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十卷

1849年8月—1851年6月

著 作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 民 出 版 社

35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唐桂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  
ISBN 7-01-002423-5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 - 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9553 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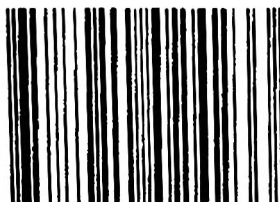
1998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1 插页 13

字数:711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2423-5/A·225 定价:55.00 元

ISBN 7-01-002423-5



9 787010 024233 >

##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9 年 8 月中旬到 1851 年 6 月底所写的政治论著、党内文件、时政评论、通讯报道、图书评介等著述。

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大陆各国的 1848—1849 年革命接连失败，欧洲革命开始转入低潮，而资本主义经历了重大危机以后，开始出现转机，并且很快就走向繁荣。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 年下半年先后流亡到了伦敦，这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新形势下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加强党的工作，尽可能快地对 1848—1849 年革命从理论上作出全面的总结。为此，除了日常工作如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和救济革命流亡者以外，最迫切的事情是要创办一家能继续《新莱茵报》事业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报刊。经过多方努力，《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一期于 1850 年 1 月份正式出版。这是第一家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杂志。本卷的大部分文章，都取自该杂志。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连载的马克思写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大发展和实际运用。恩格斯在 1895 年为重新出版该书而写的导言中指出，这“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见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出色地联系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实际，充分阐发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原理，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各阶级、各党派和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以及各种不同的政体的作用；革命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等等。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说明了革命如何加速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如何在革命的进程中迅速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积极行动起来，直接投身到政治斗争中去。他形象地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见本卷第214页）这一概括革命运动巨大历史作用的名言。革命胜利前进是这样，革命遭到失败也是这样，也同样能提高群众的认识，为他们的下一次革命准备更多的实际经验和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法国1848年六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见本卷第157页）经过革命失败的血的洗礼，法国无产阶级将抛弃各种色彩的所谓社会主义而日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马克思在给这种革命社会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下定义时，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意义重大的概念，并且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理论方面的任务。他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

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见本卷第 220 页)

法国六月起义后改组了的议会在制定共和国宪法时,删去了二月革命后通过的宪法草案中的“劳动权”,代之以“享受社会救济权”。马克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无产阶级概括自己经济改造要求的简明的公式。他认为,“劳动权”只是“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 165—166 页)。恩格斯在 1895 年高度评价了这个想法,他认为,马克思是“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可见,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见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对法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政治态度逐一作了剖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并且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他用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农民的状况,回顾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农民处境恶化的过程,他指出,法国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他们的剥削者实际上都是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见本卷第 214 页)根据对法国革命中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马克思得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极为重要的结论:无

产阶级在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

恩格斯在《革命的两年》一文中，向英国工人阶级介绍了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的内容，而且直接摘引了其中许多十分重要的段落。

本卷所收入的一些著作，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对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经验所作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写的 1850 年 3 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等都是这样的著作。

在 3 月的《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出，《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原理，在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进程中都得到了证实。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提出的对同盟进行改组的计划，是同盟改组的理论基础。3 月的《告同盟书》总结的主要一点，就是必须建立和保持秘密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组织，因为革命失败后，在德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言论自由。工人政党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的策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抗衡，即使在同其他民主派政党合作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做；如果起义胜利，无产阶级就应该保持独立的武装，而不应当把武器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必要时都应予以回击，甚至武力回击。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德国的状况，认为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能力领导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工人阶级就必须独立地、不间断地将革命进行下去。关于不断革命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48—1849 年发表于《新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中都已经说到了，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 3 月的《告同盟书》中，则对不断革命论作了经典性的最完整的表述。他们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实现了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



革后,就希望尽快结束革命,相反地,“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 389 页)

本卷中另一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 6 月份写的,这篇《告同盟书》同 3 月的那篇一样,指出“德国全国各地都需要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的组织”,也明确指出了工人政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工人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派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于其他任何政党。”(见本卷第 424、426 页)6 月的《告同盟书》还通报了同盟在国内外的活动情况以及各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活动的情况。

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是对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总结的一部分,也是他以亲身参加者和目击者身分写出的生动翔实的报道。恩格斯认为,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最后阶段中为维护帝国宪法而举行的武装起义,最突出地表现了典型的德国特色。起义的起因、它的发生、它的方向、它的整个进程都是纯德国式的,它反映了德国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程度。整个著作生动地刻画出,取得领导权的小资产阶级如何随着革命的步步深入逐渐从口头革命转变成背叛革命。他用这次武装起义的大量事实证明,德国的小资产者在当时、在以后永远都不能领导革命。只有工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者才能将革命进行下去。“最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见本卷第 94 页)

恩格斯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本卷收入的又一长篇著作。在这里，恩格斯首次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分析比较久远的一段历史，他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教育人民群众从自己祖先英勇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力量。他用三百年前伟大农民战争中顽强而坚韧的形象来鼓舞人民群众，使他们摆脱当前的消沉状态重新振奋起来。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利用德国历史学家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中的材料证明，16 世纪德国的市民阶级同他们 19 世纪的后代即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在革命的后期背叛了革命人民，出卖了革命，使革命最后归于失败。与此同时，他还着重指出，当时的被压迫群众由于自己阶级地位的局限而军令不统一、行动散漫，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进行战斗，也是革命失败的原因。

德国 1525 年农民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旗号下进行的。一些史学家据此认为，这场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神学上的争论。恩格斯指出，“16 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见本卷第 482 页)他在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同时，揭示出宗教改革同农民战争的关系，揭示出它们的社会经济原因及阶级实质。这为我们提供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剖析已往历史的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三篇《时评》和恩格斯为英国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的《民主评论》撰

写的《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两组共 12 篇文章,是对欧洲各国时局的跟踪分析报道和评论。这些文章同《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等著作的分析一样,并且以最新的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著作中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运用于当时面临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章中评述的当时的政治问题,不仅涉及法国和德国,而且也涉及英国、俄国、瑞士、美国,他们甚至关注着远在亚洲东部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方向。在《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中,恩格斯还提出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问题。例如在《法国来信》中,他就提出了工人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他在谈到法国对农村增加赋税使农民开始觉醒时说:“在法国农业地区,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已经得到惊人的广泛传播…… 社会民主派一旦把农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星期,红旗将会在土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的上空飘扬。”而且农民阶级“终于开始懂得: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那种虽有小块份地却越来越受痛苦和饥饿煎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见本卷第 127—128、247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篇《时评。1850 年 5—10 月》中,对欧洲革命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欧洲革命不可能很快就爆发,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生产正开始繁荣,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正以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以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的。“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

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见本卷第 596 页)关于危机和革命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作了进一步的、更为科学的表述。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欧洲形势将如何发展,特别是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个革命高潮,这是各党各派都极为关心的问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代表的一批冒险主义分子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确估计,他们不顾客观现实的状况,急切盼望下一次革命很快到来。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要求同盟的全部活动以及同盟的组织建设和改造,都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开展。如果按照他们这种毫无根据而只凭主观愿望提出的计划来行动,势必使同盟过早地发动革命从而陷于孤立并导致完全的失败。这种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同盟中央大多数持正确观点的委员的反对。从 1850 年 7 月底开始,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为了同中央的多数作斗争,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同盟内部进行了反对中央的活动,而且在党外还同小资产阶级集团的首领结成宗派主义的联盟。由于维利希和沙佩尔坚持自己的错误,中央在 9 月 15 日决定将维利希和沙佩尔开除出同盟,并且决定将同盟中央迁到科隆,将自己的职权交给科隆的区部委员会。

本卷还收入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和第 4 期上发表的共 6 篇书评。这些书评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背弃革命的行径作了进一步的批判。

基佐曾经是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史学家,也是最早发现阶级斗争

并认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史学家之一。他曾经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成功地剖析了英国、法国的历史事件,产生过进步的影响。但是在欧洲 1848—1849 年革命以后,他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而用唯心主义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空话代替科学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基佐的《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一书时指出:“即使旧制度下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他们那里不能不认为是史学天才的人物,也被不幸的二月事变弄得头晕目眩,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基佐先生不是通过二月革命去理解 1830 年法国君主制度和 1688 年英国君主制度之间迥然不同的历史情况、迥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而是用一些道德词句去抹杀它们之间的全部区别……”(见本卷第 261 页)这表明,资产阶级当时已经不再揭露社会的真相,而是力图掩盖事实、混淆视听,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中连先进的代表人物,也不再参加革命,更谈不上领导革命了。

资产阶级先进的代表人物在 1848—1849 年欧洲革命前后开始没落。这一现象并不是个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时,也指出了这种现象,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著述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著述中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见本卷第 312 页)他写的法国革命史、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和恩格斯曾经评论过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但是在《当代评论》中卡莱尔强化了自己原来就存在的英雄史观,他认为,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都可以是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真理并且按照真理去行动的贤人和贵人同与此相反的愚人和贱人之间的矛盾。结论自然就

是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卡莱尔否认“全部历史过程”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他们本身自然为一定的、本身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见本卷第 318 页)。这种结论的必然结果,就是为当时统治者张目,维护甚至加深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丑恶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两名法国警探谢努和德拉奥德的回忆文章时指出,对于职业密谋家,现有的一切描绘始终没有真实地把握住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追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职业密谋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些人中不少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的带着这个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的浪荡汉。“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固定观念中那些混乱思想和偏见……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更富理论性的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见本卷第 333—334 页)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秘密组织的目的已经不是直接组织起义,而是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秘密组织在 30 年代末就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性质。到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无疑已经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而老密谋家也不得不追随这个运动,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老密谋家的批判,同样也是针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

本卷收入了两篇恩格斯写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文章:《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这两篇论述十小时工作日的文章表明,恩格斯认为英国当时的十小时工作日是封建势力反

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手段。因此要工人阶级认识到，“**他们要获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见本卷第 286 页）在当时条件下“十小时工作日法对工人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是保护工人身体所必需的。没有十小时工作日法，英国整整一代工人的身体就要垮了。”“我们不但毫不反对，我们甚至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一天，为了不让妇女和儿童劳动过度，将采取远比十小时工作日法，甚至比八小时工作日法更严格得多的措施。”（见本卷第 307、286 页）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 1 卷中，对十小时工作日法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评价。

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中，马克思又重新投入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恩格斯则利用一部分时间钻研他深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本卷发表的《反思》一文，反映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初步成果之一。《反思》是他 1848—1849 年革命后在伦敦写的经济学笔记（即通常所说的《伦敦笔记》）中反映部分研究成果的一篇文章。当时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金银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特殊地位，而消除危机的办法就在于银行改革。针对这种理论，马克思试图从生产领域去探索危机的根源。《反思》包含有未来的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论点，这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发展成完整的再生产理论。

本卷收入的《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是恩格斯研究军事的成就之一。恩格斯这篇不是为发表只是为自己练习并同马克思交换看法而写的军事著作，是他研究工作的一个重大成就。他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科学研究方面，首次揭示出“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

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正确地运用在他以前所发明的物质手段的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见本卷第 666、663 页),他还强调了战术的运用同士兵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关系。

本卷收入的文献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7 卷以及第 44 卷属于这一时间段的一部分文献。本卷新收入的文献有 8 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5 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盈利和发行量的估价单》、《为再次发表路易·梅纳尔(Jambes)一诗加的按语》、《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为转载〈共产党宣言〉第三章加的附注》和《卡尔·马克思文集》;附录 3 篇:《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2 月 25 日举行的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两周年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9 日收据》和《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20 日收据》。根据本全集的编辑原则,有些证件和私人信件,将分别收入性质相应的以后的卷次。此外,恩格斯和马克思于 1850 年 6 月分别写给《新德意志报》编辑的信,在本卷中合并编为一篇。有的著作属于手稿,原文没有分段,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参考其他语种的译文划分了一些段落。本卷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部分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德文版第 7 卷。本卷还新收入了一封马克思《致〈纽约州报〉编辑部》的信,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出版以后新发现的文献,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发表的原文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李成毅  
季 丰 朱中龙 韩文臣 朱 霞  
张 红 冯世熹

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章丽莉 卢晓萍  
耿睿勤 夏 静 冯如馥 胡永钦 蒋仁祥  
李锁贵 朱 羿 章 琳 毕 磊 李 楠  
孙家衡

全卷译文由张奇方、韦建桦审定

# 目 录

前言 .....	1-12
弗·恩格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	3-109
一 莱茵普鲁士 .....	10
二 卡尔斯鲁厄 .....	31
三 普法尔茨 .....	47
四 为共和国捐躯! .....	66
弗·恩格斯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泰晤士报》 .....	110-111
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盈 利和发行量的估价单 .....	112-11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出版启事 .....	115-116
弗·恩格斯 德国来信 .....	119-123
[德国的政治形势。——普鲁士和奥地利为最高权力 而进行的争吵]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	124-128
[酒税]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	129-240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	132

二 1849年6月13日 .....	158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	191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	226
弗·恩格斯 德国来信 .....	241—245
关于德国暴君的有趣揭露。——蓄意对法国进行的战争。	
——即将来临的革命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	246—248
红色共和主义光辉成就的鲜明证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 .....	249—266
I. 评格·弗·道默《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	
共两卷。1850年汉堡版 .....	249
II. 评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请求德国陪审官保护	
全体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1849年美因河	
畔法兰克福版 .....	256
III. 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	
1850年巴黎版 .....	26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时评。* 1850年1—2月 .....	267—281
弗·恩格斯 十小时工作日问题 .....	282—28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启事 .....	289—290
弗·恩格斯 德国来信 .....	291—294
普鲁士国王宣誓效忠宪法和“侍奉上帝!”——神圣同盟的	
大阴谋。——日益临近的对瑞士的进攻。——征服和瓜分	
法国的计划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	295—298
时代的象征。——预期中的革命	

弗·恩格斯 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 .....	299—31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 .....	311—354
I.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 模范监狱》1850年伦敦版 .....	311
II.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前警备队长阿·谢努《密谋家,秘密组织; 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 西安·德拉奥德《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 .....	324
III. 评埃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1850年巴黎版 .....	34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时评。* 1850年3—4月 .....	355—359
弗·恩格斯 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 .....	360—381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	382—384
选举。——红色分子的辉煌胜利。——无产阶级的优势。 ——秩序党人的沮丧。——对革命进行镇压和挑衅的新计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 同盟书 1850年3月 .....	385—396
卡·马克思 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 .....	397—40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再次发表路易·梅纳尔 《Jambes》一诗加的按语 .....	40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 .....	402—40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辟谣 .....	40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 .....	407—409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	410—413
[三月选举后的政治形势。——巴黎的重新选举]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	414—415
弗·恩格斯 * 法国来信(片断) .....	416—417

[废除普选权的结果]	
弗·恩格斯 * 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的“无政府之友” …	418 — 42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	
同盟书 1850年6月 .....	423 — 430
卡·马克思 * 致《纽约州报》编辑部 .....	431 — 43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普鲁士流亡者 .....	434 — 43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 .....	437 — 44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地球》报编辑的信 .....	441 — 443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	444 — 448
[普选权的废除。——给总统的薪俸。——奥尔良派和 正统派的协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 .....	449 — 45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威悉报》编辑部的信 .....	451 — 452
卡·马克思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	455
弗·恩格斯 德国来信 .....	456 — 459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	460 — 463
[新闻出版法。——议会休会]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	465 — 567
一 .....	468
二 .....	481
三 .....	502
四 .....	518
五 .....	523
六 .....	551
七 .....	56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的声明 .....	56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为转载《共产党宣言》 第三章加的附注 .....	57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约·格·埃卡留斯的《伦敦 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的编者按语 .....	572—573
卡·马克思 * 《时评。1850年5—10月》一文中 有关德国的草稿 .....	57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时评。1850年5—10月 .....	575—62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鲍威尔和普芬德关于伦 敦工人教育协会的钱款的声明草稿 .....	622—62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 的声明 .....	624—625
卡·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文集 .....	626—62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奥·布朗基祝酒词的 德译文的按语(附祝酒词全文) .....	630—632
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	633—635
卡·马克思 反思 .....	636—647
弗·恩格斯 *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 前景 .....	648—678
卡·马克思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 和国宪法 .....	679—695

## 附 录

救济德国流亡者的呼吁书 .....	699—701
-------------------	---------

- \*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收据…………… 702
- \*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收据…………… 703
- \*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以及  
关于建立社会民主主义救济委员会的决议…………… 704—707
- 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 召股启事…………… 708—709
- \*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2 月 25 日举行的纪念法国  
    二月革命两周年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 710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711—714
- \*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4 月 5 日纪念马·罗伯斯  
    比尔诞辰 92 周年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 715
- 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4 月 8 日会议记录…………… 716—717
-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718—719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720—722
-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723—724
-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5、6、7 月的  
    财务报告…………… 725—728
- \*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9 日  
    收据…………… 729
- \*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9 月 10 日“民主派兄弟  
    协会”为海瑙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 730
-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15 日会议  
    记录…………… 731—737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8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  
    的财务报告…………… 738—740



*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20 日 收据 .....	741
*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致科隆的同盟中央委 员会建议书 .....	742—743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	744—747
*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12 月 30 日“民主派 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 .....	748
注释 .....	751—834
人名索引 .....	835—897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	899—902
文献索引 .....	903—936
报刊索引 .....	937—948
地名索引 .....	949—966

## 插 图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的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图 (1849 年 5 月—7 月) .....	56—57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封面 .....	117—118
英国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的扉页, 以及载有弗·恩格斯的 《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两篇文章的两页 .....	121—122
卡·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 译本 1942 年延安解放社版(作为“马恩丛书”第 12 种)的 封面和译文 .....	130—131
卡·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原件影 印件 .....	453—454

---

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译本的	
封面和译文 .....	466—467
德国农民战争图 .....	528—529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战争图(1525年) .....	546—547
1850年11月9日在《红色共和党人》第21号上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的第1页 .....	569—570
《马克思文集》1851年科隆版第1册扉页 .....	627—628
卡·马克思的《反思》手稿的一页(第VII笔记本第48页) .....	637—638
弗·恩格斯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	
手稿的第1页 .....	649—650
载有卡·马克思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的《寄语人	
民》杂志的一页 .....	681—682

卡 · 马克思

和

弗 · 恩格斯

1849年8月—1851年6月



弗·恩格斯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sup>1</sup>

弗·恩格斯写于1849年8月  
中—1850年2月

载于1850年1月、2月、3月《新  
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  
2、3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①都打倒杀死！”<sup>2</sup>

这是一段副歌，是南德的“人民自卫团”在从普法尔茨到瑞士边界的所有道路上和旅店里到处高唱的一段歌词，它套用了“在大海怀抱中”这个大家熟悉的又像圣歌又像手摇风琴曲的谱子。这段副歌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sup>3</sup>的全部性质。这两行歌词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的大人物、他们的最终目的以及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起敬的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

在二月革命<sup>4</sup>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引起的一切运动和动荡中，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突出地表现了典型的德国特点。它的起因、它的发生、它的方向、它的整个进程都无一不是纯粹德国式的。正如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sup>5</sup>表明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一样，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表明了德国的尤其是南德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所谓的市民阶层，而这个

---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出版者为应付书报检查删掉了“德意志君主”。——编者注

阶级在德国,特别是在南方,恰恰占着主导地位。正是小资产阶级在“三月协会”<sup>6</sup>、民主立宪协会、爱国协会<sup>7</sup>、许许多多所谓的民主协会中以及在几乎一切的民主派报纸上,对帝国宪法发出不计其数的但又不关痛痒的格吕特利的誓言<sup>8</sup>,并且还进行了反对“不听话的”君主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唯一后果,最初自然只是他们自己感到履行了国民义务而扬扬自得罢了。正是以法兰克福议会<sup>9</sup>中坚定的所谓极左派为代表的,即特别是以斯图加特议会和“帝国摄政政府”<sup>10</sup>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正式领导了整个运动;最后,小资产阶级在各邦的地方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临时政府和制宪议会里面都占统治地位,而上述这些机构在萨克森、莱茵省和南德为捍卫帝国宪法多少作出了一些贡献。

假如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么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规规矩矩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以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自1830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响应并郑重其事地参加由它发起的运动,它就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不坚决,一旦反动的政党取得胜利,它总是倍受欺骗和凌辱。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背后,处处都有其他阶级来响应由它所发起并为它的利益而服务的运动,它们促使这个运动性质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而且一有可能就尽力去掌握运动。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和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此外,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别也往往暂时依附于它们。

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这些阶级,对待忠于帝国宪法的矢志保证,比小资产阶级鼓动家本身要认真得多。如果说小资产者像他们所不断发誓的那样,为了帝国宪法不惜“牺牲一切”,那么,工人、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情愿这样做,而且面临着一个各党派都心照不宣的条件,那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必然为维护这部帝国宪法转而反对这些工人和农民。这些阶级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同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开决裂。如果说,他们未能制止住自己的小商人式的盟友甚至在斗争期间就在叛卖,那么,他们至少有一点可以感到满意,就是反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叛卖行为却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另一方面,在运动的初期,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比较坚决的派别也曾依附过小资产阶级,这同英国和法国历次小资产阶级运动中的情形完全一样。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实行统治的;且不谈至今在自己的手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就是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也立即分裂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另一方代表厂主。其次,和执政派别相反,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在野的进步派别,却和小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和它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在德国,武装的反革命恢复了差不多是由军队、官僚和封建贵族独霸的统治;那里尽管还存在宪法的形式,但是资产阶级只不过扮演着极其平凡的配角,因此,那里存在更多的理由来实行这种联合。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起英法的资产阶级来要怯懦得多,只要有一点点再发生混乱即进行真正决战的迹象,它便会张皇失措地退出斗争的舞台,这一次的情

形也是这样。

其实时机决不是不利于斗争的。法国那时选举<sup>①</sup>在即，这次选举不论谁得多数票，保皇党也好，红党也好，结果总会排挤制宪议会的中间派，加强两个极端的政党，使得尖锐化了的议会斗争通过人民运动而迅速解决；一句话，选举必然会使“决定性的一天”来临。在意大利，罗马城下进行着战斗，罗马共和国顶住了法国的干涉军<sup>11</sup>；在匈牙利，马扎尔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猛进，帝国军队被赶过了瓦格河与莱塔河；在维也纳，人们每天都恍若听到炮声，匈牙利的革命军随时都可能到达；在加利西亚，人们在等待邓宾斯基率领波兰—马扎尔军队到来，而俄国的干涉，远远危害不到马扎尔人，相反地，看来它会把匈牙利的斗争变为欧洲的斗争<sup>12</sup>；最后，在德国笼罩着非常强烈的激昂情绪；反革命实行进攻，军阀、官僚和贵族越来越横行无忌，内阁中的老牌自由派不断叛卖，君主们<sup>②</sup>背信弃义的事件一个紧接着一个，凡此种种都使得整批整批的过去拥护秩序的人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

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起来的，我们在下面的片段里，就要来描写这个斗争。

由于所有的材料都还不完备而且混乱，由于所搜集的参加者的口述材料几乎都根本不可靠，由于迄今出版的所有论述这次斗争的著作都具有纯粹的个人目的，以致不可能对事件的全部进程加以评述。因此，我们只好限于叙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东西。幸而这些

---

① 见本卷第184—190页。——编者注

②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出版者为应付书报检查删掉了“君主们”。——编者注

东西已经足以说明整个运动的性质；固然，单凭个人印象我们不能够说明萨克森的运动和梅洛斯拉夫斯基向内卡河的进军，但是《新莱茵报》杂志可能在最近找到个机会至少对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作一些必要的说明<sup>13</sup>。

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人有许多还关在监牢里，另外一些人已经得到机会返回家园了，还有一些人仍然侨居国外，整日期待回国的机会，他们中间没有最糟糕的人物。在关系到这些斗争的参加者时我们必须谨慎，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对某些事秘而不宣，也很自然。现在有一些人重新住在国内没有遭到迫害，在这里我们不想叙述那些表现出他们真正英勇非凡的精神的事件以免把他们暴露出来，对此他们是不会责备我们的。

## 一 莱茵普鲁士

读者还记得,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是5月初首先在德累斯顿爆发的<sup>14</sup>。大家知道,得到农村居民的支持但被莱比锡小市民出卖了的德累斯顿街垒战士们,经过六天的战斗之后,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打败了。这里的战士不超过2500名,他们的武器是形形色色的,他们的炮兵只有两三尊不大的轻型臼炮。而王室军队除了萨克森的几个营以外,还有两个普鲁士团,他们拥有骑兵、炮兵、步枪手和一个针发枪营。在德累斯顿,王室军队大概比在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胆怯<sup>①</sup>;然而同时,无可怀疑的是,德累斯顿的战士们在和这些优势敌人作战时要比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的任何人都更为勇敢。当然,巷战同开阔地上的野战是完全不同的。

在柏林,由于实行戒严和解除武装,一直保持着宁静的气氛。甚至没有为了在柏林城下就把普鲁士增援部队截住而扒掉铁路。布雷斯劳那里曾发动一场街垒战,但是没有气势,况且政府早有戒备,因此,这个城市更是注定陷入军刀的专政之下。德国北部其余地区失去了革命中心,陷入了瘫痪状态。只有把希望寄托给莱茵普鲁士和德国南部;而在德国南部的普法尔茨此时也已经行动了起来。

---

<sup>①</sup>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出版者为应付书报检查将这里的“胆怯”改为“可怜”以缓和语气。——编者注

自 1815 年以来,莱茵普鲁士被认为是(有理由这样认为)德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它兼有两个优势,这种情况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莱茵普鲁士和卢森堡、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共同具有这样一个优势:1795 年以来,法国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在拿破仑时代又得以巩固下来的社会、行政和立法各方面的成果,给予了这些地区以直接的影响。革命党在巴黎失败以后,军队便把革命带到了法国国外。在这些刚刚解放了的农民子弟的冲击下,不仅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而且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统治也分崩离析了。在莱茵河左岸已经有两代人不知封建主义为何物:贵族已经被剥夺了特权,土地所有权从贵族和教会的手中转入农民的手中,土地都被分成小块,农民也像在法国一样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城市里,行会和宗法式的贵族统治比德国其他的地方早十年就消失了,让位给自由竞争,最后,拿破仑法典<sup>15</sup>总括了革命的全部建制,在法律上承认了整个这种改变了的秩序。

另外,莱茵普鲁士拥有全德最发达、门类最多的工业,这也就是它同莱茵河左岸的其他各邦比起来所具有的主要优势。在亚琛、科隆和杜塞尔多夫这三个行政区,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了: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应有尽有,还有附属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其次,采矿业、军火生产和其他的金属生产都集中在这块没有多少平方德里的面积上,使从业人口的密度在德国达到空前的程度。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与莱茵省紧相毗连,它满足了莱茵省在原料上的部分需要,在工业方面依附于莱茵省。这里有德国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外,工业部门还敷设了许多铁路,并且每天都在扩大自

己的铁路网。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大集散地的直接频繁来往,以及在原料和铁路股票上的相应的投机买卖等,与这里的工业息息相关。总之,莱茵省工商业发展的程度,虽然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还无足轻重,但在德国说来,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莱茵普鲁士,由于工业(它也是在革命的法国的统治下繁荣起来的)和与之相关的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以及与其对立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德国其他各地只是零散地存在着,并且还处在萌芽阶段,然而在这里,它们却几乎完全决定着莱茵省独特的政治发展。

莱茵普鲁士比德国其他受法国人的影响而革命化了的地区优越的地方是它的工业,比德国的其他工业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优越的地方是它继承了法国革命。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社会发展几乎完全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地区,这里有发达的工业、广泛的贸易、资本的积累、地产的自由;在城市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里占主要地位的是人数众多、负债累累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制来统治无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农民,通过竞争来统治小资产阶级;最后,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资产阶级的陪审制和整个物质立法的承认。

莱茵省的居民为什么要憎恨一切普鲁士的东西,现在还不明白吗?普鲁士简直是把法国革命和莱茵省一道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它不仅把莱茵省居民当作被征服的外国人来对待,而且还当作战败了的叛乱者来对待。普鲁士不但不本着日益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来改善莱茵省的立法,而且甚至想强迫莱茵省居民接受普鲁

士邦法，而普鲁士邦法是一种迂腐的、封建而庸俗的混合物，它即使在东波美拉尼亚也未必再适用。

1848年2月以后的转变清楚地表明了莱茵省的特殊地位。莱茵省不仅给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而且给整个的德国资产阶级提供了自己的典型代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它给德国的无产阶级提供了唯一的不仅凭口说或者善良的愿望而且按照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来代表它的一个机关报，这就是《新莱茵报》。

尽管如此，莱茵普鲁士过去很少参加德国的革命运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不应该忘记，30年代的运动是为了空谈家和律师的那种立宪主义而进行的，它对于从事更为实际的事业即从事工业企业的德国莱茵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利益；当各小邦还在幻想德意志帝国的时候，在莱茵普鲁士无产阶级已经公开地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了；在1840—1847年，即在资产阶级的真正立宪主义运动的时期，莱茵的资产阶级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而在1848年三月事件<sup>16</sup>的时候，在柏林它对斗争的结局曾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为什么莱茵普鲁士在公开的起义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任何成就呢？为什么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全省的总起义呢？为了说明这一切，最好是简单地叙述一下莱茵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德累斯顿，斗争才刚刚爆发；在普法尔茨，斗争随时都可能发生。巴登、符腾堡、法兰克尼亚，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几乎没有人讳言自己以武器解决问题的决心。在整个南德，军队处于动摇状态。普鲁士同样是群情激昂。无产阶级因为1848年3月间自认为已经争到手的那些权利又被人骗走，正在伺机报仇。小资产阶级处处都企图把一切不满分子联合成一个拥护帝国宪法的大派别，并希望自

己来领导它。在一切报纸上,在所有俱乐部和酒吧间,那种与法兰克福议会共存亡、不惜为帝国宪法而牺牲一切的誓言,简直是处处可见,处处可闻。

在那个时候普鲁士政府也已经展开了敌对的活动,它征召了相当大一部分后备军<sup>17</sup>,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的后备军。在和平时期发布征召后备军的命令是违法的,不仅小资产阶级,而且富裕资产阶级也都群起而攻之。

科隆市参议会宣布召开莱茵省各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大会。政府禁止召开这次会议;于是,人们决定不拘形式,尽管有禁令,大会还是召开了。各市、镇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宣布自己承认帝国宪法,要求普鲁士政府接受帝国宪法,要求内阁辞职,并且要求取消后备军征召令,他们几乎公开地威胁说,一旦政府拒绝这些要求,莱茵省便与普鲁士脱离关系。

“鉴于第二议院在主张无条件接受本年3月28日所公布的德意志宪法以后被普鲁士政府所解散,致使人民的代表权和表决权在目前这一决定性时刻被普鲁士政府所剥夺,下面署名的莱茵省城市和乡镇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议,共商国是。

会议在特里尔市议员采尔和科布伦茨市议员韦尔纳的主持下,在书记科隆市议员伯克尔和杜塞尔多夫市议员布勒姆第二的协助下,通过如下的决议:

(1)会议声明,承认帝国议会本年3月28日所公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既定的法律,并且在普鲁士政府挑起的冲突中,支持德意志帝国议会。

(2)会议要求莱茵省全体居民,特别是能手持武器的所有男人,以大大小小的团体的名义集体地宣布:愿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坚决捍卫德意志帝国宪法、贯彻帝国宪法的规定。

(3)会议要求德意志帝国议会尽速采取有力措施,使德意志各邦人民,尤其是莱茵省的人民在进行反抗时能够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只有团结和强大才能挫败组织良好的反革命势力。

(4)会议要求帝国政府尽速安排帝国军队宣誓效忠宪法,并下令将军队集



中起来。

(5)下面署名的代表们保证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争取使帝国宪法在自己的市镇范围内得到承认。

(6)会议认为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以及在现行选举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召开两院会议,是绝对必要的。

(7)会议特别认为不久前对部分后备军的征召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危害国内和平的措施,望立即撤销此项命令。

(8)最后,下面署名的代表们深信,拒不理会本声明的内容,将给祖国造成极为严重的危险,甚至可能危及普鲁士现今的版图。

1849年5月8日在科隆通过。”

(签名)①

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就是主持这个会议的那位采尔先生,几个星期以后,竟以法兰克福帝国内阁<sup>18</sup>的帝国专员的身分到了巴登;在那里,他不仅号召大家保持平静,而且和当地的反动分子共同策划了后来在曼海姆和卡尔斯鲁厄所采取的反革命行动。此外,他还很可能同时作为军事奸细替帝国将军波伊克尔效过劳。

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大资产阶级——三月革命前的莱茵省自由主义之花——从一开始就企图在莱茵普鲁士领导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它的言论、它的决议、它的所有行为,使它不能不对以后发生的事件担负责任。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市、镇参议员先生们的话,尤其是相信了他们关于莱茵省脱离普鲁士的那种威胁性的说法。一件事情,只要有资产阶级的参预,那就可以认为已经注定成功,就可以指望居民中的一切阶级的支持,因而也就可以去冒点险了。小资产阶级的算盘就是这样打的,于是它急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不言而喻,这毫不妨碍小资产阶级的假盟友

① 见1849年5月9日《科隆日报》第110号第2版。——编者注

大资产阶级一旦机会到来就出卖它，而且到后来，当事情十分悲惨地终结时，还要在事后嘲笑它的愚蠢。

在此期间，激奋的情绪有增无已；来自德国各地区的消息都充满着战争气息。最后，事情演变到装备后备军的地步。各营的人集合了起来，他们坚决声明不穿军装。少校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事情没有闹到威逼和动武的地步他们倒称幸不已。他们把士兵解散了，重新指定一个装备的期限。

政府当时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给后备军军官以必要的支持，但故意听任事态发展到那个地步。而现在，它却一下子就使用起武力来了。

那部分不服从命令的后备军，主要属于贝格-马尔克工业区。反抗中心是埃尔伯费尔德和伊瑟隆、索林根和恩讷珀河谷。前两个城市立即就有军队开去了。

开赴埃尔伯费尔德的有第十六团的一个营，有一个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城里面一片慌乱。后备军的士兵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决定来一次冒险。许多农民和工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最怕的是政府一翻脸便使他们遥遥无期地离开家园。当他们想到反抗的后果时，心情就沉重起来：构成犯罪、触犯战时条例、罚苦役，甚至可能挨枪子！总之，处于战斗状态的后备军士兵的数目（他们手头都有武器）一天比一天少，最后只剩下大约 40 个人。他们在城外的一个饭馆里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在那里等候普鲁士人。在市政厅周围有市民自卫团和两队市民射击手；他们摇摆不定，和后备军进行着谈判，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决心保护自己的财产。居民潮水般地涌向街道，这里有在政治俱乐部宣誓效忠于帝国宪法的小资产阶级，有各种类型的无产者：既有坚决革命的工人，也有醉醺醺的运货马车夫，

谁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

市参议会想和军队进行谈判。司令官拒绝了，并开进城内。军队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到市政厅的旁边列开队伍和市民自卫团对峙。谈判开始了。群众中有人向士兵扔了几块石头。前面所说的为数约 40 人的后备军，从城市的另一侧开到这边来了，经过长时间的商议以后他们也驻在军队的对面。

突然人群中发出了释放囚犯的呼声。在紧靠着市政厅的监狱里，有 69 名索林根工人已经被监禁一年，罪名是捣毁了城堡旁的铸钢厂。再过几天就要开庭审判。人群涌向监狱，要把他们放出来。大门被撞开了，人们一拥而入，囚犯被放出来。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军队开了过来，一排枪响，从牢门跑出来的最后一个犯人应声倒地，脑袋被打得粉碎。

人群后退了，但他们大喊道：到街垒上去！转瞬间，通向市中心的所有通路都被封锁了。没有武器的工人很多，在街垒后面有武器的不超过 50 人。

大炮移到前面来了。无论是刚才的步兵或是现在的炮兵都射击得过高，大概是故意的。这两部分军队都是由莱茵省人或威斯特伐利亚人组成的，他们用意都是善良的。后来，冯·乌滕霍芬上尉率领第十六团第八连来到了前面。

在第一座街垒的后面有三个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喊道：“不要向我们开枪，我们只打军官！”连长命令道：“注意！”在街垒后面有个射手喊道：“你要是敢喊‘预备’，我们就地干掉你。”“预备，放！”一排枪响，就在那一瞬间，连长也倒了下去。子弹正中他的胸膛。

士兵们仓皇后退，连连长的尸体也没带走，又响了几枪，有几个士兵负了伤。指挥官不想在起义的城市中过夜，便率领自己的部队

出了城,同部队一起露宿在离城步行一小时之远的地方。大兵一撤走,跟着四面八方就筑起了街垒。

普鲁士人撤退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到了杜塞尔多夫。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头;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都兴奋异常。接着又有传闻说将有新的军队派到埃尔伯费尔德去,这个消息就成了发动的信号。有一些工人,他们不顾武器的不足(自1848年11月起市民自卫团就被解除了武装),不顾有相当强大的驻防军,也不顾这个前公国小首府的宽阔而笔直的街道对起义者不利,就发出号召:到街垒上去!新街和博尔克街上构筑了几座防御工事;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方面是由于早已有军队集结在那里,另一方面是由于富裕市民和小市民胆怯,而没有构筑任何的工事。

傍晚时分战斗打响了。这里也像别的地方一样,街垒战的战士很少。再说他们到哪里去弄武器和弹药呢?难得他们给处于优势的敌人以长时间的和坚强的抵抗,有几个本来可以守住的街垒,只是在敌方频繁地使用大炮之后,才于清早时分陷入普鲁士人之手。大家知道,这些行动谨慎的英雄们在第二天对女仆、老人和其他的和平居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就在普鲁士人从埃尔伯费尔德被赶走的那天,有一个营(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是第十三团的一个营)开赴伊瑟隆去镇压当地的后备军。但是在那里这个计划也破产了:后备军和人民刚一知道军队逼近的消息,就在通往城市的所有道路上构筑起街垒,荷枪实弹以待敌人。这个营没有敢打就后退了。

埃尔伯费尔德和杜塞尔多夫的战斗以及伊瑟隆的街垒,是贝格-马尔克工业区大部分地方实行起义的信号。索林根的居民以袭击夺取了格雷夫拉特的军械库,用那里缴获的枪枝弹药武装自己,大

批大批的哈根居民参加了运动，武装了自己，占领了鲁尔的各个要冲，并派出了侦察巡逻队；索林根、龙斯多夫、雷姆沙伊德、巴门及其他城市都派遣了自己的队伍到埃尔伯费尔德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地方，后备军也参加了运动，并愿听法兰克福议会的调遣。在埃尔伯费尔德、索林根、哈根和伊瑟隆，安全委员会代替了那些被遣散的区政权和地方政权。

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自然是被夸大得骇人听闻：整个伍珀河谷和整个鲁尔地区被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起义阵营；传说在埃尔伯费尔德有 15 000 名武装人员，在伊瑟隆和哈根两地也有如此多的武装人员。政府由于突然大吃一惊，面对最忠顺的地区的这次起义束手无策，镇压无方，这也大大地促使那些夸大的传言更加被人相信。

不管这些可能的夸大要打多少折扣，下面的这个事实终归是无可怀疑的：公开的、暂时还是所向无敌的起义席卷了贝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各个主要据点。事实就是如此。此外还有消息说，德累斯顿仍然屹立不动，西里西亚发生骚乱，普法尔茨的运动得到加强，在巴登军队里爆发了胜利的起义，大公<sup>①</sup>逃之夭夭，马扎尔人驻扎在亚布伦卡河畔和莱塔河畔。简言之，这是 1848 年 3 月以来民主党与工人党面临的一切革命时机中最有利的一个，当然必须抓住这个时机。莱茵河左岸不应抛弃右岸。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莱茵省中比较大的城市，不是有坚固的堡垒和炮台控制着的要塞，例如科隆和科布伦茨，就是有大批的驻防军，例如亚琛、杜塞尔多

---

<sup>①</sup> 莱奥波德。——编者注

夫和特里尔。此外,莱茵省还在韦瑟尔、于利希、卢森堡、萨尔路易,甚至美因茨和明登这些要塞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要塞和驻防军的兵力一共至少有三万人之多。最后,科隆、杜塞尔多夫、亚琛、特里尔早已被解除武装。因此,莱茵省的各个革命中心都已经陷入了瘫痪的境地。在这里,正如杜塞尔多夫的例子所已表明的,任何举行起义的企图都不能不以军队的胜利告终;打个比方说,如果在科隆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那么不论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消息传来,贝格-马尔克区起义者的士气都会一蹶不振。在莱茵河左岸的摩泽尔河、艾费尔高原和克雷费尔德工业区,运动虽然可能开展,但是有六个要塞和三个有防军驻守的城市把这个地区包围住了。与此相反,莱茵河右岸已经起义的各个地区,都是人烟稠密的辽阔地带,那里森林茂密、山峦重叠,简直可以说是专门为进行起义战争而创造的一个环境。

可见,支援起义地区只能有一个办法:

首先,在要塞和驻有防军的城市中,应该避免任何无益的发动;

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厂区和乡村中,应当进行佯攻,以便牵制住莱茵的防军;

最后,应该把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使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靠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心。

普鲁士的新的揭发专家们,可不要因为我在这里揭发了一个叛国阴谋,而过早地高兴吧。遗憾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阴谋。上面提出的三点措施并不是阴谋计划,而是本文作者正在他为了促进第三点的实现而前往埃尔伯费尔德时所提出的普通建议<sup>①</sup>。由于民主党和工人党组织的瓦解、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地方领导

---

<sup>①</sup> 见恩格斯1849年5月16日写的《埃尔伯费尔德》一文。——编者注

人优柔寡断和过分小心,最后还由于时间不够,所以事情没有发展到进行密谋活动的地步。如果说,在莱茵河左岸到底还是发生了试图破坏的活动,如果说,在肯彭、诺伊斯及其附近的地方发生了骚动,在普吕姆以袭击方法夺取了军械库<sup>19</sup>,那么,这些事件决不是按一个总计划安排的,而只不过出于居民的革命本能。

其实,在起义区内的情形远不像莱茵省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固然,埃尔伯费尔德这个城市,从它的街垒(虽然这些街垒构筑得极其紊乱和仓猝)、从它那许多的岗哨和巡逻队以及其他的武装人员、从它那全体涌上街头的居民(似乎只有大资产阶级没有出来)、从它的红旗和三色旗<sup>20</sup>来看,的确不错。但是,城里的其他方面却一团糟。小资产阶级靠一开始就成立起来的安全委员会,抓到了运动的领导权。可是在它刚刚达到这一步以后,却又对自己的权力害怕起来,尽管它的这点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它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来承认它的合法性,而且为了答谢市议会的美意,还吸收了5名市参议员参加安全委员会。使用这种方法壮大起来的安全委员会立刻就把所有危险工作摆脱掉了:它把对外保卫安全的任务移交给军事委员会去负责,自己只保留对军事委员会的监督权,以节制其行动。那些被本城的主宰们亲手移置在法律基础上的战战兢兢的安全委员会里的小资产者们,用这种方法使自己和起义完全隔绝了之后,就可以仅限于安定一下人心,料理一下日常事务,澄清一下“误会”,抚慰一下起义者,把事情高高地挂起来,并且借口必须先等待派到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团的回音而阻止任何坚决果敢的行动。其余的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完全追随安全委员会,到处号召保持平静,尽力阻止进一步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和加强武装,而且始终摇摆不定,不知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参加起义。

在这个阶级里面,只有一小部分人下定决心在城市遭到进攻时拿起武器自卫,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努力使自己相信,只要威胁一下,就能把政府吓得不得不停止炮击埃尔伯费尔德并实行让步;不过,这些人也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防万一。

在战斗开始后的最初一瞬间,大资产阶级吓得像遭到雷劈一样。它被吓得产生了幻觉,看见了一片烧杀掳掠,灾祸无边的景象。安全委员会(它的大部分委员是市参议员、律师、首席检察官以及有威望的人士)的成立,出乎意料地使大资产阶级的生命和财产有了保障,大资产阶级因而欣喜若狂。那些大商贾、染坊主和厂主们从前大骂卡尔·黑克尔、里奥特、赫希斯特等先生们是嗜血成性的恐怖分子,现在却成群结伙地蜂拥到市政厅去,像得了狂热病似的把那些被他们视为吸血鬼的人们拥抱来拥抱去,并掏出成千的塔勒摆在安全委员会的桌子上。不言而喻,当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也正是这些狂热崇拜和拥护安全委员会的人,又不仅对运动本身而且也对安全委员会及其委员们散布种种最荒唐、最卑鄙的谎言,并且还以同样的狂热来感谢普鲁士人把他们从空前的恐怖之中拯救出来。像黑克尔先生、赫希斯特先生和首席检察官海因茨曼先生这些无辜的立宪派市民,又被他们描写成脸上写着与罗伯斯比尔、丹东同宗的那种恐怖分子和吃人生番了。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责任为上面所提到的正人君子们彻底洗清这种罪名。再者,大部分大资产阶级都携家带着尽早地搬到了杜塞尔多夫,以便受到戒严令的庇护,只有胆量较大的一小部分人留了下来,准备不惜一切地保卫自己的财产。在起义期间,市长<sup>①</sup>躲在一辆四轮朝天的马车下,上面盖满了牲畜粪便。在斗争

<sup>①</sup> 约·阿·卡尔纳普。——编者注



的时刻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当安全委员会里面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刚一发生动摇时，也分裂了。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厂工人、部分丝织工人坚决地支持运动，然而正是这些组成无产阶级核心的工人们，却几乎是手无寸铁。像所有在劳动中需要体力多于技能的工人阶层一样，身体好、挣得多、不开化因而思想反动的染色工人，从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就表现得十分冷淡。在街垒战期间，他们是所有产业工人当中唯一继续工作不为外界所动的工人。最后，流氓无产阶级，同在任何地方一样，在运动的第二天就暴露出谁给钱就听谁使唤的习性；他们早晨向安全委员会要武器和薪饷，下午却卖身于大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看家护院，或到傍晚的时候去破坏街垒。整个说来，流氓无产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因为资产阶级给他们的钱最多，运动期间他们拿着这些钱高高兴兴地消磨时光。

由于安全委员会怠惰和怯懦，军事委员会意见分歧（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本来就是消极派占多数），从开初就难以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行动。第二天反动便开始了。马上就可以看出，在埃尔伯费尔德，只有打着帝国宪法的招牌，只有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调和，才可能指望有所成就。而这里的无产阶级，一方面不久前才刚刚从狂饮和敬神的泥坑中挣脱出来，因此连一点点关于无产阶级本身解放的条件观念都还没有进入工人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有的仇恨只是本能的，对于资产阶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要求表现十分淡漠，因而不可能满腔热情地捍卫这类三色旗的利益。结果，坚决行动派，即唯一认真地对待防御的那一派，就陷入了不妙的境地。他们宣布拥护帝国宪法。但是小资产阶级不信任他们，在人民面前对他们百般诽谤，阻碍执行他们在加强武装和巩固城防方面的一切措施。哪一道真正能够加强城市防卫力量的命令，只要碰到安全委员会的任何一

个委员,就会立刻被取消。哪一个小市民,如果发现自己的门前在构筑街垒,就会立刻跑到市政厅去弄一道拆除的命令来。守在街垒上的工人们应领的饷金(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到了不致饿死所必需的起码数目而已),只有经过一番周折,安全委员会才肯发给,而且数目少得可怜。战士们的薪饷和给养都不按时发放,并且还常常少发。在五六天的期间内,对服役人员没有检阅或集合过一次,以致没有人晓得,一旦需要,究竟可以出动多少兵力。仅仅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才试图给战士们编队,然而这一次编队很不成功,编队时连现有的战斗力量有多少都还完全没弄清楚。安全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是自作主张。颁布的命令彼此矛盾,所有的命令几乎只有一点是彼此相同,即粗心和紊乱越来越厉害,有碍于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步骤。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打消了无产阶级参加运动的兴头,只用了几天的工夫,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可能使工人消极冷淡起来。

当我在5月11日到达埃尔伯费尔德的时候,那里至少有2500—3000名战士。但是他们当中可靠的只有外埠来的增援部队和为数不多的埃尔伯费尔德的武装工人。后备军是动摇的;其中大部分人因为想到会被判处苦役而惶惶不安。起初,这样的人并不太多,但是他们的人数由于从其他部队流入一些不坚定的和胆小怕事的分子而日益增多。最后,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反动的和专为镇压工人而组织起来的市民自卫团,宣布保持中立,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保卫自己的财产。但这一切只是过了几天以后才显露出来;当时由于运动处于静止状态,外埠增援部队和工人有一部分开走了,真正的战斗力量日益减少;而市民自卫团却日益统一起来,并且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自己的反动意图。在最后的几个夜晚,他们竟毁掉了几

座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起初毫无问题在1 000人以上,可是到5月12日、13日就已经少了一半,最后,当宣布总集结令的时候才发现,能够指望的全部武装力量,充其量也不过七八百人。后备军和市民自卫团都拒不参加集结。

还不仅仅是这些! 起义的埃尔伯费尔德的四周全都是所谓“中立的”居民点。巴门、克罗嫩贝格、伦内普、吕特灵豪森等地方都没有加入运动。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人当中那些持有武器的都到埃尔伯费尔德去了。所有这些地方的市民自卫团都纯粹是厂主手中用以压制工人的工具,而且是由厂主、工厂监工和完全依赖厂主的小店主组成的;它们为了“秩序”和厂主的利益在统治着这些居民点。至于工人们本身,由于多半分散地住在各乡镇而同政治运动有了隔阂,再加上那些人所共知的强制措施和关于埃尔伯费尔德运动性质的诽谤性报道的影响,有部分人被拉到厂主方面去了;这些诽谤宣传在农民中间尤为见效。况且,运动的发生正是在15个月的经济危机之后,这时厂主终于重新获得了充足的订货,而大家知道,对于有活干的工人是谈不上革命的;这种情况也在埃尔伯费尔德发生强烈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中立的”邻居只不过是隐蔽的敌人而已。

不但如此,和其余的起义地区的联系也没有建立起来! 偶尔有个别的人来自哈根;伊瑟隆方面的消息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有些人自告奋勇愿做全权代表,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据说,埃尔伯费尔德和哈根之间的一些信使在巴门及其附近地区被市民自卫团扣留了。唯一有联系的地方是索林根,而那里的情况也与埃尔伯费尔德完全一样。索林根的工人虽然向埃尔伯费尔德派遣了四五百名战士,但由于他们的组织性好,意志坚定,仍然能够在本市与资产阶级

和市民自卫团抗衡。不然的话那里的情况可能会糟糕些。如果埃尔伯费尔德的工人也像索林根的工人那样先进,那样有组织的话,完全可能获得成功。

情况既已如此,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必须采取一些迅速而坚决的措施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给运动输入新的战斗力量,使运动的内部敌人瘫痪,在整个贝格-马尔克工业区组织尽可能强而有力的运动。第一步就应该解除埃尔伯费尔德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征税作为这样武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这一步骤将意味着彻底抛弃安全委员会先前那种消极怠惰的态度,给无产阶级注入新的生命并且瘫痪“中立”区的反抗力量。而第二步措施的任务是从这些“中立”区内设法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并且有计划地组织整个地区的防御;能否采取这第二步措施,要看第一步是否成功。其实,只要有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并且能够支配哪怕仅仅400名索林根的工人,就可以在刹那间解除埃尔伯费尔德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后者的勇气是不值得一提的。

为了保证还被羁押在狱中的埃尔伯费尔德五月事件参加者的安全,我认为有责任申明,所有这些建议都完全是由我个人提出来的。从安全委员会经费刚开始支绌起,我便主张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

但是,可尊敬的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类“恐怖措施”。我所做到的,或者毋宁说是我和部队的某些指挥官(他们全都幸运地脱离了险境,有一部分人现在侨居美国)共同自作主张而做出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夺取了克罗嫩贝格市民自卫团存放在当地市政厅里的约80支步枪。这些步枪分发得极其轻率,大部分都落入好酒贪杯的流氓无产者之手,他们在当天晚上便把这些枪支卖给了资

产阶级。原来这些资产者先生们派奸细四出到民众中去，以相当高的价钱尽量地收买枪支。这样，埃尔伯费尔德的流氓无产者就把几百支因临时政府的疏忽和混乱而落入他们之手的步枪供给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用这些枪支武装了工厂的监工和忠于资产阶级的染色工人等等，“心地善良的”市民自卫团的队伍也就一天天地加强起来。

安全委员会的先生们对于改善城市防御的任何建议所给予的回答是，所有这一切全不需要，普鲁士人没有胆量到这里来，他们不敢进入山地等等。他们自己很明白：这是在散播最荒唐的无稽之谈，从四周的高地甚至用野战炮也能轰击到这个城市，稍微像样的防御设施也没有部署，在起义停止发展而普鲁士人又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发生某种极为特殊的事件才可能挽救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

其实，普鲁士的将领们，看来也并不特别愿意向几乎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大举进军，至少在还没有集结起真正压倒优势的战斗力的时候是这样的。埃尔伯费尔德、哈根、伊瑟隆和索林根这四个不设防的城市竟使那些小心翼翼的战争英雄们大为敬畏，竟至下令从韦瑟尔、威斯特伐利亚和东部的几个省份调集了一支配备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两万人的大军，其中一部分是乘火车来的；这支军队不敢贸然进攻，而是在鲁尔境外进行正规的战略部署。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右翼、中央——一切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好像它们面临的是一支非常强大的敌军，好像是要同贝姆或邓宾斯基打仗，而不是同几百个既没有组织、装备恶劣，又几乎无人领导、被向他们提供武器的人暗中出卖了的工人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起义是怎样结束的。大家都知道，工人们厌烦了小

资产阶级的一贯拖拉、三心二意、胆小怕事以及背叛性的消极怠惰，最后离开埃尔伯费尔德，投奔帝国宪法能够给他们以某种保障的其他地方去了。大家都知道，他们遭到普鲁士枪骑兵和被挑唆起来的农民的多么凶恶的追击。大家都知道，他们刚一离开，大资产阶级马上又爬了出来，命人拆除街垒，搭起凯旋门，迎接将要到来的普鲁士英雄们。大家都知道，哈根和索林根由于资产阶级的直接背叛而落入普鲁士人之手，只有伊瑟隆还和第二十四团这些已经满载战利品的德累斯顿的征服者们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的力量悬殊的战斗。

埃尔伯费尔德、索林根和米尔海姆的一部分工人幸运地到达了普法尔茨。他们在这里遇到自己的同乡，后者都是在袭击了普吕姆的军械库之后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和同乡们一起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团中组建一个连，这个连几乎完全是由莱茵省人组成的。凡是他们的战友都必定能证明：他们无论在哪里打仗，尤其是在穆尔格河的最后一次决战中，都表现得非常英勇。

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之所以值得比较详尽地阐述一下，是因为在这里，各个不同阶级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得最鲜明、最彻底。贝格-马尔克区其他城市中的运动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运动一模一样，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些城市里各个阶级参加或是不参加运动并不那样明显，因为在那些地方，各个阶级本身就不像在这个区的工业中心那样相互间区分得非常明显。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几乎完全没有集中的大工业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成熟的大资产阶级，阶级的关系较为隐晦，具有比较平和的和宗法的性质，所以体现这次运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交错关系更加复杂。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一点，同时也会看到，在那里，所有这些参加起义的分子最终也都聚集在作为整个光荣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核心的小资产阶级周围。

去年5月间莱茵普鲁士起义的尝试清楚地说明,在革命运动中德国的这个部分能够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在莱茵普鲁士,周围有七个要塞,其中三个是德国第一流的要塞,经常驻有几乎三分之一的普鲁士军队。它的铁路四通八达,有一支运输舰队归军事当局调遣;在这样的条件下,莱茵的起义只有遇到某种完全特殊的情况才有成功的机会。只有要塞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莱茵省的居民才能够以武力取得某些成就。但这样的事情只有遇到军事当局被某些外部的重大事件吓昏头脑或者军队整个地或部分地加入了运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莱茵省的起义都注定要遭到失败。如果巴登的队伍向法兰克福迅速推进,普法尔茨的队伍向特里尔迅速推进,那就很可能使得起义马上在摩泽尔河与艾费尔高原、在拿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中爆发,使得当时还群情激奋的中莱茵各邦的军队加入运动。如果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莱茵的所有的军队,特别是整个第七和第八炮兵旅,也都会学他们的榜样,或者至少是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情绪来,弄得普鲁士的将领们束手无策。也很可能有几个要塞会转到人民手中来,这样,即使不是埃尔伯费尔德,那无论如何也会是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分地区会得到挽救。所有这些,也许还远不止于这些,都因为绝顶聪明的巴登委员会实行了拙劣的、小市民式的、畏首畏尾的政策而终成泡影<sup>21</sup>。

随着莱茵工人的失败,被工人们认为唯一能公开而坚决地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停办了。总编辑<sup>①</sup>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莱茵普鲁士人,却被逐出了普鲁士;其他的编辑们也都受到或者直接被逮捕或者马上被流放的威胁。科隆的警察直言不讳地宣

---

<sup>①</sup> 马克思。——编者注

布要这样对付他们,而且极其具体地指出,它掌握了每个人的足够的罪证,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这样一来,报纸恰恰在销售量空前迅速增长确保了它的存在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止发行。编辑们都分散到德国各个已经起义的或就要起义的地方去了;有些人到了事态又要发生转折的巴黎<sup>22</sup>。这些编辑们在今年夏天的运动期间或者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被捕或流放;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科隆警察殷勤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命运,有一部分排字工人跑到普法尔茨,加入了军队。

莱茵的起义同样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莱茵省四分之三的地区宣布了戒严,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随后有三个袭击普吕姆军械库的参加者<sup>①</sup>被枪决,起义就此告终,其时适逢霍亨索伦王朝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诞辰的前夕。Vae victis! [失败者罪该万死!]

---

① 约·曼施泰恩、安·载勒尔和尼·阿尔肯。——编者注



## 二 卡尔斯鲁厄

巴登的起义是在最有利的、只能进行暴动的条件下发动起来的。全体人民一致痛恨政府背信弃义、笑里藏刀以及凶残狠毒的政治迫害。反动的阶级即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人数并不多。在巴登,大资产阶级可以说刚刚处于萌芽状态。除开这些人数不多的贵族、官吏和资产者,除开那些仰仗宫廷和外国富翁过活的卡尔斯鲁厄和巴登-巴登的小店主,再除开海德堡的一些教授和卡尔斯鲁厄郊区的几个村庄以外,整个这个地区都同心同德地站在运动的方面。在别的起义中都必须把军队打败,可是这里的军队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甚至把运动进行得超过了奥芬堡会议<sup>21</sup>资产阶级领导者们的愿望,因为这里的军队受贵族军官的欺压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厉害,其次,民主党派已经对他们进行了一年的教育工作,不久前又由于实行了一种普遍兵役制而使得军队里面的叛乱者更增多了。正是军队在拉施塔特和卡尔斯鲁厄把“运动”变成了起义。

因此,起义的政府在一开始执行职务的时候,就得到了现成的军队、充盈的军械库、组织完备的国家机器、充实的国库以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居民。其次,这时正逢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的起义已经展开,正好掩护了它的左翼;在莱茵普鲁士,起义固然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尚未彻底败北;在符腾堡、在法兰克尼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和在拿骚,普遍存在着昂扬的激情;连军队也是如此,只要有一颗火星,便

可以使巴登的起义在整个德国南部和中部重演。这样就会至少有五六万正规军归到起义者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应该怎么办,是十分简单十分清楚的,所以现在当起义被镇压之后,每个人都懂得了这一点,并且都肯定地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一点。那时应该即刻毫不犹豫地要把起义急速扩展到黑森、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拿骚和符腾堡。应该立刻从现有的正规军中征集8 000—10 000人(利用铁路,这件事两天以内就可以做到),把他们派到法兰克福去“捍卫国民议会”。起义所取得的一个紧接一个的胜利简直使丧魂落魄的黑森政府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它的军队显然同情巴登人;它也像法兰克福参议会一样不能进行任何反抗。驻守在法兰克福的黑森选帝侯国、符腾堡和达姆施塔特的军队站在运动方面;那里的普鲁士人(大部分是莱茵省出生的人)发生了动摇,奥地利人则为数不多。巴登人的到来(不管是否有人企图阻止他们),必然会把起义的旗帜带到黑森的两个公国和拿骚的心脏去,必然会使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撤往美因茨,必然会使战战兢兢的德国的所谓国民议会在起义军民面前感到恐惧。在这以后,如果在摩泽尔河、艾费尔高原、符腾堡和法兰克尼亚起义还是没有马上爆发,那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法把起义扩展到这些省份去。

其次,应该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为起义提供必要的款项,通过立即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来使绝大多数的农业居民愿意参加起义。设立一个总的军事和财政的集中管理机构,并使之有权发行纸币<sup>①</sup>,首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发行。在巴登以及起义军所占领的一切地区

---

<sup>①</sup> 巴登议会很早以前就批准发行200万纸币,但是连一个钱也还没有用掉。

废除全部封建义务就足以使起义更加百倍地强大起来。

但是,这一切应该在最初的时刻就火速地做到,唯有快速才能保证胜利。在巴登委员会成立一个星期以后就太晚了。莱茵的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符腾堡和黑森没有动起来;本来情绪昂扬,对起义很有利的那些部队,这时已经靠不住,他们终于重新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反动军官。起义已经丧失了全德的性质,而变为纯巴登的或巴登-普法尔茨的地方性的起义。

我在斗争结束以后才知道,前巴登军少尉弗·济格尔(他在起义期间,起初是“上校”,继而又是“总司令”,曾博得一点好坏难说的小小名声)从一开始便向巴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发起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长处在于它包含着一种正确的思想,即无论如何都必须进攻;但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个计划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冒险的计划。济格尔想率领一个巴登的军团首先向霍亨索伦挺进,在那里宣布建立霍亨索伦共和国,继而占领斯图加特,并且在符腾堡把起义发动起来以后,再由斯图加特推进到纽伦堡去,最后在也己掀起起义的法兰克尼亚的心脏安下大本营。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完全忽略了法兰克福在士气方面的作用——只有拿下了法兰克福才能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以及沿美因河一线在战略上的重要作用。还可以看出,这个计划预定的战斗力量完全不是实际上可以支配的战斗力量;而且最后,在一次完全可以称为唐·吉珂德式或席尔式的进军之后,它并未击中要害,以致在黑森和拿骚的军队还没有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因而起义者未能得到增援以前,使得南德军队中最强悍、唯一坚决敌视起义的巴伐利亚军能够立即出来对付起义者。

新政府借口几乎全体士兵都已经解散回家而不同意发动任何的进攻。先不说这只是为数不多的个别部队,特别是近卫团里的情况,

就连那些曾解散回家的士兵们过了三天以后,也几乎全部又回到自己的部队里来了。

不过,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发动任何进攻。

领导整个巴登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在这位律师的身上,具有几分德意志小邦群众活动家所难免的、抱负不算大的虚荣心和表面上的坚强信念(这在南德一般地是博得声望的首要条件),并且还兼有一些外交家的狡诈,凭着这点狡诈,大概除开唯一的一个人以外,他足以把周围的一切人完全控制住。布伦坦诺先生——这现在已经是人所共知了,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党(巴登最强大的党)在奥芬堡会议上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改变大公<sup>①</sup>的政策而已,而这样的改变只有由布伦坦诺组阁才可能做到。大公的回答和广泛的鼓动引起了拉施塔特的军队哗变。而这是违背布伦坦诺的初衷和意图的。在布伦坦诺先生被抬上巴登委员会领袖地位的时候,他已经被运动抛在后面,因而已经不得不想法子把运动拖住。于是乎就发生了卡尔斯鲁厄事件;大公逃走了,而使布伦坦诺先生成为政府首脑并且可以说是给予他独裁大权的形势,却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得他竟不得不用自己的权力来反对给予他这种权力的运动。当人民为大公的逃窜而雀跃欢呼的时候,布伦坦诺先生和忠于他的巴登委员会却像坐在了炭火上。

这个委员会中几乎全部是信念异常坚定而头脑却异常糊涂的巴登庸人,就是那些生怕宣布建立共和国并且看到任何一点点果断的措施就哀告上帝的“纯粹共和主义分子”;这个地道的庸夫俗子的委员会,当然完全在布伦坦诺的掌握之中。律师赫希斯特在埃尔伯费

<sup>①</sup> 莱奥波德。——编者注

尔德所扮演过的那一角色,在这里是由律师布伦坦诺扮演的,而且活动范围更扩大了一些。至于说布林德、菲克勒尔和司徒卢威这三个从狱里释放出来而进入巴登委员会的外人,布林德深深陷入了布伦坦诺的阴谋诡计的圈套,以致孤掌难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被赶到巴黎去当个巴登的代表;菲克勒尔被指定到斯图加特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至于司徒卢威,布伦坦诺先生则认为他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因而也就放心地容他留在委员会里面,不过时时监视着他,尽力不使他成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这一点,布伦坦诺先生也完全做到了。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和其他的人一起建立了“坚决(或者不如说是稳步)前进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经过一次失败的发动以后,便被解散了<sup>23</sup>。过了几天,司徒卢威多少是以“亡命者”的身分出现在普法尔茨,准备在那里重新出版他的刊物《德国旁观者》。但是,试刊号刚刚出版,普鲁士人就到了。

巴登委员会从最初起就纯粹是布伦坦诺手里的工具,它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仍然是布伦坦诺。不久,执行委员会几乎完全顶替了巴登委员会,它至多把预算和已经采取的措施交给巴登委员会去批准,并且还把这个较大的委员会的一些多少有点靠不住的成员打发走,分派到各区或军队里去担负各种各样的次要工作。最后,执行委员会完全撤销了巴登委员会,而用布伦坦诺一手操纵下选出来的“制宪议会”代替了它,而执行委员会本身则摇身一变成了“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头儿不用说自然又是布伦坦诺先生。是他任命了各部的部长。他所任命的都是像弗洛里安·默尔德斯和迈尔霍弗这类的部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个十足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不同于小资产者群众和他们的其他代表人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眼光看

得太远了,所以没有他们那么多幻想。布伦坦诺先生从一开始就出卖了巴登的起义,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比巴登的任何一个官方人物都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他采取的那些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小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措施必然把整个起义全部断送。当时布伦坦诺的声望大得无边,而在7月以后又受到他从前的崇拜者的辱骂,其秘密都在于此。巴登的小资产者大多数是同布伦坦诺一模一样的叛徒,但他们同时又是受骗者,而对于布伦坦诺却不能这样说。小资产者的背叛是因为懦弱,他们的受骗是因为愚蠢。

巴登也像整个的南德一样,几乎没有大资产阶级。巴登的工业和商业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里只有很少数的、很分散的、不大成熟的无产阶级。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占居民的大多数)、小资产者和手工业帮工。手工业帮工,即那些分散在小城市里的城市工人(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产生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大中心城市),现在,或者至少到现在为止是处在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之下的。至于农民,他们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之他们的利益又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庇护之下。所以,以律师、医生、教员、个别商人和书商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从1848年3月起,一方面是直接地,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代表控制了巴登的整个政治运动。

在巴登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对立,因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苗头,无论是由比较发达的国家回国的工人带进来的还是由于受法国或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影响而产生的,都不能在巴登扎下根来。红

色的飘带和红色的旗帜在巴登只不过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至多夹杂着一点恐怖主义,而司徒卢威先生所发现的“人类六大祸害”<sup>24</sup>,尽管在资产阶级看来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在能引起群众反响的东西当中已经是最厉害的了。巴登的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最高理想,从来就是一个不大的、从1830年起存在于瑞士的那种资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渺小的、清心寡欲的人们有其小小的活动场所;以范围略加扩大的市镇,即“州”组成一个国家;工业规模小、停滞不动,其基础是手工劳动,因而使社会状况也就同样停滞不动和萎靡不振;富人不多,穷人也不多,到处全是中等处境和中等状况;没有君主,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多少赋税,没有积极干预历史的活动,没有外交——只有地方上的琐碎的街谈巷议和家庭的小小纠纷之类的内政;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世界贸易,没有百万富翁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冲突,但是却有着一种充满虔诚笃信和君子之风的恬静而舒适的生活,适应于知足常乐的人们要求不高的生活,在历史上无声无息的生活,这就是存在于瑞士大部地区的、也是巴登小资产者和农民久已梦想建立的乐土。假若巴登的或者说南德的小资产者,在热情奔放的时刻,脑子里竟然产生了关于全德国的概念,那么,在他们的幻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理想的德国就是一个放大的瑞士,也就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例如,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sup>①</sup>里面就已经把德国划分为24个州,有同样数目的州长和大大小小的议会,在小册子里面甚至还附上一幅已经划分就绪的地图。假若德国真有一天变成了这样的乐土,那就会使它降低到甚至在它

---

<sup>①</sup> 古·司徒卢威《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1848年比尔斯费尔登版。——编者注

最耻辱的时代都想象不出的低级阶段。

其实，南德的小资产者已经不止一次地亲身体验到：即使革命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下，也会很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所心爱的恬静的乐土卷入大规模冲突和真正阶级斗争的漩涡。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仅在一切的革命动荡面前，甚至也在他们自己的烟草啤酒的联邦共和国的理想面前惶惶不安。因此，他们热中于帝国宪法，认为这部宪法至少满足了他们眼前的利益，而只给皇帝留下中止权，这就使他们有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合法的手段实行共和制。因此，当巴登的军队未经询问便往他们的办公桌上送来现成的起义时，他们就惊慌失措了，因此，他们也怕把起义扩展到未来的巴登州的范围以外去。要知道，这场火灾也可能在无意中蔓延到存在着大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地方，并把这些地方的政权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那时候，财产就罪该万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伦坦诺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他在巴登替小资产阶级犯下了小资产阶级自己曾经在莱茵普鲁士明知故犯的罪：出卖了起义，然而他却拯救了小资产阶级。

布伦坦诺出卖起义，决不像后来终于失望了的巴登小资产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在他采取最后的行动的时候，是在穆尔格河失败以后逃跑的时候，而是一开始就把起义出卖了。运动之所以被出卖给了普鲁士人，正是由于那些最受巴登的小市民以及追随他们的部分农民甚至手工业者所赞不绝口的措施所造成的。布伦坦诺也正是由于自己的变节，才声望日隆，激起了小市民们的那种狂热，使他们紧跟自己。小资产者只看到迅速恢复起来的秩序和平静，只看到运动本身的短时期的停滞，并没有发觉运动被出卖了；后来他们看出，他们因为参加运动而倒了霉，运动正走向毁灭，他们自己也要和运动一起



毁灭,这时他们才大嚷大叫被出卖了,而且像一个受了骗的老实人那样怒不可遏地痛斥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然而为时已经太晚。

当然,布伦坦诺先生也受了骗。他希望参加运动能使他一跃而为“温和的”党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大人物,但他却不得不在夜色的掩护下背弃自己的党,自己的好友(这些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可耻地溜走了。他甚至希望在大公那里弄个大臣当当,他的如意算盘所获得的嘉奖,是他遭到一切党派的唾弃,永远丧失了扮演任何角色的可能性。当然,你可能会比任何一个德意志的侏儒邦国的全体小资产者都聪明些,但你终归可以看到,你的最美妙的希望幻灭了,你的最崇高的意向被玷污了!

布伦坦诺先生执政伊始,就尽力把运动限制在小市民的范围以内,使运动几乎未曾想超出这个范围。布伦坦诺在矢忠于大公的卡尔斯鲁厄市民自卫团(就是那个在几天以前还和起义者对着干的市民自卫团)的护卫下,进入了等级代表议会大厦,以便从这里来钳制运动。使逃兵归队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改编各个营的工作也进行得不怎么快。但是,解除了武装的曼海姆小市民却武装得不慢,然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人都不想打仗,并且在瓦格霍伊瑟尔附近一战之后,甚至大部分人加入了背叛曼海姆的龙骑兵团。至于向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进军,至于把起义扩大到拿骚或者黑森,甚至连提都不用提了。刚一提出类似的建议,就会像济格格的建议一样马上遭到拒绝。谁谈论发行纸币就会被认为是国事犯,被认为是共产主义。从普法尔茨派来的信使络绎不绝;他们报告说,普法尔茨是非武装的,没有步枪,没有弹药,更不用说大炮了,并且说,凡是扩大起义,尤其是占领兰道和盖默斯海姆两要塞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那里都需要;但从布伦坦诺先生那里什么都不能得到。普法尔茨建议马上就

建立军事总司令部,甚至把两个邦联合起来受一个统一政府的管辖。但是这些办法由于拖延、阻挠而不能实现。据我所知,普法尔茨得到的唯一支持,就是一笔数目不多的钱;后来,已经是很迟的时候,才送来八门大炮和不多的弹药,但没有炮手和驾具,最后,才奉梅洛斯拉夫斯基的直接命令,开来一个巴登的步兵营和两门白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中的一门炮只射过一发炮弹。

这样拖延和拒绝采取本可以促进起义开展的最必要的措施,也就是出卖了整个运动。在内部问题上,也完全消极应付,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事情只字不提;布伦坦诺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在农民里面,特别是在上巴登,隐藏着的革命分子很多,超出了他的心愿,因此,他必须在他们还没有更深地卷入运动之前,很快地制止他们。新官员大都是布伦坦诺的走狗,或者是些无能之辈;所有的旧官员,除开那些在近一年来的反动时期丢尽脸面因而逃之夭夭的人以外,全都留任了原职,这就使得全体愿意恬静的市民们大为高兴。甚至连司徒卢威先生在5月的最后几天也认为应该赞扬一下“革命”,因为一切都完全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留任了原职。在其他方面,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代理人也采取了如下的活动方针:尽可能使一切都转上旧轨道,尽可能减少混乱和骚动,尽快地使国家失去革命的面貌。

在军事机构中也同样是疲疲沓沓。人们只干点不得不干的事情。军队没有指挥官,没有训练,也没有秩序;无能的“陆军部长”艾希费尔德以及他的继任人叛徒迈尔霍弗甚至连像点样的军队配置也不会。军用列车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地在铁路上开来开去。各步兵营今天调往这个方向,明天又调往那个方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警备队的士兵无所事事,成天进出于小饭馆。显然,这是存心使他们的

精神颓丧，政府是想把他们尚存的最后一点军纪也毁掉。对于第一批征召的所谓的人民自卫团即凡是能手执武器而年龄未逾 30 岁的男子的组织工作，是委任著名的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去进行的。贝克尔是一个瑞士籍人和瑞士军队的军官。布伦坦诺对于贝克尔在执行使命时施加的阻力究竟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普法尔茨的军队撤退到巴登地区以后，当不能再拒绝这些衣着褴褛装备很坏的普法尔茨部队的坚决要求的时候，布伦坦诺为了推卸责任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要依着我，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大公回来的时候，至少要让他知道，谁把他的积蓄都挥霍光了！”因此，要是说巴登的人民自卫团一部分表现很坏，而一部分毫无组织，那么在这里，主要的罪过无疑地也应由布伦坦诺和各地区中他的那些心怀恶意的或庸碌无能的官员们来承担。

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被封闭以后，最先踏上巴登的领土是在 5 月 20 日或 21 日，也就是在大公出走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边防上的，或者确切些说，没有边防的极端疏忽大意的状况使我们惊讶不已。从法兰克福到黑彭海姆的这条铁路全被符腾堡人和黑森人所组成的帝国军队所占领；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布满了军队；所有车站，所有居民点都被强大的部队占据；按规则设置的岗哨一直伸展到国境线上。相反地，从国境到魏恩海姆连一兵一卒都看不到；在魏恩海姆也是这样。唯一的预防措施，就是拆毁黑彭海姆和魏恩海姆之间的一小段铁路。只是在我们来到魏恩海姆期间，才开来一支不大的至多 25 人的近卫团部队。于是在魏恩海姆和曼海姆之间又是一派天下太平的景象。最多在什么地方出现个别的微带醉意的人民自卫团人员，他们倒有些像掉队的士兵，或者像逃兵，而不像在服役。自然，什么国境上的检查也就更谈不上了。可以在任何方向随意越

过国境。

在曼海姆,不管怎样,整个看来还有点像战争时期的样子。一伙一伙的士兵站在街上,或坐在小饭店里;人民自卫团和市民自卫团在操场上操练,当然大部分人还很不熟练,而教官也很糟糕。在市政厅里,有许多委员会、新旧军官、穿军装和短衫的人们在开会。老百姓和士兵、志愿兵混在一起。他们在狂饮,欢笑,逗趣。但是转眼便可看出,最初的热潮已经过去,许多人感到大失所望,士兵们心怀不满;他们说,我们举行了起义,而现在事情该轮到应该担任领导的非军事人员了。可是他们却一直拖拖拉拉,因而把事情弄坏了。士兵对自己的新来的军官们也不大满意;新军官和大公的旧军官的关系紧张,虽然旧军官每天都有几个逃跑,但是许多人当时还是在服役;他们都身不由己地陷入了痛苦的境地,而不知道怎样自拔。终于怨声四起,抱怨缺少一个刚毅而干练的领导。

在莱茵河另一岸的路德维希港,我们觉得运动要活跃得多。当时在曼海姆,许多显然是第一批征集的青年,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还在安然地干自己的事,但在路德维希港所有的人都武装起来了。诚然,后来发现,在普法尔茨也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在路德维希港,志愿兵和士兵之间完全相处无间。在那些当然同样也是挤得满满的小饭店里,马赛曲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歌声不绝于耳。没有谁诉苦,也没有谁抱怨,大家都在欢笑,都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贡献给了运动,在那时,他们,特别是其中的步枪手和志愿兵,还完全情有可原地和天真无邪地幻想自己的力量所向无敌。

在卡尔斯鲁厄,运动具有更加庄严的形式。这里已经宣布下午一时在巴黎旅馆举行宴会,但是宴会一直等到“巴登委员会的先生们”莅临时才开始。类似这样一些引人注意的细微之处,已经使运动

具有令人愉快的官僚气派了。

我们曾经对巴登委员会的先生们谈过在前面提到的一个看法，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必须向法兰克福挺进，使起义继续扩大，现在，再来这样做想必是太迟了，如果在匈牙利没有坚强有力的打击，或者在巴黎没有新的革命，那么整个运动就注定没有希望。很难想象，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在这些巴登委员会的市民中间引起了怎样的愤怒。只有布林德和戈克站在我们这方面。现在，当事件已经表明我们是正确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当然也要断言，仿佛从一开始他们也是坚持进攻的。

在卡尔斯鲁厄，当时已经看出大规模争权夺势的端倪，这种争权夺势在“集中德国的全部民主力量”这个大标题下被吹嘘成拯救祖国的行动。不管什么人，只要在某个时候，某个俱乐部里多多少少糊里糊涂地发表过一次演说，或是在某一张偏僻地方的民主小报上号召过人们憎恨暴君，他都要急忙奔往卡尔斯鲁厄或凯撒斯劳滕，以便在那里一跃而成为大人物。用不着特别指出，在这里做出来的事情是完全符合集中起来的那些势力的胃口的。例如，在卡尔斯鲁厄就有一位著名的所谓的哲学家阿塔·特洛尔<sup>25</sup>，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前议员，是一家所谓的民主小报<sup>①</sup>的前任编辑，这家小报尽管有我们这位阿塔·特洛尔的百般谄媚但仍不免被曼托伊费尔查封。这位阿塔·特洛尔四处奔波，弄到了一个巴登驻巴黎公使的小职位，他认为自己特别有资格担任此职，其原因就是他过去在巴黎住了两年，但却没有学会法语。他的确很幸运，得到了布伦坦诺先生的国书，但是，当他把行装收拾妥当的时候，布伦坦诺却突然派人来叫他，又从他的口袋里

<sup>①</sup> 《改革报》。——编者注

拿走了委任状。可想而知,阿塔·特洛尔这时置布伦坦诺先生于不顾,硬是跑到巴黎去了。另外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公民——海因岑先生也在卡尔斯鲁厄,这位公民几年来一直扬言要使德国革命化和共和化。大家知道,在二月革命以前,这位可敬的活动家随时随地都号召“战斗”,但是当革命爆发以后,他却认为最好是站在瑞士的中立的高山之巔来观察德国的各种起义。现在,看来他也终于乐意加入与“压迫者”战斗的行列了。如果根据他以前说的“科苏特是个大人物,但是他却忘掉了雷汞<sup>①</sup>”这句话来判断,预料他会马上组织起前所未有的、非常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来对付普鲁士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既然远大的计划看来已经无法实现,那么,我们这位憎恨暴君的人,据说,也就仅限于建立一支精锐的共和部队,同时抽工夫给《卡尔斯鲁厄日报》撰写几篇为布伦坦诺辩护的文章,时常到“坚决前进俱乐部”走一走。俱乐部被解散了,精锐的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出现,最后海因岑先生发觉,甚至连他都不可能再为布伦坦诺先生的政策辩护了。这位谁也不承认的、精疲力尽、心情郁闷的海因岑先生,连一个“压迫者”都没有打死就来到上巴登,而后从这里又到了瑞士。现在,他正在对压迫者们进行报复:他住在伦敦,在想象中把他们成千上万地送上断头台。

我们第二天清晨离开了卡尔斯鲁厄造访普法尔茨。

关于巴登起义以后的进程,就它的一般政治领导和民事管理而论,我要说的也不多了。当布伦坦诺感到自己十分强大的时候,他一举消灭了以“坚决前进俱乐部”为代表的恭顺的反对派。“制宪议会”无条件地赞同布伦坦诺的全部措施,因为议会的选举是在布伦坦诺

---

① 卡·海因岑《谋杀》,见1849年1月26日《进化》第4号。——编者注

的巨大声望的影响下，在支配一切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的。“握有专政权力的临时政府”<sup>①</sup>（在虚构的国民公会下的专政！）整个处于他的领导之下。他就是这样继续统治，阻挠起义朝革命和军事方面发展，马马虎虎地处理日常事务，热心地保护他心目中一直当做合法天赐君主的大公的储备和私人财产。他在《卡尔斯鲁厄日报》上声明，大公随时都可以回来，而城堡也的确一直都上着锁，好像里面的住户只不过是出外旅行去了似的。他用一些模棱两可的回答一天天地搪塞普法尔茨派来的人；而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建立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签订关于废除曼海姆和路德维希港之间桥头税的条约，然而，这并不妨碍布伦坦诺先生下令在曼海姆方面照旧征收这种赋税。

最后，当梅洛斯拉夫斯基在瓦格霍伊瑟尔和乌布施塔特的战役之后被迫带着他的余部越过山区一直撤退到穆尔格河彼岸的时候，当不得不把卡尔斯鲁厄和在那里的大量储备物资放弃的时候，当穆尔格河畔的失利决定了运动的命运的时候，巴登的市民、农民和士兵们的幻想都破灭了，他们都叫嚷说布伦坦诺干了叛卖的勾当。布伦坦诺靠小资产者的胆怯、农民的不自立以及工人的不够集中而维持的全部威望，一下子就丧失净尽。布伦坦诺由于他自己的“制宪议会”控告他犯下背叛人民的罪过，在茫茫夜色的掩盖下逃到瑞士，藏身于苏黎世州的福伊尔塔伦。

可以使人聊感安慰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因自己的叛卖行为而受到足够的惩罚：他的政治地位完全毁灭了，他受到所有政党的普遍鄙视。巴登的运动遭到失败这件事本身倒不是至关重要。巴黎的6月

---

① 指巴登临时政府。——编者注

13日<sup>①</sup>和戈尔盖的拒绝向维也纳挺进，即令当时有可能将运动扩展到黑森、符腾堡和法兰克尼亚去，也使巴登和普法尔茨尚存的一切成功的机会化为乌有。失败或许更光荣些，但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然而，什么事情使革命的政党不能宽恕布伦坦诺先生和支持他的那些胆小如鼠的巴登小资产者呢？这就是：在卡尔斯鲁厄、弗赖堡和拉施塔特发生了屠杀，在拉施塔特囚室内因伤寒病而被普鲁士人悄悄地杀害了无数不知名的人，对于这些牺牲者，他们都负有直接的罪责。

我想在本刊第二期中叙述一下普法尔茨的局势，最后描写一下巴登—普法尔茨的运动。

---

<sup>①</sup> 见本卷第158—190页。——编者注



### 三 普 法 尔 茨

我们从卡尔斯鲁厄前往普法尔茨,首先来到施派尔,德斯特尔和临时政府本打算驻扎在这里。但是,他们已经迁到了凯撒斯劳滕,政府认为这个地方是“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因而最终确定为政府所在地。在施派尔,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却见到了维利希和他的志愿兵。他带领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使得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共4000多人的警备队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切断了他们的供应,并千方百计地骚扰他们。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带领80名左右的步枪手攻打了盖默斯海姆警备队的两个连,一枪不发就把他们赶回要塞。第二天早晨,我们和维利希一齐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我们遇到德斯特尔、临时政府和整个德国民主派的精英。在这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完全异己的这个运动。因此,过了几天我们就折返宾根,在路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因为有参加起义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我们被押解到达姆施塔特,随后被送往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终于被释放。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了宾根,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将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巴黎,以便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去会见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sup>26</sup>而我则返回凯撒斯劳滕,想留在那里最初作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据《新莱茵报》唯一能占据的地

位——士兵的地位。

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过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略带醉意的地方，运动必然是朝气蓬勃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换上了一些快活的喜爱葡萄酒的普法尔茨人。人们终于从故作深奥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刁难曾经被那些在其他方面极其乏味的《飞行传单》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轻松愉快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酒店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一个大酒店，在这六个星期当中，“以普法尔茨人民的名义”喝去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普遍嗜好葡萄酒这点是一致的，就连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被卷入这种普天同乐之中。

要了解几个星期以后普鲁士军队会给这些喜气洋洋的普法尔茨居民带来多么丧气的失望，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远见。而在普法尔茨，不沉湎于绝对安全感的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相信普鲁士人可能会来，但是大家都深信，即使他们来了，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回去。的确，这里并没有那种由信念坚定所产生的严峻性，在巴登人民自卫团的每个军官的前额上都写有“严肃乃为人之本”这样一句箴言，但是这并不能防止我下面就要谈到的那些十分惊人的事件的发生，在这里也没有像巴登的小市民性质的运动所赋予大多数参加者的那种庄严的美德。在普法尔茨，人们只是偶尔“严肃”过。在这里，“热情”与“严肃”只不过是装饰一下共同的欢乐。但是，尽管如此，这里的人十分“严肃”和“热情”地认为，自己在世界上一切力量面前，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面前，是不可战胜

的；即使在静静沉思之余，产生了轻微的怀疑，也会被下面这种不可辩驳的论断所消除：“即便如此，也不应该说出来。”然而，运动越开展，集结在萨尔布吕肯和克罗伊茨纳赫之间的普鲁士步兵营的数量越是明显地增多，这种怀疑自然也就会越经常出现，同时恰恰在怀疑和胆怯的人中间关于“为自己自由所鼓舞的人民”（人们是这样称呼普法尔茨人）战无不胜的这种吹嘘，也就越厉害。这种吹嘘很快就发展成一套整套麻醉人的东西，它得到了政府的偏爱，削弱了加强防御的任何行动，使每个反对它的人都有被当作反动分子逮捕的危险。

这种无忧无虑、这种对于“热情”及其万能的吹嘘，再加上“起义”所拥有的微不足道的物质资源和起义赖以发生的狭小地区，都构成普法尔茨起义的滑稽可笑的一面，并且给少数具有远见和独立地位从而能够自由判断的人提供不少笑料。

从外表上看，普法尔茨运动是欢快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刚当上正规军或人民自卫团少尉的人，都束紧身上笨重的军服，炫耀自己那副后来在战斗当天立即塞进口袋的银质肩章，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6月上旬的灼热，便脱下所有的呢制外衣、背心和领带，换上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像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郁闷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穿衣随随便便，唯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一下子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交往中看到博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转瞬之间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

这些微笑着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做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有善良的意愿，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同卡尔斯鲁厄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因为别人嘲笑他们用温情的方式搞革命，嘲笑他们采取软弱无力、微不足道的措施而感到愤愤不平。

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一旦得不到巴登政府的支持，便一事无成。它对于巴登，完全尽了自己的义务。它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节，一次又一次地作出让步，无非为了争取达成协议；结果是徒劳无益：布伦坦诺先生都断然拒绝了。

巴登政府一切都是现成的，而普法尔茨政府却什么也没有。它没有经费，没有武器，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有许多反动地区和两个敌人要塞。法国立即禁止武器运入巴登和普法尔茨，普鲁士和黑森扣留了运到那里去的所有武器。普法尔茨政府立刻派遣代表到法国和比利时去购买和运送武器，武器买到了，但没有运来。可以指责政府的是，它行动不够果断，特别是它没有利用在国境线上的大批走私贩去组织秘密的运送；可是大部分的责任应该由它的代表承担，这些人办事漫不经心，有时就只满足于一些空洞的诺言，而不设法运送法国武器，哪怕运到萨尔格明德和劳特堡也好。

至于经费问题，那么，在小小的普法尔茨，纸币所能带来的益处是很小的。当政府处在财政困难中的时候，它至少有勇气发行一种按累进率规定的强制公债，虽然累进率不大。

可以指责普法尔茨政府的地方就在于，它既然觉得自己软弱无力却过分地沾染了普遍的无忧无虑和由此而来的幻想自身安全的毛病；因此，它不肯毅然把即使是有限的钱用于国防建设，而宁愿寄希

望于山岳党在巴黎取得胜利，匈牙利人占领维也纳，甚至出现某种能够挽救普法尔茨的真正奇迹，如普鲁士军队中发生起义等等。因此，往这个地方运送武器的问题是不大受关注的，然而这里只要有1000支能用的火枪也多少会有巨大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普鲁士人到来的那天，才终于把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40支步枪从国外即从瑞士运来；因此，轻率地挑选了民政委员和军事委员，结果大都是最无能的糊涂虫和空想家；因此，留用了数量很多的旧官僚和所有的法官；最后，因此，就看不起一切的、甚至容易做到的办法，其实利用这些办法，就有可能包围以至于占领兰道，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类似于秘密总书记，或者如布伦坦诺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凯撒斯劳滕温和政府周围的红色奸党”。<sup>①</sup>附带说说，属于这个“红色奸党”的还有其他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逃亡到此地来的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在德斯特尔的身上，普法尔茨的执政者们获得了他们所不大懂得的行政问题的知识以及革命的智慧，这种革命智慧总是限于完成最直接的、无疑地可以实现的任务，从而在贯彻具体措施时从来也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它就更加令他们钦佩。德斯特尔凭这一点博得了很大的威信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然德斯特尔对待运动有时候过于认真，例如，他认为通过实行自己的、在当时条件下是完全不适宜的市镇施政条例会带来颇大的益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推动了临时政府来执行他那多少比较果断的一切措施，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冲突时，

---

<sup>①</sup> 洛·布伦坦诺《1849年5月13日至6月25日革命期间内阁成员的处境和态度》。——编者注

他总是能够拿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在莱茵普鲁士反动的和革命的阶级一开始就互相对立,如果说在巴登最初向往运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随着危险的逼近而对他们所挑动起来的运动逐渐改变自己的态度,起先是冷淡,以后则是敌视,那么,在普法尔茨,对运动表示反对的与其说是居民中的个别阶级,不如说是受本地利益驱使的个别地区,不过有的从一开始就反对,有的逐渐开始反对。在施派尔,市民阶级总的说来是一开始就反动,在凯撒斯劳滕、诺伊施塔特、茨韦布吕肯等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反动起来,但反动派的主要力量则盘踞于遍布全普法尔茨的各个农业地区,要消除各派的不明确的立场,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进攻用于抵押贷款和抵押高利贷活动的私人财产,使债台高筑和受高利贷者百般盘剥的农民得到些好处。但是,这个唯一能使全体农民立刻愿意参加起义的办法,是以领土比普法尔茨宽广得多而且城市中社会关系比普法尔茨发达得多作为前提。这个办法只有在起义的初期,在起义推向摩泽尔河和艾费尔高原的同时才有可能实施,因为这些地方的农村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又与莱茵省各城市的工业发展相辅相成。但是,在普法尔茨也像在巴登一样,并没有设法向外推广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能用来和反动地区作斗争的办法就很少了,只有派遣武装队伍分别到叛乱的地方去讨伐,逮捕,特别是逮捕领导反抗的天主教教士等等,任命得力的民政委员和军事委员,最后就是宣传。那些讨伐大部分是滑稽可笑的,只有短时期的效果;宣传不起任何作用;而那些专会摆架子而没有本领的委员们,做起事来大都是错误百出,或者只知道大喝特喝普法尔茨葡萄酒,喝起酒来又不免要胡乱地吹嘘一番。

在中央行政机关的宣传员、委员和官员中，民主主义者占居极为显要的地位，他们到普法尔茨来的人数比到巴登的还要多。到这里来的不仅有从德累斯顿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中逃出来的参加者，而且还有一批想在这里为祖国效力的多少比较热情的“群众活动家”。普法尔茨政府不同于卡尔斯鲁厄政府，它正确地感觉到，单靠本地的能人就连领导这样的运动也无法胜任，因而愉快地接待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在普法尔茨停不上两个钟头，便会接到成打的建议，让你去担任各种各样的、总之是很荣耀的职务。民主主义者先生们虽然看到普法尔茨-巴登运动越来越具有局部的和无足轻重的性质但并不是地方性起义，而是全德民主派光荣起义的光荣曙光，总之，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的或多或少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左右了运动，因而也就热烈地响应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同时又认为，他所能接受的职位应该使他的要求，自然多半是贪得无厌的要求，在全德运动中丝毫不被忽视，在刚开始的时候，事情还好办，凡是愿意效劳的人，都会立即当上办公厅主任、政府委员、少校或中校。但是谋取职位的人逐渐增多，而职位则越来越少了，于是便形成追逐职位的庸俗卑微风气，给旁观者提供了笑料。《新莱茵报》经常惊异地发现，德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一种古怪的事务主义与观点混乱、令人讨厌和庸碌无能等的混合物。而这种讨人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丝毫不差地重新出现在普法尔茨的官员和宣传员的身上，关于这一点，大概是无需特别赘述的。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这个或那个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撰写几篇鼓动文章<sup>27</sup>。我知道，这也是行不通的，但

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表明我的好意。我在遣词用字上当然不十分客气，所以第二篇文章就引起反感，被认为过于“刺激人”；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到普法尔茨来的民主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久前曾在自己的家乡参加过战斗的人，即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为数不多的萨克森人大都在各个中央办公厅任职，他们努力工作，行政管理知识丰富，头脑冷静而清醒，没有任何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都是工人，多数参加了军队；最初在机关工作的人，后来也拿起了武器。

设在凯撒斯劳滕的水果蔬菜商场里面的中央机关办公厅充满非常快活的气氛。在普遍松懈的情形下，在完全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情形下，在工作人员空前多的情形下，可做的事一般说来是不多的。人们几乎只做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可是，就连这些工作也做得马马虎虎。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通知，如果没有一个爱国的市民提出有关拯救祖国的深思熟虑的建议，如果没有一个农民前来诉苦或是没有一个乡镇派代表团来，那么，在绝大多数的办公室里是无事可做的。人们打哈欠，闲聊天，讲笑话，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俏皮话，或者制定战略计划。他们从这间屋串到那间屋，尽量设法消磨时间。谈话的主题自然是众说纷纭的当前政治事件。对于情报的收集毫不留意。旧的邮政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留任原职，这些人当然是很不可靠的。除他们以外，还设置了“战地信箱”，由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普法尔茨轻骑兵<sup>28</sup>来管理。边境地区的警备司令和委员们毫不关心边界那边的动静。政府收到的报纸只有《法兰克福报》和《卡尔斯鲁厄日报》，



而我直到现在还很愉快地想起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在俱乐部里的一份几天以前的《科隆日报》上,我看到关于 27 个普鲁士步兵营、9 个炮兵连和 9 个骑兵团集结的消息,以及它们在萨尔布吕肯和克罗伊茨纳赫之间如何配置的具体情况<sup>①</sup>。

最后,我要谈主要的问题即军事组织的问题。巴伐利亚军队中约有 3000 名普法尔茨人带着全部家私投到起义者方面来了。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志愿兵参加了军队,其中有的是普法尔茨人,有的人来自其他地方。此外,临时政府对第一批军役年龄的人,首先是所有 18—30 岁的未婚男子发出了征召令,但是这次征召不过是一纸空文,一方面是由于军事委员们无能和草率,另一方面是由于武器不足,再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本身漠不关心。在普法尔茨,组织防御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武器,因而必须用一切办法来获得武器。如果不可能从国外得到武器,那就必须收集普法尔茨所有的一切火枪、步枪以及猎枪,发给直接参战的战士。事实上,不仅有大量的武器在私人手里,而且,还有不下于 1 500—2 000 支步枪掌握在市民自卫团各个支队的手里,其中还没有算上马枪。至少可以要求私人交出武器,也可以要求那些不是第一批征召和不想去当志愿兵的市民自卫团的士兵交出武器。但是这类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做。经过多方的催促,最后才作出了这种有关市民自卫团武器的决定,但是决定并没有实行;由 300 多个小市民组成的凯撒斯劳滕市民自卫团作为警备队,身着军装手拿武器,每天都在水果蔬菜商场的后面列队行进,而普鲁士人在进城以后,还是称心如意地解除了这些先生们的武装。到处的情形都是这样。

---

<sup>①</sup> 见 1849 年 5 月 31 日《科隆日报》第 129 号。——编者注

在官方的报纸上曾经号召林业部门的职员和森林看守人到凯撒斯劳滕来成立一支步枪队，<sup>①</sup>但林业部门的职员没有来。

在全普法尔茨下过命令，或者至少发出过号召，要制造大镰刀，有一些镰刀的确造出来了。在基希海姆博兰登的莱茵-黑森部队中，我看到装运了几桶镰刀刀身，准备送往凯撒斯劳滕。两地之间大约有乘行七八小时的路程，四天后政府不得不把凯撒斯劳滕放弃给普鲁士人，而大镰刀却还没有运到。如果把这些大镰刀分发给未动员的、所谓第二批征召的市民自卫团，来补偿必须让它们交出来的枪支，那事情就好了。事实上，懒惰成性的小市民们仍旧留下了自己的击发枪，而年轻的新兵则不得不以大镰刀来进攻配备有大炮和针发枪的普鲁士人。

一方面枪支普遍地感到缺乏，而另一方面，检阅用的马刀不知为什么反倒多得惊人。谁领不到枪支，谁就赶忙挂上一把叮当作响的战刀，好像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军官。正是在凯撒斯劳滕，这样自封的军官数不胜数，他们这种可怕武器的响声在大街上日夜不绝于耳。特别是大学生们，他们通过这种威吓敌人的新的举动，要求建立一支完全由步行骑兵组成的大学生军团，为拯救祖国建树特殊功勋。

此外还有半连投奔过来的轻骑兵，但是由于他们照管战地信箱等等，已经四处分散，不可能组成一个单独的战斗队伍。“中校”安内克所指挥的炮队中，有几门3磅炮和一些小白炮，但我记得没有看见过3磅炮的炮车。在凯撒斯劳滕的水果蔬菜商场前面，放着收集在一起的再好也没有的装置白炮的旧铁炮身。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搁置不用。两个最大的炮身放在巨大的特制的炮架上运走了。巴登政

---

<sup>①</sup> 见1849年6月14日《城乡信使》第118号。——编者注

府最后卖给普法尔茨配备一个炮兵连所用 6 磅炮(都是经过多次使用而磨损了的)和数量不多的弹药,但是没有炮车、炮手和足够的弹药。弹药尽力制造出来,炮车通过组织农民和征用骡马而马马虎虎地得到了保证;至于炮手,找了几名巴伐利亚的老炮兵,他们用巴伐利亚军队采用的笨拙而复杂的操练方法来训练别人。

军事领导权落在非常无能的人的手里。在临时政府中领导军政部的赖沙特先生,工作勤恳,但不够果敢,没有专业知识。普法尔茨战斗部队的第一任总指挥官是冒险分子芬讷尔·冯·芬讷贝格,他由于行为暧昧很快就被撤职了;波兰军官拉基耶暂时接任了他的职务。最后听说,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的总指挥将由梅洛斯拉夫斯基来担任,而普法尔茨军队的指挥则让施奈德“将军”来担任,他也是波兰人。

施奈德将军来到了。他是个矮胖子,与其说他像“请去打仗的麦尼劳斯”,不如说他像一个已经不算年轻的享乐人。施奈德将军威风十足地接管了指挥权,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且马上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这些命令大部分涉及的问题是着装,即军常服和作为军官标志的三色袖带或绶带,还徒然发布过十次之多的号召,要服役期满的骑兵和步枪手自愿参军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施奈德自己首先以身作则,马上购置一件缀有三色丝带的骠骑兵短外衣,以便引起军队的尊敬。在他的命令中确实有实际意义的重要东西,只不过是重复早已发布过的命令或者少数干练军官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有实现的建议,这些建议只有现在凭着一位指挥军队的将军的威望才有可能实行。在其他方面,施奈德“将军”则依靠上帝和梅洛斯拉夫斯基,并且大享口福,——一个毫无能耐的人唯一能够做出的高明事情,也就是这些。

在凯撒斯劳滕的其他军官里面，唯一能干的是泰霍夫，他就是任普鲁士军上尉时曾和纳茨默一起袭击柏林军械库的那个人，他当时把军械库交给了人民，在被判处要塞监禁 15 年的时候，从马格德堡逃走了。<sup>29</sup>泰霍夫作为普法尔茨总参谋长，处处显示出是个见多识广、慎重周到和镇静的人，也许镇静得有些过分，因此难以相信他具有那种在战场上往往有决定意义的当机立断的精神。“中校”安内克在组织炮兵的工作上是一个无能而又疲沓的人，而领导弹药制造厂则是称职的。在乌布施塔特郊区，他作为统领没有赢得桂冠，在拉施塔特，梅洛斯拉夫斯基委任他管理物资，以供被围之需，但在城市还没有被包围以前，他便丢下马匹，令人奇怪地逃到莱茵河对岸去了。

在各个地区里，军官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波兰人中有的是在施奈德以前来的，有的是同他一起来的。但是，由于波兰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代表们已经都在匈牙利。不难想象，这些波兰军官的成分就十分复杂了。他们大部分都急于弄到相当数量的乘骑，他们也发布几道命令，至于命令执行与否，并不特别关心。他们态度相当傲慢，认为可以像对待受压制的波兰农奴那样来对待普法尔茨的农民，他们既不了解地理、语言，也不懂得指挥，所以，他们作为军事委员，即作为各个营的组织者，办事很少，或者说根本不办事。在战事进展的过程中，他们不久就都跑进施奈德的指挥部，而以后当施奈德遭到自己士兵的围攻和虐待的时候，他们又很快就溜走。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来得太晚，因而什么也来不及组织。

在德国军官里面，能干的人也很少。莱茵-黑森的队伍中本来有一些在军事上可以训练成材的人，但是这支队伍却是由一个根本不称职的霍伊斯纳来指挥，而且是处在齐茨和班贝格尔这两位后来在卡尔斯鲁厄英勇逃跑的英雄的更为不幸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影响之

下。在普法尔茨山区，有一个前普鲁士军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组织了一支队伍。

只有两名军官早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积极从事军事活动就已经很出色，这就是维利希和布伦克尔。

维利希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团，担负着先监视而后包围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在他指挥之下的部队有：一连大学生、一连在贝桑松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工人、三连人数不多的来自兰道、诺伊施塔特和凯撒斯劳滕的体操家，两连来自附近地区的志愿人员以及一连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这些人多半是参加普吕姆和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之后流亡到这里来的。他们最后一共有七八百人；不管怎样，这是全普法尔茨最可靠的士兵；下级军官大都是服过军役的人，其中有的人在阿尔及利亚时已经习惯于游击战。维利希率领这支不大的战斗力量驻扎在兰道和盖默斯海姆之间，在乡村中组织了市民自卫团，用它们守护道路和放哨，他们击退了两个要塞的袭击，尽管敌人的力量，特别是盖默斯海姆警备队的力量占优势。维利希封锁兰道非常成功，他几乎截断一切供应，切断输水管路，堵住奎希河，使得要塞的所有地窖都被淹没，且又缺少饮水；每天夜里他都派遣侦察兵去骚扰警备队，侦察兵不仅清除了弃置的外围工事，把在那里捡到的哨房用的火炉以每个五盾的价格卖掉，而且他们还深入到要塞的堑壕，常常迫使警备队用 24 磅炮向一名上等兵和两名士兵开火，炮火很猛烈，但却伤不到人。这段时期在维利希志愿军团的历史上无疑是最光辉的一页了。假若他当时拥有哪怕几门榴弹炮，甚至几门野战炮，那么根据每天进出于兰道的侦察员的情报来判断，这个警备队士气不振、实力不强和人心思变的要塞，在几天之内就可占领。甚至不要大炮，再继续封锁一个星期，也会迫使它

投降。在凯撒斯劳滕有两门很好的 7 磅榴弹炮,足以在晚间把几间兰道的房子打得燃烧起来。如果当时有这两门炮,就可能发生闻所未闻的事件:用几门野战炮就拿下兰道这样的要塞。我每天都劝说凯撒斯劳滕的参谋总部,必须至少这样尝试一下。结果,白费唇舌,有一门榴弹炮留在凯撒斯劳滕,另一门运到霍姆堡,在这里差一点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两门炮一弹未发便放置在莱茵河对岸了。

然而,“上校”布伦克尔比维利希更为出色。布伦克尔“上校”以前是个葡萄酒推销员,曾以希腊之友的身分到过希腊,以后又在沃尔姆斯做过葡萄酒的买卖。毫无疑问,他在这整个极为光荣的运动里面,也是一位出众的军事人材。他总是高高地骑在马上,身边带着一帮参谋人员,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有一副傲慢的相貌和与黑克尔一样的壮观的胡须,有洪钟般的声音以及其他一切造就南德“群众活动家”的品质。不过大家知道,这些品质中恰恰不包括智慧。布伦克尔“上校”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拿破仑看到他也不得不躲藏起来,他有资格在本文开头我们引用的那段副歌里被提到<sup>①</sup>。布伦克尔“上校”觉得即使不要“黑克尔、司徒卢威、齐茨和勃鲁姆”的援助自己也有本事赶走德国的所有君主,他于是马上就干起来。他想要不以一个士兵身分,而以一个葡萄酒推销员身分来进行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决定夺取兰道。那时维利希还没有来。布伦克尔集结了在普法尔茨所能调动的全部队伍:正规军和人民自卫团,有组织的部队和游散的部队,骑兵和炮兵,直向兰道挺进。在要塞的前面,召开了军事会议,组编了进攻纵队,确定了炮位。但是,炮兵是由几门从 $\frac{1}{2}$ 到 $1\frac{3}{8}$ 磅的

---

<sup>①</sup> 见本卷第 5 页。——编者注

轻臼炮组成的，载运大炮的工具是同时用来运输弹药的干草运输车。但配备给这批各式各样轻臼炮的全部弹药只是一枚 24 磅重炮弹而已；至于火药，则根本谈不到。当一切商量妥当的时候，他们便视死如归地前进了。他们一直到了要塞的斜堤，未遇到丝毫的抵抗；他们又继续前进，到达了要塞门口。走在前面的是兰道来的起义士兵。在城墙上出现了几名士兵，作为军使。有人向他们喊话，叫他们打开城门。充满善意的交谈开始了，一切好像极为顺利，不料城墙上突然炮声轰鸣，霰弹从进攻者的头上飞过，霎时间全部英勇的军队及其普法尔茨的欧根亲王<sup>30</sup>都狼狈地奔逃了。大家都跑呀，跑呀，跑得飞快，连从城墙上不久以后发射的几枚炮弹也不能掠过逃跑者头上，而只能飞过他们遗弃的枪支、子弹带和背囊。布伦克尔“上校”先生由兰道跑了几个钟头以后，终于停下来，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带领他们回营去了，虽然没有得到要塞的钥匙，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他那骄傲的姿态。用三门轻臼炮和一枚 24 磅炮的炮弹夺取兰道的这个盖世大功，就是如此。

这些霰弹是几名巴伐利亚的军官看到自己的士兵准备打开要塞的大门而匆忙发射的。士兵们自己改变了瞄准方向，因而没有伤人。当兰道的警备队看到这种碰运气的射击所产生的作用时，当然关于交出要塞的事也就不再提起了。

然而，英雄布伦克尔并不是一个甘心这种失败而不想报复的人。现在他决定夺取沃尔姆斯。他从他指挥过一个营的弗兰肯塔尔出发挺进。驻守沃尔姆斯的几个黑森士兵溜之大吉，于是英雄布伦克尔便敲敲打打地进入自己的故城。在设早宴以隆重庆祝沃尔姆斯解放之后，又举行一次正式庆祝活动，即让 20 名因病留在城里的黑森士兵宣誓忠于帝国宪法。然而，就在获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当天夜里，波

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已经把大炮架设在莱茵河右岸，第二天清早就很不客气地以隆隆的炮声惊醒了这些胜利的征服者。毫无疑问，是帝国军队用真正的炮弹和榴弹从对岸射击的！英雄布伦克尔一句话也没说就集合了自己的勇士，悄悄地退出沃尔姆斯，回到弗兰肯塔尔。至于他以后的英勇功绩，诗神将会在适宜的地方继续报道。

这时，在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在士兵们和人民自卫团的战士们不去操练，反而在小酒馆里引吭高歌的时候，在凯撒斯劳滕，军官先生们却在为一些极为深远的战略计划冥思苦想。问题的中心就是依靠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斗力量来对付拥有30 000名以上士兵和60门大炮的这样一支实实在在的军队，是否可能保持住像普法尔茨这样一个几个方向都没有掩蔽的小小省份。正因为所有的方案在这里都同样无用和荒唐，正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制定任何战略计划的一切条件，这些深谋远虑的军事家，这些普法尔茨军队的杰出人物，才决定要想出一个战略上的奇迹，截断普鲁士人到普法尔茨来的通路。每个初涉人事的尉官、每个腰佩马刀的大学生军团的莽汉（大学生军团终于在施奈德先生的庇护下组织起来，而且其中所有的人得到尉官军衔）、每个办事员都在对着普法尔茨的地图皱眉苦思，希望能发现一个战略上的万应灵丹。不难想象，这会导致怎样滑稽可笑的后果。匈牙利的作战方法特别受到赏识。从施奈德“将军”一直到最后一个还未得到公认的军中的拿破仑的口中，时刻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像科苏特那样干。我们应该放弃一部分领土，根据情况撤退到这边或那边，山上或平原。”在所有的小酒馆里都在高谈“我们应该像科苏特那样干”。每个伍长、每个士兵、每个街上的小孩也都重复着“我们应该像科苏特那样干。”而临时政府由于十分晓得不应该干预这些事情，由于感到



不管怎样行动最后都与它毫不相干,于是也好心地重复着“我们应该像科苏特那样干”。“我们应该像科苏特那样干,不然我们会灭亡。”——普法尔茨和科苏特!

在我描述军事行动之前,还应该简略地叙述一下几家报纸上提到过的关于我在基希海姆短时被捕的事件<sup>①</sup>。在普鲁士人到来的前几天,我陪送友人莫尔到普法尔茨的边境基希海姆博兰登去执行他所担负的使命。这儿驻扎着一部分莱茵—黑森部队,里面我们有一些熟人。傍晚,我们在客店里和这些熟人以及这个部队的其他志愿兵聚会在一起。在这些志愿兵里有几个是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的认真严肃的、满腔热情的“实干派”。他们认为武器虽少,但热情充沛,击溃世上的任何军队都没有什么困难。这些人在军事方面以前最多只见过换哨,从来也没想过能用物质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因此,正如我后来多次有机会亲自见到的那样,他们大部分人在初次交锋时就大失所望,以至急忙逃之夭夭了。我问一个这样的英雄,他是不是确实认为单靠普法尔茨现有的30 000把马刀和3 500支枪(其中许多是生锈的马枪)就能击败普鲁士人;正当我要欣赏这位实干派由于最高贵热情受到挫伤而表现的崇高愤怒时,突然警卫进到屋里宣布我被逮捕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有两个怒容满面的人从后面向我扑来。一个自称为民政委员弥勒,另一个是我唯一没有深入交往的政府委员格赖纳先生,我所以没有和他深入交往,一则是因为他经常离开凯撒斯劳滕(这位先生偷偷地将自己的不动产变成了动产),再则是由于他有一副令人可疑的阴沉哭丧的相貌。我的老朋

---

<sup>①</sup> 这几家报纸至今尚未查明。——编者注

友<sup>①</sup>莱茵—黑森部队的上尉马上站起来申明,如果我被逮捕,他和这支部队的相当多的优秀人物都将即刻离开部队。莫尔和其他的人想以武力保护我。在场的人分成了两派。场面可能变得很有趣;我声明说,我当然甘愿被逮捕:让所有的人最后都看到,普法尔茨运动到底是怎样的。于是我随着警卫去了。

第二天早晨,在齐茨先生对我进行可笑的审问之后,把我交给了民政委员,民政委员又把我交给了宪兵。宪兵得到命令把我当作奸细,所以给我加上了手铐,押着我步行去凯撒斯劳滕;我被控告的罪名是诋毁普法尔茨人民的起义,煽动人们反对政府;这里顺便带一句,这个政府我从来都没谈起过。在路上,由于我据理力争而给了我一辆车子。在凯撒斯劳滕(莫尔已经在我之前到了这里),我发现几位政府委员因为威武的格赖纳的失策,尤其因为对我的虐待而感到极为难堪。当然我当着宪兵的面给了这些先生们一些颜色看。由于格赖纳先生的报告还没有收到,有人提议要我作口头保证后释放。我拒绝作口头保证,并起身到区的监狱去了,——按照德斯特尔的建议作出决定,没有派人押送。德斯特尔声明,这样对待他的党内同志,他无法再留在政府里工作。刚来不久的奇尔讷态度也非常坚决。那天晚上,这件事传遍全城,所有的坚决派的拥护者马上都站在我这方面。此外,有消息说,这个事件在莱茵—黑森队伍中引起了骚动,他们大都想解散回家。这一切就更足以向那些我曾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们表明,必须满足我的要求。我在监狱中非常痛快地度过了24小时之后,德斯特尔和施米特到我这里来了;施米特对我说,我毫无条件地被释放了,政府希望我今后不要拒绝参加运

---

① 维·席利。——编者注

动。另外他还告诉我,已经颁布命令,从现在起严禁给政治犯带镣铐,并且继续追究滥施虐待的责任,调查逮捕情况及其原因。政府(格赖纳先生还没有向它打过任何报告)就是如此尽它当时的一切可能来使我感到满意,此后双方都丢掉了官腔,在“唐纳山”共饮了几大杯葡萄酒。第二天早晨,奇尔讷启程到莱茵-黑森部队进行安抚工作,我也托他带去一张便条。格赖纳先生回到凯撒斯劳滕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因为受到同事们的狠狠的申斥。这时候,普鲁士人开始从霍姆堡向前推进,由于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引人注意的转变,由于我不愿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最后,由于《新莱茵报》为了荣誉应该在普法尔茨-巴登军队中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我也腰佩战刀到维利希那里去了。

## 四 为共和国捐躯!

“为了德意志共和国的繁荣，  
必须把那 36 个王座推翻；  
弟兄们，献出我们的财产和生命，  
为了无情地将王座摧毁，  
为共和国捐躯，  
这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命运，这是我们所选定的奋斗目标！”

我乘车到诺伊施塔特去打听维利希的临时大本营驻地的时候，在火车上听到志愿兵们唱着这首歌。

看来，为共和国捐躯，这就是，或者至少必须是今后我所奋斗的目标了。我对于这个新的目标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端详了一下这些年轻的、漂亮的、英俊的志愿兵小伙子。从他们的外表上看不出目前为共和国捐躯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我从诺伊施塔特出发，乘坐一辆征用的农民的载货车，到兰道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奥芬巴赫去，因为维利希还在那里。刚过埃登科本就碰上了农民按维利希的命令设置的第一批岗哨；以后在每个村庄的进出口以及所有的交叉路口，都有这样的岗哨，没有起义政权的证明文件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显然已经接近有军事行动的地点。我在半夜到达奥芬巴赫，并立刻担任了维利希的副官。

当天(6月13日)维利希的一支不大的队伍打了一场漂亮仗。前几天，维利希曾得到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即德雷埃尔—奥伯弥勒

营的支援，因而充实了自己的志愿军团；他从这个营里抽调 50 名左右的人开往盖默斯海姆，让他们先到贝尔海姆。在他们的后面，在克尼特尔斯海姆还驻有志愿军团的一个连，以及一些用大镰刀武装起来的士兵。一营巴伐利亚人带着两门大炮和一个轻骑兵连突然出击。巴登人没有抵抗便逃走了；其中只有一个人被三个骑马的宪兵赶上，他拚命自卫，直到最后被军刀砍得遍体鳞伤，才跌倒在地，被进攻的人杀害了。当逃跑的人到了克尼特尔斯海姆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连长<sup>①</sup>出来迎击巴伐利亚人，这个连一共不到 50 人，其中有些人只有大镰刀。他巧妙地把自己的人分作几组，以散兵线的队形坚决地向前推进，结果兵力超过十倍的巴伐利亚人，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被迫退到巴登人所放弃的村子；最后，维利希部队派来一些援兵，又把巴伐利亚人赶出这个村子。巴伐利亚人大约伤亡 20 人，退到盖默斯海姆。遗憾的是，我不便指出这个勇敢的有才干的青年军官的名字，因为他现在的处境或许还不安全。在他的连里只有五个人受伤，伤势都不重。这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法国的志愿兵，他还没来得及射击，上臂就受了伤。尽管如此，他还是打完自己的 16 发子弹，当时他由于受伤自己不能装子弹，就让一个拿大镰刀的士兵替他装，以便尽可能射击敌人。第二天，我们到贝尔海姆去视察战场和筹划新的作战部署。巴伐利亚人曾向我们的散兵发射圆炮弹和霰弹，但是只不过把树枝打了下来，铺满整个的路面，还打中了连长前边的一棵树。

那天，德雷埃尔—奥伯弥勒营都全体到达，准备最后在贝尔海姆一带驻扎下来。这个营又体面，装备又好；特别是它的军官们，尖尖

---

<sup>①</sup> 洛雷克。——编者注

的胡须，黝黑的面庞，一个个威风凛凛、生龙活虎，看来简直是一群头脑开化的吃人生番，幸好他们并不那样可怕，这一点我们慢慢就会看到。

我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弹药，大多数人只剩下五六发子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20发，现有的弹药甚至填不满参加昨天战斗的战士们的空子弹带，这些使我感到很惊奇。我当时就自告奋勇到凯撒斯劳滕去弄些军火来，于是当天晚上就出发了。

农民的载货车走得很慢，其次，在各站停歇的时候又必需再去征用车辆，道路又不熟悉等等诸如此类的困难也耽搁了些时间；等我到达迈卡默（距诺伊施塔特差不多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在这里，我遇上了从皮尔马森斯来的人民自卫团的一个支队，押着四门大炮，送往霍姆堡。这四门大炮在凯撒斯劳滕已经被认为是丢失了的。这个支队穿过茨韦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然后越过非常难走的山路到达这里，才终于踏上了平原。我们这些来自皮尔马森斯的战士们由于劳累、夜行军、喝足了葡萄酒，因而心理很紧张，总觉得好像敌人紧跟在后面，其实，普鲁士的先生们一点也没有急于追赶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这天是6月15日）我到了诺伊施塔特。全体居民都走上了街头，其中夹杂着士兵和志愿兵（在普法尔茨，穿着便服的人民自卫团战士都一律称作志愿兵）。运货车、大炮、马匹堵塞了所有通道。一句话，我落入了全体撤退的普法尔茨军队中间。临时政府、施奈德将军、总参谋部、各个办公机构全都在这里。凯撒斯劳滕连同它的水果蔬菜商场、“唐纳山”饭店、啤酒店——“普法尔茨最好的战略据点”——被放弃了，目前诺伊施塔特这个地方成了普法尔茨混乱状态的中心，这种混乱只是在眼下打起仗来的时候，才达到了

顶点。于是，我就探听了全部情况，尽量地搜集火药、铅块和现成的子弹，——难道这些一仗没打就溃不成军的军队还会需要军火吗？——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奔波，最后才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找到一辆大车，当晚押着所获得的军火，在几个人护送之下启程而回。

在动身之前，我拜访了施奈德先生，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转达给维利希。这个老馋鬼告诉我几条毫无意义的消息，还郑重其事地说道：“看，我们现在恰恰像科苏特那样干。”

普法尔茨起义者之所以最后恰恰像科苏特那样干，原因是这样的。在“起义”的全盛时期，即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普法尔茨约有5 000—6 000名用各式枪支装备起来的战士，还有1 000—1 500名使用大镰刀的战士。所有这5 000—6 000名战士首先是来自维利希领导下的和莱茵-黑森地区的志愿军团，其次来自所谓的人民自卫团。每一个区都任命了一名军事委员，负责组织一个营。每一个营的核心和教练员都是从各该区部队中转向起义方面来的士兵。如果是在作战的情况下，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经常不断的军事训练，那么把正规军同新招收的战士混编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但是在这里却坏了事。由于武装不足，这些营没有组建成功；无所事事的士兵把军纪、军容一概置诸脑后，大部分人都逃跑了。到后来在一些区里算是组成了几个营，在另一些区里则只有几个武装的小队。以大镰刀做武器的战士是根本没有用的，他们总是碍手碍脚。在真正的战斗中派不上用场；他们一部分被留下作为所属营的临时附属部队等候为他们弄得武器，一部分则编为一支特别部队由一位不太精明的秦恩上尉指挥。公民秦恩是最道地不过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毕斯托；这位公民在英雄布伦克尔率领下从兰道附近逃跑时被自己的刀鞘绊了一下，把刀鞘折断了，后来却赌咒发誓地说“一颗

24 磅燃烧弹把它给炸成了两半”；这位不可战胜的毕斯托在此以前曾被任用来平定反动势力盘据下的村庄。他对执行这项任务十分热心，以致农民们虽然对于他和他的队伍极其尊敬，可是只要他只身落到他们手里，每次都得挨一顿痛打。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回来的路上，他手下的战士们都奉命把自己的大镰刀打出缺口或碎片，而他本人在到达凯撒斯劳滕后则以福斯泰夫的神气大谈自己和农民厮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靠这样的队伍当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于是 6 月 10 日才来到巴登军大本营的梅洛斯拉夫斯基就命令普法尔茨的队伍向莱茵河边打边撤，尽可能占领曼海姆那里的莱茵河渡口，如果占领不了，就在施派尔或克尼林根转到莱茵河右岸，然后从巴登方面守住莱茵河渡口，在命令发出的同时，有消息说，普鲁士人从萨尔布吕肯侵入普法尔茨，开了几枪以后，就迫使部署在边境上的为数不多的我军战士朝凯撒斯劳滕方向败退。同时，几乎一切多少有组织的部队都朝凯撒斯劳滕和诺伊施塔特方向集结；人心开始异常慌乱，一大部分新兵逃跑了。一个来自 1848 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志愿队的青年军官拉科率领着 30 名士兵去搜罗逃兵，用了两天两夜的工夫，弄到 1 400 人；他把这些人组成一个“凯撒斯劳滕营”，并一直指挥到战事结束。

从战略方面讲，普法尔茨的地势很简单，就连普鲁士人也不致在那里出差错。莱茵河畔是一道河谷，有步行四五小时的路程那样长，任何天然屏障都没有。普鲁士人畅行无阻地走了三天，从克罗伊茨纳赫和沃尔姆斯到了兰道和盖默斯海姆。在多山的普法尔茨山区有一条自萨尔格明德至美因茨的“帝国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大半段不是在山脊上就是在宽广的河谷旁。这里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因而一支人数少、战术差的军队连一点点可以据守的地方都找不



到。最后，紧靠着普鲁士边境线，在霍姆堡那里从“帝国公路”分出一条修筑得很好的道路，一段沿着河谷，一段顺着孚日山脉的山坡，经茨韦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直通兰道。固然在这条路上天然屏障多一些，但是如果军队人数少、没有大炮，也无法把这条路封锁住，特别是当一支敌军在平原地区调动并且有可能把通向兰道和贝格察伯恩的退路切断的时候。

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人的进犯非常简单。第一次袭击是从萨尔布吕肯打到霍姆堡；从霍姆堡出发，一支纵队直插凯撒斯劳滕，另一支纵队经皮尔马森斯打到兰道。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支队伍开始向莱茵河谷进犯。这支军队在基希海姆博兰登首次遭到了驻扎该地的莱茵-黑森队伍的猛烈抵抗。美因茨的步枪手们尽管伤亡不小，但还是以极顽强的精神坚守皇家花园。到最后，因为被敌人抄了后路，他们才撤退。其中有 17 个人落入普鲁士人的手中。他们被“英勇的军队”的喝醉了酒的英雄们绑到树上，立即枪杀了。这一卑鄙的行为就是普鲁士人对普法尔茨的“短促的但是光荣的讨伐”<sup>①</sup>的开始。

这样，普鲁士人就完全占领了普法尔茨的北半部，两个主力纵队之间的联系也恢复了。他们现在只要沿平原向前推进，解兰道和盖默斯海姆之围，就有可能占领普法尔茨的其余部分，并且把还可能在山里坚持的队伍一网打尽。

在普法尔茨，有将近 30 000 普鲁士人，他们拥有大量的骑兵和炮兵。在平原地带，普鲁士亲王和希尔施费尔德正率领最精锐的队伍向前进犯，在他们和诺伊施塔特之间，仅仅有一些已经涣散了的、没

---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9 年 1 月 1 日和 1849 年 7 月 28 日对巴登的普鲁士军队下达的命令。——编者注

有抵抗能力的人民自卫团的队伍和几支莱茵-黑森队伍。他们只要向施派尔和盖默斯海姆迅速推进,所有集中在,或确切些说所有乱聚在诺伊施塔特和兰道附近的四五千名普法尔茨起义军就会被击溃、驱散、赶跑或俘虏。然而,普鲁士先生们虽然在枪杀手无寸铁的俘虏时那样积极,但在战斗中却小心翼翼,在追击时松懈无比。

普鲁士人及其他的帝国军队所遇到的敌军人数比他们少,常常只有他们的五分之一,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分之一,组织得又很差,而且在有些地方是由一些平庸无能的人指挥的,可是在这样的敌军面前,普鲁士人和其他帝国军队在进攻和追击中却表现出极其罕见的畏葸不前;如果我在描述这次讨伐的全部过程时必须多次指出这一点,那我显然决不是想把这种状况说成是由于普鲁士士兵有些太胆小而产生的,更不是——读者大概已经看出——把我们的军队幻想得异常英勇。同样,我也并不像反动派那样,想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什么普鲁士人心肠宽厚,或是怕俘虏得太多而感到累赘。普鲁士的文武官僚,在战胜弱小的敌人时总要大事庆贺,以向手无寸铁的人残酷地进行报复为乐事,他们早就因这种行径而扬名于世了。他们在巴登、在普法尔茨就是这样干的,有下列事实为证:在基希海姆许多人被残杀,在卡尔斯鲁厄的养雉场里许多人夜间被枪杀,在各个战场上杀死负伤和放下武器的敌军的事件数不胜数,为数不多的俘虏也遭到残害,弗赖堡和拉施塔特的战地军事法庭把许多人判处死刑,最后,拉施塔特的犯人被拷打,没有饭吃,被关在又潮湿、又拥挤、又不透气的牢房里,再加上这一切所引起的伤寒病,结果被慢慢地、秘密地、因而更残酷地杀害了。普鲁士人作战行动松懈当然是由于怯懦,就是说,是由于指挥官们怯懦。且不谈我们的普鲁士英雄们在用兵和练兵方面的迟缓、怯懦而迂腐,这种迂腐本身就使得他们根本不可

能行动果敢、当机立断；且不谈他们的繁琐的军规，制定这些军规是为了间接地防止过去那些可耻的失败——这都暂且不谈，我们要谈的是：如果普鲁士人对手下的士兵信任的话，难道他们能够采用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无聊透顶的、对他们说来是丢尽脸面的作战方法吗？全部问题正在这里。将军先生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三分之一是不听话的后备团，这些团只要起义军打一次胜仗，就会转到那边去；而且很快就会把一半正规军特别是全部炮兵都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霍亨索伦王朝和“并没有被削弱的王位”<sup>①</sup>要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人人都一目了然。

因为要更换车辆和护送人员，所以我要在迈卡默等到16日早晨，在这里，一清早从诺伊施塔特开出的军队又赶上了我。昨天还在讲进攻施派尔，现在看来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军队直奔克尼林根桥。我在15个来自皮尔马森斯的半野蛮的青年农民（他们都是生于普法尔茨山区密林中的人）的护送之下由此动身。当已经快到奥芬巴赫的时候，我听说维利希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开向位于兰道东北的一个小市镇弗兰克韦勒去了。于是我翻回头，在将近中午时分，到了弗兰克韦勒。在那里，我不但遇到维利希，而且再一次遇到普法尔茨军队的全体先头部队，他们为了避免通过兰道和盖默斯海姆之间这段路而选择了兰道以东的一条路。临时政府及其官员们、总参谋部以及一大批对于两方面都依附的游手好闲的民主主义者，都驻在一所旅馆里。施奈德将军正在吃早饭。所有的人都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在旅馆里，临时政府的委员们、指挥官们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跑来跑

---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7年4月11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开会时的御前演说。——编者注

去,在大街上士兵们也是东跑西跑。后来,军队的主力:布伦克尔先生、特罗钦斯基先生、施特拉瑟先生以及所有其他各位先生骑着战马率领着自己的勇士们也陆续来到。情况更混乱了,好容易才慢慢地派出几支队伍朝因普夫林根和坎德尔方向前进。

这支军队看不出是在退却。混乱在军队中一开始就习以为常了;虽然年轻的战士们已经由于不习惯行军开始发起牢骚,可他们还是照旧在小酒馆饮酒取乐、喧哗吵闹,声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普鲁士人消灭掉。尽管对胜利抱着这样的信心,但是,只需一个骑兵团配备上几门马拉的大炮,就足以把这一伙快乐逍遥的人赶得四处奔逃,把“莱茵-普法尔茨自由军队”全部瓦解。这只要当机立断,再加上一些勇气就能做到,可是在普鲁士军中既谈不到当机立断,也谈不到什么勇敢。

次日早晨我们出发了。退却的队伍的主力开向克尼林根桥,而维利希则率领所部和德雷埃尔营开进山区去打普鲁士人。我们一个由兰道的约50名体操家组成的连队一直开到最高的山上,开到约翰尼斯克罗伊茨。席梅尔普芬尼希和他的队伍还屯扎在皮尔马森斯到兰道的那条路上。应该把普鲁士人挡住,并且在后魏登塔尔切断他们到贝格察伯恩和劳特河谷的去路。

在这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放弃了后魏登塔尔,退守林恩塔尔和安韦勒。道路在这里有一个转弯,恰好在转弯的地方,奎希河谷两岸的群山形成一个峡谷,峡谷的后面就是林恩塔尔村。峡谷由一支特殊的野战警备队守着。夜间,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巡逻队报告说,敌军向他们开火了;一清早,来自茨韦布吕肯的前民政委员魏斯和年轻的莱茵省人麦·约·贝克尔带来消息说普鲁士人逼近了,要求派巡逻队去侦察。可是因为没有去侦察,峡谷两面的高地没有占领,于是

魏斯和贝克尔就决定自己去侦察。当敌人逼近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地传来的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手下的战士们开始在峡谷口构筑工事；维利希前来巡视了阵地，下令占领高地，把毫无用处的工事拆除。然后他又急忙赶回安韦勒去调自己的队伍。

当我们穿过林恩塔尔的时候，听到了第一阵枪声。我们急速穿过村子，看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们已经在公路上列开阵式，大多数人用的是大镰刀，只有少数人用枪；有些人已经投入战斗。普鲁士人边射击边向高地进攻；席梅尔普芬尼希就眼睁睁地让他们占领了他自己应该去占领的阵地。我们的队里还没有落一颗枪弹；所有枪弹都高高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当枪弹嗖嗖地从手使大镰刀的战士们头上飞过的时候，整个队形就乱了起来，四处喊声大作。

我们费力地从这支队伍旁边通过，他们几乎把道路都堵住了，使得秩序大乱，加之手里使的是大镰刀，什么也不能干。连、排长等也和士兵一样毫无办法、惊慌失措。我们的步枪手被派去夺取高地，一部分在左边，一部分在右边。此外，又派两个连去增援左方的步枪手并迂回普鲁士人。主力纵队仍留在山谷内。一些步枪手占领了转角地方废弃的工事后面的阵地，向站在百步以外的普鲁士队伍开枪射击。我带了几名士兵跑到了左边的山上。

我们刚刚登上荆棘丛生的山坡，眼前就是一片开阔地；普鲁士步枪手从对面树林边用他们的锥形枪弹向我们射击。我又调上来几名志愿兵，他们不知所措地而且有些畏缩地在山坡上爬来爬去，我把他们尽可能地安排在隐蔽之处，开始观察地形。当派到左方去迂回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普鲁士人翼侧的时候，我无法带着这么几个人通过宽达 200—250 步的开阔地；我们最多也只能在原地坚守，因为本来掩蔽得就已经很差了。普鲁士人尽管有枪，有尖头子弹，可他们的枪

法却非常糟糕。我们几乎毫无掩蔽地在极其猛烈的火力之下挺了半个多小时，而高明的敌军步枪手却只打中一支枪的枪身，打穿了一个人的衣襟。

我必须最后弄清楚，维利希在哪里。我的战士们答应坚守阵地，于是我就折回爬下山坡。下面一切正常。普鲁士人的主力部队由于遭到大道上以及大道右方我军步枪手的射击，被迫稍稍后退。忽然，从左方，从我站过的那里，我们那几名志愿兵丢下了自己的阵地，沿山坡跑下来。原来，挺进到极左翼的那几个连（由于很多人掉队而人数减少了）认为通过前面小树林的那条路太长了，于是在一位在贝尔海姆打了胜仗的连长<sup>①</sup>指挥下，径直穿过开阔地。他们遇到了猛烈的射击；连长和很多士兵倒下了，其他的人失去了指挥官，在敌人的优势下顶不住了。现在普鲁士人赶到了前面，打我军的翼侧，从上面向我军战士猛烈射击，这样就迫使我军战士后退。很快整座山全都落入普鲁士人手里。他们从山上向我们射击；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于是开始撤退。道路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和德雷埃尔—奥伯弥勒营堵塞了，这个营行军的行列是按照绝妙的巴登传统，每个横排不是4—6人，而是半个步兵排即12—15人，所以把公路从左到右整个排满了。我们的人只得通过泥泞的草地向村子前进。我同步枪手则留下来掩护撤退。

这一仗所以打输，一方面是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违反维利希的命令没有去占领高地，而我们手下能打仗的队伍人数极少，无法从普鲁士人手中夺回这些地方，另一方面是由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和德雷埃尔那一营人什么用处也没有，再一方面是由于派去迂回普

---

<sup>①</sup> 洛雷克。——编者注

鲁士人的那个连长没有耐心，以致几乎丢了性命，使我们的左翼暴露无遗。然而，我们遭到这次失败还算运气，不然我们在后魏登塔尔可能遭到四面包围，因为当时普鲁士人的一个纵队已经在向贝格察伯恩进发，兰道之围已解。

在撤退的过程中，我们减员比战斗时还多。我们的队伍在行进中秩序很混乱，人声嘈杂，普鲁士人的枪弹不时飞入我们的密集的队伍。我们约有15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席梅尔普芬尼希，他在战斗打响不久膝盖上就中了一枪。普鲁士人这次追赶我们也是很松懈的，很快就停止了射击。只有山坡上的几个步枪手继续追击我们。在安韦勒，即距离战斗地点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安安静静地吃了点东西，然后向阿尔伯斯韦勒进发。我们最急需的已经弄到手了：3000盾的强制公债，这笔钱在安韦勒已经准备好了。后来普鲁士人把这叫作掠夺金库。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也认定我军的曼托伊费尔上尉（同柏林的可敬的曼托伊费尔是家，投诚过来的前普鲁士下级军官）已在林恩塔尔被打死。其实曼托伊费尔先生不但没有被打死，而且从那以后，甚至还在苏黎世的体操比赛中得过锦标。

在阿尔伯斯韦勒，我们增加了两门来自巴登的大炮，还有梅洛斯拉夫斯基派来的部分援军。我们打算利用这一批力量再一次在附近地方摆开阵势；但是我们得到情报：普鲁士人已经到了兰道，因此我们只好径直向朗根坎德尔进发。

在阿尔伯斯韦勒，我们幸运地摆脱了和我们一起走的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由于失去了指挥官，已经开始有些涣散，自行开赴坎德尔<sup>①</sup>。这支队伍还时常把走不动的或因其

---

① 即朗根坎德尔。——编者注

他原因掉队的战士留在沿途的小饭店里。德雷埃尔的那个营在阿尔伯斯韦勒发生了骚动。维利希和我去问那些战士们他们要干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后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志愿兵喊道：“他们要赶我们去送死！”一个连一次仗都没有打，在撤退时只有两名最多不过三名轻伤员的队伍里，喊出这样一句话，听来非常滑稽可笑。维利希命令这个战士走出来，交出武器。这个带几分醉意的白胡子老头这样做了，他的表现令人哭笑不得，他哭哭啼啼地讲了一大堆话，主要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这番话在非常善良但纪律很坏的战士们中间勾起了普遍的愤愤不平。因此，维利希下令全连立即离开，他说，他已经听够了废话和怨言，一分钟也不愿再指挥这样的士兵。这一连人没有多加分辩，向右一转就走了。五分钟以后这个营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走了，维利希并拨给他们两门大炮。他们不愿意被“赶去送死”，不愿意遵守纪律！我们倒情愿让他们离开。

我们转向右面，上了山，向因普夫林根方面前进。不久我们就接近了普鲁士人，我们的人和他們互射了几枪。整个晚上不时发出枪声。我在最先到达的村子里逗留了一下，以便差人去给我们由兰道的体操家组成的连队传递消息。我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消息没有，但是他们平安地转移到了法国，从法国又转回到巴登。由于这样逗留了一下，我掉了队，只好一个人摸索着走向坎德尔。路上满是掉队的士兵，所有的饭店都容纳不下了。看起来，一切堂而皇之的东西都幻灭了。这一伙军官没有士兵，那一伙士兵没有军官，这是一群各个队伍掉队的形形色色的志愿兵，有的徒步，有的乘着马车，全都急急忙忙地奔赴坎德尔。普鲁士人根本不想认真地追击他们。因普夫林根距兰道只有一小时的路程，沃尔特（在克尼林根桥的前面）距盖默斯海姆则有4—5小时的路程，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立即派军队到



这两个据点中的任何一处去，其实他们如果派出军队，在这边可以拦截掉队的人，在那边可以拦截全军。普鲁士亲王获取荣誉的方式真是与众不同！

在坎德尔，我遇到了维利希，可是没有看到他的军队，他的军队都在后面，驻扎在城外。虽然没有看到军队，却又看到了临时政府、总参谋部和那一大群游手好闲的人。这里和昨天弗兰克韦勒的情形一样，到处都挤满了军队，不过这里的秩序更坏，情况更混乱。每一分钟都有军官跑来寻找自己的队伍，士兵跑来寻找自己的指挥官，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已经到了全面瓦解的程度。

次日早晨，6月18日，全体都列队通过沃尔特，过了克尼林根桥。虽然有很多士兵被打散了，回家了，但剩下的军队，加上从巴登来的援军，总共还有五六千人。他们昂首阔步地开过沃尔特，样子满像刚刚夺取了这个村子，大步向前迎接新的胜利。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和科苏特一样。只有一个巴登的常备营还保持着军纪，他们路过酒店时能够只有几名士兵离队跑进去。最后来到的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留下来担任掩护，直到人马都过了桥；当一切完毕的时候，我们转移到了巴登，协助拆桥工作。

巴登政府，为了不惊动那些在6月6日如此勇敢地反对共和主义者<sup>23</sup>的顶刮刮的卡尔斯鲁厄小市民，就把普法尔茨的全部人马驻扎在近郊。而我们则坚决要求把我们的队伍驻扎在卡尔斯鲁厄；我们需要大大地整顿一番，设法添置各种军装用品，此外，我们认为在卡尔斯鲁厄完全应该驻有一支可靠的革命队伍。但是布伦坦诺先生早已想到我们了。他派我们到达克斯兰登去，一个距卡尔斯鲁厄有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村子，它被形容成简直是黄金国。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是全区最反动的巢穴。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费了很

大力气才弄到一些稻草；全队有一半人得睡硬地板。从各个门洞和窗户里探出的都是些难看的嘴脸。我们迅速作出决定。布伦坦诺先生收到了我们的警告：我们如果得不到好一些的驻地，第二天早晨，即6月19日将到卡尔斯鲁厄去。说到做到。早晨9点钟，我们动身出发。离开村子还没有走到步枪射程那么远，就遇到布伦坦诺先生带着一名参谋走来了。布伦坦诺先生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用尽花言巧语，企图使我们远离卡尔斯鲁厄。说什么这个城里已经住了5000人；较富有的人家都逃走了，中等人家里住的人已经过多了；他不会让维利希的英勇的、为人所绝口赞扬的队伍安置在条件很坏的地方，如此等等。但是不管他怎么说也没有用。维利希要求把逃跑的贵族领主们的空闲宅第拨给我们几个。布伦坦诺不愿这样做，于是我们就动身到卡尔斯鲁厄去宿营了。

在卡尔斯鲁厄，我们为大镰刀连的战士弄到了武器，还弄到一些大衣呢料。设法把服装靴鞋尽快地修补一下。我们的队伍又加入一些新人，有几个是我在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认识的工人，此外还有金克尔和齐赫林斯基。金克尔是参加贝桑松工人连当步枪手的，齐赫林斯基是德累斯顿起义军总司令的副官，在起义军撤退时，他指挥过掩护部队。他参加了学生连当步枪手。

我们一方面补充装备，一方面也没有忘记战术训练。我们紧张地进行了演习，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天，就演习从皇宫广场袭击卡尔斯鲁厄。小市民们对这些演习普遍地大为恼怒，这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事态的危险性。

最后，我们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征用大公<sup>①</sup>宅内那批被视为圣

---

① 莱奥波德。——编者注

物一直没人敢碰的武器。当我们正准备为从那里拿到的 20 支枪定制弹筒帽的时候，有情报说，普鲁士人在盖默斯海姆过了莱茵河，现在驻屯在格拉本和布鲁赫萨尔。

我们立即（这是在 6 月 20 日晚上）出动，并携带两门普法尔茨军的大炮。当我们到达布兰肯洛赫（从卡尔斯鲁厄朝布鲁赫萨尔方向步行一个半小时的地方）的时候，遇到了克莱门特先生和他的一营人，听说普鲁士人放出的前哨已进到距布兰肯洛赫约一小时的路程。在士兵们持枪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维利希提议立即向普鲁士人进攻。但克莱门特先生宣称他的军队缺少经验，不能在夜间出击。于是作出决定：我们立刻向卡尔斯多夫进发，拂晓前向普鲁士人发动进攻并努力突破他们的防线。如果成功，我们就想到布鲁赫萨尔去，并且尽可能打入这个城市。这时克莱门特先生应在天明取道腓特烈斯塔尔出击，支援我们的左翼。

将近午夜时分，我们启程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还是相当冒险的。我们的兵力还不足 700 人和两门大炮。我们的战士比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更有训练、更可靠，都经过战火的考验。我们用这样一支力量所要打击的敌人兵团，无论如何都比我们训练有素，他们的下级军官比我们的下级军官经验丰富得多，我们有些连长几乎没有在市民自卫团里工作过；敌人兵团的人数我们知道得不确切，但至少不少于 4 000 人。可是我们的队伍曾经受过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的考验，而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在人数对比上又根本不能指望更有利些。

我们派了十名大学生先行百步担任前哨，接着是第一队，队前面有六名巴登龙骑兵，这六名龙骑兵是分配给我们执行联络任务的。第一队后面是三个连队。再后面一些，是大炮和其余的三个连队。整个队伍由步枪手殿后。下了一道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开枪，行

进时不许出一点声音，一经发现敌人要以刺刀迎击。

没有过多久，我们就远远看到了普鲁士人岗哨上的灯光。我们一直走到施珀克，没受到袭击。主力部队停了下来，只有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忽然枪声四起；在村口的路上，燃起了稻草，火光耀眼，警钟急鸣。我们的步枪手从左右两侧迂回村庄，队伍开进村里。村子里也燃起了火堆；我们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提防着敌人的射击。但是四面寂静无声，只是在村公所的门前有一支特别的岗哨，放哨的都是农民。普鲁士的岗哨已经撤走。

我们在这里看出：普鲁士的先生们，尽管兵力占着巨大的优势，可是如果不把他们那套迂腐的警戒条例执行到繁琐不堪的程度，是不会感到安全的。他们这个边哨的位置和大本营相距有整整一小时的路程。假如我们也像这样用放边哨的任务来折磨自己的不习惯于战争劳苦的战士们，那我们就要有无数的人累垮。我们深信普鲁士人是胆小鬼，而且我们认为他们怕我们比我们怕他们更甚。情况确是这样。我们的前哨，我们的宿营地，直到抵达瑞士边界都没有遭到过一次袭击。

不管怎样，普鲁士人现在受到了警告。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呢？我们认为不能回去，于是，继续前进。

在诺伊特哈德又响起了警钟，但是这一次既没有信号火也没有枪声。我们的队伍靠拢了一下，通过这里的村庄，踏上山路，直奔卡尔斯多夫，我们的先头部队这时距我们只有 30 步远，刚刚上了山就发现对面有一个普鲁士哨兵，哨兵向他们喊了话。我听到问什么人以后，就跑到前面去。我的一个战友说，他完了，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了。可是向前这一跑却使我免遭惨祸。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这一刹那，敌人的哨兵开火了，我们的先头

部队不是把他用刺刀刺倒，而也开了火。在行军中和我并行的龙骑兵胆小成性，立刻掉转马头逃跑，冲到了队伍里，撞倒好几个人，把前面的几排（可能是4—6排）完全冲乱，然后飞奔而去。就在这时候，敌人在田野左右两边布下的马哨向我们开了火，在万分慌乱之际，我军有几个糊涂虫竟向自己的先头部队开火，而别的糊涂虫也跟着干起来。转眼之间，前面的一半队伍散了，士兵们有的四散在田野里，有的逃跑，也有的在大路上乱成一团。伤员、背包、帽子、枪支杂乱地丢弃在嫩绿的庄稼地里。这还不算，四面俱是粗野混乱的喊叫声、枪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嘈杂的声音刚刚平息一些，我就听见我们停放在后面远处的大炮被急急忙忙地拉跑了。这两门大炮给后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和龙骑兵给前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完全一样。

尽管我这时由于看到我们的士兵都像小孩子一样被吓得心惊胆战而感到很气恼，可是我觉得普鲁士人非常可怜，他们虽然预先得知我们来临的消息，却只放了几枪就停了火，也慌慌张张地退走了，我们的前哨仍旧停留在原来的位置，没有遭到任何袭击。只要一个骑兵连或一阵不太密集的射击就足以把我们赶得狼狈而逃。

维利希离开前哨队伍急忙驰赴本队。贝桑松连最先重新整队，其余的受了些申斥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连。天已破晓了。我们受到的损失是6人负伤，其中有我们的一个参谋，他就是当我跑向前哨一眨眼之后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被龙骑兵的战马撞伤的。此外，有几个人显然是被我们自己人的枪弹打伤的。为了不让普鲁士人得到一件哪怕是最没用处的战利品，我们把所有被丢弃的装备品都仔细地收拣了起来，然后慢慢向诺伊特哈德折回。在最先遇到的几幢房屋后面埋伏下步枪手作为掩护。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来，齐赫林斯基又去侦察了一次，发现他们仍旧留在山后面，从山后对他开了几枪，都

没有打中。

给我们解运大炮的几个普法尔茨农民已经押着一门大炮穿过了村子，另一门翻倒在地上。赶车人把套索割断，拉了五匹马逃跑了。我们只好把炮扶起来，仅用一匹骡马拉着它继续前行。

在到达施珀克的时候，我们听到右方，在腓特烈斯塔尔那边有越来越密集的对射的声音。克莱门特先生终于开始进攻了，但是比约定的时间迟一小时。我提议我们从侧面进攻来支援他，以补救错过的时机。维利希也有同样的意见，他命令我们顺着第一条拐向右边的路前进。我们队伍有一部分已经转了弯，这时从克莱门特那里来了一名传令官报告说，克莱门特已经撤退。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开向布兰肯洛赫。不久我们遇到了总参谋部的博伊斯特先生，他看到我们完整无恙而且队伍整整齐齐不胜惊讶。逃到卡尔斯鲁厄的可恶的龙骑兵，一路上乱讲，说什么维利希战死了，所有的军官都战死了，队伍被打散了，全被消灭了。说什么敌人对我们使用了霰弹和“燃烧弹”。

在到达布兰肯洛赫以前，我们遇见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军队，最后还有施奈德先生和他的参谋部。这个老滑头大概整夜都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他竟还有脸向我们大叫道：“你们上哪里去了，先生们？敌人是在那边！”我们自然也同样回敬他一句，从他旁边经过，到了布兰肯洛赫我们设法略事休息和用餐。两小时以后施奈德先生带着队伍转回来了，自然他也没有看到敌人，回来后就坐下来吃早饭。

现在施奈德先生所统率的人，连来自卡尔斯鲁厄一带的援军算在内，约有八九千人，其中有三个巴登常备营和两个巴登炮兵连。共有大炮约 25 门。由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命令有些不明确，更重要的是由于施奈德先生无能透顶，所以普法尔茨的军队还全部停留在卡

尔斯鲁厄一带，而普鲁士人却已经在盖默斯海姆的桥头堡掩护之下过了莱茵河。梅洛斯拉夫斯基下过一道通令（见他写的巴登战役的报告<sup>①</sup>）：从普法尔茨撤退以后，要守住从施派尔到克尼林根的莱茵河渡口；还下过一道特别命令：掩护卡尔斯鲁厄，并以克尼林根桥作为全军的集合点。施奈德先生则理解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他应该继续留在卡尔斯鲁厄和克尼林根。假如他按照梅洛斯拉夫斯基通令的意图派一支配备有炮兵的精锐队伍去盖默斯海姆的桥头堡，那就不会这样荒唐地命令姆尼夫斯基少校带着 450 名新兵，连大炮也没有，就去夺回桥头堡；30000 普鲁士人也就不会畅行无阻地渡过莱茵河；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联系就不会中断；普法尔茨的军队也就及时地赶到瓦格霍伊瑟尔战场。然而普法尔茨的军队没能这样做，它在瓦格霍伊瑟尔激战那一天，即 6 月 21 日，不知所措地奔跑于腓特烈斯塔尔、魏恩加滕、布鲁赫萨尔等地之间，不知道敌军在哪里，东跑西跑地白白浪费了时间。

我们接到命令向右翼出发，经魏恩加滕沿山坡推进。在 6 月 21 日这一天中午从布兰肯洛赫出发了，离开魏恩加滕的时间约在傍晚 5 点钟。普法尔茨军队终于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发觉敌军实力是占优势的，到当时为止，至少可以说到那一仗以前他们一向所表现出的那付满不在乎的神气不见了。从这时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人民自卫团，后来正规军和炮兵也渐渐同他们一样，到处都好像看见了普鲁士人似的，每天都不仅一次地受到这样的虚惊，以致常常引起全面的混乱，常常造成极端滑稽可笑的场面。过了魏恩加滕，刚登上一个

---

<sup>①</sup> 即《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1849 年伯尔尼版。——编者注

高岗,就有巡逻队和农民向我们跑来,大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我们的队伍排成战斗队形冲上前去。我折回城里去发警报,因此丢掉了自己的队伍。自然,这一阵惊慌混乱后来证明是毫无道理的:普鲁士人已经离开这里撤向瓦格霍伊瑟尔去了。维利希在同一天晚上就进入了布鲁赫萨尔。

我在上格龙巴赫同奥斯瓦尔德先生和他的普法尔茨营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同他们一起向布鲁赫萨尔进发。离城不远,迎面来了几辆马车,上面坐着掉队的士兵,他们大叫:“那里有普鲁士人!”全营立刻骚动起来,好不容易才使他们听命继续前进。自然这次又是谎报;在布鲁赫萨尔,驻屯着维利希和普法尔茨军前卫残存的队伍;其余各队陆续来到,而普鲁士人连影子也没有。除军队和指挥官以外,德斯特尔、前普法尔茨政府、还有戈克(自从布伦坦诺一意孤行以来他差不多是专门跟军队在一起帮办民政事宜),都在这里。军队的给养很坏,秩序混乱,只有大本营里的那些人像往常一样生活得舒舒服服。

我们又从卡尔斯鲁厄的库存弹药中领到了相当数量的子弹,当晚开拔,和我们一同开拔的还有全体前卫部队。他们到乌布施塔特宿营,我们则向右转,到下厄维斯海姆去在山地上掩护队伍的翼侧。

现在我们是一支看起来很像样的队伍。我们又新增加了两支部队。一支是朗根坎德尔的营,这个营的战士在从家乡到克尼林根桥的路上走散了,营里的 beaux restes[剩下来的宝贝]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人包括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一名旗手、一名司务长、一名下士和两名士兵。另一支是举着红旗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这支队伍约有 60 人,这些人看上去像是生番,而在征用物品方面则英雄气概十足。此外,又调配给我们四门巴登的大炮和一营巴登人民自卫



团，这个营叫作什么克尼尔、克纽尔还是克尼里姆营（名字究竟是什么已无法肯定了）。克尼里姆营真不愧是克尼里姆先生指挥下的营，而克尼里姆先生也称得起是这个营的指挥官。这个营也好，它的指挥官也好都是些死顽固，都是些糟糕透了的牛皮大王和大吵大嚷的人，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他们那种人所共知的“热情”如何驱使他们立下了盖世的英勇业绩。

6月23日早晨，维利希收到在乌布施塔特指挥着普法尔茨前卫部队的安内克写来的报告，内容是：敌人逼近，我军已经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维利希接到这个不寻常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刻骑马赶到那里，劝说安内克及其手下的军官要在乌布施塔特展开战斗并亲自视察了阵地，指出架设大炮的位置。然后他赶了回来，命令我们的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当我们正在调动队伍的时候，接到了从布鲁赫萨尔大本营来的由泰霍夫签署的如下命令：我军主力部队正向海德堡进发，希望今天就能赶到明戈尔斯海姆，我们应同时取道奥登海姆开赴瓦尔德昂格洛赫并在那里宿夜，以等待主力部队胜利的消息和有关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命令。

司徒卢威先生在他任意编造的《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一书第311—317页上发表了一篇关于6月20—26日普法尔茨军队作战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是为无能的施奈德进行辩护，不确切和歪曲事实之处非常多。从以上所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1）施奈德决不是“在到了布鲁赫萨尔（22日）几小时后就得到了瓦格霍伊瑟尔的作战情况及其结果的准确情报”；（2）可见，决不是“因此他改变了计划，撤消原定向明戈尔斯海姆进军的计划”，22日他决不是已经“决定同他那一师的主力部队留在布鲁赫萨尔”（前面谈到的泰霍夫的手令写于22日夜）；（3）决不是“预定在23日早晨进行大

规模的侦察”；事实上，是预定把队伍开赴明戈尔斯海姆；(4)“所有各个队伍都接到命令，一听到枪声就朝枪声的方向前进”；(5)“右翼的队伍(维利希)以未听到枪声来解释自己没有投入乌布施塔特战役”，——这一切统统都是拙劣的谎言，我们下面就来说明。

我们立即出发了。准备在奥登海姆进早餐。拨给我们担任联络的几名巴伐利亚的轻骑兵驰向左方，绕着村子，侦察有无敌军。普鲁士骑兵已经到过这个村子，征集了一批草料，准备迟一些再来取。我们没收了这些草料，开始为我们身背武器的士兵分发葡萄酒和干粮，这时候，一个轻骑兵飞奔而来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转眼间，离我们不远的克尼里姆那一营人乱了起来，变成一群疯子，到处乱跑，吵骂喊叫，而少校先生由于控制不住他的受了惊的战马，只好丢开自己的队伍不管。维利希骑马赶到，恢复了秩序，我们才继续前进。自然，根本没有发现普鲁士人。

在奥登海姆后面的高地上，我们听到了从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隆隆炮声，炮声很快听得更清楚了。有经验的人已经能够从炮声中辨别射出的是普通炮弹还是霰弹。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是继续照原方向前进还是沿炮声的方向前进。既然我们有明确的命令，而炮声听来又向明戈尔斯海姆那边移动，这就是说我们的人在前进，于是我们就决定向危险性更大的方向——向瓦尔德昂格洛赫前进。万一普法尔茨军队在乌布施塔特打了败仗，我们差不多就会被封锁在山顶上，处境将非常危险。

司徒卢威先生说什么乌布施塔特之战“假如翼侧部队能及时发动进攻，本来是可以取得辉煌战果的”(第314页)。可是炮声持续不到一个小时，而我们赶到施泰特费尔德和乌布施塔特之间的战场则需要两个至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战斗结束后一个半小时

才能到达那里。司徒卢威先生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在距蒂芬巴赫不远的地方，我们停留了一下。当队伍打尖的时候，维利希发出了几份急件。克尼里姆营在蒂芬巴赫发现了一个像是属于本镇的酒窖，他们把它没收了，把整桶整桶的酒搬出来，一小时的工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早晨对于普鲁士人的一场虚惊所引起的满腹懊恼，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炮声，这些英雄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自己军官的不信任心理——这一切在酒的刺激下，突然变为公开的骚乱。他们要求立即开回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休止地翻山越岭。这自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就擅自开了回去。生番似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也跟他们去了。我们任他们离去，然后便向瓦尔德昂格洛赫进发。

这里是一个很深的盆地，在这里宿夜无论如何是不安全的。因此我们停下来，探听周围地区的地势及敌军分布情况。这时，农民中间有一个不太确实的消息，好像说内卡军已经撤退。还传说什么一支不小的巴登军取道辛斯海姆和埃平根正向布雷滕推进，什么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已经隐瞒姓名极为秘密地经过这里，在辛斯海姆险些被捕。炮兵军心不稳，连我们的大学生也开始抱怨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炮兵遣回，然后向希尔斯巴赫进发。在希尔斯巴赫我们知道了48小时以前内卡军撤退的详细情况，而巴伐利亚人驻在辛斯海姆，距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估计他们有7000人，后来知道实际上达10000人之多。我们至多不过700人。我们的人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因此，就把他们安置在粮库里（往常，我们有必要把他们尽量集中在一起时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布置下加强哨，就去安歇了，我们第二天即24日的早晨动身的时候，已清清楚楚地听见巴伐利亚军队开近的声音。我们走后有一刻钟的工夫，巴伐利亚人就到了希

尔斯巴赫。

两天以前,即6月22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曾在辛斯海姆宿夜,当我们到达希尔斯巴赫的时候,他早带着他的队伍到了布雷滕。贝克尔率领后卫部队也通过了辛斯海姆。因此,他不可能如司徒卢威先生在第308页所说的那样,23日那天在辛斯海姆过夜,因为在晚上8点钟,也许还会更早一些,那里就有了巴伐利亚人,他们在头天晚上还同梅洛斯拉夫斯基打了不大的一仗。梅洛斯拉夫斯基从瓦格霍伊瑟尔撤出取道海德堡向布雷滕的转移,被这次行动的参加者描述成极为危险的一着。6月20日至24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指挥的军事行动,即在海德堡迅速集结队伍打击普鲁士人,并且在瓦格霍伊瑟尔一仗失利后迅速撤退,这当然都是他在巴登的全部活动的最光荣的篇章;但是这种战术碰到了如此懈怠的敌人,危险并不太大,在24小时后我们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队伍竟能顺利地全部撤退就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我们还畅行无阻地通过了弗莱英根峡谷,而梅洛斯拉夫斯基曾预料23日在那里会受到攻击,然后向比希希前进。我们打算在那里停下来,以便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在布雷滕扎下的营盘,使他不至于首当其冲。

在我们途经埃平根、蔡森豪森和弗莱英根,到处都有人投来惊异的眼光,因为内卡军的全部队伍,包括后卫,都已经从这里开过去了。我们到达比希希的时候,号兵吹起了军号,居民们惶恐不安,以为是普鲁士人来了。正在为梅洛斯拉夫斯基军营征集军粮的布雷滕市民自卫团的一支队伍,把我们当成了普鲁士人,慌作一团,直到我们拐了弯,他们看到我们穿的是便服,才放了心。我们马上征用了他们准备好的食品,刚刚吃完就得到消息:梅洛斯拉夫斯基率领所部从布雷滕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赶紧奔赴布雷滕。

我们在布雷滕住了一夜，由市民自卫团布置岗哨守卫。我们征用了一批运货车，以便在次日早晨把全体人员运往埃特林根。我们再没有其他的办法重新同主力部队汇合，因为布鲁赫萨尔在24日就已经被普鲁士人掌握，如果那条经迪德尔斯海姆通向杜拉赫的道路被敌人占领（我们后来知道确是被占领了），我们就无法作战了。

在布雷滕，大学生推选了几名代表来见我们，声称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尽无休地行军，请求让他们走。我们当然答复说，大敌当前决不能放走一个人；如果想当逃兵，那就悉听尊便了。于是，几乎走掉了半个连。其余的则一个一个地不断逃跑，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些步枪手。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些大学生一般地都像是永不满足且又胆小如鼠的公子哥儿，他们总是要求知道各项作战计划，腿上受点伤就叫苦连天，如果行军时不能让他们过得像假日游览一样舒适满意，他们就怨声载道。在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中间，只有几个人例外，他们表现出真正的革命品质和勇敢非凡的精神。

敌人在我们离开半小时以后进入了布雷滕，这是我们后来听说的。我们到达了埃特林根，在埃特林根，科尔文-维尔斯比茨基先生敦请我们开往杜拉赫，说贝克尔奉命在该地牵制敌人，直到卡尔斯鲁厄撤退完毕为止。维利希派了一名轻骑兵给贝克尔送信去，问他能否再坚持一些时候。一刻钟以后，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贝克尔的队伍，他们已经全部撤退了。于是我们就开往全军汇合地点拉施塔特。

到拉施塔特去的路上的景象混乱无比。大批的各式各样的队伍，有的列队前进，有的混杂在一处休息。在酷热的烈日之下、在一片混乱中我们费了很大劲才使战士没有散开。在拉施塔特城堡前的斜堤上面，驻屯着普法尔茨军队和巴登军几个营。普法尔茨军队兵

员数目锐减。还在乌布施塔特战役以前，齐茨先生和班贝格尔先生就在卡尔斯鲁厄召集了一支最精锐的队伍——莱茵-黑森队伍。这两位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斗士向这支队伍宣布：一切都完了，敌军的优势太大，现在还可能安然回家，他们——议会空谈家齐茨和英雄人物班贝格尔——不忍心让大家无辜地流血或遭受其他的横祸，就此宣布这支军队解散。莱茵-黑森军队的战士们听了这种可耻的提议自然非常愤怒，他们气得想把这两个叛徒抓起来枪毙。德斯特尔和普法尔茨政府也下令通缉他们。但是这两位可敬的公民已经逃之夭夭。在以后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勇敢的齐茨已经在安全的巴塞尔袖手旁观了。1848年9月齐茨先生曾经号召“坚决行动”<sup>31</sup>，1849年5月他又是鼓动人民起义的最卖力的议会吹牛家之一，而在这两次，他又都是在起义时最先置人民于不顾的人中名列前茅。在基希海姆博兰登，最先逃跑的人中间也有齐茨先生，而他的步枪手却进行了决战，牺牲在枪弹之下。莱茵-黑森的队伍本来已经和其他队伍一样，由于士兵逃跑而大大削弱，由于向巴登撤退而士气低落，现在则一蹶不振了。一部分战士解散回家了，另一部分经过改编，一直战斗到底。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驻扎在拉施塔特的时候，听说7月5日以前回家的都将被赦免，因而军心涣散。一半以上的人都跑掉了，各个营的人数都减少到一连人的样子，下级军官大都离散，剩下来的不足1200人的队伍差不多是无济于事了。至于我们这一支队伍，虽然决没有泄气，但是由于损失、生病、大学生逃跑，也有所削弱，缩减到只有500人多一点。

当晚，我们在库彭海姆宿营，这里已经驻有别的队伍。第二天早晨，我同维利希到拉施塔特去，在那里又遇到了莫尔。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的那些多少有教养的人

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那成百上千的工人，却谁也没有提起过，是他们把斗争坚持到底，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们活活瘦死在拉施塔特的牢房中，是他们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能把工人当作一种可以鼓动的、可以引爆的、可以剥削的材料，当作纯粹的炮灰。我们的“民主派”太无知了，资产阶级气味太浓了，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气质他们也是仇视的，因为无产阶级自尊心非常强，决不会对他们阿谀逢迎；因为无产阶级眼光非常远大，决不会被他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运动的时候，这些人总是手握武器站在最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人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既然所谓的民主派没有兴趣对这样的工人给予肯定，那么，无产阶级的党就有责任给这些工人以应有的荣誉。科隆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与组建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sup>32</sup>。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隆工人联合会<sup>33</sup>的领导工作。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sup>34</sup>后曾经流亡伦敦，不久又化名回到德国，在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别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撒斯劳滕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的使命，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的敌军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贝桑松工人连。三天之后他

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忠实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第二天，即27日，我们的队伍向山地，朝罗滕费尔斯的方向多少转移了一些。军队所划分的各种战斗单位，各单位的部署，逐渐确定了下来。我们属于右翼师，指挥是托梅上校，他就是在梅克斯海姆要把梅洛斯拉夫斯基逮捕起来，并且儿戏似地要他留任原职的那位先生<sup>35</sup>。从27日起，这一师归梅尔西指挥。济格尔提议由维利希任普法尔茨军队的司令官，维利希予以谢绝，而担负了师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师部署在从盖恩斯巴赫、符腾堡的边界线到罗滕费尔斯的那一边。左方紧靠着集结在库彭海姆周围的奥博尔斯基师。前哨部队进驻界口和苏尔茨巴赫、米歇尔巴赫、温克尔。给养起初不好，又不能按时发下，27日以后有所改善。我们这一师的全部人马是：巴登军的几个常备营、普法尔茨军队中剩下来的由英雄布伦克尔率领的一部分人、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个至一个半炮兵连。普法尔茨军队在盖恩斯巴赫及其附近驻防，正规军和我们的队伍在罗滕费尔斯及其附近。大本营设在罗滕费尔斯对面的伊丽莎白泉旅馆里。

28日，我们——师参谋部人员、我们队伍的参谋部人员、还有莫尔、金克尔以及其他的志愿队人员——在这座旅馆里吃过饭正在喝咖啡的时候，忽然得到情报说我们驻米歇尔巴赫的前卫部队遭到普鲁士人的攻击。虽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敌人的意图只不过是侦察



而已，但我们还是立即出动了。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曾一度被普鲁士人攻占的位于峡谷中的米歇尔巴赫村已经夺回。双方隔着峡谷从两面的山坡对射了一阵，白白浪费许多弹药。我只看到一个人被打死，一个人被打伤。当正规军向距离 600—800 步远的地方盲目地发射自己的子弹的时候，我队战士则按照维利希的命令不慌不忙地把枪支架在一起，在有名无实的敌军身边，在有名无实的火力网下休息。只由步枪手走下林木丛生的斜坡，在正规军的一部分战士支援下，把对面山坡上的普鲁士人赶跑了。我们的一个步枪手用他那支简直像是手提式大炮的大枪向敌人射击，在差不多相距 900 步远的地方把一个普鲁士军官打下马来，这个军官手下的全连人马立即折回，逃入林中。落到我们手中的有几个被打死打伤的普鲁士人，还有两名俘虏。

第二天，全线总攻击开始了，这一次普鲁士先生们使得我们连午饭都来不及吃。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第一次进攻是向比施韦尔，即奥博尔斯基师同我师的接合部发动的。维利希极力主张我们的队伍尽可能留驻罗滕费尔斯作为后备，因为无论如何要防备在相反的方向，即在盖恩斯巴赫方面受到敌人的主攻。但是梅尔西反对这样做，他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常常是在一个营遭到进攻的时候，其余各营不立即出动予以全力支援，这个营就会叫嚷说自己被出卖了，全体都会逃跑。于是，队伍就向比施韦尔进发了。

维利希和我率领一连步枪手沿穆尔格河右岸，向比施韦尔进发。在距离罗滕费尔斯有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和敌人遭遇。步枪手成散兵线散开，维利希则纵马折回，去调后面不远的一支队伍上前沿。我们的步枪手在果木树和葡萄架的掩护下同敌人对峙了一段时间，敌军火力非常强大，我们的战士亦猛烈还击。但是后来有一支强

大的敌军纵队沿大路向前冲来增援他们的步枪手,这时我军左翼的步枪手后退了,无论怎样也无法说服他们守住阵地。右翼则向山地继续前进,后来得到我们队伍的接应。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步枪手简直毫无办法,于是我干脆丢开他们不管,向山上插有我们队伍的旗帜的地方奔去。有一个连落在后面,连长本来是个裁缝,可以算得上一个勇敢的汉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把他的战士并入其余的队伍,这时遇到了维利希。他刚刚命令贝桑松连布成散兵线,又把所有其余的队伍,包括派往山地去掩护右翼的那个连,在后面布成两条作战线。

我们的散兵线遭到了猛烈火力的射击。我们面对的敌军是普鲁士步枪手。他们有发射尖头子弹的步枪,而我们的工人只能用旧式火枪来对付他们。然而,工人们在我们右翼的步枪手的参加和支援下,坚决转入进攻。结果距离拉近了,特别是在右翼,这样很快就抵消了武器性能差的弱点,普鲁士人被击退了。两条作战线几乎紧接在散兵线的后面一直保持没有动。这个时候,在我们左方穆尔格河谷里运来两门巴登的大炮,用这两门大炮向停在路上的普鲁士步兵和炮兵开了火。

激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射击的火力异常猛烈,普鲁士人节节后退,我们的一些步枪手已经打到比施韦尔,这时普鲁士人得到了增援,派了几个营向前推进。我们的散兵线后退了;第一作战线排枪齐发,第二作战线略向左方转入谷地后也开了火。但是普鲁士人以密集的队形全线发动进攻。掩护我军左翼的两门巴登大炮已向后撤,在右翼,普鲁士人已经下了山,于是我军被迫撤退。

我们刚刚撤出了敌人的交叉火力点,就在山坡上占据了新的阵地。先前,我们的阵地是面向莱茵平原,面向比施韦尔和尼德魏尔,

而现在则是面向奥伯魏尔方面的普鲁士人所控制的山地。这时，那些常备营也终于拉上了火线，我们队伍中的两个连再次被调到前面布成散兵线，常备营就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

我们的伤亡很重。减员约 30 人，其中包括金克尔和莫尔。而四散逃走的步枪手还不算在内。金克尔和莫尔率领本连的右翼和若干名步枪手前进得太远了。步枪手的指挥官，来自莱茵普鲁士特罗内肯的埃默曼，是个森林守护队长，打普鲁士人就像猎兔一样，他把步枪手们带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射击普鲁士炮兵辎重队，迫使它急忙退却。可是正在这时候，从谷地冲出一连普鲁士人，向他们开火。金克尔倒下了。头部负了伤，只好抬着他，直到他能重新自己走路；可是他们很快就遭到交叉火力的射击，必须想办法脱身。金克尔不能随着大家走了，他跑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里被普鲁士人抓住痛打一顿。莫尔的腹部中了一枪也被俘了，随后因伤重而死。齐赫林斯基也负了伤，被炮弹打中颈部，但他仍然留在队伍里面。

当主力部队原地不动，而维利希驰赴战场的另外一端的时候，我急忙向穆尔格河上位于罗滕费尔斯低凹地区的那座桥跑去，那座桥算是一个汇合点。我是想得到来自盖恩斯巴赫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到那座桥，就看见陷入火海的盖恩斯巴赫的上空烟雾腾腾，到了桥上我知道这里已经可以听到盖恩斯巴赫方面的隆隆炮声了。后来我又到桥那边去了几次，盖恩斯巴赫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糕；在桥旁聚集的巴登正规军一次比一次多，这些军队刚一上火线就心里发慌。最后，我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加格瑙。到那里迎击敌人已经刻不容缓了。维利希带着队伍过了穆尔格河，去占领罗滕费尔斯对面的阵地，他还带了刚刚落到他手里的 4 门大炮。我去找我们那两个成散兵线前进的连，这时他们已经向前推进得很远了。我到处都遇到正规军，

大部分没有军官。其中一支队伍由一个医生率领着，他趁此机会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您想必认识我，我叫诺伊豪斯，是图林根运动的领导人！”这些可爱的人到处都把普鲁士人打得落花流水，现在看不到敌人便回来了。我没有找到我们那两个连，他们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取道罗滕费尔斯折回，于是我又向桥那边奔去。在那里我遇到梅尔西和他的参谋部和军队。我请求他至少拨给我两三个连去支援维利希。得到的答复是：“把全师带走都可以，只要您有办法对付这帮人。”这些曾到处击退敌人的士兵，一共只有五个钟头没有歇脚，这时他们却躺在草地上，松松垮垮，士气低落，毫无用处；敌人在盖恩斯巴赫对他们进行迂回的消息对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继续向前走，遇到一个从米歇尔巴赫回来的连也根本不中用了。当我在原来的大本营重新找到我们队伍的时候，从加格瑙涌过一批溃逃下来的普法尔茨军——毕斯托-秦恩带着他那一帮现在已配备上火枪的乌合之众。维利希到处侦察了好久，选定一个既能控制穆尔格河谷又能同时相当有利地进行步枪射击的炮兵阵地，可是炮兵们却拉着大炮扬长而去，连长也无法阻止他们。他们又到桥上梅尔西那里。这时候，维利希把梅尔西写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信里说一切都完了。他将向奥斯那边撤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和他们一样，立即向山地前进，当时的时间大约7点钟。

盖恩斯巴赫的情况是这样：波伊克尔所率领的帝国军队，前一天已经被我方巡逻队在符腾堡界内的黑勒纳尔布发现，他们和布防在边境上的符腾堡军队一起，在29日午后进攻盖恩斯巴赫。他们先对我方前哨人员用了一个卑劣的狡计，高喊不要开枪，说他们是自家弟兄，可是等他们靠近到80步远的时候便一齐开火，迫使我军哨兵后撤。然后他们就用榴弹轰击盖恩斯巴赫，使城市着了火。当大火已

经烧到无法扑救的时候，梅洛斯拉夫斯基派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保住阵地的那位济格尔先生亲自下令，要布伦克尔先生及其部下边战边撤。济格尔先生大概不会否认这一事实，正像在伯尔尼一样，当布伦克尔先生的一个副官当着他（济格尔先生）和维利希的面讲述这件怪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否认。由于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边战”（！）边放弃穆尔格河上的全部军事部署的中心据点——，战斗自然是全线失败，而且巴登军的最后一个阵地也丢掉了。

普鲁士人虽然在拉施塔特打了胜仗，但是也并不怎么光彩。我军只13 000人，大部分士气低落，除少数例外，指挥都不灵；敌人的军队加上打到盖恩斯巴赫的帝国军队，一共至少有60 000人。他们虽然在力量对比上占了这样大的优势，可是却不敢发起像样的正面攻击，而是采用懦夫的卑劣的手段，破坏了我们不能进入的符腾堡领土的中立。如果不是盖恩斯巴赫留守的人少得那样奇怪，如果不是济格尔先生下了前面所提到的那道令人难忘的命令，那么尽管普鲁士人使用了卑劣的手段，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至少在最初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最后仍然必须进行正面攻击。我们的阵地决不能说是难以攻破的，再过一天就会被夺去，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这样的胜利会使普鲁士人付出更多得无比的牺牲，会大大损坏他们的军事声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选择了破坏符腾堡中立的办法，而符腾堡也竟然不动声色地任其破坏。

我们这支不超过450人的队伍穿过山地向奥斯方向撤退。这里道路上挤满了散兵、马车、大炮等等，混乱已极。我们在人流中穿过去，在辛茨海姆停下来休息。第二天早晨过了比尔以后，我们招收一批逃亡者。并在上阿赫恩过了一夜。最后一仗是在这一天打的。德意志—波兰军团，再加上贝克尔师的几支队伍一起，在奥斯击退了帝

国军队并从他们手中夺得一门榴弹炮(梅克伦堡的),这门炮后来完好地带到了瑞士。

军队是彻底瓦解了。梅洛斯拉夫斯基和其他的波兰人都辞去指挥的职务;奥博尔斯基上校于6月29日晚上,还在战场上就放弃了自己的职守。不过,这种暂时的瓦解本身还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普法尔茨军队彻底溃散已经有三四次了,每次又都马马虎虎地重新组织起来。现在还有两个办法可以尝试一下,那就是尽可能慢些撤退,在所有不得留给敌人的地方征集兵员以补充队伍,并迅速地把上巴登的弗赖堡和多瑙埃兴根征集来的兵员集中起来。这样,他们还能够短期内多少整顿一下秩序和军纪,在弗赖堡前面的凯撒施图尔或者在多瑙埃兴根作最后一次拚死的但是光荣的战斗。然而不论政治领导还是军事领导,都比士兵们更加泄气。他们对军队以及整个运动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直撤退下去,被打得落花流水,束手无策,垂头丧气。

自从对盖恩斯巴赫的攻击之后,所有的人都担心被敌人从符腾堡方面迂回,这就使得士气普遍低落的情况更为严重。维利希的队伍带了两门山炮——发给我们的大炮除这两门以外都在经过卡珀尔以前就丢下了——沿卡珀尔河谷向山地进发,以便掩护符腾堡边界。我们行军经过黑林山的时候,一次也没有遇上敌人,简直是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7月1日经阿勒海利根到达奥珀瑙,2日通过洪茨山到了沃尔法赫。7月3日我们在那里得到消息说政府现在在弗赖堡,而且连这个城市也打算放弃。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奔赴该地。我们想迫使临时政府的委员先生们和当时在济格尔这位英雄领导之下的最高司令部不要一仗不打就把弗赖堡拱手送给敌人。我们从沃尔法赫动身时已经晚了,深夜才到达瓦尔德基希。我们在这里

听说弗赖堡已经放弃，政府和大本营的驻地已转移到多瑙埃兴根。这时我们接到一道直接下达的命令，要我们占领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在那里构筑工事，并把我们的司令部设在富特旺根。因此我们只得折回布莱巴赫去。

济格尔先生现在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黑林山山脊的那一边，防线布置的设想是：从勒拉赫起，经托特瑙和富特旺根，朝施兰贝格的方向延伸到符腾堡的边界。梅尔西和布伦克尔组成左翼，沿着莱茵河谷向勒拉赫前进；其次有做过推销员的多尔先生，他以黑克尔军的将军的身分被任命为师长，驻守赫伦河谷地区；再其次是我们的队伍，分布在富特旺根和西蒙斯瓦尔德河谷；最后，在右翼贝克尔的队伍驻在圣格奥尔根和特里贝格。济格尔先生率领一支后备军驻扎在山脊那边的多瑙埃兴根。这时的战斗力量虽然因时常有人逃跑而大大削弱，并且没有新兵来补充，但是还有约9 000人和40门大炮。

从大本营，从弗赖堡、武塔赫河畔诺伊施塔特和多瑙埃兴根来的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充满着背水一战、视死如归的精神。的确，大家都估计敌人会从符腾堡出动取道罗特韦尔和菲林根，再次袭击我军的背后；但是大家有决心把敌人打垮，不论情况如何也要守住黑林山山地，正如有一道命令所说的，“对敌人的一切动静都简直不必理睬”。这就是说，济格尔先生确保自己能够在四小时内从多瑙埃兴根堂而皇之地撤到瑞士境内，然后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沙夫豪森坐视我们这些被包围在山地里的人的命运如何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造成多么令人开心的结局。

4日，我们带着两个连（160人）到了富特旺根，我们部队其余的人派去驻守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和居滕巴赫、圣梅尔根的山口。在圣

梅尔根,我们和多尔先生的队伍为邻,在申瓦尔德和贝克尔的队伍为邻。所有的山口都构筑了工事。5日,我们驻在富特旺根。6日,从贝克尔那里传来消息说普鲁士人正在向菲林根挺进<sup>①</sup>;同时他要我们在弗伦巴赫袭击敌人以支援济格爾的行动。贝克尔还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主力队伍在特里贝格构筑了很牢固的防御工事,他本人等到济格爾一拿下菲林根,马上就到特里贝格去。

要我们去进攻根本不可想象。我们这支不满450人的队伍负有守住三平方英里地面的任务,所以连一个人也抽不出来。我们必须驻留原地,并且这样通知了贝克尔。随后不久,大本营来了一道紧急命令,派维利希立即奔赴多瑙埃兴根,担任指挥全部炮兵的任务。当我们正准备动身的时候,有一队人民自卫团开到了富特旺根,后面还跟着炮兵和人民自卫团的其他几个营。这是贝克尔和他的队伍。据说,他的战士们军心浮动。我向一位朋友,“少校”参谋奈林格爾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他,奈林格爾在指挥特里贝格阵地的時候,刚刚下了构筑工事的命令,军官团就交给他一份由全体军官签名的书面声明,说军心已变,如不立刻下令拔营,他们军官就要带着全部队伍一起离开。我一看签名,原来又是那个勇敢的德雷埃爾-奥伯米勒营!奈林格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贝克尔,然后就向富特旺根开拔。贝克尔立即动身追赶他们,所以他和他的全部人马才来到富特旺根,那些胆小如鼠的军官和士兵在这里饱尝了我们志愿兵的无情嘲笑。这些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到晚上贝克尔终于又把他们带回原来的阵地。

<sup>①</sup> 见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第430—433页。——编者注



我们仍然开往多瑙埃兴根，随后还有贝桑松连。普鲁士人蜂拥着直奔大路而来。菲林根被他们占领了。可是，我们平安通过，一路上没有发生战事，晚上快 10 点钟的时候，贝桑松连也到了。在多瑙埃兴根我遇到德斯特尔，听他说，司徒卢威先生在弗赖堡的制宪议会<sup>36</sup>上要求立即迁往瑞士，因为一切都完了；英雄布伦克尔采纳了这个提议，今天早晨他已经由巴塞尔转移到瑞士境内。这两个消息完全得到了证实。英雄布伦克尔的确在 7 月 6 日到巴塞尔去了，尽管恰恰是他距离敌人最远。不过，临走他还抓紧时间用来特别征集一批物资，为这批物资他和济格尔先生，后来又和瑞士当局发生过一些纠葛。英雄司徒卢威在 6 月 29 日还宣称布伦坦诺先生以及每一个想同敌人谈判的人都是叛徒<sup>①</sup>，谁知三天以后，在 7 月 2 日他却大为泄气，以致厚颜无耻地在巴登制宪议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如下的建议：

“为了使上巴登不像下巴登那样遭受战争灾祸，为了不再牺牲更多的宝贵鲜血，由于必须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应当把巴登议会的代表们和革命的全体参加者的 7 月 10 日以前的薪饷发给他们，再发给适当的路费，然后全体人员连同现金、储备物资、武器等等一并撤入瑞士境内！”

勇敢的司徒卢威这个高明的建议是在 7 月 2 日提出的，这时候我们正停留在黑林山山上的沃尔法赫，那里距弗赖堡是 10 小时的路程，距瑞士则是 20 小时的路程！司徒卢威先生确是够天真的，他在所著《历史》<sup>②</sup>一书第 237 页及以下几页上竟讲述了这回事，而且还

---

① 见古·司徒卢威在 1849 年 6 月 28 日制宪议会上以提议形式作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即《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 年伯尔尼版。——编者注

自鸣得意。采纳这一建议只能有一个结果,即普鲁士人将尽全力进逼我们,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也就是说,要抢夺我们的现金、大炮和储备物资,因为执行了上述决定,这样来大力追击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其次,我们的军队马上会大量散去,整队整队的人马会自行逃向瑞士,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处境也将最坏;我们驻留在巴登境内直到12日,而我们的军饷则发到17日。

济格尔先生不去想办法把菲林根从敌人手中夺回,却首先决定在多瑙埃兴根的后面许芬根附近布防,等待敌人。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又决定转移到紧靠瑞士边境的施蒂林根。我们赶紧派人骑马到富特旺根去给我们的队伍和贝克尔的队伍送信。这两支队伍也都要取道诺伊施塔特和博恩多夫到施蒂林根去。维利希到诺伊施塔特去迎接队伍,我则留在贝桑松连里。我们是在里德伯林根过的夜,第二天,即7月7日午后到达施蒂林根。8日,济格尔先生检阅一下自己的已经散失了一半的军队,并下令以后不要再乘行,而要行军(在边界线!),说完他就走了。他留给我们半个炮兵连和一道下给维利希的命令。

这个时候,从富特旺根传来全面退却的消息,首先传到贝克尔那里,然后传到我们的驻扎在前面的几个连。我们的队伍先在富特旺根集合,又在诺伊施塔特遇上维利希。贝克尔的驻地比起我们前面的队伍来距富特旺根近一些,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他却迟一些时候才到达那里。他在路上遇到一些工事,阻碍了他的前进。后来瑞士报纸上说这些工事是我们的队伍构筑的。这不对。我们的队伍只是在黑林山山脊另外一侧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根本没有在特里贝格至富特旺根这条路上设置障碍,这条路我们根本没有去据守。此外,我们的志愿兵是在贝克尔的前卫部队进入富特旺根以后才离

开这个城镇的。

我们在多瑙埃兴根决定，全军的残部在武塔赫河对岸埃京根至廷根一线集结，等待敌人的临近。在这里，我们把队伍的两翼扎在瑞士的边境，凭我们很有威力的炮兵，还能够来一次最后决战。甚至可以坐等普鲁士人侵入瑞士领土而把瑞士拖入战争。但是维利希来到以后，我们读了勇敢的济格爾的命令真是万分惊奇，他说：“主力部队开赴廷根和瓦尔茨胡特，在那里占据坚固的阵地(!!)。请您设法尽可能坚守阵地(施蒂林根和埃京根的阵地)，守得越久越好。”廷根和瓦尔茨胡特的“坚固的阵地”——背有莱茵河，前有敌人容易达到的高地！这只能意味着我军打算过塞京根桥转移到瑞士去。可是济格爾这位英雄在谈到司徒卢威的建议时不是说过，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他济格爾就第一个起来反抗吗？

我们紧靠武塔赫河岸占据了阵地，并把队伍分布在埃京根和我们司令部所在地武特兴根之间。我们在这里接到济格爾先生的一份更加奇妙的文件：

“命令。廷根大本营。1849年7月8日。送埃京根维利希上校。由于沙夫豪森州现在已经对我采取敌对态度，所以我已无法占据我们商定的阵地。你队的行动当适应这一形势，开赴格里森、劳赫林根和廷根方向。我明天将由此动身，或者到瓦尔茨胡特去，或者到阿尔布河去(即到塞京根去)……总司令济格爾。”

这太过分了。当晚，维利希和我驰赴廷根。“总军需官”施林凯对我们说了实话，实际上是要到塞京根去，从那里渡过莱茵河。济格爾起初还想摆出“总司令”的架子来压人，但维利希并不买账，最后终于迫使济格爾下令军队折回，向格里森开进。向塞京根进军的借口是同多尔会师，说多尔在向那里进军，还假说那里有坚固的阵地。这

个阵地分明就是 1800 年莫罗据以发动战役时所占的阵地，不过，这块地方有一个缺点，即它的正面完全不是敌人向我军推进的方向。至于高贵的多尔，他急忙表示，自己不用济格尔先生的帮助也能转移到瑞士去。

在苏黎世州和沙夫豪森州之间有一小块巴登的领土，这块地方有耶施泰滕和洛特施泰滕两个居民点，四面都在瑞士领土包围之中，只是在巴尔特斯韦尔那里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应当在这里构筑最后的阵地。巴尔特斯韦尔后面道路两旁的高地对我们说来是个很好的炮兵阵地，在我们的大炮万一不得不转入瑞士领土的时候，我们的步兵还足够用来掩护它们。经商议的结果，我们留在这里以便摸清普鲁士人是想进攻我们还是想困死我们。主力部队就在这里扎了营，贝克尔也汇合了进来。维利希选定了炮兵阵地（后来，我们发现选定的炮兵阵地变成了停炮场）。我们自己担任后卫，慢慢地跟着全军前进。9 日晚上开向埃尔青根，10 日开向里德恩。这一天在军营里开了一个军事大会。只有维利希一人主张守下去，济格尔、贝克尔等人都主张退入瑞士境内。当时有一个瑞士特派员在场，好像是库尔茨上校，他宣称，如果再打仗的话，瑞士将拒绝提供庇护。在表决时，维利希和两三个军官占少数。我们的队伍除他以外谁也没有出席。

当维利希还在军营里的时候，拨给我们的那半个炮兵连接到撤走的命令，他们没有向我们打一声招呼就离开了。除了我们的队伍以外，所有其他各部也奉命到军营里去。入夜，我同维利希再次驰赴洛特施泰滕大本营。当我们在拂晓往回赶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全军人马撤离驻地，极为混乱地涌向边界。就在 11 日当天清晨，济格尔先生率部转入瑞士境内，到达拉夫茨，贝克尔先生率部到达莱瑙。我们把自己的队伍集合起来，先到了军营，然后到耶施泰滕。在耶施泰

滕，将近中午的时候，收到济格尔从埃格利绍派传令官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经平安地到达瑞士，军官们仍旧保留他们的军刀，我们应尽快地到那里去。原来他只有到了中立的国土上才想起我们！

我们取道洛特施泰滕直抵边界，仍在德国的领土上安营露宿，12日早晨把枪支卸下了子弹，作为最后一批巴登-普法尔茨军踏上瑞士领土。就在同一天，和我们同时，康斯坦茨也被当地驻军放弃了。一个星期以后，拉施塔特由于有人叛变而陷落，整个德国，直到边境之地，又暂时落入反革命之手。

---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本身的不彻底性和内部的缺陷。从1848年六月革命<sup>5</sup>失败的时候起，对于欧洲大陆上的文明国家说来，问题已经是要么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统治，要么由二月革命以前的统治阶级来统治。中间的出路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自己没有能力统治；在人民的面前，它之所以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完全是因为它把统治权又拱手让给了贵族和官僚。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连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试图在帝国宪法中实现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平衡，以期延缓决战的日期。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认真对待运动的人并不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认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不认真对待运动。

虽然如此，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它结束了无休止的协商的企图。在这次运动失败以后，取得胜利的只可能要么是以立宪主义稍加粉饰的封建官僚君主制，要么是真正的革命。而革命在德国只有当无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才能结束。

其次，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那些阶级对立表现得还不很尖锐的德意志邦，大大地促进了对立的发展。巴登尤其如此。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登在起义以前几乎没有阶级对立。因此，小资产阶级名正言顺地统辖着所有其他反对派阶级；因此，居民显得万众一心；因此，巴登人，也像维也纳人一样，迅速地从反对变为造反，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起义，甚至不怕和正规军队打野战。但是起义刚刚爆发，阶级就发生明显的分化，小资产阶级从工人、农民中分离出来。以布伦坦诺为代表的小资产者，从此遗臭万年。小资产者被普鲁士军阀的统治逼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厌恶目前的压迫制度而追求任何其他的制度，甚至工人建立的制度也可以；在下一次运动中他们将比在过去历次运动中更积极得多；但是，谢天谢地，他们永远也不能再像布伦坦诺专政时期那样占有独立的和统治的地位。工人和农民在目前军阀统治之下受的苦难和小资产阶级一样深重，上一次起义的经验对他们说来并不是徒然的。此外，他们有责任为死难的兄弟们报仇，他们会设法在下次起义中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让小资产阶级抓去。虽然任何起义的经验也代替不了只有在大工业长期存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的阶级的发展，但是巴登通过自己的最近这次起义以及起义所获得的成果，已经进入了德国的那些在未来的革命中将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省份之列。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在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失败了。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彻底地毁了它。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不称职的、无知

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场革命风暴中，凡是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这唯一头衔的人，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对指挥官是这样，对士兵也应照此办理。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比我们少六倍。

然而，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这幕喜剧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鲁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

弗·恩格斯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泰晤士报》<sup>37</sup>

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上星期五《泰晤士报》登了一封署名为“反社会主义者”的信，信中向英国公众和内务大臣揭露一位卡尔·海因岑先生在《德意志—伦敦报》上所陈述的某些“恶毒学说”，把这位海因岑先生描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的火炬”。这些“恶毒学说”大体上被归结为一个慈善的建议：在下一大陆的革命中，杀掉“几百万个反动分子”。

《泰晤士报》的编辑们把自己报纸的篇幅变成了登载赤裸裸的警察情报及政治性告密的地方。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完全让贵报自己来评价。但是，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欧洲居领导地位的报纸”竟把海因岑先生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的火炬”。“欧洲居领导地位的报纸”无论如何应该知道，海因岑先生不但不是这个党的光辉的火炬，而且正好相反，他从1842年以来一直殚精竭虑地——尽管是徒劳地——反对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一切。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也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对卡尔·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和所写的任何东西负责。



至于上述“恶毒学说”可能造成的危险，那么《泰晤士报》应该已经知道，海因岑先生在德国最近 18 个月的革命动荡时期不仅没有企图实现这些学说，而且在这一时期连脚也没有踏上过德国的土地，没有在任何一次革命中起过什么作用。

如果认为一个连微不足道的德国君主也从来没有冒犯过的人，能给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带来危害，那么，亲爱的先生，在我们看来，抱有这种想法是对英吉利民族的一种侮辱。因此，我们倒想建议《泰晤士报》感谢卡尔·海因岑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济于事的勇敢精神，以此对整个事件告个结束。

编辑先生，请接受最崇高的敬意！

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49 年 11 月 28 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1 月  
28 日

载于 1849 年 12 月 1 日《北极星  
报》第 63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的盈利和发行量的估价单<sup>38</sup>

2 000 册

1 500册每册 12  $\frac{1}{2}$  银格罗申 =

$\frac{5}{12}$  塔勒 = —……

625.00 塔勒

500 册每册 25 银格罗申 =  $\frac{5}{6}$  =

416  $\frac{2}{3}$  塔勒    1041.20 塔勒

减去

印刷费每 3 册 × 70 塔勒 =

210.00 塔勒

500 册运输费和托收费 = 20%

83.10 塔勒

邮资、追加费用等 =

50.00 塔勒    343.10 塔勒

100.00 英镑或 698.10 塔勒

2 500册

2 000册每册  $12 \frac{1}{2}$  银格罗申

.....

833  $\frac{1}{3}$  塔勒

500册每册  $\frac{2}{3}$  塔勒.....

333  $\frac{1}{3}$  塔勒 1 166.20塔勒

减去印刷费每3册 × 85 塔勒

255.00 塔勒

邮资、追加费用

65.00 塔勒 320.00 塔勒

120.00 英镑或 846.20 塔勒

3 000册

2 500册每册  $\frac{5}{12}$ .....

1 041.20塔勒

500册每册  $\frac{2}{3}$ .....

333.10 塔勒 1 375.00塔勒

减去印刷费每3册 × 100 塔勒

300.00 塔勒

邮资、追加费用

80.00 塔勒 380.00 塔勒

150.00 英镑或 995.00 塔勒

300册每册 25 银格罗申.....

250.00 塔勒

运费、附加开支、邮资

25.00 塔勒 225.00 塔勒

50 册每册 25 银格罗申	41.20 塔勒	
运费、附加开支、邮资	<u>5.20 塔勒</u>	36.00 塔勒

100 册每册 25 银格罗申	83.10 塔勒	
运费、附加开支和邮资	<u>23.10 塔勒</u>	<u>60.00 塔勒</u>
	47.00 英镑或	321.00 塔勒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2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出版启事<sup>39</sup>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将于 1850 年 1 月开始出版

主 编

卡尔·马克思

本杂志以《新莱茵报》为名，应视为该报的延续。本杂志的任务之一，就是发表一些探讨过去事件的评论来阐述《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来的一段时期。

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长处。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探讨各种事件，并且只谈最主要的

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

目前这个表面上平静的时期,正应当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党派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党派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本杂志每月一期,每期至少5印张。每季订价25银格罗申,订费在收到第1期时付清。零售每期10银格罗申。本杂志由汉堡舒伯特公司负责发行。

希望《新莱茵报》的朋友们在当地索取订单,并尽快地将订单寄交本人。寄给本杂志的稿件及待评的新书,请自付邮资。

《新莱茵报》出版负责人

康·施拉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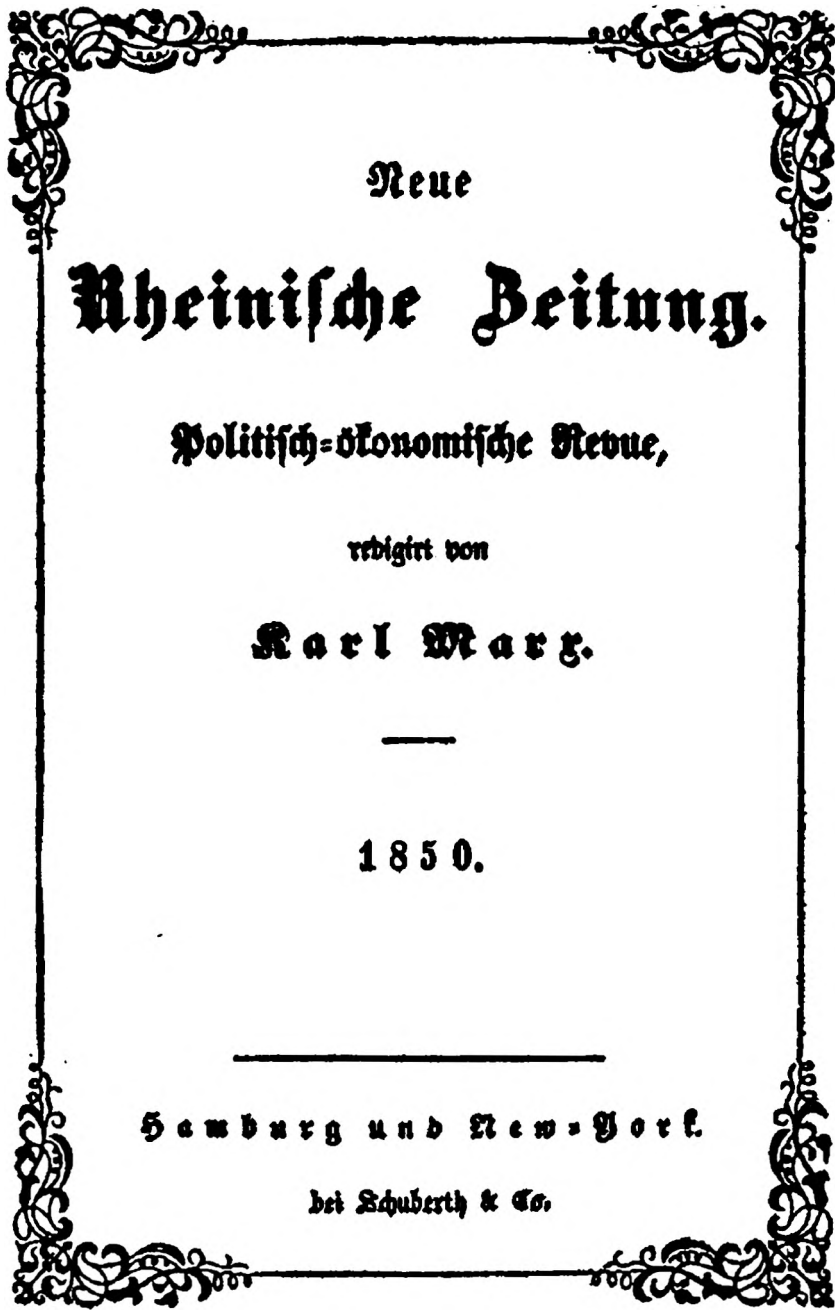
1849年12月15日于伦敦切尔西金斯路安德森街4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49年12月15日

载于1849年12月27日《伯尔尼日报》第36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Neue

#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herausgegeben von

**Karl Marx.**

---

1850.

---

Hamburg und New-York.

bei Schubert & Co.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封面





弗·恩格斯

## 德国来信<sup>40</sup>

[德国的政治形势。——普鲁士和奥地利为最高权力而进行的争吵]

1849年12月18日于科隆

“德国秩序井然。”这就是我们的治理者们当前的主要口号，不管他们是君主、贵族、资产者，还是那个新近成立的、用英语可以叫作秩序迷<sup>41</sup>的党的任何其他派别。“德国秩序井然”；可是，德国从来没有，甚至在以前“神圣罗马帝国”<sup>42</sup>时代也从来没有像目前“秩序”井然时这样混乱。

1848年革命以前，在旧制度下，我们至少知道是谁统治我们。以前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sup>43</sup>，曾经用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用特别法庭，甚至用某些德国人借以自慰的、可笑的宪法限制来使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现在呢！我们自己简直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中央政府。首先我们有帝国摄政王<sup>44</sup>，他是由解散了的国民议会拥立的，尽管没有一点权力，却死抱住自己的职位不放。其次有“过渡政府”<sup>45</sup>，——这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看来是旧议会的复活，

是在普鲁士往日巨大影响下产生的,这个“过渡政府”正在对老摄政王(他多少代表奥地利的利益)施加压力,要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们<sup>46</sup>。在这期间这两者都毫无权力。第三,有国民议会临终前在斯图加特选出的“帝国摄政政府”<sup>10</sup>,以及该议会的残余——“坚定左派”和“极左派”。这两个“左派”同“摄政政府”一道代表德国“温和的和逆来顺受的”民主派和小店主。这个“帝国”政府在瑞士伯尔尼的一家酒馆举行自己的会议<sup>①</sup>,它的权力大概同前两者不相上下。第四,有所谓的三王联盟<sup>47</sup>,或者说是“有限的[Confined](或是改良的[Refined],我也说不准)联邦国家”,成立它的目的是要使普鲁士国王<sup>②</sup>成为凌驾于德国所有小邦之上的皇帝。它所以被称为“三王联盟”,是因为除普鲁士国王外,所有的国王都反对它!而它之所以自称为“有限的<sup>③</sup>联邦国家”,是因为它虽然从今年5月28日起就不时感到分娩时的阵痛,却没有希望能生出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第五,有四个国王,即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国王<sup>④</sup>,他们决心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屈从上述任何一个“无能的中央政府”。最后,有奥地利,它极力要保持它在德国的最高地位,因此支持四个国王摆脱普鲁士控制的努力。目前,真正的政府,即有权的政府,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府。它们靠军事专制统治德国,随意发布和废除法律。在它们的领地和属地之间,有一个似乎是中立地带——上述的四个王国,正是在这个地带,特别是在萨克森,这两个

① 见本卷第259页。——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Confined”既有“有限的”意思,也有“在分娩中的”意思。——编者注

④ 恩斯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威廉一世。——编者注

( 315 )  
**LETTER FROM FRANCE**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great question of the day is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the National Legislative Assembly, its organization, and procedure, in fact, in the most critical situation, that it will not be unable to derive a lesson.

The text on the subject of the day is of very old date. It is the principal featur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and one of the main points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various articles, has made the following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of the various European royal families.

The text on the subject of the day is of very old date. It is the principal featur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and one of the main points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various articles, has made the following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of the various European royal families.

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AL, HISTORY, & LITERATURE

EDITED BY  
**O. JULIAN HARNEY.**



VOL. 2  
 JUNE, 1949—MAY, 1950.

London:  
 J. WATSON, 4, QUEEN'S HEAD PASSAGE, PATERNOSTER ROW.  
 1950.

**LETTER FROM GERMANY.**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Order reigns in Germany." Such is the present great motto of our country. It is the motto which the party of order has taken to itself. It is the motto which the party of order has taken to itself. It is the motto which the party of order has taken to itself.

The text on the subject of the day is of very old date. It is the principal featur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and one of the main points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various articles, has made the following 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of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of the various European royal families.

英国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的扉页, 以及载有弗·恩格斯的《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两篇文章的两页



强国的权利将发生碰撞。但是，它们之间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冲突。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很清楚，要遏制在整个德国、匈牙利和是否属于它们尚有争议的那部分波兰土地上传播的革命精神，它们的力量仍须联合在一起。此外，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敬爱的妹夫”<sup>①</sup>，全体俄罗斯人的信奉正教的沙皇，会进行干预，禁止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理人再互相争吵。

可是，这种在政府、权利、要求和德国联邦法律方面的史无前例的混乱，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德国的共和党人直至今天分为联邦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两派；前者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每一次力图把德国改组成联邦国家所引起的混乱都明显地证明，任何这样的计划都是要失败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和愚蠢的，因为德国的文明已经很发达，除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志共和国**这种形式，它不能以任何其他形式统治。

我本来还想就宣告瓦尔德克和雅科比无罪<sup>48</sup>说几句话，因篇幅有限，只好作罢。不过要指出，至少在几个月内，普鲁士政府完全不可能对政治案件作出有罪的判决，除非在一些偏僻角落，陪审团像阿尔斯特的奥伦治派<sup>49</sup>一样狂热，才有这种可能。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2

月 18 日

载于 1850 年 1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① 指尼古拉一世，他娶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妹妹夏绿蒂公主。——编者注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sup>50</sup>  
[酒 税]

1849年12月20日于巴黎

当前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立法国民议会正在讨论的“饮用酒”税<sup>51</sup>。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并且实际上充分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因此，这封信专门对此加以议论是很相宜的。

饮用酒税的历史说来话长。它是18世纪君主制度财政体制主要的特点之一，也是第一次革命时期人民不满的主要问题之一。它被那次革命废除。但是，大约1808年，拿破仑稍加改变又恢复了它，当时他忘记自己是靠革命起的家，而把在欧洲古老的王室圈子里建立自己的王朝当作主要目的。这项赋税被人民痛恨到如此程度，以致在拿破仑垮台时，波旁王朝答应立即加以废除。拿破仑本人在圣赫勒拿岛上说过，是这项赋税而不是别的什么造成了他的倒台，它使得法国的整个南部都起来反对他。不过，波旁王朝根本就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于是这项赋税也就一直保留到1830年革命，这时又有人向全国提出要废除它。这次诺言和上次一样没有履行，因此，这项

赋税到 1848 年革命爆发时还存在着。临时政府没有立即废除它并代之以对大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课高额所得税,而只是许诺如果不废除它至少也要加以修订;制宪议会则更不像话,甚至要将这项赋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是在它存在的最后几天,保皇主义空前猖獗,议会的“正直的”和“温和的”议员们才投票赞成从 1850 年 1 月 1 日起废除饮用酒税。

十分清楚,这项赋税实质上属于法国的君主制传统。当人民群众占上风时,这项赋税便废除;一旦权柄落入以路易十八或路易-菲力浦之流为代表的贵族或资产阶级手中,这项赋税便恢复。甚至拿破仑,——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都反对他,并且被他们的合伙阴谋所推翻——甚至这位大皇帝也认为,自己必须恢复君主制法国的古老传统的这一特点。

全国不同阶级分担的这项赋税是极不均衡的。对于穷人这是难以忍受的负担,对于富人,压力却微乎其微。法国大约有 1 200 万酿酒者;他们消费的酒不纳税,因为酒是自己酿造的;其次,1 800 万人住在农村和人口不到 4 000 的城镇中,他们每 100 公升酒要纳 66 生丁到 1 法郎 32 生丁的税;最后,约 500 万人住在人口超过 4 000 的城镇中,他们要为他们的酒交纳入市税<sup>52</sup>;这种赋税在城门口征收,而且各个地区都不一样,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比前一类人纳的税高得多。其次,最低档的酒和较昂贵的酒税额都一样;每百公升卖 2、3、4 法郎的酒和每百公升值 12—1 500 法郎的酒交同样多的税金;可见,喝高级香槟酒、克拉列特酒和勃艮第酒的富人几乎不纳什么税,而喝劣等酒的工人却要向政府交纳相当于这类酒原价的 50%、100%,有时甚至 500% 或 1 000% 的税金。在征收的这种税金中,有 5 100 万法郎由较贫穷的阶级交纳,只有 2 500 万法郎由较富有的公

民交纳。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这项赋税使法国酒类生产遭到莫大的损害。这种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城镇,对于一个酿酒者来说,成了真正的异国他乡,他在出售自己的产品之前,就得交纳规定的关税,税金相当于酒的原价的50%—1000%。在另一部分市场——农村地区,税金至少是原价的20%—50%。这种状况的必然的后果是国家各酿酒地区的破产。诚然,尽管存在着这项赋税,酒的生产还是在不断增长,但人口的增加以快得多的速度超过了这种增长。

为什么在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下竟会把这项令人憎恶的赋税保留下来呢?你会说,在英国,即使科布顿和布莱特也早就会把它取消的。他们确实会这样做。但是在法国,企业主们既找不到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利益的科布顿和布莱特,也找不到一个对他们的要求作出让步的皮尔。法国财政制度,尽管被议会中的多数大加吹嘘,却是所能想象的最混乱的、臆造出来的大杂烩。英国在1842年后实行的各项改革,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没有一项是打算实行的。在圣洁的基佐时代,邮资改革几乎被看成是亵渎神灵。无论是当时或现在,这种税则都既不属自由贸易制性质,也不属单纯财政性质,既不属保护关税性质,也不属禁止性关税性质,而是包含了除自由贸易制以外所有其他税则的某些特征。旧的禁止性措施和高额关税,多年来毫无成效,而且显然对贸易是有害的,却贯穿于这种税则的所有部分。但是谁也不敢触动它们。在所有人口超过一千的城镇中地方税是间接的,从运入城市的产品中征收。这样,甚至在国内,贸易的自由每经过10或15英里都要遇到一种内地税关的阻碍。

这种即使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来说都是一种耻辱的状况,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依然如故。尽管各种沉重的税收聚敛了14—15亿法郎,可是一到年底总是出现赤字,并且每隔四五年就要发行一次公



债。国库的这种不良状况成了巴黎交易所股票投机商牟取暴利、尔虞我诈和投机倒把的无穷尽的来源，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伙构成两院的大多数，因而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总是要求新资金的流入。而且，如果不采取广泛措施，使预算达到平衡，使赋税的分担得到改变，并通过向股票投机商本人征税，使资产阶级的其他集团在政治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财政改革就不可能实现。而在路易-菲力浦腐败透顶的政府当政的情况下这些改革的后果如何，谁都可以根据那个引起二月革命<sup>4</sup>的、比较微不足道的理由作出判断。

这次革命没有导致任何一位能对法国财政制度进行改革的人上台。占据了这个部的《国民报》派的先生们<sup>53</sup>感到自己被庞大的赤字捆住了手脚。他们为逐步实行改革作了许多尝试；除了废除盐税和邮资改革外，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什么成果。最后，制宪议会在绝望之余表决通过了废除葡萄酒税的决议，可是现在“正直的”和“温和的”秩序党人<sup>54</sup>在当前这个珍贵的议会上却要恢复葡萄酒税！而且这位部长<sup>①</sup>还打算恢复盐税并再次增加邮资；这样，在法国不久就会恢复陈腐的财政制度及其永恒的赤字和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巴黎交易所的无限权力及其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和追逐暴利的行径。

不过，对于这项措施——恢复对穷人主要必需品而言是沉重的而又几乎不触及富人的赋税，人民未必会心甘情愿。在法国农业地区，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已经得到惊人的广泛传播，而这项措施将使剩下的几百万在12个月前还投票拥护路易-拿破仑这个徒务虚名的偶像的人<sup>55</sup>转到社会民主派这方面来。社会民主派一旦把农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星期，红旗将会在土伊

① 财政部长阿·富尔德。——编者注

勒里宫和爱丽舍宫<sup>56</sup>的上空飘扬。只有在那时,才能一举结束国家债务,实行直接的累进税制,并采取其他同样坚决的措施,从而彻底粉碎陈腐的专制的财政制度。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12 月  
20 日

载于 1850 年 1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sup>57</sup>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底—  
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  
—11月1日

载于1850年1、2、3和5—10月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1、2、3和5—6期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  
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1960年德文版第7卷翻译



---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sup>4</sup>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证明这一点就是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

## 1848年的六月失败<sup>5</sup>

七月革命<sup>58</sup>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sup>①</sup>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sup>②</sup>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本身越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sup>59</sup>被血腥镇压以后，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鲁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

① “教父”的原文是“compère”，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

② 1789—1794年法国革命以来革命政府所在地，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临时政府的所在地。——编者注

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喉舌，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狗——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官方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发言人，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专门人才”。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造成日益加剧的财政困难。没有达到预算平衡，没有达到国家收支平衡，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开支，即不损害那些恰好构成现存统治制度的全部支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调整捐税的分担，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达到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是了解交易所活动的秘密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机密，有可能制造公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

许多较小的资本家破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赤字符合掌握统治权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5 000万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样骗人的供货合同、贿赂、贪污以及舞弊勾当有机可乘。在发行公债时大批地骗取国家财物,而在承包国家工程时则零星地骗取。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正如统治阶级在整个国家支出和公债方面进行掠夺一样,它在**铁路建筑**方面也进行掠夺。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份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份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相反,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施加影响而遭到失败。**邮政改革**就是一例。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能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 *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 ——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



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院、贫民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景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掌握统治权的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诸如《路特希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做任何事情!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犹太人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sup>60</sup>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sup>61</sup>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sup>62</sup>方面的时候,法国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虚张声势的战争中的胜利增强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sup>63</sup>则像电击一样

激活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sup>①</sup>。

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更使得到处民怨沸腾。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sup>64</sup>,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失败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sup>4</sup>就爆发了。

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一个特别的后果:一批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

---

<sup>①</sup>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科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巴勒莫的起义,是在1848年1月12日;1月底,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九天的炮击。”——编者注

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他们开设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他们也因此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被解除了武装,七月王朝<sup>65</sup>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sup>53</sup>,代表王朝反对派<sup>66</sup>的是克雷米约、杜邦-德勒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不过,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诞生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由陶醉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国人的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他们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国民报》派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像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准备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强迫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回来。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两小时的期限未滿,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夺目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 随着立宪君主制被推翻,国家政权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这种虚假的政权挑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其实,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大多数的大

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sup>67</sup>从七月王朝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怪乎《法兰西日报》同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过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过赞同革命。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对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最后,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什迫使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几天以后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像心目中已经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向市政厅进发,大声高呼:**组织劳动! 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勉强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

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在寻找点金石,市政厅里却在铸造着通用的钱币。

可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那也只能在卢森堡宫的朦胧状态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像他们在临时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一样。**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部,只能是一个徒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宫委员会。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

一旦有某个阶级奋起反抗,社会的革命利益就汇集在它那里,这时,它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己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法国工人阶级并没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

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工业更发达,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革命。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一等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之中。所以,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sup>68</sup>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

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惨重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宫委员会总还算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的一个讲坛上泄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在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的假寐中惊醒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集团伪善的词句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造成各阶级的分裂，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

从临时政府这方面来说，它既然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那就要尽力使这个共和国能为资产阶级和外省所接受。它以废除政治犯死刑来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发表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掌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



衣裳,借以取乐。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建立丰功伟绩的途径不在于去恐吓别人,而在于经常出头露面,在于依靠自己的柔顺和不对抗的生存方式来谋求生存并消除对抗。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专制国家大声宣告,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座右铭。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处的情势起来反抗了。俄国和英国都感到措手不及,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于是,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把共和国看作是自己创造的,自然赞同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措施。它心甘情愿地接受科西迪耶尔的委派,去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的财产,就像它让路易·勃朗去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一样。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最能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解决这一任务的。

**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社会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犹太人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反对的首先是金融贵族。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可见,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经瘫痪,流通已经不畅,

生产已经停滞。革命危机加剧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没有受到侵犯并且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即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宫的斯芬克斯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又该产生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信用,因为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及其制度。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必须保证这个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再度上升。

为了使人不致怀疑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偿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虚张声势的手段。法定偿付期限未到,它就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五分、四分五和四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骄矜自负的态度就立刻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财政拮据,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费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有所减轻。财政拮据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者、仆役和工人就不得不掏出钱来,为政府赠给国家债权人的这份使他们喜出望外的礼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100法郎以上的储蓄银行存折今后不得提取现款。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被没收了,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公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这时所持有的已经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公债券,于是他

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从而直接听任交易所犹太人的宰割，而他们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人才进行二月革命的。

**银行**是七月王朝时期掌握统治权的金融贵族的高教会<sup>69</sup>。正像交易所操纵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银行的生存；银行一开始就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以图使共和国丧失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然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下室里的钱提出来。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赶到银行出纳处去挤兑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可以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破产**，它只要冷眼旁观，让银行听天由命就行了。**银行破产**就会像洪水泛滥一样，转瞬间把金融贵族，这个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银行一旦破产，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自身就只得把这看作是摆脱绝境的最后的拼死一搏。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使法兰西银行网络遍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订约借款，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恳求大家为爱国主义作出牺牲，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工人才给它一点施舍。于是它只得采取英勇手段——开征**新税**。然而向谁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

税吗？这不是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同情的办法。这样做一方面会危害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会力图用很大的牺牲和屈辱去换取这种信用。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谁来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牺牲呢？是笨伯雅克<sup>①</sup>，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sup>70</sup>。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非法攫取的10亿巨款<sup>71</sup>占有者的身上。而实际上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在他们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用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离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描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犹太人、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sup>72</sup>。

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归附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

<sup>①</sup> 笨伯雅克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编者注

身分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多年的革命旧账,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催逼的债务人。它只得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的许诺,都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的解放——即令只是空话——也已成了新共和国不堪忍受的危险,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意味着不断反对恢复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把工人清除出去。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逐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觉得自己还不能对付无产阶级。而且,国民自卫军尽管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和千方百计的阻挠,也不得不逐渐地、零星地让武装的无产者进入自己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组织了 24 营别动队<sup>73</sup>,每营 1 000 人,由 15 岁到 20 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sup>74</sup>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那种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给他们 1 法郎 50 生丁,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

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表上不同于穿工作服的工人。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弟,这些人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迷住了他们。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他们自己当中招募的年轻力壮、蛮干的24 000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向列队通过巴黎街头的别动队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队。马利部长把10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场<sup>75</sup>。在这个响亮的名称之下不过是以23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从事枯燥、单调和非生产性的掘土工作罢了。国家工场只不过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sup>76</sup>。临时政府以为这样就组建了第二支反对工人本身的无产者大军。这一次资产阶级把国家工场看错了,正如工人把别动队看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不过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

国家工场——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场同卢森堡宫的设想完全相反,但因为牌号相同,就往往给人提供机会,去别有用心地制造误会,就像描写仆人的西班牙喜剧所制造的那种误会一样<sup>77</sup>。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场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因为国家工场的预言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了。在巴黎资产阶级半天真半故意地混淆这两种东西的过程中,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操纵的舆论中,这些习艺所竟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于

是，社会主义就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在这些国家工场上。同时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场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把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场当作发泄自己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计算着这班无产阶级懒汉耗费的钱财，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变得一天比一天艰难。装装样子的工作竟可以获得国家年金，这就叫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嘟囔着。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场，就在于卢森堡宫的浮夸之词，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阴谋诡计的，莫过于这些濒临破产而又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又在整个大陆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时而从意大利，时而从德国，时而从最遥远的欧洲东南部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不断地给人民带来胜利的证据，使人民普遍地沉浸在欣喜的情绪之中，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这种胜利。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让临时政府回到革命轨道上来，在必要时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清除出去，并且迫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sup>78</sup>。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

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在“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呐喊声中涌向市政厅。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 临时政府万岁!”不得不抗击资产阶级,以维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屈服于自己,反而加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许多工人聚集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上,以便筹备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事宜。突然有一个谣言迅速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工人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下武装集合,打算从那里向市政厅进发,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全体紧急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竞相表白,说首先发出警报的殊荣归于自己,——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10万人荷枪待发,市政厅的所有入口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打倒共产主义者! 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的口号响彻巴黎全城,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所有的人都准备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惊悉,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在周密筹划的虚假战斗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怕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这出拙劣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sup>79</sup>开会了。普选权并不具



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就是他们那种人民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小资产者在选举中为什么必定由好斗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统辖。然而,普选权虽不是共和主义庸人所想象的那种法力无边的魔杖,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功绩;它发动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的幻想和失望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限制选举资格的君主制度则只是让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集团丧失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得以隐藏在幕后并且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sup>53</sup>。正统派<sup>67</sup>和奥尔良派<sup>80</sup>本身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只有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象。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在政治上对它实行的改造,是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重新加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不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的整个存在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整个法国在国民议会里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立即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sup>81</sup>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恢复原状**。”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在斗争中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就注定要失败。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作出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王权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出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出生地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加速了决战的到来：它在5月15日涌入了国民议会，徒然地试图恢复自己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有能力的领袖落

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sup>82</sup>。 *Il faut en finir!* 这种局面必须结束! 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决心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直接向工人发出挑衅,辱骂和嘲弄工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攻击对象,还是**国家工场**。制宪议会命令执行委员会对付这些国家工场,而执行委员会本来就只等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既定的计划。

执行委员会开始阻挠工人进入国家工场,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工人赶到索洛涅,说是让他们去做掘土工作。而所谓掘土工作,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来掩饰驱逐工人这一行动的花言巧语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把一切未婚工人强制逐出国家工场,或者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

大家知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坚持了5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 000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了几星期,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简直被那冲散他们共和国幻觉的硝烟熏得头昏眼花。

请读者允许我们用《新莱茵报》中的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的消息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正式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照明弹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烧弹。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博爱，在2月间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

学究们，他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怜，并且被允许进行长时间地说教和同样长时间地丢丑，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实行整套旧的、不过没有戴王冠的首领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是一场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

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呐喊。**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蒂亚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①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

---

① 见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编者注

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眼前总是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决不妥协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崛起一样,现在则认为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人民,那么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阻碍了它巩固自己的统治,阻碍了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这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权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而定,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

能够实现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sup>68</sup>**!

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 二

##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强迫法国实行共和制,6月25日把革命强加给法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六月斗争<sup>5</sup>是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领导的,斗争胜利了,政权当然归他们。戒严使手足被缚的巴黎毫无抵抗地倒在他们脚下,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精神上的戒严气氛,胜利了的资产者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农民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财产的狂热情绪。因此,在下层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派亦即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那种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sup>81</sup>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sup>83</sup>,在新闻出版界是《改革报》。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在4月16日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一派赖以成为一股力量的背景,因为小资产阶级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



结成的虚假同盟。民主主义共和派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抛弃，他们堕落成了三色旗派的仆从，他们不可能迫使后者作出任何让步，但是每当后者的统治以及整个共和国看来受到反对共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开始就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自己只有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法国一度把卡芬雅克当成自己的救星来欢迎，而当反共和派在六月事变后不久重新取得独立地位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只容许这一派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派以他们的著作家、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专门人才、他们的野心家、他们的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的一家报纸即《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有自己的分社。《国民报》派<sup>53</sup>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官职——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同时，他又以司礼官的身分在自己的沙龙中接待正直的共和国的宾客。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著作家，也由于对共和主义传统怀着某种敬畏而抱着错误见解，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议会外的影响越是丧失殆尽，制宪议会就越是坚决地摆出这副面孔。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

集团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前台表演大型政治历史剧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作罪犯来审判，而是当作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六月事件和五月十五日事件<sup>82</sup>，并调查社会主义各派和民主主义各派的领袖们参加这些事件的情况。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派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复仇了。这个人是在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自由主义的化身，妄自尊大的小人，浅薄无能的庸才，他不仅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要同那些使他丢掉内阁首相职位的革命家算账。这保证他决不会手软。于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十足的案件，这个案件可以概括如下：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杀**，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深奥的刑事调查工作引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作了回答<sup>①</sup>：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就是**创建罗马**。国

① 指该报1848年8月28日的社论。——编者注

家的起源湮没在神话之中，而对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清洗自身的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法律被废除；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大部分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为什么不干脆连他们的选举权也剥夺掉呢？重新施行了报纸交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他们急忙给旧日的资产阶级关系恢复旧日的保障，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种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者——开咖啡店的、开餐馆的、开酒店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主们奋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而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溃，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奔回自己店里的时候，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这位代理人拿着威胁性的通知单迎接他们：票据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正是为了对付他们，人们才需要去拯救这种财产，这样做为的是那些将房屋租给他们住的房东，为的是那些给

他们票据贴现的银行家,为的是那些贷给他们现金的资本家,为的是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出卖的工厂主,为的是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恢复信用!**但是,重新变得稳定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干练的神,它把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子儿女一起逐出了住所,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抛进了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威风凛凛地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击溃了工人,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了债权人的掌握之中。他们从2月起就像慢性病一样拖延下来的、似乎没有人去注意的破产,在6月以后被正式宣告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为**维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现在,既然已经和无产阶级算清大账,也就可以和小店主来算小账了。在巴黎,过期的票据总值在2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100万法郎以上。巴黎有7000多家商店老板,自2月以来就没有交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2月以来的**政治罪责**,那么小资产者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聚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威胁地提出要求:任何商人,凡是能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到2月24日以前生意仍然不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并强制债权人在取得适当利息的条件下撤诉。这个问题曾以“友好协议”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在圣但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者面对着复活的六月幽灵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又板起了面孔。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concordats à l' amiable* ——友好协

议——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可见,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派代表早已把小资产者的民主派代表压了下去,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现实的经济意义,因为小资产者作为债务人被交给资产者这个债权人去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只许在完全成为资本奴隶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友好协议,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期间,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囚禁在万塞讷监狱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汇兑业者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大批破产造成的后果势必远远超出直接受害者的范围而持续发生作用,因而势必再次破坏资产阶级的交易,同时因六月起义造成的耗费加大了国家的赤字,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因生产停滞、消费紧缩和输入减少而持续下降。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别无他法,只好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得到的六月胜利果实是破产和清账,而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sup>73</sup>得到的酬劳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社会的这些“年轻的救主们”在马拉斯特——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骑士——的沙龙里备受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的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通过自己的报纸《国民报》用以争取一部分军队和农民阶级的一切民族幻想,却已经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充当调停者,以便伙同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

利,仅仅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18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期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必须被消灭”<sup>①</sup>这句话过日子的;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sup>62</sup>,而《国民报》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sup>64</sup>的。历史的讽刺竟使《国民报》的前外事编辑巴斯蒂德当上了法国外交部长,让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阶级曾一度相信,有了军事专政,同时就会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靠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现在需要的士兵只是宪兵。卡芬雅克在恪守古老共和主义的忍让精神的严肃面具下,隐藏着他鄙俗地服从于为了资产阶级的官位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的真相! *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 金钱无主人! 卡芬雅克也像制宪议会那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造出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sup>65</sup>,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这部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宪法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它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的事实,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

① 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编者注

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把固定不变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可变更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从而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于是，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日和6月25日的惊吓后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非常权力，提高成了根本法。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在术语上做文章。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原任《国民报》总编辑、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不无才华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像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喷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他还准备通过土地丈量来更精确地划定地产的边界。当制宪议会在理论上雕琢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来维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宣布延长戒严期。从前，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过程达到一个停顿点，新形成的阶级关系已经固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各派彼此已经求得一种妥协，使它们相互间可以继续进行斗争而同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之外，这时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相反，这次的宪法却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劳动权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劳动权换成了 *droit à l'assistance* ——享受社会救济权，而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养活着自己的穷人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

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 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准绳——中删去，把“劳动权”斥为异端。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累进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各中等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的手段。

在友好协议问题上，三色旗共和派<sup>53</sup>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税，就把这件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良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那么，还有哪个阶级留下来作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的共和派来重新巩固经济生活中的旧关系，那么，在另一方面，他们则打算利用重新巩固起来的旧社会关系来恢复那些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早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经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安做共和国的部长，而不顾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拚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也没有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却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最狂热地拥护旧国家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它把临时政府企图否定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于是，它所罢黜的一个国王，就在这种合法的终身任职的异端裁判官身上大量地复活起来。

法国报刊多方面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一国二主——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等等。



但是,这部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通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被它认可享受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大理会这些矛盾。既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只有在充当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急先锋时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从一个政党降为一个派别了。宪法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大阴谋。他们认为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别的统治,总统应该由卡芬雅克继续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延续。他们希望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降低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同时又充分玩弄这种权力,借以威胁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让他们时时面对六月事变时期的那种两难选择: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在10月23日结束了。9月2日,制宪议会就已经决定,在颁布补充宪法的根本性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特有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侏儒一定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就不再由国民选举,而由制宪议会选举。

真是枉费心机!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的底层放着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

“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 100 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 600 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 5 倍<sup>86</sup>。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的二月。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是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诈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的象征，是经过权衡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诞绝顶的时代错乱，是世界历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的野蛮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 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对外宣布战争，对内宣布谋取自己的阶级利益。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乐曲走向投票站，高呼：“Plus d'impôts, à bas les riches, à bas la république, vive l'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富人共和国。

12月10日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自从他们取消法国的一个政府而给了它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巴黎。他们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活跃的主角，别人就再也无法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唯命是从的角色中去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推翻制宪议会，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宣布六月胜利无效。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拿破

仑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跟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公开决裂，因为这个集团想把暂时性的地位作为宪法认可的地位固定下来，他们已经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派羞答答地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sup>87</sup>。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sup>88</sup>。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致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反对卡芬雅克，并且是为了用集中选票的办法剥夺制宪议会的最后决定权。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词，前者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词。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代言人大声宣称投拉斯拜尔的票，完全是一种示威；这既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抗议，同时又是对赖德律-洛兰投的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而脱离了民主派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派，即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山岳党

在提名赖德律-洛兰为候选人时倒是一本正经的,这是它在愚弄自己时的一种庄严的习惯。而且,这也是它想作为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独立派别出现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仅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派别,而且还有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的毫无生气的讽刺画罢了。正如使用1793年词句摆出蛊惑家姿态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戴着皇冠打着鹰旗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于是,历来对1793年的迷信和历来对拿破仑的迷信同时都告结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显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现代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主角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可以说,12月10日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不体面的逗趣可笑地打破了对旧革命作的经典式模拟。

12月20日,卡芬雅克卸职,制宪议会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如果撤销自己不经法庭审讯而判处15000个起义者流放的6月27日的法令,岂不就是否定六月屠杀本身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大臣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任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于12月10日,而是始于1804年的参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内阁不是始于12月20日,而是始于2月24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旧内阁以

缓和政府的更迭,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来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没来得及被用坏。

他的这个选择是资产阶级保皇集团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昔日王朝反对派<sup>66</sup>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sup>53</sup>的过渡阶梯,现在由他完全有意识地来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阶梯,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奥迪隆·巴罗是那个总是徒然争夺内阁位置而还没有精疲力尽的唯一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否认自己旧日的言论,并且最终成为一堆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被人民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持重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瞥,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和人的自负。在他前面镜子里照出的是基佐,就是那个一向令他羡慕并经常把他当作小学生看待的基佐;镜子里的形象简直就是基佐本人,然而这个基佐长着奥迪隆的前额,即奥林波斯山上的神的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迈达斯的耳朵。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显露出来。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会士的法卢又作为文化部部长跟他这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sup>89</sup>沉湎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务部就交给了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法、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都齐全了,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充当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

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官职，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厅——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君主制走卒的手中。正统派尚加尔涅一人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这种官员的任免，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派的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各种角色的位置、戏剧题材、冲突内容和整个格局——全都变样了。只有老掉了牙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地没有动。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共和国建成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大地已经创造出来，它的造物主除了逃到天上去，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效法造物主，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它即使已经被夺去了行政权的一切杠杆，它手中不是还握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主权岗位，并从这里出发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国民报》派内阁取代了巴罗内阁，保皇派的人物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制宪议会提供了一个它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再合适不过的攻击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着取消捐税！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只坐了六天，到第七天，即在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税和葡萄酒税一起享有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在农民的眼中更是如此。

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巴罗内阁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他的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失去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的盐,变得淡而无味了——农民起义所拥戴的拿破仑就像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派资产阶级阴谋的非常陌生的人物。而巴罗内阁把这种不明智的令人失望的蛮横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

制宪议会方面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推翻内阁,又能够扮成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 $\frac{1}{3}$ ,从而使56000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静待内阁辞职。它对自己周围的新世界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实在是太不理解了。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600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又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竟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那个贯穿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寿命的长期决斗从此开始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巨大事件,同时也正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表现:矛盾一方是享有主权、不许解散、通过实行普选权而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是总统,按照条文,总统应当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际上,总统不仅同样通过实行普选权而获得批准,并把分配在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从而百倍分散的全部选票集

中于一身,而且,总统还掌握着全部行政权,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悬浮在行政权之上。对于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议会讲坛上、报刊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的对立并不是宪制权力中一方同另一方的对立,不是行政权同立法权的对立,而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同建立共和国的那些工具的对立,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和意识形态上的要求的对立,这个集团建立了共和国,而现在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像一个复辟的君主国,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以及它的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强行保持下去,不让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完备的和典型的形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代表着回归到它中间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着尚未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的当选,只有当选举给一个名字加上它的各种不同的意义的时候,只有当这种选举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12月10日废除了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这样,在1月29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着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方是不大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成立共和国,才能用巷战和恐怖统治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特征;另一方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派大众,——唯有他们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才能剥去宪法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个1月份当中蓄积起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辞职。但巴罗内阁作为回敬,却建议制宪议会对自己投下最终的不信任票,判处自己自杀,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交给制宪议会,交给这个早在8月间就已经决定在它颁布一系列补充宪法的根本性法律以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内阁中的富尔德率直地向制宪议会说,“**为恢复遭到破坏的信用**”,制宪议会必须解散。的确,制宪议会延长临时状态,而且使波拿巴跟着巴罗、已经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波拿巴都重新受到威胁,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巴罗这位奥林波斯山上的神变成了疯狂的罗兰,因为共和派让他等了整整一个“Dezennium”即十个月之久才终于弄到手的内阁总理位置眼看又要被夺去,而他连两个星期的福也没有享到。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他所说的最温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议会这时确实也只代表着过去。巴罗又以讽刺的口吻补充说:“它没有能力在共和国周围确立那些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构。”确实如此!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同它的资产阶级毅力同时受挫,它对保皇派的敌视态度同它的共和主义狂热一起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机构来巩固它再也无法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在指使拉托提出建议的同时,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地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一束一束情书,其中都或多或少坚决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让人们要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波拿巴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主张或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式复活了。请愿是对十二月十日事件的事后注释。这种鼓动在整个1月份一直持续

不断。

制宪议会在同总统的冲突中,不能再说自己是普遍选举的产物,因为别人正是用普选权来反对它。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就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尝试过的那样用不信任票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sup>73</sup>以及革命无产阶级的各个中心——**俱乐部**。别动队,这些六月事变的英雄们,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正如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场**<sup>75</sup>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在必须彻底取消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残暴地攻击国家工场一样,波拿巴的内阁在必须彻底取消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向别动队猛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遣散并被抛到街头,另一半则从民主制的组织被改成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境地,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又怎样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对总统的不信任,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对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对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聚集起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制宪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并用强制性手段使它回复到原来状态、想要把它改造为维护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各派。已经发生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革命运动的结晶又重新融解了;这些派别为之斗争的共和国又成了性质模糊的二月共

和国,而对于二月共和国的性质,他们本来就各持己见。转瞬之间,各派又采取了它们在2月时期的旧立场,不过没有抱着2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又来依靠《改革报》的民主主义共和派,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派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派(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和解和联合),并在俱乐部里奠定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有理由把《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看作复活的六月起义者。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福适部长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取缔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紧急事项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这项紧急提案,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把内阁交付审判这一点不是冒失地暴露出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软弱无能,就是说明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抗议是软弱无能的;在这种时候竟要求把内阁交付审判——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危机的每个紧要关头打出的那张大点数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也针对这个议会,准备在道义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重演一遍,想强迫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就是这个议会曾经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被告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开始扮演保皇派的布朗基角色反对制宪议会,而制宪议会已开始俱乐部里,从革命无产者方面,从布朗基派方面找寻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提出来交给《国民报》派所发明的最高法院,以此来刁难制宪

议会。令人惊奇的是，怕失去内阁总理位置的焦虑竟从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媲美的机智！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杀人犯的问题上，又回复到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对付总统和部长们时不得不诉诸**起义**，那么总统和内阁在对付制宪议会时就不得不诉诸**政变**，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去解散制宪议会。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取消自己的共和主义的合法名义。于是他只好拿出君主主义的合法名义，而君主主义的合法名义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合法名义，但这两种名义同正统的合法名义比起来是不值一提的。合法共和国的颠覆，只能使与它势不两立的一方即正统君主国重新抬头，因为这时奥尔良派只是2月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只是自己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君主国的名义。正统派知道时机对他们有利，就公然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有可能指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曾公开宣告**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把一次起义顺利镇压下去，内阁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合法性会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如果发生一次起义，人们就可以借口维护社会安宁来解散制宪议会，就可以为了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的粗暴态度，建议解散俱乐部，大张旗鼓地撤销50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派，解散别动队<sup>73</sup>，尚加尔涅虐待别动队长官，恢复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混不下去的勒米尼耶教授的讲席，容忍正统派的狂妄行为——这一

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是起义毫无动静。起义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终于到了1月29日,这一天要对马蒂厄·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进行表决。正统派<sup>67</sup>、奥尔良派<sup>80</sup>、波拿巴派、别动队、山岳党、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秘密活动,既起劲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起劲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协和广场检阅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排场很大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这个交织着各种希望、疑惧、期待、愤慨、紧张和阴谋的中心——猛如雄狮的制宪议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时代精神的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好像是一个不只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觉得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的战士。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它自己已处于戒严之下,它就以巴黎戒严作为必要界限来限制自己的立宪活动。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它也只配采取这种报复办法。山岳党暴露出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理解力,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充当这出阴谋大喜剧中参与争吵的叫喊者。《国民报》派最后一次尝试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一月危机关系到制宪议会的存亡,而三月二十一日危机则关系到宪法的存亡;前一件事涉及《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件事涉及这一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宁愿放弃他们超然脱俗的意识形态,也不肯放弃在尘世间执掌政府权力的乐趣。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适提出的反对结社

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八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取缔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且制宪议会还得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自己就曾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者。而俱乐部不就是要让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不就是要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去对抗资产者的国家吗？俱乐部不就是十足的无产阶级制宪议会和十足的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相协调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而表述得有点笼统，那么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存在难道不正是为了在各个具体场合对宪法进行解释和运用吗？既然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经因为戒严而被取缔，那么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难道就不能用法律来取缔吗？三色旗共和派只能用宪法中的堂皇辞令来反对这样不加修饰地解释宪法。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帕涅尔、杜克莱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长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取缔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专用的办公大厅里去“开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经不再具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票数。这时克雷米约先生在办公大厅里及时提醒，说这里有一条路直通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再度受骗的山岳党也尾随其后。山岳党一直苦于革命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同样，它也一直在寻求合乎宪法的途径；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

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唯一恰当地体现宪法条文的精神。

剩下的只有一点需要调整一下,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的制宪议会里气氛异常激奋。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辱和在军事上丢丑,法兰西共和国暗杀罗马共和国<sup>11</sup>,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大点数王牌,赖德律-洛兰免不了在议长桌上放上一份控告内阁——而且这一次还控告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舰队到奇维塔韦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送到法国。教皇的任务是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利用教皇来拉拢神父,利用神父来拉拢农民,再利用农民来谋取总统职位。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目的说来是为选举做广告,同时也是对罗马革命进行抗议和威胁。这次远征包含着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进行的干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在内阁,这就意味着教皇在罗马,并且是在教皇的罗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稳住教皇,以便稳住总统的农民。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上了总统。如果他们不再有信仰,就会不再轻信,而他们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会怎么样呢!要恢复国王,必须先恢复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

保皇思想，——如果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没有宗教，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对获得天国财富具有抵押权，这就保证资产者对获得农民土地具有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统治。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经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询，内阁予以否认，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项议程。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始终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不过，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的本分，那么假装相信这种谎言，并以此挽回共和国的体面，就是国民议会的本分。

这时，皮埃蒙特被攻破，查理-阿尔伯特退位，奥地利军队直叩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以激烈的语气提出质询。但是内阁已经证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一个适当的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不是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一并陷落，就是法国必须向奥地利，从而也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委员会<sup>90</sup>了吗？或是把自己当



作国民公会<sup>91</sup>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法国军队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 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前往奇维塔韦基亚；4月16日，国民议会同意给内阁拨款120万法郎，作为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地中海三个月的经费。这样，国民议会就给了内阁干涉罗马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干涉奥地利。它对内阁不是观其行，而只是听其言。这么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没有遇见过。制宪议会已经落到了无权过问已经建成的共和国所作所为的境地了。

终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幕上演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意大利远征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大加赞扬。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内阁的控拆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揭穿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在这里扮演富基埃-坦维尔的角色，但这岂不是在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露出了天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吗！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首脑；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就是实现宪法；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正在奋斗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两天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而给自己一点补偿，此后它便退出了舞台。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引起曾

利用它作工具的资产阶级的反感而被粗暴地、轻蔑地扔在一边，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建树而将来又毫无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么，它就只能通过经常重提6月的胜利、重温6月的胜利，通过再三判处已被判处的人们以证实自己的存在，来镀饰自己的尸体。这些专靠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为生的吸血鬼！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赤字，并且因镇压六月起义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奴制而给予种植场主的补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葡萄酒税的取消而使赤字增大了；制宪议会在临终时才决定取消葡萄酒税，它活像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庆幸给自己欣喜的继承者加上一笔令人身败名裂的信誉债。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鼓动。有两大集团相对垒：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派<sup>53</sup>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12月10日以后，当它可以把《国民报》派、即把资产阶级共和派从自己队伍中排挤出去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产，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sup>65</sup>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奥尔良则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只有在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么，它除了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

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并不代表他们阶级中拥有经济基础的庞大集团。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两个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集团相反,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把它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是把它当作自己小集团的统治来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的顶峰站着联合的保皇派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派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集团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么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必然互相中和。秩序党<sup>54</sup>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向作为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靠拢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只得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派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在怒气冲冲、切齿咒骂中保存了共和国形式,最后则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享有统治本身使这两个集团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复辟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个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它以薪金豢养旧社

会的一切幻想家,它控制着现政权的势力,它在众多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中拥有不领薪的奴仆大军,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对革命运动还很疏远,把地位显赫的大财主看作是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天然代表。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造反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职员、文书、一切日常生活中从属于它的工作人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这样一种错觉,即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当选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真正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残废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向立法议会输送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即山岳党,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言人接近,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又如何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由于资产阶级利益被蛮横坚持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他们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二月大宴会上它们又再次采取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由于紧跟着六月事变而来的痛苦挣扎一度陷于瘫痪,从戒严状态解除时起,即从10月19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动荡。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

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日的案件<sup>92</sup>，——在这次案件中，与总统、联合的保皇派、正直的共和派、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等渺小人物比起来，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就显得好像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遗留在社会表面的，或者只能是先于社会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狄坦神；选举鼓动；处决那些打死布雷亚的人<sup>5</sup>；接连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政府派警察对宴会运动进行的暴力干涉；保皇派的放肆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像被挂在耻辱柱上；已经建成的共和国与制宪议会之间的不断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随时都使战胜者变为被战胜者，被战胜者变为战胜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处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下的可耻失败<sup>11</sup>——在这运动的旋涡中，在这历史动荡的痛苦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戏剧性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不能不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外省已经革命化了。他们已经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况且，红党答应向他们提供的已经不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再是免除租税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10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的行动。

军队本身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波拿巴的票，原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可望成为伟大革命统帅的小军士，而他给军队带来的却仍然是那些只具有普通军士水平的大将军，毫无疑问，红党，即联合的民主派，即使得不到胜利，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因为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外省都会投票拥护它。赖德律-洛兰这个山岳党的领袖在

五个省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如果说，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谈家联合——无产阶级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不得不通过精神上的胜利重新振作起来，又由于其余各阶级的发展使它无力实行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入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谈家的怀抱，即投入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那么，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于是，山岳党就成了革命营垒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谅解就消除了革命派内部的任何对立。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激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随着《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不彻底的本性而听任保皇派内阁的压制，在《国民报》派全权在握的时期被屏于一边的山岳党也就抬起头来，并且起到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保皇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相反，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民主制度。于是与卡芬雅克之流和马拉斯特之流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站在革命真理的一边，由于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革命热情的表现越是局限于在议会中进行攻击——提交控诉书、进行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空话的极端措施，他们也就越是勇敢。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者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

洛兰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在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情况下，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必然首先被推上领导地位。

《国民报》派、“坚决的宪法之友”和纯粹的共和派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被选进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位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奥菲士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重演了5月8日的冲突。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拆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拆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然而不是去进行巷战，而只是上街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只不过是1848年6月的一幅可笑而又可鄙的漫画。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大人物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更伟大的战斗报告，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12月20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总统。5月28日，补上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1848年6月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出生登记簿的；而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则是在1849年6月通过它与小资产阶级演出的难以名状的滑稽剧载入这个出生登记簿的。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失败。

1849 年 6 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出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一出包藏牢狱之灾的可悲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现在一定要露出真相了。



## 三

##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线条平淡的行政权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显示出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闹宴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的**立法权**面孔。有了立法国民议会，**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派集团——联合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派同盟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同盟又向三月革命<sup>16</sup>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sup>93</sup>。俄国入侵匈牙利<sup>12</sup>，普鲁士军队进攻维护帝国宪法<sup>3</sup>的军队，乌迪诺炮轰罗马<sup>11</sup>。欧洲危机显然已经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集中在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切实的、扼要的、强制性的控诉书。

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侵犯罗马共和国就是侵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V条说：“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侵

犯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使用法国军队去侵犯罗马的自由。宪法第54条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sup>94</sup>同意而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5月8日通过决议，坚决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军回到原定目标上来，可见它也同样坚决地禁止他们对罗马作战，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请出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证人。他这位宪法保护人向国民议会的保皇派多数发出了威胁性声明：“共和派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甚至诉诸武力！”山岳党<sup>83</sup>以强烈百倍的回声重复说：“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怕的喧嚷；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则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决议从炮轰罗马问题转入一般议程。

难道赖德律-洛兰以为能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又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但是，据内阁说，法军在罗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虽然在制宪议会中有那么多经验却依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依然不懂得宪法条文应该就其切实可行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宪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意义吗？依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派多数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神父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于世时，奥迪隆·巴罗一个人就曾违背过它的意志，难道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还应该认为自己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约束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忘记了正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

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忘记了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部长们无罪,从而承认侵犯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忘记了他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布的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最终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专门列了一个条文,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依据的正是这一条文。但同时,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背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当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机构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机构的时候才出现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企图发动的,是“纯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议会内的起义**。山岳党想让被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前景吓坏了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借毁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来毁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制宪议会曾经那么顽强地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不也是企图用类似手段宣告波拿巴的当选无效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sup>91</sup>时代没有出现过议会内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为什么老辈山岳党能够做成的事情,青年山岳党就不能做成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不是不利于采取这种行动。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经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军队并不拥护政府;立法议会的多数派本身刚刚形成不久,来不及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党把议会内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大权就会直接落入它的手中。至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它一向热中的莫过于看到议会的亡灵们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争斗。最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都想借议会内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

大目的：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构成危险。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成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起事。山岳党坚决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领导权；它对盟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疑虑重重，而且是有道理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使巴黎无产阶级的队伍激动过。然而无产阶级还是被它自己同山岳党的联盟束缚住了。山岳党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掌握了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又因霍乱而人员锐减，因失业而不得不大批地离开巴黎——就是在没有1848年6月的那种逼迫无产阶级进行拚死斗争的情势下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无产阶级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迫使山岳党丢丑，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否决时越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这一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展开一场真刀真枪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推动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考虑到可能获得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已经成立好了，要让它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经接受了1848年6月的血的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晚采取了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

愤地跑到“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跑到《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部里去了<sup>95</sup>。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大地的儿子安泰一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却成了非利士人<sup>①</sup>。一场冗长、嘈杂而空洞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山岳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心，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sup>96</sup>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残余的自称。它在议会中保留下来的代表有六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已经把他的军刀交给秩序党随意使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摆脱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他们不正是这个藏在他们的盾牌、藏在他们的原则、藏在宪法后面的民主政党的当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山岳党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地方刊登出来<sup>97</sup>。这个宣言宣布总统、部长们、立法议会多数“不受宪法保护”（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无非是等于“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水塔街出发沿着林荫大道行进的列队

---

① 见《旧约全书·士师记》第15章。——编者注

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着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途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们在喊这个口号时是机械的，冷漠的，违心的，这些呼喊声没有汇成雷鸣般的巨响，反而受到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的嘲讽。在这个多声部的合唱中缺少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开会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山墙上出现了一个雇用的宪法使者，他拼命挥动他那顶受雇捧场者的帽子，使足了劲叫喊“宪法万岁！”，喊声像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头上，——这时，游行者自己似乎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滑稽可笑。大家知道，游行队伍在和平路口转入林荫大道时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猎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顷刻间就四散奔逃，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几声“拿起武器！”，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大道上被杀害，街道上越来越乱，当这一切似乎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挽回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集结于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工艺学校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没有等到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小心的自卫军把自己的代表丢开不管，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挠人民构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作出，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此结束。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么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派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纯粹典型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事变才发展成顽强的流血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着,工人运动不像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一般运动范围内,不由一般运动决定,六月十三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对六月十三日事件有过反响的其他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成烈火,只不过划过一道冷清清的闪电。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无产阶级。6月13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派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sup>90</sup>了。

巴黎把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们则宣布巴黎“戒严”。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宪法保护”;而多数派则以违背宪法的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护。山岳党被砍杀得只剩下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内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取消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谴责、罚款、停发薪金、暂停与会资格和监禁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方悬挂的不是利剑,而是鞭子。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了保全名誉,本应集体退出议会。这样的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在甚至没有一点对抗的迹象促使秩序党团结

一致的时候，秩序党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在民主派小资产者被夺去议会力量的时候，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莱和鲁镇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部，擅自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投递员，在此之后，却得到了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嘉奖。在整个法国，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相继被解散了。

颁布新的新闻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都被查封；里昂及其邻近五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无处不在；已经受过多次清洗的大批公职人员再次受到清洗——这都是获得胜利的反动派必不可少和经常重复的惯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这次它们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外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充满着各种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把宣布戒严的权利交给了政府，对报刊的控制更严，取消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在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在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只是使词句生动而造作的腔调和姿态。放肆无耻地表露保皇主义信念，以盛气凌人的狂妄态度对共和国进行侮辱，卖弄而轻浮地道出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的体面，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音调和色彩。“宪



法万岁!”这是6月13日的失败者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情假意地去讲什么宪制即共和主义的言词了。反革命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认为复辟的日子在法国很快就要到来。秩序党各派头头们之间发生了真正的竞争,即竞相在《通报》上表白自己的保皇立场,坦白、忏悔他们在君主制时期可能犯下的自由主义罪行,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统派土容克庄严地宣称自己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自己的英雄勋业,说只是因为路易-非力浦的仁慈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在二月事变中令人惊叹的,竟不是获得胜利的人民的宽宏大量,反而是保皇派所表现的自我牺牲与温和宽厚,而正是这种态度使人民取得了胜利。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鲁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像。梯也尔称宪法是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痛悔自己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整个王朝的倾覆;梯也尔痛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痛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痛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三个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受到追究。在滑铁卢会战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人侵入法国,不像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里昂及其邻近各省实行的恐怖政治而发出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

国民议会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句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每当共和派的惯常做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做法，例如用“公民”称呼议员——被违反时，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都会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大部分人拒绝投票的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充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们进入罗马<sup>98</sup>，以及随之而来的异端裁判所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给6月的胜利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更加陶醉了。

最后，8月中旬，保皇派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一方面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一方面是由于一连数月的帮派闹宴弄得他们精疲力竭。他们采用明显的讽刺手法，留下了一个由25个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护者，其中包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精英，如摩莱与尚加尔涅。这种讽刺手法比他们所料想的还要意味深长。他们原来被历史判定去促使他们心爱的君主国倾覆，却又被历史注定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其保皇主义猖狂时期也就结束了。

巴黎的戒严解除了，报刊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期间，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期间，君主立宪派小资产者的老的文字代表者《世纪报》共和主义化了；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文字体现者《新闻报》民主主义化了，而共和派资产者的老的典型喉舌《国民报》则社会主义化了。

公开的俱乐部变得难以存在，秘密团体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了。被视为纯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产业工

人协会,在政治方面也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脑袋砍了下来,留下的群众却有了他们自己的头脑。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巴登和罗马的卑鄙的兽行和无以复加的残暴手段,已经把“红色共和国”洗成了白色。法国社会的心怀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毫无指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未必会带来恐怖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瑞进行了更多的革命宣传。按工效定能力!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体会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派跑到埃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孙子<sup>99</sup>,而大批亲近秩序党的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进行阴谋活动。必须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的话,即提出立刻修改宪法的紧急动议。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才能修改宪法。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国民议会还不应当听听法国的呼声以牺牲宪法的贞操吗?国民议会对这些省议会的期望,同伏尔泰《亨利亚特》中的修女们对潘都尔兵<sup>100</sup>的期望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波提乏们在外省碰到了为数不少的约瑟。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会这种令人厌烦的诱导。阻碍修改宪法的,正是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本身:各省议会的表决。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复会——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①它的

---

①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向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派因正统派前往埃姆斯参拜而发生猜疑,正统派则因奥尔良派跟伦敦来往<sup>101</sup>而疑虑重重,两派的报纸都已经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追求者的相互要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或多或少露骨的、想要摆脱宪法束缚的企图,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有理由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把他出卖给这个国民议会。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问题上,以及在由帕西部长提议的而被保守派骂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款 30 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抚恤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兰西民族负债簿上增添了 700 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羞答答的乞丐,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批准,于是路易·波拿巴又像以往那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sup>102</sup>

内阁的第二个拨款要求是提供 900 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这更加剧了以波拿巴为一方向以内阁和国民议会为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卫官埃德加·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出乎真意”<sup>103</sup>,拒绝对自己的已经恢复的权力加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有意透露内情,撩开了他的内阁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戏院最贱楼座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

但是在自己家里不被了解的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sup>①</sup>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飞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挽回面子而提议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而是维克多·雨果。“够了！够了！”——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喊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够了！够了！”谁会对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相信您，认为您真正相信总统吗？“够了！够了！”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决裂，又因对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堂弟<sup>②</sup>，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乘内阁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追求者摆到与波拿巴派的王位追求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确切些说，摆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追求者的地位，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顶峰。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的愤怒迫使他立即为自己将神圣的东西与可恶的东西、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而表示歉意，并使这两个提案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多数派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里耶这位正统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追求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

① 见格·海尔维格《一个活人的诗》。——编者注

② 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

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里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回到法国来只是为了以普通的私人身份而生活的话，那人家会怎样看待他！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他靠目前的状况什么也没有赢得，而联合的保皇派需要他在法国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则是因为俗人的目光无法透过流亡的云雾认清真正的王位追求者。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敬了立法议会，咨文用颇为粗暴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并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派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已经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掌握行政权，从而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他的努力，而且如果说他已经不再得人心了，那么秩序党本来就不得人心。难道他不能指望，由于奥尔良派与正统派的竞争，以及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追求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宪法机构间那种受到基佐如此赞美的习见的把戏，即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于这一点。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

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同样，这些保皇派也正是这样对待君主国的。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派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新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富尔德。让富尔德当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金融贵族在《通报》上宣布了对富尔德的任命，同时也就宣布了自己的复辟。这个复辟必然成为其余各种复辟的补充，而且与它们一起构成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来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豺狼为财政大臣。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表明没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名称。在所有的领域，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把各种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隐藏在后台的东西推到了前台。它把君主国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用表明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徒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

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富尔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联合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忍受和容许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以排斥或支配资产阶级其余各个集团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派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举足轻重的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的统治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专门人才不是金融贵族昔日的同盟者和同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已经实际参加了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全部闹宴。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难道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二流人物不正是把那个在很大的范围内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到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管理尽可能少些,官吏尽可能少用,尽可能少介入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会走这条道路的:随着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受各方面的威胁,它就必须越来越加强它的镇压措施,加强它的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紧通过国家机关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在。当对人身和财产的侵犯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能相应减少的。

或者,国家必须设法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的阶级身上而使预算立即得到哪怕是暂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会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兰西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家债权人、银行家、兑换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秩序党中只有一个集团同金融贵族的垮台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债,因为国债的息金已列入捐税项下,所以,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某个科布顿或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

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侵犯,就不能像英国人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并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同他们阶级的整个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使他们学乖了。还有谁比雇主,即工业资本家更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是在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做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着通常应该是由小资产者完成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本国范围内的什么地方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革命在这里并没有终结,而是获得有组织的开端,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税制!保留葡萄酒税<sup>51</sup>!撤回帕西关于征收所得税的提案!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个老大臣。他是杜

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sup>①</sup>的密友。帕西也曾称赞旧税制，他也曾提议保留葡萄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蒙在国家赤字上的面纱。他宣称，如果不想让国家破产，就必须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曾经劝告赖德律-洛兰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又劝告立法议会保留国家赤字。他答应节约，而这种节约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6 000万法郎，而短期债款却增加了2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由于金融贵族身旁有其他一些心怀忌妒的资产阶级集团，所以它当然就不像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那样无耻腐败。但是制度还是照旧：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被掩饰起来。渐渐地，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尼翁的铁路法律；一时成为巴黎全市议论话题的国家证券行市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还有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势必很快就重新回到2月24日前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废除了1850年度的葡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提议要保留葡萄酒税。富尔

---

<sup>①</sup>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贵族院里开始了对于帕芒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三个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三年徒刑。”——编者注

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颁令**恢复葡萄酒税**。

竭力为这次恢复葡萄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朗贝尔。他的论据简单明了：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乳；政府，这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攻击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这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税无疑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可敬的赋税。葡萄酒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想象魔鬼的时候，就把他想象成税吏。自从蒙塔朗贝尔把赋税尊崇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不信神的人，变成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不可挽回地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伯父的侄子”并不是他家族中受葡萄酒税，即受蒙塔朗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赋税之害的第一个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项赋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已经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对象了（见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有废除葡萄酒税的诺言。当然，贵族阶级是不一定要履行他们对必须无条件

纳税的人民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答应了废除葡萄酒税,可是根本没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应废除葡萄酒税,也如它答应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答应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十天,立法议会又重新实行了葡萄酒税。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这项赋税,但是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见它从窗口飞了进来。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因此,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少,税额便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使劳动阶级直接受到毒害。这项赋税使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城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一个这样的城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额。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小酒商,所谓 *marchands de vin*, 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税的死敌。最后,葡萄酒税既然使消费额减少,就会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然使城市工人无力买酒喝,也就使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无力把酒卖出去。而法国酿造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1200万。因此,一般百姓对于葡萄酒税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而农民对于葡萄酒税的切齿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况且,他们不是把恢复葡萄酒税看作是一个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农民具有一种父子相传的特有的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

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葡萄酒税的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是和别人一样的。但他过去又和别人不一样,他本是农民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 $\frac{2}{3}$ 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式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形式偿付过的贡赋。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块土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土地的价钱越提高,农民的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随着增大,——不管这小块土地是由他直接买下的,还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的,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上积聚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土地上积聚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块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但是土地被分割的过程越发展,小块土地连同它那极可怜的农具就越成为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越少,小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财

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其他生计的程度而相应减少,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土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而且,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即不能再让土地担负新的押据时,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交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在法国,这个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而加速了。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地界相连和互相交错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之间的无数纠纷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爱打官司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乐趣都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的总产品合计为5 237 178 000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355 200万法郎的耕作费用,这里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产品合计为1 685 178 000法郎,其中扣去55 000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

35 000 万法郎用于赋税, 10 700 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原产品剩下的只有 $\frac{1}{3}$ , 合计为 578 178 000 法郎; 按人口平均计算, 每人还分不到价值 25 法郎的纯产品。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 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 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 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 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 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 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 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 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 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 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丛、历书以及传单中, 都是这样说的。这些语言已经由于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理解; 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 它随意地夸大、粗暴地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者的意向和思想, 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 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sup>72</sup>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 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逐渐发生的转变, 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 表现于里昂周围五个省的戒严, 表现于六月十三日事



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sup>①</sup>的前任议长；表现于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选出一个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个去世的正统派的议员，<sup>104</sup>而加尔省原是正统派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政府所颁布的规定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外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进步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被加封为省长、专区区长尤其是市长的异端裁判官，使密探活动向各地蔓延，直到穷乡僻壤；**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专门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使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乡镇被赶到另一个乡镇，就像被追猎的野兽一样；**镇长法案**，在镇长们头顶上悬着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乡村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17个军区改为四个帕沙辖区<sup>105</sup>，并把兵营和野营作为民族沙龙强加给法国人；**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该党在普选权制度下生存的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规定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拼命企图为秩序党重新赢得各省和各省农民。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一些使秩序党自己的目标落空的拙劣办法。重大的规定，如保留葡萄酒税<sup>51</sup>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税<sup>70</sup>，轻蔑

---

①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编者注

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10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声一下子从中心大批袭来，使农民阶级感到震惊。上述各项法律和规定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当时在每所茅舍中议论的中心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

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通过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sup>106</sup>后，立刻又通过卡尔利埃——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卑劣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的模仿一样——随后发出的咨文<sup>107</sup>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sup>89</sup>之间的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者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彼此攻击时散发给人民的那些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他们不会再从人民手里夺过去吗？任何事情，甚至连友好协议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还是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刚被任命为省长的王朝老朽无能之辈召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派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

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这家报纸向公众透露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得不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此否认一番;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议会历次的不信任投票,执意保留自己的内阁;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多发给军士四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他们,同时又抄袭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信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剩下的六月起义者放逐到阿尔及尔,以使立法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逐个笼络人心。梯也尔说了些关于“政变”和“冒险行动”<sup>①</sup>的威胁性的话,立法议会就对波拿巴进行报复,否决他为私人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对于他为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以吵吵闹闹的怀疑态度予以审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图通过加强行政权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进行了报复。

使正统派方面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能干的奥尔良派又夺走了几乎一切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是希望主要靠实行地方分权来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准备了一套机构。反革命甚至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把法国的金銀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派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受到重新抬头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视,正像一个市民出身、地位低微的妻子受到自己贵族丈夫的冷

---

<sup>①</sup> “政变”原文为“coups d'état”,“冒险行动”原文为“coups de tête”。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淡和鄙视一样。

我们已经逐一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等阶层如何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如何迫于形势而同正式共和国公开敌对，从而被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派即红色共和国派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派——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从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派的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肉类与粮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派别即自由贸易派<sup>108</sup>的要求在法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全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是要打破秩序党的整个垄断！

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派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本阶级或阶级集团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

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某些人是在故意骗人,而另一些人则是在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加以改造的世界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革命要求的实现和一切革命冲突的扬弃。

在无政府派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面,隐藏着《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大体上一贯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交易摆脱历来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党中工业、商业和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相符而被这些巨头屏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以债权人的身分来迫害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以竞争来扼杀它,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协作社;资本以集中来战胜它,所以它要求征收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承办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哪怕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也行,——那么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思想家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成为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

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据领导地位一样，在无政府派中也必然是无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聚集起来的时候，当各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立法议会本身越来越埋怨法国的苏路克所提的要求时，延搁已久的为填补6月13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而安排的补充选举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遭到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这种令人讨厌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只要巴黎发生暴动，政府就可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如果不愿意让自己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不得不对政府让步。

于是政府就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树<sup>109</sup>，以此向人民挑衅。结果是徒劳。如果说自由之树丧失了安身

之所，那么政府自己也已弄得张皇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吓倒了。国民议会则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态度对待波拿巴这种妄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sup>110</sup>上取走不谢花花圈，也没有收到更大的成效。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找到借口，用或多或少隐蔽的方式对内阁投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除普选权和哥萨克骑兵入侵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要他们上街，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接到的只是议长要他遵守秩序的命令，而秩序党<sup>54</sup>则在暗中幸灾乐祸，听凭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望进行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发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人民在2月24日采取冷漠的态度。

无产阶级没有受人挑动去进行**暴动**，因为他们正准备**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只是加强了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并没有能阻止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六月被放逐者，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笼络人心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谋杀行动。**维达尔**是共产主义作家，以《论财富的分配》一书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宫委员会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从事过组织工作并赢得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为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会士的教育法的活生生的象征。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这一派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

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这就像在2月那样,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

一切反对都是枉然,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陆军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吓得如同遭到五雷击顶。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屠杀和放逐过六月起义者的人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地跟随着被放逐者并且嘴里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了国民议会,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大臣奥赛在1830年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获得多数票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的多数票的抗议。3月10日是一次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sup>①</sup>。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来拯救秩序,而波拿巴又成了他们的中立人物。如果他

---

① 暗指武装起义,因当时巴黎起义者经常利用铺路石来构筑街垒。——编者注



们想起自己是保皇派，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绝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追求者，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罢了。

为了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做内务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当局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驱走自己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发起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不停息的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殊死战中，双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7 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sup>111</sup>！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

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居然把巴黎的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这就是说，1848年6月不会重演；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不会重演；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经被摧毁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所有制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陪臣，即小所有制已经到一无所有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重弹它那非弹不可的老调。“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十倍！”但是它的镇压力量已减少了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却增强了百倍。难道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

队本身不需要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必须粉碎窒息着我们的合法性的铁环。立宪共和国太不成体统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在特洛伊木马<sup>112</sup>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伊利昂城，但我们并不是像我们的祖先希腊人<sup>①</sup>那样潜入的，我们没有占领敌人的城池，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虏。”

可是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秩序党和资产阶级是对的。而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则承认自己是错的。把资产阶级统治看作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看作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但是，当这种选举权，这种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资产阶级的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理性，即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普选权一再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自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整个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危及一切现存权力，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

---

①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双关语，原文 greccs 意为‘希腊人’，但同时也有‘职业骗子’的意思。”——编者注

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照这个逻辑,资产阶级现今已不在法国境内寻求支持,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支持。

资产阶级选定法国本土作为第二个科布伦茨<sup>113</sup>,它号召外国入侵,就激起了一切民族情感来反对自己。它攻击普选权,就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任何**特殊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的各个集团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显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了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了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了**立宪共和国**,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像是一个老人,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的盛装,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三月十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①**

---

① 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 四

###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杂志最后两期即第5—6期合刊所载《时评》中摘出来的。本文首先叙述了1847年在英国爆发的大规模商业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在1848年即已再度来临而在1849年势头更猛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遏止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有可能在此期间取得胜利。接着,文章在专门讲到法国时作了如下论述:)<sup>①</sup>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卢斯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了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

---

<sup>①</sup> 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写的。——编者注

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7300万法郎(1492万英镑)。1849年11月2日,银行券流通额是48200万法郎,或1928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英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9600万法郎,或1984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以致到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2300万法郎,或500万英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论断<sup>①</sup>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就免除了该行为银行券兑换现金的义务。它发行银行

<sup>①</sup> 见本卷第204—208页。——编者注

券的数额限定为 35 000 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面额为 100 法郎的银行券。4 月 27 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 1848 年 5 月 2 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 45 200 万法郎。1849 年 12 月 22 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 52 500 万法郎。最后，1850 年 8 月 6 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sup>114</sup>。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 1797 年到 1819 年英国的银行限制<sup>115</sup>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 2 500 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低得多，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

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促成了4月28日的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省也当选。山岳党<sup>83</sup>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省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

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勾销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否定了为六月起义恢复名誉的做法；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次提名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来。由于对手的政策不坚决而壮起胆来的秩序党，为了同这种善意的提名相对抗，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个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sup>116</sup>，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冑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使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得意忘形。山岳党心花怒放，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掀起一场再度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靠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宝座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17个卫戍官<sup>117</sup>。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重冷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定会消灭所谓的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保存自己。所谓的革命报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这个临时性问题提交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作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

5月22日,人们以462票对227票的表决结果解决了这个临时性问题。有些人曾经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稳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突发奇想,要全国行动起来,并且是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而他们自己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决定的无限期推迟,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者的庄重冷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出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sup>4</sup>称为危害深重的灾难。

山岳党的演说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他们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却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后者不久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严厉得多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规定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单户票据,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特征。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时事评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

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讷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時候，自诩为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

在讨论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堕落到如此道德败坏的地步，竟只是给路易-菲利浦时期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sup>118</sup>，即两份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sup>①</sup>

不得已的共和派<sup>②</sup>这出喜剧，即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

① 见本卷第204—205页。——编者注

② 套用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编者注

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无休无止的磨擦；秩序党经常面临分裂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经常重新结合；每一个集团都企图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相互的忌妒、仇恨、倾轧，常常刀剑相见，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接吻<sup>119</sup>，——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像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政府放弃了政权吗？波拿巴能同国民议会抗衡，不正是倚仗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这个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300万法郎作为酬劳。国民议会在它宣布绝大多数法国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胁的姿态，抬出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在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之后，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增加300万法郎，而只决定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国民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对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以后，它才作出这种让步。可见，这200多万实际上不是许给波拿巴的，而是许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掷给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而在讨论新闻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

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发行人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罚金5 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加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政府的报复行动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坏宪法的罪名追究几家正统派报纸的责任。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国民议会阻碍,希望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议会党团能够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议员能够谋求个人利益,也希望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把自己的信任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总统的印记。在议会休会期间由28人组成保护共和国美德常设委员会<sup>120</sup>,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立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几个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看来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两个王室的融合,而它们在斗争时打的旗号就是王室。报纸上登满了在圣伦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讨论的和解计划;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她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

温情的眷恋,相反,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像他们的竞争者到圣伦纳兹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宫谒见亨利五世,他们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在国外的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美德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sup>121</sup>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了会。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没有明确规定的君主制复辟;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乎宪法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派别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在各个集团之间以暴力一决胜负。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行政权一加强,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加强其共同的权力时,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手段,增加了他在决胜关头以暴力阻挠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反对秩序党时将不会对宪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生反感,正像秩序党在反对人民时不会对宪法的另一个重要

支柱,即选举法产生反感一样。他甚至有可能诉诸普选权来反对议会。总之,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会危及整个政治现状,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像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买卖、票据、婚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恶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质的原因,也理解错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来对抗前往圣伦纳兹和威斯巴登的拜谒。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这个人有什么魔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邮政马车大批装载着十二月十日会<sup>122</sup>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演说,或者宣称总统施政的座右铭是坚持共和主义的随和温顺的态度,或者宣称这一座右铭是坚持刚毅倔强的精神。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像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已经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了起来,于是他着手争取军队。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

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士兵。如果说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疲劳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他手下的虚弱士兵，那么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sup>①</sup>，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一方与尚加尔涅一方的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况且，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已经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成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这个亚历山大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可笑，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监视总统。他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分炫耀自己——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以越来越高傲的态度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的颁布会引发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入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办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招摇撞骗和不可思议的妄自尊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惊恐不

---

① 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u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编者注



安的资产阶级通过幻想产生的怪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的人,就足以把这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退休的将军。

波拿巴很早就对尚加尔涅进行过报复,嗾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在议会即将开会对这个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之前抢先采取行动,便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尔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主的得力助手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正是诺马耶在上次阅兵式上使全体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过。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将在不祥的征兆之下复会。但是,这将是杯水风波。从根本上说,旧戏必定还会继续演下去。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维护原则的勇士们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将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同样,尽管波拿巴提出了种种临时性的抗议,他也仍然会把这种延长任期当作国民议会的简单授权从它手里接受下来,因为仅仅由于缺钱,他就已经感到沮丧。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穷于应付;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无所不

用其极,直到经济关系本身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以致使所有这些互相抱怨的派别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钱财都落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弗·恩格斯

德国来信<sup>40</sup>

关于德国暴君的有趣揭露。  
——蓄意对法国进行的战争。  
——即将来临的革命

1850年1月20日于科隆

在我给你们寄出上封信的第二天，这里就传来了关于谁应统治整个德国的“问题获得解决”的消息。由两名奥地利代表和两名普鲁士代表组成的“过渡政府”，终于得以促使老约翰大公引退。结果他们取得了政权，然而这不是无限期的，而是到今年5月期满。我们有充分把握预料，甚至在期满以前就会有些“不愉快事件”，把这四位德国临时执政者赶走。这四位军事专制主义走卒的名字是值得注意的。奥地利派来的是梅特涅手下的财政大臣屈贝克先生和刽子手拉德茨基的得力助手雪恩哈尔斯将军。普鲁士的代表一个是拉多维茨将军，他是耶稣会会士，国王的宠臣，并且是使普鲁士暂

时得以把德国革命镇压下去的所有阴谋的主要策划者，另一个是伯蒂歇尔先生，他在革命前是东普鲁士省的省长，那里的人们至今还亲切地(?)记得他是公众集会的“镇压者”和密探系统的组织者。这么一伙恶棍会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就不必对你们多说了。我只举一个例子。符腾堡政府为革命所迫，曾同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订立合约——你们知道，这位公爵排斥各邦政府，垄断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信件邮递和客运。<sup>123</sup>我说过，符腾堡政府曾同这个强盗签订了一个全国性的合约，给他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让他把垄断权交给上述政府。当那些靠掠夺国家为生的人的境遇一得到改善，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就认为他的垄断权比合约上规定的更值钱，而不愿放弃垄断权。已经没有压力的符腾堡政府，认为改变主意完全合乎情理；于是双方都诉诸“过渡政府”——公爵是公开地，上述政府则是秘密地。过渡政府利用1815年旧法中的一条为借口，宣布这个合约无效和非法。事情就这样办妥了。图尔恩-塔克西斯先生把他的特权再保留几个月就好多了；当人民结束全部特权时，他们不仅要无偿地夺走他的垄断权，而且甚至还要他退出至今从他们身上掠取的钱财。

奥地利的军事专制主义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能忍受。报刊几乎全被消灭，所有的公民自由都被取消，整个国家布满了密探——全国到处都有监禁、军事法庭和鞭笞——这就是政府不时公布的那些各省宪法<sup>124</sup>的实际意义，他们在这些宪法公布的当时就毫不在乎地破坏它。但是凡事都有个头，甚至戒严和刺刀统治也不例外。军队要花钱，而钱这个东西，即使最有权力的皇帝也不能随意制造出来。奥地利政府一直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摆脱财政困境。但是这也到了头。有一位普鲁士尉官曾经要同我决斗，因为我对他说，无论

哪个国王或皇帝都不能想印多少纸币就印多少纸币<sup>①</sup>，与这位尉官，这位博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愿望相反，奥地利皇帝<sup>②</sup>还是看到了，他的纸币（尽管是不能兑换的）比银币贬值 20%—30%，比金币几乎贬值 50%。他原来打算发行的外债由于科布顿先生的竭力反对而落空。外国资本家只认购了 50 万镑，他要的是这个数目的 15 倍；而他的财力枯竭的国家已经不能为他提供任何资金了。去年 9 月底 1 550 万镑的赤字现在可能已经增到 2 000 万—2 400 万镑了，而且匈牙利战争的费用大部分应在 1849 年最后一个季度付清。这样，奥地利就只有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要么破产，要么对外作战，使军队负担自己的费用，并且靠打胜仗，征服外地和战争赔款来恢复商业信誉。这样，科布顿先生借口保卫和平而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外债（因为俄国和奥地利处于同样的困境），<sup>125</sup>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加速了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联合进军，这种进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再推迟了。

在普鲁士，我们目睹了“国王良心”的又一幕演出。你们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从不食言的人在 1848 年 11 月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并且把一部合他心意的宪法<sup>126</sup>强加给他的人民；他曾同意让这件美好的作品由第一次召集的议会进行修改；这个议会的第二议院（众议院）甚至还没有着手修改就被解散了，而另一个新的选举改革<sup>127</sup>又被强加给人民，通过选举改革非常巧妙地删去了普选权，保证了土地贵族、政府官吏和资产者成为多数。由于所有民主派都拒绝参加这个议院的选举，所以它只是由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或

---

① 见恩格斯 1846 年写的《普鲁士银行问题》一文。——编者注

②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六分之一选出的。这个议院同原来的第一议院一道着手修改宪法，自然，它们把它修改得比国王本人原来提出的本子还要更合国王的心意。现在他们已经几乎办完这件事了。你们以为现在陛下会高兴接受这个修改过的宪法，并宣誓效忠吗？他才不呢！他给他忠实的议会写了一道上谕，说他深为嘉许两个议院为他的宪法所做的一切，但在其“国王良心”允许他宣誓以前，必须对自己的宪法作十多处修改。<sup>128</sup>是些什么修改呢？哟，陛下真够谦虚的，他除了下面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外，就再无所求了。1. 现在由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选举的第一议院，应该成为真正的贵族院，其成员应包括各个亲王、陛下挑选的大约 100 名世袭贵族、大土地所有者选出的 60 名贵族、大资本家选出的 30 人、各大学选出的 6 人。2. 大臣们应对国王和国家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3. 现在预算上规定的一切税目应永远不变，议会无权废除。4. 由“星法院”<sup>129</sup>或最高法庭来审判政治案件——没有提到陪审团。5. 应颁布规定和限制议会第二议院权力的特别法等等。现在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陛下强加给善良的普鲁士人一部新宪法，要议会去修改。他的议会修改了，把残存的一点公民权利统统勾销。但国王还不满意，竟宣称，若不作上述补充修改，他的“国王良心”就不允许他接受那部按照他自己的利益修改过的他自己的宪法。这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国王的”那一类良心！甚至目前这个可笑的议会都不大可能屈从于此类无耻的要求。结果将是解散议会，普鲁士将暂时没有任何议会。所有这一切的奥妙就在于：预期会发生上面提到的同盟战争。坐在普鲁士王位上的这位“有良心的”正人君子，预期在 3、4 月份会有成百万的亚洲野蛮人麇集于他那动乱的国家，他们将率同“他自己的光荣军队”<sup>130</sup>一道进军巴黎，征服这个生产他心爱的香槟酒的美好国家。一旦共和国被消灭，圣路易的

后代<sup>①</sup>在法国重新登极,那时候自己家里那个宪法和议会还有什么用呢?

目前,革命精神正在德国全国迅速复活。1848年3月以后曾同国王一道反对人民的最顽固的前自由派<sup>②</sup>现在也认识到了,正如德国谚语说的,虽然他只把一个小手指尖伸给魔鬼,可是这个君子从此却抓住了整只手。陪审团对政治案件不断作出的无罪判决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方面的新事每天都有。例如,几天前,曾经在1849年5月为了阻止向起义的埃尔伯费尔德运送军队而毁坏铁路的米尔海姆工人在这里即科隆被宣告无罪<sup>131</sup>。在南德意志,财政困难和赋税的增长使每一个资产者都看到,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不了多久。在巴登,就是这些背叛上次起义、欢呼普鲁士人到来的资产者被这些普鲁士人和在这些普鲁士人保护下使他们破产和绝望的政府所折磨和激怒。各地的工人和农民都在警觉地等待着起义的信号,这次起义一定要使无产者的政治统治和社会进步得到保证,否则决不会平息下去。这场革命已经临近了。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1月  
20日

载于1850年2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1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① 昂·尚博尔。——编者注

② 卢·康普豪森。——编者注

弗·恩格斯

## 法国来信<sup>50</sup>

### 红色共和主义光辉成就的鲜明证据!

1850年1月21日于巴黎

自从我发出上一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是由于大多数读者想必已经从日报和周报上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再从头至尾地重述了,在这封信里我只就国内形势谈一些总的看法。

在最近这12或15个月里,革命精神在整个法国极其高涨。那个因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在文明社会中最大限度地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阶级,那个被以前的君主制立法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利的阶级,那个从来不看报,可是却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阶级,终于迅速醒悟了过来<sup>132</sup>。这个阶级就是小农,男女和儿童总共约2800万人,其中小土地所有者800—900万人,他们以自由农<sup>133</sup>的身分占有法国全部土地的至少五分之四。从1815年起,这个阶级便受历届政府的压迫,临时政府也不例外,它规定对这个阶级的土地税每1法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sup>70</sup>,而法国的土地税本来已经很重了。这个阶级还



受到一帮高利贷者的压榨,他们的财产几乎无例外地都以特别高的利息抵押给这帮人了。就是这个阶级终于开始懂得: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那种虽有小块份地却越来越受痛苦和饥饿煎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这个阶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1789年的革命,并且是拿破仑的庞大帝国产生的基础。就是这个阶级现在有绝大多数的人已经站到了巴黎、里昂、鲁昂以及其他法国大城市的革命党派和工人的一边。农民们现在十分清楚地知道路易-拿破仑如何欺骗了他们,在总统选举中他们给了他至少600万张选票,而他回报他们的却是恢复葡萄酒税<sup>51</sup>。所以,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一有适当时机,就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横暴统治。这个被二月风暴吓倒了的阶级重新掌握了政权,其统治甚至比它在它亲爱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统治还要专横得多。

最近几个月来的事件为这一极端重要的事实提供了无数证据。例如奥普尔部长给宪兵队的通令,责成他们甚至在边远的穷乡僻壤也要进行密探活动;再如反对教师的法律<sup>134</sup>,法国农村的学校教师一般是最能代表这些地区的舆论的,现在他们要由政府来摆布了,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持社会民主派的观点。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事实。但是最鲜明的证据之一是不久前加尔省的选举。这个省众所周知是“白色分子”即正统主义者的老巢。它是1794年和1795年罗伯斯比尔垮台后对共和派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这里也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当时对新教徒和自由派进行了公开的杀戮,而这些牺牲者的妻女姐妹则受到正统派暴徒的最骇人听闻的污辱,他们以出名的特雷斯塔永为首并受到正统的路易十八政府的庇护,就是在这个省份必须选出一名议员代替一名去世的正统派议员;选举结果,大多数票投给了一名完全红色的候选人,而两名正统派的

候选人得到的票显然很少<sup>104</sup>。

新的公共教育法<sup>135</sup>是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的这一联盟迅速取得成就的又一证据。资产阶级的最顽固的伏尔泰主义者<sup>89</sup>，甚至梯也尔先生都明白，只有放弃他们的老理论和老原则并使教育听命于僧侣，才能阻挠联盟取得成就！

再者，现在所有的报纸和社会活动家，只要不是完全反动的，都在争先恐后地捞取一度受人蔑视的“社会主义者”的名义。社会主义的最老牌的敌人现在都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国民报》，甚至《世纪报》，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是君主主义的报纸，现在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报纸。甚至 1848 年的无耻叛徒马拉斯特，现在也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以期能使自己当选，尽管这是枉费心机。不过人民并不是那么好愚弄的；绞索已经给那个无赖准备好了，只是等待时机。

今天国民议会正在讨论关于杀害余下的 468 名被囚禁的六月起义者的法案，杀害的办法是把他们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对健康极为有害的地区去做工<sup>136</sup>。毫无疑问，法案将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然而，在这场劳动大搏斗的不幸英雄们到达那注定将成为他们葬身之地的大海彼岸之前，无疑人民的新的愤怒狂涛会把那些投票赞成这一杀人法案的人们席卷而去，并且，也许会把今天处于多数地位的，可能逃脱人民对他们的更为迅猛、更为严峻和最为公正的报复的那些人送到那个流放地去。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1 月  
21 日

载于 1850 年 2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sup>137</sup>

书 籍<sup>①</sup>

I. 评格·弗·道默《新时代的宗教。

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共两卷。

1850年汉堡版

“纽伦堡有一个人，一般说来思想非常开放，对新事物决不置若罔闻，而对民主派的作为却恨之入骨。他原来崇拜隆格，把隆格的照片挂在房间里。但是，一听到隆格站在民主派一边，便把他的照片挂到厕所里去了。他说过：啊，如果我们生活在俄国人的皮鞭下，我会感到多么幸福！他在动乱时期死去，我想，他虽已年迈，但是，完全由于他对事情的发展感到不满和忧伤而使他进了坟墓。”（第2卷第321—322页）

①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编辑部在此处加了一个注：“这里所列举的所有著作都收藏于伦敦的戴·纳特先生家里，即滨河路270号，距圣克莱门特教堂两个门。”

假如这个可悲的纽伦堡的庸人不是死去,而是从《德国通讯员》那里,从席勒和歌德的著作里,从旧教科书和租书店的新书里收集一些思想片断,他也许会免于一死,而道默先生也就不必辛辛苦苦地写两卷书来创立综合格言了。自然,那时我们就不会有了解新时代的宗教并认识它的第一个殉道者的良机了。

道默先生的著作分为两部分:“绪论”和“正文”。在绪论部分,这位德国哲学的忠实的埃卡尔特说出了他深感忧虑的事:两年来甚至那些有思想、有教养的德国人也被引入歧途,他们竟为纯粹“表面的”革命活动而抛弃了珍贵的思想成果。他认为,现在正是重新唤起美好的民族情感的时机;他指出,这样轻率地抛弃整个德国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而德国能保持现在这样,只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他用他那博学的宝盒提供的最有力的格言来编纂德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他这样使德国文化出的丑并不亚于使德国哲学出的丑。他那本荟集德意志精神的大作就其庸俗浅薄而言,甚至超过了供名门闺秀消遣的鄙俗不堪的读物。从歌德和席勒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市侩式的抨击起,从“唤醒狮子是危险的”<sup>①</sup>这一类经典名句起,到现代文学作品为止,这个新宗教的最高教士孜孜不倦地从中寻找的每个段落,都表现出德国人的因循守旧带着懵懵懂懂的不满情绪坚决反对他们所厌恶的历史运动。这类人的权威,如弗里德里希·劳默、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罗赫纳、莫里茨·卡利埃尔、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克鲁格、丁盖尔施泰特、隆格、《纽伦堡信使》、麦克斯·瓦尔道、施特恩堡、格尔曼·莫伊勒、路易莎·阿斯顿、埃克尔曼、诺阿克、《文艺杂谈》、奥·孔策、吉拉尼、泰·蒙特、萨菲尔、谷兹科、一位“娘家姓加特雷尔”的人

<sup>①</sup> 席勒《钟之歌》第26节。——编者注

等等,都是支撑新宗教庙堂的柱石。在这里遭到许多人咒骂的革命运动,从一方面说,在道默先生看来不过是由《德国通讯员》炮制出来的流行于纽伦堡的极其无聊的马路政治,从另一方面说,在道默先生荒诞想象中不过是小民的过火行为。他在这里获取的资料同上述人物的资料并提是完全相称的;除了不止一次提到的纽伦堡的《通讯员》外,还有《班贝格报》、慕尼黑的《农村信使》<sup>①</sup>、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等等。这些庸俗的报刊始终认为无产者只是粗野堕落的流氓,看到在1848年巴黎六月大屠杀中杀死了三千多个这种“流氓”便拍手称快,而对人们嘲笑充满温情的动物保护协会却感到愤懑不已。道默先生在第1卷第293页上惊呼:

“在这些野蛮人看来,不幸的动物在残暴的人类手中遭到的可怕折磨都是‘区区小事’,不必感到不安!”

在道默先生看来,现代的全部阶级斗争都只不过是“粗野”反对“教养”的斗争。他不从这些阶级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解释阶级斗争,而把阶级斗争的原因归结为某些恶人玩弄阴谋诡计,煽动下层民众的卑劣欲望,反对有教养的阶层。

“这种民主改良主义……激起了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愤怒和贪欲,而上层阶级正是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善良并为文明达到更高发展阶段奠定基础的好工具!”(第1卷第289页)

道默先生甚至不知道“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进行怎样的斗争才达到即使只是像纽伦堡那样的“文明教化阶段”,才能出现道

---

<sup>①</sup> 即《巴伐利亚农村信使》。——编者注

默式的捕捉摩洛赫的勇士。<sup>①</sup>

第二部分,即“正文”,从正面叙述了新的宗教。这位德国哲学家因为自己反基督教的斗争被人遗忘,因为人民对宗教这个唯一值得哲学家注意的对象表示冷漠,所以他在这里发泄了他的怒气。为了给自己被竞争挤垮的行业恢复声誉,我们这个哲人对旧宗教狂吠了一通以后只好创造一种新的宗教。但是,这种新宗教同第一部分完全限于同一个内容,它不过是继续荟集德国庸俗文化中的一些格言、题诗和纪念诗。这本新古兰经的各篇,只不过是把德国现存制度从道义上加以美化、用诗歌进行修饰的一大堆空话而已。这些空话虽然去掉了直接的宗教形式,但还是同旧宗教有同源的关系。

“全新的世界秩序和世界关系只有通过新的宗教才能产生。宗教能够干什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抽象的独有的政治是软弱无力和毫无结果的,1848年开展的运动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第1卷第313页)

从这种内容丰富的论点中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这位德国“思想家”是非常浅薄无知的,他竟把德国的、特别是巴伐利亚的一点“三月成果”看成是1848年和1849年的欧洲运动,他要求逐步开拓着和汇集着伟大革命的最初的、甚至只是浅层的迸发就应当产生出“全新的世界秩序和世界关系”。对哲人道默先生来说,整个复杂的社会斗争,在最近两年中从巴黎到德布勒森、从柏林到巴勒莫发生的这种社会斗争的前哨战,只是使“1849年1月埃朗根立宪协会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第1卷第312页),只是对可能再一次令人不快地惊扰道

---

① 暗指道默《古希伯莱人对火和火神摩洛赫的崇拜》1842年不伦瑞克版和《基督教古代的圣礼》(两卷集)1847年汉堡版。——编者注

默先生研究哈菲兹、穆罕默德<sup>①</sup>和贝尔托尔德·奥尔巴赫的那种新斗争感到恐惧。

正是道默先生的这种无耻的浅薄,使他完全无视下列事实:古代“世界秩序”彻底瓦解以后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不过是这种瓦解的表现;“全新的世界秩序”不是通过基督教从内部产生的,而是在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从外部”攻击罗马帝国的尸体时才产生的;在日耳曼人入侵以后,不是按照基督教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基督教随着这种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发生变化。但愿道默先生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旧世界秩序是随着新宗教的出现而发生变化的,而在此同时并不出现非常激烈的“外在的抽象的政治”动荡。

显然,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因此,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革。但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抛弃一切宗教,而不再以新宗教的狂热形式把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奉为神明。

新的哲理甚至超过了克尼格的说教<sup>②</sup>,因为它不仅包含对人的必要的约束,而且包含对动物的必要约束;在这种新哲理的温和的道德说教之后,——在所罗门的箴言之后,就出现了新所罗门的雅歌。

“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是真正神圣的……人类对自然的奉献,男人对女人的奉献,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恭谦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虔诚。”(第2卷第257页)

---

① 道默《哈菲兹》1846年汉堡版和《穆罕默德及其事业》1848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阿·克尼格《论为人处世》1804年汉诺威版。——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思辨的宗教创始人的浅薄怎样转变为明显的怯懦。道默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而诉诸所谓的自然,即乏味的田园诗,鼓吹对女性崇拜以掩饰他自己对女性的顺从。

但是,道默先生的自然崇拜是很独特的。他最后甚至比基督教表现得还反动。他企图用现代的形式来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的自然宗教。于是不言而喻,他把这一切都变成了对自然界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宗法式的空谈,下面的例子就说明这一点:

“可爱的、神圣的大自然啊  
让我踏着你的足迹前进,  
用你的手牵着我  
就像用带子拉着学步的孩子!”

“这种诗已经过时,而且对文化、进步和人类幸福也没有好处。”(第2卷第157页)

我们看到,自然崇拜不过是小镇居民礼拜天散步时知道杜鹃把卵产在别种鸟的巢里(第2卷第40页),知道眼泪有使眼睛表面保持湿润的作用(第2卷第73页)等等的事情而像孩子一样吃惊,最后以敬畏的心情颤抖地向他的孩子朗诵克洛普施托克的春天颂<sup>①</sup>(第2卷第23页及以下几页)。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对这种现代自然科学却只字不提。相反,我们却听到了神秘的暗示,听到了关于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苏格兰人的未卜先知以及动物的磁性<sup>138</sup>等等令人惊讶的庸人猜测。然而巴伐利亚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即僧侣和道默之流都同样赖以滋生的土壤,总有一天要用

<sup>①</sup> 指弗·克洛普施托克《颂歌集》中的《到处是神灵》。——编者注



现代耕作法和现代机器来翻耕的。

对女性的崇拜正是同对自然的崇拜一样。不言而喻，道默先生对妇女当前的社会地位只字不提，相反，只是就妇女谈妇女。他竭力用内容空洞和玄妙的矫揉造作的词句对她们表示崇拜，以此安慰她们的无权地位。例如，他安慰妇女说：妇女一出嫁，她们的才能便随之消失，因为那时她们要生儿育女（第2卷第237页），甚至到60岁还能给婴儿哺乳（第2卷第244页）等等。道默先生把这叫作“男人对女人的奉献”。为了在自己祖国找到所必需的理想妇女形象以便作出他们男人的奉献，他不得不求助于上一世纪的各种贵妇。这样，对女性的崇拜又归结为一种文人对其尊敬的女保护人的可怜的关系，就像威廉·迈斯特那样<sup>①</sup>。

道默先生在耶利米哀歌<sup>②</sup>里大谈其没落的那种“文化”，是纽伦堡作为帝国直辖市处于繁荣时期的文化，是纽伦堡的工业——艺术和手工业的混合物——起着重要作用时期的文化，是与德国小资产阶级同趋没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以往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巨著提供材料，那么，小市民阶级当然只能表现出极其狠毒而又软弱无能，提供桑乔·潘萨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子。道默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完全缺乏幽默感的汉斯·萨克斯的延续。德国哲学悲痛欲绝地在它的养父——德国小市民阶级——临终时的床前哭诉，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动人情景。

①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编者注

② 借用圣经中哀悼耶路撒冷被毁的《耶利米哀歌》这一篇名，暗指悲叹和诉苦的作品。——编者注

## II. 评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请求 德国陪审官保护全体维护帝国宪 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1849年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我们投票反对了帝国元首的世袭权力；在第二天选举帝国元首的时候，我们弃权。但是，当全部问题根据由普选权产生的议会中多数人的意志最后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宣布愿意服从，要是我们不这样做，那就证明我们根本不适应市民社会。”（第43页）

可见，在“特里尔”的路·西蒙先生心目中，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议员已经“根本不适应市民社会”了。可见，在“特里尔”的路·西蒙先生看来，市民社会的范围比圣保罗教堂<sup>①</sup>的范围还窄。

不过，西蒙先生在他1849年4月11日的自白中很得当地披露了他以前的反对立场和他后来转变的秘密。

“从3月前的外交界的浑水里升起了寒冷的迷雾，这种迷雾将凝聚成云，险恶的暴风雨将会来临，它首先摧毁我们集会的教堂的尖塔，请留意照管使你们

---

①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5月30日召开会议地点。——编者注

免遭雷击的避雷针吧!”<sup>①</sup>

也就是说：诸位先生，这是我们性命攸关的事情！

法兰克福左派仅仅为了使多数派不离开议会，在讨论皇权问题时以及在帝国代表团可耻地回来<sup>139</sup>后向多数派提出乞求似的建议，作出卑鄙的调和，当时左派在各方面都低声下气地企图妥协，所有这一切在西蒙先生下列言论中都变得非常崇高了：

“由于去年发生的事件，‘妥协’一词已经变成了颇使人疑虑的嘲笑对象，如果不冒被嘲笑的风险，就几乎不敢再提这个词。可是，二者必取其一：要么大家彼此妥协，要么像野兽一样厮打。”（第 43 页）

这就是说，要么各政党把斗争进行到底，要么通过任意的调和把斗争搁置一旁。当然，后一种做法是比较“文明”和“人道”的。可是，根据西蒙先生的上述理论，他就可以无限地作出妥协，通过这些妥协他就能够留在任何“市民社会”里。

已经一命呜呼的帝国宪法用下面的哲学演绎给自己找到了辩护的理由：

“帝国宪法实质上表明，不采取新的强制性措施是可能的……它是民主君主政体的生动(!)表现，因而也是原则性矛盾的表现。实际上世间已经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事物，它们在原则上是矛盾的，可是以后的生活正是从原则性矛盾的实际存在中发展起来的。”（第 44 页）

显然，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毕竟比引用席勒的诗句要困难一些。如果帝国宪法虽有“原则性矛盾”，“实际上”仍然存在，那么它至少应

---

<sup>①</sup> 路·西蒙 1849 年 4 月 11 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见 1849 年 4 月 13 日《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第 271 号第 2 版。——编者注

当“原则上”反映出“实际上”存在的矛盾。“实际上”站在一边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即军事专制制度，站在另一边的是德国人民；他们的三月起义<sup>16</sup>成果被骗走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天真地信任可悲的法兰克福议会<sup>9</sup>而受骗的，而且是在他们最后冒着危险重新投入反对军事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时候。这种实际矛盾只有通过实际斗争才能解决。帝国宪法反映了这种矛盾吗？根本没有。它只反映了1848年3月间存在的矛盾，即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没有重新聚集力量，反对派由于局部失败而分裂、削弱和解除武装以前存在的矛盾。其次，它只反映了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幼稚的自欺欺人想法，他们自以为在1849年3月还能授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府制定法律，能永远确保自己既有利又安全的德意志帝国的巴罗的地位。

后来，西蒙先生庆幸自己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动摇他们对帝国宪法的执著的迷恋。

“你们这些哥达的叛徒<sup>140</sup>，羞愧地承认吧，我们即使在热情冲动的时候能抵挡任何的诱惑，我们仍然决不食言，丝毫也没有背弃我们的共同事业！”（第67页）

然后，他指出他们为符腾堡和普法尔茨立下的英雄业绩；指出他们在6月8日的斯图加特决议中把巴登置于帝国的保护下，虽然帝国当时基本上已处于巴登的保护下；<sup>141</sup>他们的决议只不过证明他们下决心“丝毫也不”放弃怯懦行为并且硬要坚持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的幻想。

西蒙先生用下面意味极为深长的话反驳“帝国宪法只不过是共和国的假面具”这一谴责：

“只有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这种谴责才能站得

住脚……可是，谁对你们说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呢？谁能预测斗争成败和战争胜负的一切可能的变化呢？一旦相互敌对的弟兄（政府和人民）经过残酷斗争后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他们就会产生和平与和解的情绪，在帝国宪法的旗帜下，他们可以握手言和，难道我们能去损害，哪怕是稍微损害一下这面旗帜吗？看看你们的周围吧！要说真话！真心实意地扪心自问一下，你们就会而且一定会回答说，不，不，完全不！”（第70页）

西蒙先生在圣保罗教堂以非常惊人的效果射出的那支箭，就是从这个真正善言巧辩的箭囊中取出来的！这种感人的激情虽然庸俗，但是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表明，法兰克福的先生们怎样安心地在斯图加特等待敌对的政党精疲力竭，以便在适当时机出现在这些疲惫不堪的人中间，向他们提供和解的万应灵丹——帝国宪法。西蒙先生多么了解他同事的心意，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这些先生现在还聚集在伯尔尼的补锅匠街的本茨酒店，等待爆发新的斗争，以便在各政党“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的时候，能插足其间，向他们建议为了妥协而采用充分体现筋疲力竭和相持不下的帝国宪法。

“但是，不管怎样，我告诉你们，远离祖国，远离故土，远离年迈父母而走上孤独寂寞的放逐道路是多么痛苦，即使给我一切尘世的财富，我也决不会把纯洁的良心换成叛逆者的悔恨和统治者的不眠之夜！”（第71页）

但愿能够放逐这些先生！可是，他们不是随身携带着法兰克福速记记录中那种祖国吗？从这些记录中他们呼吸到最纯正的祖国空气，并感到美妙无比，怡然自得。

顺便提一下，如果西蒙先生认为他是在为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说话，那么，这是一种虔诚的谎言。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并不需要他的“正义呼声”。他们自己保卫自己倒是更好些，更有力些。但是，西

---

蒙先生必须以此为借口,以便遮盖这样的事实:为了在各方面都已经声名狼藉的法兰克福人,为了帝国宪法的制订者,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必须发表一篇自卫演说。

### III. 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

基佐先生撰写这一小册子的目的是要证明，为什么路易-菲力浦其人和基佐的政策本来不应该在1848年2月24日<sup>4</sup>遭到失败，怎样由于法国人品质卑劣，致使1830年的七月王朝<sup>65</sup>18年苦心经营以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而不像1688年<sup>142</sup>以来的英国君主制度那样天长地久。

从这一小册子里可以看出，即使旧制度下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他们那里不能不认为是史学天才的人物，也被不幸的二月事变弄得头晕目眩，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基佐先生不是通过二月革命去理解1830年法国君主制度和1688年英国君主制度之间迥然不同的历史情况、迥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而是用一些道德词句去抹杀它们之间的全部区别，并且在结尾宣称，在2月24日遭到失败的政策“保住了国家，只有这一政策能消灭革命”。

如果把基佐先生想要回答的问题确切地表述出来，那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在英国以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向前发展，要比在法国长久？

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基佐先生是怎样认识英国资产阶级发

展过程的。

“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执政时，社会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对外政策已经不再是关心的重点，内政、维护和平、财政问题、殖民地问题、商业问题、议会制度的发展和斗争已经成为政府和公众最为关怀的事情。”（第168页）

基佐先生在威廉三世执政时，只发现两个值得一提的情况：一是议会同国王之间保持均势，一是通过反对路易十四的斗争在欧洲保持均势。在汉诺威王朝时期，突然“社会思想倾向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不知道怎样发生变化和为什么会变化。在这里可以看到，基佐先生如何把法国议会辩论中陈腐不堪的老调套用在英国历史上，他认为这一来就把英国历史说明白了。基佐先生当大臣的时候正是这样想的，认为他肩负着保持议会同国王之间的均势和欧洲的均势，而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把整个法兰西国家和整个法兰西社会一块一块地零售给巴黎交易所的重利盘剥者而已。

至于说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是为了消灭法国商业和法国海上力量的纯粹的贸易竞争战，在威廉三世时期由于建立了银行和发行了国债<sup>143</sup>，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初次得到认可，由于一贯实行保护关税制，手工业资产阶级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切在基佐先生看来都是不值得费力去谈的。对他来说，只有政治空话才有意义。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安女王统治时期，执政党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和立宪君主制，是由于它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议会的职权延长到七年，从而几乎完全消除了人民对政府的影响。

在汉诺威王朝时期，英国已经发展到能够用现代形式对法国进行贸易竞争战。英国自己还仅仅在美国和东印度同法国进行斗争，在大陆上则满足于雇用像弗里德里希二世这种外国君主去同法国作战。而当对外战争采取另一种形式时，基佐先生就声称“对外政策已



经不再是让人关心的主要事情”，并为“维护和平”所代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议会制度的发展和议会斗争已经成为政府和公众最为关怀的事情”，这可以同沃尔波尔内阁时期发生的贿赂丑行作一对比，这类丑行其实同基佐内阁时期经常发生的丑行毫无区别。

据基佐先生解释，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英国革命具有纯粹宗教的性质，因而它根本没有同过去的一切传统决裂；第二，英国革命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而议会捍卫现行的旧法律，使它不致受王权的侵犯。

至于第一点，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期使他心惊胆战的自由思想不是从别的国家而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之父，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这种自由思想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辉煌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古怪的结论：那种被基佐先生认为是使法国革命遭到失败的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关于第二点，基佐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就像英国革命一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还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是诸如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为了保护旧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度的风俗和习惯曾经起来反对这种新东西。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破了产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基佐先生认为，英国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国王已经不可能违背议会，特别是下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可以归纳如下：最初国王

和议会双方都已经越权,都走得太远,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达到适当的均势,彼此互不侵犯。至于王权从属于议会的意思就是王权从属于某一阶级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是毋庸赘述的。因此,他认为也不必详尽研究这一阶级如何获得必要的权力,使国王最后成为它的奴仆。在基佐先生看来,查理一世同议会之间的全部斗争仅仅是围绕着纯粹政治特权而进行的。为什么议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需要这种特权,却只字未提。关于查理一世直接干预自由竞争而使英国工商业日益陷入困境,关于持续的财政困难致使查理一世越是想对抗议会却越依赖议会,这些基佐先生也很少提到。因此,在他看来,整个革命只是由于对适度的自由感到不满的少数分子捣乱的恶意和宗教狂热引起的。基佐先生同样不太懂得阐明宗教运动同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共和国当然也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和心怀恶意的人搞出来的东西。至于在这个时期,在里斯本、那不勒斯和墨西哥也企图建立共和国<sup>144</sup>,而且像英国一样也建立荷兰式的共和国,对这样的事实他只字不提。虽然基佐先生从来没有忽视法国革命,但是他甚至没有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一切地方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政体才能从专制君主制过渡到立宪君主制,甚至当旧王朝已经混不下去而不得不让位给想篡权的旁系亲属时,情况也一样。因此,关于英国复辟的君主制崩溃的问题,他只能向我们说一些很无聊的陈词滥调。他甚至没有指出崩溃的最近的原因:宗教改革造就的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的复兴,因为天主教一旦复兴,他们当然就得归还过去被他们掠夺去的所有教会土地,也就是说,英国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七都得易主;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畏惧,天主教根本不利于他们的贸易活动;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和宫廷贵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地把全部英国

工商业都出卖给法国政府，即出卖给当时唯一能在竞争中威胁英国人并在许多方面都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等等。由于基佐先生处处漏掉最重要的情况，所以他就只有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地、乏味地纯粹从政治角度去阐述事件了。

对基佐先生来说，英国革命的保守性是一大难解之谜，他只知用英国人的深邃的理智来解释，其实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同绝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持久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小块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个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土地所有者，它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没有矛盾，反而是完全协调的。他们的地产实际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一方面给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手工工场所必需的人手，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同工商业的状况相适应。因此，他们同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从而结成了联盟。

在基佐先生看来，随着立宪君主制在英国的巩固，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他认为，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托利党<sup>145</sup>和辉格党<sup>146</sup>之间有趣的轮流做庄，也就是说只不过是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之间的大辩论。相反，实际上正是随着立宪君主制的巩固，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变革。基佐先生认为充满恬静、田园诗般安宁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形成极其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革命。在立宪君主制下，工场手工业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整个整个阶级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需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庞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同法国革命进行斗

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致在改革法案<sup>147</sup>还没有把政权直接交到它手中就强迫它的对手颁布几乎只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需要的法律。它在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权,并且利用这种代表权来消灭土地所有制保留的最后一点残余实力。最后,资产阶级这时便致力于彻底摧毁基佐先生所赞叹不已的那座漂亮的英国宪法大厦。

正当基佐先生因为法国社会生活的恶瘤,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未能动摇唯一能拯救世人的君主制的支柱而向英国人祝贺时,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却发展到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在这里,拥有无比的财富和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正遭到拥有无比的力量和集中程度的无产阶级的对抗。因此,基佐先生赞赏英国,最后得到的是这样的结局:在英国,在立宪君主制的掩护下,远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更多的和更激进的社会革命因素获得了发展。

当英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打成了结,而基佐先生自己再不能装样子用纯粹政治空话来解这个结的时候,他就乞灵于宗教的空谈,乞灵于上帝的武装干涉。于是,就有例如圣灵突然降临于军队并阻止克伦威尔自封为国王等等的说法。基佐借上帝来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借文体来逃避世俗公众的指摘。

其实,不但国王要滚蛋,而且资产阶级的英才们也要滚蛋。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1—2月

载于1850年2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时评。\* 1850年1—2月<sup>148</sup>

A tout seigneur, tout honneur! [地位高低决定荣誉高低!]从普鲁士谈起。

普鲁士国王正竭力使目前双方勉强达成的协议和还不完全和解的局面陷入危机<sup>149</sup>。他钦定了宪法,并且几经周折后建立了两院来修改这部宪法。两院为了使宪法完全为王室所接受,把凡是可能引起王室反感的条款统统删掉,以为这样国王就会马上宣誓忠于宪法。但是正好相反<sup>150</sup>。弗里德里希-威廉为了向两院证明“国王的诚意”,发布了一项公告,提出了“修改宪法”的新提案;通过这些提案,势必使上述文件表面上最后一点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障也丧失净尽。国王希望两院否决这些提案,可是,事实上相反。如果说两院对王室估计错了,那么两院现在担心的是国王对它们也估计错了。两院仅仅为了不致被打发回家,仅仅为了使国王最后能隆重地作一次“实在的”宣誓,竟通过了贵族特权、特别法庭、国民兵役以及限定继承权<sup>151</sup>等所有这一类提案。这就是普鲁士立宪派资产者造成的恶果。

国王很难想出一种办法使两院感到过分的屈辱。最后,他将不

得不声明：“他要立的誓约对他来说越是神圣，他越要忠心耿耿地承担上帝赋予他的对可爱祖国的义务”，他的“国王的诚意”越不允许他向那个虽然赋予他一切而对国家却毫无裨益的宪法宣誓。

已经归天的“联合议会”<sup>152</sup>的先生们，现在又聚集在两院里了，他们之所以如此害怕被推回到三月十八日前的原先状态去，是因为到那时他们又会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玫瑰花。况且，在1847年他们还能否决借口建设东部铁路所提出的贷款，而在1849年他们先在事实上批准了政府这项贷款，然后才毕恭毕敬地请求政府给予批准拨款的理论上的权力。

与此同时，两院外的资产阶级对陪审法庭宣告被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无罪一事颇感满意，并以此表明它对政府的反对立场。这样一来，在这些案件中，一方面使政府，另一方面使被告及旁听者所代表的民主派都不断地出丑。关于这一点，回想一下“一贯的立宪主义者”瓦尔德克案件、特里尔案件等等就很清楚了<sup>153</sup>。

年迈的阿恩特提出“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sup>①</sup>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回答说：爱尔福特。<sup>154</sup>写出一部模拟《伊利亚特》的《青蛙与老鼠之战》<sup>②</sup>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迄今还没有人胆敢打算模拟《青蛙与老鼠之战》。而现在有人竟用爱尔福特计划模拟圣保罗教堂里的蛙鼠之战。当然，这个不可靠的议会是否真的会在爱尔福特召开，或者信奉正教的沙皇是否会禁止它，正像福格特先生那份无疑会同费奈迭先生取得一致意见的对议会权限的抗议书一样，是完全无

① 指阿恩特的诗歌《德国人的祖国》。——编者注

② 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模拟荷马的《伊利亚特》，作者不详。——编者注

关紧要的。对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东西感兴趣的,只有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和普鲁士资产者,前者在他们的社论中把“大德意志”或“小德意志”的问题看作是既取之不尽又必不可少的资源,后者则沉缅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即普鲁士国王会在爱尔福特同意一切,原因正是他在柏林拒绝了一切。

如果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应当或多或少地按原样在爱尔福特重建起来,那么,旧的联邦议会就会以“过渡政府”的形式<sup>45</sup>重新复活,同时将回复到它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即奥普联邦委员会。临时协议在符腾堡已经生效,并且不久在梅克伦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会生效。

普鲁士长期来一直靠发行纸币、海外贸易公司<sup>155</sup>的秘密贷款和国库余款勉强维持它的预算,只是现在才被迫走上靠贷款度日的道路,而在奥地利,国家已经完全陷于破产。1849年的头9个月,赤字为15 500万古尔登<sup>①</sup>,到12月底,一定会达到21 000万—22 000万古尔登;在获得新贷款的企图完全落空后,国家信用在国内外就彻底丧失;国内的财源——普通捐税、强制捐税、发行纸币等——完全枯竭;必须向已经被吸尽榨干的本国强行征收挽救危局的新税,可以预期,这种税将一无所得,——这就是奥地利财政极度困难的主要特征。同时,奥地利的国家机体也越来越快地趋于土崩瓦解。政府竭力用中央集权来控制局面,但是徒劳;这种现象已经波及国家机体的四肢末端;甚至对那些作为旧奥地利主要支柱的极不开化部落来说,对在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的南斯拉夫人来说,对“忠诚的”边屯居民<sup>156</sup>来说,奥地利也成了难于忍受的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

① 德国的旧金币,一个古尔登约合1.69马克。——编者注

办法还能带来一线得救的希望,那就是对外战争。奥地利势必要发动的这场对外战争,一定会使奥地利很快就彻底崩溃。

俄国也没有足够的钱来换取自己的荣誉,何况换取这种荣誉还必须用现金。信奉正教的沙皇尽管在乌拉尔和阿尔泰有出名的金矿,尽管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地下室里有无数的珍宝,尽管在伦敦和巴黎似乎完全是由于现金过多而收购有价证券,但是他认为,不仅必须以种种借口从保存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作为纸币保证金的现金储备中提取500万银卢布,下令在巴黎交易所抛售他的有价证券,而且还必须请求非正教的伦敦西蒂区老板们给3000万银卢布贷款。

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使俄国深入了欧洲的政治,以致如果它不立即实现关于土耳其、关于“它家门上的锁钥<sup>①</sup>”君士坦丁堡的老计划,那它就永远别去实现这个计划。西欧反革命获得进展,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日益增长,俄国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恶化,迫使它迅速采取行动。不久前,我们看到了在东方问题上新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外交序幕<sup>157</sup>;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场剧的正戏了。

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是一场欧洲战争。这正合神圣俄罗斯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机会在德国站住脚,坚决把那里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人占领纳沙泰尔,最后向革命的中心巴黎进军。

英国在这场欧洲战争中不可能保持中立。它必定要出面反对俄国。英国是俄国的最危险的对手。如果大陆的陆军越来越深入俄国

---

① 1808年6月24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中的用语。——编者注



腹地,那它们必然会因此越来越分散兵力并削弱自己力量,如果它们向前推进,由于有重蹈1812年的覆辙的危险,就必须在旧波兰东部边境上几乎完全停顿下来,这时,英国就可以在俄国最要害的地方给以打击。何况,英国还能迫使瑞典人夺回芬兰,为它的舰队打开彼得堡和敖德萨的通道。大家知道,俄国舰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舰队,占领喀琅施塔得和施吕瑟尔堡同占领圣让达克和圣胡安-德乌卢阿<sup>158</sup>一样容易。但是,俄国失掉了彼得堡和敖德萨,就成了一个被砍掉双手的巨人。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俄国无论在销售原料还是在购买工业品方面离开英国哪怕六个月也不行,这一点在拿破仑大陆封锁<sup>159</sup>时期就表现得很明显,而目前更是如此。俄国断绝同英国市场的联系,几个月后就会陷入极严重的困境。英国则相反,它不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要俄国市场,而且可以从其他市场上获得俄国的各种原料。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决不是那么危险。但是,在德国市民看来,俄国之所以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它直接控制着他们的君主,是因为他们十分正确地预感到:俄国那帮野蛮人很快就会遍布德国并在那里几乎起着救世主的作用。

一般说来,瑞士对神圣同盟<sup>62</sup>的态度,特别像普鲁士议院对它们的国王的态度。所不同的只是,瑞士还有个替罪羊——德国流亡者,它可以将它从神圣同盟受到的打击两倍、三倍地发泄在他们身上,况且,替罪羊没有自卫能力,命运完全由它来摆布。的确,日内瓦、瓦特州和伯尔尼的一部分瑞士“激进主义者”曾经就联邦委员会对神圣同盟和流亡者所奉行的软弱政策提出抗议。但是,另一方面,联邦委员会有权声称它的政策是“绝大多数瑞士人民的政策”,这的确如此。同时,中央政权还继续用非常和缓的方式在内政方面进行小规模的资产阶级改良,如实行关税、币制、邮政、度量衡的统一,这些改革获

得了小资产阶级对中央政权的赞许。固然，中央政权还不敢实行废除服役合同的决议，直到现在每天还有一批批旧州居民到科莫为那不勒斯服兵役<sup>160</sup>。但是，不管瑞士对神圣同盟怎样顺从和献殷勤，它还会受到灾难性的风暴的威胁。在宗得崩德<sup>61</sup>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以后的初次自我陶醉时，一向胆怯的瑞士人竟被人引上采取冒失行动的道路。他们竟敢去做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希望最终能独立自主；他们抛开列强所保证的1814年宪法，而制订新宪法，他们不顾条约的约束，承认纳沙泰尔的独立<sup>161</sup>。为此，尽管他们卑躬屈膝，殷勤效劳和充当警察，仍不免受到惩罚。瑞士一旦卷入欧洲战争，它的处境是很不妙的；如果瑞士得罪了神圣同盟，那么，它在另一方面也还是叛变了革命。

在法国，资产阶级本身为了自己的利益率领了反动势力；在这里，共和政体使反动势力有可能得到最自由、最彻底的发展；在这里，镇压革命采取了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打击接踵而来：恢复直接使半数农业人口破产的酒税，发布让宪兵充当密探甚至去监视官吏的奥普尔通令，发布关于地方官可以任意撤换所有小学教员的教师法，发布关于教士治校的教育法，发布放逐法，在最后这项法令里资产阶级发泄了他们对六月起义者的全部刻骨的复仇欲望，由于不好用其他惩罚手段，就把他们放逐到整个阿尔及利亚那种能彻底致人死命的气候中去。至于从6月13日以来仍然继续大批驱逐无辜的外国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资产阶级的残暴的反动行为的目的自然是恢复君主制度。但是，复辟君主制度遇到了一些王位追求者本身以及在国内支持他们的那些党派的很大的阻力。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两个大体上势均力敌的最强大的保皇派；第三派是波拿巴派，它的力量要弱得多。路

易-拿破仑虽然得了700万张选票,但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派别,只是一个小集团。在共同执行反动政策时,他总是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但是,只要他作为王位追求者的特殊利益一冒头,不仅议会多数派离弃他,而且他的部长也离弃他,凡在这种场合,他的部长都要揭穿他的骗局,尽管如此,还要迫使他第二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可见,他同多数派之间的不和,不管可能引起怎样严重的后果,到目前还只是些可笑的插曲,在这些插曲中,共和国总统总是扮演被愚弄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保皇派都暗自勾结神圣同盟也就可以理解了。《国民议会报》竟无耻到了公开用俄国人来吓唬人民的地步。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路易-拿破仑正勾结尼古拉搞阴谋活动。

反动势力在加强,革命党的力量自然也在壮大。由于土地分成小块、捐税负担沉重以及甚至连资产阶级也认为是纯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的大部分有害捐税,广大农民群众破了产,他们对路易-拿破仑和反动议员的诺言感到失望,投入了革命党的怀抱,声称信仰社会主义,当然通常他们信仰的社会主义还很肤浅,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甚至在正统主义影响最深的省份里,革命情绪也很高涨,在保皇主义和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加尔省最近的选举就说明这一点,在那里当选的是一位红色分子<sup>104</sup>。大资本在商业和政治方面又占居了路易-菲力浦时代那样的地位,深受大资本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也跟着农民走。形势变化如此之大,就连叛徒马拉斯特和小市民的报纸《世纪报》也不得不表示赞成社会主义者。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只是各个阶级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表现,目前这种阶级关系几乎又同1848年2月22日一样了。不过现在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工人清楚得多了,特别是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阶级即农民阶级被卷入了运

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

正因为这样,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试图尽快地废除普选权;即使抛开国际关系不谈,这种必然性又肯定会使革命很快取得胜利。

目前整个局势是多么紧张,从人民代表普拉迪埃提出的可笑的法案中就可以看出,他企图通过国民议会的一项包括约200条款的法令来防止政变和革命。在这里和其他首府,金融巨头如何不相信表面上已经恢复的“秩序”,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各个支系几个月以前把它们的公司合同仅仅延长了一年,——期限这样短,在大规模商业活动的历史纪年中是罕见的。

在最近两年中,大陆上总是忙于革命、反革命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无休止的舌战,而工业发达的英国干的完全是另一种事情:繁荣经济。在这里,1845年秋季按时爆发的商业危机曾经两次中断,一次是在1846年初,由于议会通过自由贸易的决定<sup>162</sup>;一次是在1848年初,由于二月革命<sup>4</sup>。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期间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月革命正是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于大陆市场受干扰而遭到的损失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本来要遭到的损失只是稍多一些。二月革命一度使大陆工业几乎完全停顿,这就帮助英国人轻易地度过了危机的一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海外市场存货的倾销,并且使1849年春季的工业新高涨成为可能。这种高涨——其实它也涉及一大部分大陆工业——最近三个月来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连厂主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光景,这种说法总是出现在危机前夕。工厂的订货非常多,因此都加紧生产,千方百计不执行十小时工作日法<sup>163</sup>,争得更多的工时。所有工业区,都在兴建大批新工厂,同时扩建旧工厂。现金涌入

市场,游资想利用广泛获利的时机,贴现滥用于投机并投进了生产或原料交易,几乎所有商品都绝对地涨价,而一切商品都毫无例外地相对地涨价。总之,英国因其极度的“繁荣”而感到高兴。不过要问一问:这种令人陶醉的光景究竟能维持多久?决不会很久。许多最大的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差不多已经饱和。目前,把商品运往真正的大市场,就不如运往世界贸易的集散地有利,从那里可以转运到最有销路的市场去。由于1846—1847年,特别是1849年英国工业的巨大生产力比1843—1845年又有了增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其余的市场,特别是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饱和。随着关于市场饱和的最初消息一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领域里引起“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同大陆的重大冲突一起爆发,其后果将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都是一个信号,表明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以及再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和金融资产阶级,而这次危机将标志着英国现代革命的开端,在这场革命中,科布顿将扮演内克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谈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仅仅过了差不多18个月,现在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甚至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还要大得多。在三百三十年中,欧洲同太平洋的全部贸易一直是以非常感人的耐性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进行的。所有打通巴拿马地峡的建议都因贸易国的偏见和猜忌而搁浅。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仅过了18个月,美国佬就已经着手修建铁路、宽阔的国家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格雷斯,从巴拿马到圣弗朗西斯科已经有轮船定期航班;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一条跨越30个纬度的海岸是世界

上最美丽最富饶的海岸之一，以前几乎荒无人迹，现在正迅速地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这里稠密地居住着一切种族的人：从美国佬到华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人，从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近代是英国，而目前则是北美半岛南半部。旧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像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败，如果不愿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就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再过几年，我们就将有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格雷斯、从查格雷斯和圣弗朗西斯科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国的不断努力，将使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晚，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变革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弥补地理上的不利条件。

最后，再谈一件由著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从中国带回来的有

代表性的新鲜奇闻。这个国家的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难以忍受。后来英国人来了，夺得了在五个口岸自由通商的权利。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当郭士立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定会看见上面写着：

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1850年1月31日于伦敦

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愿望实现了：“荣誉的人”已经在使他“能用这部宪法实行统治”的条件下宣誓效忠宪法。在2月6日以后的短短几天中，两院的资产者就已经完全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他们在2月6日以前曾经说过：我们必须作出让步，只要国王宣誓效忠宪法；宣誓一结束，我们就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而2月6日以后他们却说：宪法已经通过宣誓，我们有了一切可能的保障，因此我们就完全可以放心让步了。需要1800万军费用来动员50万士兵以对付至今还不知道是谁的敌人没有辩论，没有反对，就几乎一致同意通过；预算经过四天就表决了。一切政府提案转眼间就由两院通过。可见，德国资产阶级依然如故，并不缺乏怯懦，也不缺乏这种怯懦的口实。

好心的两院使普鲁士国王有充分的机会去领会立宪制度同专制制度相比具有怎样的优点，不仅对被统治者来说而且对统治者来说都具有这样的优点。如果回忆一下1842年至1848年的财政困难情况就会看出极鲜明的对照：1842年，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银行借贷均一无所得，遭到路特希尔德的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与此相比1850年的财政就大为宽裕——两院同意弥补三次预算中的7000万赤字，大量发行债券和国库券，政府同银行的关系比任何时候政府同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3400万批准作为储备贷款！

因此，根据陆军大臣的言论来看，普鲁士政府认为迫使它动员全



部军队来维护欧洲的“秩序和安宁”的事件是有可能发生的。普鲁士通过这个声明十分响亮而明确地宣布，它将重新参加神圣同盟。新的十字军远征的敌人是谁，这是很明显的。无政府状态和暴乱的中心巴比伦<sup>①</sup>务必消灭。直接进攻法国，还是首先佯攻瑞士和土耳其，几乎完全取决于巴黎局势的发展。不管怎样，普鲁士政府现在有经费足以在两个月之内把兵力从18万扩充到50万；40万俄国兵在波兰、沃伦和比萨拉比亚严阵以待，奥地利至少有65万现役军人。光是为了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俄国和奥地利就必须在今年发动一场侵略战争。至于这次远征的矛头首先指向谁，新近发表的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说明了这一点。

《瑞士国民报》在最近一号上发表了一篇据说是奥地利的雪恩哈尔斯将军所写的条陈，其中有侵略瑞士的全面计划。计划的要点如下：

普鲁士在美因河畔靠近铁路集结了六万人左右；黑森人，巴伐利亚人和符腾堡人组成的一个军团，一部分集中在罗特韦尔和图特林根一带，一部分集中在肯普滕和梅明根一带。奥地利在福拉尔贝格和通往因斯布鲁克一带陈兵五万并在意大利的塞斯托卡伦代和莱科之间组成第二个军团。同时，用外交谈判稳住瑞士。进攻的时机一到，普鲁士人就迅速沿铁路线开往勒拉赫，小股兵力则开赴多瑙埃兴根；奥地利人分布在布雷根茨和费尔德基希一带，而意大利军队则集结在科莫和莱科一带。一个旅留在瓦雷泽一带，以威胁贝林佐纳。各国使节提出最后通牒，并撤离瑞士。军事行动开始，主要借口是恢复1814年的联邦宪法和宗得崩德各州的独立。进攻集中在卢塞恩。普鲁士人经过巴塞尔向阿尔河推进，奥地利人经过圣加仑和苏黎世向利马特河挺进。前者部署在从索洛图恩到楚尔察赫一带，后者部署在从楚尔察赫经过苏黎世到乌茨纳赫一带。同时调遣15 000名奥地利人经过库尔向施普吕根山口进逼，同意大利军团会

① 意为“祸根”。——编者注

合,然后都经过莱茵河上游河谷向圣哥达山口进击,在那里再同经过瓦雷泽和贝林佐纳的军团会师,并策动各个奠基州起义。这时,主力部队同经过沙夫豪森的一些小股兵力会合,向前推进并占领卢塞恩,以切断这些州同瑞士西部的联系,从而把绵羊同山羊分开<sup>①</sup>。同时,根据“1月30日的秘密协定”务必在里昂和科尔马一带部署六万军队的法国,就用以往占领罗马的同样的借口去占领日内瓦和汝拉山区。因此,伯尔尼就守不住了,“革命”政府或者被迫立刻投降,或者同自己的军队一起饿死在伯尔尼高原。

看来,这个计划的确不坏。它周密地考虑到了地理条件,提出了先占领比较平坦和富饶的瑞士北部,用联合的主力部队夺取瑞士北部现有的唯一重要阵地,即阿尔河和利马特河的对岸阵地。这个计划的优点在于,它预定切断瑞士军队同产粮区的联系,暂时把交通不便的山区留给瑞士军队。因此,这个计划可能在初春实现,计划实现得越早,被困在高山区的瑞士人的处境就越困难。

上面所谈的文件究竟是违背作者的意愿发表的,还是蓄意让某一家瑞士报纸发现后去发表而编写的,单凭事情本身很难判断。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其目的完全在于促使瑞士人迅速而大量地征兵,从而造成国库空虚,使他们越来越顺从于神圣同盟,使关于神圣同盟国家意图的舆论完全发生错误。目前在大肆宣扬俄国和普鲁士的备战并宣扬对瑞士的作战计划,似乎说明了这个情况。条陈本身有一句话也是这个意思,其中建议在各参战部队集结和出动之前,一切军事行动应以最快速度进行,以便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另一方面,事情本身有许多证据也说明,这个条陈是真的,确实有过这个侵略瑞士的计划。

---

<sup>①</sup>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第32节,把绵羊同山羊分开,意指把好人同坏人区别开来。——编者注

有一点是肯定的：神圣同盟在今年还要进军，或者先进攻瑞士或土耳其，或者是直接进攻法国，在这两种场合下，联邦委员会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不论是谁先来到伯尔尼，是神圣同盟还是革命，联邦委员会由于采取怯懦的中立态度，都将导致它自己的灭亡。反革命不可能满足于联邦委员会的让步，因为它本身或多或少是革命的产物；革命一刻也不能容忍在欧洲的心脏里，在三个最热中于运动的国家中间存在这样一个背叛的怯懦的政府。处于当代大国包围中的小国所谓的“独立”和“自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点瑞士联邦委员会的所作所为提供了极其明显的例子，但愿这是最后的例子。<sup>①</sup>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1月底—2月底之间

载于1850年2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① 关于法国最近发生的事件，参看这一期《评论》上发表的那篇1848—1849年的文章的有关部分。关于实际上取消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将在下一期的一篇专文中加以论述。

弗·恩格斯

## 十小时工作日问题<sup>164</sup>

工人阶级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sup>108</sup>的论据时,往往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有人冷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即充当主人可以随使用来使资本更加增光和使资本更快积累的东西,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延续下去,而身受傲慢的爱钱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蹂躏、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么,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激情、革命义愤,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支持工人中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抗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冲天大怒,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平气和的争论中,即使在自鸣得意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厚颜无耻地断言,现代社会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他们今后还能不能靠工人的血汗来积累财富,对此我们只想说一句话。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

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来粉饰的:教士、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自由贸易论者蛮横宣称:“你们工人是奴隶,并将永远做奴隶,因为只有你们当奴隶,我们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因为你们不做奴隶,我们这个国家统治阶级就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于是,压迫的秘密现在终于揭开了;现在幸亏有自由贸易论者,人民才终于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处境;现在问题终于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因此,我们认为公开的敌人比虚伪的朋友好,蛮横的自由贸易论者比伪善的贵族慈善家好,贵格会会士<sup>165</sup>布莱特比阿什利勋爵好。

十小时工作日法<sup>163</sup>经过议会、讲坛、报刊、工业区的每一个工厂和作坊中历时40年的激烈的长期斗争,已经通过了。一方面有人描绘了令人心碎的情景:谈到儿童成长受阻碍,他们受到残害;谈到妇女抛开家务和幼儿的情况;谈到整整几代人都染上了慢性病,谈到无数的人失去了生命,谈到在整个国家人们的幸福都已经破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本来就已经非常富有的一小撮人发财。这里没有丝毫的捏造,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铁的事实。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敢于要求消灭这种丑恶的制度;而只是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家,即靠这个制度发财的人所雇用的奴仆,他们用一系列的像比例的运算法则那样无可辩驳的和严格的推论来证明,不能以任何方式触及现行制度,否则将遭到“国家毁灭”的惩罚。

应当承认,工厂工人的维护者根本不能驳倒政治经济学家的论

据,甚至未必敢于驳斥这些论据。这是因为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只要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许多人都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则这些论据就像对方提出的许多其他事实一样,是无可辩驳的。是的,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英国及其人口中的各阶级完全离不开本国工业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在现存制度下完全离不开毫无限制的买卖自由,离不开从国家的各种资源中吸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的确,在现存的制度下,保证现在帝国赖以生存的这种工业繁荣的唯一办法就是每年都要开支减少而生产增加。可是,怎样才能减少开支而增加生产呢?首先是使生产工具即机器和工人今年比去年工作得更多;第二,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来代替以前所采用的普通生产方法,即用改良了的机器来代替人;第三,降低工人的费用,降低他们的生活费用(谷物的自由贸易等等)或者干脆把他们的工资降到最低的水平。可见,不管怎样,总是工人吃亏;可见,只有以英国工人的死亡作为代价才能挽救英国!这就是机器进步、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外竞争给英国造成的状况和必然结果。

可见十小时工作日法,从它本身和作为最终措施来看,毫无疑问是个骗人的手段,是不高明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它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根苗<sup>166</sup>。这个法一方面没有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它的发展。十小时工作日法不是使这个制度迅速发展 to 极限,发展得使统治阶级发现它的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使统治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使社会革命无法避免,而是竭力硬使社会退回到早已让位给现存制度的过去阶段。只要观察一下不顾自由贸易论者的反对而迫使议会通过这个法的那些政党,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是不是工人阶级掀起风潮,用自己的威胁行动争得这个法的呢?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工人多年以前就争取到宪章<sup>167</sup>了。而且曾

经在工人当中领导缩短工作日运动的那些人决不是可怕的革命者。他们大部分是忠实于教会和国王的温和的和体面的人物。他们对于宪章运动敬而远之,而对于一种温情的保守主义却大多心向往之。他们从来没有使任何一个政府感到畏惧。通过十小时工作日的,是自由贸易的反动敌人,是结为同盟的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殖民地各公司和航运公司的代表,即联合起来的贵族和自己害怕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通过这个法是不是出于对人民的某种同情呢?决不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靠掠夺人民为生的。他们虽然不那么露骨,比较温情,但是同厂主完全一样坏。他们不愿意被厂主排挤掉,所以出于对厂主的憎恨而通过了这个法律,以便赢得人们的同情并且阻止厂主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十小时工作日的通过并不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为所欲为。

从那时起,厂主实际上保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议会在谷物贸易和海运方面强迫实行自由贸易。土地所有者和航运公司的利益由于厂主这颗初升的明星而遭到牺牲。厂主的势力越强大,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束缚就越头痛。他们开始公开破坏这个法案:他们恢复了轮班制<sup>168</sup>,迫使内务部颁发指令,让工厂视察员不去追究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当对他们的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使他们无法容忍某些讨厌的视察员的批评意见时,他们就把问题提到财务法院<sup>169</sup>,而财务法院仅仅以一纸判决就完全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

厂主只需靠短时间的“繁荣”和“需求的增长”,其日益强大的势力就使40年宣传的成果毁于一旦。英国的法官证明说,他们和教士、律师、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管是土地贵族阶级,是金融贵族阶级还是厂主贵族阶级)雇用的奴仆。

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呢？难道我们主张保存靠榨取妇女和儿童的血汗和脂膏而发财的那种可恶制度吗？当然不是。我们不但毫不反对，我们甚至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一天，为了不让妇女和儿童劳动过度，将采取远比十小时工作日法，甚至比八小时工作日法更严格得多的措施。但是，我们以为，1847年通过的法，并不是由工人阶级通过的，而是由他们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上的反动阶级通过的，由于继这个法之后并没有任何其他措施来彻底改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个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

尽管十小时工作日法不再存在了，但是，工人阶级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得益者。工人阶级尽可以让厂主得意于一时，而最终得意的将是工人阶级，厂主将会感到悲痛。因为：

第一，多年来为宣传十小时工作日法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在这种宣传中，工人阶级得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懂得自己力量之所在。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起初强过百倍。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聚集；现在它是知道自己强壮的、充满力量的机体，这个机体已经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而且很快就会成为第一。

第二，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他们要获得任何持久的利益，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工人现在应当懂得，他们要保障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唯有通过普选权，普选权能使他们形成下院中的工人多数。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的破坏会给民主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



第三,1847年的法律实际上被废除,会使厂主染上严重的生产过剩寒热病,以致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现存制度的一切资料和资源都将很快耗尽,使革命无法避免,这次革命使社会得到比1793年和1848年时更深刻得多的改造,因而将使无产者很快取得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我们已经看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工业资本家的统治是密切联系着的,而这种统治又取决于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扩大生产有一定的限度,它不可能摆脱现有市场的限制。当扩大生产超出了现有市场的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引起破坏、破产和贫困。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危机,以往由于开辟了新市场(1842年开辟的中国市场)<sup>①</sup>或者更好地开拓旧市场以及通过降低生产费用(例如通过实行谷物自由贸易)都安然渡过了。但是,这也是有限度的。新市场现在已经再也无法开辟了,而要进一步降低工资也只有一个办法,即实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通过取消国债来减少税收。如果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老爷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走这条路,或者如果这种暂时办法在一定的时候也将用尽,那么生产过剩就会置他们于死地。很明显,在需要不断扩大生产的制度下,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厂主老爷的统治就会完结。以后将怎样呢?自由贸易论者说,将是“天下大乱”。我们说,将是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英国工人们!假使你们、你们的妻子和儿女将重新被关进十三小时工作日的“笼子”,你们也不必悲观失望。这杯酒虽然苦,但是必须喝下去。你们经历这件事越快就越好。你们可以相信,你们那些傲慢的厂主虽然取得了对你们的所谓的胜利,但是却为自己掘好了

<sup>①</sup> 见本卷第304—305页。——编者注

坟墓。十小时工作日法实际上被废除,是一个大大加速你们解放时刻到来的事件。你们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弟兄们决不满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他们要求彻底摆脱资本的暴虐无道的压迫。而你们,在机器、技能和相对人数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实力去求得自己的解放和为你们大家生产足够数量的财富——你们当然不会满足一些小恩小惠。这样你们不要再要求实行“劳动保护”,而应当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而使你们有可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劳动。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2 月  
9 日—大约 20 日之间

载于 1850 年 3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启 事<sup>170</sup>

《新莱茵报》第一期的出版延期了，其原因不在编辑部。因此，第二期最迟将在第一期出版后两星期出版，其中将包括以下几篇文章：

卡尔·马克思：1848—1849年。二、1849年6月13日。三、六月十三日对大陆的影响。四、英国的现状。<sup>171</sup>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三、普法尔茨。四、为祖国捐躯。<sup>172</sup>

第三期的主要文章有：

卡尔·马克思：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财产？二、地产——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sup>32</sup>所作的讲演。<sup>173</sup>

威·沃尔弗：德国议会的最后几天。<sup>174</sup>

普鲁士的财政状况，<sup>175</sup>等等。

本编辑部将负责使杂志今后于每月 1—10 日出版。

编辑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2 月

载于 1850 年 1 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1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德国来信<sup>40</sup>

普鲁士国王宣誓效忠宪法和  
“侍奉上帝！”——神圣同盟的  
大阴谋。——日益临近的对瑞士的  
进攻。——征服和瓜分法国的计划

1850年2月18日于科隆

普鲁士国王陛下终于宣誓效忠所谓的“宪法”了<sup>151</sup>。这场君主的闹剧，要不是有一个演讲的机会，无疑是不会上演的。喜好演讲的陛下，为了能够演讲，决定强咽下这个宣誓，就像他过去当着众人的面强咽过不少令人不快的东西那样，例如，大家都知道，1848年3月19日柏林人曾对他高喊“脱帽<sup>176</sup>！”宣誓没有什么意思。一个国王，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宣誓有什么用！演讲是主要的，而且这是一篇精心雕琢的演讲。请设想一下这样的场面，普鲁士国王陛下在十分严肃地宣称，他是一个正派的人，并且准备拿出他最宝贵

的东西，即国王的保证！而他以及在会场上的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发出笑声。但是，在他使用了许多异想天开的辞令之后，继续说，他提供这种保证只有一个条件：使他能够用这个宪法进行统治和实现他三年前许诺的“我和我全家将侍奉上帝”<sup>①</sup>。

这个新式的“正派人”所谓用宪法统治和侍奉上帝是什么意思，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这次宣誓闹剧之后，陛下的大臣们一是提出了两项几乎完全废除新闻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公众集会权利的法律；二是提出了拨1800万美元（250万镑）用于扩军。这意思很清楚。首先逐一消灭这个精心雕琢的宪法废品留给人民的寥寥无几的假自由，然后使军队达到战时编制，并同俄国和奥地利一起去进攻法国。资产者的两个议院无疑会赞同这一切，从而使国王能够用宪法进行统治，并且同他全家一道侍奉上帝。

只要把普鲁士“为了应付可能在春天发生的意外事件”而举借的军事贷款同神圣同盟<sup>62</sup>的其他措施联系起来，我们就能看穿他们的阴谋。除了上述的1800万以外，普鲁士还正在以修建大规模的东方铁路为借口商谈1600万贷款。从俄国贷款一事以来，你们都很清楚，为修建铁路筹款成了神圣同盟各国政府的极好借口。这一来，普鲁士将很快弄到500万镑，全部将由陆军部支配。俄国除了已经弄到的500万镑以外，正准备签订另借3600万银卢布即500万镑的协定。唯有奥地利在不久前设法筹款的可怜结局之后，不得不满足于它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数目。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它的

---

<sup>①</sup> 1847年4月1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普鲁士联合议会开幕时的御前演说，见1847年4月12日《普鲁士总汇报》第101号。——编者注

赤字实际上一年已经达到 2 亿弗罗伦(2 000 万镑)! 可见,俄国和普鲁士筹款是为了打仗,奥地利则是为了筹款不得不打仗!

无疑,如果法国不发生麻烦,下个月就要开始发动对瑞士<sup>①</sup>,或许还对土耳其的“神圣”战争。俄国在波兰及其邻近地区驻有 35 万随时准备出动的军队。它已经订购了大批食物,规定在下个月交货,但不是送往波兰,而是送往普鲁士的但泽。普鲁士军队——现在大约有 15 万人——通过征召后备军和第一类战时后备军,一个月内就可以扩充到 35 万人。奥地利军队——大约 65 万人——从未缩减过,相反,由于收容匈牙利战俘而扩充了。这些可用于对外作战的兵力总数大约是 100 万人,但是三分之二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都染上了民主病,一有机会就很可能转到另一边去。

进攻瑞士的第一个借口是那个国家里居住着德国流亡者。这个借口很快就不会存在,因为联邦政府出于怯懦而进行的迫害直接或间接地强迫所有流亡者都离开瑞士。目前在这个国家里大概还有 600 名德国流亡者,他们也将不得不很快离去。可是还有另一个借口——普鲁士要求恢复普鲁士国王在前公国纳沙泰尔的权力,这个公国在 1848 年成为共和国<sup>161</sup>。即使这个要求满足了,根据新的联邦宪法又会发生宗得崩德<sup>61</sup>问题,这个新宪法在 1848 年取代了神圣同盟所保障的 1814 年的旧反动协议。因此,瑞士是无法逃脱这场战争和外国占领的。

但是,神圣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和瓜分法国。为立即结束这个伟大的革命中心而拟定的计划如下:法国一旦被征服,将划分成三个王国——西南部的王国或叫阿基坦(首府为波尔多),将交给波尔

---

① 见本卷第 384 页。——编者注

多公爵昂利<sup>①</sup>；东部的王国或叫勃艮第(首府为里昂)，将交给茹安维尔亲王，而北部的王国或叫法兰西本土(首府为巴黎)，将送给路易-拿破仑，以奖励他为神圣同盟立下的卓越功勋。这样，法国就被弄成几世纪前的四分五裂的老样子，变得毫无力量。这个美好的计划无疑是从普鲁士国王的“历史”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你们对此能说些什么呢？

但是，请相信，神圣同盟在筹划时没有予以考虑的人民，很快就会制止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只要神圣同盟开始实现自己的计划，人民立刻就会加以制止。因为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人民都十分警惕，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一旦要进行全面的、决定性的和公开的斗争，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压倒自己的一切敌人。那时民主的敌人将恐惧地看到，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同那场将烧光欧洲的旧制度并照耀着胜利的各民族走向自由、幸福和光荣的未来的燎原大火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2月

18日

载于1850年3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1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① 昂·尚博尔伯爵。——编者注



## 弗·恩格斯

### 法国来信<sup>50</sup>

#### 时代的象征。——预期中的革命

1850年2月19日于巴黎

我不得不把这封信的篇幅稍加限制,不过,一个月来所发生的事件历历在目,所以都已经不言自明了。革命来得这么快,任何人都一定看到它已经迫近。在社会的所有领域,无不在谈论它的临近,所有外国报纸,甚至敌视民主的,也都声言不可避免。而且,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言:如果没有意外事件改变社会事态的发展,在联合起来的秩序党人和绝大多数人民之间发生严重的对抗,看来,不会晚于今年春末。而这一对抗的结局是不容怀疑的。巴黎民众都确信,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革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因此在他们当中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避免一切细小冲突,凡不涉及你的切身利益的一概听之任之!”因此,在前几天砍倒自由之树<sup>109</sup>的时候,政府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仍没有能挑起工人的哪怕是零星的街头骚乱。而围着圣马丁门的自由之树跳舞的人们——你们的《伦敦新

闻画报》把他们的样子画得叫人非常害怕——乃是警察局的一帮密探，他们由于人民沉着冷静而白忙了一天。因此，本月 24 日<sup>①</sup>将会太太平平地过去，尽管政府报纸说得恰恰与此相反。政府准备使用几乎所有的招数来使巴黎发生骚乱，并且在外省制造一些假的密谋和起义，以便在首都和那些因递补在凡尔赛被判罪的议员<sup>177</sup>而定于 3 月 10 日补选新议员的省份实行戒严。下面简略地谈谈新的军事独裁体制。为了控制各省，政府发明了一种新的统帅体制。它把法国 17 个军区合并为 4 个大军区，各由一个将军统辖；这样一来，这个将军就几乎拥有东方暴君或罗马地方总督的无限权力。这 4 大军区是这样分布的，它们好似一道铁箍，把巴黎和整个法国中部团团围住，以便控制。然而，采取像这样的非法措施，不仅是针对人民，而且也针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现在正统派<sup>67</sup>和奥尔良派<sup>80</sup>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路易-拿破仑为他们服务得很糟。他们所以需要他，只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用过之后可以扔掉的工具。而今他们看到，他在为自己追求皇位，而且进展得比他们所希望的要快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目前君主制没有希望，他们必须等待时机；可是路易-拿破仑却竭尽全力要把事情搞到底，并且宁愿冒险进行可能会要他脑袋的革命，而不愿等待时机。他们也知道，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奥尔良派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优势，使他们中哪一派的胜利已成为无可争辩的必然；正像 1848 年 12 月 10 日以前那样，他们需要有一个能在他们等待事态发展的时候按照两派共同的利益治理国家的新的中立人物。于是，这两派，即秩序党人仅有的两大派别，现在都反对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总统任期，尽管四个月以前他们

---

① 指 1848 年二月革命两周年。——编者注

会为了争取到这一点而拚其全力；他们这一次又重新主张共和国建立在中立的基础上，让尚加尔涅将军当总统。看来尚加尔涅也参与了密谋。拿破仑不信任尚加尔涅，但又不敢免去他巴黎的地方总督职务，于是在他的周围设置了4个军区像镣铐一样地钳制他。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多数人能够极其耐心地听帕斯卡尔·杜普拉先生（曾叛卖1848年六月起义，而现在重又在猎取名声了）反对新军事体制和反对路易-拿破仑本人的演说。<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两起很妙的事。据一家报纸的报道，当杜普拉先生谈到路易-拿破仑只能或者选择他伯父<sup>②</sup>的立场，或者选择华盛顿的立场时，会场左边有人喊道：“或者选择海地皇帝苏路克的立场！”<sup>③</sup>把法国皇位争取者比作一个给巴黎所有的《喧声报》提供笑料最多的人物，引起哄堂大笑，甚至议会议长<sup>④</sup>都未加制止。请看，连那高贵的多数派对路易-拿破仑也这样看！这时陆军部长<sup>⑤</sup>站了起来，朝着会场左边发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在结束时说道：“现在，先生们，如果你们愿意开始干，我们准备奉陪！”<sup>⑥</sup>部长的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向诸位表明，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场激烈的斗争。

这时，社会民主派正积极地准备选举。尽管在巴黎约有6万工人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已经被从选民名单中勾掉了，“正直的和温和

---

① 帕·杜普拉1850年2月16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见1850年2月17日《总汇通报》第48号。——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③ 1850年2月17日《总汇通报》第48号。——编者注

④ 安·杜班。——编者注

⑤ 阿·奥普尔。——编者注

⑥ 见本卷第412页。——编者注

的”人们只有一两个候选人可能当选,可是,毫无疑问,在各省,社会主义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政府本身预料到这一点。因此,它已经拟定了一项措施准备废除现在被公开地称作“普选权”阴谋的东西。它打算实行间接选举,由选举人选举数目有限的复选人,再由他们提出代表。这样,政府才有把握取得多数的支持。但是这等于公开推翻宪法,宪法在1851年以前是不能修订的,而且不能由为此目的选出的议会来修订,因此政府可以预料到人民会强烈反对。这就需要外国军队来吓唬人民,这些军队应该在提案提交议会时出现在莱茵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发生的话——看来,路易-拿破仑愚蠢得会冒险干出这种勾当——,那你们可以期望听到如同革命风雷那样的事件。而那时,就让上帝宽恕所有的拿破仑、尚加尔涅、秩序党人之流的灵魂吧!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2月  
19日

载于1850年3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1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弗·恩格斯

## 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sup>178</sup>

英国工人遭到了重大的失败,而且这失败是来自他们最料想不到的方面。英国四个最高法院之一——财务法院<sup>169</sup>在几个星期以前作出了判决,实际上等于废除了1847年颁布的十小时工作日法<sup>163</sup>中的主要规定。

十小时工作日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英国阶级对立发展的特殊形式,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大家知道,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前所未有的、无限制的无耻剥削。新机器使成年男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看管机器需要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比男人更适合做这种工作,而且比男人更便宜。于是工业剥削立即殃及工人的整个家庭,把他们禁锢在工厂里;妇女和儿童必须日以继夜不停地做工,直到体力耗尽累垮为止。在越来越需要儿童的情况下,习艺所<sup>76</sup>里穷人的孩子就完全成了交易对象。他们从四岁起,甚至从三岁起,就用签订学徒合同的形式被大批地拍卖给出价高的厂主。在那个时期儿童和妇女受到无耻而残酷的剥削,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条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厂主就不会放松剥削;英国老一代的工人对这种剥削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中许多人弯曲的脊背或残缺的肢体使他们总是想起过去,他们的健康

已经完全毁坏了。最坏的美国种植场里的奴隶的命运,比起当时英国工人的命运来简直是非常美好的。国家很早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厂主们肆无忌惮的疯狂剥削,因为这种剥削践踏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求。但是,最初规定的法律限制是极不完备的,并且很快就被绕了过去。只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建立大工业以后,工业发展的潮流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到了1833年,才有可能实施一项有效的法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早在本世纪初,在一些慈善家的领导下,创建了一个党派,它要求在法律上将工厂每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10小时。这个政党20年代在萨德勒的领导下,他死后在阿什利勋爵和理·奥斯特勒的领导下从事宣传,并且一直到十小时工作日法真正实施为止,除了工人本身它还逐步把贵族和一切敌视厂主的资产阶级派别都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工人同英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极其反动的分子的联合,必然使十小时工作日的宣传完全脱离工人的革命宣传。诚然,宪章派<sup>179</sup>是一致赞同十小时工作日法的;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的所有会议上,他们是基本群众,发出共同的声音;他们让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使用自己的报刊;但是没有一个宪章主义者正式同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十小时工作日拥护者采取联合行动,或者是成为曼彻斯特的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Short - Time - Committee)的成员。该委员会完全由工人和工厂监工组成。但是,这些工人都是意志消沉、被劳动摧残得精疲力竭的人,他们沉默寡言、笃信上帝、老实正派,他们对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抱有敬畏的心理,对国王和宗教表现出相当的尊敬;他们对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显得软弱无力,他们只会在贵族面前卑躬屈膝,因为至少承蒙贵族还屈尊体恤他们的疾苦。这帮十小时工作日拥护者的工人保守主义反映了工人最初对工业进步所持的反对立

场：他们试图恢复旧日的宗法状态，他们在采取最激烈的行动时也不过是破坏机器。主张十小时工作日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脑们同这些工人一样，也是反动的。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感伤主义的托利党<sup>145</sup>人，大多数是入迷的玄学家，他们非常怀念被消灭了的宗法制的隐蔽剥削，怀念伴随这种剥削而来的笃信宗教、依恋家庭、崇尚美德和恪守陈规，怀念那种固定不变的世代相传的状况。这些目光短浅的人一看到产业革命的漩涡，就头晕目眩。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感由于面对新的像魔术一般突然增长起来的生产力而感到惶惑，因为这种生产力在几年之内就清除了以前社会中那些最受尊崇、最不可侵犯和最重要的阶级，而为一些新的、没有听说过的阶级所代替，它们的利益、情感、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是同英国旧社会制度相矛盾的。这些好心的玄学家从不放过机会，从道德、人性和同情心的角度反对赖以完成这种社会变革过程的残酷无情和肆无忌惮，而提出已经气息奄奄的宗法制度的稳定、安适和礼仪作为社会的理想，来与社会变革相对抗。

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引起公众关注的时期，社会上所有自身利益受到产业革命损害、生存受其威胁的派别都同上述这些人联合了起来。银行家、证券投机商、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个时期都日益在十小时工作日的宣传者的领导下联合起来。

十小时工作日法给这些反动的阶级和派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使它们进而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这个法虽然大大阻碍了厂主的财富、影响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但是，工人得到的，仅仅是一种物质利益，而且只是对身体有好处。它使工人的健康免于过快地毁坏。但是，它没有给工人提供什么东西，可以使

工人危及自己的反动同盟者；既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权利，也没有改变他们身为雇佣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反，十小时工作日的宣传经常使工人受他们的有产阶级同盟者的影响，有时甚至受他们领导，而自从实施改革法案<sup>147</sup>和出现宪章派的宣传以来，工人们就越来越力求摆脱这种领导。工人仅仅在同工业资产者进行直接斗争的时候，联合不直接剥削他们、也反对工业资产者的贵族以及资产阶级其他派别，特别是在产业革命的初期，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联盟扭曲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使之掺杂了很大的反动成分，只是现在反动成分才逐渐消失；这种联盟大大加强了工人运动中的反动分子的地位，即加强了这样一些工人，例如手工织工的地位，他们的生产部门仍然属于手工操作，因而受到工业进步本身的威胁。

在 1847 年，在所有旧的议会政党都已经瓦解而新的政党还没有形成的混乱时期，最终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这对工人来说是件幸事。这个法经过了一系列混乱的显然仅仅由偶然性所左右的表决才被通过，在表决时，除了以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为一方和热中于保护关税的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以外，没有一个政党的投票是一致的和一贯的。通过这个法是贵族、部分皮尔分子<sup>180</sup>和部分辉格党人<sup>146</sup>给厂主一个难堪，为的是对厂主在废除谷物法<sup>162</sup>方面获得重大胜利进行报复。

十小时工作日法不仅满足了工人身体上不可缺少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受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健康，而且它还使工人不同感伤主义的玄学家为伍，不同英国一切反动阶级合作。自从十小时工作日法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热门话题以来，像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的关于宗法制的空谈和阿什利勋爵这种人表示同情的娓娓动听的保证，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全集中



力量去实现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以作为彻底变革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不久以前还是工人的同盟者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现在成了工人的凶恶敌人,成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反对工人了。

通过产业革命,英国赖以夺取和征服世界市场的工业,成了英国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英国的成败取决于它的工业,盛衰取决于工业的起落。由于工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工业资产者即厂主就成了英国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阶级;工业家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清除一切阻碍大工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成为必然的了。工业资产阶级采取了行动。从1830年到现在的英国历史,就是工业资产阶级接二连三战胜它联合起来的反动敌人的历史。

正当法国七月革命使金融贵族获得统治的时候,英国在这以后不久,于1832年所通过的改革法案却使金融贵族垮了台。银行、国家债权人和证券投机商,总之,借给贵族巨额款项的金融商人,直到那时候在垄断选举的五光十色的幌子下几乎单独统治了英国。大工业和世界贸易越向前发展,他们的统治虽然作出了一些让步;仍然变得越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其他所有派别同英国无产阶级和爱尔兰农民结成联盟,推翻了金融商人。人民以革命相威胁,资产阶级大量向银行兑换银行券,致使银行濒于破产。金融贵族及时作了让步,它的让步使英国避免了一场二月革命。

改革法案使国内一切有产阶级,直到最小的小店主都能参与政权。资产阶级各派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基地,借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法国,资产阶级各派从1848年六月胜利时起在共和国内相互间进行的斗争,在英国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也在议会里进行了。不言而喻,由于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不同,产生的后果也就不同。

工业资产阶级既然靠改革法案取得了进行议会斗争的场所,就必然能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它通过限制领干薪的职位<sup>181</sup>,使依附于金融巨头的贵族遭受损失,通过 1834 年的济贫法<sup>182</sup>使穷人受到损失,通过降低税率和实行所得税使金融巨头和土地所有者丧失免税的利益。随着工业家取得胜利,他们的附庸增多了。大大小小的贸易都得向他们缴纳贡税。伦敦和利物浦都拜倒在自由贸易这个工业家的救世主的脚下。但是,随着他们取得胜利,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欲望也增加了。

现代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机器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挤压,迫使现代大工业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但是,工业的扩大取决于市场的扩展。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水平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展市场要迅速得不知多多少倍,于是便出现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过剩,商业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滞;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的销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英国是这种危机的中心,这种危机所产生的瘫痪性的影响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到处都有很大一部分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到破产。此外,这种危机再清楚不过地向英国社会的各部分人表明了他们对厂主的依存关系,要克服这种危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拓宽市场,或者夺取新市场,或者充分利用旧市场。如果撇开为数不多的特殊情况不谈,如 1842 年用武力冲开中国这个一向顽固、闭关自守的市场<sup>①</sup>,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途径

<sup>①</sup> 见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条约》。——编者注

开辟新市场并且充分利用市场，也就是降低价格，即减少生产费用。减少生产费用的途径是采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减少利润或者降低工资。但采用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并不能避免危机，因为这会增加生产，从而本身就需要新的市场。在危机时期谈不到降低利润，因为在这个时期即使折本出售谁也都愿意。工资也是一样，而且工资同利润一样，是由不以厂主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规律支配的。但是工资毕竟是生产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持续降低工资是拓宽市场和避免危机的唯一办法。但是，只有廉价地生产出工人的生活必需品，工资才会降低。而英国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对谷物、英国殖民地产品等等征收保护关税以及实行间接税而价格昂贵。

因此，工业家们不断地普遍大力宣传贸易自由，特别是废除谷物税。因此，就出了这样特别的情况：从1842年起每一次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都给他们带来新的胜利。废除谷物税使英国的土地所有者成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食糖等等的差别关税使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成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航海条例<sup>183</sup>使船主成了工业家的牺牲品。这时他们鼓吹限制国家开支、减少赋税以及准许最可靠的那一部分工人享有选举权。他们想把新的同盟者拉入议会，以便更快地取得直接的政治统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统治，他们才能清除已经失去意义但却花费很大的那些英国国家机器上的传统附属品，如贵族、教会、领干薪的职位、半封建的法律体系等。正是现在，不久即将爆发的新的商业危机，根据各种迹象来看，将会同大陆上重大的新冲突同时出现，毫无疑问，这次危机至少会给英国的发展带来上述进步。

正当工业资产阶级这样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反动的派别却顺

利地用十小时工作日法的锁链把它束缚起来了。这个法既不是在繁荣时期也不是在危机时期,而是在两者之间的那个时期通过的,在这个时期工业还深受生产过剩后果之苦,以致只能动用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因此厂主本身也不让整天开工。在十小时工作日法限制了厂主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它才被接受。但是,这样的时期很快就为新的繁荣时期所代替。空荡荡的市场需要重新供应商品;投机倒把又重新猖獗,使得需求倍增;厂主来不及制造产品。现在十小时工作日法已经变成了工业无法忍受的桎梏,因为工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的独立性和毫无限制地支配它的一切资源。如果不允许工业家在短暂的繁荣时期竭尽全力进行剥削,那么,在下一次危机中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呢?十小时工作日法必须取消。如果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在议会里废除它,那也必须设法绕开它。

十小时工作日法把 18 岁以下的少年和所有女工每日工作时间限制为 10 小时。因为妇女、少年和儿童在工厂工人中占大部分,所以,其必然后果就是一般工厂每天只能开工 10 小时。但是,当繁荣时期厂主需要增加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总会找到出路的。像过去那样,在对 14 岁以下儿童的工作时间作更多的限制时,厂主就比过去多雇用一些妇女和少年来帮工和轮换。这样,厂主就可以使自己的工厂和成年工人每天工作 13、14、15 小时,而适用十小时工作日法的人没有一个每天工作超出 10 小时。这就有一部分违背法律条文了,尤其是违背了法律的整个精神和立法者的意图。工厂视察员提出了控告,治安法官们意见不一,他们的判决也不相同。越是繁荣,工业家就越是激烈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和工厂视察员的干涉。内务大臣乔·格雷先生命令视察员对轮班制<sup>168</sup>(relay 或 shift system)采

取宽容态度。但是，他们中许多人都以法律为根据，不理睬这个命令。最后，一个轰动的案件告到财务法庭，而法庭却作出了有利于厂主的判决。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厂主又完全成了自己工厂的主人。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开工2小时、3小时或者6小时，而在繁荣时期则开工13小时到15小时，工厂视察员再也不得干预了。

既然维护十小时工作日法的主要是反动派，而且它只是由反动阶级推行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根据通过这个法所采取的方式，它完全是一项反动的措施。整个英国社会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紧密相连的。一切阻碍这种进步，限制或者想要采用外在准则来调节并支配这种进步的制度都是反动的，不能持久的，并必然为这种进步所消灭。轻而易举地就制伏了古老英国整个宗法制社会，制伏了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然不会使自己受有节制的十小时工作日法的限制。阿什利勋爵及其伙伴想通过一项正式声明来恢复那已经失去效力的法的一切企图，都是不会有结果的，最多也只能得到暂时的表面成果。

不过，十小时工作日法对工人来说还是必不可少的，是保护工人身体所必需的。没有十小时工作日法，英国整整一代工人的身体就要垮了。但是，现在工人所要求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同萨德勒、奥斯特勒和阿什利所宣传并由1847年的反动联盟所实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两者是大相径庭的。由于这个法寿命短暂，由于这个法轻易就被取消（只要一纸法庭判决书，甚至不需要议会法令，就足以宣布法无效），再加上工人们根据自己过去的反革命同盟者后来的言行，工人们了解到，同反动派结成联盟有什么价值。他们了解到，采取一些零零星星的措施去反对工业资产者，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了解

到,工业资产者暂时还是唯一能在目前领导运动的阶级,要阻挠他们完成这个进步的使命是徒劳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工人丝毫也没有减少对工业家的公开敌视,他们现在却乐意支持工业家鼓吹彻底实行贸易自由、财政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活动,而不愿再让慈善家把自己诱骗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旗帜下面去。他们感到,只有当工业家不再起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他们凭正确的本能知道: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取得统治从而为推翻工业家作准备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忘记,他们使工业家取得统治也就是使他们最有利害关系的、最直接的敌人取得统治;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政权,才能使自身得到解放。十小时工作日法的废除,再一次最有说服力地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要恢复这个法的效力,只有在实行普选权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独占政治统治以及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状况的革命变化。正因为如此,工人现在所要求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与不久前被财务法庭废除的那个法是截然不同的。它已经不再是使工业发展停顿的个别意图,它是变革整个现存社会状况和逐步消灭迄今存在的阶级对立的一连串措施中的一环;它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十小时工作日法最初由厂主擅自作主而后通过财务法庭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这首先就促使繁荣时期缩短,加速危机的到来。但是,加速危机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加速英国发展的进程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最近目标——工业无产阶级推翻工业资产阶级。可供工业家拓宽市场和消除危机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科布顿提出缩减国家开支的办法,不是纯粹的辉格党人的胡说,就是等于一次彻底的革命,尽管它或许起作用于一时。即使缩减国家开支通过最广泛的革

命方式（就英国工业家能够成为革命者而言）来实行，那又怎样去防止下一次危机呢？显然，英国工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力量比他们的销售市场的发展力量要大得多，他们正迅速地走向这样的时期，那时，他们的补救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高压下将完全消失，危机和危机之间只有短时期的半停滞状态的微弱的工业活动；那时，如果这种反常状态本身不具有自己的医治办法，如果工业的发展不同时产生唯一能领导社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那么工业、商业和整个现代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到运用的有生力量过剩，另一方面则由于极端的贫困，而势必遭到毁灭。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事情的合乎规律的正常进程，这种进程是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从英国当前整个社会状况中产生的。大陆上的冲突和英国发生的革命突变能把这个正常进程缩短多少，不久就能看到。

那么十小时工作日法会怎么样呢？

自从世界市场的范围对于充分挖掘现代工业的一切资源来说变得太窄小的时候起，自从现代工业为了使自己的力量重新获得自由的活动场所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起，限制工作时间就不再是反动的措施，不再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了。相反，这种限制完全是自然出现的。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大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占据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手里，而随着工业的集中，那些现今使劳动时间的调整同工业的进步发生冲突的一切竞争状况也将消失。因此，解决十小时工作日问题，也像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无产

阶级革命。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3 月  
中—4 月之间

载于 1850 年 4 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sup>184</sup>  
书 籍

I.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  
(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  
监狱》1850年伦敦版

托马斯·卡莱尔是唯一直接受到德国著述极大影响的英国作者。仅仅出于礼貌,德国人也不能忽略他的著作。

从基佐最近的著作(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第3篇<sup>①</sup>)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资产阶级的人才正在趋于没落。在我们手边的两本卡莱尔的小册子里,我们看到同历史斗争的尖锐化相抵触的天才著作家没落了,因为他企图违抗历史斗争,坚持自己不为人所承认的、直接的、预言式的灵感。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61—266页。——编者注

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著述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著述中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例如他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和现在》<sup>①</sup>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和对中世纪的不寻常的非历史的颂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这种做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和一部分宪章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赞赏，现代却使他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的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sup>②</sup>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装模作样的萎靡、谨小慎微的絮语、不知所云的无聊的感伤说教；这种风格已经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著作界了。和这种著作相反，卡莱尔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尤其是依照让·保尔格式创造的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

① 指托·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三卷集）1837年伦敦版；《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两卷集）1845年伦敦版；《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托·卡莱尔《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偶像崇拜和英雄事迹》1841年伦敦版。——编者注

《当代评论》在这方面也表现了明显的倒退。

在整个德国著作界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人不是黑格尔,而是著名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很说明问题的。

卡莱尔和施特劳斯所共同推崇的天才崇拜,在这两本小册子里失去了天才,而剩下的只是崇拜。

《当前的时代》一开头就声称:现代是过去的女儿,未来的母亲,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实行改革的教皇**。庇护九世手持福音书,想从梵蒂冈的高位上向基督教世界宣布“真理的法律”。

“三百多年以前圣彼得皇上收到一份终审判决书,这是一道正式的命令,在天国的法庭中曾经记录在案,然后一切正直的人在心中都了如指掌;这道命令是要皇上自己引退,要他离开,要他不再用幻想和亵渎神明的呓语来迷惑我们的头脑;从此他自负风险继续存在并且必须为了每日自己这样的存在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是真理的法律吗?根据这种真理的法律,教皇必须抛弃自己侮辱神和人的、腐朽而经过电镀的生命,必须老老实实地死去,让人家埋葬自己。可怜的教皇的作为却与此相去甚远,虽然整个说来在本质上事情还是这样。实行改革的教皇怎样呢?……杜尔哥和内克根本不能与此相提并论。上帝是伟大的,当要结束一种丑行的时候,他就召唤一个虔信的人,这个人会满怀信心地去做,而决不会悲观失望。”(第3页)

教皇在他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问题,

“狂风漫天、烈焰遍野、大地震颤的原由……所有的官方人士都希望,甚至多数都盼望把这些问题拖延到末日审判,但是末日审判已经来到,这是可怕的事实。”(第4页)

真理的法律业已颁布,西西里人

“是首先开始采用圣父所批准的这种新规则的民族;根据真理的法律我们不属于那不勒斯和这些那不勒斯的官吏。我们希望凭着上天和教皇的恩典得

到解放。”

于是发生了西西里的革命。

法兰西民族自认是“救世的民族”，是“优秀的自由战士”，他们害怕可怜的、受轻视的西西里人夺去他们的这笔生意( trade)。于是就有了二月革命。

“好像由于地下交感电流的作用，整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无法控制的爆炸；我们知道 1848 年是欧洲世界经历过的最奇特的、最不幸的、最使人吃惊的而整个说来又最使人感到屈辱的一年…… 各国的国王和执政人物都一下子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耳朵里响起了全世界的声音：滚开，你们是蠢材、伪君子、小丑，而不是英雄！滚蛋，滚蛋！在这一年首先发生的最引人注意的事情是所有的国王都鼠窜而逃，他们好像都在哀号：是的，我们的确是可怜的小丑；你们需要英雄吗？不要杀死我们吧，我们又做得了什么呢？——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敢掉转头来坚持他为之舍生忘死的王权。我再重复一下，这就是现代的令人忧虑的特点。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民主主义者发现所有的国王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丑角。国王们由于害怕监狱或其他更坏的东西而拔腿逃遁了，其中有的人可以说是极其羞耻地逃走的。各地的人民或老百姓都是自己来统治，现在到处公开的无帝王论(Kinglessness)都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警察那就更妙了。1848 年 3 月的历史事件就是如此，它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地区。于是欧洲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如果不算站在啤酒桶上、通过社论或者和同类人一起聚集在国民议会中发议论的公开‘演说家’[haranguer]，那么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在几乎四个月的时间中，整个法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欧洲就像受了一种狂热的驱使一样，成了以市政厅中的拉马丁先生为领导的汹涌的老百姓的海洋。这位可怜的拉马丁先生在他还有势力的时候，除了一些好听的空话和软弱无力的夸夸其谈之外，一无所长，这在有思想的人看来是个可悲的场面。的确这是个可悲的场面：复原了的‘混沌’的最雄辩的最后体现，能为自己辩解并用娓娓动听的话语使人相信，它就是‘宇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只需稍加等待：一切气球受到外界的压力，都必然会排出它的气体，并且会立刻难看地瘪下去。”(第 5—8 页)

谁煽动了这次显然已经具备了燃料的全面的革命的火焰呢？

“是大学生、青年文人、律师、报刊撰稿人、热情的无经验的热心人和粗野的、理应破产的亡命之徒。青年人(几乎是儿童)至今从来没有这样指挥过人类的命运。从第一次发明 senior, seigneur 或‘长者’二字来代表老爷或长官(像我们在各民族的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以来,时代已经变了!……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看见,长者不再受尊敬,并且开始受轻蔑,他似乎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那种娇态、高尚和充沛的精力,这种疯狂的局面自然很快就会变好,现在各处已经能看到这种情况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需要不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而这些需要不管花多大代价都应当予以满足。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大概很快会对旧机器进行某种修理,使它具备新的色彩和变化了的形式;旧的戏剧性的国王将在承认宪法和国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时髦的点缀品的条件下重掌政权,旧时的日常生活又将试图在各处重新开始。但是这次已经没有希望使这种平衡长久继续下去……在这种险恶的动荡中的欧洲社会必然会继续踉跄地前进,像在湍急的无底漩涡与波涛汹涌的海流中漂浮一样,没有稳固的根基,时而又无可奈何地倒下去,时而又勉为其难地立起来,间隔越来越短——直到新的岩基终于出现,暴动及其必然性的上下翻腾的洪流再行退落时才会结束这种局面。”(第8—10页)

这种以对旧世界也无可告慰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就谈这么多。现在谈谈道德:

“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事实。”(第10页)

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二月革命是

“欺骗的总破产;这就是它的简单的定义”。(第14页)

在新时代流行的是幻象和假象,即“诡诈”,“欺骗”,“幻想”和失

去了意义而不表示真实关系和事物的名称,一言以蔽之,谎话代替了真实。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个人和社会与这些假象和幻想决裂。不能否认必须根除一切诡诈和欺骗。

“自然,这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显得奇怪,在不少所谓有教养阶级中胃脏健康得能消化自己布丁的体面英国人看来,这可能显得特别奇怪,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观念,完全是埋藏着祸端的异端邪说。在他的一生中,他已习惯于早已失去意义的礼节,习惯于公认的行为规范和只具有礼节性质的庆祝仪式,——用你们破坏偶像的幽默来讲,这就叫做诡诈;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些东西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也能取得成绩。难道棉纱不是自己纺出来的吗?难道牲口不是自己长肥的吗?难道殖民地的商品食物不是从东方和西方运来的吗?难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和诡诈和睦共处吗?”(第15页)

民主会完成这种必要的改革,摆脱诡诈吗?

“民主将来通过普选权而建立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完成这一从幻想到现实,从谎话到真实的有益的普遍过渡呢,从而逐渐建立起幸福的世界呢?”(第17页)

卡莱尔否定这一点。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作是各国人民的一种流行病,他们得病是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按人头计算的普选

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最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杰出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存在。那希腊人和罗马人呢?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至于法兰西的各种共和政体就更不用谈了。北美共和国模式又怎样呢?美国人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的居民没有政府;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辽阔土地和从英国带来的对警棍的尊敬心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美国是否出现过哪怕一种伟大的人类心灵,一个伟大思想和一件值得敬仰与衷心赞扬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第 25 页)

它每 20 年使自己的人口增加一倍——如此而已。

因此,在大西洋的两岸民主制永远不可能实现。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一个国家如果不把永远领导和统治愚民的永恒的神圣职责赋予最高贵的人以及从较高贵的人中选出的僚属,那就不是上帝的王国,就不符合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的秘密、来源和必要性了。现代民主的秘密不过就是伪装高贵的人(sham-noble)提高了地位,由于传统和重新制造的幻想而受到了崇拜。

但是,谁该去发现那个由较小人物珠宝环绕着的真正高贵宝石呢?当然不是普选制,因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能找到高贵的东西。所以卡莱尔宣称,在英国还有一些那样的贵人和“国王”,并在第 38 页上敦促他们到他那里去报到。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全部历史的过程不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他们本身自然为一定的、本身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全部历史过程取决于永恒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就是深谙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即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即愚人与贱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且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即应当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见解便简单得像前世纪伊留米纳特<sup>185</sup>和共济会<sup>186</sup>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像《魔笛》<sup>187</sup>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的讨论，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统治的也不能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揭示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显露出来。高贵者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要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且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选择。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



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条理分明”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条理不清”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确定。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掩掩盖盖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他对高喊解放的声音深恶痛绝。

“让我们彼此都互不相干吧,除现金交易外,不要任何关系或联系;根据自愿的契约和供求的规律交易,做好一天工,给够一天钱——这被认为是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一切难题和不公平事件的办法。要矫正两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难道除完全断绝这种关系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第29页)

这样最终地消灭人们之间的一切联系、一切关系,自然就会达到**无政府状态**的顶点,达到**无法之法的**顶点,达到各种联系的联系即政府遭到彻底破坏状态的顶点。在英国、在大陆上、甚至在“规规矩矩的德国”人们都力图造成这样的状态。

卡莱尔这样继续用许多篇幅发表了狂怒的胡言,荒谬绝伦地把红色共和国、博爱、路易·勃朗等和自由贸易、废除谷物税等混在一起(见第29—42页)。于是卡莱尔就把清除传统的封建残余、使国家机构缩减到最必要的最精简的限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与废除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消灭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等混为一谈了。这是明显地回到皂白不分的“绝对的黑夜”!这就是连自己周围事物都一无所知的“博学者”的深知睿

识！这就是认为消灭封建主义或自由竞争就会断绝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的非凡洞察力！这就是十分郑重地认为父母不事先到市政厅去“缔结”婚姻关系就不会再有孩子，从而便窥破了“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卓见！

在这种纯粹无知智慧的有启发性的实例后面，卡莱尔又给我们举出一个证据，说明爱发高论的高贵气概一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露骨的卑劣行径。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类的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另一方面，自然也不缺乏需要被领导的人，这就是被我们描写成脱缰马似的庄稼汉，沦于流浪和饥饿境地的那个可怜的兄弟阶级；这个阶级也已在所有其他国家形成并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按照灾难性的几何级数发展着。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组织劳动是全世界的普遍的重大问题。”（第42—43页）

当卡莱尔在前40页中满怀义愤对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人与人之间封建关系的废除、供给与需求、自由放任<sup>188</sup>、棉纱的生产、现金支付等一再地大肆攻击之后，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诡诈的主要代表人物工业资产者不仅属于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这路英雄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的凯旋都隐藏着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看来似乎很令人奇怪，卡莱尔既然找到了劳动大军的统帅和士兵，即找到了一定的劳动组织，却仍然认为劳动组织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可别上当！这里的问题不是组织已经被管束的工人，而是组织还未受管束的没有统帅的工人，这件事卡莱尔要亲自动手解决。在他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我们看见他突然以不列颠的在野首相的角色出现，把300万爱

尔兰的和其他地方的乞丐、有工作能力的定居的或流浪的赤贫者召集在一起举行习艺所<sup>76</sup>内外的不列颠穷人的全国大会，并向他们发表“堂堂皇皇的”演说；在演说中他首先向这些穷人重复他早已向读者谈过的那些东西，然后向这些精选出来的一伙人说道：

“到处流浪的穷人和懒汉们，你们有些是笨人，许多人是罪犯，所有的人都令人可悲！你们的样子使我非常惊愕和绝望。你们总共有 300 万人。你们有些人堕入了完全以乞讨为生的深渊，说起来真可怕，每一个堕进深渊的人又加重了把别人拖进去的链子。站在这个深渊边缘上的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有人告诉我，每天还要增加 1 200 人，他们不断跌下去，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而链子就越来越重，谁最后还能站得住呢？你们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他还站得住的人现在也在和自己的困难作斗争。但是你们精力不足而胃口太大，事情做得少而啤酒喝得太多，这就证明了你们是站不住的。你们要知道，无论谁是自由之子，总之你们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你们不是自由的人，你们是地地道道的囚徒……你们是天生的奴隶，或者说得好听些，你们是找不到主人的漂泊流浪的奴仆……今后你们可以和我来往，但不是作为光荣的不幸的自由之子，而是作为声名狼藉的囚徒，作为不幸堕落的兄弟，来要求我统率你们，如果必要的话，来约束和管制你们……当着苍天、大地，当着上帝、你们的造物主面前我宣布：我看到你们靠你们兄弟的血汗来维持你们这种生活，感到非常痛心，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还不如死去……加入我那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的新时代的队伍吧，你们这些可怜的游荡的强盗，应当服从、劳动、容忍、节食，像我们所有的人应当做的那样……你们需要工业的指挥官、工厂的工长、监工和生死的主宰，这些人像拉达曼那样公平，那样刚直，只要你们一旦要受军事条令的约束，就会给你们找到这样的人……那时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说：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按照我在这里指出的方法，以军人的英勇服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开始这个工作吧，——那时你们就会很容易地拿到工资……如果你们不服从，畏惧艰苦的劳动，不遵守规定，我将设法规劝你们，督促你们；如果这样无效，我就要鞭打你们；如果这些都白费，最后我就要枪毙你们。”（第 46—55 页）

由此可见，天才统治的“新纪元”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鞭

子自以为是天才。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以贫困吓人而把穷人和犯人相提并论,在1833年通过了济贫法<sup>182</sup>,而卡莱尔却是以贫困产生贫困为理由来控诉穷人犯了**叛国罪**。正像他以前认为历史地产生的统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居于统治地位而充当了天才一样,现在在他看来,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得越厉害,就越被拒于天才之外,就越成为我们那些不为人所承认的改革家的狂怒的牺牲品。穷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当谈到最低层的无用的人们,谈到“恶棍”即**罪犯**的时候,他那高尚的道德上的愤怒就会达到顶点。以上这些人,他是在论模范监狱的小册子中谈到的。

这本小册子不同于第一本小册子的地方在于火气更大,其实作者如此愤怒更加不值得,因为这里的对象是被正式抛弃于现存社会以外的人,是被监禁的人;结果由于这种愤怒甚至连一般资产者出于礼貌而顾及的颜面也被抛弃了。卡莱尔在第一个小册子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贵人的等级制度,从贵人中找出最高贵的人,而在这里他也同样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坏蛋和恶棍的等级制度,竭力寻找坏人中的坏人,英国的**最大恶棍**,以便痛痛快快地把他绞死。假定卡莱尔把这样的人捉到了并且绞死了,那么另外一个人现在是最坏的人又应当被绞死,在他之后又有另外的一个,这样最后就会轮到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最高贵的人——卡莱尔,他是恶棍的迫害者,同时也是贵人的谋杀者,他连恶棍中的高贵的东西也消灭了;剩下的这个高贵人中最高贵的人,突然变成了恶棍中最卑贱的一个,他

---

作为这样的人便必须**绞死自己**。于是有关政府、国家、组织劳动、贵人的等级制度等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永恒的自然规律最后也就会实现了。

## II.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前警备队长 阿·谢努《密谋家, 秘密组织; 科 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 义 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 安·德拉奥德《1848年2月共 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

如果用伦勃朗的浓重色彩终于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 还是后来官方领导人——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 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 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 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 脚穿厚底靴<sup>①</sup>, 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神化了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中, 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

固然, 这两本书已经去掉了二月革命<sup>4</sup>的“伟人”以往常常穿着的厚底靴和顶着的灵光圈, 深入了这些伟人的私生活, 向我们展现了他们身穿便服的形象和他们周围形形色色的配角。但是, 它们并没有因此而稍微真实地描绘了人物和事件。这两个作者, 一个是公认的

<sup>①</sup> 古希腊、罗马的一种戏靴。——编者注

路易-菲力浦的老牌间谍，另一个是老职业密谋家，后者和警察局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他的观察力只举出一点就足以说明：据他自己说，他能在莱茵费尔登和巴塞尔之间看见“银峰耀目的巍峨的阿尔卑斯山脉”，能在凯尔和卡尔斯鲁厄之间看见“远处山峰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莱茵阿尔卑斯山”。这类人要写书，——特别是还要为了表白自己而写书时——，显然也只能写些多少带夸张色彩的二月革命丑闻录。

德拉奥德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库珀小说中的间谍<sup>①</sup>。他说八年来他使秘密组织的活动瘫痪了，这样他就为社会立了功。但是，德拉奥德先生距离库珀笔下的间谍还很远，非常远。德拉奥德先生是《喧声报》的撰稿人，1839年起是“新四季社”<sup>189</sup>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改革报》创刊以来的编辑之一，同时也是警察局长德莱塞尔雇用的间谍；可是谁也没有像谢努那样使他如此声名扫地。他写这本小册子是直接由于谢努的揭露而引起的，但是他却小心翼翼，生怕有一个字回答谢努关于他所说的一切。可见，至少谢努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谢努说：

“我有一次夜行，发现德拉奥德在伏尔泰沿河街踱来踱去。当时大雨滂沱，这种情景引起我的思索。这位可敬的德拉奥德是不是正好也领秘密津贴？不过我想起了他的歌曲、他歌颂爱尔兰和波兰的美妙诗篇，特别是他为《改革报》撰写的犀利文章。”

（然而德拉奥德先生却竭力标榜自己是缓和《改革报》语气的人。）

---

① 费·库珀的小说《间谍》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编者注

“晚安，德拉奥德，这样的時候，这样坏的天气，你在这里搞什么鬼？——我在这里等一个欠我钱的坏小子，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他必须还钱给我，不然——他用手杖在沿河街的栅栏上狠狠地打了一下。”

德拉奥德尽力想躲开他，向骑兵竞技场桥走去。谢努向相反的方向走开，不过只是为了在研究院的拱门下面躲藏起来。德拉奥德不一会儿就走回来了，小心翼翼地向下看了一看，又继续踱来踱去。

“过了一刻钟，我发现一辆挂着两盏小绿灯的马车，就像我从前的密探给我讲过的那样。”

（这个人从前是一个间谍，在监狱里他向谢努泄露过许多警察局的秘密和暗号。）

“马车停在旧奥古斯丁街的拐角。车里走出一个人来；德拉奥德径直向那个人走去，他们交谈了片刻，随即我看见德拉奥德做了一个往口袋里装钱的动作。——这件事发生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德拉奥德排斥在我们的会议之外，首先是不让阿尔伯上圈套，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厦的柱石。在这之后不几天，《改革报》就退回了德拉奥德先生的一篇文章。这一下刺伤了这位作家的虚荣心。我劝他另办一家报纸来进行报复。他接受了这个劝告，甚至跟皮尔和杜波蒂一起发表了《人民报》的创刊启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摆脱了他。”（谢努，第46—48页）

我们看到，这个库珀笔下的间谍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干卑鄙勾当的最下流人物，他为了领取津贴，冒着倾盆大雨在街头等候某一个最普通的警官。此外，领导秘密组织的并不像德拉奥德企图断言的那样是他本人，而是阿尔伯。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谢努的整个叙述中看得出来。“为秩序服务”的间谍在这里一下子变成了受屈辱的作者，他对《改革报》干脆拒绝接受《喧声报》撰稿人的文章大为不满，因



此他跟真正的党派机关报《改革报》决裂了，他利用《改革报》可以为警察局效劳，他与之决裂是为了另办新报纸，而这个报纸至多能够满足他的写作的虚荣心。正像娼妓力图用某种类似感情的东西使自已从良一样，这个间谍力图用写作的要求使自已摆脱这个肮脏的身分。浸透了他的整个小册子的对《改革报》的仇恨转化为作者的最庸俗的复仇心理。最后，我们看到，在秘密组织的最重要时期，即二月革命即将到来的时期，德拉奥德越来越被秘密组织所排斥；这就说明，为什么德拉奥德跟谢努相反，硬说秘密组织在这个时期日益崩溃。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谢努所描述的揭发德拉奥德二月革命后的叛卖行为的情景。《改革报》派应科西迪耶尔的邀请在卢森堡宫阿尔伯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蒙尼埃、索布里埃、格朗梅尼尔、德拉奥德、谢努等人。科西迪耶尔宣布开会时说道：

“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我们必须组成秘密法庭来审判他。”

格朗梅尼尔是与会者中的年纪最大的人，当选为主席，梯凡被选为记录。科西迪耶尔以公诉人的身分继续说道：

“公民们，我们长期谴责真诚的爱国者。我们万没有想到会有毒蛇钻到我们中间来了。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叛徒，这就是律西安·德拉奥德！”

德拉奥德一直安然地坐着，当听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控告时猛然跳起来。他要夺门而出。科西迪耶尔马上把门关上，掏出手枪喝道：

“你动一动，我就打碎你的脑袋！”

德拉奥德急切地断言自己无罪。科西迪耶尔说：

“好吧，这里有一叠文件，里面有1800件给警察局长的情报。”

他把专门有关我们每个人的情报发给了我们。德拉奥德始终矢口否认这些经皮埃尔签字的情报是他搞的,直到最后科西迪耶尔宣读了一封后来刊印在他的回忆录里的信为止。在这封信里德拉奥德表示愿意为警察局长效劳,信上还署有他本来的姓名。从这时起,这个倒霉的人就不再否认了。他企图借口穷困来辩解,他说穷困使他产生了投靠警察当局的倒霉念头。科西迪耶尔把手枪递给他——这是德拉奥德的唯一出路。德拉奥德开始恳求他的审判官,请他们宽宏大量,但是他们毫不动心。当时在场的博凯忍无可忍,抓起手枪,一连三次递给德拉奥德说:

“快,打碎自己的脑袋吧,胆小鬼,胆小鬼,不然我亲手宰了你!”

可是,阿尔伯从他手里夺过手枪说:

“冷静点,在卢森堡宫开枪会惊扰所有的人!”

博凯喊道:

“对,我们应当弄点毒药。”

科西迪耶尔说:

“毒药?我随身带了各种各样的毒药。”

他拿起一个杯子,斟了一杯水,放了一点糖,然后放进一些白粉末,递给吓得往后缩的德拉奥德。

“你们打算这样弄死我吗?”

博凯说:

“是的,喝吧。”

德拉奥德的样子非常可怕。他面色苍白，他那十分鬃曲而又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都竖立起来了。他满脸冷汗，一面哀求，一面嚎啕大哭。

“我不想死！”

而博凯依然无动于衷地把茶杯端在他的面前。科西迪耶尔说：

“喂，喝吧，一眨眼工夫就完了。”——“不，不，我不喝！”

随后，他摆出一副凶相，惊惶地加上了一句：

“啊，这样折磨我，将来一定要报仇！”

当大家都相信，任何留点脸面的方法都没用的时候，阿尔伯讲了情，德拉奥德终于得到了宽恕，被解送到孔谢热里监狱去了。（谢努，第134—136页）

这个冒牌的库珀小说中的间谍越发变得卑鄙。他只是靠怯懦来反抗自己的敌人，这就在我们面前完全暴露了他的下贱。我们责备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因为他不开枪打死他碰到的任何一个敌人。他后来企图写一本小册子来为自己开脱，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竭力把整个革命描写成纯粹的骗局。这本小册子的正确名称是《大失所望的警察》。它证明真正的革命是和间谍的想法完全相反的，而间谍跟“实干派”完全一样，把每次革命都看成是小集团的活动。如果说一切由小集团或多或少任意挑起的运动始终不过是骚乱，那么从德拉奥德的说法本身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官方的共和派在二月事件之初对共和国的胜利还没有抱任何希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违反本意帮助共和国取得胜利；可见，二月共和国的建立是当时形势所必然产生的结果，那时情况使得与一切

小集团无关的无产阶级群众不得不走上街头,使得大部分资产阶级不得不呆在家里或者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在其他方面,德拉奥德所谈的东西也都十分枯燥无味,不外是些最庸俗的流言蜚语。只有一个情节是引人注意的,那就是2月21日晚上官方的民主派在《改革报》社举行了会议,在会上首领们表示坚决反对暴力进攻。他们讲话的内容基本上证明了在这一天他们对情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可笑的只是这些人的口气很夸张,最后自我吹嘘说,似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在进行革命。德拉奥德在背后所能指责他们的最糟糕的行为,就是他们过于长久地让他混在自己中间。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谢努。谢努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个老密谋家,从1832年起参加过所有的武装起义,在警察中间是尽人皆知的。他被征召入伍后不久便当了逃兵,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参加过密谋活动和1839年的武装起义<sup>59</sup>,但是他在巴黎一直没有被发觉。1844年他回到他的团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但是师长还是使他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仅如此,他在团里服役期限未竟竟能回到巴黎。1847年他受到燃烧弹密谋案<sup>190</sup>的牵连,在要逮捕他的时候逃掉了,虽然他被缺席判处了四年徒刑,但是仍然住在巴黎。只是在他的同谋者揭露他勾结警察以后,他才迁往荷兰,1848年2月21日又从那里返回。二月革命后,他当了科西迪耶尔的警备队长。不久科西迪耶尔就怀疑他跟马拉斯特的特种警察有关系(怀疑是很有根据的),于是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他打发到比利时去了,后来又打发到德国。谢努先生相当自愿地先后参加了比利时、德国和波兰的志愿军团。而这一切是发生在科西迪耶尔的势力已经开始动摇的时候。这时,谢努自认为已完全控制住了科西迪耶尔,他声称,他有一次被捕后用一封恐吓信就使科西迪耶尔立即释

放了他。关于我们这位作者的性格和可信程度我们就说这些。

妓女力图用大量胭脂和薄荷香水来掩饰自己肉体不太诱人的地方,著作界也有类似情况,那就是德拉奥德用机智俏皮来点缀他的小册子。相反地,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吉尔·布拉斯<sup>①</sup>相媲美。正像吉尔·布拉斯在种种冒险活动中始终是一个仆人并按照仆人的准则来评价一切问题一样,谢努从1832年的武装起义时起,直到被逐出警察局止,始终是一个演配角的密谋家;不过,密谋家的特别短浅的目光和从爱丽舍宫<sup>56</sup>派到他那里的文学“巨匠”的平庸的文思是很容易区别的。显然谢努也根本谈不上对革命运动有所了解。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值得注意的,只是那些多少比较公正地描写他亲眼看到的那些密谋家和英雄科西迪耶尔的章节。

罗曼语各民族对密谋的偏爱以及密谋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20年代初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密谋家失败后,里昂,特别是巴黎就成了革命团体的中心。大家都知道,1830年以前领导反对复辟的密谋活动的是自由资产者。七月革命<sup>58</sup>之后,共和派资产阶级代替了他们;在复辟时期已经学会秘密活动的无产阶级,随着共和派资产者在毫无结果的巷战以后惶恐地退出密谋活动而登上前台。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用来组织1839年武装起义的四季社已经成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它失败后组织起来的新四季社也是这样。新四季社的首领是阿尔伯,谢努、德拉奥德、科西迪耶尔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密谋家们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和在以

---

① 阿·勒·勒萨日的小说《桑蒂利亚纳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编者注

《改革报》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但是他们始终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当然,这些密谋家的组织从来没有吸收为数众多的巴黎无产阶级。它们的人数比较少,而且经常发生变动。这些成员一部分是一贯的老密谋家,即每个秘密组织到时候移交给它继承者的那些密谋家,一部分是新招募的工人。

在这些老密谋家中,谢努几乎只描述他自己那一类,即**职业密谋家**。随着无产阶级密谋家组织的建立就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即只是在其他工作之外参与密谋的工人,他们仅仅参加集会和随时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到达集合地点;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且以此为生。他们是工人和领导人之间的中间层,甚至常常钻入后者的行列。

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参加无产阶级密谋家的组织,自然只能使他们得到极其有限的没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因此,他们常常不得不伸手向组织要钱。他们有的人甚至直接跟资产阶级社会冲突起来,并且或多或少体面地出现在违警法庭上。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与其说出于他们的活动,不如说时常出于偶然事件;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密谋家的见面处——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不三不四的人,因此,使他们沦为巴黎人所说的那种浪荡汉。这种无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即民主派游手好闲之徒和小咖啡馆的老主顾——,不是抛弃自己的工作因而腐化堕落的工人,便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并把这个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带到自己新生活里的人。因此不言而喻,几乎每个密谋案件中都混杂着一些惯犯。

这些职业密谋家的整个生活带有十分明显的浪荡汉的性质。他

们作为招募密谋家的下级军官,从一个小酒馆转到另一个小酒馆,考查工人们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然后用甜言蜜语使这些人参加密谋,并且必然让组织或者新朋友出钱来痛饮一番。一般说来,小酒馆实际上成了他们的招待所。密谋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他在这里会见同党,会见他小队的成员和他准备招募的人;最后小队和小队(组)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在这种不断出入酒馆的气氛中,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放荡者。在秘密会议上表现出斯巴达式的严格自律的阴沉的密谋家,突然温和起来,变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处有熟人的常客。这种小酒馆的寻欢作乐由于密谋家经常遇到危险而更变本加厉。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召到街垒上去,战死在那里;他一举一动都可能碰上警察所设的圈套,都有被送进监狱甚至罚苦役的危险。这些危险恰恰就是这种职业的真正魅力;危险越大,密谋家越急于及时行乐。同时,他对危险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把生命和自由置之度外。在监狱里他感觉像在家里和在小酒馆里一样。他天天盼望着起义的命令。巴黎的各次起义所表现的铤而走险的勇敢精神,正是这些老职业密谋家,这些行动坚决的人带来的。是他们筑起第一批街垒,负责指挥,是他们组织抵抗,领导对武器铺的劫掠和征用私人武器与弹药的工作,是他们在起义时采取冒失鲁莽的行动,因而常常弄得执政党惊慌失措。总之,他们是起义的指挥官。

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

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固定观念中那些混乱思想和偏见。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阴谋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更富理论性的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这说明他们对黑色燕尾服，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平民的；但是，因为后者是党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黑色燕尾服有时也会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因此非常明显，密谋家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追随革命党派的发展。

密谋家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和警察进行斗争，而他们和警察的关系就像小偷、娼妓与警察的关系一样。警察当局容忍密谋家组织的存在，而且不仅仅把它们当作必然的祸害。它容忍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容易监视的中心，这里聚集着社会中最好暴力的革命分子；是因为它们是骚乱的制造所，在法国，骚乱如同警察本身一样，已经成了必要的统治手段；最后是因为它们是警察局物色自己的政治密探的场所。下等政治警察是从职业密谋家当中招募来的，他们像最能干的刑事密探维多克之流那样，是从上等和下等流氓，如小偷、无赖和假破产者之类中搜罗来的，而且他们常常重新干起他们的老本行。密谋家经常要跟警察打交道，他们时时刻刻都会跟警察发生冲突；他们时常跟踪密探，就像密探跟踪他们一样。间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职业密谋家常常摇身一变而成为警察局雇用的密探，这是不足为奇的，何况还有穷困、监禁、威胁利诱的推动。由于这种情况，密谋家组织内部充满无穷的怀疑，这种怀疑完全蒙蔽了它们的成员，使他们把好人看成是密探，而把真正的密探看成是最可靠的。



人。显然,这些从密谋家中招募去的密探在跟警察当局勾结时大都具有想欺骗他们的美好愿望,他们在还没有越来越成为自己第一步的牺牲品以前,有时玩得成两面手法,的确他们也常常欺骗了警察当局。不过,这样的密谋家会不会陷入警察给他们设下的圈套,这全凭偶然的情况,并且与其说全凭性格坚定的质的不同,不如说全凭性格坚定的量的不同。

谢努所描写的密谋家就是如此;他往往把他们描述得栩栩如生,并且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人的性格也刻画了出来。其实,他本人——包括他同德莱塞尔和马拉斯特的警察局的不清白的关系——就是职业密谋家的最好的典型。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本身开始作为一个派别不断走上前台,这些密谋家就开始失去领导作用,内部开始瓦解,他们在无产阶级秘密组织里遇到了危险的竞争,因为这些组织所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起义,而是组织和壮大无产阶级。1839年的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起义之后发生了分裂,对此老密谋家抱怨不已。分裂是由于工人们要弄清本阶级的利益而引起的,分裂部分地发生在旧有的密谋家组织本身,部分地发生在新的宣传组织中。卡贝在1839年后不久便开始大力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党派内部所出现的争论问题,很快就超过了密谋家的认识水平。谢努和德拉奥德都承认,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已经绝对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密谋家为了不丧失他们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在对抗黑色燕尾眼中的作用,不得不追随这个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例如,早在二月革命之前以阿尔伯为代表的工人密谋家组织与《改革报》的拥护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不久又在临时政府中暴露出来。但是,我们不打算把阿尔伯跟这些

密谋家混为一谈。从我们所评论的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出,阿尔伯在和自己这些工具的关系上能够保持个人的独立的地位,他决不属于靠密谋活动为生的那类人。

在1847年的爆炸事件中,警察所实施的直接打击比在以往任何一次事件中都大,这次事件终于瓦解了最顽固的最倔强的老密谋家的队伍,并把其中一直保存下来的那些小队卷入了直接的无产阶级运动。

二月革命后,我们又看到这些职业密谋家、他们小队中的狂热分子和无产阶级出身而又多半是老密谋家的政治犯以山岳党人<sup>83</sup>的身分出现在警察局里。但是,职业密谋家是这些人的核心。不难想象,这些同时手持武器聚集在这里的人由于多半都和警官、军官非常亲密,必然是一个相当狂暴的集团。以前,国民议会的山岳党模仿了旧山岳党,它本身的软弱无力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793年的老革命传统在当时已经不够了,而现在警察局的山岳党人也是如此,这些旧长裤汉一类的人证明,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已经不够了,只有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革命。

谢努以极其生动的笔调描述了这些警察局中可敬人物的长裤汉生活。这些滑稽幽默的场景——显然,谢努先生本人也曾积极参加了演出——有时带有相当粗暴的性质。但是,它们很好地说明了老密谋家,这些放荡者的性格,而且是对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资产阶级穷奢极欲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对照。

我们现在只从叙述他们坐镇警察局的故事中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天刚破晓,我看见组长们带着自己的人陆续到来,但是多半没有武器。我让科西迪耶尔注意这个情况。他说:‘我要给他们弄到武器,你在警察局里找个

适当的地方把他们安置下来。’我立刻执行了这个任务，派他们去占领我曾经在那里受过非礼待遇的旧警卫室。不一会我看见他们跑步回来。我当即问他们：‘你们到哪儿去？’德韦斯回答我说：‘那个地方有一帮警察占着，他们还在那里睡大觉，我们去找点家伙把他们弄醒，把他们赶出去。’于是他们就顺手拿起通条、刀鞘、对折起来的皮带和扫帚柄作为武器。然后，这些多少领教过酣睡者粗暴残酷迫害的好汉们，挥动着拳头向他们扑去，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半个多小时，以致有些人事后久病不愈。我听到他们的惨叫声跑过去，费了很大气力才把门打开，原来机灵的山岳党人从里面把门锁上了。看着警察们半裸着身体往院子里跑，真开心，他们从楼梯上一下子跳了下来，幸而他们熟悉警察局所有的出入口，这才得以躲开追打他们的敌人。我们的山岳党人占领了堡垒，客客气气地接替了堡垒的守备队，胜利地用战败者丢下的东西把自己装束起来，只见他们腰佩宝剑、身披斗篷、头戴他们从前大都望而生畏的三角帽，在警察局的院子里逍遥了很久。”（第83—85页）

我们了解了山岳党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领袖，谢努的叙事诗的主人公科西迪耶尔。整本书可以说是针对他而写的，因此谢努在许多地方谈到他。

对科西迪耶尔的主要指责在于他的品德。所有这些指责不外是说他专开空头支票和耍其他一些弄钱的小手腕，而这些勾当是巴黎的所有债台高筑和喜欢寻欢作乐的推销员能够干和经常干的。作为整个商业基础的欺骗、敲诈、投机和交易所骗局按《刑法典》治罪的轻重，一般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多少。至于作为法国商业特点的交易所诡计和中国式的敲诈，可以读一读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虚假的行业》、《普遍统一论》以及他的遗著<sup>191</sup>，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精彩的描述。谢努先生甚至不想证明科西迪耶尔利用他的警察局长的职位营私舞弊的事情。一般说来，假如某一派的得胜的敌人不得不只限于揭露这种商业道德方面的不关痛痒的事情，那么这一派是完全可以为自己庆贺一番的。推销员科西迪耶尔的小实验与1847年资产

阶级的大丑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整个攻击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科西迪耶尔属于《改革报》派，这一派人企图用发扬共和派美德的保证和阴沉严肃的观点来掩盖革命毅力和革命认识的缺乏。

在二月革命的所有的领袖当中，科西迪耶尔是唯一具有乐天性格的人。他代表革命中的乐天派，是老职业密谋家们的十分适当的首脑。他多情，幽默，是各种咖啡馆和酒馆的老主顾，他自己活，让别人也活，同时又像军人一样地勇敢，宽宽的肩膀，样子和蔼，举止大方，但实际上却十分狡诈、精明而慎思，观察力也异常敏锐，具有一定的革命手腕和革命毅力。科西迪耶尔当时是个真正的平民，本能地仇恨资产阶级，极富平民的一切热情。他刚被安置在警察局里，就秘密地反对《国民报》派，同时也没有忘记前任者的厨房和地窖。他立刻组织军事力量，保证自己手中有一个报社，成立俱乐部，安排人事，总之，他一开始活动就信心百倍。警察局在24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座不怕敌人袭击的堡垒。但是，他的一切计划不是一纸空文，就是实际上毫无结果的纯粹平民式的胡闹。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和他的组织一样，在《国民报》派和像布朗基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动摇不定。他的山岳党已经分裂；老的放荡者不服从指挥，也已无法控制，革命的一部分则转到布朗基方面去了。科西迪耶尔本人在他的警察局长和人民代表的官场地位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5月15日，他小心谨慎地对事件<sup>82</sup>采取旁观态度，而且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在议会里为自己辩护；6月23日，他对起义者完全弃置不顾。作为报应他自然被逐出了警察局，而且不久以后遭到放逐。

下面我们从谢努和德拉奥德的书中摘引几个最值得注意的关于科西迪耶尔的地方。

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刚刚任命德拉奥德为警察局秘书长

之后便对他说：

“我这里需要些可靠的人。在行政管理上，一切都要设法走上正轨；我暂时留用旧官员；一俟他们教会爱国者，我们就把他们踢开。这还在其次。我们要的是把警察局变成革命的堡垒。要按这个精神给我们的人发指示，叫他们全部到这里来。假如我们这里能有1000个强壮的人，那么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了。赖德律-洛兰、弗洛孔、阿尔伯和我彼此都很了解，我希望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必须打倒《国民报》派。然后，使国家共和国化，不管它愿意与否。”

在这之后紧跟着就是由《国民报》派授权指挥警察的巴黎市长加尔涅-帕热斯来访。他建议科西迪耶尔放弃警察局的不愉快的职务去担任贡比涅的要塞司令。科西迪耶尔用同他那膀大腰圆的身躯极不相称的细声细气的嗓子回答他说：

“‘要我到贡比涅去？这办不到！我必须留在这里。我手下有好几百个能干的弟兄，他们都工作得很出色；我还准备把人数增加一倍。如果你们市政厅意志和勇气不够，那我可以帮忙。哈哈，革命将是逐渐发展的，这是必然的！’——‘革命？它已经完成！’——‘噢，不，它甚至还没有开始！’——可怜的市长完全懵了。”（德拉奥德，第72页）

谢努所描述的最有趣的场面之一，是新警察局长正在办公时接到警监和警官求见的报告以后接见他们的情况。

“科西迪耶尔说：‘让他们稍等一等，局长在办公。’他又办公足有半个小时，才布置好了接见警监先生们的场景，这时警监们也已经沿着大楼梯列好了队。科西迪耶尔腰佩马刀威武地坐在椅子上。两个山岳党人衣冠不整，一脸凶气，脚旁放着火枪，嘴里叼着烟斗，在看守房门。两个队长拿着出鞘的马刀站在他的写字台两旁，此外，他的总部里面的所有小队长和共和派三三两两地站在大厅里。所有在场的人都带着大马刀和马枪，来复枪和猎枪。所有的人都在吸烟，大厅里烟雾腾腾，这就使人们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森可怕，给这个场面增添了一种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在中间给警监们留下一块空地方。全体都戴上了帽子，这时科西迪耶尔下令带他们进来。这些可怜的警监们不敢奢望什

么,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是打算用种种酷刑对待他们的山岳党人的侮辱和威胁。山岳党人喊道:‘你们这些坏蛋!现在可落到我们手里了!你们跑不掉了,你们必须把皮留在这里!’——警监们走进局长办公室时认定是要甫出龙潭再入虎穴。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警监刚一跨进门坎,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所有在场的人投向他的目光是这样的可怕,他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后退。最后,他下定决心往前走了一步并且鞠躬敬礼,再前进一步腰弯得低了一点,再前进一步腰弯得更低了一点。警监们全部走进了屋里,向可怕的局长深深地鞠了个躬,局长手按马刀刀柄,冷淡地默默地接受了这种敬意。警监们诧异地凝视着这种反常的情景,有些吓得恍恍惚惚,而有些无疑想讨好我们,认为这个场面庄严肃穆。——‘静点!’——一位山岳党人以阴沉可怕的音调命令道。在他们都走进来以后,一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的科西迪耶尔,打破了寂静,以最严厉的音调讲道:

‘八天以前,你们全然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在这些忠实的朋友们卫护之下见到我。总之,现在他们是你们的统治者了,这些人是你从前所说的那种纸糊的共和派。让你们在这些过去不被你们当人的人们面前发抖吧。你们这些走卒是已经被推翻的政府的最恶劣的狂热的信仰者,是共和派最疯狂的迫害者,而现在你们却落入你们的死敌的手里,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人没受过你们的迫害。如果我听从人们向我提出的正当要求,我就会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我却宁愿把一切置于脑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听到你们参加任何反动阴谋,我就要像捏臭虫一样把你们捏死。去吧!’

警监们经过了所有的恐惧阶段。他们只挨了局长一顿骂倒也心满意足,于是就高高兴兴地走开了。在下面楼梯上等着他们的山岳党人吵吵嚷嚷地一直把他们送到耶路撒冷街的尽头。最后一个警监刚一消失,我们马上便哈哈大笑起来。科西迪耶尔觉得自己跟警监们开的玩笑很妙,所以很高兴,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开心。”(谢努,第87—90页)

科西迪耶尔积极参加了3月17日的事件以后,对谢努说:

“我可以按我的意愿把群众发动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谢努,第140页)

科西迪耶尔除了对自己的敌人开开吓唬人的玩笑外,再也没有做什么事。

最后,关于科西迪耶尔和山岳党人的关系,谢努写道:

“当我告诉科西迪耶尔他的部下热中于过激行为时,他叹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双手全被束缚住了。他手下的绝大部分人是和他一起混过来的,他们和他苦乐与共,许多人给他出过力。如果说他不能制止他们,这是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后果。”(第 97 页)

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两本书是在为 3 月 10 日<sup>192</sup>选举进行竞选宣传期间写的。它们的影响如何,选举结果红党获得辉煌的胜利便可以证明。

### III. 评埃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1850年巴黎版

社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坏的”社会主义。

坏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反对资本的战争”。它是平分土地、消灭家庭关系、进行有组织的掠夺等恐怖景象的根源。

好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和资本的融洽”。它会消灭愚昧，根除贫困，组织信贷，增加财产，改革税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产生“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

必须利用好的社会主义来消灭坏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有一个杠杆：这杠杆就是**预算**。但是它还缺少一个彻底改造世界的支点。2月24日的革命给它提供了这样的支点：这就是**普选权**。”

**税收**是预算的泉源，因此，普选权对预算的影响也就是对税收的影响。通过这种对税收的影响，“好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

“法国的支出不能超过12亿法郎的年税收。为了把开支缩减到这个数目，你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5年来，你们在两个宪章和一个宪法中曾经三次写道：所有的法国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分担国家的开支。在35年中，这种平等课税的原则始终是一种谎言…… 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的税制。”



### 一、土地税。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土地税并不是均衡负担的：

“如果两个毗邻地段在地籍簿上的估价相同，这两个土地所有者都应毫无差别地交纳同样的税，而不管是表面上的还是真实的所有者”。

就是说不管是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还是没有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

其次，土地税和其他的财产税是不相称的。1790年，国民议会通过土地税的时候，是受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把土地看作纯收入的唯一来源，并因此把全部赋税都摊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可见，土地税是以经济学的错误为根据的。如果平摊税负，那么土地所有者只应交纳他收入的20%，而现在他们却交纳53%。

最后，土地税按原有规定只应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是由土地承租人或佃户负担。但是照日拉丹先生的说法，情况不是这样，土地税总是由土地承租人和佃户负担。

这里日拉丹先生犯了一个经济学上的错误。如果土地承租人是真正的土地承租人，那么，土地税就由所有者或消费者负担，而决不会由土地承租人负担；如果在租佃关系的外表下他实际上只是所有者的工人（在爱尔兰就是这样，在法国也往往如此），那么，所有者应纳的税总是要由他来负担，不管是什么税。

二、私人动产税。它也是1790年由国民议会明令施行的税收，目的是直接向流动资本征税。资本额的大小是以房租来确定的。实际上这种税是落在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工业家的肩上，而对食利者影响甚小或完全没有影响。可见，这种税完全违背了它的制订者的本来意图。况且百万富翁也可能去住只有两张破椅子的阁楼，这是不合理的，等等。

**三、门窗税。**这是对人民健康的侵害。这是使人得不到新鲜空气和阳光的财政措施。

“在法国几乎半数的住宅只有一扇门而没有窗，或者最多只有一扇门和一扇窗。”

这种税是由于急需货币在共和国第7年葡月24日(1799年10月14日)通过的，它只是临时的非常措施，在原则上是遭到反对的。

**四、特许税(营业税)。**它不是赢利税，而是营业税。它是对劳动的处罚。这种税本该由工业家负担的场合，多半也是由消费者来负担。总之，在1791年实行这种税的时候，也只是为了满足暂时的货币需要。

**五、注册税<sup>193</sup>和印花税。**注册税是在弗朗索瓦一世时代施行的，最初并没有财政的目的(?)。1790年财产契约的强制注册范围扩大了，费用也提高了。注册税规定，买卖交纳的税要比馈赠和遗产交纳的多。印花税是纯粹财政上的发明，它对不同的利润却征收同样的捐税。

**六、酒税。**这种税集中了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它阻碍了生产，是令人愤懑的课得最重的一种税(见本刊第3期《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sup>①</sup>)。

**七、关税。**这是一堆毫无计划的、依照传统乱七八糟地堆积起来的关税条款，它们彼此矛盾，毫无目的，并且危害工业。例如，在法国每100公斤原棉就要课以22法郎50生丁的税。现在再谈下一种捐税。

---

<sup>①</sup> 见本卷第191—225页。——编者注

八、入市税<sup>52</sup>。这种税连保护民族工业这样的借口都不要了。这是国内的关税。最初它是地方性的济贫捐,现在主要由较贫穷的阶级担负,并且在供应给他们的食物中掺假。有多少城市,这种税就给民族工业造成多少障碍。

这就是日拉丹对各种税的评述。读者大概已经看出,他的评论是浅显的,但是公正的。他的批评归纳起来就是以下三个论点:

(1)从来没有一种税是按照它的制订者的意图由应当负担的那个阶级去负担的,而总是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

(2)所有的临时税都会固定下来成为永久税。

(3)任何一种税都不是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的,都不是公平的、平等的、合理的。

这些反对现行税制的一般的经济观点在各国都屡见不鲜。但是法国的税制有一个特点。正像英国人在公法和私法方面是真正有历史的民族一样,法国人在税制方面是真正有历史的民族,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从一般的观点出发进行归纳、简化,并抛开了传统。

关于这一点,日拉丹说道:

“在法国我们生活在旧制度的几乎所有财政措施的统治之下。主要由农民负担的直接税、人头税、间接税、关税、盐税、检验税、注册税、副本税、烟草专卖税、邮务超额利得税、火药交易税、彩票税、村镇的或国家的徭役、宿营税、入市税、河流道路通行税、临时税——所有这些税,尽管名称可以变更,但实际上都仍然存在,而且人民承受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减轻,国库的收入一点也没有增加。我们的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它不过是中世纪传统的反映,而这种传统本身就是无知的和带掠夺性的罗马财政的遗物。”

不过,我们的先辈在第一次革命的国民议会上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只是要把税收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说这种状态在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还能够继续存在,那么现在已经响起了它的丧钟:

“取消选举特权必然导致取消财政上的一切不平等。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暴力代替科学,我们就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时机,必须立即实行财政改革……税收几乎是**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唯一基础**……我们却竭力到九霄云外去寻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在税收里。在这里找吧,一找就会找到。”

那么我们找到了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捐税应当是有产者为了保证不会遭到任何可能妨害自己占有和享受财产的危险而缴纳的保险费……这种保险费应当是按比例缴纳的,应当具有严格的精确性。任何一种税收,如果它不能保证免除危险,不是为商品付出的价格,不是劳力的等价物,都应当废除;只有两种例外:舶来品税(关税)和死亡税(注册税)……于是,纳税人就被投保人所代替……谁有兴趣纳税就纳税,纳税的多少仅仅根据兴趣的大小而定……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所有的捐税之所以遭到非难,就是因为它们的名称叫捐税。一切捐税都应当废除,因为捐税的特征是具有强制性,而保险的特点则是自愿性。”

不应当把这种保险费和所得税混淆起来,保险金其实是资本税,因为它保险的不是收入,而是全部财产。国家就跟保险公司一样,它在承保时所关心的是保险物的价值,而不是保险物带来的收益。

“在法国国民财富中估计有资产1340亿,其中应当减去负债280亿。如果每年的支出预算缩减为12亿,那么只要从资本中抽1%的税就足以使国家变成一个相互保险的大公司。”

从这一时刻起也就“不要再搞革命了!”

“权威这个词为团结这个词所代替;共同的利益变成了联系社会成员的纽带。”

日拉丹先生并不满足这种一般的建议,他同时还给我们制定了一个具有一定格式的保险证,由国家签发给每个公民。

每一年前任收税官都发给被保险人一个“护照大小的共有四页的”保险证。第一页是被保险人的名字、编号以及交款登记栏;第二页是被保险人及其家庭的详细情况和本人对其全部财产的详细的并被确认的估价;第三页是法国的国家预算和总收支平衡表;第四页是各种多少有用的统计资料。这个保险证就成了护照、选举证、工人的旅行证书,等等。这些保险证的登记簿也成了国家制订四大总簿的根据:人口总簿,财产总簿,国债总簿和抵押债务总簿,这四个总簿合起来就包括了法国全部财源的完整的统计数字。

这样一来,捐税实际上就成了被保险人为了享有以下好处而缴纳的保险金:(1)有权享受社会保护、免费诉讼、免费举行宗教仪式、免费教育,有权获得抵押贷款以及向储蓄银行领取养老金;(2)免除和平时期的兵役;(3)保证不虞匮乏;(4)火灾、水灾、雹灾、牲畜瘟疫、轮船失事等造成的损失得到赔偿。

还必须指出,日拉丹先生想用各种罚金、国有土地的收入、保留下来的注册登记费、关税收入以及国家专卖事业的收益等来抵偿国家应付给被保险人在遭到损失时的赔偿费。

税制改革是一切激进资产者的拿手好戏,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改革的特殊要素。从第一批中世纪的小市民起直至当代的英国自由贸易派<sup>108</sup>,主要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捐税进行的。

税制改革的目的是不是废除妨碍工业发展的旧传统税和缩减国家预算,就是比较平等地分摊捐税。资产者对平等分摊捐税的幻想追求得越顽强,实际上这种幻想就越不能实现。

捐税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直接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

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和利润的关系,但是它从来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所有关于捐税的探讨和争论都以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万世长存为前提。甚至取消捐税也只能加速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

捐税能使一些阶级处于特权地位,使另一些阶级负担特别沉重,例如我们在金融贵族统治时期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捐税只会使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产,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把捐税的重担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

每出现一种新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更恶化一些;取消任何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在革命时期,大幅度增加的捐税可以用作打击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捐税不是促使进一步采取新的革命措施,就是最后又造成旧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

减少捐税,更公平地分配捐税等等,这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捐税,这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面向工商业中间等级和农民。现在已经生活在至善世界里的大资产阶级,自然会鄙视另一个至善世界的空想。

日拉丹先生取消了捐税,把它变成了保险金。社会成员支付一定的保险金就可以彼此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因火灾、旱灾、雹灾和破产而受到损失,一句话,就可以免除现在可能妨碍资产阶级享受安乐生活的一切危险。每年缴纳的保险费不仅由被保险人集体来确定,而且还由每一个个人自己来确定。他自己估价自己的财产。商业和农业的危机、巨大的损失和破产消失了,资产阶级存在过程中从产生现代工业起就具有瘟疫性质的一切变动和兴衰消失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富有诗意的一面消失了。于是普遍的安全和普遍的保险

便实现了。公民获得国家的书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破产。现存世界的一切阴暗面都被消除，它的所有光明面都大放异彩，总之，“酷似资产者所想象的人间天堂”的制度实现了。团结代替了权威，自由代替了强制，管理委员会代替了国家，于是便找到了哥伦布的鸡蛋：每一个“被保险人”都根据自己的财产数学般精确地来交纳保险费。每一个“被保险人”都心里装着整个立宪国家，即完备的两院制。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怕给国家付钱过多，迫使“被保险人”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贵族院的保守分子一心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促使“被保险人”倾向于过高地估价自己的财产。从这两个对立派别的立宪游戏中势必产生真正的权力均势、财产状况的精确说明和按准确的比例负担的保险费。

有一个罗马人希望有一栋玻璃房子，以便使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他的每一个行动。资产者不希望他的房子是玻璃制的，而希望他邻居的房子是玻璃制的。这一愿望也实现了。例如，某个公民希望我给他一笔垫款或者希望与我合伙。我请他拿出他的保险证来，在那上面我能看到关于他的所有公民关系的详尽陈述，这种陈述有他的明确利益作保证，有保险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签字。有一个乞丐来我这里叩门乞讨。拿出保险证来！这个公民必须肯定他救济了应该救济的人。雇一个仆人时，把他带到家里，把全家都交给他，凭的就是——一句：拿出保险证来！

“有很多婚事，操办时双方都不太晓得，该如何考虑彩礼嫁妆的实际情况，或者彼此的期望是否过高。”

那就拿出保险证来！将来互相吐露心曲的时候，只要交换保险证就行了。这样，现在造成人生欢乐与痛苦的欺骗就会消失，真正的

真理王国便会实现。而且还不仅如此。

“在现行制度下，法庭需要国家开支750万左右，如果我们那种制度实现了，违法就将给国家带来收入而不是造成支出，因为它们都变成了罚金和赔款——多么美妙的思想！”

在这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切都带来利润：犯罪消失了，而违法却带来收入<sup>①</sup>。最后，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财产为不受任何侵害而保了险，国家仅仅是一切利益的总保险公司，所以工人就永远有工作：“不要再搞革命了！”

如果这样还不能使资产者满意，  
那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使他满意！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名称的改变丝毫也不会改变这种保险的条件。日拉丹先生一度硬说各个人在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上似乎具有独立性，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得不立刻放弃这种说法。谁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谁就会遭到惩罚，因为这样保险机构就会按他申报的价格收买他的财产，甚至用奖赏的办法来鼓励别人检举。更有甚者：谁要是不愿意给自己的财产保险，谁就会处在社会之外，并被直截了当地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社会当然不能容许在它的内部形成一个反抗它生存条件的集团。于是，强制、权力、官僚机构的干涉——这些日拉丹恰恰要消灭的东西，就

---

① 这句话里的“消失”和“违法”，在德文原文中都是“Vergehen”。——编者注



会又出现在社会上。如果说日拉丹先生也曾一度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那么这只是为了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这些条件上来。

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只有作为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才有意义,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镇压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回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发展得很不充分;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迁往西部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预在东部降到了最低限度,在西部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面临的斗争,就是隐藏着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过分吹嘘,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不受阻碍的前提下对一切国家形式所抱的无所谓态度。既然关于“在更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最美丽的法国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

这样一来,在日拉丹先生的保险公司里就只剩下**资本税**了,这种税不同于所得税并且代替其他一切税。日拉丹先生的资本不是局限于投入生产的资本,它囊括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他把这种资本税吹得天花乱坠:

“这是哥伦布的鸡蛋,是建筑在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尖端上的金字塔,是一股自己开辟河道的急流,是没有革命者的革命,没有退步的进步,没有推动的运动,归根结底,这是纯朴的思想和真正的规律。”

在日拉丹先生所做的这些招摇过市的广告(众所周知,这种广告多得不可胜数)中,资本税的这则广告无疑是一个杰作。

不过,资本税作为单一税,有其优越性;所有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都证明单一税有好处。资本税作为单一税,可以一举撤掉现今的数量庞大耗费巨大的税务机构人员,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正常进程产生最小的影响,并且和其他一切捐税不同,征收的范围也包括投入奢侈品方面的资本。

可是,在日拉丹先生看来,资本税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其他十分特别的良好效果。

数量相等的资本,不管它的收益是6%或3%,或根本没有收益,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同样的税。这样,就会使闲置资本投入流通,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本,而已经投入流通的资本则会加速周转,也就是说,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两种情况结果都会使利润和利率下降。可是日拉丹先生的看法却相反,他断言在这两种情况下利润和利息都会上升,这真是经济学上的奇迹!把非生产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和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一般地会加快和加强工业危机的发展过程,会降低利润和利率。资本税只能加快这一过程,加重危机,从而加速革命因素的增长。“不要再搞革命了!”

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税的第二个神效是:它将使资本从收益低的农业流入收益较高的工业,使土地价格降低,使土地的占有集中,把英国那种大规模的耕作方式,从而把整个发达的英国工业移植到法国来。撇开为此还必须把英国工业的其他条件也搬到法国来这一点不谈,日拉丹先生在这里犯了很出奇的错误。法国的农业并不是苦于资本过剩,而是苦于资本不足。英国地产集中和农业发达并不是从农业中抽走资本的结果,相反地,是工业资本投入农业的结果。英国的土地价格远远超过法国的土地价格;英国土地的总价值几乎等于日拉丹所估计的法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因此,法国土地的价格

恐怕不仅不会随着土地的集中而下降,相反地,还会上涨。其次,英国地产的集中从地面上彻底冲走了好几代人。在法国,同样的集中(资本税必将通过使农民加速破产促进这种集中)将把这一大批农民赶入城市,从而使得革命更无法避免。最后,如果说在法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地产从分散到集中的相反过程,那么在英国大地产又大踏步地走向再一次分散,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还存在,农业就必然持续地在土地的集中与分散的循环中运动。

这些奇迹已经谈够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最初只是为地产设立的。国家发行和钞票完全相同的抵押证券,不同的只是,这里作为担保物品的不是现金或金条,而是土地。国家发给欠债的农民利率为4%的抵押证券,以满足抵押债权人的要求;现在对土地的抵押贷款不在私人债权人手里,而在国家手里,而国家把这种债务改为长期债务,因此,国家已经永远不可能要求收回债务。法国的全部抵押债务为140亿。虽然日拉丹建议只发行50亿的抵押证券,但是纸币增加这个数量却不足以降低资本的价值,而是足以使纸币完全贬值。因此日拉丹还不敢使这种新的证券具有强制比价。为了避免贬值,他建议这种证券的持有人兑换票面价值为3%的公债券。总结起来,这种交易的结果就是:农民以前支付利率5%和抵押证券过户及契约更新手续等费用1%,现在只支付利率4%,即赚了2%;国家按利率3%贷入,按4%贷出,赚了1%;以前按利率5%取得利息的抵押债权人,在抵押债券贬值的威胁下,不得不以感谢的心情来接受国家给他提供的3%的利率,因此损失2%。而且,农民不必再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债权人则不能再向国家追收他应得的款项。因此,这种交易不过是对抵押债权人的直接的用抵押证券勉强掩饰起来的掠夺,从5%的利率中夺去2%。这样一

来,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除了改革捐税外还想改变社会关系本身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直接侵犯私有财产,不得不成为革命者,放弃自己的一切幻想。但是,就连这种侵犯也不是从他开始实行的。他是从德国共产主义者那里抄袭来的,后者在二月革命以后首次要求把抵押债务变为欠国家的债务<sup>①</sup>,当然后者的做法是和日拉丹先生的做法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日拉丹先生所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提出多少有点革命味的措施的时候,他只提出了缓解的办法,而没有勇气提出其他的东西,而这种缓解办法只能使法国的土地分散过程更加持久,只有让时光倒退几十年,才能最终又回到现在的这种状态。

读者在日拉丹的整本书里唯一没有读到的就是工人。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总是设定社会只是资本家构成的,这样做是为了以后能够从这一点出发来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问题。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3月中—大约4月18  
日之间

载于1850年4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sup>①</sup>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编者注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时评。<sup>\*</sup> 1850年3—4月<sup>148</sup>

(上一期因篇幅所限未能刊登每月时评。现在我们仅把这篇时评中有关英国的部分补登在这里。)

二月革命<sup>4</sup>纪念日前不久,当卡尔利埃下令砍掉自由之树<sup>109</sup>的时候,《笨拙》刊登了一幅自由之树的画<sup>①</sup>,树的叶子是刺刀,果实是炸弹,在这棵长满了刺刀的法国自由之树的旁边,有一首歌词赞颂一棵挂满英镑、先令、便士等累累硕果的英国自由之树。但是,生意人惯用的这种恶毒挖苦比起《泰晤士报》从3月10日以来对“无政府状态”的胜利所表现的强烈愤怒,未免黯然失色。英国的反动政党,像所有其他国家的反动政党一样,对巴黎受到打击,就感同身受。

其实,目前对英国“秩序”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来自巴黎的危险,而是这种秩序造成的新的最直接的后果,是那棵英国的自由之树所结出的果实——商业危机。

在本刊1月份时评(第2期<sup>②</sup>)中,我们曾经指出,危机已经逼

① 1850年3月《笨拙》第18卷第9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74—275页。——编者注

近。许多情况都使危机加速到来。在1845年的最近一次危机以前，过剩资本被大量投入铁路部门进行投机。然而，生产过剩和狂热的铁路投机规模之大，以致铁路营业甚至在1848—1849年的繁荣时期也未能恢复元气，而且这个部门最殷实企业的股票价格也还特别低。低贱的粮价和1850年的农村年景也没有给投资提供什么好机会，而各种国家证券风险很大，不能进行有把握的投机。这样一来，繁荣时期过剩资本的通常出路就被堵塞了。过剩资本只好全部投入工业生产并用于殖民地商品以及重要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的投机。由于以前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本相当大的一部分直接投入工业，工业生产自然就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就使商品充斥市场，从而大大加快了危机的爆发。现在，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和在投机活动中，已经显露出危机的苗头。一个月来，举足轻重的工业部门即棉纺织业完全陷于萧条，而遭殃的又是棉纺织业中的一些主要部门，特别是生产普通衣料的纺纱业和织造业，棉纱和普通印花布价格的跌幅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原棉价格的跌幅。生产日益减缩；几乎所有工厂都缩短工时。工厂指望大陆的春季订货能给工业生产带来暂时的复苏，但是，不仅国内市场、东印度、中国、黎凡特的以前的订货现在多半已经退掉，平常能保证生产两个月的大陆订货由于政局动荡也几乎完全没有了。在毛纺织业中，不时出现一些征兆，据此预料，目前还相当“不错”的生意不久就会结束。生铁的生产也困难重重。企业主们认为不久的将来生铁价格势必下跌，于是力图在他们之间联合起来制止价格暴跌。工业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来谈一谈投机。棉花跌价，一方面是因为供货又有了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萧条。殖民地商品的情况也是这样。供货在增加，而国内市场的消费量却在减少。近两个月来，就有25船茶叶运到利物浦。对殖民地商品的

消费,由于农业区的贫困甚至在繁荣时期也处于很低的水平,而现在连工业区也出现紧缩状态,就更严重地影响对殖民地商品的消费。由于上述原因,利物浦经营殖民地商品的**最大商号之一**已经受到这种冲击。

目前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就其影响来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会严重得多。商业危机将同从英国废除谷物税<sup>162</sup>时起就已经开始,并且由于最近丰收而愈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一起爆发。英国第一次**同时经受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会具有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会像德国那样受到英国危机如此直接、广泛和强烈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德国是英国在大陆上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而德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羊毛和粮食则在英国销路最广。这种情况在一首讽刺秩序之友的短诗里就有反映:工人阶级因消费品不足而群起造反,上层阶级则因生产过剩而倾家荡产。

当然,辉格党人<sup>146</sup>将是危机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会像以往一样,只要即将袭来的风暴一发作,就会失去国家领导权。不过,这一次他们得同唐宁街的官邸永远诀别。即使起初可能由托利党<sup>145</sup>内阁来暂时代替他们,但这个内阁的基础还是在晃动,以工业家为首的所有反对派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他们手中也并没有像废除谷物法时所用的那种备受欢迎的灵丹妙药来治疗危机。他们不得不至少进行一下议会改革。这就是说,他们必将取得政治统治,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为无产阶级打开议会的大门,把无产阶级的要求提到下院的议事日程上去,并使英国卷入欧洲革命。

这篇关于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的短文是一个月以前写的,现在只略加补充。通常在春天出现的短暂的旺季,这次也终于出现了,但还是比往常差一些。主要生产夏装薄布的法国工业在这次旺季获利特别多,而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西区,订货也有所增加。顺便提一下,工业的这种短暂的活跃是每年春天都出现的,但也只能稍微延缓一下危机的发展。

在东印度也出现了商业的瞬间的活跃。对英国比较有利的汇率使商人们有可能按低于平常的价格抛售自己的一部分存货,因而孟买的市场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这种短暂的、局部的转旺,是一种偶然性,特别在每次危机之初往往都会发生,它对于危机的整个过程影响并不大。

与此相反,刚刚从美国得到消息说,那里的市场完全处于萎缩状态。但是美国市场最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市场商品充斥、美国生意萧条和物价下跌,也就是真正危机的开始,也就是对英国产生直接、迅猛和不断的影响的开始。只要回忆一下1837年的危机,便会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只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即美国的公债券,这是唯一能给我们的欧洲秩序之友的资本提供可靠的庇护所的国家证券。

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大陆上的政治事件也日益不可遏止地要爆发,本《时评》不止一次谈到的那种商业危机和革命同时爆发也越来越不可避免。<sup>①</sup> 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 [愿注定

<sup>①</sup> 见本卷第275—276页。——编者注



的事情发生吧!]

1850年4月18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3月中—4月18日之间

载于1850年4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弗·恩格斯

## 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sup>194</sup>

在1848年和1849年，科隆出版了一家德文日报——《新莱茵报》。这家由卡尔·马克思任主编，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斐·沃尔弗和威·沃尔弗等人共同出版的报纸，作为德国唯一的无产者的刊物，英勇无畏地捍卫最先进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很快就获得了非凡的信誉。普鲁士政府利用去年5月间莱茵地区起义的失败，对编辑们进行种种迫害来使这家报纸停刊，结果他们便离开了那里，以便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或正在进行的各种运动里去找寻新的活动场所。他们有几个人去了巴黎，那里的形势即将发生决定性的转折（6月13日）<sup>22</sup>，他们就在法国民主的中心代表德国的革命党；有一人<sup>①</sup>进入了当时正被卷入起义的德国国民议会；还有一人<sup>195</sup>去了巴登，在革命军队中同普鲁士人打仗。这些起义失败之后，他们就在英国、瑞士和法国过着流亡生活。由于暂时没有可能重新创办一家日报，便在情况允许他们在本国的日报中重履旧职之前，办起了一个月刊作为他们的机关报。

这个刊物的第一期刚刚拿到。刊物的名称同过去的日报一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样——《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卡尔·马克思主编。

第一期只收入三篇文章。开头的一篇是主编卡尔·马克思写的论述过去两年的革命事件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接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篇文章<sup>①</sup>，叙述去年5月、6月和7月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起义运动。最后是卡尔·布林德（巴登临时政府前驻巴黎大使）写的关于巴登各党派情况的文章。后两篇文章中虽然有许多重要的揭露，但主要是德国读者会感兴趣。第一篇文章写的是所有各国读者，特别是工人阶级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一题目由公民马克思来写从各方面说都是最合适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应该在有限的版面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以摘录的形式刊载。

此处所讲的这篇文章写的是二月革命<sup>4</sup>、它的起因和结果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直至1848年6月的大起义<sup>5</sup>。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在这些失败中实际上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只是革命政党的一些非革命成分，即造反党<sup>②</sup>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了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了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

①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本卷第3—109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见本卷第131页。——编者注

力的斗争,造反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这就是公民马克思在文章中发挥的主题。他首先揭示二月革命的起因,他对这些起因的解释比以前任何论述这一问题的作家都远为深刻。所有研究最近二十年法国国内大事的历史学家都普遍认为: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整个资产阶级是法国的统治力量;1847年揭露出的丑闻<sup>①</sup>是引起革命的主要原因;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直接斗争。在公民马克思的笔下,这些论断虽然没有被直接、完全否定,但是有了重要的修改。

这位德国历史学家证明,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政权并不是集中在整个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集中在这一阶级的一小部分人手里,这部分人在法国称为金融贵族,在英国则叫作银行巨头、交易所巨头、铁路巨头如此等等或者叫作金融巨头,以区别于工业巨头。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本身越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毫无成果的起义<sup>59</sup>之后<sup>②</sup>,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已经巩固,则它的

---

① 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各次起义被血腥镇压以后”。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

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小店主<sup>①</sup>，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这种金融贵族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一切公共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利益，他们把国家看作只是用来增加他们财产的工具。公民马克思很有说服力地描述了这种丑恶的制度怎样在法国竟存在了18年之久；政府债台高筑、开支增加、无休无止的财政困难和国库亏损怎样成了为金融巨头的私囊增添财富的大量源泉，这些财源一年比一年更加流畅地汇入他们的私囊，国家的财力更加迅速地被耗尽；政府、陆海军、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开支怎样为金融家们提供了成百上千的机会，他们贪婪地抓住这些机会用骗人的合同来欺蒙公众，如此等等。总之——

“七月王朝<sup>65</sup>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为数可观<sup>②</sup>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利浦是这个公司的乔治·赫德森<sup>③</sup>——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

① “各阶层的小店主”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为数可观”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个公司的经理”。见本卷第134页。——编者注

尤其是在社会①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1847年戴斯特、普拉兰、居丹、杜亚里埃等人的丑闻②败露,把这种事态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法国政府在克拉科夫问题上<sup>60</sup>和瑞士宗得崩德<sup>61</sup>事件中的无耻行径,极大地伤害了法国的民族自尊心;而瑞士自由派的胜利和1848年1月巴勒莫的革命<sup>63</sup>则鼓舞了反对派的士气。

“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使普遍不满爆发成了起义。这两个事件中的第一件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③。1847年的那个接近于饥荒的局面④,在法国和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都引起了流血的冲突,这边是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的生活,那边是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sup>64</sup>,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第二个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资产阶级社会”。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更使得到处民怨沸腾”。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

④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1847年的物价腾贵”。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

重大经济事件<sup>①</sup>,就是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失败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英国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sup>162</sup>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人破产,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法国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支持议会改革的宴会宣传中联合了起来<sup>②</sup>。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在巴黎,商业危机<sup>③</sup>还引起一个特别的后果:一批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他们开设大公司,使大批小店主被他们的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他们也因此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的作用引发了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成立了。所有的反对党都有代表参加这一政府:王朝反对派<sup>66</sup>(克雷米约、甚至还有杜邦-德勒尔),共和派资产阶级(马拉斯特、马利、加尔涅-帕热斯),共和派小资产阶级(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和无产阶级(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共同起义,及其虚构的成果、幻想、诗意。按

-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加速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
-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
-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工业危机”。见本卷第136页。——编者注

他的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新政府里占大多数。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阶级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由‘陶醉于革命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国人的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sup>①</sup>，巴黎工人最好还是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云云。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无产者强迫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作了他们的发言人。他声明，如果两小时内不照办，他将再次带领20万武装工人回来。结果，两小时期限未到，共和国就宣布成立了。

“工人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政府，并通过它强加给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其实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政府，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sup>67</sup>从1830年革命<sup>②</sup>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这一广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必须等待他们投票表决”。见本卷第137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七月王朝”。见本卷第139页。——编者注



大阶级(实际上的土地所有者是资本家,因为土地已经抵押给他们了)①即农民指定为法国的命运的裁定人。最后,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正如1830年的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而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1830年的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1848年的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工人把这个让步也从共和国那里②争到手了。”

“劳动权”和卢森堡宫委员会(由于设立了这个委员会,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实际上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实权则掌握在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手里)是这些社会机构中最引人注目的。工人们看到他们自己是在不与资产阶级对抗,而与资产阶级互不相干并排共存的情况下去谋求自己的解放。交易所和银行依然存在,只是在这两个资产阶级教堂旁边设立了卢森堡宫委员会这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工人们相信他们能在不触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获得解放,而且他们也同样相信他们能在不触犯欧洲其余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下获得解放。

“工业工人阶级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③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创

① “土地”、“这一广大阶级”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从共和国那里”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而是“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见本卷第140页。——编者注

造出现代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最后根底<sup>①</sup>,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目前法国的工业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工业都更发达<sup>②</sup>。但是二月革命首先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在二月以前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sup>③</sup>工业为自己的产品夺得了世界市场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在国内市场的范围内<sup>④</sup>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里昂、里尔、米卢斯、鲁昂<sup>⑤</sup>这样几个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商人中间。因此,充分发展的和达到转折点的反资本主义斗争<sup>⑥</sup>,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物质根底”。见本卷第141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比整个大陆上的资产阶级更革命”。见本卷第141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文章中接着是：“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见本卷第141页。——编者注

④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在国内市场的范围内”，而是“在本国的疆界内”。见本卷第141页。——编者注

⑤ 这几个地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⑥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见本卷第141页。——编者注

为在当时,反对次一等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厂主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藏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之中。在革命进程把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即既非资产者又非无产者,构成法国国民大众的农民和小商人<sup>①</sup>发动起来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并迫使他们参加无产者行列<sup>②</sup>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到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工人们才能够不是在不触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宣布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并把它作为与资产阶级利益直接相反的利益加以维护<sup>196</sup>。工人们只能用 1848 年 6 月惨重的失败作代价走向<sup>③</sup>这个胜利……

于是,这并非在现实中,而是<sup>④</sup>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工人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互相敌对的<sup>⑤</sup>阶级存在或至多只认为这是君主制<sup>⑥</sup>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大人物的想象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sup>⑦</sup>。这时,一切保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农民和小商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见本卷第 141 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见本卷第 141 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来换得”。见本卷第 142 页。——编者注

④ “这并非在现实中,而是”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⑤ “互相敌对的”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⑥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立宪君主制”。见本卷第 142 页。——编者注

⑦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集团的伪善的词句里”。见本卷第 142 页。——编者注

皇党人一下子都称自己是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称自己是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和阶级利益<sup>①</sup>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人人都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互相斗争着的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

我们将在下一期继续刊登这些摘录。那时将评论临时政府的措施,国民议会的召开和六月的起义。

在本刊4月号上,我们对公民马克思关于二月革命的述评一直介绍到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它最先采取的措施。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个政府里有足够力量来谋取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能够利用巴黎无产者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的所在和怎样促进这种利益而得益。以下我们继续摘录:——

“共和国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碰不到什么抵抗。仅仅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是要它自己去适应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苛求。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最能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解决这一任务的。

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当然被动摇了。社会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养肥犹太金融家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反对的首先是金融贵族。此外,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

<sup>①</sup>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阶级和阶级利益”,而是“阶级关系”。见本卷第142页。——编者注

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可见,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就已经瘫痪,流通已经不畅,生产已经停滞。革命危机当然加剧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财富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sup>①</sup>、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没有受到侵犯并且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即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宫的斯芬克斯<sup>②</sup>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又该产生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信用,因为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状况。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必须保证它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再度上升。

为了使人不致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偿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虚张声势的手段。法定偿付期限未到,它就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骄矜自负的态度就立刻恢复了。

银行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金融贵族的高教会<sup>69</sup>。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见本卷第144页。——编者注

② 指卢森堡宫委员会。——编者注

正像交易所操纵着社会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私人信用<sup>①</sup>。

革命不仅直接威胁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银行本身的生存；银行一开始就到处破坏信用，以图使共和国丧失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私人银行家，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然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其结果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害。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下室里的钱提出来。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赶到银行去挤兑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可以不用任何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破产；它只要冷眼旁观，让银行听天由命就行了。银行倒闭就会像洪水泛滥一样，转瞬间把金融贵族，这个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银行一旦破产，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么资产阶级不也一定会把这看作是政府的最后努力吗？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像皮特在1797年那样，中止现金支付<sup>②</sup>，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使法兰西银行网遍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这家银行订约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金融贵族的权势<sup>③</sup>！”

众所周知，政府对交易所和银行的金融巨头那样宽大，而对构成社会另一极的各阶级却是这样做的：对工人和小商人是没收他们在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商业信用”。见本卷第145页。——编者注

② “像皮特在1797年那样，中止现金支付”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银行统治”。见本卷第145页。——编者注

储蓄银行的存款，对农民则是在四种直接税中每法郎再加征 45 生丁<sup>70</sup>。

“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被没收，并宣布为统一公债。这就激起了<sup>①</sup>小商人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商人领到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公债券，他们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者去宰割，而他们进行二月革命正是为了反对这些高利贷者！！

四十五生丁税首先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而他们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致命的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致命的问题。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等于这项可恨的税，而在他们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懒散的浪子。1789年的革命是从免除农民一切封建负担开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却<sup>②</sup>首先就对这个阶级<sup>③</sup>加上一项新税。

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断然脱出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现任财政部长，高利贷银行家富尔德曾向赖德律-洛兰提出过这一补救方法，而这位公民，如他自己在国民议会所述，对这样一个建议则严辞驳斥，其义愤填膺之状人们记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原已处境困窘的”。见本卷第 144 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见本卷第 146 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农民”。见本卷第 146 页。——编者注

记忆犹新。<sup>①</sup>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sup>72!!!</sup>

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投降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多年的革命旧帐,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催逼的债务人。它只得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sup>②</sup>,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的许诺,都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无产者解放——即令只是空话——也已成了共和国不堪忍受的危险,因为要求无产者解放,意味着不断反对恢复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阶级对抗<sup>③</sup>为基础的。所以,必须一定要一劳永逸地把工人清除出去。”<sup>④</sup>

二月已经把军队逐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武装的资产阶级,成了巴黎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靠自己来对付无产者。尽管极力防范,这支部队还是搀进了工人的成分。因此,别无他法,只能用工人来反对工人了。

① “现任财政部长……”这句话,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说法不同。见本卷第146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

④ “一劳永逸地”是恩格斯加的。在5月号的《民主评论》上登到这里为止。——编者注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组织了 24 营别动队<sup>73</sup>，每营 1 000 人，征召的主要是 15—20 岁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流氓，他们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特点<sup>①</sup>不同而有所不同，<sup>②</sup>他们的性格在受政府征募的那种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作出轰轰烈烈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醒醜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给一个半法郎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表上不同于穿工服的工人。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从军队派来的军官，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人要为共和国牺牲的高调迷住了他们。人民就把这 24 000 名刚刚离开街垒的健壮、蛮干的青年士兵当作自己的军队，当作与旧的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相对立的真正的无产阶级自卫军。<sup>③</sup>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此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队。马利部长把 10 万个（因革命和危机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的国家工场<sup>75</sup>。在这个响亮名称之下不过是以 23 苏（11 个半便士）一天<sup>④</sup>的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文化水平”。见本卷第 147 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的特点”。见本卷第 147 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代替这句话的是：“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他们自己当中招募的年轻力壮、蛮干的 24 000 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向列队通过巴黎街头的别动队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见本卷第 148 页。——编者注

④ “（11 个半便士）”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工资雇用工人去从事枯燥、单调和非生产性的筑堤劳作等等罢了。**国家工场**只不过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sup>76</sup>。临时政府希望这样就组建了第二支可以用来反对整个工人阶级<sup>①</sup>的无产者大军。但这一次资产阶级把**国家工场**看错了,正如工人把**别动队**看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不过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国家工场**——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场同卢森堡宫的设想完全不同。谣传<sup>②</sup>这些**国家工场**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因为**国家工场**的预言者路易·勃朗自己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了。在巴黎资产阶级、法国和欧洲的受到操纵的舆论中<sup>③</sup>,这些习艺所竟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于是社会主义就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场**上。同时,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场**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公然宣布反对二月革命的幻想时就首先加以打击的对象。小生意人阶级也把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场**当作发泄自己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工人本身”。见本卷第148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见本卷第148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在巴黎资产阶级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过程中,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操纵的舆论中”。见本卷第148页。——编者注

牙切齿地计算着这班无产阶级懒汉花费的钱财，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变得一天比一天艰难。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场，就在于卢森堡宫的浮夸之词，就在于无产者在巴黎示威游行。最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阴谋诡计的，莫过于这些濒临破产<sup>①</sup>的小资产者，巴黎小店主<sup>②</sup>了。

这样，正当陶醉于胜利的人民每天都收到激动人心的新的革命消息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它同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把所有的优势，所有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把社会的各个中间阶级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sup>③</sup>”

必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一系列道义上的胜利。虽然无产者在3月17日明显地占有优势，但示威的真正目的，即迫使临时政府服从无产者的意志，并没有达到。4月16日则是无产者的一次决定性失败，而且接着就是军队开回巴黎。不久，国民议会的选举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

“普选权并不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全法国，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同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而又毫无得救希望”。见本卷第149页。——编者注

② “巴黎小店主”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正是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又在整个欧洲大陆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时而从意大利，时而从德国，时而从最遥远的欧洲东南部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不断地给人民带来胜利的的证据，使人民普遍地沉浸在欣喜的情绪之中，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这种胜利”。见本卷第149页。——编者注

一观点和智力的公民。这就是他们那种人民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的**意想中的**法国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也就是说,是各个不同阶级代表构成的人民。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小生意人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必定由现在又①好斗起来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统辖,然而,普选权虽没有共和主义者所想象的那种魔力,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功绩:它发动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②阶层的幻想和失望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步一步③地过去;它一下子使资本家阶级所有集团都进入政权,从而揭去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过去在君主制下所戴的骗人的反对派假面具④。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sup>53</sup>。正统派<sup>67</sup>和奥尔良派<sup>80</sup>本身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只有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⑤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武器,而相反地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整个法国在国民议会里对巴黎工人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明确而不容置疑地宣布了资产

① “现在又”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中等” 见本卷第151页。——编者注

③ “一步一步”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④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限制选举资格的君主制度则只是让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集团丧失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得以隐藏在幕后并且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见本卷第151页。——编者注

⑤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唯一合法的”。见本卷第151页。——编者注

阶级共和国<sup>①</sup>，它从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恢复原状。**’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帮助下建立<sup>②</sup>的。无产者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战胜者，并提出战胜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击败和战胜这些无产者。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作出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王权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出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不真正出生于二月胜利，而是出生于六月失败。”

5月15日的冲突<sup>③</sup>、6月23日、24日、25日、26日的战斗<sup>④</sup>，它们的直接原因和与这些原因有关的事件是人所共知的。六月失败暂时地解决了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个情况就已经注定它有罪。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解决这个任务。《通报》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下自己的处境，那也是没有希望的<sup>⑤</sup>”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见本卷第152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争得”。见本卷第152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是一种空想”。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于是，原先工人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看起来狂妄而实质上细小的、甚至还带有中等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呼声取而代之，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靠工人们的鲜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迫使它现了原形<sup>①</sup>：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支配地位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眼前总是站着—一个决不妥协与不可战胜的敌人，<sup>②</sup>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中等阶层，即小店主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日益明显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那么在别的大陆国家却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六月起义以后资产阶级到处都和封建王朝结成公开的联盟，这种联盟就被王朝利用来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

“……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这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权之下。

---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见本卷第155—156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见本卷第156页。——编者注

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而定。<sup>①</sup>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下一次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允许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自由发展<sup>②</sup>。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sup>68</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3 月  
中—5 月之间

载于 1850 年 4—6 月《民主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见本卷第 156 页。——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见本卷第 156—157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 法国来信<sup>50</sup>

选举。——红色分子的辉煌  
胜利。——无产阶级的优势。  
——秩序党人的沮丧。——对  
革命进行镇压和挑衅的新计划

1850年3月22日于巴黎

胜利了！胜利了！人民在呼喊，而且喊得这么响亮，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阴谋的人工堆砌的大厦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卡诺、维达尔、德弗洛特——巴黎的人民代表，以127 000—132 000张票当选了。这就是人民对政府和议会多数的卑鄙挑衅的回答。卡诺是《国民报》派在临时政府时期唯一没有向资产阶级谄媚而招致资产阶级极大憎恨的人物；维达尔是早就出名的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德弗洛特是布朗基俱乐部的副主席，1848年5月15日<sup>62</sup>冲进议会事件的第一批积极参加者之中有他，同年6月街垒战<sup>5</sup>中的先锋战士中有他。他被判处放逐，现在却从囚船上径直走进立法议会之宫。的确，这样



的人选是意义重大的<sup>197</sup>！它表明：如果说红党的胜利是由于小生意人阶级同无产阶级结成了同盟，那么，这个同盟借以建立的基本条件，较之那个曾经导致君主制覆灭的暂时联合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正是这个小生意人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尤其是在制宪议会中占优势，并且很快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现在则相反，工人是运动的领导者，而那个同样遭受资本压迫而落得倾家荡产的、由于在 1848 年 6 月效了劳而受到破产报答的小资产阶级，则不得不跟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步伐行进。农民也是这种情况。于是，现在反对政府的那些阶级的全体群众——他们构成法国人的绝大多数——便都在无产者阶级领导下，由它率领前进；而且他们认识到，他们本身要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得不取决于工人的完全彻底的解放。

各省的选举也对红色党派极为有利。红色党派的候选人有三分之二当选，而秩序党人只有三分之一。

这个党，或者党派的大杂烩，十分清楚地理解人民的这一明确的暗示。他们现在懂得，如果容许 1852 年包括议会和新总统在内的普选仍按现在的选举制度进行，摆在他们眼前的就是不可避免的灭亡。他们明白，人民是如此迅速地团结在红旗的周围，他们哪怕是只把政权执掌到任期届满都是不可能的了。一方面是总统<sup>①</sup>和议会，另一方面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一天比一天壮大，组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方阵。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秩序党<sup>54</sup>人等待得越久，人民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大。他们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们必须尽快地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他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尽快地挑起起义并与之

---

<sup>①</sup>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编者注

进行最后决战。此外,在3月10日的选举以后,“神圣同盟”<sup>62</sup>对于它应奉行什么方针也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现在瑞士已经不在话下<sup>198</sup>。一个庄严可畏的革命的法国重又屹立在它的面前。因此,必须进攻法国,越快越好。“神圣同盟”的现金越来越不足了,而现在要想使那种合意的物品得到新的补充,希望很小。每一个国家单是在国内已经不能把军队维持下去了——要么把军队解散,要么叫他们靠敌人供养。可见,我在上一封信中告诉你们革命和战争已经迅速临近,这个预言正为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sup>199</sup>。

秩序党人暂时又放下了他们的内部争吵。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向人民进攻。他们更换了巴黎卫戍部队,因为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投了红色人物的票;而昨天,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关于恢复报纸印花税的法案,另一个法案规定把所有报纸的保证金增加一倍,第三个法案是取消竞选集会自由。接着还会有其他法案:其中之一是规定警察局有权把任何一个不在巴黎出生的工人驱逐出巴黎;其二,是允许政府不经审讯把认为犯有参加秘密社团罪的任何公民放逐到阿尔及尔去,此外还有许多法案,都是以对普选权或多或少直接攻击为收场。可见,他们是以取消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利来挑动起义。起义是要爆发的,而且与广大的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的人民,定将很快地推翻这个声名狼藉的阶级政府,这个政府除了进行卑鄙的压迫以外根本没有能力干任何事情,可是却厚颜无耻地以“社会救星”自诩!!!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

22日

载于1850年4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2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告同盟书<sup>200</sup>

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兄弟们!

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sup>201</sup>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可是在同一个时候,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

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甚至渐渐地中止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当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中央委员会理解到这种必要性,因此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改组同盟。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sup>3</sup>使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穆尔格河战役中阵亡。他的牺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资历最深、最积极和最可靠的成员,他参加过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前往各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7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重聚在伦敦,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立即动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的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

兄弟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掌握统治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转过来对付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已成为事实。1848年三月运动<sup>16</sup>之后,资产者果然立即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资产

阶级如果不同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最后甚至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它终究为自己保住了一些条件,假如革命运动现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由于政府陷入财政困难,那些条件就可能使统治权逐渐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不会采取这种和平进程。相反,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sup>62</sup>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sup>202</sup>,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在迄今为止的运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点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即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sup>3</sup>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

一派的代表是历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 and 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到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正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凡是在他们还能找到机会用立宪的办法追求自己目标的地方，如在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坚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此外，很明显，改变这个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不得不反对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且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主要税负由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构，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

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的乡镇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那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作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

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1. 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2. 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度？

3. 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巨大的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沦为官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官方民主派相抗衡，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同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采取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雷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猖狂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



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联合。一旦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正如历来的情况一样，将来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发生冲突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抗衡。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

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 and 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

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

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通过俱乐部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中央委员会一有可能就迁往德国,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审查旨在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一个设在主要运动中心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各个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屏除于选举之外。

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听信民主派的空话,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这些空话,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蒙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预先就会被消除掉。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会像法国农

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次，民主派或者是直接力求建立联邦共和国，或者，如果他们不能回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乡镇和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以便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他们不应当被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任何一个像德国这样还需要铲除那么多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那么多地方性和省区性痼习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和省都设置什么新的障碍去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重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德国人在每个城市和省都不得不为同一个前进步骤而独自去搏斗。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比现代私有制还要落后，并且到处都必然陷于解体而转变为现代私有制，——也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使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裕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永无休止地发生争执，决不能容许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刁难工人的规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

真正革命党的任务<sup>①</sup>。

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呢?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 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进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2. 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扩展,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

---

<sup>①</sup> 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通过大革命才开始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和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和地方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刚刚结束以后,就急忙取消这种自治制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可见,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同政治的和全国的中央集权制相抵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同自治州或乡镇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德意志南部的所有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企图在德国把它奉为准则。”——编者注

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3月24日以前

1850年印成传单,1885年由恩格斯收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霍廷根—苏黎世版)中作为附录发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sup>203</sup>

我们的读者大概还记得，上一期里我们曾经指出，法国的金融贵族又当政了<sup>①</sup>。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指出，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结成联盟是为了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所投机。富尔德一参加内阁，路易-拿破仑不断向立法议会要钱的行动突然停止了，这件事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最近的选举以后，暴露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波拿巴总统收入的来源。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谈一下。

我们的文章中主要将引用选民同盟<sup>204</sup>冠冕堂皇的机关报《祖国报》。这家报纸的老板是银行家德拉马尔，他本人是巴黎最大的交易所投机商之一。

趁着3月10日的选举，一次哄抬价格的大规模的投机活动被制造了出来。这一阴谋活动中为首的是富尔德先生。第一流的秩序之友都参加了。波拿巴先生的党羽和他本人也为这件事情投入了很大一笔钱。

3月7日三分息的证券上扬5生丁，五分息的证券上扬15生

---

① 见本卷第205—209页。——编者注

了。这就是由于《祖国报》公布了选举秩序之友的初步结果。不过这点涨价对我们的投机者来说太微不足道了，还应当“加油”。因此，前一天晚上出版的3月8日的《祖国报》在其交易所公报中曾指出，对秩序党的胜利不必有丝毫怀疑。报纸还写道：

“我们自然不会去指责资本家们的谨慎；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情况不容怀疑的话，那就是初选有了结果以后的现在这种情况。”

要想充分估计《祖国报》的交易所公报和所有报道对交易所的影响，就应当知道，这家报纸是现政府的真正的通报，它得到的官方消息比《通报》得到的都早。尽管如此，这次投机还是没有成功。

当3月8日人们得知军队中的某些有利于红党的选举结果以后，牌价马上就下跌了。看来，投机者们都惊慌失措；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对付。《祖国报》的交易所公报态度坚持不变。选民同盟的所有报纸都被卷入这一斗争；对选票统计中某些无足轻重的差错展开了热烈争论；有一家报纸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投票拥护君主主义者的一个团的选举结果；共和派的报纸最后不得不登载官方的辟谣消息，不过这种辟谣没有几天就证实也是一些谎言。

经过所有这些努力，在3月9日交易所开市时国家证券的价格略有回升，不过没有持续多久。在两点一刻以前牌价相当低；自两点一刻起到交易所收盘时止<sup>①</sup>牌价步步上扬。关于这个突然转变的原因《祖国报》自己泄露出来了：

“有人断言，一些感到提高牌价对自己非常有利的投机者在交易所快要收盘的时候大量购入，以便在选举时使外省振奋起来，并且依赖外省的信任而造

---

<sup>①</sup> 在巴黎交易所，从下午1点到3点进行交易。——编者注



成再一次购入,这必然使牌价更为上扬。”<sup>①</sup>

这是一次几百万法郎的交易,由于这次交易,三分息的证券上扬 40 生丁,五分息的证券上扬 60 生丁。

由此可见,有些投机者感到上扬对自己有利,所以在紧要关头,他们再一次大量购入,以便引起进一步上涨。这些投机者是谁呢?事实可以回答这一点。

3月11日交易所牌价下滑。面对变换不定的选举结果,投机者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

3月12日牌价又大大下滑,因为选举结果几乎已经人所共知,3个社会主义者候选人<sup>②</sup>获得强有力的多数的选票,这几乎已经是确定无疑了。抬高价格的投机者还企图拚命挣扎。《祖国报》和《晚报》在官方电讯的幌子下登载了纯粹捏造出来的外省选举结果。手腕耍成功了。晚间,在托尔托尼<sup>205</sup>牌价略有回升。可见,问题只是在于继续“加油”。《祖国报》登载了如下的一则报道:

“根据到目前为止已知的投票表决的情况,公民德弗洛特仅比公民斐·富瓦多得 341 票。在机动宪兵队选举之后,选举结果还可能变得对我们候选人有利。有人断言,明天政府将向立法议会提出两项法案——新闻出版法和选举集会法,并且要求立即通过。”<sup>③</sup>

第二个消息是捏造的;只是在犹豫很久以后,又经过与秩序党首领长久讨论和内阁更迭之后,政府才决定提出这两项法案。第一个消息更是无耻的谎言:正当《祖国报》发表这个消息的时候,政府已把

① 1850年3月10日《祖国报》第69号。——编者注

② 拉·伊·卡诺、保·路·弗洛特和弗·维达尔。——编者注

③ 1850年3月15日《祖国报》第74号。——编者注

德弗洛特当选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各省。

然而投机成功了：证券上扬了1法郎35生丁，投机者先生们则赚了三四百万法郎。为了秩序和社会，“财产之友”竭力想多抓到一些他们的崇拜物，这当然不能责怪他们。

在从事这次成功的投机勾当之后，投机者先生们竟如此狂妄，以致他们马上又一次大规模购入，并以此促使其他许多资本家也去购入。证券上扬很多，甚至在交易所里已经把这次交易中可能获得的利润都算进去了。但是在15日由于卡诺、德弗洛特和维达尔被宣布为人民的代表，而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牌价突然发生无法制止的暴跌，任何假消息和假电报都挽救不了我们投机者的失败命运。

卡·马克思写于1850年3月  
底—约4月18日之间

载于1850年4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再次发表路易·梅纳尔  
《Jambes》一诗加的按语<sup>206</sup>

我们的朋友路易·梅纳尔,《革命的序幕》一书的作者,告知我们采用他在1848年六月屠杀之后立即写作的这首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4月上半月

载于1850年4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sup>207</sup>

德国的所谓革命政党竟冷漠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在法国或者在英国会引起公愤的事情,在德国却会悄然过去,甚至会得到普遍赞许,而对此却没有人感到惊异。瓦尔德克先生在陪审法庭上提出了详细的证人证词,说明他一向是端正的立宪主义者,而柏林的民主派却欢呼着把他迎接回来。格律恩先生在特里尔的公开审判时极其荒谬地否定革命,而审判厅里的听众却不顾被判了罪的无产者,向这个被宣告无罪的市侩欢呼。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 1849 年 8 月 4 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发表的、并在今年 4 月 6 日和 7 日的柏林《晚邮报》上刊登的辩护词,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说明在德国竟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预料得到,我们向我们的党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引起感伤主义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普遍愤懑。我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的任务是无所顾忌地批判,这种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我们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甘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所享有的廉价声望。我们的抨击丝毫也不会使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恶化;我们的揭露会使他得到赦免,因为我们证实了他的表白,即他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人,并且我们还宣告,他不仅应

该受到赦免，而且甚至应该担任普鲁士公职。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公布了。我们要向我们的党揭露整个辩护词；在这里我们只引用几处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

“我也从来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因此我也不能对其他人的行为负责。所以我抗议把我的行为同一些卑鄙龌龊的行为混为一谈，遗憾的是，据我了解，卑鄙龌龊的行为终于玷污了这场革命。”

难道因为金克尔先生“在贝桑松连里是个士兵”，难道因为他用这番话对所有的军官表示怀疑，他就没有责任在这里至少把他的顶头上司维利希除外吗？

“我从来没有在军队里服役过，所以，我也没有违背过誓言，没有用如果我为祖国服役可能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反对祖国。”

对于被俘的前普鲁士士兵扬森和贝尼高而言，难道这不是直接告密吗？他们两人在这之后不久就被枪杀了。难道这不是完全承认把已经被枪杀的多尔图判处死刑是正确的吗？

此外，金克尔先生同样还向军事法庭告发了自己的党：他谈到把莱茵河左岸划归法国的计划，并表白自己同这些罪恶的计划毫无关系。金克尔先生明明知道，把莱茵省并入法国只是在以下意义上说的：莱茵省在革命同反革命进行决战中将无条件地站在革命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他同时也没有忘记指出，他不同于野蛮的革命者，他性格温和，这就有可能使他即使不作为一个党员，也会作为个人同阿恩特和其他保守派分子融洽相处。

“我的过错就在于，我在夏天仍然要求你们大家在3月里，全体德国人民在3月里要求的東西！”

他在这里把自己描绘成一心想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他除了这个帝国宪法之外,从来没有要求别的什么东西。他的声明我们记录在案。

金克尔先生谈起他写的一篇有关普鲁士士兵在美因茨骚扰<sup>208</sup>的文章,他说:

“我因此受到了怎样的对待呢?当我不在家的時候,为了这件事曾两次要把我传到法庭去,因为我不能出庭为自己辩护,所以我被判处剥夺选举权五年(这是有人最近告诉我的)。对我判决剥夺选举权五年,对于一度曾荣幸地当选为议员的人来说,这是极其残忍的惩罚”(!)。

“我常常听人说,我是个‘坏普鲁士人’;这种话是对我的侮辱……算了!我的党目前在我的祖国遭到了失败。如果现在普鲁士国王终于奉行大胆而强有力的政策,如果我们的王位继承者普鲁士亲王殿下能够用武力统一德国(因为用别的办法是不行的),使德国在我们的邻国面前成为一个伟大而又令人尊敬的国家,保证国内有真正的持久的自由,使整个的商业和交通重新活跃起来,使全德国均匀分担目前压在普鲁士身上的过于沉重的军事负担,并且首先使我的人民中的穷人(我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都能吃到面包,——如果你们的党能够做到这一切,那我立誓跟你们走!对我来说,祖国的荣誉和尊严比我的政治理想更可贵;对1793年的法国共和主义者(富歇和达莱朗?①)我知道如何评价,他们后来为了法国的利益心甘情愿屈服于拿破仑的权势;如果在我们这里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我的人民再一次给我荣誉,选我当他们的议员,我就会成为首先衷心欢呼‘德意志帝国万岁!’‘霍亨索伦帝国万岁!’的议员中的一个。如果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便是坏普鲁士人,那好吧,我当然就不企求成为好普鲁士人。”

“各位先生,在你们判决一个今天由于人类命运的转变而极为不幸地站在你们面前的人的时候,请也稍稍为他家里的妻儿想一想吧!”

金克尔先生发表的这个辩护词,正是在他的26位同志被同一个

---

① 这两个人都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编者注

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被枪决的时候。这些人在死亡面前的态度与金克尔先生在法官面前的态度迥然不同。此外,金克尔把自己描绘成绝对无辜的人,那完全是对的。他加入他的党纯属误会;如果普鲁士政府还继续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4月中

载于1850年4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 辟 谣<sup>209</sup>

我们从华盛顿获悉：“《纽约快邮报》编辑狄德埃先生自称曾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此说并非事实，特此声明。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4月中前后

载于1850年4月《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sup>210</sup>

4月14日柏林《晚邮报》刊登了以下报道(4月11日于斯德丁):

“在救济伦敦流亡者的问题上作了如下规定:把款子寄给布赫尔,由他同(施特里高)施拉姆取得联系,因为其他两个委员会意见不一,分配款子不公。”

在伦敦这里实际上只有一个流亡者委员会<sup>211</sup>,即下面署名的委员会。本委员会成立于去年9月流亡者开始移居伦敦时。以后,曾试图再建立其他流亡者委员会,可是没有成功。本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对来到此地的需要帮助的所有流亡者,除了四五人没有申请以外,都已经给予救济。但是,由于最近从瑞士被驱逐的流亡者蜂拥而至,本委员会的款子最后也几乎已经告罄。这些款子发放给那些证明自己曾参加过德国革命运动并且需要帮助的人,不论他属于什么派别,完全一视同仁。本委员会取名“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因为它只救济这一派的流亡者,而是因为它主要靠的是这一派的资金,这一点在它去年11月的呼吁书<sup>212</sup>中已经作了说明。

谣传伦敦这里为流亡者存有大量的钱,这显然是由于建议在瑞士为帮助流亡者举办的抽彩而引起的一种谣言,因此就有人向我们

委员会提出了无法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各家报纸也故意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在相互竞争的委员会之间存在分歧,致使一大笔款子未能寄到伦敦。本委员会为了弄清楚是否有救济流亡者的其他资金和其他委员会,曾经要求流亡者派代表团去公民司徒卢威、鲁道夫·施拉姆和施托尔珀的路德维希·鲍威尔那里。这件事已经照办了。流亡者带回的答复如下:

施特里高公民施拉姆声明,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流亡者委员会,但是他从日内瓦的加莱尔那里得到一些彩票,并受托把款子寄往日内瓦。另外的委员会只不过是空架子。

公民司徒卢威声明,他没有钱,而只有尚未推销出去的一些彩票。

公民鲍威尔给了如下的书面声明:

“为了回答流亡者克莱纳的问题,本人作如下证明:这里的民主主义同盟流亡者委员会连一个政治流亡者都无力救济;这个团体的出纳处在支出2英镑15先令救济金以后,再也无力进行这类的援助了。

民主主义同盟救济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医生

1850年4月8日于伦敦”

司徒卢威先生和施拉姆先生曾经向流亡者建议,由自己的人或者由政治上中立的人组成流亡者委员会。本委员会让流亡者自己对该建议作出决定。流亡者发表如下声明作为答复: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经事先协商,下面签名的流亡者认为,似应将照管我们的工作交给由我们自己组成的委员会,并根据原来的流亡者和新近来到的流亡者的一致意见,认为应向现今的委员会委员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在管理这一工作中所从事的活动和所付出的辛劳,因为他们始终把所掌管的款项分配得使我们感到满意。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但愿这些委员们继续关怀我们,一直到我们大家所

盼望的即将到来的革命使他们不必照管我们为止。

致以

兄弟的敬礼!

(签名)

1850年4月7日于伦敦”

流亡者自己所写的这个文件,是对上述文章以及报刊上其他类似怀疑的最好回答。顺便提一下,如果不是为了需要救济的流亡者本身而必须向公众澄清这类言论,那我们是不予以理睬的。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弗·恩格斯 亨·鲍威尔

奥·维利希 卡·马克思

卡·普芬德

1850年4月20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4月18日—20日之间

载于1850年4月25日《西德意志报》第9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弗·恩格斯

## 法国来信<sup>50</sup>

[三月选举后的政治形势。  
——巴黎的重新选举]

1850年4月20日于巴黎

在3月10日选举之后本来已经不可避免的革命,由于政府和目前领导巴黎运动的人们的怯懦而推迟爆发了。3月10日的选举和一再得到证实的军队中的叛乱情绪,使政府和国民议会惊恐万状,以致不敢立即作出什么结论。它们下决心通过我在上封信里向你们列举的那些新的镇压法;但是,如果说内阁和多数派的某些领导人对这类措施是信得过的,那么,大多数议员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就连政府也很快对这些措施又丧失了信心。因此,这些镇压法中的一些较严厉的法案,至今还没有提出来,甚至那些已经提出来的法案——新闻出版法和选举集会法——,多数派的态度也是犹豫不定。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党没有像应该做到的那样,从这次的胜利中取得好处。其原因十分简单。这个党不仅仅由工人组成,目前它又吸收了小店主阶级的大量成员,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比无

产者的社会主义要温和得多。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非常清楚，只有无产者的解放才能使他们免于破产。他们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也懂得，如果无产者通过革命夺得了政权，他们这些小店主就会完完全全地被放在一边，并处于工人阶级想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的境地。相反，如果现政府被和平地推翻，那么，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这个目前所有反对阶级中最不可憎的阶级，就可以很从容地进入并掌握政府，同时把其中尽可能小的一部分给予工人。可见，小生意人阶级就像政府害怕自己的失败一样，害怕自己的胜利。他们看到一场革命正在他们眼前展开，于是就立即尽力加以制止。为此他们具有现成的手段。公民维达尔除在巴黎当选外，也在下莱茵省当选。他们怂恿他接受下莱茵省的委任状，这样，巴黎就必须举行新的选举。很清楚，只要人民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胜利，他们决不会去呼吁“拿起武器”，然而一旦人民被挑动起来举行起义，即使胜利的机会极少，他们也要进行搏斗。

新的选举规定在本月 28 日举行，而政府立即就利用了可爱的小店主们创造的有利形势。内阁部长们搬出了旧的警察条例，以便把许多暂时没有工作的工人赶出巴黎；他们直接禁止一切选举集会，表明即使不提出反对选举集会法，他们也能够应付<sup>213</sup>。人民知道他们的斗争在选举之前是不会有成效的，于是便屈服了。完全掌握在小店主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报刊，自然尽一切可能来稳住群众。自从“自由之树”事件以来，这种报刊的行为是极端无耻的。在这期间，人民起义的机会出现过很多次，但报刊总是鼓吹和平和安定，同时，小店主的代表在选举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中，经常为人民的愤懑开辟和平发泄的出口，力求减少巷战胜利的机会。

红色党派被迫采取的违背原则的立场和秩序党人从新的选举中得到的好处,在两个参加竞选的候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红色党派的候选人欧仁·苏是好心的、“甜言蜜语的”、感伤的小店主社会主义的突出代表人物,这种社会主义完全不承认无产者的革命使命,宁愿用小生意人阶级的善意庇护来给无产者以虚幻的解放。欧仁·苏作为政治人物是渺小的。为了显示力量而提名他为候选人,是从3月10日占领的阵地上后退了一步。不过应该承认,如果说感伤的社会主义注定要在今天时髦起来,那么,在被推选的人中,苏的名字最孚众望,而且他很有希望当选。

另一方面,秩序党人<sup>54</sup>恢复了自己的阵地,现在它用六月起义中的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勒克莱尔先生<sup>116</sup>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对抗欧仁·苏这个默默无闻或名气很小的人物。勒克莱尔是对德弗洛特的直接回答,也是比其他任何名字更为直接的对工人的挑衅。提出勒克莱尔作为巴黎的候选人,就是重复奥普尔将军的话:“现在,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乐意上街,我们准备奉陪!”<sup>①</sup>

正像你们所看到的,巴黎的重新选举没有给无产阶级的党提供什么好处,相反,已经给它造成了极大的坏处。还应当指出另一个事实:3月10日的选举是按旧名册进行的;4月28日的选举将按照4月1日生效的、新修订过的1850年选民名册进行;而在这份修订过的名册中,在种种借口下有20 000—30 000工人被勾掉了。

然而,即使秩序党人这一次能得到微弱多数,他们也不是获胜者。事实毕竟是事实,只要普选权还存在,秩序党人就再也不能治理法国了。事实毕竟是事实,社会主义已经广泛感染了军队,军队就只

① 见本卷第221和297页。——编者注

等待公开叛乱的时机。事实毕竟是事实,巴黎的工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结束目前的状态。他们从来都没有像这次这样公开地在竞选集会上发表意见,直到他们被禁止。而政府加紧攻击普选权,将给人民提供进行战斗的机会,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无疑将获得胜利。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4 月  
20 日

载于 1850 年 5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1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sup>214</sup>

先生：

在上周五贵报登载的警方消息中，我们注意到关于福瑟吉尔先生、司徒卢威先生等人代表德国流亡者在伦敦市长官邸与首席市政委员吉布斯先生会晤的一条报道。我们谨作如下声明：本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以及任何受本委员会救济的德国流亡者，均与此事无关。

我们请求您将此声明在贵报下一号上刊出，因为从我们的民族利益出发，我们必须提出抗议，不能让居住在伦敦的众多流亡者为他们中某些人擅自采取的步骤负责。

顺致敬意

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卡·马克思

卡·普芬德

弗·恩格斯

亨·鲍威尔

奥·维利希

5月27日于草市大磨坊街20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5月24—27日

载于1850年5月28日《泰晤士

报》第2050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弗·恩格斯

\*法国来信

(片断)<sup>215</sup>

[废除普选权的结果]

如果无产者容忍他们的选举权被夺走，他们就会听任二月革命<sup>4</sup>获得的与他们利益有关的成果化为乌有。对于他们，共和国将不再存在。他们将被关在共和国的外面。他们能容许这样做吗？

这个法案是一定会通过的，它丝毫不会放宽。多数派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决心<sup>216</sup>。按照目前的状况，谁都无法估计后果将会怎样——是人民起来推翻政府和议会，还是人民将等待另一个时机。巴黎看来是平静的，没有革命行将到来的直接征兆；但是，一个火星就足以引起熊熊烈火。

要不是那些除了鼓吹“和平”、“安定”和“庄严的宁静”就无所事事的有名的领袖们的叛变行径，<sup>217</sup>烈火早就燃烧起来了。然而这种情况长不了。法国的形势是高度革命的形势。秩序党人<sup>54</sup>保不住原来的东西。为此他们必须每天前进一步。如果这一法案通过了而没有激起革命，他们将对宪法和共和国发动新的、更狂暴和更直接的进

攻。秩序党人要的是叛乱,而得到的将是革命,并且很快就会得到。因为必须记住,这是几周的问题,也可能是几天的问题,而不是几年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5 月  
底

载于 1850 年 6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2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的  
“无政府之友”<sup>218</sup>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只有作为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才有意义，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镇压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回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发展得很不充分；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迁往西部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预在东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在西部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面临的斗争，就是隐藏着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过分吹嘘，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不受阻碍的前提下对一切国家形式所抱的无所谓态度。既然关于‘在更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最美丽的法国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4期第58页①)

废除国家,实行无政府主义此刻在德国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用语。蒲鲁东的四下逃散的德国门徒<sup>219</sup>,柏林的“最高的”民主派和甚至斯图加特议会、帝国摄政政府<sup>10</sup>中已被遗忘的“最高尚的民族精英”<sup>220</sup>,都按照各自的一套办法学会了这一貌似激烈的用语。

所有这些派别都一致力图维护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既然要保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必然主张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自然主张由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和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不同的地方,不过是他们具有的“先进的”、“最进步的”外表赋予他们的不寻常形态。这种外表在实际生活中一遇到冲突就消失了;每当革命危机中出现真正的无政府状态<sup>②</sup>,群众互相使用“野蛮暴力”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总是又千方百计地来控制无政府状态。这种备受赞美的“无政府主义”的含义,归根到底同“比较发达的”国家里用“秩序”二字来表达的意思毫无二致。德国的“无政府之友”和法国的“秩序之友”是心心相印的。

无政府之友不从属于法国人蒲鲁东和日拉丹,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日耳曼式的,就这点而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施蒂纳。总的说来,德国哲学解体时期给德国民主派提供了绝大部分通用辞句。德国晚近的一些学者(尤其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概念和辞句,在二月以前就已经以杂乱的形式深入了平庸的小说文学思想和报刊文章,而这些东西又成了三月革命后的民主派代言人的主要依

① 见本卷第351页。——编者注

② 手稿中接着删去了“当国家政权在群众政权面前消失的时候”等字。——编者注

据。施蒂纳鼓吹的无国家论特别适合于使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日拉丹的消灭国家的主张具有德国哲学所固有的“崇高庄严”。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sup>221</sup>一书诚然已经被人遗忘,但是他的思想方法,特别是他对国家的批判却又浮现在无政府之友那里。如果说我们过去已经研究了这些先生取之于法国的文献资料<sup>①</sup>,那么现在为了分析他们取之于德国的资料,我们就必须再次深入那早已过时的德国哲学的底蕴。既然要进行一场德国的日常论战,那么,和某种观点的最先的发明人打交道总比同旧货商打交道要愉快得多。

诗神,请为我再准备一次飞马,  
让我飞向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sup>②</sup>

在谈论上面提到的施蒂纳的那本书以前,我们必须回忆一下“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和那已经被忘却的该书问世的时代。那时普鲁士资产阶级抓住政府财政困难的机会,着手夺取政权,就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和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一起日益蓬勃地开展起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需要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不得不处处装扮成某种社会主义的样子;保守的和封建的党派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许下诺言。在资产阶级和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斗争的同时,无产者进行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在它们之间有一系列中间的社会主义派别,囊括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斗争和趋向都受到压制,由于国家政权的压迫、

① 指对艾·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见本卷第342—354页。——编者注

② 维兰德的诗《奥拜龙》。——编者注

由于书报检查和禁止集会结社等而无法表现出来。在德国哲学取得它最后的微不足道的胜利的时候,各党派的情况就是如此。

书报检查制度从它实行之日起就迫使一切多少有点不受欢迎的人采取尽量抽象的表达方式;当时恰好处于黑格尔学派土崩瓦解时期的德国哲学传统提供了这种表达方式。反对宗教的斗争还在继续。越难于在报刊上开展反对现存政权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也就越尽力采取宗教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形式。形式非常杂乱的德国哲学,就成了“有教养的人”的共同财富,它越成为共同财富,哲学家们的观点就越杂乱、支离、空泛,而这种混乱和庸俗反过来又使哲学家们在“有教养的”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越来越高的威信。

“有教养的人”头脑混乱得令人吃惊,而且每时每刻有增无已。它是德国、法国、英国、古典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思想的大杂烩。之所以会这样混乱,是由于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从第二手、第三手以至第四手得来的,因而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遭此厄运的不仅有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且还有德国人的思想,例如黑格尔的思想。当时所有的著作,特别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施蒂纳的著作,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而且现代的德国著作至今还饱受这种后果之苦。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哲学上的假战斗被当作了真战斗的反映。哲学上的每一次“新变动”都引起了“有教养的人”的普遍注意,这种人在德国包括为数众多的思想懒汉、见习法官、候补教师、失意的神学家、难以为生的医生、文人等。在这些人看来,每发生一次这样的“新变动”都意味着克服和最终排除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只要随便哪个哲学家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随便怎么批判一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会死亡,就会从历史发展中一笔勾销,而在现实中也就

被消灭了。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也是这样。究竟这些发展阶段被“消灭”、“清除”和“排除”到什么程度,这在以后革命时期,它们开始起主要作用,而消灭它们的那些哲学家突然间无人再提起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

晚近的德国哲学混乱的形式和内容,无谓的妄自尊大和浮夸的胡言乱语、极端的庸俗和辩证法的贫乏——所有方面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候。能够相提并论的只有公众难以置信的轻信态度,因为他们对这一切竟然信以为真,竟然认为是崭新的东西,是“从未有过的东西”。德意志民族,如此“认真的”……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5 月  
底—8 月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27 年  
6 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第 6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① 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告同盟书<sup>222</sup>

1850年6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兄弟们!

我们在经同盟特使<sup>①</sup>转发给你们的上一个通告<sup>②</sup>中,阐明了工人政党,特别是同盟,无论在目前或者在革命时期所持的立场。

本通告的主要目的是报告一下同盟的情况。去年夏天革命政党遭到了失败,一时间同盟的组织几乎完全濒于瓦解。参加过各种运动的非常积极的同盟盟员都被迫各奔东西,联系中断了,通信地址已经不能再用,加上信件有被人偷拆的危险,曾经一度无法通信。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到将近去年年底时还完全陷于停顿。

① 亨·鲍威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85—396页。——编者注

随着遭受失败造成的最初影响逐渐消失，德国全国各地都需要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的组织。这种需要一方面促使中央委员会决定派遣一名特使到德国和瑞士去，另一方面促使在瑞士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秘密联合会，并促使科隆支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在德国改组同盟。

今年年初，在瑞士，一些因为参加过各种运动而多少有点名气的流亡者组成了一个联合会<sup>223</sup>，其宗旨是在适当时机参与推翻各邦现政府，并且准备好能担负领导运动甚至接管政府的各种人员。联合会并不具有明确的政党性质，因为它的成员形形色色，不允许具有这种性质。他们来自参加过各种运动的各个派别，从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从以前的同盟盟员起，直到胆怯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前普法尔茨政府成员。对于当时留居瑞士的那么多巴登-普法尔茨的谋求一官半职的人和其他次一等的不甘寂寞的人来说，联合会可以向他们提供所希望的升官的机会。

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该联合会发给它的代表们的指示，很难令人信任。缺乏明确的政见，企图把现有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弄到一个挂名的联合会中，这一切只不过是拙劣地用所提出的关于各地区的工业、农业、政治和军事情况的一大堆细节问题加以掩盖而已。这个联合会的力量也微不足道。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完整的会员名册，瑞士的整个联合会在其全盛时期，会员也不过30名。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工人，这是很特殊的。它一直就是一支没有士兵、完全由军士和军官组成的队伍。他们中间有普法尔茨的彼·弗里斯和格赖纳、埃尔伯费尔德的克尔纳以及济格尔、约·菲·贝克尔等人。

他们派了两名代表到德国。第一个是同盟盟员荷尔斯泰因的布伦。他用欺骗手段使一些同盟盟员一度加入了新的联合会，使他们

把联合会看作是重建的同盟。同时,他还把有关同盟的情况报告给设在苏黎世的瑞士中央委员会,而把有关瑞士联合会的情况报告给我们。他不仅玩弄这种两面手法,当他还同我们保持通信联系的时候,写信给在法兰克福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被拉入瑞士联合会的人,直接诽谤同盟,并指令他们不要同伦敦建立任何联系。因此,他立即被开除出同盟。法兰克福的事情由同盟特使作了处理。在其他方面,布伦为瑞士中央委员会进行的活动也毫无成效。

第二个代表是波恩的大学生叔尔茨,他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正如他本人在给苏黎世的信中所写的,他发现所有可利用的力量已经掌握在同盟的手里。后来,他突然离开德国,现在他正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游荡,在那里,他受到同盟的监视。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这个新的联合会对同盟有什么危险,特别是因为在该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位十分可靠的盟员<sup>①</sup>,他受托监视并报告这些人反对同盟的措施和计划。此外,中央委员会还派了一名特使到瑞士<sup>224</sup>,与上述那位同盟盟员一起把可利用的力量都吸收到同盟里来,并在瑞士改组同盟。此处提供的消息均根据十分可靠的文件。

司徒卢威、济格尔以及其他一些当时在日内瓦串通在一起的人,早就有过类似的企图。这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把他们企图组织的联合会冒充为同盟,并且为此目的滥用同盟盟员的名义。当然,他们的这种谎言是蒙骗不了任何人的。他们的企图到处都未能得逞,就连这个从未建立起来的联合会的几个留在瑞士的成员最后也不得不加入了上述的组织。但是,这个派别越是软弱无力,它就越是像“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sup>225</sup>之类的响亮称号来炫耀自己。在伦敦这里,

---

① 威·沃尔弗。——编者注

司徒卢威还同其他一些失意的大人物一起继续贯彻这种企图。他们往德国各地寄发宣言以及敦促参加“全德流亡者中央局”<sup>226</sup>和“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通知,但是,这一次也毫无效果。这个派别同法国的革命者和其他非德国的革命者的所谓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它的全部活动不外是在本地的德国流亡者中间搞一些小动作,而这些人同同盟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不构成什么危险,又容易监视。

所有这类企图追求的目的要么与同盟追求的目的相同,即建立工人政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分散力量,使党失去了集中性,从而失去了力量,因此这种企图无疑是有分裂主义;要么就只能是为了再次利用工人政党以实现同该党不相干的或直接敌对的目的。工人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派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于其他任何政党。而那些在上次运动<sup>3</sup>中参加了政府的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出卖运动并且压制想独立活动的工人政党,对这样一些人无论如何应当保持远距离。

关于同盟的情况报告如下:

## 一、比 利 时

在比利时工人当中,像1846年和1847年存在过的那种同盟组织,自从1848年一些主要同盟盟员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来又减判为无期徒刑以来,当然已经不复存在了。<sup>227</sup>整个说来,从二月革命和大部分德意志工人协会<sup>228</sup>会员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时候起,比利时的同盟已经大大削弱。目前的警察制度不准许它重整旗鼓。虽然如此,在布鲁塞尔一直保存着一个支部,它直到今天还存在,并且在尽力进行工作。

## 二、德 国

中央委员会本打算在此通告中专门报告一下同盟在德国的情况。但是,目前还不能作这样的报告,因为普鲁士警方现在正好在侦查革命政党中间日益扩大的联系。本通告将采取可靠途径送往德国,但是,在德国国内传播过程中当然有时可能落入警方手里,因此,在起草本通告的时候,尽量不让它的内容被警方利用来作为反对同盟的工具。因此,中央委员会这一次只限于报告如下情况:

同盟在德国的主要活动地点是科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美因茨、威斯巴登、汉堡、什未林、柏林、布雷斯劳、利格尼茨、格洛高、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班贝格、维尔茨堡、斯图加特、巴登。

指定为各地区的总区部的是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什未林(梅克伦堡);布雷斯劳(西里西亚);莱比锡(萨克森和柏林);纽伦堡(巴伐利亚);科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

格丁根、斯图加特和布鲁塞尔的支部在它们还没有能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足以成立新的总区部以前,暂时仍同中央委员会保持直接联系。同盟在巴登的情况在收到派往那里和瑞士去的特使<sup>①</sup>的报告以后才能确定。

像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梅克伦堡有农民和雇农协会的地方,同盟盟员对这些协会能够施加直接的影响,并且完全掌握了部分协会。萨克森、法兰克尼亚、黑森和拿骚的工人和临时工协会大部分也在同盟的领导之下。工人兄弟会<sup>229</sup>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会员也是同

---

① 恩·德朗克。——编者注

盟盟员。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支部和盟员都认识到,对工人协会、体操协会、临时工协会等组织施加的这种影响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各地都应当做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要求各总区部以及同它保持直接通信联系的各支部在其最近的来函中专门报告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被派到德国并在活动中取得成绩而受到中央委员会表彰的特使<sup>①</sup>,在各地只吸收一些最可靠的人入盟,并且托付他们发展同盟,因为他们比较熟悉当地的情况。坚定的革命者能否被直接吸收入盟,这要看当地的情况而定。在不可能这样做的地方,应当把那些对革命有用又可靠的,但还不了解当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成盟员的第二部分。应当把这个第二部分盟员看成是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他们必须始终由真正的盟员和同盟领导机构领导。借助于这种比较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对农民协会和体操协会的影响就很容易巩固起来。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总区部负责,中央委员会期待总区部也尽快提供这方面的报告。

有个支部建议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同盟代表大会,而且在德国本土召开。各支部和各区部自己都会认识到,在当前的情况下,甚至总区部的区域性代表大会也不是各地都宜于召开的,而召开一次全同盟的代表大会在目前则根本不可能。但是,只要条件许可,中央委员会就会在某个适当地点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科隆总区部的一名特使<sup>②</sup>不久前到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了解情况。但是,伦敦还没有收到关于此行结果的报告。我们要求所有总区部尽快以同样方式派特使考察本地区并尽快报告考察结果。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

---

① 亨·鲍威尔。——编者注

② 彼·诺特荣克。——编者注

点,同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已经同军队取得联系。有关同盟在那里所能产生影响的较为详细的报告,不久可望收到。

### 三、瑞 士

现在还没有收到特使的报告<sup>①</sup>。因此,在下次通告中才能作出较详细的通报。

### 四、法 国

贝桑松和汝拉山区其他地方的德国工人将通过瑞士重新建立联系。在巴黎,一直担任当地支部领导工作的同盟盟员艾韦贝克已经声明退盟,因为他认为他的著作活动更为重要。同巴黎的联系也就暂时中断了,在重新建立联系时,必须更加谨慎,因为巴黎的同盟盟员已经把一些完全不合适的、甚至过去直接敌视同盟的人接收入盟了。

### 五、英 国

伦敦区部是全盟最强大的区部。它特别突出的地方是,几年来,同盟的经费,特别是特使的差旅费几乎全部是由它筹措。近来,它由于吸收了新的成员而更加壮大了,它一直领导着本地的德意志工人

---

<sup>①</sup> 恩·德朗克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于1850年7月3日寄出。德朗克在1850年7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及同盟的事件。——编者注

协会<sup>32</sup>和侨居本地的德国流亡者中坚定的一派。

中央委员会通过专门派出的几个盟员同法国人、英国人和匈牙利人的坚决革命的政党建立了联系。

法国的革命者,特别是布朗基所领导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布朗基主义的秘密协会的代表与同盟的代表保持经常的、正式的联系,他们还把迎接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的一些重要准备工作委托给同盟的代表去做。

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们<sup>①</sup>也经常同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报刊可以供我们使用。这个革命的独立的工人政党同比较倾向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以奥康瑞尔为首的一派之间的分裂,由于同盟代表的影响而大大加速了。

中央委员会同匈牙利最进步的流亡者党派也保持同样的联系。这个党派很重要,因为其中有许多在革命时期可为同盟效力的杰出军人。中央委员会要求各总区部尽快地在其盟员中散发本通告并立即报告情况。正当目前形势极为紧张,新的革命不久即将爆发的时候,应加紧活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  
写于 1850 年 6 月 7 日

1885 年由恩格斯收在马克思的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  
(霍廷根—苏黎世版)中作为附  
录发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和 1960 年德文版第 7  
卷翻译

① 主要是厄·琼斯和乔·朱·哈尼。——编者注



卡·马克思

\*致《纽约州报》编辑部<sup>230</sup>

您不会要求我同两名声名狼藉的骗子伯恩施太因和贝尔奈斯先生论战吧。他们对我的攻击,我是从贵报上才得知的。我只确认一些事实。

载勒尔写小册子我没有参与。他把小册子献给我,事先我也不知道。同时,我自己在《新莱茵报》2月和3月那两期上叙述了6月13日的情况。<sup>①</sup>

伯恩施太因先生说: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马克思先生在他自己的寓所曾受到他抨击过的两个人的严厉诘难。马克思用胆怯的否认推托掉了云云。”

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上午,伯恩施太德先生、卡·伯恩施太因先生、勒文费尔斯先生和两个工人出现在我巴黎的寓所。他们事先从看门人那里得知我当时不在家,于是就闯进我的公寓,粗鲁地对我太太大吵大闹。我回家得知这些先生们的粗野行径后,立即由恩·德朗克和弗·恩格斯陪

<sup>①</sup> 见本卷第158—225页。——编者注

同前往总部责问伯恩施太德。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其他几个人正围着他。伯恩施太德向我解释说,他和海尔维格作为领导人不会参与任何决斗,而要让他们的一些同伴出来办。这个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拒绝。于是,伯恩施太德对在我家的吵闹作了种种辩解,说是一次误会,等等。

伯恩施太因先生说我作了“胆怯的否认”,但是他最清楚,我不是背着这些先生,而是当面,并且当着他们志愿军团成员的面,公开地抨击他们的。这些志愿军团成员大批地出现在我们圣丹尼街俱乐部,存心恐吓我们,这当然没有得逞。另外,为了整个志愿军团的灵魂伯恩施太德的荣誉,我必须补充一点:他曾经从他被囚禁的拉施塔特的监狱写信到科隆给我,承认自己不对,完全同意我在巴黎的行动,拒绝与那些只是企图利用德国工人热情的人发生任何进一步的联系。

至于伯恩施太因先生,1844年有人向我、卢格、海涅、海尔维格,总之向《德法年鉴》的全体撰稿人告发,说他是骗子和政治可疑分子。谁告发的呢?是贝尔奈斯先生。贝尔奈斯先生觉得还不够,又给伯恩施太因写了许多非常粗野的信。在信中,他历举了使他蔑视这个伯恩施太因的全部经过。伯恩施太因和贝尔奈斯先生之间后来怎么又亲密起来了呢?贝尔奈斯先生在无数与事实不符而又热情得受不了的书信中有一封向我揭穿了这种关系的谜,让我开心了好几年。我不向公众透露这件丑事。同一个贝尔奈斯先生在二月革命<sup>4</sup>前写的另一封同样还保存着的信中向我告发了“高尚的海尔维格”——不是告发他私人,而是告发他这个有党派身分的人。伯恩施太因先生一开始就是一个出了名的骗子。至于贝尔奈斯先生,我承认,我虽然知道他有动不动就流泪并以心地善良而自负这些弱点,但看到他这

个行动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逐步投靠拉马丁和卡芬雅克,我还是感到很惊讶的。这个可怜虫!

卡尔·马克思

1850年6月7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0年6月  
7日

载于1850年7月6日《纽约州  
报》第2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1982年第5辑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普鲁士流亡者<sup>231</sup>

给《太阳报》编辑的信

编辑先生！

一些时候以来，我们这些在信后署名的侨居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有理由赞扬的是，不仅普鲁士使馆而且连不列颠政府也对我们颇加关注。对此我们本来不必特别重视，因为我们很难设想会在哪些方面破坏外侨管理法<sup>232</sup>中所谓“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安宁”的规定；可是，近来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到关于普鲁士公使<sup>①</sup>奉命坚决要求把最危险的流亡者驱逐出英国的消息，而且大约一周以来我们一直受到英国警探的严密监视，因此经过郑重考虑，我们认为必须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毫无疑问，普鲁士政府在尽力争取使用外侨管理法来对付我们。但是，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干涉英国政治吗？要证明我们这样做过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普鲁士政府

---

① 本生。——编者注

需要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柏林发生枪击国王<sup>①</sup>的事件，是各地广泛开展阴谋活动的结果，而其中心则似乎必须在伦敦寻找。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真相。行刺事件的魁首泽费洛盖除了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疯子之外，是极端保皇主义团体“忠实者同盟”<sup>233</sup>的成员，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他已经以柏林第2分部133号在这个团体登记，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不久前他还受到这个团体的资助，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泽费洛盖的证件保存在供职于皇家陆军部的一个极端保皇主义者库诺夫斯基少校的家里，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

面对此类事实，硬说革命党同行刺事件有什么瓜葛，真是令人可笑。普鲁士亲王迅速登上宝座对于革命党毫无好处，而对极端保皇主义者却有。虽然如此，普鲁士政府却正在让激进的反对派为行刺事件付出代价，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法令<sup>②</sup>和伦敦普鲁士使馆的活动就是证明。

同时，我们要声明一点，大约在行刺事件前两周，有些人来找我们，想要引我们卷入杀害国王的阴谋活动，我们认定这些人都是普鲁士的暗探。当然，我们没有上当。

如果不列颠政府想得到有关我们情况的任何材料，我们准备随时提供。但是我们不理解，政府通过密探来监视我们，是想了解些什么。

在俄国庇护下正处于恢复中的神圣同盟，<sup>62</sup>如果能够迫使英国——它道路上的唯一绊脚石——在内部实行反动政策，是会非常高兴的。如果完全由于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

---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1850年6月8日。——编者注

分)要进行复仇而采用外侨管理法,那么对于加了这种注释的英国的反俄情绪、政府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人们又将作何设想呢?

我们相信,神圣同盟的各国政府不可能使不列颠政府受骗到让内务部采取措施的程度,否则作为各党和各国流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长期以来所赢得的声誉将大受损害。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奥·维利希

科隆《新莱茵报》编辑

巴登起义军上校

1850年6月14日于索霍广场迪恩街64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6月14日

载于1850年6月15日《太阳报》1801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sup>234</sup>

1850年6月14日于索霍广场迪恩街64号

编辑先生!

一些时候以来,我们这些在信后署名的侨居贵国的德国流亡者有理由赞扬的是,不列颠政府对我们颇加关注。我们已经习惯于时常碰到普鲁士使馆的藏头露尾的官员(“此项职务并未依法登记在案”);我们听惯了这些挑拨者非常讨厌的装腔作势的话和疯狂的建议,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我们要赞扬的不是普鲁士使馆对我们的关注——对此我们感到自豪;但是,我们要赞扬的是,普鲁士密探和英国告密者显然是为了对付我们而建立的亲密一致的关系。

说实话,编辑先生,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英国会有像我们在短短一周中荣幸地见到的那么多的警探。不仅如此,我们住宅的门旁,还被一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严密监视着,一有人进出,他们都耐心地记下来,不管我们去哪里,步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关照。我们不知道办这种令人惬意的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请问,这群可怜的密探,这些显然按计件工资从最没用的告密者当中招募来的最下流的卖淫男子,从我们门坎旁搜集到的一点点情报,能给谁带来什么好处呢?难道他们得到的情报——当然十分可靠,——竟如此珍贵,以致使人有权为了它不惜牺牲英国人历史悠久的豪言,说他们国内不可能实行无论哪个大陆国家也离不开的密探制度吗?

此外,我们一直愿意而且现在仍然愿意尽可能提供政府希望得到的有关我们情况的任何材料。

其实,我们非常清楚事实真相。普鲁士政府利用最近行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事件<sup>①</sup>,来重新掀起一个反对普鲁士国内外政治敌人的运动。因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疯子向普鲁士国王开了一枪,有人就诱使英国政府对我们采用外侨管理法,虽然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住在伦敦会在哪些方面妨碍“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安宁”。

大约八年前,我们在普鲁士曾经反对当时的统治制度,政府官员和报刊扬言:如果这些先生不喜欢普鲁士制度,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国家。我们来到国外,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离开以后我们也到处碰到普鲁士的阻难;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我们都感到普鲁士公使施加的影响。如果我们现在由于这种影响被迫离开我们在欧洲剩下的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那么普鲁士将会认为自己是统治世界的力量。

对于在俄国庇护下正处于恢复中的神圣同盟<sup>62</sup>来说,到目前为止英国一直是它道路上的唯一绊脚石;而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最企求的就是要诱使敌视俄国的英国采取多

---

① 见本卷第 435 页。——编者注



少像俄国那种对内政策。如果完全由于外国反动政府要求复仇而采用外侨管理法<sup>232</sup>,那么对于加了这种注释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欧洲实际上会怎样看待呢?

普鲁士政府硬说,枪击普鲁士国王是各地广泛革命阴谋活动的结果,活动的中心应当在伦敦找。因此,它第一是取消国内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是要求英国政府把虚构的阴谋活动的虚构的魁首从英国驱逐出去。

如果考虑一下现任普鲁士国王及其兄弟(王位继承人)<sup>①</sup>的个人品性和素质,那么对后者迅速继承王位感兴趣的是革命党还是极端保皇主义者呢?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在柏林发生行刺事件前两周,有些人来找我们,几乎公开地建议我们参加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组织行刺国王的阴谋活动,我们有充分把握认为他们不是普鲁士政府的暗探,就是极端保皇主义者的暗探。不用说,这些人没有能使我们上当。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就是在行刺事件发生以后,也还有其他的类似人物来纠缠我们,谈过这一类的话。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枪击国王的泽费洛盖中士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极端保皇主义者。他属于极端保皇主义团体“忠实者同盟”<sup>233</sup>第2分部,他在盟员名册上的登记号码是133号。他一度领取过该同盟的津贴;他的证件保存在供职于陆军部的一个极端保皇主义者少校<sup>②</sup>的家里。

如果这个案件能在什么时候开庭公开审讯(我们对此表示怀

---

① 普鲁士亲王威廉。——编者注

② 库诺夫斯基。——编者注

疑),那么,公众会清楚地看到,这次行刺事件有没有煽动者,他们是些什么人。

极端保皇主义的《新普鲁士报》首先急忙来指控伦敦的流亡者,说他们是这一行刺事件的魁首<sup>①</sup>。它甚至点了后面署名人之一的名字<sup>②</sup>,早就肯定说他在柏林住了两周,但是,有许多见证人可以作证,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伦敦。我们曾经写信给普鲁士公使本生先生,请他把上述报纸的有关的几张寄给我们。可是,这位绅士对我们的关心,未能使他表现出超乎我们所预期的骑士<sup>③</sup>的文雅尚礼的态度。

编辑先生,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把事实全部公之于众。我们认为,一切事情,凡是多少有损于英国作为一切党派和一切国家流亡者最可靠避难所的流传悠久的声誉,英国人是会关心的。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

科隆《新莱茵报》编辑

弗·恩格斯

奥·维利希

巴登起义军上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6月14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0年6月15日《旁观者》第114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① 1850年5月25日《新普鲁士报》第117号。——编者注

② 马克思。——编者注

③ 暗指本生的男爵称号。——编者注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地球》报编辑的信<sup>235</sup>

编辑先生!

请允许我通过贵报这个媒介使公众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能或多或少地关系到不列颠民族的荣誉。

您知道,领导 1849 年运动的党失败以后,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到处把大批的政治流亡者,特别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避难地驱逐出去,一直到他们最终在英国获得了保护和安宁为止。

在大陆上,一些仇视自己政敌的政府看起来并不满足于这种结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柏林内阁达到使大多数普鲁士流亡者都集中在贵国的目的以后,显然正企图用各种办法迫使他们迁往美国。有那么些政党,它们在本国自己的报纸上(例如《新普鲁士报》<sup>①</sup>和《国民议会报》)把英国政府描绘成反对全欧洲保守派的雅各宾党人和阴谋家的委员会,现在又对英国的安宁表示颇为可疑的关切,它们向不列颠政府检举这些外国流亡者,硬说他们干预了英国的

---

<sup>①</sup> 1850 年 5 月 24 和 25 日《新普鲁士报》第 116 和 117 号。——编者注

政治，涉嫌谋刺普鲁士国王<sup>①</sup>。

我很荣幸，属于不管到哪里都受到普鲁士政府迫害的那种人。我在1842年担任过科隆《莱茵报》的编辑，在1848—1849年担任过《新莱茵报》的编辑；这两家报纸都由于普鲁士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竭力干涉而被封闭。在普鲁士使馆的直接要求和压力之下，我在1845年和1849年被驱逐出法国，1848年被驱逐出比利时，而在1848—1849年我居住在普鲁士的时候，大约受到过十几次政治控告，但是，在我两次被陪审团宣告无罪以后，所有这些控告都被取消。

然而，甚至在贵国普鲁士政府也不放过我。这里有个证明，最近我收到许多警告信，说英国政府根据这类检举，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我。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这点：几天以来有几个人一直紧贴在我的门旁，一有人进出都记录下来。其次，《新普鲁士报》<sup>②</sup>也可以证明这点：该报不久以前写道，我正在德国各地旅行，曾在柏林住了两周，但是我的房主和其他许多英国人都可以证明，我自从去年迁到这里来以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伦敦。正是这家极端保皇派的报纸在疯子泽费洛盖的行刺事件发生后把无中生有的我到柏林的旅行一说和行刺事件联系起来，其实这家报纸应当比谁都清楚，如果有人参与了这件事，那究竟是谁，因为泽费洛盖是极端保皇主义团体“忠实者同盟”<sup>233</sup>第2分部的成员，他除了柏林陆军部的参谋官以外从来没有和其他人有过联系。此外，在伦敦出现的普鲁士挑拨者也可以证明这点，他们在泽费洛盖行刺事件前两周到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这里宣传行刺的必要性，甚至暗示柏林在进行以此为目的的阴谋活动。他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1850年5月25日《新普鲁士报》第117号。——编者注

们发现不能使我们上当以后,便经常参加宪章派的大会,以便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外国的流亡者都积极参加英国的宪章运动。

最后,编辑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并通过您向公众提一个问题:如果不列颠政府受到这种影响,被诱骗采取一些措施,从而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一个普遍的信念,即不列颠的法律对任何踏上不列颠国土的人都给予同样的保护,——这难道是可取的吗?

余不多谈。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6月中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4年俄文第1  
版第25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弗·恩格斯

法 国 来 信<sup>50</sup>

[普选权的废除。——给总统的薪俸。  
——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协议]

1850年6月22日于巴黎

选举“改革”法通过了，巴黎的人民却安然不动。普选权废除了，没有一点骚动或示威游行的企图，法国工人重新沦为路易-菲力浦时代那种政治贱民，没有公认的权利，没有选举权，没有武器。

的确，十分有趣的是，法国1848年轻易争得的普选权，1850年更轻易地被废除了。然而，这几度起伏，非常符合法国人的性格，这在法国历史上是见惯了的。英国就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在那里，普选权一经确立就永远不会被废除。哪一届政府都不敢触动它。只要想想看，若是哪个大臣蠢到当真想要恢复谷物法<sup>236</sup>，那他就会被全国人民的哈哈大笑声轰下台。

毫无疑问，巴黎人民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没有利用废除普选权所提供的举行起义的时机。军队的情绪是好的，小生意人阶级不得不与人民一起前进，山岳党<sup>83</sup>，甚至还有卡芬雅克派都懂得，在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不管他们是否同人民站在一起。因此，一旦起义爆发，至少小生意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山岳党在道义上的支持，在这次是有保证的，而这就可以粉碎相当一部分军队的反抗。但是，机会错过了：一方面这是由于议会领袖和报刊的怯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巴黎人民现在的特殊情绪。

首都工人现在处于过渡状态。到目前为止他们中间讨论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已经不能再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应该承认，把法国所有社会主义体系放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真正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多次被自己的带头人蒙骗过的人民，对所有曾经充当过他们的领袖的人，都极不信任，连巴尔贝斯和布朗基也不例外<sup>237</sup>，因此，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来使这些领袖中的任何人掌权。这样一来，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即将另有一番革命得多的景象了。人民一旦开始独立思考，摆脱了旧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很快就会找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准则，同各种体系的创立者和夸夸其谈的领袖们为人民臆造出来的一切相比，这些准则能更明确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人民会因此而成熟起来，到那时，他们会重新利用前领袖所具有的一切才能和勇敢，而不做这些领袖中任何人的尾巴。巴黎群众的这种情绪，也就是人民对废除普选权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大搏斗要拖到国内两股竞争势力的一方或双方，即总统或国民议会试图推翻共和国的那天才开始。

而这一天定会很快到来。你们还记得，各家反动报刊怎样吹捧总统和多数派之间取得真诚的谅解。现在，这种真诚的谅解简直变

成了竞争双方的殊死斗争。为了使总统同意选举法,花费的代价是:允许给总统的年俸增加 300 万法郎(12 万英镑),为债务所苦的路易-拿破仑对此极为需要,此外,他又认为这是把自己的总统任期延长 10 年的预备步骤。选举法刚刚通过,部长们就出来干涉并索取一年 300 万法郎。但多数派一下子害怕起来。他们不再认为低能的路易-拿破仑是个合格的王位追求者,并且根本不打算同意延长他的总统任期,相反却希望尽快摆脱他。多数派委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就这一提案作报告,委员会表示反对通过这一提案<sup>238</sup>。爱丽舍宫极为慌乱。拿破仑以辞职相威胁。一场国内两大势力之间最严峻的冲突迫在眉睫。内阁、许多银行家、还有其他一些“秩序之友”,都出面调停,但没有结果。提出了几个“协议”方案,也都徒劳。最后采取了一个看来各方多少都感到满意的修正案。多数派对同总统决裂后果如何还没有十分把握,并且至今仍没有最后签订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为一个党的协议,他们仿佛有点退缩,打算同意采取另一种形式来支付这笔钱。辩论应当在星期一进行;谁都不能说结果会怎么样。可是我认为,真正同拿破仑决裂,目前还不符合保皇主义多数派的政策。

关于奥尔良派<sup>80</sup>和正统派<sup>67</sup>、波旁王室幼系和长系联合的协议,目前比任何时候都谈得更多。的确,关于这个问题正在进行非常积极的谈判。梯也尔先生、基佐先生等人到圣伦纳兹去探望临终的路易-菲力浦没有别的目的。我不准备再向你们叙述有关这件事的情况和上述行动所取得的结果的种种说法。各种日报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已经够多了。然而有一点是确实的:在法国,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差不多已经就条件达成了协议,而唯一的困难是要使竞争的两个派系



都接受这些条件。波尔多公爵<sup>①</sup>昂利应该成为国王，因为他无嗣，把巴黎伯爵，即路易-菲力浦的孙子继嗣作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困难。此外，还应当把三色旗保留下来。预料中的年老的路易-菲力浦的死，或许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一些。他似乎已经向这种解决办法屈服了，而波尔多公爵，看来也接受了协议。好像唯有奥尔良公爵夫人、巴黎伯爵的母亲及其小叔子茹安维尔是解决道路上的障碍。他们打算出1 000万现款来摆脱路易-拿破仑。

毫无疑问，这种或与此类似的协议最终将会达成；这件事一办好，接着就会向共和国直接进攻。同时，各省议会也一定会开始初次交锋。各省议会刚刚提前召开，预计它们会向国民议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正是这个问题，去年也曾考虑过，但当时各省议会都认为那样做还为时过早。这一次，各省议会无疑将表现出更大得多的勇敢精神，尤其是对选举权进行了成功的打击之后。而那时，也将是人民出来表态的时候，他们将表明，如果他们在某个时候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威力，那也决不是甘愿被拉回到最卑鄙丑恶的复辟时期。

又及。我刚刚读完了一本定价三个苏(半便士)的小册子<sup>239</sup>，这是随《共和国报》一起免费赠阅的。其中极其惊人地揭露了保皇派自1848年春以来的种种密谋。作者是一个名叫博尔姆的人，是布尔日的巴尔贝斯和布朗基案件<sup>92</sup>中的证人。他承认自己是领取报酬的保皇派密探，在这一案件中提供了大量伪证。他断定整个1848年5月15日的运动<sup>82</sup>是由保皇派发动的，并透露出其他许多十分奇妙的事

---

① 昂·尚博尔。——编者注

情。<sup>240</sup>还有一些事情涉及《泰晤士报》。博尔姆署上了姓名和地址。他住在巴黎。这本小册子必定还会引出更多的揭发材料。望你们对此严加注意。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6 月  
22 日

载于 1850 年 7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2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sup>241</sup>

在今年6月22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您指责我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您和我相反,提出要根本消灭阶级差别。这个修正,使我莫名其妙。

您非常清楚,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二月革命<sup>4</sup>之前发表)第16页上写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您知道,还在1848年2月之前,我在《哲学的贫困》这本批驳蒲鲁东的书里就曾主张这样的观点。

最后,在您批评的那篇文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3期第32页)<sup>①</sup>里我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

---

<sup>①</sup> 见本卷第220页。——编者注

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卡·马克思**

在6月22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承蒙您承认由于《新莱茵报》的被迫停刊在德国的日报中出现了“明显的空白”,但是您反对“恩格斯先生的论断”,即《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言论上和善良的愿望上代表无产阶级的机关报。

在我那篇载于《新莱茵报》第1期上的关于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文章里,我的确说过,《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善良的愿望上和言论上代表德国无产阶级的报纸<sup>①</sup>。如果您认为这种论断给《新德意志报》,即前法兰克福极左派的正式报纸造成了损害,那么您就指出,《新德意志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代表了德国的无产阶级或它的阶级利益,这样,您无疑会使工人非常感激。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6月25日

载于1850年7月4日《新德意志报》第15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sup>①</sup>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威悉报》编辑部的信<sup>242</sup>

今年6月22日贵报刊载了一篇伦敦通讯，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奥古斯特·维利希……在给《旁观者》的信中写道，普鲁士使馆的密探步步跟踪他们云云。《旁观者》对这篇冗长的控诉作了简要的讽刺性评论，内容如下：‘这类人物（即政治流亡者）在这种事情上常常容易产生误解，而且他们的误解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虚荣心，他们把自己设想得非常重要，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二是意识到本身有罪。流亡者对有自由思想的和好客的英国政府妄加猜疑是不折不扣的厚颜无耻的行为。’”

对英国报纸的立场和固定的、拘谨的文风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就会立刻发现，任何一家英国报刊，尤其是文风细腻而诙谐的《旁观者》，都不可能登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那样粗鲁的普鲁士式的短评。上面援引的硬说登载在《旁观者》上的那个“评论”，全篇都是通讯员的无耻伪造。在《旁观者》上不仅没有任何这类评论，相反地，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在刊登我们的声明的同一期上作了如下的说明：

“下面发表的这封信对我们政府进行了令人惊讶的控告。我们对事情的了解不外是这封信本身所反映出的内容，不过对讲得如此有根有据，如此合情合理的公开控告，不能不加以注意。控告的内容是，伦敦的普鲁士警探（blood-

men)企图利用外侨管理法来反对德国流亡者的时候得到了关照。”(6月15日《旁观者》第554页)

贵报的通讯员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对本生先生的颂扬,充分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捏造。顺便提一句,这个诡计为普鲁士的奸诈增添了光彩。

我们希望您把我们的这一声明刊登在贵报下一期上,以便使贵通讯员独享这个妙着发明者的荣誉。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50年7月2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7月2日

载于1850年7月10日《不来梅  
每日纪事报》第3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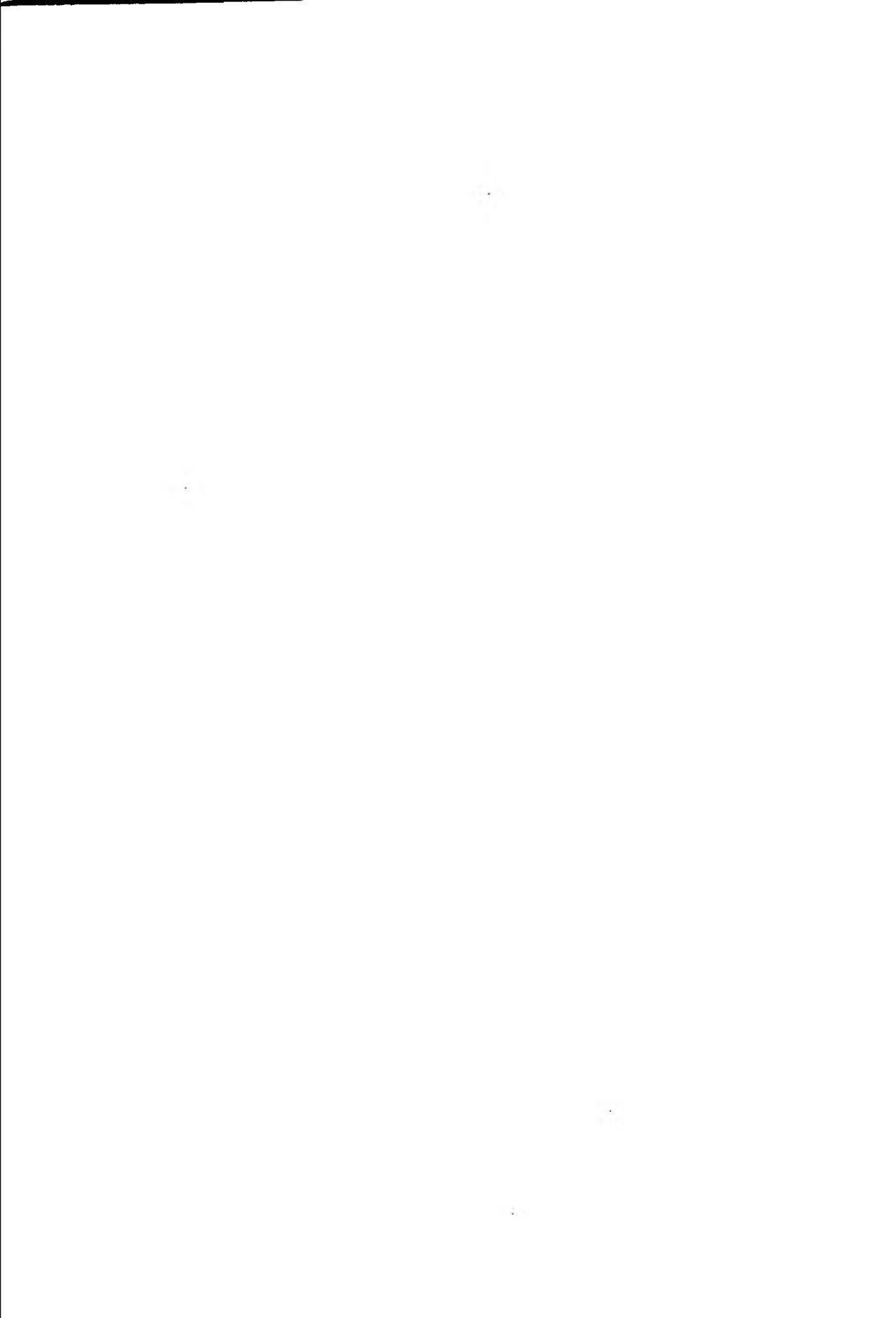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Gruppe 15. Göttingen  
Christ, Markwald  
Gruppe 21. München  
Speckhölzer, G. F. G.  
Christ.  
Gruppe 30. Gießen  
P. L. G. G. G. G.  
J. G. G. G.  
Schne, G. G. G. G.  
Dauer, M. G. G. G.  
G. G. G. G.

卡·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原件影印件





卡·马克思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委员名单<sup>243</sup>

弗伦克尔, 克拉肯韦尔路米德尔顿街 35 号。

列曼, 牛津街伯里克街 25 号。

沙佩尔, 黄金广场大普尔特尼街 30 号。

施拉姆、恩格斯、普芬德、鲍威尔、维利希、马克思、埃卡留斯。

卡·马克思写于 1850 年 7 月  
初一—9 月中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7 年历史考证  
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德国来信<sup>40</sup>

###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1850年7月21日于科隆

在德国,目前最引人关注的自然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sup>244</sup>。因为这个事件在你们国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知道得很少,请允许我对此作一个简略的述评。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德国周围的独立小国都是或多或少以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势力的主要集中地。例如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就是第一个抵挡二月冲击<sup>4</sup>,第一个宣布戒严令和宣判爱国者死刑的国家。<sup>245</sup>又如瑞士,很不体面地渡过了这场革命风暴,它在革命处于高潮时躲在中立的万里长城后面,当反动派在整个欧洲重新得势时,又充当神圣同盟<sup>62</sup>的卑躬屈膝的打手对付已交出武器的流亡者。显然,小国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必然导致它们主要依靠早就建立的亦即反动的政府的支持,况且它们不可能不知道任何一场欧洲革命都会使它们的民族独立成为问题,这种独立只有旧政治制度的拥护者才有兴趣去支持。

丹麦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同样具有这种民族独立的优越感和进行扩张的极大欲望。<sup>①</sup> 丹麦是个全靠用海峡税<sup>246</sup>掠夺世界贸易为生的国家，对它的独立和强大感兴趣的只有俄国和某些英国政治家。由于上世纪签订的一系列条约<sup>247</sup>，丹麦简直成了俄国的奴隶；俄国通过丹麦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达达尼尔海峡。英国的老派政治家也关心丹麦的领土扩张，因为按照他们的老政策把中欧支解成许多互相敌对的小国，能使英国对它们实行“分而治之”的原则。

与此相反，各国革命派的政策总是要使迄今为止一直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大民族牢固地联合在一起，保证民族的独立和强大，但并不是保证诸如丹麦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等、等等败落的小民族（每一个民族起初有 100 万到 300 万人），或者诸如瑞士人和比利时人那些混合的自称为民族能独立和强大，而是保证现在被欧洲统治制度压迫的人数众多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能独立和强大。欧洲的共和国联盟只能由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那些力量均等的大民族组成，而绝不能由像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瑞士人等这些弱得可怜的所谓民族组成。

此外，革命派是否允许北方最重要的海上阵地——波罗的海的入口——永远为自私的丹麦人控制？他们是否允许丹麦人依靠向每一艘通过松德海峡和贝尔特海峡的商船征收重税来支付国债的利息呢？当然不会。

丹麦凭借把人民看作一大笔的动产的宝贵继承权，吞并了德国的两个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各有自己的宪

---

① 很少人知道，1848—1849 年瑞士曾多次议论把萨瓦并入瑞士，而且瑞士人希望这件事能够由于意大利的革命失败而得以实现。

法,内容彼此相同,还有它们的君主们所赐给的早已规定的权利,“两国应该永远统一而不可分割”。此外,丹麦的王位继承法和这两个公国的不一样。<sup>248</sup>1814年在声名狼藉的维也纳会议<sup>249</sup>上,民族被支解和拍卖,荷尔斯泰因被并入了德意志联邦,而石勒苏益格则没有。从这一天开始丹麦民族党就力图把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但没有成功。1848年终于来到了。3月哥本哈根爆发了民众运动,民族自由党上台执政。他们立即颁布了宪法,并把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其结果是在两个公国爆发了起义,在德国和丹麦之间发生了战争。

当德国兵在波森、意大利和匈牙利镇压革命时,在石勒苏益格的这场战争却是德国进行过的唯一的革命战争。问题在于石勒苏益格人是否将被迫把自己同弱小的半开化的丹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永远成为俄国的奴隶,还是他们将有可能同当时正在为争取自身的自由、统一,从而为恢复实力去斗争的4000万人的民族重新合并。德国的君主,特别是装扮成国王的普鲁士酒鬼<sup>①</sup>对这场战争的革命意义了解得太清楚了。大家都知道普鲁士公使维登布鲁赫少校有一个照会<sup>250</sup>,他在其中向丹麦国王<sup>②</sup>建议进行佯装的战争,使战争只是限于让丹麦和德国双方都作为志愿军参战的革命积极分子互相残杀。因此,战争在德国方面来说是接连不断的一串叛卖行为。甚至在腓特烈西亚会战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万人的共和军团遭到了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被三倍于它的丹麦军队歼灭,而当时有四万普鲁士军队和其他军队离他们只有几英里,却听任他们处于困境。最后在柏林搞出了个叛卖和约,允许俄国在石勒苏益格驻扎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军队,允许普鲁士去荷尔斯泰因镇压叛乱,这个叛乱是普鲁士自己至少曾用官方的形式援助和挑唆过的。

如果过去对哪一方是捍卫革命利益,哪一方是维护反动利益有疑问的话,那么,现在这个疑问就不存在了。俄国派遣自己的舰队去同丹麦表示友谊,并且共同封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海岸。所有“世上的强者”都起来反对这个不到 85 万人的小小的日耳曼部落;这个不大的然而勇敢的民族所得到的援助,只是各国革命者的同情。他们无疑会失败;他们也许能抵抗一段时间,甚至推翻普鲁士所强加的资产阶级叛卖政府,他们也许能打败丹麦人和俄国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被击败,除非肯定要进入荷尔斯泰因的普鲁士军队拒绝行动。如果这些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你们会看到德国将是另一种情况。那时那里可能爆发全面的起义,而且是 1848 年完全不能与之比拟的那种起义,因为神圣同盟的行动已经给了德国人民很好的教训;如果在 1848 年甚至连联邦共和国也是不可能的话,那么现在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不到六个月就要成为**社会的共和国**。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7 月  
21 日

载于 1850 年 8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2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法 国 来 信<sup>50</sup>

[新闻出版法。——议会休会]

1850年7月23日于巴黎

正像我在上封信中所预见的，议会终于通过了给路易·波拿巴一笔补助金的决议，这实质上是允许了他所要的款项，而形式上却使他在全体法国人面前大大出了丑<sup>238</sup>。此后，议会就恢复了它的镇压活动，通过了新闻出版法<sup>251</sup>。不管这个新闻出版法出自作者巴罗什先生之手时是多么厉害，同议会多数派因憎恨而改动后的相比，它是无害而温和的。多数派出于对报刊的强烈却又无力的憎恨，几乎是盲目地进行打击，不考虑打击的是“好的”报刊还是“坏的”报刊。于是，“憎恨法”通过了。保证金增加了。报纸的印花税恢复了。对报纸的一个栏目，“小说文艺”栏征收特别的印花税，这种措施，如果不是由于欧仁·苏的社会主义小说的影响还没有被多数派忘记，而对他的当选进行报复，那就完全不可理解。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不足一定

篇幅的所有文章，都和报纸一样要征印花税。最后，报纸上刊登的每一篇短文都要有作者的署名。

多数派的盲目憎恨所促成的这样的法律，不仅将严重打击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报刊，而且也将严重打击反革命报刊，对反革命报刊的打击，可能比对反对派报刊的打击厉害得多。共和主义作者是极其著名的，因此不管他们在自己的短文上署名还是不署名，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权力报》、《立宪主义者报》等报刊将不得不披露其撰稿人的名字，这些报纸的社论即使在它们原有的读者中也会立即失去一切影响。大型日报、特别是已经发行很久的大型日报的名称，对于可尊敬的公众来说，总是代表可尊敬的报社；但是，如果这些报社——贝尔坦公司，维隆公司，德拉马尔公司——一旦披露出他们的作者的名字，如果这些神秘的“公司”一旦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现金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老朽的、卖身的雇佣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政治家自居的愚蠢的老儒夫，如果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并抛出冗长文章的小人一旦按照新法律而公之于世，你们将看到这些可尊敬的报刊会显出一付多么可怜的样子。

的确，实行了新法律，由于报纸涨价，广大读者将被剥夺这种消息来源。许多工人，尤其是大多数农村居民就会既得不到报纸和廉价期刊，也得不到其他大众出版物。但是，报刊从来就只是影响农民的次要手段；这个阶级对自己的物质上的损害和增加税收，比起对报刊的夸夸其谈，要敏感得多；而只要目前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能找到——它永远也不能找到——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高利盘剥和捐税负担的办法，最近已觉醒的这个阶级就会继续表现出不满和“革命倾

向”。至于城镇工人,要完全不准他们读报是不可能的,即使禁止发行廉价期刊,他们也会通过增加秘密团体、秘密辩论俱乐部等活动来弥补。但是,就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减少革命小册子和期刊的数量,它付出的代价则是整个出版事业和书籍贸易的毁灭,因为在新法律规定的种种限制下,这些行业就不可能存在。因而很可能这将大大促使秩序党在议会内外的分裂。

新闻出版法刚投票通过,议会就又一次向路易-拿破仑明确地暗示他不应当超出宪法给他规定的范围。波拿巴派的《权力报》刊登了一篇以不十分赞许的口气评论议会的文章。复辟时期的旧法律被搬出来了,于是,《权力报》的出版者便被公开指控为破坏特权并被处以 5 000 法郎(200 英镑)的罚金<sup>252</sup>,这笔罚金当然立即就支付了。这种惩罚不算过分严厉,但议会的这项决议意义极为重大。一个议员在热烈的掌声中说:“我们打击下面,意在打击上面。”

然后,议会决定从 8 月 11 日起延期三个月再召开会议。根据宪法规定,议会应当选举一个由 25 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它应当留在巴黎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多数派的领袖认为路易-拿破仑已经够丢丑的了,便提出了一个只包括多数派成员的候选人名单,即包括奥尔良党人、温和的正统主义者、几个波拿巴分子,却没有一个共和主义者或极端正统主义者。可是在表决时,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落选了,反倒选出几个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和极端正统主义者。议会从而又一次表示,它根本无意去搞路易-拿破仑梦寐以求的政变。

我认为任何重大情况都要到试图推翻共和国之后才会发生,不管进行这种试图的是谁,是总统还是保皇集团之一。这无疑会把人民从麻木的状态中唤醒;而这一事件必定会在今天到 1852 年 5 月之



间发生,但确切的日期是无法预告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7 月

23 日

载于 1850 年 8 月《民主评论》

杂志第 2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sup>253</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夏—秋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 5—6 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1960 年德文版第 7 卷翻译



---

德国人民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产生过能和其他国家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国人民也曾表现出韧性和毅力，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韧性和毅力会创造出极其辉煌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历时两年的斗争过去以后，目前几乎到处都是一片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是很合时宜的。自从农民战争以来，三百年过去了，有些事物已经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同我们今天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我们将会看到，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暴烈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仅仅在局部地区，即在奥登林山、黑林山和西里西亚才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 16 世纪初期德国的状况。

德国工业在 14 和 15 世纪已经相当繁荣。城市行会手工业已经取代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工业，并且已经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从事生产。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织造这时已经成为固定而又分布很广的工业部门；就连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经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那些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工艺品生产部门，例如金银加工业、雕塑和雕花业、铜版雕刻和木板雕刻业、武器锻造业、奖章制作业、旋工行业等等，也都蒸蒸日上。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sup>①</sup>和印刷术的发明。商业也同工业齐头并进。汉撒同盟<sup>254</sup>垄断海上航路达百年之久，从而确保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虽然从 15 世纪末起，汉撒同盟由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已经开始急剧衰落，而且当时已经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但是，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

---

① 恩格斯在 1875 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编者注

利丝织品、印度香料以及黎凡特的一切产品的庞大的集散地。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开采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经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不仅大片的荒地开垦出来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引进的植物也种植起来了,对这些植物的精心栽培,使农业普遍地受到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利益也极不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点。南部有另外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同北部毫不相同;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那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的全部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隆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有一些较小的城市远离内河和通商大道,它们被排斥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继续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艰难度日,很少需要外来商品,也很少输出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同外界保持较为广泛的接触,才会产生新的需求;农民群众从来不曾逾越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他们的视野也从来没有超出与此相应的地方范围。

在英国和法国,工商业的高涨促使各种利益在全国范围内联结在一起,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在德国,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结合成利益集团,因而造成政治上的四分五裂。

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就固定了下来。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维系整个帝国的纽带松散了,直属帝国的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直辖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同诸侯或皇帝对抗。帝国当局对自己的地位已经失去信心,它惶惑不定地摇摆于帝国的各种势力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它企图像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尽管采用了各种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结果也只是维系住奥地利的世袭领地<sup>255</sup>,除此之外一无所成。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最后赢得胜利而且稳操胜券的人,就是在四分五裂局面下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在地方和省区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即诸侯。同这些诸侯相比,皇帝本人日益变得像一个普通的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个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除了原有的阶级之外,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阶级。

从上层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且已经掌握大部分主权。他们自行宣战与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邦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吞并其余的帝国直辖市和男爵领地。他们对于这些城市和男爵领地实行集权,而对于帝国当局却主张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经十分专横。他们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收赋税和搜刮钱财;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即使在等级会议执行这种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通常也总是依靠骑士和高级教士这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而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由于生活奢侈和宫廷耗费日增,由于要供养常备军,还



由于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因而对钱财的需求日益迫切。赋税重担有增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而免去了这个负担;于是整个赋税的重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既落到诸侯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到农奴、依附农以及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骑士的佃农身上。<sup>256</sup>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就实施间接税;财政上用尽心机巧立名目,以期填补国库亏空。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愿意借贷,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值,一切都以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拿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来做交易,然后又强行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把反对派的任何一种图谋都用来作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勒索和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诸侯通常谋取收入的财源。甚至连司法也是诸侯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看的货色。当时的臣民除了承受上述负担之外,还得满足诸侯属下的官吏的私欲,总之,他们实在尝够了这种“慈父般的”政府所赐予的恩泽。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层贵族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中层贵族不是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降入下层贵族的行列。下层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没落。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陷于贫困,只靠从军或担任文职为诸侯效力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还有较少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在发展,步兵作用日益增大,火器已经得到改进,这一切使骑士这种笨重的骑兵在军事上失去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的手工业者一样,骑士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了多余的人物。骑士等级对金钱的渴求,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走向毁灭。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城堡里的生活变得日益奢侈,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竞相炫耀豪华的风气越来越盛,武

器和马匹的价格越来越高,而骑士和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根本没有增加。专为掠夺和勒索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尚勾当,都日渐变得十分危险了。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杂捐和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同诸侯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更加刁钻。农奴们被榨尽最后一滴血,依附农则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目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土地税、接租费、死亡税<sup>257</sup>、保护金<sup>258</sup>等等,都不顾一切原有契约的规定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专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农民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出来。

下层贵族和其余各个等级也同样不能和睦相处。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贵族企图使自己直接从属于帝国,直属帝国的贵族则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同诸侯不断发生冲突。僧侣当时表现得高傲狂妄,他们在骑士的心目中已经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羡慕僧侣拥有大片庄园,羡慕他们由于坚持独身和遵守教规而积累起来的财富。<sup>259</sup>骑士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向城市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抓获人质、收取赎金来维持生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就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影响。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垄断。在知识领域也出现了分工。新兴的法学家等级把僧侣从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这部分僧侣从此也就成了多余的

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日益变得无所事事、愚昧无知。但是，这些人越是显得多余，其人数也就越是增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僧侣中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教权等级构成了**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教士。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在其他诸侯手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采取了更加无耻的手段。他们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还玩弄一切宗教上的刁钻伎俩，除了用严刑拷打来威胁，还用革除教籍和拒绝赦罪来威胁，此外还利用忏悔室来玩弄形形色色诡谲的花招，总之是要从他们的臣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经常乐于使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了通常的封建贡赋和地租以外还要征收什一税<sup>260</sup>，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于是他们便求助于其他各种手段，通过制造灵验的圣像和圣徒遗物、组织超度礼拜场、贩卖赦罪符，从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物，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教士及其人数众多的、随着政治煽动和宗教煽动的扩大而日益强横的修道士打手队伍，不仅引起了人民、而且也引起了贵族的切齿痛恨。只要他们还直属于帝国，他们就总是诸侯前进的障碍。脑满肠肥的主教、修道院长以及他们的修道士走卒的奢侈生活引起了贵族的忌妒，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种生活的耗费；他们的奢侈生活越是同他们的说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民就越是怒不可遏。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

不属于教会的封建教权等级，不能分享教会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不大有人过问；虽然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十分重要，可是在当时却远不像兵营内的修道士警察活动那样不可缺少。因此，他们的报酬就少得多，他们的薪俸多半都很菲薄。他们出身于市民或平民，生活情况同群众十分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为僧侣，还是保持着市民和平民的思想感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间只是例外，而在他们中间却很普遍。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平民和农民的代表，并为此而牺牲在断头台上。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涉及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sup>261</sup>，即帝国税，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用教会税去支付罗马教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德国由于僧侣人多势众，因此这种教会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征收得更加认真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以后新任者要向教皇交纳上任年贡<sup>262</sup>时，就更是如此。随着需求的日益提高，搜括钱财的新花样也相继发明出来了，诸如贩卖圣徒遗物、收取赎罪金和庆祝费等等。大宗钱财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加的沉重负担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感情，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感情，贵族们在当时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关市民<sup>263</sup>中发展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城市贵族，即所谓“名门”。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他们独自操纵市政当局，并占据一切城市官职。因此他们不仅管理、而且也侵吞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世代沿袭的、得到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不仅用各种方式来剥

削城市公社,而且也剥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谷物和钱币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强行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城市森林和牧场的一切权利逐步取消,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谋取私利;他们擅自在大路、桥头和城门口设置税卡,还征收其他捐税;他们利用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和司法权做交易。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恰恰相反,城市派往乡村的官吏,全都出身城市贵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表现出贵族的残酷和贪婪,还带有官僚制度中的精细苛刻作风。通过这类手法聚敛的城市收入,竟听凭这些人极其随意地管理。市政财务账目纯粹是官样文章,草率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要想了解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权阶层,在当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私囊,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848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数不胜数的侵吞诈骗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城市贵族处心积虑地取消城市公社在各个领域的权利,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权利。直到后来,当这些老爷的欺诈行径变得穷凶极恶时,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期至少要掌握监督市政管理的权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个行会之间争斗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受到帝国以及同他们结盟的各个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出身于城市贵族的市政会老爷便通过巧取豪夺,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独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期,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新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在城市中,反对城市贵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在农民战争中的态度都十分鲜明。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比较富裕的

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这部分小市民的人数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多少不等。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机构(扩大的市政会,公社委员会),去监督市政管理并分享立法权;其次,他们要求对城市贵族任人唯亲和少数家族独揽大权的状况加以限制,这种状况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也日益明显了。此外,市民反对派至多还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在市政会里担任几个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城市贵族中的心怀不满和潦倒没落的团体参加进来。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个行会中,这个反对派都占大多数。而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绝对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了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一模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了完全相同的成就。<sup>264</sup>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的侈糜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采取措施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劣行径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的独立审判权和免税权,并且限制整个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以及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一般说来,流氓无产阶级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而正是在当时,由于社会封建制度的崩溃,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者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就大量增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一种行业、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是无数特权把持的禁地。在

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从来都没有像 16 世纪上半叶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一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第一部分参加了镇压农民的诸侯军队；第二部分参加了农民秘密结社和农军，在这里，他们随时都在产生涣散斗志的影响；第三部分参加了城市派别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一部分人，在当时基本上还保持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开化了的流氓无产阶级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同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刚刚崛起、但尚未发展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陷入贫困境地的行东，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还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驱逐的农民和被辞退的侍从人员，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没有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在当时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在行会特权还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最接近无产阶级；但同时也正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市民师傅。因此，这个由各种成分混合而成的人群，其党派倾向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派别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农民的起义才使他们成为一个派别，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要求和行动仍然几乎处处都以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紧紧依赖农村的一个明显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他们就要求确立城市手工业在

农村的垄断地位,就不愿意免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反动的,他们为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所支配,从而为最近三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充当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以致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成分比运动中的其他一切集团都暂居上风。这段插曲构成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最高潮,它的中心是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人物托马斯·闵采尔,可是这段插曲为时极其短暂。城市平民集团势必垮得最快,同时,他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也必然表达得极其含糊,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缺乏牢固的基础。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这个民族中遭受剥削的广大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一个帝国直属贵族、一个主教、一个寺院,还是属于一个城市,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连牛马都不如。如果他们是农奴,那就得无条件地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们是依附农,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在一天天加重。他们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动;而他们在少量的自由时间里的劳动所得,还要用来缴纳什一税、地租、杂捐、财产税、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和帝国税<sup>261</sup>。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结婚,连死也不行。除了常规徭役以外,农民还要为老爷采集干草、草莓、越桔、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鱼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



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支配财产一样任意支配农民及其妻女的人身。主人享有初夜权。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法官等着一样,当时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sup>265</sup>中的那些含有惩戒意义的篇章提到了“割耳”、“割鼻”、“剜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这些尊贵的老爷或保护人随心所欲地用来对付农民。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权贵、僧侣、城市贵族或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从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无比困难。农民世代相传,习惯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因此,我们在中世纪可以找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遍及各地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却一次也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他们相互结盟,严阵以待,这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就不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同其他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

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正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当这个民族中遭受所有其他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即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稍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这种状况远不像当时那样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造成了怎样的混乱,那么,对于那个时代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纷纭错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 二

由于存在着地方分权以及地方和各省的独立地位,由于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当时那么多的等级几乎不可能归并成较大的集团。这种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宗教政治思想的普遍传播才开始出现的。赞成或者反对这些思想的各个等级把全民族集结成(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或反动营垒、路德的市民改良营垒、革命营垒。这次全民族大分化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是相同的,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经处于解体状态;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暂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过去几年常常有机会在德国见到这类十分相似的事实,因此,在16世纪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各个等级和阶级之间看来混淆不清的现象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

虽然有了最近的经验,但是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然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在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幻想家们实在轻信,总是对某一个时代关于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对某一个时代的幻想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例如,正是这帮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对于立宪

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问题的激烈辩论,把七月革命<sup>58</sup>看成只是关于“神授”君权无法继续这一问题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sup>4</sup>看成只是解决“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这一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每次写在旗帜上的政治口号都是阶级斗争的赤裸裸的表现,可是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我们的玄学家们甚至直到今天还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息不仅从国外频频传来,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发自动底层的抱怨和愤怒声中也清晰可闻。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

显然,这种情况下,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上的灵光圈。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随着时代条件的不同,他们或者是以神秘主义<sup>266</sup>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派同它有着很深的依赖关系;就连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至于各种异教,其中一部分是实行宗法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势力侵入他们生活的表现(韦尔登派<sup>267</sup>);一部分是越出封建制度的城市同封建制度对抗的表现(阿尔比派<sup>268</sup>,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sup>269</sup>等等);一部分是农民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保尔<sup>270</sup>,皮卡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sup>271</sup>等等)。韦尔登派的宗法制异教,同瑞士人的暴动完全一样,无论就形式还就内容来看,都是阻碍历史运动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这里可以不必多谈。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看到,早在12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大规模对立的先兆,农民战争后来就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归于失败的。这一对立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末期。

城市的异教——这是中世纪真正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对他们的豪富殷实和政治地位进行抨击。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廉价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廉价教会。市民异教同所有把教会和教条的发展仅仅看成是一种蜕变的异教一样,从形式上来看是反动的,它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规,要求取消自成一统的僧侣等级。实行这种廉价措施,就会取消修道士,取消高

级教士,取消罗马教廷,一言以蔽之,就会取消教会中一切耗费钱财的东西。这些城市虽然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但它们本身已经是共和国,它们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常形式是共和国。这些城市之所以对一系列教条和戒律如此敌视,一部分可以由上述情况来说明,一部分也可以由当时城市的其他生活条件来说明,例如,为什么这些城市要如此激烈地反对独身制度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说得更清楚了。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sup>272</sup>,在波希米亚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sup>273</sup>。至于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教会封建势力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其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经被承认为等级,它们已经能够运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以足够的力量去反对世俗的封建势力及其特权了。

我们在这里也可看到,无论在法国南部,还是在英国和波希米亚,绝大部分下层贵族在反对僧侣的斗争中和从事异教活动时都加入城市一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下层贵族依赖城市,也是由于在面对诸侯和高级教士时,下层贵族和城市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会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的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同起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规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要求承认这种关系也是市民间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得出有关市民平等的结论,甚至已经部分地得出有关财产平等的结论。它要求贵族同农民平等,要求城市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市

民同平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极其悬殊的贫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被说成是原始基督教教义的必然结论。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同市民异教相区别,但是到了14和15世纪,它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截然不同的派别见解了,这时,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同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sup>274</sup>的传教者约翰·保尔,又如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博尔派<sup>275</sup>。在塔博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的掩饰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而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的平民代表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在一起,例如鞭笞派<sup>276</sup>、罗拉德派<sup>277</sup>等等的狂想就是如此。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摒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没有特权,又没有财产;他们甚至不如农民和小市民,连一点带着沉重税负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既没有产业又没有权利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同当时的公共机构毫无直接关系,这种公共机构完全不理睬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可能仅限于反对封建制度和享有特权的城关市民<sup>263</sup>,为什么这个集团——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刚刚萌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必然对一切以阶级

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公共机构、观点和看法提出疑问。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sup>278</sup>同这类想法就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超越不仅超出了现在,甚至超出了未来,因此,它只能是武断的、空想的超越,而在第一次付诸实践的尝试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中去。对私有制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必然烟消云散,结果出现的只是原始的慈善团体;意义模糊的基督教平等,至多只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废除一切官厅,最后变成了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这种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预见。

这种武断的、但是很容易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中得到解释的对于未来历史的预见,最初出现在德国,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和他那一派中。诚然,在塔博尔派那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用这种刚刚萌生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来,民众在每一次动荡中都出现这种思想,直到它渐渐同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况,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同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集结了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势力,即帝国政府、教会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而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者势力,即大量的下层贵族、市民阶级、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希望通过没收教会财产中饱私囊并想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结成了革命



派,其要求和理论都由闵采尔作了极其鲜明的表述。

路德和闵采尔,无论就其理论来说,还是就其性格和行动来说,都不折不扣地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派别。

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立宪派从1846年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也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些资产阶级党派一度被推到运动的领导地位,但在这种运动中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开始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还根本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排斥任何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潮。因为在最初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势力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的异教去同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他们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中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在他活动的最初阶段,以无比激烈的方式表现出他那强健有力的农民本性。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逞凶肆虐,我以为只有请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毒害整个世界的恶人,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除此而外,简直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来遏制这种暴虐行径。我们既然用刀剑惩治盗贼,用绞索惩治杀人犯,用烈火惩治异教徒,为什么不运用一切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教人作恶的丑类,以及罗马罪恶城中的所有奸邪之徒,并用他们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双手呢?”<sup>①</sup>

<sup>①</sup> 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64—365页。——编者注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并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烈火。全体德国人民都投入了运动。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路德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自由的说教看成是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下层贵族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甚至诸侯也被卷进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认为向一切压迫他们的人进行清算的日子来到了;而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剥夺僧侣的权力,摆脱对罗马的依附,废除天主教等级制度,并且没收教产而大发横财。两派势力壁垒分明,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两派中进行抉择。这个受到萨克森选帝侯<sup>①</sup>保护的人,这个维滕贝格的名教授,这个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群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了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了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现在路德吹起了和平发展和消极抵抗的调子(见1520年《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等文件)。当胡登邀请路德前往贵族密谋反对僧侣和诸侯的中心埃伯恩堡去同他本人和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道:

“我不希望人们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圣经来征服的,教会是靠圣经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圣经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用暴力而取得一切,同样,他们也将在不施暴力的情况下自取灭亡。”<sup>②</sup>

从路德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或者更确切些说,从路德比较清楚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以决定教会机构和教条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改革;就开始了那一场施展权

---

①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② 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66页。——编者注

术、妥协变通、玩弄阴谋和握手成交的丑恶把戏，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sup>279</sup>，也就是经过讨价还价而最终议定的改革后的市民教会的章程。正是这种肮脏的交易，近来又令人作呕地以政治形式在德国国民议会、协商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议会中重演。官方宗教改革的市侩性质在这类交易中表现得最为露骨。

路德如今公然成了市民阶级改革的代表人物，他鼓吹合法的前进是有他的理由的。当时多数城市已经倾向于温和的改革；下层贵族参加温和改革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随声附和，另一部分诸侯则举棋不定。至少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温和的改革可以说已经稳操胜券。如果形势继续和平地发展下去，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挡温和反对派的进逼。但是，任何激烈的动荡都必然促使温和派同激进的平民农民派发生冲突，必然导致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退出运动，其结果不是市民派被农民和平民所压倒，就是参加运动的所有派别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势力所镇压，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政党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就立即企图利用合法前进的手段周旋于革命的岩礁和复辟的漩涡之间<sup>280</sup>。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也屡见不鲜。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条件下，任何一种变动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市民阶级的改革也同样如此，它越是明显地脱离平民和农民群众，便越要落在改革派诸侯的控制之下。路德本人已经日益变成了诸侯的奴仆，而民众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办，他们说，路德也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了诸侯的仆人；民众还在奥拉明德追击路德，向他投掷石块。

当农民战争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时，路德企图采取调解的态度。他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政府，认为起义

是由于他们施行苛政而引起的；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而是上帝本身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起义当然也是亵渎上帝、违反福音的。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实行和解。<sup>①</sup>

但是，这种好意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还是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席卷了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革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支起义队伍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取得一些进展，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陷入重围，人们也许就会手持长矛驱逐他这个叛徒，市民阶级的改革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垮。在这种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同农民暴徒相比，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辜的羔羊，成了上帝的温顺的孩子；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联合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sup>281</sup>。路德大声疾呼：

“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应当用秘密的或者公开的方式，去戳碎他们，扼死他们，刺死他们，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来刺死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么你将无比荣幸，死得其所。”<sup>②</sup>

路德认为，绝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谁怜悯上帝所不怜悯的人，谁怜悯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乱者的行列。如果农民只须交出一头牛，就可以安然享用另一头牛，他们就会感谢上

① 马·路德《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525年维滕贝格版。——编者注

② 马·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吕埃尔的信，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713页。——编者注

帝；诸侯们要从这次叛乱事件中认识到，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对于他们，只能用暴力来进行统治。<sup>①</sup>

“圣人说：驴子需要的是吃草、负重和挨鞭。而农民需要的是吃糠咽菜，他们不听圣经，十分愚蠢，所以必须让他们听听鞭声和枪声，他们活该如此。我们应当为他们祈祷，使他们俯首听命；如果他们竟敢违抗，那就不必再讲什么慈悲。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sup>②</sup>

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sup>16</sup>以后要求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先前曾标榜社会主义和博爱的那些资产者用的恰恰就是这样的腔调。

路德通过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他在圣经译本中使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提供了一幅没有层层叠叠的、人为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图景，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利用这种武器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而现在路德竟把这一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了真正的赞美诗去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当权者，这是任何一个舔食专制君主残羹的臣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唯命是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在这方面，不仅农民起义，就连路德本人对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反抗活动也被全盘否定；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资产者最近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这些难道还要一一列举吗？

---

① 马·路德《就反对农民的小册子发的通函》[1525年版]。——编者注

② 马·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吕埃尔的信，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714页。——编者注

现在让我们把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宗教改革家**路德**作一番对比。

**托马斯·闵采尔**大约在1498年<sup>282</sup>生于哈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相传他的父亲死在绞刑架下，成了**施托尔贝格**伯爵淫威的牺牲品。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哈雷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sup>①</sup>，并反对整个罗马教会。他在当时神学领域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哈雷的一个女修道院神父助手的职位。在这里，他已经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根本不朗诵把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的祷词，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sup>②</sup>。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雅敬**撰写的论述**锡利亚教义**的著作。在闵采尔看来，**约雅敬**所宣告和描绘的千年王国<sup>266</sup>以及对**堕落教会**和**腐败世界**的**末日审判**，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遍及各地的风潮的开始而即将来临。他的布道在周围地区受到了热烈欢迎。1520年，他作为第一个宣讲新教教义的布道者前往**茨维考**。在那里，他遇到了狂热的**锡利亚教派**中的一支，这个教派在许多地区秘密地坚持活动，过去，他们一度做出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姿态，以掩盖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而现在，随着鼓动工作的不断加强，他们已经越来越公开而顽强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了。这个教派就是**再洗礼派**<sup>283</sup>，是由**尼克拉斯·施托尔希**<sup>284</sup>领导的。他们宣称**末日审判**和**千年王国**已为期不远，他们能够“见神，通

①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② 《**马·路德**论**温克尔麦斯**的信》，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55页。——编者注

神并且传达神谕”。不久他们就同茨维考市政会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相反，倒是这一派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仍然出来保护他们。市政会采取坚决行动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闵采尔也同他们一道离去。这些事发生在 1521 年底。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同胡斯运动的余部取得联系，力图在这里立足。他发表了宣言<sup>①</sup>，但结果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 年他在图林根的阿尔施泰特城担任布道者。他在这里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经付诸实施。他完全不用拉丁文，而且在规定宣读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宣读这两部分而是宣读全部圣经。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施泰特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民众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当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所攻击的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像路德当时所做的那样，提倡平心静气的辩论与和平的前进，而是把路德早期那种激烈的布道继续下去，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说过：我不是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下了命令（见《路加福音》第 19 章 27 节）：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此事应靠主的力量去完成，而不需要你们手持刀剑予以协助，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消灭掉，而不予任何宽赦，就像

---

① 闵采尔《布拉格宣言》，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 年斯图加特版第 2 卷第 64—67 页。——编者注

希西家、居鲁士、约西亚、但以理和以利亚消灭事奉巴尔的僧侣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恢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莠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而去事奉其他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sup>①</sup>

但是，对诸侯提出的这些要求并无结果，而与此同时，人民中的革命激情却一天比一天高涨。闵采尔的思想越来越犀利，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坚决地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攻击整个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利用基督教形式宣讲一种泛神论，这种泛神论同近代的思辨观点<sup>285</sup>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接近无神论。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是理性，这种启示曾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现在依然存在。他认为，如果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那就意味着以经文扼杀圣灵。因为圣经所宣讲的圣灵并不是我们身外的存在物；圣灵本来就是理性。信仰无非是理性在人身上的复苏，因此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这种复苏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入天堂。因此天堂并不是什么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必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人世间建立起来。既然无所谓彼岸的天堂，当然也就无所谓彼岸的阴间或地狱。同样，也就没

<sup>①</sup> 闵采尔《对诸侯讲道。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宫内对积极的、可敬的诸侯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编者注



有什么魔鬼,有的只是人的邪念和贪欲。基督同我们一样也曾是人,不过他是先知和师长,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纪念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并没有加入任何神秘的佐料。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以基督教词令作掩饰,闵采尔宣讲上述这些教义也大半是以同样的基督教词令为掩饰。但他的著作到处都流露出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闵采尔对这件圣经外衣的态度远不像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样郑重。然而在闵采尔与近代哲学之间却相隔三百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紧密相连的;正如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一样,他的政治理论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正如他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sup>4</sup>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理论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人间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年王国,其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同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机构。闵采尔所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不再有阶级差别、不再有私有财产、不再有对社会成员而言是独立的和异己的国家政权。闵采尔认为,当时所有的政权,只要是不依附、不参与革命的,都应当推翻,一切劳动和一切财产都应当具有公共的性质,必须实行最完全的平等。为了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这一切,必须建立一个同盟;必须邀请诸侯和封建主都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应当不失时机地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具有更加激烈、更加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以外，他还以同样慷慨激昂的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在想象中的实行社会共和平等的千年王国同当时的压迫加以对比。与此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他本人则留在阿尔施泰特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捣毁了阿尔施泰特附近梅勒巴赫的圣母教堂，这是按照圣诫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因为你们是圣洁的人民。”（《申命记》第7章5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施泰特去平息这次骚乱，并传唤闵采尔到城堡去。闵采尔在那里宣读了一篇布道词，这样的布道词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个“维滕贝格的行尸走肉”（闵采尔对路德的称呼）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闵采尔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要杀掉那些把福音书当作异端邪说的僧侣和修道士，为此，他援引新约作为根据。他说，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生存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封建主就是盘剥、偷盗和掠夺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植物，统统攫归己有。然后他们却向穷人们宣讲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而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敲骨吸髓；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架，这时那位撒谎的博士<sup>①</sup>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

<sup>①</sup> “撒谎的博士”是闵采尔对路德的蔑称。——编者注

“穷人仇恨封建主,这是封建主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消除骚乱的根源,年深月久,局势怎么会安定呢?呵!亲爱的封建主,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那该多好啊!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威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布道词付印了;他在阿尔施泰特的承印者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而被驱逐出境,闵采尔本人的一切著作都必须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sup>①</sup>拿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究竟是哪些权贵亵渎神明,把上帝变成画像上的小人物。”

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巨大的冲击;这将是一场较量,它将使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使卑贱的人翻身。”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句:

“请你注意,我已经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今天已经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除根、破坏、击溃、颠覆,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道抵御君主、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经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sup>②</sup>

闵采尔同路德及其党羽之间的裂痕早就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

---

① 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编者注

② 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7—78页。——编者注

已接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闵采尔撇开路德而自行实施的。路德怀着温和改革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早在1524年春季,闵采尔就已经写信给梅兰希顿这个心胸狭窄、思想顽固、蜚居书斋的典型人物,指出他和路德根本不理解这场运动。他们企图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窒息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已经陈腐不堪。

“亲爱的兄弟们,不要再等待和踌躇了,时机已经到了,夏天已经来临。请不要同不敬上帝的人为友,他们在阻挠圣经发挥全部力量。请不要对你们的诸侯阿谀逢迎,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这些温文尔雅的人士,幸勿见责,我实在不能不如此。”<sup>①</sup>

路德不止一次地要求同闵采尔公开辩论;但是,闵采尔虽然时刻准备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滕贝格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参与一场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向高等学校证实圣灵的力量”<sup>②</sup>。他表示,如果路德真有诚意,就应当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著作承印者的迫害,取消书刊检查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出版物充分展开。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印行以后,路德就以告发者的姿态公开出来反对闵采尔了。他印发了《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称闵采尔为撒旦的工具,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讲邪恶教义为满足,他们还号召人

① 闵采尔1522年3月27日给菲·梅兰希顿的信。(威美尔曼错把日期写成1524年3月29日。)——编者注

② 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6页。——编者注

们起来暴动,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不得不在魏玛宫廷的诸侯面前就指控他密谋作乱一事进行答辩。人们揭发了一些事实,使他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经被发觉,他同矿工和农民的组织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就有人用驱逐出境来威胁他了。他刚刚回到阿尔施泰特,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引渡他;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走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该城,市政会就把他引渡过去。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的鼓动热潮日益高涨,使得闵采尔的宣传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闵采尔把再洗礼派争取过来,作为宣传工作的极宝贵的代言人。这个教派本来没有确定成文的教义,他们只是通过反对一切统治阶级的共同立场,通过再洗礼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力修苦行,在鼓动方面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日益紧密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由于遭受种种迫害,他们居无定所,在整个德国到处漂泊,到处宣讲新的教义,因为闵采尔在这种教义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自身的需要和愿望。他们当中有无数的人遭受刑讯,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坚贞不屈;在人民的激情迅速高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取得了无法估量的成就。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现成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得到帮助。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sup>286</sup>。约在一个月以前,该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起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闵采尔就在此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那十分大胆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没有绝对约束力,圣礼<sup>287</sup>毫无价值可言,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对上帝的亵渎。路德大叫:“看吧,

撒旦又在这里出没了，那个来自阿尔施泰特的妖精！”<sup>①</sup>闵采尔把他的答路德书<sup>②</sup>在纽伦堡付印。他直截了当地指责路德向诸侯献媚，指责他虎头蛇尾，支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被市政会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阿尔萨斯和瑞士，然后再回到黑林山南部。这个地区早在数月以前就已经爆发了起义，他的再洗礼派密使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次起义的进程。闵采尔的宣传旅行，对于人民派的组成，对于这个派的要求获得明确提法，对于起义最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显然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这次旅行中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进行诱导；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坦率地同他们畅谈自己的最终目的。闵采尔当初在图林根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现在，闵采尔已经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从萨克森和图林根，到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直到阿尔萨斯和瑞士边境，他都建立了组织联系，德国南部的鼓动家，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格里森的汉斯·雷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厄和斯图加

---

① 路德1525年2月4日给约·布里斯曼的信，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81页。——编者注

② 闵采尔《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滕贝格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编者注

特的曼特尔博士,都成了他的弟子和同盟的首领,这些人大多是革命的教士。他本人多半逗留在沙夫豪森边境的格里森,由此出发巡游黑高和克莱特高等地区。惶惶不安的诸侯和封建主到处对这个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反而使平民派的反抗精神更加昂扬,使他们的团结更加巩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近五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这里亲自领导起义,详情后面再谈。

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两派首脑人物的品性和行为是如何忠实地反映出本派的立场;路德的动摇不定的态度,他在运动发展的严峻时刻所怀的恐惧心理,以及他投效诸侯的卑劣行径,如何同市民阶级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完全合拍;闵采尔的革命气魄和果断精神如何在最先进的平民和农民集团中得到发扬。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路德只满足于表达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借以在本阶级内部沽钓极其廉价的声誉;而闵采尔则相反,他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直接想法和要求,并且只从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一派,这一派既要站在他那样的思想高度,又要具有他那样的魄力,这样一来,这一派就始终只占起义群众的极少数。

##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 50 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就在德国农民中间显出了最初的征兆<sup>①</sup>。

1476 年,在维尔茨堡主教管区出现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个早已被胡斯战争、“被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和监禁等等”<sup>②</sup>弄得一贫如洗,而又不断遭到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伯海姆,人称吹鼓手小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河谷。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灵;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伴奏,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洗刷自己的罪过,戒除尘世虚浮的欲念,抛弃一切浮华的饰物,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

---

① 我们在纪年上沿用了威美尔曼的材料,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国外缺少足够的资料,而威美尔曼的材料也已经能完全满足本书的要求。

② 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 年斯图加特版第 1 卷第 118 页。——编者注



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受和娱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针对统治阶级而确立斯巴达式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底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底层要展示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同其他一切社会成员处于敌对地位,要使自己集成为一个阶级,必须一开始就彻底抛弃自己身上还能同现存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一切;就必须放弃那些使深受压抑的生活有时尚堪忍受的一点点乐趣,放弃连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的一点点乐趣。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粗犷狂热形式还是就它的内容来看,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的清教徒<sup>288</sup>(不同于独立派<sup>289</sup>和更激进的各教派)所鼓吹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此外,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将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而失掉其革命性质: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加,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另一方面,随着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革命化,无产阶级本身也就日益革命化。这样一来,这种禁欲主义就将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这种禁欲主义的教派分子那里,它也是或者直接演变为市民阶级的吝啬之风,或者演变为一种矫揉造作的骑士式的道德规范,而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行会手工业者式的鄙吝习气而已。无产阶级群众既然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割舍,那就无须再对他们进行什么禁欲的说教了。

吹鼓手小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是从这个说教开始活动的。事实上,只有猛烈地振臂高呼,只有突然抛弃习以为常的整个生活方式,才能把没有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习

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圣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规模迅速扩大;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是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在布道时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以后不应该再有皇帝,也不应该再有诸侯、教皇以及其他教会或世俗的权贵;人人都应该是兄弟,人人都应该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任何人都不应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关税、赋税以及其他杂捐和劳役都应该永远废止;各处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该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福音。这位预言者即“圣母使者”很快就名扬四方。一批批朝圣者从奥登林山,从美因河、科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和从莱茵河地区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创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面前并向他祈祷,就像向圣者祈祷一样;人们争相拔取他的帽子上蓬乱的绒毛,就仿佛得到了圣物和护身符。僧侣出来反对他,把他的目睹神灵的本领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信仰者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这个造反的牧人的礼拜日布道竟吸引了40 000多人齐集尼克拉斯豪森。

吹鼓手小汉斯一连几个月向群众布道。但是,他的目的并不限于布道。他同尼克拉斯豪森的教士秘密交往,还同两个骑士秘密交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图恩费尔德和他的儿子,他们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担任计划中的起义的军事首领。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吹鼓手小汉斯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了信号。在布道结束时,他说:

“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圣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请你们把妇女、小孩和老人都留在家里;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

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朋友都约请来,越多越好。但你们来时不要拿朝圣手杖,而要全副武装,一手拿朝圣的蜡烛,一手拿剑和矛或戟。到时候,圣母将要向你们宣告她希望你们做什么。”<sup>①</sup>

可是,在农民大批到来之前,主教<sup>②</sup>的骑兵已经在夜间把这位反叛的预言者抓去,并把他带到维尔茨堡的城堡里去了。在预定起事的那一天,大约来了34 000名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农民们感到十分沮丧。绝大部分人纷纷散去;较坚定的一部分人集结了将近16 000名群众,在孔茨·冯·图恩费尔德和他的儿子米夏埃尔率领下一同来到城堡前。主教许下各种诺言劝说他们回家;可是,他们刚刚开始散去,就遭到主教骑兵的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小汉斯本人则被烧死。孔茨·冯·图恩费尔德逃脱了,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修道院,才允许他回来。后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的活动还继续了一些时候,但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

在这第一次发动起义的尝试之后,德国又沉静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90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

1491—1492年荷兰农民举行起义,在海姆斯凯尔克会战中被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镇压下去;同一时期,上士瓦本肯普滕修道院管区的农民也举行过起义;1497年前后夏尔德·埃尔瓦领导了弗里斯兰起义<sup>③</sup>,结果也遭到了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的镇压;所有这些起义,我们就不一一论述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战

① 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21—122页。——编者注

② 鲁道夫第二·冯·谢伦贝格。——编者注

③ 弗里斯兰农民起义于1500年爆发。“1497年前后”是恩格斯从威美尔曼著作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它们迄今都是自由农民反对企图把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密谋组织:鞋会和穷康拉德。

在尼德兰导致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猛涨,于1493年在阿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一个秘密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还有地道的市民阶级反对派中的人物,甚至一部分下层贵族也或多或少地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施塔特、苏尔茨、丹巴赫、施托茨海姆和舍尔韦勒等地区。这些谋反者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和现在都一贯通过高利贷榨取阿尔萨斯农民脂膏的犹太人,要求举行一次把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的欢乐年,要求取消关税、杂捐以及其他各种负担,要求撤销教会法庭和罗特韦尔(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把僧侣俸给限定在每人50—60古尔登,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要求在每个教区都建立独立的、通过自行选举组成的法庭。谋反者的计划是,一旦力量足够强大,就袭击城防坚固的施勒特施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从该城发难,在整个阿尔萨斯发动起义。预定在起义时刻打出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系着长长的皮带的农民鞋,这就是所谓的 *Bundschuh*,从这时起,到以后20年间,农民在密谋造反时都以此为标志和名称。

谋反者常常在夜间到僻静的洪格贝格山上集会。入会时要举行极其秘密的仪式,并且规定,如有背叛行为,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在1493年复活节前一周,正当谋反者准备向施勒特施塔特发动攻击的时候,事情还是泄露了。官方马上采取行动;许多谋反者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有的人被肢解或斩首,有的人被砍掉双手或指头,驱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受这第一次镇压之后并没有被消灭。相反,这个组

织还是秘密地继续存在,而且,许多散居于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流亡者都变成了密使,他们到处都发现同样的压迫激起了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扩建鞋会组织,使它遍布于现今的巴登全境。德国南部的农民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从1493年起,他们就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他们克服了分散居住的农村生活方式对于建立人数众多而集中的联合组织所造成的重重障碍,在无数次遭到镇压和失败以及首领被杀之后,仍然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种顽强坚韧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包括布鲁赫萨尔区在内的施派尔主教管区已经出现了秘密的农民运动的迹象。鞋会在这里实际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组。大约有7000人加入了鞋会组织,总部设在布鲁赫萨尔和魏恩加滕之间的下格龙巴赫,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一带,溯河而上则直达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他们的条款规定:不再向诸侯、贵族和僧侣缴纳任何息金、什一税、赋税或关税;废除农奴制度;没收寺院以及其他教会财产分给人民,除皇帝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

我们在这里看到,农民第一次提出了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这两项要求。从这时起,这两项要求经常由比较先进的农民和平民集团提出,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分配教会财产的要求转变成没收教会财产以利于实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并把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转变成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为止。

再度兴起的鞋会同原先的鞋会一样,也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入会的仪式,有鞋会的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高于一切!”它的行动计划同阿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大多数居民都已经加入鞋会的布鲁赫萨尔,要

在那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且把这支军队派去作为周围各诸侯领地的一个流动性的集合中心。

有一个谋反者在忏悔时把上述计划告诉了教士,于是,这个教士把计划披露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阿尔萨斯的各帝国等级和士瓦本联盟<sup>290</sup>对此都深感震惊,由此可以看出鞋会组织分布之广。当局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极其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的闻所未闻的行动。农民在各地集合,进行武装反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毕竟不能持久。谋反者有的被处死刑,有的逃跑了;但是因为严守秘密,所以大部分谋反者,甚至包括首领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者邻近的封建主的领地,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再次遭到失败之后,阶级斗争似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趋于平息。而实际上,斗争仍在悄悄地继续进行。早在16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德就已经在士瓦本建立了组织,它显然同被驱散的鞋会会员有联系;在黑林山地区,鞋会以单个小组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十年以后,出现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农民领袖,才把分散的线索重新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不宁的时期,这两个密谋团体组织相继开始进行公开活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农民同时掀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动。

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重建者是下格龙巴赫的约斯·弗里茨,他在1502年密谋失败后逃亡,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超群出众的人物。他逃亡以后,在博登湖和黑林山之间的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城附近的莱恩定居下来,甚至在那里当了土地看守人。关于他如何以那里为据点对组织进行改造,如何巧妙地把各

各式各样人物吸收进组织，在法庭侦查档案中都有极其有趣的翔实记载。这位典型的密谋家具有外交才能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各个阶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批地吸收到鞋会中来，其中有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和农民；他很可能还组织了各种层次不同的密谋活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他都极其审慎而又练达地加以利用。除了让立场坚定的密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于全国各地之外，他还让一些流浪汉和乞丐去完成不太重要的任务。约斯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人数众多的流浪汉统统掌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在他的密谋活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奇特的人物：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到处飘泊，诡称女孩脚受了伤，从而沿街乞讨；他的帽子上有八个以上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圣奥迪莉娅、圣母等等，他留着长长的红胡子，拿着一根带匕首和钉子的多节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廷的名义要求施舍，拿着香料和苦艾向行人兜售，穿一件铁褐色长外衣，戴一顶红色四角帽，帽上有一个特里安的小娃娃，身边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挂着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他一些乞丐头子则故意露出伤疤，也都穿着类似的古怪服装。在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十个人为了获取2 000古尔登的报酬，奉命将在阿尔萨斯、封疆伯爵领地巴登和布赖斯高这三个地方同时放火，并在察伯恩区的教堂建堂节那一天至少带着他们手下的2 000人到罗森城去，在曾任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的指挥下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中间，建立了一处又一处联络站，约斯·弗里茨就同他的主要密使——弗赖堡人施托费尔经常骑着马在各处巡回，并在夜间检阅新招来的兵员。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林山地区的分布情况，法庭侦查案卷中有充分材料可资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的

形貌特征。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一些贵族、僧侣(包括莱恩本地的僧侣),以及失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成员中可以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下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组织的分支遍及阿尔萨斯全境,遍及现今的巴登,一直到符腾堡和美因河畔。在偏僻的山上有时举行较大的集会,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讨论鞋会的事务。首领们集会时往往约请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集会都是在莱恩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举行的,也正是在这里,通过了鞋会的十四条款: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撤销罗特韦尔帝国法庭,教会法庭只能裁决宗教事务;凡所付息金已同本金数目相等,则不应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僧侣每人以领一份薪俸为限;没收教会财产和寺院珍宝以充鞋会军费;废除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持久和平;采取有力措施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牢固设防的城市弗赖堡作为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结起来,就开始同皇帝谈判,如果皇帝拒绝,就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一致通过的各项条款。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明确和坚决,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温和怯懦分子作出相应的让步。

原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举事。只是鞋会会旗还没有置办,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隆去让人绘制会旗。会旗上除了各种徽记图案之外,还画着一只农民的鞋,写着一行字:愿上帝保佑神圣的正义事业。但是,当约斯·弗里茨离开驻地的时候,其他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弗赖堡,而且事前走漏了风声,加上宣传工作中的一些疏忽,致使



弗赖堡市政会和巴登的封疆伯爵<sup>①</sup>发现了线索,最后,由于两个谋反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计划终于暴露无遗。封疆伯爵、弗赖堡市政会和恩西斯海姆的帝国政府立即出动密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逮捕,受刑讯,被处死;可是这一次大多数人,特别是约斯·弗里茨都逃脱了。瑞士各州政府这一回十分凶狠地迫害逃亡者,甚至还处决了許多人。但是,瑞士各州政府同它们的邻邦一样,也无法阻止绝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那些逃亡者后来甚至又渐渐地回来了。最疯狂的是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sup>255</sup>,它竟下令将很多人处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的莱茵河畔,但他常常到黑林山这一边来,而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瑞士人这一次之所以要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其原因从第二年即1514年在伯尔尼、索洛图恩和卢塞恩爆发的农民起义<sup>②</sup>就可以看出。那一次起义彻底扫除了贵族政府和城市贵族。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得了一些特别的权利。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还远不如德国。农民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的有组织的大军击败了,而这种大军在瑞士是不存在的。

在符腾堡形成的第二个密谋组织与巴登的鞋会同时存在,而且显然与该鞋会有直接的联系。据文献记载,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就已经存在,因为自从下格龙巴赫人遭到镇压以后,使用鞋会这一名称过于危险,所以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

---

① 克里斯托夫第一。——编者注

② 这次起义最初于1513年爆发。——编者注

陶芬山麓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人民中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乌尔里希政府的无耻压迫以及有力地促使 1513 年和 1514 年运动爆发的连年饥馑,都使加入该密谋组织的人数不断增加;新征收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古尔登每年要交一分尼的资本税,导致了运动的爆发。绍恩多夫城的刀匠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首领的集会地点,他们计划先夺取该城。1514 年春,起义爆发了。3 000 名农民(一说是 5 000 农民)开到城下,但又被公爵的官使用种种动听的诺言劝退了。乌尔里希公爵在答应废除新税之后就带着 80 名骑兵匆匆赶来,这时他发现,由于他已经许下诺言,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邦议会来审议一切申诉。但是,密谋组织的首领们深知乌尔里希只不过是在向人民玩弄缓兵之计,一旦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它们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制征税。因此,他们就从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从“穷康拉德总部”发出邀请,要求各处派人前来参加同盟代表大会,并且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促进这一工作。雷姆斯河谷第一次起义所取得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告和密使到处受欢迎,所以,符腾堡各地区派了很多代表参加了 5 月 28 日在下蒂克海姆举行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尽快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那里使起义向四面八方扩展。当代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动员施瓦本山的居民加入组织的时候,起义已经在各地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遭到袭击并被俘虏,可是巴克南、温嫩登、马克格勒宁根等城市却都落入同平民结盟的农民手中,从魏恩斯贝格到布劳博伊伦,从布劳博伊伦到巴登边境,整个地区都掀起了公开的暴动;乌尔里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 6 月 25 日召开邦议会,一面却写信向周围地区的诸

侯和自由市求援以平息起义，信中说起义危及帝国境内所有诸侯、官府和显贵，还说起义“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邦议会，即各城市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邦议会上享有席位的农民的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高级教士还没有到会，骑士根本没有被邀请。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莱昂贝格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邀参加了议会，会上通过下列决议：把公爵手下三个可恨的顾问朗帕尔特、图姆布和洛歇尔撤职查办；由四个骑士、四个市民和四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发给公爵固定的年俸；没收修道院和寺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里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对抗这些革命的决议。6月21日，他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蒂宾根，高级教士也跟着他赶到那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那里去，市民们也就照办了。于是，他就在那里继续召开没有农民参加的邦议会。在那里，市民们慑于军队的威胁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蒂宾根协议，规定公爵所负的将近100万的债务均由本邦居民偿还，而公爵本人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洞的词句搪塞农民，并且还用严禁暴动和结社的惩治法令对付他们。至于农民在邦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就只字不提了。农民们声讨这种叛卖行径；但是，自从各等级为公爵承担了债务以后，公爵又借到了钱，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sup>①</sup>，也派来了援军。这样一来，到7月底，蒂宾根协议就被整个邦所接受，人们又重新宣誓，表示效忠于官方。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亲

---

<sup>①</sup>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自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在卡珀尔山扎下了营寨。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因缺乏口粮而自行散去，剩下的人也因同几个邦议会议员达成一项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各自回家了。这时，各城市都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疯狂地反对农民，它们自愿派队伍去增援乌尔里希的军队，于是乌尔里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那里的城市和村庄洗劫一空。1 600 个农民被捕，其中有 16 人立即被斩首，其余的大多数人被判处苛重的罚款，归入乌尔里希的金库。很多人长期被禁锢狱中。当局颁布了严厉的惩治法令，禁止农民重建组织，禁止农民举行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联盟以镇压一切起义的尝试。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在这期间幸而都逃往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陆续回家。

与符腾堡运动同时，在布赖斯高和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也出现了新的鞋会反抗运动的征兆。6 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过起义的尝试，但立即被封疆伯爵菲力浦击溃，其首领巴斯蒂安·古格尔在弗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同一年，即 1514 年，也是在春天，匈牙利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人们正在进行有关十字军讨伐土耳其人的宣传。人们同往常一样许诺说，农奴和依附农只要参加十字军就可以获得自由。将近 60 000 人参加了军队，由盖尔盖伊·多扎任指挥；他是塞克勒人<sup>291</sup>，曾在以往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封号。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不愿意进行这次十字军东征，因为这次东征势必要使他们失去财产和农奴。他们追赶各支农民队伍，采用武力和残暴的手段夺回他们的农奴。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怒不可遏。劳伦蒂乌斯和瓦尔纳瓦这两个最热忱的十字军传教士发表了革命讲演，使十字军对贵族的仇恨变得更加

强烈。多扎本人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多扎亲自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多扎同他的农民队伍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科什原野。他们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同贵族方面的人员发生冲突，于是就开始了敌对行动；不久就发生了小规模战斗，最后，农民对落入他们手中的所有贵族都实行西西里晚祷<sup>292</sup>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统统烧光。宫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进行第一次人民审判时，多扎就进一步采取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五路。两路被派往匈牙利北部山区，以便在那里掀起全面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罗什·萨莱雷什指挥，留守拉科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在多扎和他的兄弟格雷戈尔率领下向塞格丁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汇集于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略求援。在萨莱雷什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以后，贵族便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科什的军团。大批俘虏都被残酷地处决，剩下的俘虏则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扎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而向乔纳德进发；他在击溃了伊什特万·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乔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血的镇压，以清算他们在拉科什犯下的严重罪行。多扎在乔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由人民行使主权，然后向巴托里据守的泰梅什堡进发。但是，在他围困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并得到由安塔尔·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的增援时，匈牙利北部的两支军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而约翰·扎波略则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扎进击。农民遭到扎波略的袭击而溃散了，多扎本人被俘，并被放在烧红的铁

椅上炙烤,在他一息尚存时,敌人强迫他的部下来吃他的肉,并规定只有吃了他的肉的人才能免受极刑。溃散了的农民由劳伦蒂乌斯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后来又一次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几千具农民尸体高高挂在路旁,或者挂在已成一片焦土的村庄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竟达60 000人。贵族们费尽了心机,要在下次邦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家的法律。

这一时期在“温迪施边区”(即克恩滕、克赖因和施泰尔马克)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类似鞋会的密谋团体组织的。这个地区受到贵族和帝国官吏敲骨吸髓的盘剥,惨遭土耳其入侵者的蹂躏,饱受饥馑之苦;早在1503年,这里就成立了上述密谋团体,并且举行了一次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在1513年又举起了stara prava(旧权利)的战旗。然而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案;1514年,当他们以更大的声势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解散了。鉴于上述情况,一再受骗的人民就在1515年春天掀起了一场来势更猛的复仇战争。同匈牙利的情况一样,各处的城堡和修道院都被捣毁,农民陪审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刑和斩首。在施泰尔马克和克恩滕,帝国上尉迪特里希施坦很快就把起义扑灭了。在克赖因,敌人偷袭了赖恩城(1516年秋),接着又采用了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径如出一辙的无数奥地利式的残暴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遭受一连串如此惨重的失败之后,在经受贵族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德国农民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悄无声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并没有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重返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地区;

1517年，鞋会在黑林山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本人一直把1513年的鞋会旧旗藏在怀里，随身携带，此刻他又奔走于黑林山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同四年前一样，人们又预定在克尼比斯山上集会。但是由于人们没有严守机密，政府了解了有关情况，于是便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能干的会员，包括约斯·弗里茨在内，都不得不逃走。这一次，约斯·弗里茨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那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 四

正当鞋会的第四次密谋活动在黑林山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滕贝格发出了行将席卷各个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提出的论纲<sup>293</sup>就像闪电击中火药桶一样，引起了大火。骑士和市民，农民和平民，觊觎大权的诸侯和低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和博学多才的、专写布尔勒斯加<sup>294</sup>的反对派作家，他们追求的目标千差万别而又纷纭错杂，但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了起来。这个由一切反对派分子仓促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它却使运动的惊人力量突然地显示出来，而且更迅猛地使运动推向前进。

然而，正是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猛，运动中潜在的分裂萌芽也就势必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鼓动起来的群众中，那些由于自身的整个生活地位而相互直接对立的部分，势必又相互分裂开来，重新回到平常那种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围绕着两个引力中心的形形色色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并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反对派。不过这时的运动已经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



两个派别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立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出版物中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于路德派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就企图反对诸侯和僧侣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究竟有多大分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德国贵族在16世纪初期处于什么地位。他们正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到，随着他们的没落，帝国政权也在没落，整个帝国正在解体，分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领地。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没落必然要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同步发生。这里还要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从事军职以及他们相对于诸侯所处的地位，他们是最能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大，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大。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对德国可怜的政治地位感到不满；对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感到不满，而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而日益加深；对外国列强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感到不满；对德国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感到不满。所以，贵族的各种要求都必然首先归结为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侣作牺牲。进行这种归纳总结工作的人就是德国贵族在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里希·冯·胡登，同他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还有贵族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很明确、很激进地提出了改革帝国的要求。

这种要求无非就是要废黜一切诸侯,把僧侣诸侯的领地和财产全部转为世俗所有,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致就像从前的波兰共和国在鼎盛时代所建立的那种贵族民主制。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建立起贵族的即主要是军人阶级的统治,只要废黜那些分裂国家的罪魁即诸侯,只要取消僧侣的权力,使德国摆脱罗马教权的统治,就可以使帝国重新走向统一、自由和富强。

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占领的各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实行的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后来都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要建立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贵族民主制已经不可能建立,因为当时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强大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像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的下层贵族同城市的联盟。在德国,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而在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sup>295</sup>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且为资产阶级出身和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在德国,农奴制依然存在,贵族的收入来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被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收入来源是**资产阶级性的**:地租。最后,专制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从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同市民阶级之间的对立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行不通,因为在德国,实施全国性中央集权制的条件尚未具备,或者极不完备。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是致力于实际推行他的理想,就越需要作出更多的让步,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同

诸侯较量,日益显得无力,可见贵族光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唯一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颇有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对贵族早就领教够了,不会再去信任他们,不肯再去同他们结成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死敌。而那些理论家不是站在市民、诸侯一边,就是站在农民一边。既然帝国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提高贵族的地位,那么,贵族又怎能保证市民和农民从这场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情况下,胡登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他的宣传文件中很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向市民指出:为了自身的利益,市民们在即将来临的诸侯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也应保持中立。胡登只字不提废除农奴制以及取消农民向贵族缴纳捐税的问题。

当时德国贵族对农民的态度,同波兰贵族在1830—1846年暴动中对本国农民的态度完全一样。同现代波兰起义中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使运动获得成功。但是,由于以下两种情况,这种联盟恰恰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落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放弃对农民行使封建特权的地位,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笼统而又渺茫的希望就同贵族结盟,也就是同压迫他们最厉害的那个等级结成联盟。同1830年波兰的情况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经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农民才可能同贵族联合。但是,贵族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根本不愿意自动放弃特权,放弃自己的整个特殊地位以及绝大部分收入来源。

因此,当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到头来是独力对付诸侯的。诸侯

在过去两百年间就不断地夺取贵族的地盘,这一次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贵族。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道组成了一个以六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贵族同盟,声称目的是为了自卫。济金根一方面靠自己筹款,一方面靠同附近的骑士实行联合,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组织了募兵和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里尔选帝侯大主教<sup>①</sup>宣战,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驻特里尔城郊的时候,他的援军由于诸侯迅速出兵干涉而被截断了;黑森邦伯<sup>②</sup>和普法尔茨选帝侯<sup>③</sup>都驰援特里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施图尔城堡。胡登及其战友虽然竭力求援,可是,与之结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竟置济金根于不顾。济金根本人身负重伤,放弃兰施图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几个月后就死在苏黎世湖中的乌弗瑙岛上。

随着这次斗争的失败和两位领袖的去世,贵族势力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就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效劳并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进一步置身于诸侯直接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也不愿意同解放了的农民结成公开的同盟去打倒诸侯和僧侣。

---

①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② 菲力浦一世。——编者注

③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 五

路德对天主教教阶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了起来,从此以后,农民没有一年不起来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年到1523年,在黑林山和上士瓦本,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就都带有系统性了。同年4月,马希塔修道院管区的农民拒绝服徭役和纳贡赋;5月,圣布拉辛的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因海姆农民宣布拒缴什一税以及其他费用;7月和8月,图尔高农民举行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联邦实行残酷镇压,处死了很多人,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邦伯领地施蒂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可以看成是农民战争的序幕。

施蒂林根的农民突然拒绝向邦伯<sup>①</sup>交纳贡赋,他们结成强大的队伍,并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率领下,于1524年8月24日向瓦尔茨胡特进发。在这里,他们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市民之所以很愿意促成这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sup>255</sup>政府对他们的传教士巴尔塔扎尔·胡布迈尔进行宗教迫害,此人是托马斯·闵采尔的朋友和弟子。兄弟会规定,每星期要交三个

---

① 鲁·冯·苏尔茨。——编者注

克劳泽的会费,(就当时币值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阿尔萨斯、摩泽尔、整个上莱茵以及法兰克尼亚等处吸收农民入会,宣告兄弟会的目标是要废除封建统治,摧毁所有城堡和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以外的一切统治者。会旗就是**德意志三色旗**<sup>20</sup>。

起义迅速蔓延到现在的上巴登全境。上士瓦本的贵族惊恐万状,当时他们的军队几乎全都在意大利同法国弗朗索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通过谈判拖延时日,以便筹款招兵,待到力量足够强大,便以“烧杀掳掠”去惩罚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以后,开始出现了种种周密策划的叛变倒戈、背信食言和阴谋活动。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以玩弄这一套手法而臭名昭著,而这一套手法也正是他们对付分散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有力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直辖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sup>290</sup>出面斡旋,但是并没有向农民保证要作出任何实际的让步。农民仍然继续行动。从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林山到达乌拉赫和富特旺根,把他的队伍扩充到3 500人,并率领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离施蒂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力量不超过1 700人,而且这些人都相当分散。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后来确实也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了协议。贵族答应同农民订立友好的条约,或者由双方直接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贵族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理农民提出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一概解散。

经农民一致同意,拟定了十六条款,要求施托卡赫法院批准。条款都很温和。农民要求废除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苛重的赋税和全部领主特权,要求保证不受任意逮捕,要求保证不受法庭任意作出的不公正判决的侵害——此外别无他求。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马上要求他们继续交纳全部尚有争议的贡赋,直到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农民当然拒绝这一要求,他们让贵族老爷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又再次爆发。农民又聚集起来,诸侯和贵族老爷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了布赖斯高,深入到符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阿尔瓦的角色,他率领军队监视农民,袭击各路援军,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有时也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院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贵族却宣读了一篇皇帝的诏书<sup>296</sup>,作为对农民的答复。审理旷日持久,而贵族、诸侯和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备战。这时,斐迪南大公除了统治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以外,还统治着符腾堡、巴登的黑林山和阿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拘捕农民,严刑拷打,杀而不赦,随心所欲地消灭他们,烧毁他们的家产,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逐出家园。由此可见,诸侯和老爷究竟是怎样实行停战的,他们所说的善意调停和审理农民申诉究竟意味着什么。斐迪南大公向奥格斯堡的韦尔泽家族借来一笔钱,迫不及待地扩充军队;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三期募齐款项和招满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是托马斯·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sup>297</sup>逗留的五个月中发生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展曾经产生过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间接地完全得到了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者大都是他的弟子,他们都拥护他的思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高原地区农民的《书简》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拟定的。闵采尔在回图林

根的途中还给造反的农民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sup>298</sup>。

与此同时,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也想借农民之力实现他收复本邦失地的阴谋。他从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的确是事实。在1520—1524年间,黑林山和符腾堡地区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都同他的名字有所牵连,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维尔城堡出发直接袭击符腾堡。不过,他只是被农民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更谈不上取得农民的信任了。

当年冬季就这样过去了,双方都没有采取什么重大步骤。诸侯老爷已经销声匿迹,农民起义却得到了发展。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和莱希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骤起。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林山-黑高农军同符腾堡的乌尔里希一道密谋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农军参加了乌尔里希发起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徒劳行动的时候(1525年2—3月),农民于2月9日在乌尔姆城南边的里德举行了起义,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里,竖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里希·施米德率领。这支农军有10 000—12 000人。

2月25日,7 000名上阿尔高农军在舒森河集结,因为传闻官方军队将开来对付这里的不满分子。肯普滕人民在整个冬季都同他们的大主教<sup>①</sup>争执不休,他们也在2月26日集结起来,并同上阿尔高农军联合在一起。梅明根和考夫博伊伦这两个城市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这两个城市在斗争中的暧昧态度,在这里已经暴露出来了。3月7日,梅明根十二条款在梅明根被上阿尔高全体农民接受。

---

① 塞·冯·布赖滕施泰因。——编者注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高农民的消息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博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扩大了。司令部设在贝马廷根。

在下阿尔高,在奥克森豪森和谢伦贝格地区,在蔡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的领地,农民也举行了起义,而且早在3月初起义就爆发了。这支下阿尔高农军有7 000人之众,驻扎在武尔察赫附近。

这四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梅明根条款比黑高农军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明显地表现出优柔寡断。农民有时也有一点果断精神,但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即在他们对敌人的花招有了体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瑙河畔创建了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瑙沃特的整个地区,从伊勒河、罗特河、比伯河这几条河的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这里安营扎寨。15个地区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赶来了,从117个地区派来了援军。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里希·雪恩,他的传教士是莱普海姆的教士雅科布·韦厄。

所以,在3月初,上士瓦本六处营寨约30 000—40 000名起义农民都武装起来了。按性质来说,这些农军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支农军中只占少数。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各处都成为农民营寨的核心和骨干。农民群众希望用威胁手段迫使贵族让步;只要贵族保证对农民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同贵族达成协议的。可是当事情一拖再拖而诸侯军队又日益逼近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厌战情绪,那些生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一点财产的农民,多半都会跑回家去。此外,当时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帮人败坏纪律,瓦解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到处采取守势,而且各

营寨士气普遍低落；这些情况还说明，即使撇开农军战术不精和良将奇缺这两点不谈，他们也绝不是诸侯军队的对手。

还在农军集结期间，乌尔里希公爵就带着招募来的军队和一些黑高农民从霍恩特维尔向符腾堡进击。如果农民这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士瓦本联盟就溃败了。但是，由于农军只采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高农军以及湖军缔结停战协定，准备进行谈判，并确定在鸠迪加礼拜日（4月2日）<sup>299</sup>了结此事。在这期间，他得以进攻乌尔里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里希公爵于3月17日再度撤离符腾堡。然后，他回过头来对付农民，但是，他自己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叛乱者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他把军队开往乌尔姆，在那里集结了新的援军。他派了一个监视营留守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士瓦本联盟终于腾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由各方派出的兵员。于是它抛弃了自己的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sup>300</sup>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地遵守了停战协定。为了准备鸠迪加礼拜日的谈判，他们拟定了自己的要求，即著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全体教徒选举和罢免神职人员，废除小什一税，把大什一税<sup>260</sup>中除支付教士俸给之外的全部余款均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权和死亡税，限制苛重的徭役、赋税和地租，归还从教会和个人那里夺去的林地、牧场和特权，消除司法和行政部门的专横跋扈。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占很大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简》中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这封向全体农民发出的公开书简要求农民参加“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

概是办不到的”),或者用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绝罚”威胁所有拒绝参加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参加就把谁排除于社会活动之外,完全隔绝他与同盟成员来往。所有城堡、寺院和教堂也都要按照世俗绝罚的要求加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自愿离开这些地方,同其他人一样搬进普通住宅,并参加基督教同盟。这篇激进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天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彻底战胜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绝罚”的规定所涉及的只是压迫者和叛徒,以及城堡、寺院和教堂;按照这种规定,必须把压迫者和叛徒处死,把城堡焚毁,把寺院和教堂没收,并把那里的财宝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把他们的十二条款提交给被指定的仲裁法庭法官之前,他们已经得到士瓦本联盟毁约和军队逼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高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军农民在盖斯博伊伦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四支农军合在一起,改编成四个新的纵队;农民还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变卖其中的珠宝以充军费,并焚毁各地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为他们的作战准则,而原定缔结和约的鸠迪加礼拜日却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层出不穷,六个月来黑林山的起义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莱希河地区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一切足以说明,在德国三分之二的地区为什么农民起义会接连不断地迅速发生。此外,各处起义同时发生这一事实,也证明领导运动的人就是通过再洗礼派以及其他密使去组织运动的那些人。在符腾堡地区,在内卡河下游,在奥登林山,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下半月就已经出现风潮;各处事前都已经指定4月2日这个鸠迪加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4月

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进行决定性的出击，举行群众起义。阿尔高农民、黑高农民和湖军农民也于4月1日通过敲起警钟和召开群众大会的办法，把全部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入营寨，并且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采取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六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了起义。这时在**讷德林根城**附近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在农民的帮助下，以**安东·福尔讷**为首的城市革命派占了优势，福尔讷被任命为市长，该城同农民采取一致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7日到处举行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在**罗滕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经拿起武器；罗滕堡城的名门的统治于3月27日被**斯蒂凡·冯·门钦根**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贡赋恰恰是该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的，暧昧的。在**维尔茨堡**主教教堂议事会<sup>301</sup>管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举行了起义；在**班贝格**主教管区内，总暴动在5天之内就迫使主教<sup>①</sup>屈服。最后，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安下了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营寨。

在**奥登林山**，革命派的首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亨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贝格的小店主。在这里，3月26日就已经掀起了风暴。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河。从罗滕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参加了行动。所有援军会合以后，就在格奥尔格·梅茨勒率领下于4月4日向亚格斯特河畔的申塔尔寺院进军，内卡河谷的农民也在这里同他会师。内卡河谷的农民是由海尔布隆附近的伯金根的小店

---

①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主耶克莱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鸠迪加礼拜日在弗莱恩、松特海姆等地宣布起义，而文德尔·希普勒则率领一批密谋者奇袭厄林根，并把附近的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在申塔尔，有两支联合成“华美军”的农民军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组织向各城堡和寺院发起攻击。华美军约有8 000人的兵力，装备了火炮，还拥有3 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了华美军并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罗滕堡和厄林根的战时后备军中征集来的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

驻内卡苏尔姆的符腾堡地方长官路德维希·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发起了进攻。由于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由于刚刚传来了关于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厄被杀以及特鲁赫泽斯施行残酷手段等消息，农民们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逃往魏恩斯贝格，他在那里遭到攻击，城堡受到了弗洛里安·盖尔猛攻。经过长时间的鏖战，盖尔终于攻下城堡，路德维希伯爵同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即4月17日，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以及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共同审讯这批俘虏，并驱赶其中的14人，由黑尔芬施太因打头，穿过手持梭镖奋力刺杀的士兵行列。他过去就是用这种最具有侮辱性的方式来处死俘虏的。魏恩斯贝格被占领以及耶克莱恩在黑尔芬施太因身上所采取恐怖报复手段，对贵族们起了作用。勒文施泰因的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亨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立过功，他们马上送来了必需的火炮和弹药。

首领们商议是否要拥立葛兹·冯·伯利欣根为领袖，“因为他可以把贵族拉到这一边来”。这个建议得到了赞同；但弗洛里安·盖尔从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了反动的苗头，于是就带着他的黑

军脱离华美军，独自行动，最初走遍了内卡河流域，后来又在维尔茨堡地区活动，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剩下的农军先是向海尔布隆进发。在这个强大的帝国直辖自由市，和几乎所有地方一样，同名门对峙的是市民反对派和革命反对派。革命反对派同农民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在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农民的领袖们带领自己的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城市被吸收加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古尔登现款，还提供了一个中队的志愿兵。只有僧侣和德意志骑士团<sup>302</sup>成员的产业遭到了洗劫。22日，农民留下少数驻防部队就撤走了。海尔布隆被指定为各地农军的联络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了代表，商议农民的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以及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同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这时又在这座城市占了优势，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登林山进发。4月24日，葛兹·冯·伯利欣根（此人在这以前的几天内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sup>①</sup>，然后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这时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担任华美白军（与佛罗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的总指挥。可是，他同时又是农民的俘虏，农民十分警觉地监视着他，并责成他按首领们的意见行事，未经首领同意不得擅自行动。葛兹和梅茨勒率领农民群众通过布亨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那里从4月30日驻扎到5月5日，并在整个美因茨地区掀起暴动。各地的贵族被迫参加暴动，借此保全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遭到焚烧和洗劫。这时农军士气明显下降；最坚

---

①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决果断的人都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一道离开了队伍。罗尔巴赫在农军占领海尔布隆以后已经离队出走,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不可能在一支想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久留。迫不及待地想同贵族取得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农军士气低落的标志。此后不久,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前来应募的雇佣兵,不要像以往那样,每个月都征召新兵、遣散老兵,从而使兵员不断更新,而应当使这支武装起来的、多少受过训练的队伍保持稳定。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忘乎所以,竟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种聚众掠夺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就不可能合乎他们的心意,而且,他们一旦填满私囊,就会随心所欲地返回家园。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海尔布隆的市政会成员汉斯·贝林竟说服农军的首领和顾问通过了《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删去了十二条款中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改成了恭顺的请愿语言,并且硬说这些语言出自农民之口。这一回,农民对事情忍无可忍了,他们纷纷发出强烈的呼声,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而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这期间,维尔茨堡地区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当农民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主教<sup>①</sup>就退守到维尔茨堡附近的坚固设防的弗劳恩贝格,并驰书各方求援,结果徒劳,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邦议会,出席会议的也有农民代表。但是,会议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查获了一批信件,证实了主教的叛变阴谋活动。邦议会立即散去,造反的市民和农民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

---

① 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德堡；第二天，弗洛里安·盖尔及其黑军就来到了维尔茨堡，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河农军，这支军队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罗滕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葛兹·冯·伯利欣根也率领华美白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贝格。

在林普格地区以及埃尔旺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势如破竹，把整个地区都卷入暴动，烧毁了许多寺院和城堡，霍亨陶芬城堡也在其中；农军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随队伍行动，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包括林普格的酒店老板在内，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准备袭击符腾堡，但经过别人劝诱以后撤退了。当时，德意志小邦林立的割据状态也同1848年一样，使各邦的革命者很难采取共同的行动。盖尔多夫农军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地区里，这支队伍在当地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势必自行瓦解。他们同格明德城达成了协议，只留下500名武装农民就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建立了农军。他们破坏了许多城堡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了哈尔特山麓诺伊施塔特，而在此以前几天，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渡河，迫使施派尔城缔结协定。冯·哈伯恩元帅只率领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召开一次邦议会以解除农民的负担。

最后，在符腾堡，起义很早就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山，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经结成了反对僧侣和领主的同盟，3月底，布劳博伊伦、乌拉赫、明辛、巴林根、罗森费尔德等地的农民都举行了起义。盖尔多夫农军在格平根附近，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



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袭击符腾堡并策动农民举行起义,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风潮。普富林根在4月6日就已经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sup>①</sup>的政府狼狈不堪。它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和各城堡的形势极其危急,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佩格也几乎毫不设防。

政府企图集中各城市的后备军去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一时遭到了失败。4月16日,博特瓦尔的后备军拒绝开拔,不愿前往斯图加特,而进入博特瓦尔附近的温嫩施泰因山,他们在那里成了市民和农民营寨的核心,而这个营寨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同一天,察伯高也爆发了起义;毛尔布龙寺院遭到了抢劫,不少寺院和城堡都被摧毁了。援军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支持农民队伍。

温嫩施泰因山上的农军首领是**马特恩·费尔巴哈尔**。费尔巴哈尔是博特瓦尔市政会成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他是不得已才作出妥协跟农民走的。在这期间他仍然持非常温和的态度,阻止在各城堡执行书简条款,总是试图在农民与温和派市民之间进行调解。他阻挠符腾堡农民同华美白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符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因而曾于4月19日被撤职,但第二天又被任命为首领。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甚至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于22日带着200名坚定分子前来援助符腾堡农民队伍时,也毫无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继续留任,而自己只能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同温嫩施泰因山上的农民进行谈判。农民坚持要政府接受十二条款,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于是

---

<sup>①</sup>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达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6 000之众的农军进驻比蒂希海姆,并威胁斯图加特。该城的市政会成员大半都已经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主持行政工作。当地的市民,也同其他城市一样,都分裂成名门、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派三派。革命平民派于4月25日给农民打开了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符腾堡的起义农民已经自称为**华美基督教农军**,这支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完成的;对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制订了严格的规章。托伊斯·格尔伯带领了一个中队的斯图加特军加入农军。

4月29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绍恩多夫附近侵入符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他把整个地区都吸收入同盟,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这样防止了他自己的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同无所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混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力量而危及他本身。他在得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绍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并于5月1日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以上我们描述了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详尽地陈述其他各批农军活动情况(图林根和黑森、阿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特鲁赫泽斯的进军情况,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在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下,消灭了这第一批起义农民。

关于特鲁赫泽斯,我们在上文叙述了他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此后就一直有提到他;3月底,他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留下一支由迪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包括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援军在内,总共近10 000人,

其中有7 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能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路援军向乌尔姆汇合的行动极为缓慢,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爆发起义的各邦很难征募兵员,一方面是由于各地政府缺少经费,另一方面还由于各地要留少数部队坚守要塞和城堡,绝对不能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动的部队究竟少到何种程度,我们在上文已经作了介绍。所以,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能否取得成就,将决定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这期间,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在里德周围地区摧毁城堡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向这支农军发起攻击。农民们在联盟军队逼近时立即退却,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进入施瓦本山的峡谷和森林。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力的骑兵和火炮对农民们是无可奈何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停止追击,转而进攻莱普海姆农军;这支农军有5 000人驻扎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 000人驻扎在明德尔河谷,有6 000人驻扎在伊勒蒂森附近,他们在整个地区掀起暴动,毁坏寺院和城堡,准备调动所有这三支部队向乌尔姆挺进。然而,这里的农民看来也有点士气低落,所以,农军在战斗中已经没有任何把握,原因就在于雅科布·韦厄从一开始就谋求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经有足够的兵力作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向农军主力发起进攻,结果彻底击溃了这支队伍。雅科布·韦厄和乌尔里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区几番追击之后,整个地区也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抢劫和额外加薪而再次发生哗变,这件事又一次打乱了特鲁赫泽斯4月10日以前的军事行动。在这以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原来在此期间,这支农

军侵入了他的领地瓦尔德堡、蔡尔和沃尔夫埃格，并围攻了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发现农民是四分五裂的，于是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先后完全击溃。农军残部在教士弗洛里安率领下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使布赫霍恩(腓特烈港)和沃尔马廷根这两个城市加入了兄弟会；这支湖军于13日在萨勒姆寺院召开了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决定迎击特鲁赫泽斯。于是，各处立即敲响了警钟，在贝马廷根营寨集结了10 000人，被击败的巴尔特林根农军也来同他们汇合。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交战并获得胜利，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孤注一掷，而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高农军和黑高农军也逼近时，就更急于谈判了。因此，他于4月17日在魏恩加滕同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项从表面看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竟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高农军代表也都接受这项协定，然后开往符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诈使他从已成定局的覆灭中挣脱出来。假如他不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绝大部分都已经士气低落的农民，以及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首领，他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早就遭到至少由25 000—30 000人组成的四个纵队兵力的包围，而且无疑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他的敌人目光短浅，而这一点在农民群众身上一直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就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需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从敌人手中逃脱。湖军农民信守协定，以致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黑高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高农军也在他们的首领指使下卷进了这种背叛活动，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了这一行动，可是

在这期间却使特鲁赫泽斯摆脱了险境。

黑高农军当时虽然没有参加魏恩加滕协定,可是紧接着却干了一件带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乡土观念的事,结果断送了整个农民战争。在特鲁赫泽斯同他们谈判一无所得而向符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且继续驻守在他的翼侧,可是他们竟从未想到同符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采取一致行动,其原因是因为符腾堡农民和内卡河谷农民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远离他们的家乡时,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撤回并且向弗赖堡开去。

我们已经叙述了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符腾堡农民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而由特鲁赫泽斯留下的交给迪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则从这里向乌拉赫返回的情况。费尔巴哈尔在企图攻取乌拉赫失利之后即转往尼尔廷根,并写信向邻近所有的起义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符腾堡平原地区和戈伊相继开来了大批援军。特别是戈伊农民,他们在一直撤退到符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的周围集结起来,并且使内卡河谷和纳戈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布林根和莱昂贝格的整个地区都掀起了暴动;戈伊农民分成了两支强大的农军,于5月5日在尼尔廷根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布林根附近同联合起来的农军遭遇。农军的人数、火炮和他们的阵地使特鲁赫泽斯为之震惊;他重演故技,立即开始同农民谈判,并且同他们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他刚刚借此骗得农民的信任,就于5月12日在停战期间袭击农民,迫使他们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直到伯布林根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而落入特鲁赫泽斯手里为止。农民左翼因此失掉了根据地,遭到袭击和包抄。于是结局已定。缺乏纪律性的农民陷于混乱,随即狂奔逃命;凡是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

的人,也纷纷丢掉武器仓皇逃回老家。“华美基督教农军”瓦解了,整个符腾堡的暴动也随之完全平息了。托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耶克莱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戴上镣铐押送到内卡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那里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用火慢慢地把他活活烤死,而特鲁赫泽斯本人则同他的骑士们在一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骑士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内卡加塔赫侵入克赖希高,以支援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撕毁同农民缔结的协定,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庄,占领了布鲁赫萨尔。与此同时,特鲁赫泽斯还袭击了埃平根并俘虏了当地运动的首领安东·艾森胡特。选帝侯下令立即把艾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赖希高就这样被平定了,还被搜括了将近40 000古尔登。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在以上各次战役之后只剩下6 000人,选帝侯的军队则剩下了6 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登林山农民发起了攻击。

伯布林根失败的消息到处流传,使起义者感到恐惧。处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直辖自由市一下子都松了一口气。海尔布隆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同士瓦本联盟<sup>290</sup>妥协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海尔布隆设有农民办公室,各路农军代表在这里进行协商,准备以全体起义农民的名义向皇帝<sup>①</sup>和帝国提出建议。这些协商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提案,但协商过程再次表明: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等级已经发展到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革新整个德国局面的程

---

① 查理五世。——编者注

度,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形势很快就表明,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争取贵族,尤其是必须争取市民阶级。这样一来,文德尔·希普勒就掌握了协商的领导权。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中,文德尔·希普勒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最正确。他不是像闵采尔那样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像梅茨勒或罗尔巴赫那样代表农民的人物。他那多方面的经验,他那对各个等级相互间的态度的实际了解,都使得他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某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完全处于当时正式社会联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初期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形势的推动下已经预感到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正如闵采尔一样,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一切进步成分中起中介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也已经预感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必将实现。诚然,他所主张的原则和他所提出的要求都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但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正在出现的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农民一旦决心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就不能不接受他的原则和要求。所以,农民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就在海尔布隆采取了一种更为明确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农民对中央集权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以及在废除境内关税等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简言之,这类规定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十分明显地维护城市市民利益而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所以,当时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接近现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被概括为一种“帝国改革”方案以后,即使不从属于市民的当前要求,也必然从属于市民的最终利益。

当人们还在海尔布隆对这一帝国改革方案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贝林已出城迎接特鲁赫泽斯,并以名门

和市民阶级的名义同他高谈有关交出该城的问题。城里反动派的活动支持了这一背叛行为，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一起逃走。他前往魏恩斯贝格，企图在那里召集符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了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逼近了，他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当时已经征服了整个内卡河地区，迫使农民重新宣誓效忠，焚毁了许多村庄，刺死或绞死了所有曾经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为了给被杀的黑尔芬施太因报仇，他们把魏恩斯贝格烧成了一片焦土。

这时，在维尔茨堡近郊汇合的农军包围了弗劳恩贝格，并于5月15日在缺口尚未攻破之前就向堡垒发起勇猛的冲锋，但没有成功。城壕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他们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他们有的阵亡有的负伤。两天之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这里，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提议只留4000人在弗劳恩贝格郊外，而当着特鲁赫泽斯的面率领全部约20000人之众的主力部队前往亚格斯特河畔克劳特海姆附近安营，所有援军都可以到那里去集中。这个计划非常出色；只有通过团结群众并依靠人多势众才有希望打败当时已经拥有13000人的诸侯军队。然而，农军军心涣散和士气低落的情况过于严重，已经无法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葛兹·冯·伯利欣根在此以后不久就公开成为叛徒，他当时可能也曾竭力阻碍农军的行动，因此，希普勒的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而农军却像往常一样陷于分裂状态。直到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应尽速接应之后才开始行动。26日，驻扎在维尔茨堡的封疆伯爵安斯巴赫各中队在接到封疆伯爵已经对农民开始采取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队的残部同弗洛里



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费尔德附近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已经放松了战斗的准备。许多人在这里听说他们的村子当时已经宣誓效忠于特鲁赫泽斯,也就以此为借口各自回家了。农军继续向内卡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遣使者到法兰克尼亚、阿尔萨斯和黑林山—黑高农军驻地要求火速驰援。葛兹从内卡苏尔姆撤回厄林根。农军的兵力日益减少;葛兹·冯·伯利欣根也在行军途中不见了;他骑着马回了家,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里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同特鲁赫泽斯谈妥。在厄林根附近,由于误传敌人逼近的消息,突然使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感到惊恐万状;农军秩序大乱,四散逃走,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很大力气才集合了大约2 000人,再次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 000名战士来到这里,可是由于葛兹显然为了叛变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泰因到厄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并没有同华美军相遇,就开到内卡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华美白军的几个中队占领的小城遭到了特鲁赫泽斯的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经看见联盟军队营寨的火光,但是,农军首领们不敢进行袭击,而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华美白军残部。内卡苏尔姆既无援军解救,就于29日向联盟军队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杀害了13个农民,然后追击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整个内卡河谷、科赫尔河谷以及亚格斯特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的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同一些农民相遇,这些农民由于受到特鲁赫泽斯从翼侧发动的攻击,被迫向陶伯河畔柯尼希斯霍芬撤

退。农民总共有8 000人，拥有32门大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在丘陵和森林的掩护下悄悄逼近农民，命令几个纵队迂回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农民尽管以几个纵队的兵力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一直战斗到深夜，但结果还是被彻底击溃了。同以往一样，这一次“农民的死神”即联盟军队的骑兵也充当了消灭起义军队的主力，这支骑兵在农民遭到枪炮和梭镖的进攻而感到惊恐之后便猛冲过去，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杀死。特鲁赫泽斯究竟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的战争，曾参加农民军的300个柯尼希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就可作证。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被杀得只剩下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用这种办法镇压了奥登林山、内卡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的农民之后，便进行扫荡，并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从而平定了整个地区，然后就向维尔茨堡进发。他在中途获悉，由弗洛里安·盖尔和布尔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正驻扎在苏尔茨多夫附近，于是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攻。

弗洛里安·盖尔在猛攻弗劳恩贝格失利以后，主要致力于同各个诸侯和各个城市，特别是同罗滕堡城和安斯巴赫封疆伯爵卡齐米尔就加入农民兄弟会问题进行谈判，但柯尼希斯霍芬失败的消息突然打断了谈判。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同布尔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联合在一起。这支农军是新建立的。卡齐米尔封疆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即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借以控制其境内的农民起义。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的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设法把农民的仇恨主要转移到教会机构上去，并企图通过最终查抄这些机构来中饱私囊。同时他不断扩充军备，伺机而动。伯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

他立即对其境内的造反农民采取敌对行动,掠夺并焚毁了许多村庄,下令绞死和屠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地集结起来,在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指挥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在追击他的时候,从处境困难的奥登林山农民那里传来了求援的消息,农民立即向海丁斯费尔德进发,并从那里同弗洛里安·盖尔一起又开往维尔茨堡(6月2日)。在这里,他们一直得不到有关奥登林山农军的消息,就留下5 000人,而派4 000人尾随其他农军开去——其余的人则都散去了。他们听信了讹传的关于柯尼希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深感安全,不料就在苏尔茨多夫附近遭到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骑兵和雇佣兵照例屠杀农民,以致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集合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因戈尔施塔特村。200人占领了教堂和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队跟踪追击,一支1 200人的纵队攻占了该村,并放火烧毁了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统统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队在年久失修的城堡墙垣打开缺口,企图发起冲锋。但两次冲锋都被隐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了,普法尔茨军队轰倒了这第二堵墙,然后发起第三次冲锋,这一次终于得逞了。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同最后的200人一起逃出险境。但是,他的隐匿处第二天(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就被发现了;普法尔茨军队包围了他所隐匿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斩尽杀绝。在这两天之中,普法尔茨军队只俘虏了17人。弗洛里安·盖尔同很少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去投奔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当时又集结了7 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散去了。他还力图把离散在森林中的农民集结起来,可是在6月9日,他就在哈尔附近遭到了官军袭击,在战

斗中阵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柯尼希斯霍芬获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贝格的被围者,此刻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会已经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夜里就把该城连同驻扎在城内的5 000个农民包围起来,并于翌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了由市政会自行打开的各个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了武装,所有首领统统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把81人斩首。于是法兰克尼亚的形形色色的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堡,其中有维尔茨堡本地的主教<sup>①</sup>本人,有班贝格主教<sup>②</sup>,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封疆伯爵。这帮显贵分别承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贝格主教一起进军,这个主教立刻撕毁了他和他的农民缔结的协定,让联盟军队的兵痞在他的领地上恣意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卡齐米尔封疆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地。代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这个封疆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下令将18个造反者斩首,在马克特贝格尔下令将43个造反者斩首。他从那里开往罗滕堡,当时罗滕堡的名门已经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并逮捕了斯蒂凡·冯·门钦根。以前,罗滕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极其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以任何援助;他们生性狭隘自私,为了城市行会的利益,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只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才勉强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贡赋中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封疆伯爵下令将他们当中的16个人斩首,门钦根当然首当其

① 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②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冲。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的方式在他的管区进行扫荡，到处掠夺焚烧，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 256 个造反者，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将 13 个维尔茨堡市民斩首以庆祝大功告成。

在美因茨地区，当地总督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威廉没有遭到抵抗就恢复了该地区的平静。他只处决了 4 个人。莱茵高本来也发生过骚动，可是，大家早都各自回家了，而佛罗文·冯·胡登（乌尔里希的堂兄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 12 个谋反头目，于是莱茵高就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巨大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会的退让，后来则靠征集军队控制住了局势。在莱茵普法尔茨，在选帝侯毁约以后大约又有 8 000 个农民集结起来，再次烧毁寺院和城堡；但是，特里尔大主教<sup>①</sup>得到冯·哈伯恩元帅的支援，于 5 月 23 日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了农民。随着惨案不断发生（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 82 人被杀），随着魏森堡于 7 月 7 日被占领，这里的起义就最终结束了。

这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没有被征服：黑高-黑林山农军和阿尔高农军。斐迪南大公曾经利用这两支农军进行阴谋活动。就像卡齐米尔封疆伯爵以及其他诸侯企图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地产和诸侯领地一样，斐迪南大公也企图利用起义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权力。他曾经和阿尔高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和黑高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进行谈判，要求他们俩说服农民宣布站在奥地利一边；这两个首领虽然都是可收买的人，可是，他们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所能做到只不过是使阿尔高农军和斐迪南大公缔结停战协定，并对奥地利保持中立，仅此而已。

---

<sup>①</sup>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黑高农军在从符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封疆伯爵境内争取到了一些援军。5月13日他们向弗赖堡进军，18日开始轰击该城，23日该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进入城内。他们从这里开往施托卡赫和拉多尔夫采尔，并同两城守军进行小规模持久战，但并没有取得战果。这两个城市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市都根据魏恩加滕协定向湖军农民求援，而湖军中昔日的造反者竟有5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同盟者。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实在太严重了。只有600人拒绝战斗，他们想加入黑高农军，结果被杀害。然而，在也已经卖身投敌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策动下，黑高农军放弃了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散去了。农军的残部借助于希尔青根的狭窄而陡峭的山间小路以自卫，7月16日，他们在当地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若干城市出面为黑高农军斡旋而缔结了一项协定，然而该协定最终并不能使汉斯·弥勒幸免于难，他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但仍在劳芬堡被捕并被斩首。在布赖斯高，弗赖堡这时（7月17日）也背叛了与农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但由于诸侯军力单薄，也于9月18日在这里缔结了奥芬堡条约<sup>303</sup>，松德高也一同签署了该条约。黑林山的8路联军和克莱特高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这时为冯·苏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举行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林山农军被迫签订条约<sup>304</sup>，12月6日，上莱茵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了。

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阿尔高农军又向各寺院和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有力的报复。他们遭遇的官军为数不多，这种军队只能进行零星的小规模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农军。6月间，在一向恪守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的运动。这次运

动只是由于偶然碰上了几路能及时赶来支持名门的联盟军队,才被镇压了下去。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仑。农民奔往城郊,正想轰击城垣,这时他们获悉特鲁赫泽斯正从维尔茨堡朝他们逼近。7月27日,农民兵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上金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他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进逼。可是,士瓦本联盟却命令特鲁赫泽斯向农民进攻,只是不许纵火;然而特鲁赫泽斯非常精明,即使他能够驾驭那些一贯在博登湖到美因河一带逞凶肆虐的雇佣兵,他也决不会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与洛伊巴斯河为掩护设防,他们约有23 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用11 000人面对农民阵地布阵。两军阵地都很坚固。骑士在那样的地势下发挥不了作用。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都比农民强,而阿尔高农军却有大批作过战的士兵和有经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性能良好的火炮。7月19日,联盟军队开始连续炮击,20日,双方继续炮战,但不分胜负。21日,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3 000名雇佣兵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伦茨贝格认识农军中的许多军官,这些军官在远征意大利时曾经是他的部下。于是他就同他们取得联系,进行商谈。军事辅助手段无济于事,倒戈阴谋却奏效了。瓦尔特·巴赫和其他许多军官和炮手都被收买。他们竟让人将农民的全部库存弹药统统毁掉,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刚离开原来的坚固阵地,马上就陷入埋伏,这是特鲁赫泽斯在同巴赫和其他叛徒串通以后,为对付农军而预设的埋伏。农军的首领已经成为叛徒,这些人借口进行侦察而离开了队伍,并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就更加无法进行自卫了。两个农军纵队全被击溃,只有洛伊巴斯河

的克诺普夫率领的第三纵队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个纵队在肯普滕附近的科伦贝格山重整旗鼓，却遭到特鲁赫泽斯的包围。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了农军的补给线，并即下令放火焚烧周围大约 200 个村庄，企图以此来瓦解他们的斗志。农民们忍受着饥饿，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焚毁，终于被迫投降了（7 月 25 日）。有 20 多人立即被处死。洛伊巴斯河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中唯一不举降旗的领袖，他逃到了布雷根茨；但是在那里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 六

正当士瓦本地区的那些早期运动爆发的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从2月底或3月初开始定居于帝国直辖自由市米尔豪森,这里是他那一派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掌握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掀起风暴,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这里群情已经万分激昂;不仅流行的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而且还有被压迫农民物质生活的贫困,也都使邻近各邦——黑森、萨克森以及哈茨山区具备了总起义的条件。尤其是在米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的群众都已经被争取到闵采尔的激进路线一边,并且急切地期待凭借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去同不可一世的名门一较高低的时机赶快到来。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保持冷静;然而他的弟子、在米尔豪森领导运动的普法伊弗却已经动手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使闵采尔无法再延迟起义的地步。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米尔豪森就已经发生了革命。原有的城市贵族市政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市政会”手中,永久市政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sup>305</sup>。

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

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于他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必须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进行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一些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样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我们在最近还看到过这样的事例;只要回顾一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sup>306</sup>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的处境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们本身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在有了二月政府——姑且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政府<sup>10</sup>——的经验以后,谁还指望获得官方地位,那他必定是目光短浅到了极点,再不然就至多是口头上的激进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米尔豪森永久市政会首脑所处的地位,要比任

何一个现代革命执政者所处的地位面临更大的风险。不仅当时的运动,就连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纪也都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都不可能实现他自己刚刚开始隐约意识到的那些思想。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刚处于形成阶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远远没有具备征服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能力。他所幻想的那种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还缺乏基础,这些物质条件甚至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恰相反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必须恪守自己的一向宣讲的关于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的教义;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当时已经宣布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政府机构都应取消。可是,实际上米尔豪森仍然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仅仅拥有几分民主化的制度,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监督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社会就惊恐万状;而所谓推翻现社会,事实上仅限于进行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其目的就是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

闵采尔本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同他所直接面临的现实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的天才观点在他的大批拥护者的愚钝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条鸿沟就越明显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以前所未有的热忱投身于扩大和组织运动的工作;他向四面八方发出信件,派遣使节和密使。他在信件和传教中流露出一种革命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情绪甚至同他本人的早期著作相比也令人震惊。闵采尔在革命前所写的小册子中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幽默情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那种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再也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先知;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狂放不羁的热情,所用的完全是旧约中的先知表达宗教狂热和民族狂

热的那种激烈的语调。从闵采尔这时努力追求的文风就可以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

米尔豪森的示范作用和闵采尔的宣传鼓动很快传到了远方。在图林根，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山，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和富尔达，在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烧毁城堡和寺院。闵采尔多少都被承认是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米尔豪森仍然是运动的中心。这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粹市民阶级的运动获得了胜利，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一派一直对农民采取暧昧的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面对农民一开始也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就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况一样。直到4月的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一支军队——这个邦伯就是菲利浦，新教和资产阶级有关宗教改革的史籍对他的虔诚盛加赞扬，而我们却要在这里对他反对农民的无耻行径略赘数语。菲利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很快就平定了他的绝大部分领地，然后招募新兵，侵入直到当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达修道院长<sup>①</sup>的领地。5月3日，他在弗劳恩贝格击败了富尔达的农军，平定了全境，并乘机不仅脱离了修道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达修道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他是准备日后再把这些教会领地变为世俗领地。然后他就攻下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察，并同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攻起义大本营米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大约8 000人的军队，并配备了一些大炮。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部分农军在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装备很差，纪律松弛，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级领导

<sup>①</sup> 约·亨讷贝格。——编者注

人都非常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尽管如此，诸侯还是认为在这里适于采取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胜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但后来却在停战期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他的人马驻扎在今天仍称为战斗山的阵地上，以车垒<sup>307</sup>为掩护。农军士气日益低落。诸侯许下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并且把他献出来，就可以得到宽赦。闵采尔让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并让大家讨论诸侯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教士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喝令把他们俩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果断有力的威慑行动受到了坚定的革命者的欢呼，农军又略为稳住了阵脚；但是，如果后来不是有人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定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绝大部分农军最后还是会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垒后面迅速摆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经向自卫能力丧失殆半而又不习惯于作战的农民飞来，雇佣兵已经冲到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垒防线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整个队伍都被击溃了。他们四散奔逃，溃不成军，结果就更容易落入包抄过来的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农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渠。8 000个农民中有5 000多人被杀；剩余的农军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同时进了城。该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米尔豪森也宣布投降；一直留守该城的普法伊弗逃脱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捕。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遭到严刑拷问，然后被斩首。他毕生英勇果敢，在走向刑场时，依然充满大无畏的精神。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弗也被斩首，此外还有无数人也遭此难。在富尔达，那位上帝的虔诚信徒黑森的非利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

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 24 人，在朗根萨尔察杀死 41 人，在弗兰肯豪森战斗以后杀死 300 人，在米尔豪森杀死 100 多人，在格马尔附近杀死 26 人，在廷格达附近杀死 50 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 12 人，在莱比锡杀死 8 人，至于被打成残废的，受刑较轻的，以及城市村庄被洗劫被焚毁的事，就更不在话下了。

米尔豪森不得不放弃帝国直辖自由市的权利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达的修道院辖区被并入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率军穿过图林根林山，这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这里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烧毁了许多城堡。诸侯军队同农民会战于迈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向城中撤退。迈宁根城突然关闭城门，并威胁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同盟者倒戈而陷入困境，只好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溃散了。比尔德豪森营寨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和上法兰克尼亚的起义者最后的残部就被消灭了。

阿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管区的农民临近 4 月中才开始起义，他们奋起之后，上阿尔萨斯和松德高农民就跟着起来。4 月 18 日，一支下阿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托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埃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尔比斯河谷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结在一起，组成了下阿尔萨斯农民大军，并筹划攻占城市和村镇、捣毁寺院。各地都要求每三个男人就要征召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比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条款要激进得多<sup>308</sup>。

下阿尔萨斯农军的一个纵队人马于 5 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该城而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在各地市民的赞同下，于 5 月 10 日占领了贝格海姆，13 日占领了拉波茨韦勒，14 日占领了赖兴

魏尔。在此期间，第二纵队人马由埃拉斯穆斯·格尔伯率领踏上征途，试图袭击斯特拉斯堡，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个纵队就向孚日山脉进发，捣毁了毛尔斯明斯特寺院并围攻察伯恩，该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与边境毗连的这一部分公爵领地上发动起义，同时还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农军在萨尔河畔埃比泽姆附近和诺伊堡附近都建立了庞大的营寨；在萨尔格明德附近有4 000个洛林德国农民构筑了防线；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 and 右翼，一支是孚日山脉的科尔本农军在斯蒂泽尔布罗恩附近，一支是克莱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阿尔萨斯农军的驻地。

上阿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相继于5月10日迫使苏尔茨，12日迫使盖布韦勒，15日迫使森海姆和附近地区同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由于力量太弱，不能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用说进攻他们了。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以外，整个阿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

但是，这时官军已经逼近，准备镇压无法无天的阿尔萨斯农民。这些官军是法国人，他们在这里复辟了贵族统治。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0 000人的队伍出发了，这支队伍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埃蒙特、伦巴第、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军。5月16日，安东公爵在卢普施泰因附近同4 000名农民遭遇，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农民打败了，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察伯恩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毫无防备的农民遭到了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阿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

阿尔萨斯农军进攻。上阿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察伯恩支援下阿尔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韦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的全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由于敌人拥有极大的优势——30 000人对7 000人,由于一部分骑士、特别是赖兴魏尔城的总督投敌叛变,所以他们虽然拼死抵抗,但仍归无效。上阿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惯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阿尔萨斯全境。只有松德高未蒙公爵光顾。奥地利政府于是扬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胁迫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了恩西斯海姆协定。但是过了不久,奥地利政府就撕毁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鼓吹者和领袖成批绞死。农民于是再次举行起义,这次起义一直到松德高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下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战争还需要加以介绍。自从恢复旧权利运动以来,这一地带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管区始终都在反对政府和贵族,这里也是广泛传播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的支持下,从1522年以来就因该城的城市特权和宗教事务而同大主教<sup>①</sup>发生争执。1524年底,大主教命令招募来的雇佣兵袭击这座城市,用城堡上的大炮进行威胁,并迫害异教的传教士。同时,他还征收新的苛捐杂税,从而激起了全城居民的极大愤慨。1525年春,就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爆发的时候,整个萨尔茨堡地区的农民和矿工也突然举行起义,组成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的农军,解放了这座城市,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同德国西部农民一样结成基督教同盟,并且把

<sup>①</sup> 马·朗格。——编者注



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这里的条款有十四条。

在施泰尔马克、上奥地利、克恩滕和克赖因，新的非法的赋税、关税和规定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农民于 1525 年春举行起义。他们占领了一些城堡，并且在哥伊斯附近打败了曾经镇压过恢复旧权利运动的老将——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采取欺骗手法招抚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多数人仍然保持团结，并同萨尔茨堡农民实现了联合，这样一来，农民和矿工就控制了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和克赖因的绝大部分区域。

在蒂罗尔，改革的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曾在这里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为明显。斐迪南大公在这一地区也迫害新教义的传教士，并且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同其他各地一样，这里也在 1525 年春爆发了起义。起义者的最高首领盖斯迈尔是闵采尔派，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起义者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对僧侣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尤其在南部，在埃奇河地区更是如此。福拉尔贝格农民也举行了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高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了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者作出让步，可是在不久以前，他还企图用烧杀掳掠的手段消灭这些造反者。他召集了各世袭领地的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同农民缔结了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集结力量，以求尽快地用另一套语言去教训这些无法无天的人。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实施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由于耗尽了钱财，便开始在公爵领地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扎尔族部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泰尔马克人民再次举行

起义,在7月2—3日的夜间,他们在施拉德明袭击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晨,农民组成陪审法庭,把俘虏中的40个捷克贵族和克罗地亚贵族判处死刑。这些贵族立即被斩首。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五个公爵领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克赖因)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蒂罗尔,议会的要求也得到批准,因而北部就被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仍然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直到12月,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地处决了一大批落到他手中的暴动策划者和领袖。

8月,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10 000名巴伐利亚士兵向萨尔茨堡开来。由于这支强大军队的到来,加上农民之间出现了纷争,这就促使萨尔茨堡起义者同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大公也对此表示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增补了足够的兵力以后,便立即撕毁协定,因而迫使萨尔茨堡农民再次举行起义。起义农民坚持了一个冬天;春天,盖斯迈尔来到他们这里,并对从各方面迫近的官军展开了辉煌的战斗。在1526年5—6月间,他在一系列出色的战役中先后打败了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佣兵,并且阻击了各路敌军,使之久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了围攻拉德施塔特的机会。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团团围住而被迫退却,他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穿过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的密谋活动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个国家卷入对奥战争,如果成功了,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是在洽谈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

---

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就不得安枕。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于 1527 年杀害了这位危险的造反者。<sup>①</sup>

---

<sup>①</sup> 盖斯迈尔于 1532 年 4 月 15 日被杀害。——编者注

##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境内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再度遭受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各地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农民承受的负担比以前更加沉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屈辱的失败而告终,而且一时还受到加倍的压迫。然而从长远来看,农民阶级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起义遭到镇压而更加恶化。凡是贵族、诸侯和僧侣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的东西,他们在战前就已经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同现代无产者是一样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了产,大批依附农则被迫去充当农奴,公社的整片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由于社会动荡而被迫流浪,或成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破坏是那个时代习以为常的现象,而且一般说来,农民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到极点,以致不可能通过增加赋税而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下去。接踵而来的历次宗教战争,以及最终爆发的那场一再造成巨大破坏和人口锐减的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的深重程度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

战争，毁灭了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生产力，同时又摧毁了许多城市，从而使农民、平民和破产市民长期陷入一贫如洗的苦难深渊。

遭受农民战争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走，不是卖给外国，就是入炉熔化了，他们贮存的物资都耗尽了。他们在各地的抵抗力最薄弱，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完全集中在他们身上。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看高级教士陷入窘境成了众矢之的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普遍推广了使教产世俗化以利农民的做法，而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世俗化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的方式去进行，在新教各邦中，高级教士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名门手中。甚至连僧侣诸侯的权势也已受到侵犯，世俗诸侯则很善于从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例如，我们看到，富尔达修道院长<sup>①</sup>是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又如，肯普滕城竟强迫拥有诸侯封号的修道院长<sup>②</sup>把他在该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该城。

贵族也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一些极其显赫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为诸侯效劳来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疑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重要地位而处于诸侯的统治之下。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名门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得到巩固；市民阶级反对派很久都不能复原。城市贵族旧时的陈规惯例一直沿袭到法国革命时期，使工商业在各个

---

① 约·亨纳贝格。——编者注

② 塞·冯·布赖滕施泰因。——编者注

方面都受到了束缚。诸侯们认为,市民派或平民派在斗争期间只是靠了城市才得势于一时,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一些原先就隶属于诸侯领地的城市(例如弗兰肯豪森、阿恩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遭到了残酷的敲诈勒索,这些城市的特权被剥夺,面对贪婪专横的诸侯,只能任其摆布;另一些帝国直辖市(例如米尔豪森)则被并入诸侯领地,或者像法兰克尼亚的许多帝国直辖市那样,至少由毗邻的诸侯兼管。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从农民战争的结局中捞到好处的是诸侯。本文一开头就已经谈到,德国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不高,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通过集权构成一个国家,这种发展状况只能造成局部的和省区的集权,因而在分裂状态下代表这种局部和省区的集权势力的诸侯,便成了从现存社会政治关系的每一次变动中都必然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如此低下,同时各省区的发展水平又是如此参差不齐,致使在世俗诸侯领地之外,还有行使主权的僧侣管区、城市共和国以及拥有主权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并存;但是这种发展尽管十分迟缓无力,却不断地推动省区的集权,也就是说,它迫使其余的帝国等级屈从于诸侯的统治。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才能从中得利。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和城市这些竞争者被削弱而得到相对的好处,他们还从其他所有等级那里夺走了 *spolia opima* [主要战利品],从而得到绝对的好处。教会财产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变成了世俗财产;一部分接近破落或完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屈服于他们的统治;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来的金钱都源源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城市特权,他们在财政措施上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德国分裂割据状态的加剧和巩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德国当时处于怎样的分裂割据状态,它不仅分成无数独立的、彼此毫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国家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都分裂为多层次的等级和等级集团。除了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所有这些等级的利益即使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最后是怎样缓慢地、勉强地、因地制宜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却还是违背现存条件给国家发展所规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开展自己的运动,因而不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最后势必遭到失败。济金根起义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整个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也没有采取共同行动,而是互相掣肘。我们也已经看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零散,因而使革命运动遭到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区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断送了整个运动;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和平民都没有采取过集中的全国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在每个省区都各行其是,从来不愿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相继被官军歼灭,而官军人数往往不到起义者总数的十分之一——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阐述中看得一清二楚。某些农军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无异于对共同事业的背叛,而唯一能使各路农军实现联合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而在于使

他们吃了败仗的各种各样的敌人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这种情形最鲜明地说明了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心的毛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里,又很自然地可以同 1848—1850 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在 1848 年,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也互相冲突,每一个阶级都自行其是。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无法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阶级的要求服从它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它在专制制度下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而且总的说来,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绝不会再把资产阶级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国的多数群众,即小资产者、小资产者的同伴(即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所抛弃,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过于革命;在某些地方,他们又被无产阶级所抛弃,因为无产阶级认为他们不够先进;而他们自己中间也存在分歧,所以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 年在农民中表现出来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 1848 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所表现的地方狭隘性更严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发生的成百次横行无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 1525 年和 1848 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想入非非地谈论什么联邦共和国,那么他就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入疯人院。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 16 世纪的革命和 1848—1850 年的革命,尽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显的本质的区别。1848 年的革命即使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却也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 1525 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 诸侯。从 1848 年的革



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 1525 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 1850 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

1525 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德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而欧洲四分五裂的状况就更为严重。1848 年的革命并不是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 1848 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甚至也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狭窄范围之内。可以说，曾经作为此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没有意识、没有意志的原料，将在目前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进程中受到改造。这场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归根结底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1848—1850 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 1525 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的声明<sup>309</sup>

大磨坊街协会<sup>32</sup>星期二例会主席：  
我等决定退出协会，特此声明。

亨·鲍威尔 卡·普芬德  
约·格·埃卡留斯 塞·载勒尔 卡·马克思  
康·施拉姆 弗·恩格斯 斐·沃尔弗  
威·李卜克内西 海恩·豪普特  
格·克洛泽

1850年9月17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9月17日

第一次发表于《对彼·格·勒泽  
尔、约·亨·毕尔格尔斯和彼·  
约·诺特荣克等人的起诉书》第  
28页(1852年科隆)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转载《共产党宣言》  
第三章加的附注<sup>310</sup>

我们在此摘录发表二月革命<sup>4</sup>以前出版的、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编辑部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10月

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约·格·埃卡留斯的

《伦敦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  
斗争》一文的编者按语<sup>311</sup>

编者按:

本文的作者是伦敦一家缝纫店的工人。请问德国资产者,他们有多少能够如此抓住现实运动的著作家呢?

无产阶级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智力上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

读者可以看到,在这里用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运动的,已经不是魏特林和其他从事写作的工人用来反对现状的那种温情道德的和心理上的批判,而是纯唯物主义的、更加自由的、不受任何情感波动影响的见解。主要是在德国,很大程度上也在法国,手工业者总是力图使自己的半中世纪的处境不致衰败下去,渴望作为手工业者联合起来,而在英国,手工业屈从于大工业被看成是一种进步而受到欢迎,同时在大工业的成果和产物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并且发现了历史

---

本身所产生的、每天新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0年10月

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

\*《时评。1850年5—10月》一文中  
有关德国的草稿<sup>312</sup>

(1)俄国的绝对优势显而易见。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分割霸权。它们的争夺使各小邦至少在形式上重新得到巩固。然而,在多数德国人看来,小邦(例如,黑森<sup>313</sup>、巴登)的君主蒙受了屈辱,于是1848年还非常强烈要求重视种族城镇差别的企望也受到打击。由于1848年运动的结果,一切现存的官方权力的威信都一落千丈了。

(2)普鲁士。资产阶级得到了一切,甚至比1847年敢于要求的还多,虽然它被赶出了政府,受到屈辱,只得到虚假的宪法<sup>151</sup>。

(3)奥地利。至今农民阶级一直受到优待,农民获得革命的果实。保护税制。<sup>314</sup>

(4)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分歧。自由贸易派<sup>108</sup>;在普鲁士是贵族,在英国是工业资产阶级。

卡·马克思写于1850年10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翻译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时评。1850年5—10月<sup>315</sup>

近六个月的运动同紧接六个月前的运动有本质的不同。革命政党到处被挤出政治舞台，胜利者们互相争夺胜利果实。在法国，是各派资产阶级在争夺，在德国，是各邦君主在争夺。争吵非常激烈，公开的决裂和以武力解决争端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不动干戈，并且为了以后重新开始准备虚张声势的战争而一再用和平协议来掩饰无法作出决断的状况，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这种表面风波借以造成的**实际基础**。

1843—1845年是工商业繁荣的几年，这个时期的繁荣是1837—1842年几乎连年工业萧条的必然结果。像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一般地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给生产过剩提供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度。危机本身首先爆发在投机领域中，后来才波及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只不过是作为生产过剩征兆的过份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生产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只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由于我们眼下无法全面叙述1843—1845年时期的历史，所以只指出生产过剩的一些最为显著的征兆。

1843—1845年繁荣时期的投机活动，主要是在铁路方面，这里投机所依靠的是实际需要，由于1845年的物价上涨和马铃薯病害而造成谷物投机，1846年棉花歉收后造成棉花投机，随着英国打开中国市场而来的投机造成对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投机。

英国铁路系统的发展早在1844年就已经开始，不过只是在1845年才全面展开。在这一年里，登记成立铁路公司的申请书竟达1 035份之多。1846年2月，在无数申请注册的设计方案中途撤出之后，由于设计方案批准生效而应当向政府缴纳的款项仍达1 400万英镑之巨；而在1847年，英国这一项收入的总额已达4 200万英镑以上，其中英国本土铁路占3 600万英镑，国外铁路占550万英镑。铁路投机的繁荣时期是1845年夏秋两季。当时股票价格不断上扬，投机者的利润很快把居民中的各个阶级都卷入了这个漩涡。公爵和伯爵跟商人和厂主争相参加有利可图的各铁路线的董事会。下院议员、法官和神父也广泛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使只有一点点储蓄的人，即使只能弄到一点点贷款的人，都干起了铁路股票的投机。铁路报纸从三家变成了二十多家。一些大的日报常常在一周之内就能收入14 000英镑的铁路广告费。工程师很缺，因此他们的薪水很高。承制广告、设计图和地图等的印刷商、石印商、装订商和纸张商等和为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许多新的董事会和临时委员会等的办公室承制家具的家具商都赚了大笔的钱。由于英国和大陆的铁路系统确实有了发展并且因此而产生了投机，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像约翰·罗<sup>316</sup>和南海公司<sup>317</sup>时期那样的投机取巧的风气。上百条线路的设计毫无实现的希望，其实设计者本人也根本不想真正实现这些设计，而只不过是为了让经理能挥霍寄存代付金和从出卖股票中获取利润。

1845年10月发生了剧变,很快就演变成全面的恐慌。早在1846年2月以前(当时必须向政府交付寄存代付金),最不现实的设计就已经破了产。1846年4月,这种反弹已经影响到大陆的股票市场。在巴黎、汉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都发生了按极低价格强制销售股票的现象,结果使得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破了产。铁路危机一直继续到1848年秋天,而危机所以拖得这么久,是由于比较可靠的设计逐渐地受到普遍紧缩的影响和受到提款的要求也相继破产;另外由于在投机的其他领域中,如工商业中,也爆发了危机,致使铁路危机更加尖锐了,这就使得比较老的可靠的股票逐渐跌价,直到1848年10月跌到了最低谷。

1845年8月,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而且发生在大陆上的马铃薯病害,首先引起了舆论的注意——这是现存社会的根基腐烂的最初征兆。同时还传来消息,肯定证明了预料中的谷物歉收。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市场上谷物价格猛烈上涨。在爱尔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贷给这个地区800万英镑,恰好每个爱尔兰人一英镑。在因为遭到损失达400万英镑的水灾而更加贫困的法国,歉收情况空前严重。在荷兰和比利时歉收情况也很严重。继1845年歉收之后,1846年发生了更严重的歉收,马铃薯又一次遭受了病害,虽然受灾地区并不广泛。这就为异常猖狂的谷物投机打下了完全现实的基础,而1842—1844年的丰收几乎使这种投机长期无法开展。1845—1847年,英国输入的谷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谷物价格一直上涨到1847年春天,当时从各国传来了关于新收获的有时好的有时坏的消息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放港口自由输入谷物等),因而出现了一个波动时期;最后,到1847年5月,谷物价格达到了最高点。在这一个月里,

英国每夸特<sup>①</sup>小麦的平均价格上涨到102.5先令,而有几天竟达到115和124先令。但是,很快就得到了关于气候和地里谷物确实良好的消息,于是价格下跌了,7月中旬平均价格只不过是74先令。在8月中旬最后肯定1847年的收成超过平均水平之前,由于若干地区的气候不佳,价格又有些回升。此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价格下跌。英国输入的增多完全出乎预料。9月18日平均价格已经跌到49.5先令。这就是说,在16个星期当中,平均价格的波动幅度是53先令。

在整个这一期间,不仅铁路危机持续不断,而且恰恰在1847年4月和5月谷物价格最高的时候,信用系统也完全受到破坏,金融市场也完全瓦解。尽管如此,谷物投机商在8月2日以前还是顶住了价格的下跌。在8月2日这一天,国家银行把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而把所有两个月以上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6%。紧接着,谷物交易所里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破产,其中最重大的是英格兰银行经理鲁宾逊先生的破产。仅伦敦一地,就有八家大谷物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总计达150万英镑以上。地方的谷物市场完全瘫痪,这时,特别是在利物浦,破产也同样迅速地接踵而来。大陆上也发生了相应的破产现象,发生的迟早,依距离伦敦的远近而有所不同。从谷物价格最低的9月18日起,英国的谷物危机才算是过去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商业危机本身,谈一谈货币危机。1847年前四个月,工商业的整个情况看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不过炼铁业和棉纺织业则是例外。1845年的铁路热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炼铁业,由于生铁生产过多,销售量缩减,自然也就遇到困难。在为东印度和中国

<sup>①</sup> 1夸特等于1.137升。——编者注

市场生产的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早在1845年为这些市场生产的商品就已经过剩,因而很快就出现了某些下降。1846年棉花的歉收,原料和成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造成的消费量的减少,更加重了对这个工业部门的压力。1847年头几个月,在整个兰开夏郡生产大为缩减,棉纺织业的工人已经遭到危机的打击。

1847年4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最短期的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它甚至不顾开期票的公司的性质,而限制应当贴现的期票的总额;最后,它向获得贷款的商人断然宣布,贷款期限一满,就应归还,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续贷。过了两天,它所公布的每周结算表表明,银行部的准备金已经下降到250万英镑。所以银行采取了上述措施来阻止黄金流出它的地下室,重新增加现金储备。

黄金和白银从银行外流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第一,消费和几乎所有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需要大量流通货币,特别是黄金和白银,以便进行零售交易。第二,铁路建设方面不断投资,仅4月一个月投资额就达4 314 000英镑,这必然要从该行提取大量存款。建设国外铁路的一部分资金直接流到了国外。食糖、咖啡及其他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这些商品的消费特别是它们的价格由于投机更加上升,歉收的信息引起棉花抢购因而使棉花输入过多,特别是谷物再度歉收引起谷物输入过多,这一切多半都要求支付现金或金银锭,这也使得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出国外。尽管该行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是贵金属流出英国的现象一直继续到8月底。

英格兰银行的规定和关于它的准备金很少的消息,立即造成金融市场的紧缩,在整个英国商界引起很大恐慌,其强烈程度,只有1845年的恐慌才能与之相比。在4月的最后几周和5月的前四天,几乎所有的信用交易都陷于停顿。但是,并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破

产。商业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支付了高额利息和被强制按近乎破产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存货和公债券等等。一些即使资本比较雄厚的公司虽说在最初的危机中得救了,这也无非是给它们以后的破产打下基础而已。人们面临的第一个危险已被克服,这个事实大大有助于信心的增强;从5月5日起,金融市场的紧缩开始有了明显的缓和,到5月末,惊慌几乎已经过去。

然而过了几个月,到8月初,在谷物贸易中的上述破产开始了,一直继续到9月;破产还没有结束,危机便在所有商业部门,特别是在与东印度、西印度和毛里求斯有来往的商业部门中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而且,是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同时爆发。在9月,仅伦敦一地,就有20家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总额达900万至1000万英镑。

“我们当时经历了英国商业王朝的覆灭,这种覆灭令人惊讶的程度并不亚于我们近来时有所闻的大陆各政治公司的倒闭。”

这番话是迪斯累里于1848年8月30日在下院说的。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的破产一直继续到年底,而在1848年前几个月,当开始传来关于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和毛里求斯的有关公司破产的消息时,又重新发生了。

产生这种商业史上罕见的大量破产的原因是,普遍的过分的投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长期以来人为地维持高昂价格的这些商品,还在1847年4月的恐慌之前就已经开始部分地跌价了;但是全面价格猛跌只是在本次恐慌以后,在整个信用系统已经瓦解,各公司不得不相继赶紧大量抛售的时候。特别是从6、7月到11月发生了空前的价格暴跌,以致那些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

公司也遭到破产。

在9月,破产的还只是**纯商业性的公司**。10月1日,英格兰银行把短期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5%,同时宣布今后不再发放以任何公债券作抵押的贷款。这时无论**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家**都已经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利物浦皇家银行”、“利物浦银行公司”、“南北威尔士银行”、“纽卡斯尔联合股份银行”等等在几天之内就相继倒台。同时,英国各地的许多比较小的私人银行家也宣告破产。

随着这种作为10月份特色的银行普遍停止支付,利物浦、曼彻斯特、奥尔德姆、哈利法克斯、格拉斯哥等地的从事有价证券、期票和股票交易的交易所经纪人,航运、茶叶和棉纺织品交易方面的经纪人,铁厂厂主,铁商,棉纺厂、毛纺厂、印花布厂的厂主大批破产。据图克先生说,这次破产不论就其数量和资本总额来说,在英国商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了1825年危机时期的破产。<sup>318</sup>10月23日至25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所有商业活动都完全停顿下来。于是西蒂的一个代表团经过努力达到了废除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发明的成果,即1844年的银行法令<sup>319</sup>的目的。这样就立即结束了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具有各自的现金储备的局面。如果旧制度再继续存在几天,两个部中的一个部即银行部,必然会在发行部积存了600万镑黄金的时候遭到破产。

还在10月份,危机就开始影响到**大陆**。在布鲁塞尔、汉堡、不来梅、埃尔伯费尔德、热那亚、里窝那、库特赖、圣彼得堡、里斯本和威尼斯,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破产。当危机的强度在英国逐渐削弱的时候,它在大陆上却加强了,并且蔓延到至今没有触及的地方。在情况最坏的时期,期票行情对英国是有利的,因此,它从11月起不仅从俄国和大陆,而且从美国越来越多地吸收了黄金和白银。由此而产生的

直接结果就是,随着英国金融市场的渐趋活跃,在其他商业世界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了紧缩,从而在这些地方也普遍发生了危机。于是英国境外的破产户在11月有所增加;这时在纽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阿弗尔、巴约讷、安特卫普、蒙斯、的里雅斯特、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也发生了大规模破产。12月,马赛和阿尔及尔也爆发了危机,在德国则危机再度加剧。

现在我们就谈到爆发法国二月革命<sup>4</sup>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看一看戴·莫·伊文思在他著的《1847—1848年商业危机》(1848年伦敦版)一书中所附的破产户统计表,我们就会发现,英国没有一个大公司由于这次革命而破产。由此而遭到破产的,只是一些证券投机商,这是因为所有大陆的公债券都突然贬了值。像这样的证券投机商破产,当然也发生在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英国统一公债下跌6%,而在七月革命以后只下跌了3%。可见,对交易所经纪人来说,二月共和国只比七月王朝危险一倍。

二月事件后笼罩着巴黎并与革命同时波及整个大陆的恐慌,在其发展过程中同1847年4月伦敦发生的恐慌有许多共同之处。信用活动突然停顿,交易活动也几乎完全中止;在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所有的人都涌向银行,把纸币兑换成黄金。然而一般说来,在证券交易领域以外,破产的情况还是很少的,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破产事件也未必能够认为是二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巴黎银行家停止支付(大多只是暂时的)一方面与有价证券交易有关,另一方面不过是预防性的措施,而决不是因为真的没有支付能力;再者纯粹是为了刁难临时政府,给它找麻烦,迫使它让步。至于大陆其他地区银行家和商人的破产,很难断定在多大程度上这次破产是继续不断和逐渐蔓延的商业危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早已摇摇欲坠的公司



为了寻找有利的出路利用了当时的情况,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这次破产确是由于革命引起恐慌而造成损失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商业危机对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对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3月到5月这段时间,英国已经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工商业部门情况都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大陆革命对英国工商业振兴的阻碍是多么小,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英国棉花加工量从47 500万磅(1847年)增加到71 300万磅(1848年)。

在英国,这次新的繁荣时期在1848、1849和1850三年当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1月到8月的八个月中,英国的输出总额,1848年为31 633 214英镑,1849年为39 203 322英镑,1850年为43 851 568英镑。除了工商业部门(炼铁业除外)中所呈现的这种巨大高涨,这三年当中各地农业也都获得了丰收。1848—1850年,英国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跌到36先令,在法国跌到32先令。在这次繁荣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机的三条主要途径被堵死了。铁路建设的速度已降到一般工业部门的缓慢水平;谷物由于连年丰收没有给投机留有余地;公债券由于革命而丧失了稳定性,没有这种稳定性,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有价证券投机活动。在历次繁荣时期,资本总会增加。一方面,扩大了的生产提供新的资本,另一方面,危机时期闲置的现有资本会脱离闲置状态而投入市场。这种追加资本在1848—1850年由于投机无路不得不直接投入工业,这样就更加速了生产的增加。这种现象虽然还没有人能够说明,但是在英国是多么惹人注目,下面1850年10月19日的《经济学家》杂志的天真议论可以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繁荣时期与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根本不同。在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任何一种毫无基础的投机都会激起种种无法实现的希望。时而开采国外矿山，时而建设数目超过半个世纪的铁路。即使这类投机有了牢靠的基础，所指望的收入也常常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得到，不论收入是来自金属生产还是来自新交通线的建设和市场的开辟都是如此。这样的投机是不会马上见利的。但是，目前我们繁荣的基础是生产直接有用的物品，这些物品一到市场，几乎立刻就会进入消费领域，给生产者带来相当可观的利润，促使他们去增加生产。”

说明 1848 和 1849 年工业大量增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主要工业部门——棉花加工业。1849 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达 275 万包，大约相当于 12 亿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跟输入的增加是同步的，因而 1849 年底的储存甚至比以前歉收年以后的还要少。1849 年，加工成纱的棉花达 77 500 万磅以上，而在以往最繁荣的一年 1845 年，也只不过加工了 72 100 万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棉花价格由于 1850 年稍微减产而暴涨（55%）。在纺织业的所有其他部门，如丝织品、毛织品、混合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中也显示出至少同样的进展。这些工业部门的产品输出，特别是在 1850 年，大有增加，虽然 1850 年棉纺织品的输出由于棉花歉收而大大减少，而该年的输出总额则增加了很多（比 1848 年增加 1 200 万，前八个月比 1849 年同期增加 400 万）。尽管羊毛价格暴涨（看来暴涨在 1849 年就已经由投机造成，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但是羊毛加工业仍在不断扩大，每天都有新纺织机投入生产。麻织品的输出，在以往麻织品输出量的最高一年 1844 年，为 9 100 万码，价值为 280 万磅，而在 1849 年却达到 10 700 万码，价值 300 万磅以上。

英国工业增长的另一证明，是主要的殖民地商品，特别是咖啡、

糖和茶叶的消费量不断增长,虽然这些商品,至少是前两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消费如此增长直接依赖于工业的扩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大规模铁路建设从1845年起所建立起来的容量极大的市场早已缩小到平常的规模,近几年来谷物价格的下跌也不能使农业区的消费量有所增加。

由于1849年棉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在同年最后几个月曾再次尝试把商品运到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但是这些地区还没有卖出去的大批存货使这种尝试很快就破产了。这时,由于原料和殖民地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产生了对这些物品进行投机的尝试,但是由于供应突然增加和1847年的创伤还记忆犹新,这个尝试也很快就被遏制住了。

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在1849年,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就以令人赞赏的冷静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个博览会,就是要把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召集到一起,来一次重大的考核,让他们在这次考核中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万能的俄国沙皇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臣下多派些人参加这次重大的考核。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雷根茨和華沙的君主会议<sup>320</sup>,不论是形形色色的在异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集中起来的力量的意义,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

在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博览会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这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出来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sup>①</sup>,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众神供奉在这里。这样一来它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无比盛大的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面临垮台的时候,这次垮台将比以往更加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已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导游者出现。

正像1845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一样,从今年年初起棉花歉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恐慌。当1851年棉花产量决不会比1850年超出很多已成定局之后,这种恐慌就更加厉害了。棉花歉收在以前的时期无足轻重,而在目前棉纺织业正在扩大的情况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已经开始严重地阻碍了棉纺织业的活动。资产阶级刚刚忘却,它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是马铃薯遭到危险这个令人沮丧的发现,而一恢复常态,现在又看到它的第二个基础棉花也遭到同样的危险。如果说,有一年棉花稍微减产,预计第二年也会如此减产,这就能够在欢庆繁荣的时刻引起严重的不安,那么今后棉花真正连年歉收,势必会把整个文明社会一时间抛进野蛮状态。黄金和黑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19世纪以其拥有的科学、世界市场和巨大的生

---

① 供一切神的寺庙,公元二世纪建于罗马。——编者注

产力注定会开创**棉花的时代**。同时,英国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掌握着迄今尚未被打破的对棉花生产的垄断的美国,对于它具有多么大的控制力。所以,它立即不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垄断。不仅在东印度,而且在纳塔尔和澳洲北部,甚至在世界上一切气候和条件允许种植棉花的地方,都要千方百计地鼓励种植棉花。同时,同情黑人的英国资产阶级发现,“曼彻斯特的繁荣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待得克萨斯州、亚拉巴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可怕的事实”(1850年9月21日《经济学家》)。英国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基础是北美联邦的南部诸州所存在的奴隶制度,这些地区的黑奴起义会破坏整个现代生产体系——这对不久前为了解放自己殖民地的黑奴而拨出2 000万英镑的那些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极其令人沮丧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会促使奴隶制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再一次成了美国国会长期激烈争论的主题)得到唯一可能的、现实的解决。美国棉花生产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要工业一发展到无法再忍受合众国对棉花的垄断的地步,其他国家的棉花生产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而且这种发展现在几乎到处都只能靠**自由工人**的劳动来实现。一旦其他国家的自由劳动能够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棉花,而且价格比美国的奴隶劳动提供的便宜,那时美国的奴隶制就会跟美国的棉花垄断一起结束,奴隶也会获得解放,因为他们当奴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同样的,一旦欧洲的雇佣劳动不再是生产的必要形式,而甚至成为生产的障碍,那时它也将会被消灭。

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像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作为历次危机之前因生产过剩而产生的难以控制的投机即将来临的征兆,我们在

这里提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两年来一直没有超过3%。如果英格兰银行在繁荣的年月里使利率维持低的水平,那么其他金融商人就只好把利率压得更低,正像英格兰银行在危机的年月里把利率提得很高,而其他金融商人只好把利率提得更高一样。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在繁荣时期追加资本会不断投入信贷资本市场,依照竞争的规律,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使利率大大降低,而随着普遍的繁荣逐渐扩大的信用则会使利率降到更低的水平,因为它减少了对资本的需求。政府在这样的时期有可能降低它的有担保债务的利率,而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按较为有利的条件恢复自己的抵押贷款。这样,当所有其他各种资本家的收入都在增加的时候,信贷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家的收入却减少了 $\frac{1}{3}$ ,或者甚至更多。这种状况持续得越久,他们就越不得不拚命地为资本寻找更有利的出路。生产过剩使得大批新项目产生,其中只要有一些项目得到实现就足以使大量资本投入这一方面,直到投机逐渐具有普遍性。但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只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是棉花的种植,一是加利福尼亚和澳洲的发展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上的新联系。我们看到,投机活动的范围这一次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繁荣时期都广阔得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农业区的情况。那里的普遍的紧缩由于谷物税的废除和与此同时的丰收已成为持续性的了,不过这种情况由于繁荣时期消费量的剧增而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谷物价格低廉的情况下,至少农业工人的处境总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这种有利程度在英国要比在那些地产分成小块的国家差一些。在这种条件下,保护关税派争取恢复谷物税的宣传还在农业区里继续进行,虽然宣传比以前更低沉更隐蔽了。很显然,当工业繁荣

和农业工人还过得去的处境继续保持的时候,这种宣传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只要危机一发生并波及农业地区,农业的紧缩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不寻常的骚动。这一回,工商业危机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在引起城市和乡村、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互相斗争的一切问题上,两派将得到两支大军的支持:工厂主将得到工业工人群众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将得到农业工人群众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北美合众国**。1836年的危机首先在这里爆发,而且也最为猛烈,它几乎一直继续到1842年,其结果是美国信用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合众国的商业是在这种比较牢固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当然一开始还很缓慢,从1844—[18]45年起,这里的繁荣也充分表现出来。欧洲物价的昂贵和欧洲各地的革命,正是美国获利的源泉。从1845年到[18]47年,由于谷物大量输出和1846年棉花价格提高,美国获得了大量利润。1847年的危机只是轻微地触动了美国一下。1849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1850年,美国由于欧洲棉纺织业得到新发展的时候发生棉花歉收,而赚了将近2 000万美元。1848年各国的革命使大量欧洲资本输入合众国,其中一部分是移民带来的,一部分是在欧洲购买了美国公债券。对美国有价证券的需求的增长,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价格,因而这种证券近来已经成为纽约狂热投机的对象。所以,不管资产阶级反动报刊怎样否认,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欧洲的资本家所信任的唯一国家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任何国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它在交易所里的牌价。

然而,合众国之所以更加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人口稠密的区域——北美联邦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两个方向扩展。由于国内的自然繁育和移民的不断流入导致人口的增加,从而

使一个一个的州和地区得到开垦。威斯康星州和艾奥瓦州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在密西西比河上游所有的州,移民大大增加。苏必利尔湖地区矿山的开采和整个五湖地区谷物生产的增加,促进了商业和这个巨大内河水道上的航运事业的新发展。国会的最近一次会议通过法令,给予加拿大和新苏格兰的贸易很多优惠条件,将会使这种发展更为加速。这样一来,西北部各州获得崭新的意义,而俄勒冈州却几年工夫就沦为殖民地,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遭到吞并,加利福尼亚州受到侵占。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2期就已经指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必然结果<sup>①</sup>。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新金矿的发现增加了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活跃起来,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加利福尼亚市场本身就已经很可观了;一年以前,那里才有10万人,而如今至少有30万人,他们差不多都是只采掘黄金,不生产其他东西;他们用黄金从其他市场换取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但是,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长的容量相比,跟智利和秘鲁、西墨西哥、桑威奇群岛的贸易的惊人发展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系相比,还并不算大。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全新的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交通线。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才被打开并将成为世界

<sup>①</sup> 见本卷第275—276页。——编者注



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以修建公路、铁路和运河的办法来开辟经过这个地峡的通道,对世界贸易来说现在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些工程在某些地方已经着手进行。从查格雷斯到巴拿马的铁路已经在修筑。美国公司为了先用横断大陆的道路,然后再用运河把两大洋联系起来,正在尼加拉瓜的圣胡安河流域进行勘测。关于其他线路——经过达连地峡的道路,经过新格拉纳达的阿特拉托河的道路,经过特万特佩克地峡的道路——,英美报纸也正在讨论。目前突然揭示出,整个文明世界对中美洲的地势懵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肯定哪一条线路更适于开凿大运河。根据已知的有限材料来判断,沿着阿特拉托河的道路和经过巴拿马的道路具有最大的优点。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通道,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南安普敦与查格雷斯之间,纽约与查格雷斯、瓦尔帕莱索、利马、巴拿马之间,阿卡普尔科和圣弗朗西斯科之间已经建立航线;但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条航线及其有限的船只是远远不够的。扩大欧洲与查格雷斯之间的航运是日益迫切的了,而亚洲、澳洲和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圣弗朗西斯科至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最重要停泊地桑威奇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它们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远隔四到六个月的这么长的帆船航行路程了。澳洲殖民地(新西兰除外)的总人口,由1839年的170 676人增加到1848年的333 764人,就是说,在九年当中增加了95.5%。英国本身也不能让这些殖民地没有航线;目前政府正在就开辟一条衔接东印度邮线的路线进行谈判,不论这条路线能否开通,与美国、特别是与加利福尼亚的船舶来往的需要很快就会自行满足,

去年就从澳大利亚迁来了3 500人。真可以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

航线这种即将扩大的规模由于上述的荷兰殖民地门户的开放,由于螺旋桨推进的轮船数量的增加而将会越来越广阔,轮船载运移民比帆船又快,又省,又能赚钱,这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从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到纽约除了已经航行的轮船外,据说还有新的船只要投到这条航线上,同时在鹿特丹和纽约之间还将开辟一条新航线。目前资本是怎样竭力在海洋航运业中寻找投资场所,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航行在利物浦与纽约之间的互相竞争的船只不断增加,从英国到好望角和从纽约到阿弗尔开辟了全新的航线,纽约目前正在议论许多这类的设计方案。

资本如此流入远洋航运业和经过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建设,已经为这一方面的疯狂投机打下了基础。这种投机的中心必然是纽约,因为它得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最多,并且已经掌握了对加利福尼亚的主要贸易,这样,它在整个美国所起的作用,完全像伦敦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纽约已经成为整个大西洋航运业的中心;太平洋上的所有船只也都属于纽约各公司,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新设计都出自纽约。在纽约已经开始了远洋航线方面的投机。开设在纽约的尼加拉瓜公司也开始了以开凿经过地峡的运河为中心的投机活动。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所有这类项目,即使伦敦交易所将充满各种类似的设计,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并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许多设计是会流产的,但是,正像1845年英国铁路网是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的一样,这次全世界的航运业至少会有个总的轮廓将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即使许多公司会破产,轮船还依然存在,而这些轮船将

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国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四个月。

英国和美国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1850年,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完全像在英国一样,突然出现了资本过剩的现象,货币市场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秋季博览会的报道,对于利害相关的资产者是一个极大的满足。正如抱有纯粹伦敦式优越感的《经济学家》讽刺地指出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事件<sup>244</sup>和黑森选帝侯国的事件<sup>321</sup>,围绕着建立德意志联邦问题的斗争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威胁性的通牒,一分钟也不能阻止住这些繁荣征兆的发展。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尔豪森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了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

9 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7 300万法郎(1 492万英镑)。1849年11月2日,银行券流通额是48 200万法郎,或1 928万英镑,即增加了436万英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9 600万法郎,或1 984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以致到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 400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2 300万法郎,或500万英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的论断<sup>①</sup>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就免除了该行为银行券兑换现金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5 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1848年5月2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5 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2 500

<sup>①</sup> 见本卷第205—208页。——编者注

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sup>115</sup>,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巴黎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低得多,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对英国的这种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

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近六个月来发生的政治事件。

在英国,每一次工业繁荣时期都是辉格党人<sup>146</sup>(他们把王国中最矮小的人约翰·罗素勋爵看作他们的理想的化身)的辉煌时期。内阁明明知道进行次要的小改革的方案会遭到上院的否决,或者它自己在会期終了借口时间不够而把方案撤回,但它还是把它们提交给议会讨论。时间不够常常是因为在起初枯燥无味的饶舌过多,议长通常尽可能拖到最后才出面制止,说明这个问题议会不宜讨论。在这样的时候,自由贸易派<sup>108</sup>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斗争便流于纯粹的空谈。广大的自由贸易派热衷于实际享有贸易的自由,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心思继续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结果;而保护关税派面对城市

工业的发展则一味发出可笑的哀叹和恫吓。各个政党继续进行斗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以便经常彼此提醒对方不要忘记它。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之前,工业资产阶级为了鼓吹财政改革吵得天翻地覆;而他们在议会中却只限于理论上的空泛议论。在会议的前夕,科布顿先生在谈到俄国的贷款的时候,再次表示要向沙皇宣战并对伟大的彼得堡穷汉大加嘲讽;六个月之后,他竟参加了和平大会这场可耻的滑稽戏,这次大会的唯一结果就是:一个俄基布韦族的印第安人<sup>①</sup>把和平的号角变出来交给了尧普先生,而使得讲台上的海瑞先生吃惊不小,同时美国佬伊莱休·伯里特这位戒酒的倡导者来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哥本哈根,想使有关的政府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似乎争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整个战争当冯·加格恩先生在干预而不是费奈迭干预的时候,就可能严重起来!

**希腊问题的辩论**是上次议会会议的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大陆的一切专制主义反动派为了推翻帕麦斯顿,跟英国托利党<sup>145</sup>结成了联盟。路易-拿破仑为了取悦沙皇尼古拉和阿谏法国的民族虚荣心,甚至从伦敦招回了法国公使。整个国民议会对断绝跟英国的传统联盟这一勇敢的行动报以狂热的掌声。这一事实使帕麦斯顿先生有机会在下院扮演争取全欧市民自由的战士的角色。他获得了46票的多数,而那种既无力又荒唐的联盟的结果就是外侨管理法没有恢复。

如果说帕麦斯顿在他反对希腊的行为和他的议会演说中对欧洲反动派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那么英国人民利用海瑞先生逗留伦敦的机会大大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对外政策。

一方面,奥地利的军事代表被人民在伦敦大街上追逐,另一方

---

<sup>①</sup> 俄基布韦族的印第安人分布在苏必利尔地区。——编者注

面，普鲁士因其外交代表的遭遇而遭到了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不幸。大家记得，英国最滑稽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著作家布鲁姆，由于著作家本生举止失礼和纠缠不休而在贵夫人的一片哄笑声中把本生赶出上院的旁听席。本生先生对这种侮辱泰然处之，就好像他所代表的伟大国家需要这样似的。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他根本不想离开英国。他的一切个人利益使他留恋着英国。他以后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外交地位，从议论英国宗教中捞些资本，给他的儿子们在英国国教会中找个好位置，给他的女儿们在英国任何一个等级的绅士中物色未婚夫。

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去世大大加速了旧政党的瓦解。从1845年起成为他的主要支柱的所谓皮尔派<sup>180</sup>，在他死后就完全解体了。皮尔本人死后被几乎所有的政党大肆吹捧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不管怎样，他比起大陆上的“政治家”，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野心家。其次，这个出身于资产阶级而跃居土地贵族领袖地位的人的政治智慧在于，他认识到在现今的时代里只有一种真正的贵族，那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他利用了他在土地贵族中间的领袖地位，经常迫使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让步。例如，他利用天主教徒的解放和警察改革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1818年和1844年的银行法加强了金融贵族地位，1842年的关税改革和1846年的自由贸易法使土地贵族直接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牺牲品。贵族的第二个台柱是“铁公爵”<sup>①</sup>，这个滑铁卢的英雄像绝望的唐·吉珂德一样，始终如一地支持棉纺织业骑士皮尔。从1845年起，托利党就把皮尔看成是叛徒。皮尔之所以能控制下院，是因为他那动听的辞令非常容

① 阿·韦·威灵顿。——编者注



易理解。只要读一遍他那最出色的演说便能看出,这些演说尽是一些空话,中间巧妙地拼凑了大量统计材料。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打算为这位废除谷物税的人建立纪念碑。一家宪章派报纸在暗指皮尔1829年所组织的警察时问道:这些皮尔纪念碑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每个警察便是活的皮尔纪念碑。

在英国最近哄动一时的事件是,教皇任命怀斯曼先生为威斯敏斯特红衣大主教,把英国划分为13个天主教区。基督全权代理人所采取的这个完全出乎英国国教会预料的步骤,又一次证明大陆上一切反动派迷恋一种幻想,即在他们不久前效力于资产阶级而取得胜利的同时,现在也自然应当随之恢复整个封建专制的社会秩序及其所有的宗教附属物。在英国,天主教的唯一支柱是社会上的两极,即贵族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由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的平民,按其身世来说是天主教徒。贵族沉醉于崇尚皮由兹教派<sup>322</sup>之雅事,直到最后甚至转入天主教教会也开始成为一种风气。当英国贵族在它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暴露自己的封建性的时候,自然必定会产生如下情况,即贵族阶级的宗教思想家,高教会派的正统神学家在跟资产阶级非国教派教会的神学家作斗争时越来越不得不承认从他们的半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中所得出的结论,甚至英国国教会的个别反动信徒会越来越经常地转向原始的唯一救世教会<sup>①</sup>。这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在英国天主教神父的脑海中引起了一种整个英国很快转向天主教的最美妙的希望。但是,再度把英国视为罗马行省并想使这种转入天主教的倾向再度高涨的罗马教皇的新训谕起了相反的作用。皮由兹派突然看到他们玩

---

① 天主教会的自称。——编者注

弄的中世纪的把戏产生严重后果以后，怒气冲冲地退了回来，皮由兹派的伦敦大主教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放弃自己的一切糊涂观念并宣布要对教皇的权力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资产阶级对整个这出喜剧感兴趣，只是这出喜剧使它可以趁机向高教会派及其大学展开新的攻击。负责提供关于大学情况的报告的调查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会掀起激烈的争论。当然，人民群众对怀斯曼红衣主教没有什么兴趣，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相反的，在目前新闻短缺的情况下，他却给报界提供了理想的材料来发表抨击庇护九世的长篇文章和愤慨言论。《泰晤士报》甚至要求政府在教皇国内煽动起义和唆使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侨民攻击教皇，以惩罚他的侵权行为。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地球》把教皇的训谕跟马志尼最近发表的宣言作了非常巧妙的对比。它说，教皇要求对英国进行宗教统治，并且任命在异国的大主教。在伦敦这里有以反教皇者马志尼先生为首的在异国的意大利政府。马志尼先生不仅要求在教皇领地内取得而且实际上正在享有的领导权，目前也带有纯宗教的性质。教皇的训谕具有纯宗教的内容，马志尼的宣言也是一样。两者都宣传宗教，诉诸信仰，它们的格言是上帝和人民。马志尼先生至少是他所面向的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代表（因为除了上帝和人民的宗教之外，意大利几乎没有其他的宗教），而教皇则不是这样的代表，除了这一点之外，请问，这两个人的要求还有什么两样呢？不过，马志尼利用这个机会更进了一步。也就是说，他跟意大利国民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现在从伦敦发行罗马制宪议会曾经批准的1 000万法郎的公债（面额 100 法郎），而这完全是为了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不能否认，这笔贷款要比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发放的不成功的志愿公债有更大的希望。

英国最近给予罗马和奥地利的确实沉重的打击，是英国与撒丁

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破坏了奥地利关于意大利关税同盟的计划，保证英国贸易和英国资产阶级政策在北意大利有一块重要的阵地。

迄今尚存的宪章派<sup>179</sup>组织也在土崩瓦解。还留在该派中的小资产者跟工人贵族联结在一起，组成纯民主主义的一派，它的纲领限于人民宪章和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改革。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宪章派的革命派。前者的首领是菲格斯·奥康瑞尔，后者的首领是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自称是古代芒斯特<sup>①</sup>国王后裔的爱尔兰绅士老奥康瑞尔，不管他的出身和政治倾向如何，却是古老英国的真正代表。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不论对工业进步和对革命都恨之入骨。他的整个理想充满宗法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在自己的身上集中了无数矛盾，这些矛盾都在某种平凡的常识中得到解决和调和，使他能够年复一年地每周在《北极星报》上撰写长而又长的书信，而每封新的信总是与上一封信公开地吵架。正是因为这样，奥康瑞尔认为自己在三个王国中是最为始终一贯的人，是20年来预言了一切事件的人。他有宽大的肩膀，雷鸣般的声音，高明的拳术（据说有一次他凭着这种拳术捍卫了诺丁汉市场，使之免遭两万多人的人群的骚扰）——这些都是古老英国代表人物的基本特征。显然，像奥康瑞尔这样的人必然是革命运动的巨大障碍。但是，这样的人也有可取之处，即跟他们在一起和跟他们斗争时会克服大量早已养成的偏见，运动一旦最后制服了这些人，就会永远摆脱他们所代表的偏见。奥康瑞尔必将在运动的过程中走向灭亡，不过他会因此也像拉马丁和马拉斯特两位先生一样，可能取得“正义事业的殉道者”的称号。

---

① 爱尔兰的一个省。——编者注

宪章派的两派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土地问题。奥康瑞尔和他的一派企图利用宪章把部分工人安置在小块土地上,最后使土地小块化成为英国的普遍现象。大家知道,他借助股份公司实行这种小规模的土地小块化的企图是如何破产的。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有把大片地产划小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始终伴随着小地产必然走向集中,必然在与大农业生产斗争中遭到灭亡的倾向,但是它能使英国工人在一段时间里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奥康瑞尔提出的土地小块化是种革命的东西。宪章派的革命派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要求与这种土地小块化的要求相对抗,他们要求不分配土地,使土地仍归国有。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和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但是对废除谷物法时的情况记忆犹新的宪章派仍然意识到,在下一次危机中他们又会不得不跟工业资产者即财政改革的拥护者一道走,帮助他们击败他们的敌人,从而迫使他们作出某些让步。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宪章派的立场必然是这样的。在英国只有实行宪章,才能开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像在法国只有赢得共和制以后,六月决战才有可能一样。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促成了4月28日的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省也当选。山岳党<sup>83</sup>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省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勾销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否定了为六月起义恢复名誉

的做法；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次提名看成是讨好轻佻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来。由于对手的政策不坚决而壮起胆来的秩序党<sup>54</sup>，为了同这种善意的提名相对抗，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个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sup>116</sup>，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冑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使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得意忘形。山岳党心花怒放，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掀起一场再度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靠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宝座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17个卫戍官<sup>117</sup>。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重冷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定会消灭所谓的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保存自己。所谓的革命报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这个临时性问题提交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作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

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

5月22日,人们以462票对227票的表决结果解决了这个临时性问题。有些人曾经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稳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突发奇想,要全国行动起来,并且是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而他们自己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决定的无限期推迟,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者的庄重冷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出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危害深重的灾难。山岳党的演说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他们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却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后者不久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严厉得多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规定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单户票据,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特征。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时事评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讷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時候,自诩为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

在讨论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堕落到如此道德败坏的地步,竟只是给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就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sup>①</sup>

不得已的共和派<sup>②</sup>这出喜剧,即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无休无止的磨擦;秩序党经常面临分裂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经常重新结合;每一个集团都企图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

<sup>①</sup> 见本卷第205页。——编者注

<sup>②</sup> 套用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编者注



败；相互的忌妒、仇恨、倾轧，常常刀剑相见，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接吻<sup>119</sup>，——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像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政府放弃了政权吗？波拿巴能同国民议会抗衡，不正是依仗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这个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300万法郎作为酬劳。<sup>238</sup>国民议会在它宣布绝大多数法国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胁的姿态，抬出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在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之后，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增加300万法郎，而只决定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国民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对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以后，它才作出这种让步。可见，这200多万实际上不是许给波拿巴的，而是许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掷给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而在讨论新闻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发行人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罚金5000法郎。

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加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政府的报复行动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坏宪法的罪名追究几家正统派报纸的责任。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国民议会阻碍,希望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议会党团能够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议员能够谋求个人利益,也希望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把自己的信任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总统的印记。在议会休会期间由28人组成保护共和国美德常设委员会,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立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几个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看来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两个王室的融合,而它们在斗争时打的旗号就是王室。报纸上登满了在圣伦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讨论的和解计划;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像他们的竞争者到圣伦纳兹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宫谒见亨利五世,他们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

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在国外的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美德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sup>121</sup>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了会。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没有明确规定的君主制复辟；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乎宪法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派别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在各个集团之间以暴力一决胜负。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行政权一加强，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加强其共同的权力时，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手段，增加了他在决胜关头以暴力阻挠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反对秩序党时将不会对宪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生反感，正像秩序党在反对人民时不会对宪法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即选举法产生反感一样。他甚至有可能诉诸普选权来反对议会。总之，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会危及整个政治现状，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像觉

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买卖、票据、婚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恶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质的原因,也理解错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来对抗前往圣伦纳兹和威斯巴登的拜谒。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这个人有什么魔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邮政马车大批装载着十二月十日会<sup>122</sup>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傀儡发表演说,或者宣称总统施政的座右铭是坚持共和主义的随和温顺的态度,或者宣称这一座右铭是坚持刚毅倔强的精神。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像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已经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了起来,于是他着手争取军队。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士兵。如果说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疲劳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他手下的虚弱士兵,那么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

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sup>①</sup>,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一方与尚加尔涅一方的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况且,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已经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成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这个亚历山大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可笑,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监视总统。他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分炫耀自己——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以越来越高傲的态度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的颁布会引发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入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办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招摇撞骗和不可思议的妄自尊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通过幻想产生的怪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的人,就足以把这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退休的将军。

波拿巴很早就对尚加尔涅进行过报复,嗾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

---

① 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u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编者注

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在议会即将开会对这个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之前抢先采取行动，便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尔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教主的得力助手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正是诺马耶在上次阅兵式上使全体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过。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将在不祥的征兆之下复会。但是，这将是杯水风波。从根本上说，旧戏必定还会继续演下去。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维护原则的勇士们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将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同样，尽管波拿巴提出了种种临时性的抗议，他也仍然会把这种延长任期当作国民议会的简单授权从它手里接受下来，因为仅仅由于缺钱，他就已经感到沮丧。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穷于应付；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无不用其极，直到经济关系本身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以致使所有这些互相抱怨的派别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钱财都落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德国近半年来的政治事件可以概括为一出戏：普鲁士欺骗自由派，奥地利欺骗普鲁士。

1849年，看来问题在于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1850年，问题在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瓜分权力；1851年，问题将仅仅在于普鲁士以怎样的形式隶属于奥地利并作为悔过的罪人返回完全重建的联邦议会的怀抱。普鲁士国王希望1848年3月22日他那不幸的柏林御驾巡游能受到酬谢而捞到个小德意志，这个小德意志却变成了小普鲁士。普鲁士必须老老实实地承受任何侮辱并退出大国之列。甚至连有关联邦的一点点幻想，也由于它的政策惯有的出尔反尔和没有远见而破灭了。普鲁士存心硬说联邦具有自由主义性质，它这样用它向来不重视的立宪的妄想来蒙蔽哥达派的谋士们；不管怎样，普鲁士本身由于整个工业的发展，连年的赤字和国债，成了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它无论怎样躲避或反抗，也越来越陷入了立宪主义。如果哥达派的谋士终于发现，普鲁士怎样无耻地对待他们的尊严和智慧，如果甚至加格恩和布吕格曼也终于以高尚的义愤背弃了十分露骨地玩弄祖国的统一和自由的政府，那么那些被普鲁士纠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的雏鸡——小国的君主不会给普鲁士带来多大的愉快。这些小公侯只有在极端受压迫和无保护的情况下才寄身于渴望兼并的普鲁士之鹰的利爪下。为了借助于普鲁士的干涉、威胁和示威以使其臣民像从前一样唯命是从，它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签订奴役性的军事条约，为驻军支付巨款，有可能通过联邦宪法的形式不久即被兼并。而普鲁士本身所作所为的结果使它们又不致

遭受这种新灾难。普鲁士到处恢复反动的统治,而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小公侯纷纷脱离普鲁士,投入奥地利的怀抱。既然它们又可以按照三月事件以前的方式进行统治,那么专制的奥地利对它们来说就要比一个既不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又不想成为自由主义的政权更亲近一些。况且,奥地利的政策并不是要吞并小国,相反的,是要保存它们作为重新恢复的联邦议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于是,普鲁士就只好眼看着前几个月普鲁士军队拯救过的萨克森脱离了它,眼看着汉诺威和黑森选帝侯国脱离了它,现在,巴登不顾本国还驻有普鲁士的警备队也跟着其他小国脱离了它。普鲁士为了支持汉堡、梅克伦堡、德绍和其他地方的反动势力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得利的不是普鲁士,而是奥地利,这一点它现已经从两个黑森的事件中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碰了壁的德国皇帝至少相信了一点:他生活在背信弃义的时代里,如果说他现在不得不眼看着失掉他的“右手,即联邦”,那是因为这只手早就不好使了。这样一来,奥地利现在已经把它的霸权扩大到整个德国南部,甚至德国北部的一些重要国家也成了普鲁士的敌人。

最后,奥地利已然做得极其过分,竟依靠俄国公开反对普鲁士。它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黑森选帝侯国两个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的宝剑”<sup>①</sup>签订了真正普鲁士的单独和约,把自己的同盟者出卖给力量占优势的敌人。英国、俄国和法国决定结束公爵领地的独立并把这一意图写在奥地利自己也参与的备忘录里。奥地利以及跟它结盟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根据伦

---

<sup>①</sup>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敦备忘录,在新恢复的联邦议会中表示赞成德意志联邦对荷尔斯泰因进行有利于丹麦的干涉,而普鲁士则企图继续奉行两面政策,驱使斗争的双方服从尚不存在和无法肯定的、被多数政府和实力最强的政府所否决了的联邦仲裁法庭;普鲁士用了一切手法,所得到的无非是大国怀疑它玩弄革命阴谋和收到许多威胁性照会。这些照会将使它很快失掉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兴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很快就会回到国父的怀抱,而允许贝泽勒尔和雷文特洛两位先生统治自己的人民,虽然所有的军队都站在他们一边,仍然表明,它还需要丹麦的鞭子来教育自己。

黑森选帝侯国的运动<sup>321</sup>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例子,说明德意志小国的“叛乱”会导致什么结果。市民对骗子哈森普夫卢格进行的合乎道义的反抗,实现了向这类场面所能要求的一切:议会步调一致,居民万众一心,官吏和军队都站在市民一边;所有的对立因素都已经消除,“君主们,滚出国去!”这个口号自然而然地实现了,骗子哈森普夫卢格跟他的内阁一起垮台了;一切事情都是按预想进行的,一切政党都严格依法行事,避免了任何过火行为,而反对派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立宪派反抗史上的最辉煌的胜利。现在一切政权都掌握在市民手中,他们的等级委员会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碰到一点反抗,这正是他们应当表现自己的时候。现在他们看到,驻在边境上的不是黑森选帝侯国的军队,而是外国军队,它们准备开进这个国家并在24小时内结束市民统治的整个伟业。只有现在才开始不知所措和忍受耻辱。如果说他们从前是能后退,那么现在他们是不能前进。黑森选帝侯国拒绝纳税这件事比以往的任何事件更令人信服地证明,小国范围内的一切冲突总是变成纯粹的滑稽剧,而这种滑稽剧的唯一结果总是外国进行干涉和用废除君主和宪法的办法来消除冲

突。这个事实证明,小国的小市民以爱国主义的忠诚信念开展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斗,来捍卫三月革命的任何一点微小成果使之免遭必不可免的毁灭,这是多么可笑。

在联邦成员国黑森选帝侯国(必须使它从普鲁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奥地利直接出面反对它的竞争者。正是奥地利煽动选帝侯攻击宪法,而后马上把他置于自己的联邦议会的保护之下。为了使这种保护有实力作后盾,为了黑森选帝侯国事件中打垮普鲁士对奥地利统治的反抗和胁迫普鲁士重新参加联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在已经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充斥着各种有关军团的进军和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喧嚷正像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争吵一样,是不会有结果的。无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做不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做主。反叛的普鲁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议会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不和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某种所谓的国家,即欧洲的人民、流亡的人民。我们不准备谈德国、法国、匈牙利等流亡者的个别支部;它们的高等政策不过是纯粹的丑闻录。但是不在国内的全欧人民最近有了一个欧洲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临时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朱泽培①·马志尼、赖德律-洛兰、阿尔伯特·达拉什(波兰人)和阿尔诺德·卢格,卢格为了证明他的参加是正当的,谦逊地在名字后面写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虽然很难指出什么样的民主主义宗教会议委

---

① 原文为:约瑟夫。——编者注

任这四位福音传播者担负了他们的职位,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宣言包含着大批流亡群众的信条,并以相应的形式概括了这些群众从近来的革命中取得的精神成果。

宣言一开始就炫耀般地列举了各派民主力量。

“为了取得胜利,民主力量还缺少什么呢?……缺少组织……我们有教派,但没有教会,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哲学体系,但没有宗教,没有使信仰者团结在共同口号之下并使他们的工作协调一致的集体信仰……我们有一天将会团结一致,并在我们当中的优秀人物统率之下共同前进……这一天将是战斗的前夕。在这一天我们清点一下我们的队伍,我们将会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为什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胜利呢?因为革命政权手中的组织比较薄弱。这就是流亡者临时政府的第一道法令。

它说现在必须用组织信教的军队和创立宗教的办法来消除这种弊端。

“但是,为此必须克服两个巨大的障碍,消除两个严重的糊涂观念:一是对个人权力的夸大,一是理论的偏狭的排他性……我们不应当说‘我’,我们应学会说‘我们’……那些意气用事、拒绝组织和纪律所要求的轻微牺牲的人,会由于过去的习惯而否定他们自己所宣传的共同信仰……理论的排他性是对我们的基本教条的否定。谁说我已经发现政治上的真理,谁把接受他的体系当作加入兄弟联合的条件,谁就是仅仅为了确定他本身的‘我’,而否定人民,即否定世界规律的唯一进步的解释者。谁断言在目前能以自己智慧的孤立劳动(无论这种劳动有多大的威力)彻底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谁就放弃真理的永恒源泉之一,即放弃参加行动的人民的集体直观,而注定由于自己知识贫乏犯下错误。彻底解决是胜利的秘密……我们的体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是解剖尸体,发现病症,分析致死的原因,而对领悟生命和理解生命是无能为力的。生命,这就是运动中的人民,这就是群众的本能,这种本能由于互相接触,由于对将要完成的伟大事业的预感,由于自发的闪电般地突然在大街上进行的联合而升华为空前壮大的力量;生命,这就是这样一种行动,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一

切尚在沉睡的希望、自我牺牲、爱和热情的力量,能表现人的统一的本性和他的全部创造力。在开辟新纪元的一个历史关头中,工人的握手将比近两千年来(过去的社会)伟大的死者用他们的智力或知识所从事的冷酷无情的劳动更多地告诉我们未来的组织的情况。”

由此可见,这一派夸夸其谈的谬论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庸人之见,似乎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人民导师的意见互相敌对而造成的。

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它的进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可悲结果,而实际上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观点,不允许各个阶级提出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硬是要求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无耻的态度暧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暧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从这些先生近两年来在法国、德国、意大利一定已经获得的经验来看,他们在这里虚伪地用拉马丁的关于友爱的词句来掩饰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很难说是无意识的。同时,这些先生对“体系”有怎样的了解,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想象着,似乎这些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过是他们宣言中的整个智慧的一部分,只不过把收集在宣言中的自由、平等等词汇之一片面地当成了基础。他们对社会组织概念描写得很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动,握手,于是就万事大吉。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时,运动、发展、斗争就会停

止,欧洲共和国的和永世逍遥自在的黄金时代就会在那时将居于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庇护下宣告开始。这些先生正像憎恶发展和斗争那样憎恶思维,憎恶冷酷的思维,——好像有某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曾经冷酷到如此地步,能像他们那样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人民勿须关心明天,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发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弃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骗人民中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

“难道这样我们就是说(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问另一个委员)我们应当不带旗帜上街吗?难道就是说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旗帜上只写上否定两个字吗?这样的怀疑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作为很早就参加人民斗争的人民代表,决不会使人民希望落空。”

相反的,这些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丰富,给我们开了一张真不愧为莱波雷洛式的单据,列举了作为“民主党”当前共同基础的永恒真理和整个过去时代的成果。这个单据可以概括为如下的令人虔诚的主祷文:

“我们相信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会朝着为我们预定的道德规律向前发展。我们相信联合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我们相信,要解释道德的规律和进步的规范不能指靠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个人,而只能指靠人民,受到国民教育的启蒙并为自己那些打了美德和智慧烙印的杰出代表所领导的人民。我们相信个人和社会二者的神圣性,两者既不当互相排斥,也不应当互相斗争,而应当为了所有人的相互完善很好地配合起来。我们相信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任何人类的责任,我们相信平等,没有平等,自由只能是欺骗,我们相信友爱,没有友爱,自由和平等就会成为没有目的的手段,我们相信联合,没有联合,友爱就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纲领,我们相信作为进步环境的家庭、团体、国家和祖国,人们应当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地成长起来,认识并实现自由、平等、友爱和联合。我们相信劳动的神圣性,我们相信劳动创造出来作为劳动的标志和

成果的财产,我们相信社会的义务,即通过贷款为物质劳动提供材料以及通过教育为智力和身心劳动提供材料……简而言之,我们相信这样的社会制度,它的顶峰是神及其规律,而它的基础则是人民……”

总起来说就是:进步——联合——道德规律——自由——平等——友爱——联合——家庭、团体、国家——财产的神圣性——贷款——教育——上帝和人民——Dio e Popolo。这些词句在1848年从法国革命到瓦拉几亚革命的各国革命的一切宣言中都出现过,正因为这样,它们在这里才作为**新革命**的共同基础而出现。所有这些革命没有一次不宣布财产的神圣性,而财产在这里被奉为劳动的成果。一切资产阶级的财产当然都是“劳动的成果和标志”,这一点亚当·斯密要比我们这些在他以后80年的革命倡导者知道得更清楚。至于说向社会主义作的如下让步,即社会应当通过贷款向每一个人提供他的劳动所需要的材料,那么,每个工厂主通常贷给工人的钱只够买他们在一星期内加工用的材料,信贷系统目前已经普及到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所能容许的程度,而贷款本身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财产的一种形式。

这种福音的本质无非是一种社会状况,在那里神是顶峰,而人民,或者如以后所说的人类,是基础。也就是说,这些人相信的是现存社会,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社会里神是顶峰,而平民是基础。如果说马志尼提出的上帝和人民,Dio e Popolo这个口号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还能有些意义的话,那么把德国假启蒙的败类中最轻浮的人约翰奈斯·隆格这种抄袭来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开时代之谜的妙语,就未免太过分了!此外,我们的阿尔诺德·温克尔里德·卢格这一次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使莱奥大为高兴;他证明,这个学派的人很容易习惯于组织和纪律所要求的微小牺牲,

很乐意放弃理论的狭隘的排他性。

宣言的结尾说：

“问题在于制定欧洲民主派的宪法，在于编制预算，建立人民的国库。问题在于组织倡导者的军队。”

卢格为了成为这种人民预算的首倡者，向阿姆斯特丹的民主主义庸人们发出了号召，并向他们进行了解释，说明他们的特殊使命是付钱。荷兰处于危机中！

1850年11月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  
写于1850年10月—11月1日

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鲍威尔和普芬德  
关于伦敦工人教育协会  
的钱款的声明草稿<sup>323</sup>

(1)由于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先生出自财政考虑乐意接纳因政治情况造成的流亡者,由于接纳不缴纳任何会费的人作为有表决权的名誉会员,协会<sup>32</sup>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把钱付给协会只会使这些钱被用来直接对抗最初的宗旨。

(2)我们作为协会的受托人接管了这笔钱款。受托人的地位英国法律已有规定。受托人只要按一般手续预先通知之后能支出钱款,就可以酌情使用钱款。

(3)至于临时支用钱款,现在出于私人考虑而坚决主张支款的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公民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协会背后背着大多数会员一直有一个秘密委员会,它拥有支配协会基金的无限权力。沙佩尔先生尤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多次为个人目的通过这个委员会从协会那里领取钱款。

我们是工人,决不容许他们像沙佩尔先生那样靠剥削协会过活,



或者像维利希先生那样利用流亡者的基金为生。

(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给协会提供了钱款,然而,由于协会在它似乎同意我们的建议之后,突然把我们告到法院——没有结果——,我们才将钱款转交给一位伦敦公民<sup>①</sup>,在没有得到协会对于用款应符合最初宗旨的充分保证以前,钱款就将一直保存在他的手里。

(5)至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拒绝,这种声明在法律上不会有任何意义。甚至书面声明也不会使我们对法人负有任何法律责任。书面声明只能有一个用处,即作为反诉。

巴黎的鲍威尔(8)

普芬德(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  
写于1850年12月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① 可能是威·罗伯茨。——编者注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sup>324</sup>

今年1月17日的《不来梅每日纪事报》在1月13日的伦敦通讯中，为反对《新莱茵报》和本声明的署名者，贩来了一大堆编造得很不高明的胡言乱语、无中生有以讹传讹的谣言、拙笨的诽谤和一本正经的训斥。

类似这位伦敦记者的“杰出的坚定的人们”总是用猴子学样的方法来回答他们招架不住的批评：他们向对方满嘴喷粪。真是各显神通。

我们把这些巧妙编造的关于《新莱茵报》的小故事回赠给这位“坚定的杰出的人”。至于他对我们退出大磨坊街协会<sup>①</sup>的行动的善意诽谤，我们特作如下声明：

恩格斯和马克思无论在退出协会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管理过协会的出纳处。他们参与管理过流亡者的出纳处，并且在以前的工作经过核查并确认无误后才退出的。说我们退出协会是为了免交每月9便士的会费，这种说法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捏造出来的！还说，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中间一个人到了曼彻斯特，而另一个人打算到海

<sup>①</sup>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编者注

外！在这些充满义愤的心灵深处理藏着多么纯洁的珍珠呵！

在德国的我党同志都知道我们退出上述协会和我们跟协会领导人分手的**真正理由**。这些理由他们是赞同的，但是不宜公开。在德国目前状况下，连老练的奸细都不能诱使我们作进一步的解释，更何况《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笨得像熊<sup>①</sup>一样的奸细。

最后只指出一点，用自己的粪便从伦敦给《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施肥的不是别人，正是波美拉尼亚<sup>②</sup>的思想家。《新莱茵报》谈起他来常常带着一种艺术家的偏爱，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根据他的著作把他描绘成“流泄一切污秽语言和德国民主的一切矛盾的阴沟”<sup>325</sup>。一句话，不来梅的亲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阿尔诺德·温克尔里德·卢格”，欧洲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现在，人们可以理解《新莱茵报》的卑鄙无耻了。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51年1月27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1年1月27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第1  
版第8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① 暗指阿·卢格。——编者注

② 波美拉尼亚是波罗的海边普鲁士的一个州，卢格的家乡。——译者注

卡·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文集<sup>32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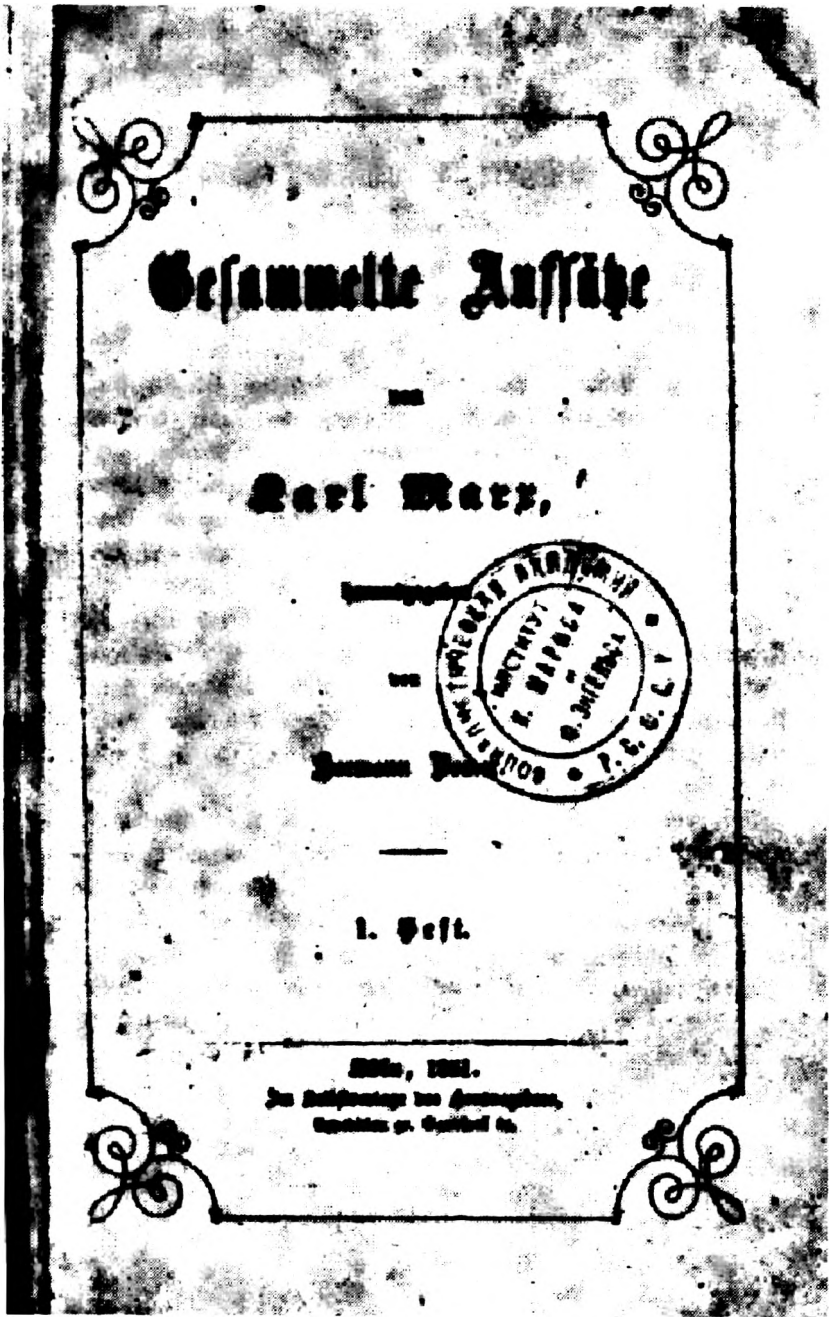
海尔曼·贝克尔出版

第一册包括：

第 1—30 页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1 年 12 月)再版《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 1 卷中登载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莱茵省一居民写作》。

第 31—80 页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1842 年 5 月)再版从 1842 年 5 月 5 日至 19 日分六次在科隆《莱茵报》上连载的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莱茵省一居民写作。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最后一部分连载开始时排印到第五个印张末尾,印刷中断。

马克思修改和编审了《莱茵报》上的下列文章,作为计划中的《文



《马克思文集》1851年科隆版第1册扉页



集)第1卷其他各册的付印稿样:

-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
-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
-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
- 《论离婚法草案。批判的批判。〈莱茵报〉编辑部附注》。
- 《〈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
-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
-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A节和B节》。
-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
- 《答“邻”报的告密》。
- 《〈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
- 《莱茵—摩泽尔日报》。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2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奥·布朗基祝酒词的  
德译文的按语<sup>327</sup>

(附祝酒词全文)

几个可耻的哄骗人民的骗子,所谓的欧洲社会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其实是欧洲败类中央委员会,由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等人主持在伦敦纪念了二月革命三周年。伤感的口头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路易·勃朗**为了阴谋反对另一个人民的叛徒**赖德律-洛兰**,加入了这个二流野心家的集团。他们在自己的宴会上宣读了据称是从各地寄给他们的贺信。虽然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但是他们从德国没有乞求到任何一篇贺词。这是德国无产阶级进步的一个良好的征兆!

他们也写信向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布朗基**提出了请求。他寄回了如下的贺词:

人 民 要 警 惕

什么样的暗礁在威胁着明天的革命?就是昨天的革命碰上的那块暗礁:乔



装成护民官的资产者的可悲的声誉。

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克雷米约、马利、拉马丁、加尔涅-帕热斯、杜邦(德勒尔)、弗洛孔、阿尔伯、阿拉戈、马拉斯特!

多么不祥的名单啊! 这是些民主欧洲所有马路上用鲜血写成的不吉利的名字。

临时政府扼杀了革命! 它得对一切的不幸和千千万万牺牲者的鲜血负责!

反动派扼杀民主, 不过是做了它本行的事情。被轻信的人民当作自己领导者的、把人民出卖给反动派的叛徒, 犯下了罪行。

可鄙的政府! 它不顾人民的呼声和请求, 规定农民交四十五生丁税, 使他们感到绝望而举行起义。

它保留保皇派的总部、保皇派的法官、保皇派的法律。叛变!

它在4月16日陷害巴黎的工人; 它把利摩日的工人关进监牢; 它在27日枪杀鲁昂的工人; 它放出了它所有的猎犬, 它追捕一切真诚的共和主义者。叛变, 叛变!

它, 唯有它对毁灭1848年革命负有重大责任!

啊, 罪大恶极的人常有, 但是在他们中最坏的就是那些被他们的冠冕堂皇的言辞所蒙蔽的人民看成是自己的剑和盾的人, 就是那些被人民热情地宣告为自己未来的主宰的人。

如果在未来的人民凯旋之日, 由于群众的健忘和宽容而使这样一个辜负群众信赖的人上台执政, 对我们是不幸! 革命就会再次垮台。

愿工人们永远记住这些恶人的名单; 如果有一个名字, 是的, 即使只有一个名字再出现在革命政府里, 那就让全体工人一起高喊: “叛变!”

如果演说、说教和纲领又仅仅是扯谎和欺骗, 如果那些骗子又回来重操旧把戏, 那便是更加疯狂的反动派一连串新行动的第一环。如果他们有一天敢于重新露头, 那就对他们咒骂和报复! 如果天真的群众再次落入他们的圈套, 那么人们将会为这些人感到羞耻!

除了把二月革命的骗子永远赶出市政厅之外, 还必须防止新的叛徒。

凡是靠无产阶级上了台而不立即采取下列措施政府都将是叛变的政府：

1. 完全解除资产阶级近卫军的武装。
2. 武装全体工人，成立他们的军事组织。

当然，还应采取许多其他必要的措施，但是采取了这种作为人民安全的预先保证和唯一保障的第一个行动，许多其他措施也就会自然由此而产生。

一件武器也不应该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否则就没有活路！

目前正在各自博取群众好感的各种学派，将来是能够实现他们进行改革和为民造福的诺言的，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即他们不是舍本逐末。

如果人民仅仅忙于理论而不重视唯一实际的唯一可靠的东西——暴力，那么他们得到的只能是悲惨的失败！

武器和组织——这就是进步的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消除贫困的唯一重要手段。

谁有剑，谁就有面包！有了刀剑就能使人屈服，手无寸铁的人群就会像糟粕一样被扫除。法国到处是武装了的工人——这就是社会主义降临。

对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一切障碍、反抗都会一扫而光。

但是，消磨时光在马路上的无聊散步、种植自由树和同律师作响亮空谈的无产者开始是得到圣水，然后是侮辱，最后是霰弹和永远的贫困！

让人民来选择吧！

1851年2月10日于贝勒岛监狱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1年3月3日—6日之间

1851年以小册子形式在伯尔尼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弗·恩格斯

##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sup>328</sup>

编辑先生!

在今天的贵报上,我看到路易·勃朗先生写的一封信,谈到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平等者宴会”<sup>327</sup>,并谈到布朗基先生从贝勒岛监狱寄给这次宴会的一个祝酒词。请允许我对这封信谈几点意见。

在宴会上,布朗基的名字用很大的字母写在墙上,同其他一些民主主义的英雄和殉难者列在一起。在这次集会上有人将祝酒词献给“诽谤的牺牲者”——马拉、罗伯斯比尔……和布朗基!宴会上所有的祝酒词和演说词都规定在2月15日以前交给“这次成功的动人的盛会的组织者”委员会。勃朗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他当然事先就同意给布朗基先生的这个祝酒词。现在勃朗先生怎么能又让布朗基先生成为“诽谤的牺牲者”,称布朗基先生是

“那些在狂怒之下企图侮辱有声望的人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断送最美好事情的倒霉的人们中的一个”?

勃朗先生硬说祝酒词并不是关在贝勒岛监狱中的囚徒们寄来的,而完全是布朗基先生一人所为。当然,布朗基先生也许是由他署名的祝酒词和文件的起草人。但是,在法国,谁都知道,这里所谈的

祝酒词是由“平等之友协会”同意和发表的。这个协会的成员里面有拥护布朗基先生的贝勒岛监狱的囚徒，因为布朗基先生像路易·勃朗先生的保护人巴尔贝斯一样，在囚徒中间也有自己的朋友。

说到“动人的成功的盛会”和“一千多名不同国家的人的统一”，不应当忘记，由于事关勃朗先生，所以这个动人的场面只不过是对赖德律-洛兰先生的博爱的示威，以便——如勃朗先生自己公开宣布的那样——对赖德律-洛兰先生、马志尼先生等参加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没有吸收他勃朗参加一事进行报复。

至于谈到路易·勃朗先生的“声望”，他最好今后暂且不再提这个须要慎重对待的问题，起码等到他的“声望”从不久以前蒲鲁东先生所给予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再说不迟。

看样子，勃朗先生极力喧嚷自己那种流亡者和被驱逐者的处境，是想使自己免受布朗基先生的攻击。但是，路易-菲力浦的后裔不也是被驱逐者吗？蒲鲁东先生并不是安居在皮卡迪利大街 87 号（这个避难所对于撰写奥维狄乌斯式的“哀歌”是很不适合的）的流亡者，而是法律手中的囚徒。难道勃朗先生因此而减弱了对他攻击的火力吗？

看样子，勃朗先生要指责布朗基先生的是，他把自己的祝酒词发表在“反革命的报刊”上。勃朗先生很清楚：自 1850 年 5 月起，在法国再也没有“革命的”报刊了。路易·勃朗先生，您“非常好意”地亲自给《泰晤士报》的编辑写信，那么请问，是从什么时候起，《泰晤士报》在您的眼里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报纸了呢？

为了使公众有可能评判引起勃朗先生如此愤怒的这个不寻常的文件（况且它至今仍是法国报刊普遍关注的对象），我向您提供全文的译文，我相信它会引起英国公众的注意。

敬爱的先生,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

菲利塔斯

弗·恩格斯写于 1851 年 3 月  
5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4 年俄文第 1  
版第 25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卡·马克思

### 反 思<sup>329</sup>

贸易的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dealers]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靠它具有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它的铸币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重要的，无论是图克，还是早在金条委员会的报告中，都强调过这种区分。<sup>330</sup> 不过所缺乏的是这两种贸易、两种货币之间的联系。

(1)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经济学家们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至少是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一切论断，正像西斯蒙第反驳麦克库洛赫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是就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而言。<sup>331</sup> 如果考虑到下面的事实，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工人和零售商以及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又取决于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而后一交换又被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制约着，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当然，正像亚·斯密所说，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必然受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的限制，因为向消费者出售的价格是最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manuscript. The text is densely packed and spans multiple lines, though the specific words are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orientation.

Handwritten notes, likely mathematical or scientific, including several lines of text and a large, complex diagram or calculation. The text is dense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handwriting and the presence of many symbols and numbers. The diagram appears to be a complex geometric or algebraic structure, possibly involving a large number of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s. The note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ypical of a personal notebook.

卡·马克思的《反思》手稿的一页(第VII笔记本第48页)





终价格,这种价格反过来必须补偿先前交易中的生产费用再加上利润。然而,在亚·斯密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整个经济学被蒲鲁东等人愚蠢地简单化了。<sup>332</sup>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首先,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例如在英国,决不[仅]受英国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全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例如,[东]印度公司<sup>333</sup>或东印度商人把蓝靛运到伦敦市场上,在这里拍卖蓝靛。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易。蓝靛的购买者把一部分蓝靛卖给法国、德国等等,在这些地方它们被有关的商人和工厂主买去。他们最终是否能赚回蓝靛的价格,则取决于最终的产品向消费者销售的情况,这些消费者也许在伊奥尼亚群岛上,或者住在阿富汗,或者住在阿德莱德。因此,说许多国家范围内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受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是错误的。如果这种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是世界性的,那它就受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本身规模越大,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的地位越重要,就越是如此。其次,因为工人阶级构成消费者的最大部分,所以可以说,随着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不是像蒲鲁东所认为的在一个国家里减少,而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减少——就会造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从而造成生产过剩。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有产阶级日益奢侈,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把这种论断绝对化,说什么种植场主的贸易取决于他的黑人的消费,也同样是错误的。第三,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造成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例如,如果工厂主从投机商那里得到大宗的订货,他就要多雇用工人,于是工人的工资就增加,工人的消费就增加;在修筑铁路的投机中,造成了非常大的最终消

费,可是最后表明,它纯粹是“非生产性的”。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大多最终毁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危机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往往是在有限的消费能力得到满足之后自然发生的,不过,往往只是发生在供给超出了不切实际的预测的场合(例如谷物投机时)。**第四**,生产过剩不仅仅归因于生产比例失调,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

(3)至于在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中出现的货币,即在真正贸易中的通货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中的通货,那么,只确认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不够的,也要考虑到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第一是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第二是地租所得者的货币,第三是所谓资本家(而不是工业资本家)、国家债权人等等的货币,甚至工人的货币(在储蓄银行中),简言之,也就是居民中不从事贸易的各阶级的收入超过他们的日常开支,以及超过他们认为必须始终由自己支配、也就是作为个人储备来保存(贮藏)的那部分货币以上的**余额**,这种余额是**存款**的主要来源,而存款又成为**商业货币**的主要基础。[资本]转移、信贷业务,总之,这个贸易界内部的整个货币运动,是建立在大部分不从事贸易的居民的存款基础上的。当[……]①信用短缺时,这些存款就从贸易中抽出。资本成为非生产性的,因为生产领导者阶级手中所掌握的支配资本的手段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当这些阶级需要货币以便在他们本身之间进行交易,而银行家不再借货币给小杂货商和厂主的时候,消费者自己手中的通货也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了,于是,缺乏货币的怨言

---

① 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

就从贸易界进到消费界。

(4)在危机时期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通货是无所谓的,这样说是错的。从上述原因不难看出,在这种时候,通货的量是最大的,一方面因为流通速度减慢了,其次因为以前不需要现金的大量交易现在需要现金。正因为如此,在货币量和只用较少量的通货就能完成的那种交易的价值之间,也就出现巨大的差距。可见,事实上缺乏的是通货,而不是资本。资本会贬值,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里,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能转化为通货,而资本的价值正在于可交换性。但是,尽管如此,资本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票据不能贴现,甚至建立在诚实交易上的那些票据也是如此。而票据是商业货币,[它的]价值代表商业资本。银行券兑换黄金的能力降到了最低程度,银行券贬值只会加重商业危机。现实的困难是商品即现实资本不能兑换成黄金和银行券,由于这个原因,也就发生了1793、1825和1847年的现象<sup>①</sup>,那时,凡是有现实资本的地方,都可以求助于发行国库券和银行券的办法。同样不能断言,这些国库券和银行券就是资本。它们只是通货。危机没有停止,但货币危机停止了。因此,银行券兑现的幕后是有价证券的兑现,不仅在银行业中是如此,在贸易中也是如此。不过甚至那些按性质来说可以兑现的有价证券,如国家有价证券,短期票据,也都停止兑现。显然,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商品,而在于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的兑现。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能再兑换成货币。当然,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

---

<sup>①</sup> 指生产过剩危机。——编者注

银行券转换成黄金归根到底是必需的,因为商品转换成货币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因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也就是说,因为总的说来存在着私人交换制度。货币贬值和商品贬值事实上甚至成反比。但是,银行券之所以能够只对黄金贬值,是因为商品能够对银行券贬值。总的说来,银行券贬值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商品即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转换成金和银,商品和黄金之间的每一个中间环节或者代表,始终只是代表,因而没有价值。可见,主要问题始终是**商品即资本本身不能兑现**。某些人说,缺乏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通货无关紧要,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在这里,问题恰好在于资本即商品同货币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于,前者不是必然地把后者作为自己的代表,作为自己的**价格**带到贸易界来,资本不再是货币,不再能流通,不再是价值。而可笑的是,当资本表现为**次要**东西的时候,却把货币说成次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另一种看法就更荒谬了:承认资本的不能兑现,却忽视了银行券的可兑现性,但是,他们想通过某种人为的措施和改变**货币制度**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不能兑现的状况,仿佛资本不能兑现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仿佛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想在这一基础上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取消了货币所以是货币的属性,而又不给予资本始终可以交换,而且是按照公正价格交换的属性。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但是,说什么对货币市场的这种压力只是由信用欺诈引起的,这也是错误的。货币本身又造成了信用制度。换句话说,同一个原因产生了这两者。

伯明翰派<sup>334</sup>当然是蠢驴，他们想靠发行大量货币，或使货币的标准贬值，来消除货币的不便之处。蒲鲁东、格雷等人也是蠢驴，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因为货币市场上发生了普遍危机，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面恢复表现为一些征兆，这些征兆不用说会突然重新成为[普遍危机的]原因，所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莫过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家们希望改革货币了。他们保留产品同产品的可交换性之间的分离，因为他们保留价值和私人交换。但是他们想好好地安排这种分离的符号，以便让这种符号表示同一。<sup>①</sup>

(5)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即老实的不学无术的民主派，只知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的货币。因此，那个爆发冲突的领域、风暴、货币危机和大宗货币交易，他们是不知道的。因此，问题对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也像一切事物对他们来说一样，是如此的简单和幼稚，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在这种交换中，谈不上阶级对立。一个商人同另一个商人相对立，一个有货币的个人同另一个有货币的个人相对立。每个人必须拥有货币，才能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活，这个事实显然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本身是这样造成的：每个人必须劳动，而且像施蒂纳所说的，使自己的能力显示出来。<sup>335</sup>首先，在所有以前的、建立在种姓<sup>336</sup>、部落、等级、阶级等等的差别和对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中，货币都是这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货币制度则是这种组织历次兴衰的表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

① 最后这两句话由马克思在页边用线标出。——编者注

历史事实。可见,我们无须证明,货币制度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倒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必须证明,不管以前的所有历史经验如何,货币制度甚至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情况下也有某种意义,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这一环节,在否定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那种[社会]状态下也能继续存在。向这些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们提出这种任务是非常幼稚的。他们靠只言片语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正是他们特别伟大之处。在他们看来,货币制度,以及全部现存制度,是如此善良,如此笨拙,正像他们自己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他们所喜爱的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吧。除了这种贸易之外,他们在前后左右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自由的个人用什么东西从小杂货商手里购买呢?用自己收入的等价物或者说价值符号。工人用工资、厂主用利润、资本家用利息、土地所有者用地租——它们转化成金银和银行券——在小杂货商、鞋匠、肉店掌柜、面包房老板等人那里进行交换。而鞋匠、小杂货商等人用什么来交换转化成货币的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呢?用自己的资本。他们在这种行为中补偿、再生产和扩大资本。

可见,在这种看来如此简单的行为中,第一,表现出总和的阶级关系,表现事先存在着雇佣工人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业和非工业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首先表明事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并使资本和收入分开。由于[收入]转化为货币,简单性也就消失了。

而且,工人获得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同样,土地所有者获得用货币交纳的地租,厂主获得货币形式的利润,而不是获得实物报酬、实物租和进行物物交换,——这种情况不过表明,货币制度和缺乏货币制度时比较起来,和货币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起来,其前提是更

高的发展阶段和更大的阶级划分和分离。没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社会]形式上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不过是利润一部分的地租。

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只要个人不是靠行乞或偷窃获得这种收入,因而,毕竟只要不是从这种形式的收入中侵吞这种收入并以相当强制的方式成为某一阶级个人的代表。[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而言。这里已经不是像古代社会那样,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仆人、阿谀者,一切都完全像咖啡、糖、鲑鱼一样成为交换物。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这一万物的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厂主从小杂货商那里购买时,他像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所有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



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

我们首先撇开收入的特有性质，这种特有性质不表现在金银上，就像尿味不表现在妓院税上一样，罗马皇帝阿德里安曾说这类税没有臭味！<sup>337</sup>这种性质重新表现在受支配的货币量上。整个说来，购买的范围取决于收入本身的性质。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性质的限制。当然，工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买肉和面包，而把工资买白酒喝掉，这是在实物支付制度下做不到的。这样一来，他的个人自由就扩大了，也就是说，白酒的支配作用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可以不去买肉和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凡是收入的性质仍然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性质，不是像现在这样单纯取决于一般交换手段的量，而是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质的地方，工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进行物质变换的社会组织及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从一开始被限制在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上。因此，货币作为阶级对立的最高表现，同时使宗教的、等级的、智力的和个人的差别变得模糊。封建主曾徒劳地试图——例如在对资产者的关系上，采取奢侈品法的办法——在政治上遏止和摧毁货币的这种起普遍拉平作用的力量。可见，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行为中，质的阶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则形成]质的差别。于是，就有了大资产者、中等资产者、小资

产者。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3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翻译

弗·恩格斯

## \*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 条件与前景<sup>338</sup>

我认为,1852 年巴黎任何一次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sup>62</sup>对法国的战争。

这次战争将完全不同于 1792—1794 年的战争<sup>339</sup>,那时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

国民公会<sup>91</sup>在军事上粉碎联军这样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藐视国民公会 14 个军团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方面颇有理由。拿破仑常说,联军的错误起了主要作用,这完全正确。甚至在圣赫勒拿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 年 8 月,90 000 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时而踌躇不前,时而飞速推进,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

Erst nach dem Zusammenstoß mit dem Kaiserlichen Heere  
im Jahre 1852 schloß sich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an die Spitze der Bewegung.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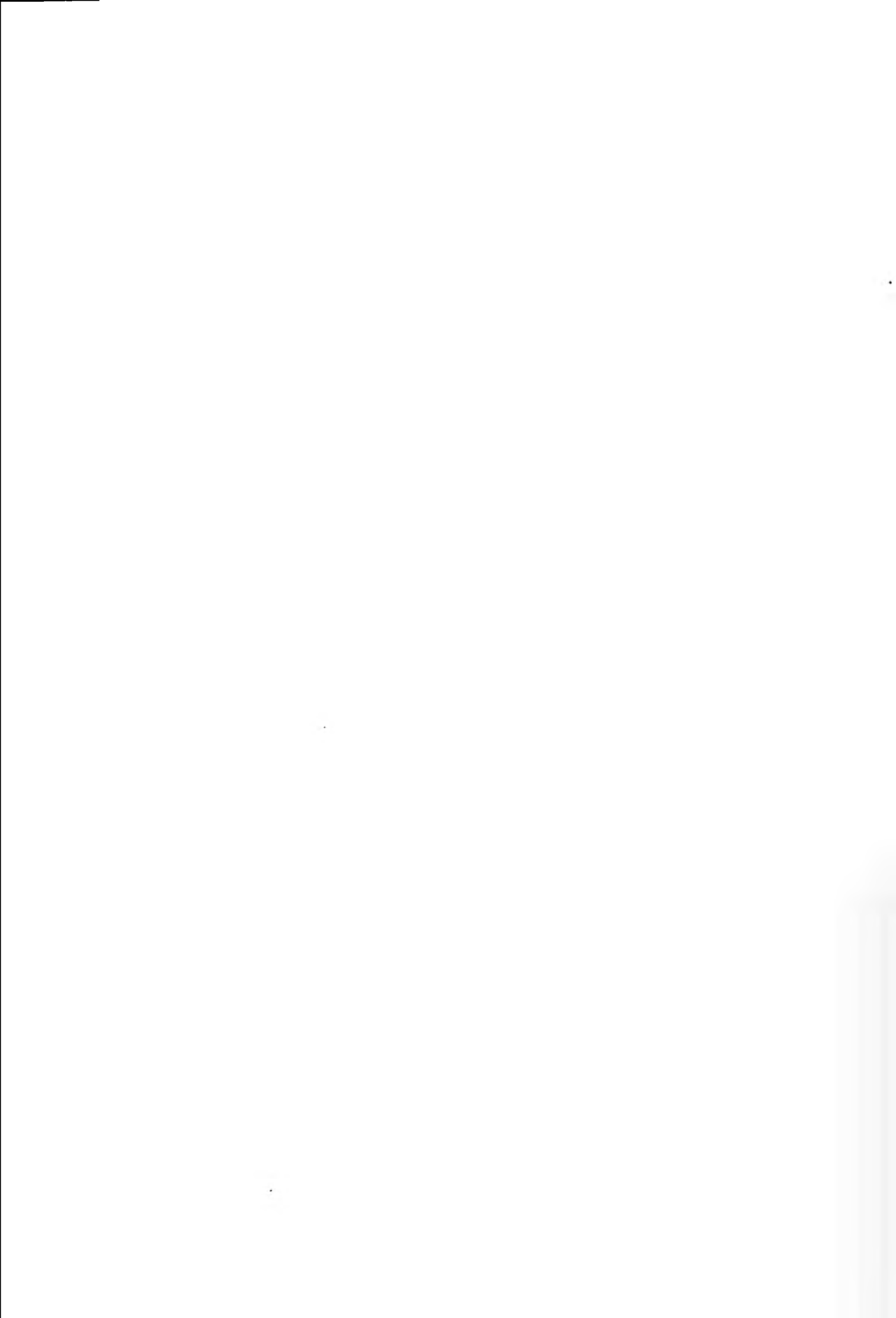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ist die Bewegung der  
Nationalen.



戈讷高地的隘路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默努尔德遮断了他们的道路。联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行动稍微正确，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这时，联军也可以比较安全地前进，并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正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联军的数量多并且质量又好。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而是在瓦尔米对他进行令人可笑的炮击，当在此地战斗时，甚至在以纵队攻击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一再改变主意，时而莽撞，时而畏葸。两次攻击，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或是就力量和士气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过错不在士兵，而在指挥上举棋不定。这不是什么攻击，充其量不过是装装样子。如果全线坚决猛攻，无疑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步兵团陷于覆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不知所措地停在原地，一直到士兵染上疾病为止。

热马普会战，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众多兵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封锁线体系、无限地拉长战线（由奥斯坦德到马斯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自己由于执意夺取荷兰却犯了同一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内尔温登会战和比利时的丧失。在内尔温登会战中，特别是在这次会战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大受称赞的英雄们如果不在杜木里埃亲身指挥之下——打起仗来决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些。不久杜木里埃叛变，旺代暴动<sup>340</sup>，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向巴黎挺进，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就会被夺取。正像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做了蠢事，就会攻下巴黎了。但是联军首脑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却停止在要塞前面，并竭尽全力，不惜大量采用战略上陈旧的办法来逐一争

取点滴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6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仍集结在一起的法军有近12万人。1792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在1793年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全民征集制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35万人。全民征集制的实行应当使这个数字增加约70万人。除去一切减员的数量,法国人在1794年初,大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即是说,远多于联军开去进攻法国的人数。

从1793年4月到10月,法国到处挨打,可是,由于联军的拖延战术,这些打击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从10月起,战斗互有胜负,到冬季战局中止;1794年春,根据全民征集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加入了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勒吕斯的胜利<sup>339</sup>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因此,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sup>341</sup>,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3月,一直无所事事;几乎没有把义勇军当成一回事。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其中有10个月,由于吉伦特党人的垮台,革命的政党摆脱了一切束缚。在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国家中,只要能持武器的居民的比例正常,如果有一年的时间,召集100万兵士,建立75万人的现役部队(人口的3%)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不管这件事在当时是如何地新奇。

所有国内的暴动,除了旺代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没有任何意义。除了里昂和土伦起义<sup>342</sup>以外,其余的都仅在6个星期内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全民征集制征集的部队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为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

错误而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万人和其他士兵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最初征集的30万人中召来的,他们有的已经连续作战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战斗,至于刚入伍的,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必须至少受过3个月的训练。拿破仑在西班牙远征中,曾经计算过随营训练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方面一般地说这类军官的素质较好),那么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对不是一群粗野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受“为共和国捐躯”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与敌军相当的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始终劳而无功的战法,这种战法使久经锻炼而主要适用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处于守势的敌人军队受到训练和习惯于战争。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比敌方将军们却高明得多;断头台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动作的协调,而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自己做了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则不在此例,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大兵群战术的几点说明:(1)大兵群战术的初始想法最早是由热马普那次幸运的机动而产生的,这次机动与其说是出于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这个想法产生于法军极差的素质,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军事上多少具有一点自信心;他们不得不用数量来弥补训练的不足。卡诺对这一发明究竟起什么作用,完全不清楚。(2)大兵群战术还处于极不成熟的状态,——例如在1794年图尔宽<sup>339</sup>和弗勒吕斯会战中这种战术完全没有采用(当



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6天的皮埃蒙特远征<sup>343</sup>中,成功地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向人们表明了这种战术的意义,而在这以前,人们对它并不了解。

(3)谈到卡诺本身,那么这个家伙越来越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肯定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急令。但是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由于他的前任帕希和布绍特的极端愚昧和无能,以及公安委员会<sup>90</sup>中其他一切人对军事一窍不通。这真是“盲人国里独眼称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方军团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等等,法军缺少什么。除此以外,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懂得,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因为在实行革命的全民征集制的情况下,反正会有许多浪费,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才能够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尤其使我对大兵群作战是卡诺发明的这一说法发生怀疑的是,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最广泛的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法国军队,他对敌人翼侧作战,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经历: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的崇高的德行,他那勇敢的安特卫普保卫战<sup>344</sup>(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庸的、墨守成规的、但是赋有一定顽强精神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安特卫普的围攻,并没有持续3个月);最后,他硬要拿破仑在1815年采用[17]93年的方法来与集中了120万人而且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体系行事的联军相对抗,以及总的来说他那庸俗的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像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sup>345</sup>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这是从没

有见过的!

总而言之,国民公会之所以得救,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和老弗里茨在七年战争<sup>346</sup>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和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得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虽然那里法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比所有的敌军至少强大三倍,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干的蠢事,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就已经能这样做了。1812年俄国战局使俄国成为整个神圣同盟<sup>62</sup>在大陆战争中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主力,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以后才集结在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但是从1848年后,神圣同盟就已经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就像莱茵联邦<sup>347</sup>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纯粹的附庸关系。尼古拉——即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德是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其次,至于现代的军事艺术,那拿破仑已经使它十分完善了。在某种情况(这个以后再谈),将帅们,除了在情况许可时仿效拿破仑以

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但是现代的军事艺术已经举世皆知。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佩纓后备官考试之前就对这门课中所能死记硬背的部分早已背熟。至于奥军,他们在匈牙利战局中认清并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地地道道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所有的文迪施格雷茨、韦尔登、格茨之辈,以及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进行的两次战局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已经不为《新莱茵报》写文章了,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明白这个老头子头脑非常清晰,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就够了。如果不是意大利将军们指挥拙劣、互不配合、经常举棋不定,查理-阿尔伯特施展阴谋和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更容易固守,那么1848年在佩斯基耶拉、曼图亚、莱尼亚哥和维罗纳4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于未得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杰作。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中,因此他一点都不必担心他的军队的给养。但是,1849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史无前例的,皮埃蒙特人不仅以集中的兵力在诺瓦拉和莫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sup>①</sup>长)附近切断通往都灵的道路(这原是上策),或者从该线上以两三个纵队向米兰前进,而是陈兵于从塞斯托到皮亚琴察一线;这条战线长达20德里,而皮埃蒙特军的人数为70000人,就是说每一德里只有3500人。同时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强行军行程。这是对于米兰的一次可怜的分进合击,他们的兵力到处都太薄弱了。在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

<sup>①</sup> 1德里等于7420米。——编者注

的是[17]92年奥军旧的方式之后,他像拿破仑会做的那样和他们作战。皮埃蒙特军的战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突破战线,打入一个60 000人的楔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3个师隔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3个师(差不多集中有35 000人),把他们追逐到阿尔卑斯山,从而使皮埃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3天内结束战局的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贝格和埃格米尔附近的机动<sup>348</sup>(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次)至少证明了:奥军已经远远摆脱了像检阅式那样“缓步前进”<sup>349</sup>的旧习惯。这里决定一切的恰恰就是运动的速度。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特别因为这次叛变供给了奥军以意军部署和计划的确实情报。萨瓦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肆意抢掠的那种卑劣行为也有同样作用。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埃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的机动已经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最后,俄国人由于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现代作战体系十分接近的作战体系。他们军队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定性会战中,在大的会战中,俄军都是以大兵群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强攻伊兹梅尔和奥恰科夫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行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的众多性而不灵活,它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主要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一国军队的行动稍为缓慢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起到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

会战计划不是人数众多的俄国纵队以其纵深和密度超过其他一切军队而立即引人注目的。

1812年以后,法军几乎不能再被看作是拿破仑传统的优先继承者。这个传统或多或少已经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内,这个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相适合,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把一切拉平的趋势;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于英国军队,现在都是几乎同样出色的组织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不过这绝对不是说,它们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战斗等等方面没有各种不同的特点。但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术和战略,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作战体系的程度。

至于法国人,那么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型战争,甚至中断了同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的联系。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否能为那些使军队习惯于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个战争是否能使人们习惯于艰苦的生活,或者恰恰相反地因过度疲劳而使他们沮丧;最后,这个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眼力<sup>①</sup>;——这些将来肯定会弄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尔或多或少是变糟了。它已忘记了它的长处——密集的攻击,而习惯于散开行动的方式,但是在这种方式中,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将军们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

<sup>①</sup> 法文原文是 *coup d'œil*, 指一瞥就能迅速作出判断的能力。——编者注

丢了丑,而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 6 月战斗中出了名<sup>350</sup>;但所有这些还决不是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采用占优势的战略和战术的机会对联军方面和革命方面至少是相同的。

### 三

但是,使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难道不会像第一次革命一样,创造出新的作战手段和新的作战方法吗?正如同用现在的拿破仑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与之相比,就像七年战争时代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与第一次革命时代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相比是同样过时和同样无用的了。

现代的作战方法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摆脱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获得必要智力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作战体系来作例子。现代作战体系的两个枢轴是:人员、马匹和火炮这些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这些进攻手段的运动性。运动性是众多性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像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约 20 德里地区内运动。他们不能把全部需要的粮食都携带在随营仓库中。他们不得不像成群的蝗虫那样扰害某个地区,在骑兵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四

面八方去征集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补充,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很少能够满足军队仅仅一个月的需要。因此,现在的作战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内长期采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法军慢慢地在西班牙并很快地在俄国崩溃。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崩溃,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而且俄军甚至在波兰也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大兵群作战体系,至于在俄国领土内,只要还没有铁路,这个体系就根本不能应用。如果俄国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那它就会土崩瓦解了。

但是,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要求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巡逻、粮秣征集、前哨勤务等范围已经大为扩展,每个士兵必需具有较大的积极性,士兵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且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得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士兵的知识、眼力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以士官和士兵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曾经有过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为前提。但是,在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中群众没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使得不加选择而征召来的50—60万人一方面能成为守纪律的像机器那样动作的士兵,同时又能发展或者保持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眼力。野蛮人生来就具有这种强盗式的眼力。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现代作战体系要求每个士兵具有这种普遍的平均文化程度。这种文化程度只有在最发达的国家里才有:例如在英国,那里士兵即使是粗野的农民出身,也受到过城市的文明教育;在法国,那里的军队

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平民(代役兵)组成的;在德意志北部,那里的封建制度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这样的文化程度,至少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看来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小农经营到处都成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越接近于自由的所有者,则军队就越适合于现代的作战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士兵的运动性,而且整个军队的运动性也以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程度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同封建制度相联系的;仅仅运载军官的大量的辎重和随从就阻碍了每一个运动。军队也同整个运动一样缓慢地爬行。专制君主制度中正在兴起的官僚机构在物资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但同时它和大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却引起了大规模的侵吞。如果说官僚机构曾经给军事以某种利益的话,那么它把固有的形式主义和守旧精神带给军队,从而却加倍地危害着军队。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受着所有这些弊病的害。到处受欺骗、遭克扣的俄国军队真是饥肠辘辘,士兵在行军中像苍蝇似地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有能力供养军队,因而才能指望他们的军队有运动性。

因此,就运动性而言,它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性。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而且甚至常常可以代替后者(譬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埃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不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征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军制<sup>17</sup>、瑞士的民军制<sup>351</sup>、法国的全民征集制<sup>352</sup>)多么不同,但是近60年来的经验



证明：在资产阶级和小自由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全民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部人口的7%，而实际作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如1793年秋人口为2500万，那么根据这个计算，全部应有士兵175万人，其中实际作战的应为125万人。后者在边境在土伦附近和在旺代（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所以说125万人差不多是有的。在普鲁士，现在人口约有1600万人，其7%和5%应各为112万人和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正规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国家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

那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召集人口的5%，而在紧急时甚至7%，那么奥地利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充其量也只能达到5%，而俄国则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来说，如果人口为3500万，那么5%便应为175万人。在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人——其兵力由于发行了科苏特纸币而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我们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埃蒙特军队中服役的5万伦巴第人，那么总数就是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部人口的 $2\frac{2}{3}\%$ 。同时，生活在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居民至少尚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200万人，按5%计算，应征集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其中，在本土内，它最多能出动100万人对敌作战。也就是说，它的总兵力从未超过 $2\frac{1}{12}\%$ ，而现役兵力则从未超过 $1\frac{7}{18}\%$ 或 $1\frac{39}{100}\%$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地广人稀，交通工具少，国民生

产低。

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的比例,是与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不一致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这是很清楚的。现在甚至已经可以确定:这个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可以期待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就如同现在混杂的有一部分还构成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的单纯夺取政权距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是一样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对立。

在德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完全集中的前提是:英国也要一起行动;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新的作战方法也同样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发现不能用奇迹来解释;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同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也正如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就工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同样,就作战方法来说,问题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和运动性,而在于把两者提到更高的水平。

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在欧洲战争中,现

在会给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采取完全新的战法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数量更为众多的兵员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 500万而是3 600万的话,那么这个数量的5%就不是125万,而是180万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都相应地有了增高。只有前者才有繁密的铁路网,他们人口的增长,比如与俄国相比,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计算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长期臣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越来越不可能。

但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其力量不能来源于一个国家应动员的5%将随人口的增多而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只能来源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16%,就是说由成年的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或者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 $\frac{2}{3}$ 。但是如果说俄国不在它的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首先是在它的生产上进行彻底的革命,就不能把它可动员的力量由2—3%提高到5%,那么德国和法国不在生产上进行革命而使这种力量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可以动员的力量由5%增加到12%。只有由于利用机器等,每一个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一倍,才能使一倍的人数从生产中解脱出来,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短的时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维持这个5%的比例。

如果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得到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阶级消灭,——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一年的志愿兵,只要他不是士官和后备军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农民和工匠来比,从来都不是好的士兵)——,那么,只有能持武器的人口的限度

才是实际征募的限度；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 15—20% 的人口，并真正使 12—15% 的人口对敌作战。但这样庞大的人数以甚至比现代军队的运动性完全不同的运动性为前提。如果没有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保证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运动。而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战略行动，——各军行动的协调——必须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至于战术行动的指挥则由各个将军来实施。显而易见，在这样条件之下，战争可能而且必须在甚至比拿破仑所需要的更短的时间内结束。就花费来讲，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这样众多的人数所实施的任何一次突击需要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样做又是必然的。

因此，按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必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士兵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成散兵线时，以及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这些士兵一定会比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士兵更加健壮、更加灵活和更加机智。

可惜的是，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没有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一种大兵群作战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对所有这一切也还缺少基本条件；尤其 1852 年是这样。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百分比，同 1789 年相比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 [17]92 和 [17]94 年间——是充满激情的、紧张的，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定是这样。但是那时已经可以看出，在伴随着激烈的内部动荡而产生的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大部分人必须用在国内。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出现，并且恐怕出现的机

会要比以前更多,因为立即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随着联军的前进而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现役军队里去。征募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平民和农民。换句话说,革命将不得不采用现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空论家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在作战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战法和发明一种新的惊人的用兵方法。正像织布机的生产率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果不创造与旧的手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手段,便不能增加三倍一样,在军事艺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重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正确地运用在他以前所发明的物质手段的人。在蒂雷纳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领域发生了革命,由刺刀和燧石枪取代了戈矛和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一般地说,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改造并完善了旧的战术,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庞大的众多军队的方法,而这庞大的众多军队的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方法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巧妙的作战行动中仿效他罢了。

总之,革命将用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来同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作战。军事才能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多兵之旅必胜。

##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两方面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去,同时又怎样运用它们。

(1)**俄国** 俄国军队平时定额号称总共 110 万人,实际上大约只有 75 万人。1848 年后,俄国政府就一直努力使战时定额达 150 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亲临各地视察。俄国现在最低限度已经实际达到平时定额 110 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多扣除:

用于高加索的兵力 .....	100 000 人
用于俄国本土的兵力 .....	150 000 人
用于波兰各省的兵力 .....	150 000 人
病员、各种分遣队等 .....	150 000 人
总计 .....	550 000 人

因此,只剩下 55 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 1813 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许多。

(2)**普鲁士** 如果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编外人员以及一切可能征召的人员被召入伍,这支优秀的军队至少可以有 65 万人。但现在政府至多仅能动员 55 万人。我现在就仅以 50 万来计算。从这个数目中只需要派出比第二类后备军(15 万人)略多的兵力去执行守备等任务。各地都在逐步召集的编外人员和下年度新应征人员(尼古拉对此十分关注),以及不断过境的俄国军队,可以组成足够的预备队以防止国内的任何暴乱企图。除此而外,普鲁士军队的病员也会较少,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河的路程比俄国军队为

短。但是,就像对俄国军队一样,我减去其中的一半,剩下另外一半,即 25 万人可以动用。

(3)奥地利 服役的和归休的士兵——但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 60 万人。这里,我照样减去一半,因为对于帝国三分之二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没有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作国内的预备队,控制起义的群众。因此,剩下 30 万人可用来对付敌人。

(4)德意志联邦 因为这些邦的首脑都居住在莱茵河附近,同时全部联军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差不多完全不需要本国的守备部队去对付内地;在联军对法作战初战获胜后,各邦的预备军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至少可出 12 万人。

(5)意大利各国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 8 万人来计算。

这样,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 130 万人,他们有的已经在服役,有的可以立即征召入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缩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仅仅由恢复健康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即可以在法国边境附近另编第二支拥有 35 万人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的数量一定还要大得多,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作战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召新兵,紧接着第一支军队之后开出去。

第一支军队(130 万人)大约可在两月内全部以下面的方式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的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在去年 11 月备战以来是用不着怀疑的;至于说到俄国军队,那么他们的 3 个最后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雷斯劳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每天以 5 德里计算,由彼得堡到柏林差不多有 45

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河有 16 日的行程,总共 61 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雷斯劳有 48 日的行程,由布雷斯劳到美因茨有 20 日的行程,总共 68 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 40 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 22 日的行程,总共 62 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在上述的强行军之下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么显而易见:就是驻防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要 3 个月的工夫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河畔;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但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而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 15—20 天。但是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治情况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所以会有更多的部队派到那里去。所以,俄军行军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尔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缅涅茨,就是说大约缩短了 60 德里的行程,相当于 12 个行军日和 4 个休息日。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可以在休息日(每隔三天)至少乘车移动 5 德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可以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车马和炮手可以行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以前的方法更早到达目的地。

从上述的一切,我认为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到莱茵河畔集中:

#### 第一支军队

##### 1. 在莱茵河畔和皮埃蒙特附近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 ..... 750 000 人



俄军 .....	300 000 人
	1 050 000 人
2. 第二线:	
相隔 10 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	250 000 人
总计 .....	1300 000 人
	(如上所述)

### 第二支军队

1. 联军各小成员国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	
普军、奥军等 .....	200 000 人
2. 在途中的相隔 20 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 .....	
	150 000 人
	350 000 人
两支军队总计 .....	1 650 000 人

实际上,在现代的条件之下,只要五六个星期就可把 30 万俄军调动到莱茵河畔,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小联盟军队的上述兵员也可以到达莱茵河畔;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时候,联军的部署,就向法国进军这点来说,还未必像现在这样有利。尽管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交战的时候,俄军还是到达了莱茵河畔。

法国能出多少兵力来抵御联军呢?

(1)正规军约 45 万人,其中 5 万人在阿尔及尔,不能调出;在其余 40 万人当中还应当减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形势不稳定地点驻屯的少数分遣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有 25 万人。

(2)现在红色党派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士兵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 6 个年龄段的人,也就是对于由 27 岁

到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在征召时出8万人。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该地气候所受的损失,12年内的正常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经陷于混乱的时候善于以各种方式逃避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6个年龄段的48万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士兵减少到30万人。其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的人来补充。可见,只要采取好些的办法,剩下的15万人就能毫不困难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

(3)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全民征集制武装,不管人们对于这种次等炮灰还有什么其他叫法。在这一类人中,除了还需要征集的约一万多的别动队之外,没有一个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士兵更善于使用兵器。固然,法国人学会这行要快些,但是两个月仍然是很短的期间。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4个星期之内完全随营训练,那只是因为他有最优良的干部;可是最近的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队伍的瓦解。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法国革命者,是有传统的,他们将首先高喊:实行全民征集制!200万士兵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将重复[17]92—[17]93年那样的蠢事,如果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步训练他们,有200万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必须估计到,在两个月内敌方会有100万现役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胜利抗击这百万大军。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么他们又将以200万人使历史重演,也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过多,由于时间短促,他们实际上将一无所获。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8个星期内训练和编组150万人,实际上结果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资源,使军队甚至连一

个适用的营都增加不了。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称职的陆军部长,懂得一点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同时如果没有人因为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给他造成愚蠢的障碍,那么,他才能在可能范围内自主行事,才能做很多事情。那样,大体上必须按如下计划行事: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可靠的乡村农民自卫军;(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要塞勤务由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来执行。从军队中只派出最必要的一部分部队。为了防卫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梅斯、里尔、瓦朗谢讷这些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除了它们自己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支队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可以用来担任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应当集中在教练营地,由不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士官来训练,以补充现役部队中的缺额。这个营地可以建立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sup>67</sup>的区域。

现役部队,要是留在法国境内,就必须增加两倍,就是说,应由40万人增加到110万人。这一步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把每一个营变为一个团,同时不可避免地普遍提升军官和士官的职务。在促使他们尊重革命方面,提升的作用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干部队伍必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逐步实现。同时把军官中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过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变出军官的条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本来,在法国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中还普遍具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陆军部有力领导之下,在战争胜利的机会存在的条件之下,特别是对叛乱者和逃兵实行惩一儆百,这类军官在最初时期是完全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的。军

事学校的学生以及桥梁公路工程局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行动之后，下级军官的军事才干就会开始发挥出来（这在法军中是极其常见的），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火的锻炼，便能够指挥一个步兵连。

至于士兵本身是：

现役士兵 .....	400 000 人
再次应召服役的士兵 .....	300 000 人
有待召集和训练的士兵 .....	500 000 人

总计 120 万人。如果去掉 10 万病员，则为 110 万人。在这个名额中可以用于作战的：

现役士兵 .....	250 000 人
再次应召服役的士兵 .....	150 000 人
新兵 .....	<u>400 000 人</u>

总计 .....

总计 .....	800 000 人
----------	-----------

用这样一支军队可以干些什么，以后是会清楚的。40—50 万新兵补充现役军队并且把他们同在编的和再次应召服役的兵士混编在各团各营里进行两个月的训练，这只要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人员都可以用来补充步兵和炮兵，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可以把一名新兵训练成步兵和能初步操纵火炮的炮手，但决不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不会有很大的增长。

整个这一武装计划要求必须具有这样一位称职的陆军部长，他必须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具有各兵种的战略、战术和具体知识，同时还要具有应有的精力、机敏和果断。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共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色党派

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的，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像通常一样，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被认为，也自认为是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理所当然能胜任各种职务，他企图扮演卡诺的角色，颁布征兵的法令，坚决地破坏一切；他很快就会智穷才竭，于是一切事将听任下级旧官吏按常规旧习处理，于是敌军就会迫近巴黎城下。但为了对付欧洲的联军，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帕希、布绍特，甚至也不是卡诺，而必须是拿破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除非敌人特别愚蠢，或者他得特别走运。

不应当忽视，在对联军兵力的所有计算中，对总兵力作了最低的估计，而对各项扣除则作了最高的估计；因此，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就会多于上面的估计，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将少于上面的估计。但是对于法国的估计却与此相反，即对法国人所能支配的时间尽可能估计得长些，对他们所能编组的总兵力估计得很高，而各项减员则很少；因此，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作了最大限度的估计。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推算（没有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和联军可能犯的大错估计在内）描绘出一幅对革命尽可能有利的情景。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前题，那就是革命和敌军的侵犯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法国最后一次内战6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能肯定，热狂的正统派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发动一场短命的暴动。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像1793年里昂、土伦等地那样暴动的可能性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政党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机会，即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能够胜利地解除暴乱的各县和各阶级的武装。

至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起义能给革命造成的有利条件，我们在下面就要谈到。

##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实际的作战行动。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围绕巴黎画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圆周在南部将在蓬德博瓦桑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尚贝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圆周虽在个别地方离开该河，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那么从这条边境上的不再以阿尔卑斯山脉为屏障的那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大约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这样一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和它全部的地理条件就相适应了。由尚贝里到鹿特丹的这条单弧线，使法国边境上唯一暴露的最靠近首都那段上的各点，到巴黎的距离相等，约为 70 德里，或者 14 日的行程，同时这段边境又可以为广阔的河流所掩护。认为莱茵河是法国自然疆界的这种论断在军事上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但是莱茵河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各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由各方面威胁它，就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当集中的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甚至在敌军的作战根据地内，这种分进合击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如此，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军队对法国所

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采取分进合击,因为:(1)占领巴黎即等于征服了法国;(2)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段边境,都不得暴露,不然,法军就可以向联军境内,及其军队的后方,派遣军队而引起骚动;(3)每一支联军对法国作战都需要投入大量军队,为了保证给养就需要许多条作战线。

双方军队都必须加以掩护的这段边境,是由尚贝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以不予考虑。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脉为屏障,而且离巴黎越来越远,因为它是上述圆周的切线。这段边境只有在下列的场合之下才须注意:(1)萨瓦山筑垒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筑垒的隘口在法军手中的时候;(2)企图在海岸沿岸进行牵制行动的时候,但是对此一定要有特别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边境其他一切地点都有安全保证之后,企图像 1796 年拿破仑那样,在这里采取攻势的时候。在一切其他情况下,这一段边境就离得太远了。

因此,积极的军事行动,无论对于联军或者对于法军都仅仅限于由尚贝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一线和位于该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上。而且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的地形,好像专为防御而设,同时在这里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恐怕是再好没有了。

由罗讷河到摩泽尔河,边境为一条漫长的、难行的只有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才能勉强通过的山脉——汝拉山——所掩护;孚日山脉与之相接,在其延长线上有霍赫瓦尔德山和伊达尔林山。这两座山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孚日山脉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泽尔河和马斯河之间,通巴黎的道路为阿登高原所掩护,在马斯河的彼岸又为阿戈讷所掩护。暴露的只剩下由桑布尔河到海边这一区域,但是在这

里任何一支军队越前进,其处境就越危险,因为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行动,他们就有从比利时方向被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讷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好几个省。

由汝拉山与孚日山脉会合点向西南沿奥弗涅山脉蜿蜒着一条山脉,它形成北海及大西洋这一边与地中海那一边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泽尔河、马斯河、马恩河、塞纳河和约讷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约讷河和卢瓦尔河之间,又蜿蜒着许多绵亘的山脉形成支脉;这些山脉仅为几条道路所切断,又使各条河谷彼此分开。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通行,但却是很贫瘠的。没有一支大的军队能够在那里支持很长的时期。

如果敌人的军队也通过这个山区,以及通过位于马斯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同样贫瘠的香槟高原地带,那么他们就进入塞纳河流域。正是在这里才充分显示出巴黎在军事上的有利地位。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兹河口是由许多条几乎成平行的弧形流向西北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是约讷河、塞纳河、马恩河、瓦兹河和埃纳河;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央。由地中海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到巴黎去的主要道路都通过这些河谷,并且同这些河谷一起汇集到巴黎。因此,防卫巴黎的军队常常可以比进攻的军队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由一个受威胁地点调动到另一地点,因为同心圆中内圆周界较短。巧妙地发挥这种优点,也就是沿内圆周界不懈地运动,曾经使拿破仑在他 1814 年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力牵制全部联



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月之久。

弗·恩格斯写于 1851 年 4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载于 1914 年 12 月 4、11  
日《新时代》第 9、10 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  
分第 1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sup>353</sup>

宪法前面有一个夸夸其谈的总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 法兰西宣布自己为共和国。2. 法兰西共和国是民主、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4. 它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基础是家庭、劳动、财产和社会秩序。5. 它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也要求其他国家尊重它的独立。它不进行任何侵略战争,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罗马呢!)。<sup>11</sup>

六月起义<sup>5</sup>以前,国民议会曾经制订过宪法。其中除了其他许多承认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以外,还有如下几条:

**第6条** 教育权是全体公民通过国家的免费教育获得全面发展身心和智力的权利。

**第7条** 劳动权是每个社会成员靠自己劳动谋生的权利。因此,社会必须对一切具有劳动能力而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人提供工作。

**第9条** 赡养权是孤儿、病弱人和老年人受国家赡养的权利。<sup>①</sup>

---

① 《国民议会通过的最初宪法草案》,见1848年6月20日《总汇通报》第172号。——编者注

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的胜利以后大胆起来了，它把这三条从

## 宪 法

中剔了出去，现在宪法是这样写的：

### “第一章

[第1条]最高权力属于法国公民整体。这种权力是不可剥夺的和永存的。个人、部分人民均无权行使这种权力。”

### 第二章 宪法保障的权利

“[第2条]非按法律规定，不得逮捕和监禁任何人。”

“第3条 凡居住在法国领土上的公民，其住宅不受侵犯，非经法律规定的  
手续，不得侵入公民住宅。”

请注意，法国宪法在这里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加一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的例外！同时，拿破仑皇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所规定的一切例外情况不仅原封未动，而且在六月革命之后还大大增加了。例如，1849年8月9日公布的法律规定戒严应由国民议会宣布，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应由总统宣布，而军事当局却有权将一切政治犯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其次，这项法律还规定，军事当局不论白天和黑夜均有权进入任何人的住宅进行搜查，有权没收一切武器，驱逐一切在被宣布戒严的地点没有住所的人。

对于外国人，他们在法国国土上所享受的唯一“权利”就是，只要

## THE CONSTITUTIONS OF EUROPE,

COMPILED FROM ORIGINAL SOURC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EADING CONTINENTAL DEMOCRATS.

## No. 1.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RENCH REPUBLIC ADOPTED NOVEMBER, 4, 1793.

A rhetorical preamble introduces the Constitution, in which the following passages deserve notice:

1. France declares itself a republic. 2. The French republic is democratic, one and indivisible. 3. Its principles are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and its foundations are Family, Labour, Property, and Public Order. 4. It respects the independence of other nations, and will make its own respected aim. It will undertake no aggressive war, and will never employ its force against the liberty of any people. [Rome.]

Before the invasion of June, the National Assembly had drawn up a constitution, which contained among many other recognitions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 the following articles.

Art. 6. The right to education is the right possessed by all citizens as the means for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ir physic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faculties, by a gratuitous educa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state.

Art. 7. The right of labour is the right of every member of society to live by labour. Therefore it is the duty of society to supply with work all able bodied persons who cannot otherwise obtain it.

Art. 9. The Right to support is the right of the orphan, the infirm and the aged to be maintained by the state.

After the victories of June 1848 had given courage to the middle-class, they erased these three articles from

## THE CONSTITUTION,

which now stands as follows:—

"CAP. I. Sovereign power rests in the entirety of French citizens. It is inalienable and eternal. No individual, no fraction of the people has the right to its exercise."

"CAP. II.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No one can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except as prescribed by the law."

"§ 3. The residence of every one on French territory is inviolable—and it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it otherwise than in the forms prescribed by law."

Observe here and throughout that the French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liberty, but always with the proviso of exceptions made by law, or which may still be made! and all the exceptions made by the Emperor Napoleon, by

the restoration, and by Louis Philippe, have not only been retained, but, after the June-Revolution, immeasurably multiplied. Thus, for instance, the law of the 9th August 1849, relative to the State of Siege, which the Assembly, and during its prerogative, the President can enact, and which gives to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the right of bringing all political offenders before a court-martial. It further grants them the power to enter and search any house by day or night, to seize all arms, and to remove all persons not having a domicile in the place declared under a state of siege.

As to *strangers*, the only "right" they enjoy as French soil, is to be arrested and driven out of it, as often as the police authorities think proper.

As to *Frenchmen*, any French citizen can be arrested, if a single functionary issues his mandate to that effect!

"§ 4. No one can be judged by others than his natural judges. Exceptional tribunals can be forme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or pretext."

We have already seen that, under "the state of siege," a military tribunal supersedes all others. Besides this, the Assembly established an "exceptional tribunal," called the "High Court," in 1848 for a portion of the political offenders; and, after the invasion in June, transported 15,000 insurgents without any trial at all!

"§ 5. Capital punishment for political offences is abolished."

But they transport to *four-stricken settlements*, where they are executed, only a little state slowly, and far more painfully.

"§ 6. Citizens have a right to assemble, to meet peacefully and unarmed, to petition,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through the press and elsewhere. The enjoyment of these rights has no other limits, than the equal rights of others, and the public safety."

That the Emption made by the "public safety," takes away the enjoyment of the right altogether, is clearly shown by the following facts:—

1.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By the laws of August 11, 1848, and of July 27, 1849, not only censorship for newspapers were re-established, but all the restrictions made by the Emperor Napoleon, and since, were renewed and made more stringent.

The law of July 23, 1850, *ruins* the security.

载有卡·马克思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的

《寄语人民》杂志的一页



警察当局认为必要,他们就随时会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对于**法国人**,任何一个官吏下一道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法国公民。

**“第4条** 任何人除他的正常法官外,不受其他人审判。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借口设立特别法庭。”

我们已经知道,在“戒严”时军事法庭取代一切其他法庭。此外,国民议会为了审判一部分政治犯在1848年建立了以“最高法庭”为名的“特别法庭”,而在六月起义之后,国民议会根本未经任何审判就流放了15 000名起义者!

**“第5条** 废除政治犯的死刑。”

但是,政治犯被流放到寒热病流行的地区,在那里处死他们只不过延缓些时日,而痛苦则要大得多。

**“第8条** 公民有结社、举行和平的非武装的集会、请愿以及通过报刊和其他方式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除了要保证其他公民有同等权利和维护公众安全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以“公众安全”为理由的限制使上述权利根本无法行使,这一点从下面的几个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1. **新闻出版自由**。——1848年8月11日和1849年7月27日的两项法律不仅恢复了关于报纸交保证金的规定,而且恢复和加强了拿破仑皇帝及其继任者所规定的一切限制。

1850年7月23日的法律增加了保证金的数额并且将有关法律规定的作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周报、杂志和其他期刊等等<sup>354</sup>。此外,这项法律要求每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的署名,并且重新规定征收报纸

印花税。不仅如此,这项法律还规定征收连载小说、纯文学小册子的印花税;如不遵循这些规定,则将处以巨额罚金。自从上述的法律颁布以后,革命报刊完全绝迹了。每一周总有一家报纸或一本小册子被控告、罚款和查禁,对这种迫害,革命报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资产阶级坐在陪审席上压制工人的报纸。

这种制度在1850年7月30日的恢复剧本检查的法律中达到了顶点。于是,言论自由便从它的最后的文学掩避所中被驱逐出去了。

2. 结社和集会权。——1848年7月28日—8月2日的法令,使俱乐部受到警察局许多规则的限制,几乎取消了一切自由。例如,俱乐部无权通过带有立法性质的决议等等。这项法令使一切非政治性的组织和私人集会完全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由警察任意摆布。

1849年6月19日—22日的法律规定,政府在一年内有权封闭一切俱乐部和禁止未经政府同意的集会。<sup>①</sup>1850年6月6日—12日的法律规定,把这种权力再授予政府一年,实际上这种权力已经扩大到那些可能不合政府口味的议员竞选集会上。结果,从1848年7月起,所有的俱乐部和公众集会,除保皇派和波拿巴派的俱乐部之外,实际上都停止了活动。

1849年11月29日的法律规定,凡是联合起来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一律判处三个月以下徒刑和3000法郎以下的罚款。这项法律还规定,工人在刑满后要受警察当局五年的监管(这就意味着贫困、破产和迫害)。

结社和集会权就是如此。

---

① 见本卷第179—181页。——编者注

**“第9条 自由教学。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享有教学自由。”**

这里是故技重演。“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完全取消这种自由的条件。

1850年3月15日的法律规定将整个教学系统置于教士的控制之下。

这个部门的主管机关是四名法国大主教所领导的**最高公众教育委员会**。这项法律规定，所有地方学校的教员，即使他们是市镇<sup>①</sup>委员会或者教区委员会推选的，都必须服从 recteurs，即督学的意志。教员必须接受与军队中的服从和纪律相类似的条件，服从督学、市长和教士；可见，根据上述法律，教学自由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民政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允许，谁也无权教学。

**“第11条 财产权不受侵犯。”**

**“第14条 保障国家债务。”**

**“第15条 只能为公众需要征税。每个公民须根据本人的财产和能力纳税。”**

### 第三章 国家权力

此章规定：

**“1. 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不得世袭。”**

**“2. 权力分立是自由政府的基本条件。”<sup>②</sup>**

---

① 法国共有 38 004 个市镇，小者不满 100 人，大者有巴黎一类的大城市。——编者注

② 这两段在宪法中是第 18、19 条。——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旧宪法的荒谬。“自由政府”的条件不是权力的分立,而是权力的统一。政府机构不能过于简单。骗子耍的花招常常就是使政府机构复杂化,神秘化。

#### 第四章 立法权

立法权由包括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的议员在内的75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来行使。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会议必须有900人出席。选举制度是按居民的人数制定的。下面四条,有必要全文照录。

**“第24条** 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投票方式是秘密的。”

**“第25条** 凡年满21岁,具有政治权和公民权的法国人,均为不受任何选举资格限制的选民。”

**“第26条** 凡年满25岁的选民均可被选为议员,而不受居住资格限制。”

**“第27条** 剥夺法国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根据由选举法规定。”

上面几条同宪法所有其他各条确实是按同样的精神表述的。“凡法国人均为享有政治权利的选民”,但是,“选举法”必须规定,哪些法国人不得享有政治权利!

1849年3月15日的选举法把除政治犯以外的一切罪犯都划入这个范围。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把所有被判定为“反对早已成为定论的舆论”和反对新闻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这个范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三分之二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

在法国,“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这句话的本意就是如此。

**“第28条** 凡担任公职的人不得同时担任人民的代表。代表在议会任职期间不得担任行政任命的有薪职务。”

这两点规定受到以后决定的限制,实际上近乎被取消。

**“第30条** 选举分省在各选区凭选票进行。”

**“第31条** 国民议会任期为3年,期满时必须举行新的选举。”

**“第32条** 国民议会应连续开会,但是它有权休会并在休会期间任命一个由25名议员和议会常务局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代表。该委员会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召集议会会议。”

**第33—38条** 议员可以再次竞选,他们不受原有的任何规定约束,他们不受侵犯,不得由于在国民议会里发表意见而被起诉和判罪,他们可以得到他们的薪金而不得拒绝。

至于“议员不受侵犯”和他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国民议会的多数在6月13日<sup>①</sup>以后通过了一项新的条例,规定国民议会议长有权发布命令谴责议员,处以罚款,褫夺他的薪金和暂时把他逐出会场,——这样一来,也就完全取消了“言论自由”。1850年,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议员甚至在会议期间可以因债务诉讼而被逮捕,如在一定期间内不清还债务则可剥夺其议员资格。

所以,无论议员的辩论自由或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在法国都是不存在的,而只有债权人的不受侵犯性。

**第39—42条** 议会会议必须公开。不过议会可以根据一定数量议员的要求转为秘密委员会。必须获得过半数议员通过,法律才能生效。除紧急情况外,不经过每隔五日宣读一次的三读程序,议案不得通过。

这种从英国“宪法”抄袭去的程序,法国在任何一个重要场合都没有遵守过,甚至在可以说是最必要的情况下也没有这样做过。例

---

<sup>①</sup> 1849年6月13日。——编者注

如,5月31日<sup>①</sup>的选举法在一读之后就通过了。

## 第五章 行政权

**第43—44条** 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总统必须是年逾三十,从未丧失过法国国籍,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

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丧失过法国国籍,不仅曾经当过英国特种警察,而且还入过瑞士国籍。

**第45—70条** 共和国总统任期为四年,任职期满后不足四年不得重新当选。此限制也适用于他的六亲等以内的亲属。选举必须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如总统在任何其他日子当选,他的权力也行使到他当选后的第4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止。总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获得绝对多数方能当选。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过半数有效选票,但至少应得到200万张选票,国民议会可以由五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中选出总统。

总统必须宣誓忠于宪法,他可以通过部长将提案提交国民议会审核,可以部署军队,但是不得亲自指挥军队;他无权割让法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也无权解散或中止议会会议和停止宪法的效力。由他负责谈判和批准一切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只有经过议会批准才最后具有约束力。他不经议会同意无权宣战,他可以行使赦免的特权,但无权允许大赦。最高法院判决的犯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赦免。总统可延迟公布法律,要求议会重新讨论,但是这种讨论仅限一次。总统可以任命大使和部长,可以将公民选举出来的市长、省议会议员、国民自卫军军官等人员免职三个月。总统的一切命令,除部长本人

<sup>①</sup> 1850年5月31日。——编者注

的免职令以外,均须由部长副署。总统、部长和政府官员都分别在各自的部门中对政府的每一项措施负责。总统可能影响、延误或阻挠议会正当行使其职权的任何行为,均被看成是叛国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的权力应立即予以剥夺,违抗总统的命令则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总统的权力应立即转交给国民议会,而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须立即集合,召集陪审员就位,以审判总统和他的同谋者。

总统应有府邸,他的年俸为60万法郎,或24 000英镑(他目前领取216万法郎,或86 400英镑)。部长按其职务需要可出席国民议会,并按他们的愿望作次数不限的发言。总统在当选后的一个月内在指定三名副总统人选,国民议会在其中选出一名共和国副总统。副总统要进行跟总统同样的宣誓,他不得跟总统有亲属关系,当总统无法行使职权时,代行总统的职权,国务会议开会时,他担任主席。如果总统职位由于总统逝世或某种其他原因而出缺,则必须在一个月之内重新选举总统。

## 第六章 国务会议

**第71—75条** 国务会议是唯一讨论由内阁提出和可能由国民议会提出的议案的审议机关。

## 第七章 国内行政机关

此章内容有关公务员、高级官员、市镇和省议会。唯一能够兑现和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实施的是下面一个条款:

**“第80条** 总统经国务会议同意可以解散省议会、县议会和市镇议会。”

## 第八章 司法权

一般来说,此章只不过是拿破仑皇帝的法律的再版。但是,下列几点补充是值得注意的:

**“第 81 条**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诉讼,一律免费。”

这太微不足道了,没有人为了免费去砍掉脑袋的!

**第 91—100 条** 有关**最高法院**。它具有审判总统的特殊权力,它也可以审判部长和所有国民议会认为应当由它审判的政治犯。

这个“最高法院”的成员是 5 名由最高上诉法院(法国的最高法院)从它的成员中选出的法官和 36 名从各省议会的成员中挑选出来的陪审员。这是完全贵族化的机构。这个法庭到目前为止审判过的唯一的一批人是 1848 年五月十五日案件的被告(巴尔贝斯、布朗基等人的名字均在被审判之列!)和因 1849 年六月十三日事变受牵连的议员。

1848 年 8 月 7 日的法律规定,凡是没有读写能力的人一律从陪审员的名单中去掉,于是三分之二的成年居民就被取消了陪审员资格!

## 第九章 武装力量

一切原有的军法都原封未动。士兵犯罪不受民事法庭审判。下面的条款可以勾划出这个宪法的精神。

**“第 102 条** 每个法国人,除法律规定者外,都必须服兵役和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务。”

每个有钱的公民都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根据目前正在讨论的二读已经结束的法律,工人阶级全部被排斥于国民自卫军之外!此外,总统有权解散各个地区的国民自卫军一年,而实际上,国民自卫军在法国一半领土上都已经解散了!

### 第十章 特别法律

**“第110条** 国民议会将宪法寄托在全体人民的警惕性和爱国心上”,而“警惕的”和“爱国的”人民则被寄托在最高法庭的宽厚仁慈上!6月13日就是如此!

### 第十一章 宪法的修改

**“第111条** 如果国民议会在闭会期间要全部或部分修改宪法,则应采取如下的方法:

议会所提出的要求只有经过每隔一月举行一次,连续三次辩论以后才能成为法律,而且需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投票人不得少于500名。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国民议会只有三个月任期,并且除非有异常紧迫的情况,不得讨论其他任何问题。”

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运用宪法的方法。读者一眼就会看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意图的漂亮话。宪法的措词本身使破坏宪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使条款本身变得完全无效。例如:“投票是直接的和普遍的”——“除法律将来规定的情况外。”

因此,不能说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它剥夺了三分之二的人民的选举权)完全违反宪法。

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说法：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准许完全的自由，写下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解决，这样的花招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已经从法国原版中抄袭去了。在1830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以前通过的一些宪法里就用过同样的花招。

人民！你们在取得政权之前，一定要像重视细节一样重视原则。英国议会里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sup>355</sup>

在整个宪法里，只有关于总统选举的条款（第45条）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条款（第111条）是无保留的确实的条款。这是仅有的可能被破坏的条款，因为只有这些条款不具有与条款本身相矛盾的内容。

这两个条款是1848年的制宪议会直接用来对付波拿巴的，因为波拿巴用阴谋手段取得总统的职位，使议员们感到惊恐。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永远存在的矛盾足以说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宪章中寻找，而应当在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以这个宪章为基础制定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在法国，专制统治极其猖狂，下面一些对付工人而采取的限制可以证明。

每个工人都要从警察局领个小本子，小本子的第一页写着他的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或工作以及他的特征。工人必须在小本子

上写明雇用他的主人的姓名和离开主人的原因。而且不仅如此,小本子还要交给主人,由主人把它连该工人的鉴定一起存放在警察局。当工人辞工的时候,他必须从警察局领回小本子,不出示小本子,就无法得到别的工作。这样一来,工人的生计就完全取决于警察局。而且还不仅仅限于这些,这个小本子还要当护照用。如果哪个工人被认为不可靠,警察就在小本子上注明:“bon pour retourner chez lui”[应回乡],这个工人就得返回原籍!这些可怕的限制是不需作什么注释的!请读者来想象一下它们所起的全部作用和追踪它们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无论封建时代的农奴或印度的贱民,他们都无法相比。所以,法国人渴望着起义时刻的来临,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爆发的怒火有如暴风骤雨,是不足为奇的。工人们在1830年表现了宽厚精神;他们在1848年也表现了宽厚精神;但是从那时起,他们的自由被出卖,他们血流成渠,每个法国监狱都挤满了无期徒刑的囚犯,15 000人一下子全都被流放,而现在工人们正遭受着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可怕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害怕人民,他们使尽最后的力量推迟清算时刻的来临,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们的内部是不统一的。他们抱着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野心,最突出的是

### 拿破仑的阴谋。

目前问题在于,总统的任期是否会延长,宪法是否会修改。拿破仑不公开破坏宪法,就无法连任,因为,第一,他只有在他任期满后经过四年才能重新当选,第二,宪法只有在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员的同意之下才能修改。而主张修改宪法的人还达不到这样的多数,因此,没有可能按照宪法再次当选为总统。



因此，波拿巴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向宪法挑战，诉诸武力，以斗争来解决问题，或者遵照法律在规定日期放弃自己的职权。在后一种情况下，卡芬雅克将会成为总统，这样，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大功告成了。而在第一种情况下，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目前拿破仑的阴谋就是力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是拿破仑的敌人，——这人民是知道的，于是他们之间就有了相互一致的联系。但是，拿破仑跟资产阶级一样，都被作为压迫者而受到憎恨；如果他能够从自己的肩上卸下这个包袱，把它完全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肩上，那就会消除一大障碍。

从他不久前在第戎发表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正是要努力实现这一点。他说：

“一切糟糕的法律国民议会都能通过，而我提出的一切好的法律，它不是否决，就是修改得残缺不全。它反对我改善你们处境的一切意图，并且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地方制造障碍来阻挠我的改进措施。”

可见，他力图将对自已的打击引向国民议会。同时，军队与其说拥护国民议会，不如说拥护他；人民贫困不堪，几乎一有点变动都会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好转，而有觉悟的人还只是少数。

这样，如果资产阶级一发现波拿巴的决心，就冒险在卡芬雅克的领导下起来斗争，人民必定会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而波拿巴就会和人民一起去斗争。他们联合起来，力量就会比国民议会强大多了。但是，那时就会面临紧急关头；国民议会看到人民可能取得胜利，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肯要拿破仑帝国或专制，而不要民主共和国和社会共和国，因此，他们会跟总统达成协议。后者则由于对民主政权害怕的程度并不亚于议会，必须接受议会的帮助。军队，或者至少一部分军队由于斗争的激情、冒险和“光荣感”会更加靠拢拿破仑；

斗争必将采取新的方式,这将是军队和**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的斗争。结局如何将取决于人民的勇敢、自觉和团结。拿破仑的阴谋在于,先是挑拨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再挑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最后利用军队反对这两者:

未来蕴藏着重大的事变,而法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历史所提供的最值得注意研究的对象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 1851 年 5 月  
24 日—6 月 8 日之间

载于 1851 年 6 月 14 日《寄语人  
民》第 7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附 录



## 救济德国流亡者的呼吁书<sup>356</sup>

德国在疯狂的战争喧嚣中又建立了“秩序和安宁”；在硝烟弥漫的城市废墟上在杀气腾腾的隆隆炮声中又恢复了“财产和人身的安  
全”；军事法庭简直来不及把一个又一个被打碎了脑袋的“叛逆者”送进坟墓；监狱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谋反者”；而唯一还存在的法就是军事管制法，——从那时起，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便无家可归，流落国外。

他们一天比一天多，这些失去祖国的人们灾难也日益深重；他们从一个地方被驱逐到另一个地方，早上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过夜，而晚上又不知道明天早晨能在何处觅食。

无数的流亡者遍布瑞士、法国和英国。这些不幸的人来自德国各地。凡是在维也纳街垒中同黑黄<sup>①</sup>联盟进行过战斗以及同耶拉契奇的骑兵队厮杀过的人，凡是在普鲁士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的兵痞手中逃跑的人，凡是在德累斯顿用枪炮捍卫过帝国宪法的人，凡是在巴登以共和国军人身分同诸侯的联合十字军作过战的人，——不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和利益的拥护者，现在则由于同样遭到驱逐

---

① 黑和黄曾是代表奥地利帝国的颜色。——编者注

和同样遭受苦难而团结起来了。

半数国民身穿破衣烂衫在他人门前乞讨。

我们的流亡同胞也流落在这世界繁华都市伦敦的寒冷街头。每一艘横渡海峡的轮船都从大海彼岸运来一批失去祖国的人；在这个城市的各条街道上都可以听到被流放者用我们的母语发出的怨声。

这种困苦的境况深深地触动了居住在伦敦的许多热爱自由的德国人。因此，今年9月18日召开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sup>32</sup>和来到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大会，建立了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委员会。被选进委员会的有下列人员：

卡尔·马克思，原《新莱茵报》编辑；

卡尔·布林德，前巴登-普法尔茨政府驻巴黎特使；

安东·菲斯特尔，前维也纳奥地利国会议员；

亨利希·鲍威尔，伦敦鞋匠；以及

卡尔·普芬德（本市画家）。

委员会将每月向全体大会提出公开财务报告，同时把报告摘要刊登在德国报纸上。为了避免一切误解，特作下列规定：今后委员会的任何委员都不得从委员会的出纳处领取任何救济金。如果委员会的某个委员需要救济，那就不得再担任委员会委员。

朋友们和兄弟们，我们请求你们尽力而为。如果你们希望那受压制的和被束缚的自由重新得到恢复，如果你们同情你们的优秀的先进战士所受的苦难，那我们是不必特别提醒你们的。

所有捐款请寄：伦敦索霍广场迪恩街64号鞋匠亨利希·鲍威尔。信封上请注明：“流亡者委员会收”。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sup>211</sup>

---

(签名)安东·菲斯特尔 卡尔·马克思 卡尔·布林德  
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1849年9月20日于伦敦

写于1849年9月2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9年9月25日《西德意志报》10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 德国政治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收据<sup>357</sup>

兹收到经爱·蒂森先生从斯德丁转来的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的七英镑期票。为此我们谨以德国流亡者的名义向捐赠人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sup>211</sup>

卡尔·马克思 卡尔·布林德

亨利希·鲍威尔 卡·普芬德

1849年10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0月26日《自由  
射手》第8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 德国政治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收据<sup>358</sup>

兹收到经 G·蒂森先生从斯德丁转来的 11 英镑 14 先令, 我们谨以贫困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名义对此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sup>211</sup>

签名: 卡尔·马克思博士

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1849 年 11 月 13 日于伦敦

载于 1849 年 11 月 23 日《北德意志自由报》第 20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以及关于建立社会民主主义 救济委员会的决议<sup>359</sup>

今年 11 月 18 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sup>32</sup>和在伦敦的大部分政治流亡者召开了大会, 听取了上次会议任命的救济委员会<sup>211</sup>的财务报告。9 月 22 日以来收入总计:

	磅	先令	便士
(1) 伦敦工人协会捐款.....	2	8	7 $\frac{1}{2}$
(2) 伦敦德国读者协会捐款.....	2	15	—
(3) 伦敦《北极星报》编辑部捐款.....	—	5	—
(4) 伦敦埃代乌斯公民捐款.....	—	1	—
(5) 伦敦西弗特公民募集.....	—	9	6
(6) 伦敦哥林格尔公民捐款.....	1	5	9
(7) 伦敦 J·鲍威尔公民募集 .....	7	1	6
(8) 经海德克公民转来巴黎德国 工人的捐款 .....	—	12	1
(9) 经克雷普公民转来哈德斯菲 尔德的捐款 .....	3	—	—

(10)普鲁士斯德丁 <sup>①</sup> 的捐款 .....	18	14	—
总计 .....	36	12	5 $\frac{1}{2}$

今年9月22日至11月18日发给流亡者：

	磅	先令	便士
(1)克莱纳.....	3	17	2
(2)钦斯基.....	3	17	4
(3)弗勒利希.....	2	2	1
(4)亨泽.....	3	7	6
(5)埃格纳.....	1	19	—
(6)W·特普弗 .....	1	11	7
(7)J·特普弗 .....	1	4	4
(8)发给流亡者布莱、贝格曼、奥索巴、 韦瑟利、布劳利许和克莱因共计.....	2	8	10
(9)凭借据付给流亡者、商人绍普 及其家属 .....	4	—	—
(10)印刷费和捐款簿费 .....	1	15	2 $\frac{1}{2}$
总计 .....	26	3	$\frac{1}{2}$
收入总数 .....	36	12	5 $\frac{1}{2}$
支出总数 .....	26	3	2 $\frac{1}{2}$
库存现金 .....	10	9	5

其次，收到的衣服已分发给流亡者。

上述财务报告经大会一致通过。一切支出都有单据，哈德斯菲尔德和斯德丁两地的捐款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请他们派代理人来

① 见本卷第702、703页。——编者注

伦敦查阅这些单据。

由于安·菲斯特尔和卡·布林德两位委员已经离去，委员会的人数不全，由于另一个同我们的委员会相对立的、不属于工人协会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流亡者的委员会正准备筹建，因此，本委员会已把委任状退还协会。协会为此通过了如下决议：

(1)德意志工人协会赞赏前委员会的活动，并从本协会内部选出五个会员，组成新的委员会，定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把上届委员会的余款移交给该委员会。(2)委员会以救济社会民主党党员为主。但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并不排除救济其他倾向的流亡者。(3)委员会每月向工人协会提出财务报告，然后进行改选。报告刊登在《德意志-伦敦报》、《北极星报》、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科隆的《西德意志报》、汉堡的《北德意志自由报》、柏林的《民主报》、《瑞士国民报》、纽约的《快邮报》<sup>①</sup>和《州报》<sup>②</sup>上。(4)捐款人有权亲自出席听取每月的财务报告，如他们不在伦敦可派代理人前往检查账目、单据和库存现金。(5)工人协会任命下列人员为委员会委员：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维利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

本委员会公布上述财务报告和工人协会决议，同时请把捐款送交伦敦索霍广场迪恩街 64 号亨利希·鲍威尔。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奥古斯特·维利希

---

① 《德意志快邮报》。——编者注

② 《纽约州报》。——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1849年12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2月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4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招股启事<sup>360</sup>

大家都知道,《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卡尔·马克思领导下在莱茵河畔科隆出版的日报。本报成功地代表了最彻底的德国民主派的方向,尽管有种种暂停出版的禁令和戒严,尽管屡屡被控告和迫害,尽管有极大的困难、诸多的敌对行动和各式各样的障碍,但是,在它总共只存在的11个月当中,就已经拥有5600订户。在编者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以后,普鲁士政府就只好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封这家使它恐惧的报纸。去年5月在莱茵普鲁士部分地区发生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政府就利用暂时的军刀统治,以暴力把本报的编者驱逐出普鲁士,从而使《新莱茵报》不能再继续出版。

《新莱茵报》的编者参加了去年夏天的革命运动,有的在南德,有的在巴黎,以后他们大多数又聚集在伦敦,决定在这里继续出版报纸<sup>①</sup>。一开始它仅能以评论为内容每月出版一次,篇幅约5印张。然而只有能够使各期之间出版间隔缩短,这个企业才能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持续不断地影响舆论,在经济方面也才能有很大的希

<sup>①</sup> 见本卷第115—116页。——编者注

望。因此,编者有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就使《新莱茵报》每两周出版一次,每次5印张,或者,如果可能,就出版像美英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而只要形势允许回到德国,就立刻再把周报改为日报。

根据初步估算,《评论》只要两周出版一次,印数3000份,年净利便可达1900塔勒。

为了企业能够自立,使《评论》每两周或一周发行一次,必须要有500英镑的资本,为筹措这笔款项,特此招股,条件如下:

(1)每股50法郎,在领取临时收据时一次付清,以后再以临时收据换取原始股票。

(2)每位股东只对他的股票数额承担责任。

(3)股东有权在伦敦指定委托人检查业务经营情况。

(4)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大会,听取关于企业的发展情况和财务状况的报告,通过关于进一步监督业务经营的决议。关于企业状况的石印报告将发送每个股东。

(5)经营中所获得的利润在《新莱茵报》还不可能每周出版一次以前均转入企业资本。在这一目标达到以后,利润分成三等份,三分之一留作准备金,三分之一作股息分给股东,其余三分之一归编辑部。

《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康·施拉姆

1850年1月1日于伦敦

写于1849年12月底—1850年  
1月1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第1  
版第8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2 月 25 日 举行的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两周年的 宴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

摘自关于 1850 年 2 月 25 日社会民主  
派流亡者协会宴会的报道<sup>361</sup>

[……]《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公民的法文演讲,最后以对六月  
起义者的致敬结束,博得极其热烈的掌声[……]

载于 1850 年 3 月 1 日《西德意  
志报》第 51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的财务报告<sup>362</sup>

### 1. 支 出

			磅	先令	便士
1849年11月	16次救济金每次	7先令	5	12	—
1849年12月	29次救济金每次	7先令	10	3	—
	3次救济金每次	4先令	—	12	—
	1次救济金每次	6先令	—	6	—
	1次救济金每次	3先令	—	3	—
	2次救济金每次	5先令	—	10	—
	1次救济金每次	5先令6便士	—	5	6
	1次救济金每次	8先令	—	8	—
	1次救济金每次	12先令	—	12	—
	4次救济金每次	10先令	2	—	—
1850年1月	20次救济金每次	7先令	7	—	—
	1次救济金每次	2先令6便士	—	2	6
	3次救济金每次	4先令	—	12	—
2月1—23日	18次救济金每次	7先令	6	6	—
	2次救济金每次	5先令	—	10	—
	1次救济金每次	2先令	—	2	—
	5次救济金每次	10先令	2	10	—
	1次救济金每次	3先令	—	3	—

1次救济金每次 13先令	—	13	—
2次救济金每次 1先令3便士	—	2	6
1次救济金每次 1先令	—	1	—
<hr/>			
114次救济金合计 .....	38	13	6
邮费、印花税、取款费和文具费 .....	1	5	1
<hr/>			
总 计 .....	39	18	7

支出中包括给当时得到工作的各个流亡者购买手工工具、衣服等等贷款 26 镑；借贷人答应以后归还。

## 2. 收 入

	磅	先令	便士
11月19日 出纳处积余 .....	10	9	5
12月1日 工人协会捐助 .....	—	3	6
12月10日 经科隆《西德意志报》转来30塔勒,扣除 费用后余 .....	4	1	—
12月15日 巴黎德国工人捐助 .....	2	5	10
12月17日 经罗斯托克的蒂尔克教授先生转来 ..	16	12	6
2月11日 辛辛那提救济委员会捐助 .....	20	18	—
2月20日 什未林工人捐助 .....	3	—	—
<hr/>			
总 计 .....	57	10	3
支出(如上所示) .....	39	18	7
<hr/>			
出纳处积余 .....	17	11	8

上列财务清单曾在这里的德意志工人协会 3 月 4 日会议上提出并被确认无误。捐款人及其代理人可到会计处查阅委员会的单据和账簿。

本报告写妥后,又从科隆和纽约收到两笔汇款,这项收入将列入下次的报告。同时,由于从瑞士和法国不断有人被驱逐出境,这里需要救济的流亡者人数剧增。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流亡者来到这里,他们大部分人不仅需要给予菲薄的普通救济金,而且迫切需要给予补助来购置衣服。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其他方面募款援助这里的流亡者的努力大概收效甚微,结果所有来到这里的流亡者大都马上指派给我们,于是本委员会的负担就更重了。幸赖这里的德国工人和流亡者本身的努力,才为某些流亡者谋得了职业。但是,在其他地方流亡者容易找到的很多专门职业,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伦敦人口过剩,竞争激烈,他们在这里却找不到。何况新来的流亡者非常之多,以致需要援助者的名单每周都在增加。

虽然交付给委员会的钱款在使用上极为节省,定期救济金已减到本地生活必需品的高昂价格所允许的最低限度,可是委员会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很快减少。我们甚至担心,不久就无力使这里的失业的流亡者摆脱流浪的生活和极端的贫困。

因此,我们再次请求在德国国内的党给予资助。我们提醒党注意一点,在瑞士和法国流亡者人数和所需援助在减少,那么在伦敦流亡者人数和所需援助就更为增加了。我们希望,手拿武器为德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而斗争过的人们,不致在伦敦街头向人乞讨。

所有捐款请寄:伦敦索霍广场迪恩街64号亨利希·鲍威尔先生。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 亨·鲍威尔

奥·维利希 卡尔·普芬德

1850年3月初于伦敦

载于 1850 年 3 月 21 日《西德意志报》第 6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4 月 5 日  
纪念马·罗伯斯比尔诞辰 92 周年  
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sup>363</sup>

摘自关于 1850 年 4 月 5 日宪章派宴会的报道

[……]弗·恩格斯对英国人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他强调指出,当英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sup>364</sup>(平等之友)就已经有了,他最后举杯对英国工人表示祝贺[……]

载于 1850 年 4 月 17 日《大胡  
蜂》报第 8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流亡者委员会

### 1850年4月8日会议记录<sup>365</sup>

公民克莱纳称,公民鲁·施拉姆向他保证自己不属于任何流亡者委员会,只是从日内瓦的加莱尔那里收到一些彩票,并受托把钱寄到日内瓦。另一个委员会设在希尔曼那里,这是个空头委员会,克莱纳认为它根本没有经费。

宣读、通过和签名

**W. 克莱纳**  
**拜尔勒**

公民格纳姆:公民司徒卢威称,他没有救济流亡者的经费,他从加莱尔那里收到100张彩票,可是还没有推销出去。如果他把这些彩票卖得了钱,就把这笔钱或者转交给某个可能成立的委员会,或者自行分配给流亡者,让他们写下收据。他对德国流亡者当中存在的分歧表示遗憾;如果没有这些分歧,那就会有成千上万古尔登源源而来。因此,他建议流亡者在自己人中间组织一个委员会。

宣读、通过和签名

**格纳姆**  
**约瑟夫·莱奥尼**

**雅科布·克莱因**

然后,公民司徒卢威拿出一个英镑,格纳姆建议将它转交委员会;对此公民司徒卢威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任何委员会,我把钱交给现在在场的人,让他们自己分。

**格纳姆**

**约瑟夫·莱奥尼**

**卢卡斯**

弗·恩格斯 1850 年 4 月 8 日  
记录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7 年历史考证  
版第 1 部分第 10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sup>366</sup>

## 第 一 条

联合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应采取保持不断革命的方法,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 第 二 条

为了促进这个宗旨的实现,联合会在共产主义革命党的一切派别之间建立团结合作的关系,按照共和主义的博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分裂。

## 第 三 条

联合会的创立委员会即为中央委员会;它可以在工作需要的任何地方设立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委员会。

## 第 四 条

联合会的会员人数不限,但经全体同意,不得接纳任何人入

会。选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 第 五 条

联合会的全体会员宣誓保证恪守本章程第一条的规定。任何修改,凡有可能削弱第一条所表述的主旨者,会员概不承担义务。

## 第 六 条

本团体的一切决定须经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亚当 茹·维迪尔 卡·马克思  
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恩格斯  
乔·朱利安·哈尼

大约写于 1850 年 4 月中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研究通讯》1926 年第 1  
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的财务报告<sup>367</sup>

### 收 入

		磅	先令	便士
2月25日	出纳处结余 .....	17	11	8
2月25日	纽约社会改革同盟捐助 .....	30	18	5
3月13日	科隆流亡者委员会捐助 .....	36	—	—
3月23日	工人协会会员阿·弗·捐助 .....	—	5	—
3月18日	汉堡捐助 .....	6	—	—
4月16日	比勒费尔德捐助 .....	13	—	—
4月16日	经恩格斯转来 E. B. ①的捐助 .....	1	—	—
4月20日	一批英国工人捐助 .....	—	7	—
		95	2	1

### 支 出

3月	53次救济金 每次7先令	18	11	—
3月	7次救济金 每次10先令	3	10	—

① 可能指恩格斯的妹夫、当时正在伦敦经商的埃米尔·布兰克(Emil Blank)。——编者注

			磅	先令	便士
3月	1次救济金	每次9先令6便士	—	9	6
3月	1次救济金	每次2先令8 $\frac{1}{2}$ 便士	—	2	8 $\frac{1}{2}$
3月	6次救济金	每次5先令	1	10	—
3月	2次救济金	每次1先令	—	2	—
3月	2次救济金	每次4先令	—	8	—
3月	1次救济金	每次2先令	—	2	—
	贷款	.....	2	3	—
	邮费和零星开支	.....	—	8	8
4月	56次救济金	每次6先令	16	16	—
4月	18次救济金	每次5先令	4	10	—
4月	2次救济金	每次2先令6便士	—	5	—
4月	14次救济金	每次1先令6便士	1	1	—
4月	52次救济金	每次7先令	18	4	—
4月	1次救济金	每次8先令	—	8	—
4月	54次救济金	每次3先令	8	2	—
4月	49次救济金	每次3先令6便士	8	11	6
4月	1次救济金	每次6先令4便士	—	6	4
	零星开支	.....	—	6	5
			85	17	1 $\frac{1}{2}$
	结余	.....	9	4	11 $\frac{1}{2}$

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委员会自建立以来大约救济了100个流亡者,救济时间或长或短,它经手的款项总计161镑7先令6便士。此外,这里的工人协会靠募款满足了个别流亡者的特殊需求。它还给其他一些流亡者找到了工作,并把自己的房屋以及报纸提供给所有的流亡者使用。

向德意志工人协会提出并经核准的上述财务报告的有关账簿和

单据,存放在委员会的会计那里,供捐款人及其被委托人查阅。

最近,司徒卢威、博布钦、鲍威尔(施托尔珀的)等先生认为需要用自己的名义,从德国为流亡者募集大量款子。为此,他们在自己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流亡者,并且在昨天的一次会上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显然,组织这个平行的委员会的新计划比起过去失败了的计划,不会更多地妨碍我们的活动。

正如财务报告所显示的,委员会出纳处的余款已经寥寥无几,它的经费勉强只够用一星期。可是,每天仍有新的流亡者申请救济。因此我们再次请求德国社会民主派不要抛弃自己的流亡者,尽快把自己的捐款寄给伦敦索霍广场英王街 21 号卡·普芬德会计。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马克思(主席)

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恩格斯 卡·普芬德

亨·鲍威尔

1850 年 4 月 23 日于伦敦

载于 1850 年 5 月 2 日《西德意志报》第 104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sup>368</sup>

###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声明]

近来，救济这里德国流亡者的捐款只收到很少，使这些流亡者遭受极大的贫困。他们某些人至今都没有找到自己专长的工作，几乎已经有一个星期露宿街头和公园，忍饥挨饿。各个方面都以各委员会之间有分歧和所谓捐款分配不公为借口，不给流亡者寄钱来。这种情况是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造成的，他们宣扬说，本委员会只援助“共产主义者”。

这里我们再一次声明，对每一个能够证明自己是需要救济的德国流亡者，我们都一视同仁地给予了救济。我们的账簿和单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捐款人及其被委托人可以随时查阅。下面署名人之一的维利希在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所领导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向领取过委员会救济金的流亡者问道，有谁问过他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一个人声称曾被这样询问过！

我们声明，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的上述断言是谎话和诬蔑。

因此，各个方面用来拒绝支援伦敦流亡者的借口也就不复存在了。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卡·普芬德  
奥·维利希 亨·鲍威尔

1850年6月14日于伦敦

信件和捐款请寄伦敦索霍广场英王街21号卡·普芬德。

载于1850年6月25日《西德意志报》第14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年5、6、7月的财务报告<sup>369</sup>

### 收 入

		磅	先令	便士
4月24日	原财务账目结余 .....	9	4	11 $\frac{1}{2}$
5月	经公民谢特奈尔转来哈瑙的捐款 13磅, 扣除所得税7先令9便士 .....	12	12	3
	一个英国人捐款 .....	—	2	—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5磅和 20磅 .....	25	—	—
		46	19	2 $\frac{1}{2}$
6月	从特里尔寄来 .....	2	2	6
	从巴黎(德国工人)寄来 .....	1	18	6
	经公民佩茨勒转来 .....	—	5	—
		4	6	—
7月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 .....	30	—	—
	从科隆寄来 .....	—	11	4
	从威斯巴登(工人协会)寄来 .....	4	10	—
	从汉堡(《北德意志自由报》)寄来 ..	11	11	10
	从伦敦工人协会寄来 .....	7	9	6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 .....	20	—	—



从哈尔特山麓诺伊施塔特寄来 .....	4	—	—
从汉堡(《自由射手》报发行部)			
寄来 .....	20	10	10
从拉绍德封寄来 .....	5	—	—
从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协会)			
寄来 .....	—	17	6
	104	11	—

## 支 出

从 4 月 24 日	128 次救济金	每次 3 先令	磅	先令	便士
至 5 月 30 日					
	6 便士 .....		22	8	—
	27 次救济金	每次 3 先令 .....	4	1	—
	26 次救济金	每次 2 先令 .....	2	12	—
	31 次救济金	每次 1 先令 .....	1	11	—
	25 次救济金	每次 5 先令 .....	6	5	—
	临时救济金 .....		1	5	—
	为流亡者制鞋的工钱 .....		—	14	—
	零星开支 .....		—	6	11
			39	2	11
6 月	58 次救济金	每次 2 先令 .....	5	16	—
	59 次救济金	每次 1 先令 .....	2	19	—
	25 次救济金	每次 1 先令 6			
	便士 .....		1	17	6
	临时救济金 .....		—	10	—
	零星开支 .....		—	11	6
			11	14	—
7 月	28 次救济金	每次 2 先令 .....	2	16	—
	24 次救济金	每次 1 先令 .....	1	4	—
	93 次救济金	每次 6 便士 .....	2	6	6
	临时救济金 .....		1	6	—

流亡者膳宿费				
7 磅 9 先令 6 便士	}	35	9	6
5 磅—				
5 磅 10 先令				
5 磅 10 先令				
6 磅—				
6 磅—				
购置劳动用品 .....	6	—	—	
给流亡者的预支款 .....	7	12	6	
给一个有家眷的流亡者的 预支款 .....	1	—	—	
零星开支 .....	—	19	3	$\frac{1}{2}$
		<hr/>		
		58	13	$9\frac{1}{2}$
		<hr/>		
总计 .....	109	10	8	$\frac{1}{2}$
收入总额 .....	155	16	2	$\frac{1}{2}$
支出总额 .....	109	10	8	$\frac{1}{2}$
		<hr/>		
结 余 .....	46	5	6	

上述财务报告是在今年 7 月 30 日的工人协会会议上提出和批准的。捐款人及其被委托人可以查阅账簿和单据。

因为 6 月份收到的捐款很少，流亡者常常处于困窘的境地，所以决定为流亡者设置集体宿舍和公共食堂。这里的工人协会，以及已找到工作的部分流亡者，靠捐款就可能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以后收到的款子，可以用来购置一些室内所必需的家具什物。目前宿舍有 18 位流亡者住宿，食堂约有 40 位流亡者用餐。首先利用流亡者中没有事做的鞋匠给他们的同志提供必需的鞋子。其次，委员会出资

并采取必要措施,在上述场所为流亡者设立一个联合工场,使他们能够挣得自己的部分生活费用。

如果初次尝试获得成功,那就将更大规模地施行这项工作,并及时继续把这一工作的情况通知大家,委员会希望,当流亡者还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时候,救济流亡者和给他们设立工场这两项措施用德国来的大量捐款能够维持下来。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 奥·维利希

卡尔·普芬德 亨·鲍威尔

1850 年 7 月 30 日于伦敦

载于 1850 年 8 月 8 日《北德意志自由报》第 42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年9月9日收据<sup>370</sup>**

今代载勒尔从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收到3先令6便士。

**贝尔托尔德(代载勒尔领取)**

1850年9月9日于伦敦

今再次从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收到3先令。

**斐·沃尔弗**

1950年9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翻译

##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9 月 10 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为海瑙事件而举行的 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报道<sup>371</sup>

摘自关于 1850 年 9 月 10 日民主派兄弟协会<sup>372</sup>

大会的报道

[……]普鲁士人恩格斯先生接着在大会上讲话,感谢酿酒工人为今后有效地阻止所有像海瑙元帅这样残暴的专制统治者来访问这个国家树立了榜样。但愿海瑙元帅在经过的每一个车站或轮船码头都受到同样的对待。(欢呼声)[……]

载于 1850 年 9 月 14 日《北极星报》第 67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50年9月15日会议记录<sup>373</sup>

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留斯、沙佩尔、维利希、列曼。

弗伦克尔请假。

由于本次会议是非常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不在手头，因此无法宣读。

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sup>32</sup>委员会会议时间有冲突。既然维利希<sup>①</sup>召集了区部会议，——我不想探讨这个会议是否合法——这次会议今天必须举行。

我提出下列3点建议：

1. 在今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隆，它的职权移交给该地的区部委员会。这项决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隆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建议，以免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这一点在我们的建议中已经

---

① 第二个副本中有“星期一”。——编者注

去掉了。而且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无论在上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或者在现在区部召开的全会上,或者在协会,或者在流亡者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反对多数派。因此,中央委员会在这里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那么,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2. 延用至今的同盟章程<sup>374</sup>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章程。

理由:1847 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在 1848 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作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削弱了原盟章中的原则性的条款。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有效,在另一些地方则哪个盟章也不起作用,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sup>①</sup>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是一片无政府状态。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开,因而不能再继续使用。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3. 在伦敦组建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成员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sup>②</sup>告同盟书,甚至跟

---

① 第二个副本中有:“独立”。——编者注

② 第二个副本中有:“中央委员会的”。——编者注

宣言<sup>①</sup>直接抵触的观点。他们用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逢迎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情感。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强调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 15 年、20 年、50 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正像民主党人把“人民”这个词只当一句空话使用一样,他们现在使用“无产阶级”这个词也只当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sup>②</sup>,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辩论最后<sup>③</sup>表明,私人争吵的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而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见解成了两派各自的战斗口号;而某些盟员把宣言的维护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办法使他们威信扫地,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威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本来有权解散伦敦区部并把少数派<sup>④</sup>成员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建议,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无益的争吵,因为这些人就其信仰来说还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只能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则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沙佩尔常常说要分裂——那

① 指 1850 年 3 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第二个副本中是:“这种观点”。——编者注

③ 第二个副本中是:“最后明显地”。——编者注

④ 第二个副本中是:“中央委员会少数派”。——编者注



就分裂吧,我对待分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们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

我声明,就我而言,我希望加入我们区部的人最多 12 个,尽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众多的人交给少数派。如果这个建议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sup>①</sup>协会里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协会。归根结蒂,问题不在于两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相反而是在于要停止纷争,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像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山岳党<sup>83</sup>和《新闻报》决裂一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决裂。我赞成迁移中央委员会<sup>②</sup>和修改盟章。科隆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认为,新的革命将会造就出一批人来领导自己,而且比所有在 1848 年享有声誉的人领导得<sup>③</sup>更好。至于原则性的分歧,是埃卡留斯提出的问题成为这场辩论的起因。我说出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很热中于这件事。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一开始就动手砍掉别人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了,从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躺下睡大觉了,那样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轮到我们,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道,好吧,那么我们现在就分道扬镳。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一定

① 第二个副本中有:“同一个”。——编者注

② 第二个副本中有:“到科隆”。——编者注

③ 第二个副本中是:“领导”。——编者注

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是这样一来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时我们又走一条道路。我是马克思的个人朋友,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分裂,好吧——那么我们走我们的路,你们走你们的路<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握政权的观点,在这一方面,我是个狂热分子,如若不然,我就会对整个事件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建议。只要我的建议被通过,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互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员会<sup>②</sup>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作出的牺牲不比任何人少,但是,这是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出的牺牲。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并不需要多少热情。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着眼于一时一刻的意见。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是直接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很好例证,说明过早取得政权会得到什么结果。况且,在法国无产者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

---

① 第二个副本中是:“你们走你们的”。——编者注

② 第二个副本中是:“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巴黎公社证明,为了做出一些事情,并不需要参加政府。此外,当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尤其是公民维利希,为什么不发言呢?我们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把伦敦区部分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我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下一次革命中能立即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在俱乐部里比在政府里更重要。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地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亦然。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沙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科隆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有效的。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隆没有就这件事写过文章<sup>①</sup>。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议大家在记录上签名。这个意见被通过。沙佩尔声明他不签名。

1850 年 9 月 15 日写于伦敦。

---

<sup>①</sup> 在第二个副本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宣读、通过和签名<sup>①</sup>。

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卡·马克思

书记弗·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康·施拉姆 约·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 1956 年  
《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 1 卷第  
2 部分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sup>①</sup> 在第二个副本中没有这几个字。——编者注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 8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的 财务报告<sup>375</sup>

## 收 入

		磅	先令	便士
8 月	出纳处积余 .....	46	5	6
	贝格小姐募集 .....	12	—	—
	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协会捐助 .....	2	10	—
	同上 .....	1	10	—
	哈尔特山麓诺伊施塔特捐助	8	—	—
	经《德意志—伦敦报》编辑部转来			
	卡·弗洛里先生捐助 .....	—	8	—
9 月	巴黎德意志工人协会捐助 .....	2	—	—
	约翰·伯格先生募集 .....	17	10	—
	总计 .....	90	3	6

## 支 出

8 月	流亡者食宿支出 .....	28	9	3
	制刷作坊修建费 .....	7	10	—

陶皮革等 .....	—	13	6
		镑	先令 便士
56次救济金 每次6便士 .....	1	8	—
23次救济金 每次1先令 .....	1	3	—
6次救济金 每次2先令6便士 .....	—	15	—
各种救济金 .....	—	5	6
4次救济金 每次10先令 .....	2	—	—
流亡者贷款 .....	8	4	—
给4个流亡者迁居美国的路费 .....	5	—	—
迁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路费 .....	7	3	—
零星开支、邮费、取款费等 .....	—	11	3
9月 食宿支出 .....	14	4	8
39次救济金 每次6便士 .....	—	19	6
2次救济金 每次1先令 .....	—	2	—
1次救济金 每次10先令   .....	—	15	—
1次救济金 每次5先令   .....	—	—	—
按捐款人伯格先生的指示分配 .....	8	15	—
流亡者贷款 .....	1	18	—
零星开支 .....	—	6	10
总计 .....	90	3	6

原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下面署名的四个委员,在提出本清单的时候声明退出这个委员会,大磨坊街协会<sup>32</sup>已指定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账簿和单据;委员会于本月15日提出报告,认为一切账目完全无误。

下面署名的人认为,有必要把所有与他们管理工作有关的账簿和单据保留在一直担任委员会会计的卡·普芬德(索霍广场英王街21号)那里,因为他们不仅退出了委员会,而且也退出了协会,一旦公众有所怀疑,这些文件是必不可缺的。

因此,请捐款人指定在伦敦的被委托人来检查存放在上述会计那里的账簿和单据。

卡尔·马克思 亨·鲍威尔

卡·普芬德 弗·恩格斯

1850年9月18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9月2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0卷翻译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年9月20日收据<sup>370</sup>**

今从马克思博士处领到救济款 10 先令。  
此据。

**克洛泽**

1850年9月20日于伦敦

今从马克思博士处各领到 10 先令。  
此据。

**斐·沃尔弗**

**威·李卜克内西**

1850年9月20日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翻译



##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 致科隆的同盟中央委员会 建议书<sup>376</sup>

在作出决定之后，埃卡留斯在伦敦建立的区部还向我们提交了正式的建议书：“开除一切宗得崩德<sup>61</sup>的盟员，特别是开除下面七人——沙佩尔、维利希、谢特奈尔、列曼、狄茨、格贝尔特和弗伦克尔，并且把这项决定通报同盟的所有区部和支部，同时通知伦敦的宗得崩德和它的领导人。”

这份建议书以下列确实令人十分信服的理由为依据，为便于进一步了解这些人，我们将这些理由也通报全盟：

“(1)他们向同盟之外的秘密协会的领导机构、各民族的流亡者报道了，而且是歪曲地报道了伦敦发生的分裂。

(2)他们公然违抗合法的科隆中央委员会，违反它的决议；他们派出特使<sup>①</sup>到德国各地建立宗得崩德。

(3)在与伦敦区部成员的关系上，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反对伦敦区部的成员，破坏了秘密协会成员应尽的一切义务。

(4)他们从同盟分裂时起就在破坏秘密协会的一切规章，所以他

---

① 豪德。——编者注

们继续留在同盟的队伍里,只会助长他们瓦解同盟的活动。”

写于 1850 年 11 月 11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51 年 6 月 22 日《德累斯  
顿新闻通报》第 71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sup>377</sup>

[卡·马克思加了标记、文字的全文]

1.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以一切宣传和政治斗争的手段破坏旧社会——**推翻资产阶级**，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经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同盟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同样，它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完全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未达到最终目的前不得解散。

2. 具备下列条件的人方能成为同盟的**盟员**：

(1) 不信仰一切宗教，不参加任何宗教团体和一切仪式(民法要求遵守的仪式除外)；

(2) 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的；

(3) 不参加任何敌视同盟宗旨或阻挠这一宗旨实现的组织和局部要求；

(4) 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活力；

(5) 严格保守同盟一切活动的秘密。

3. **接收盟员**的决定必须支部一致通过。接收盟员的工作通常由支部会议的主席主持。被接收入盟的人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同盟

的决议。

4. 违反盟员条件的人应予开除。开除个别盟员的决定由支部多数通过。中央领导机关可以在区部总支部呈请之下开除整个支部。开除盟员必须通报全盟周知,同盟对被开除的盟员应像对待一切可疑分子那样进行监督。

5. 同盟分为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6. 支部至少须由居住同一地区的三人组成。每个支部选举一名主席主持会议,一名副主席管理出纳。

7. 一国或一省的支部隶属于总支部,即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区部。支部只跟区部直接联系,区部只跟中央委员会直接联系。

8. 支部应定期召开会议,至少每半个月一次;它至少每个月向区部作一次书面报告,各区的总支部至少每两个月向中央委员会作一次书面报告;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作一次有关同盟情况的报告。

9. 支部和区部的主席和副主席每年改选一次,选举人可以随时罢免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只有代表大会才能罢免。

10. 每个盟员必须每月交纳盟费,盟费的最低额由代表大会规定。盟员所交的盟费,一半交区部,一半交中央委员会;盟费用来支付管理费用、散发宣传品和派遣特使。区部负担与支部通信的费用。盟费每三个月向区部上缴一次,区部把总额的一半上缴中央委员会,同时向自己的支部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特别费用由特别收入开支。

11.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执行机关。它的成员不少于三人。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区部选举和补选;中央委员会只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12. 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代表大会由区部会议的代表

组成。区部会议的每五个支部选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13. **区部会议**是区部的代表机关。它每三个月在区部所在地定期召开一次会议,在总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讨论区部事务。每个支部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区部会议必须在每年7月中旬召开一次会议,选举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五条 支部**

**第九条 接收盟员**

**第六条 区部**

**第十条 开除盟员**

**第七条 中央委员会**

**(财务)①**

**第八条 代表大会**

14. 区部选举会议结束两个星期以后,代表大会照例在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召开,除非中央委员会已另行指定地点。

15. 代表大会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它的全部活动和同盟状况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但没有表决权。代表大会阐明同盟必须遵循的政策的原则,决定修改章程的问题并指定中央委员会下一年度的所在地。

16. 中央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届时非常代表大会由各区部选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

17. 同一支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支部最后解决;同一区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区部总支部最后解决;不同区部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中央委员会最后解决;对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性质的控诉应转交代表大会。同一区部内的支部之间的争执由区部总支部解决;支部和它的区部之间的争执或区部之间的争执由中

① 第五至第十条是马克思写在手写稿第3页下边的。——编者注

央委员会解决；不过，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诉诸区部会议解决；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诉诸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还解决中央委员会和同盟下级委员会之间的一切冲突。

写于 1850 年 12 月 18 日—1852  
年 3 月 5 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48 年  
《历史问题》第 11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关于弗·恩格斯在 1850 年 12 月 30 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上  
发表讲话的报道<sup>378</sup>

摘自关于 1850 年 12 月 30 日“民主派兄弟协会”<sup>372</sup>聚会的报道

[……]恩格斯先生(他同卡尔·沙佩尔一起作为德意志协会<sup>32</sup>的代表出席)也抱有同感,他代表自己的兄弟对发言者所表示的同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英国人民繁荣昌盛。接着他开始了经过深思熟虑的长篇讲话,谈到国外[革命运动]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反动的原因,指出人民的愚昧和他们的领袖的叛卖也促使了反动的猖獗。[……]

载于 1851 年 1 月 4 日《北极星报》第 68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0 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 注 释

- 1 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论述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史的著作，写于 1849 年 8 月中至 1850 年 2 月。

恩格斯曾亲自参加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的军事行动，起义失败后于 1849 年 7 月和最后一批起义军战士撤退到瑞士，随后很快决定撰写这一著作。马克思在得知恩格斯到达瑞士后于 1849 年 8 月 1 日给他写信说：“你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就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篇抨击性文章”。于是恩格斯从 8 月中旬开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有关资料动手写这一著作。他原来打算出版单行本，并就出版事宜于 1849 年 8 月 24 日给雅·沙贝利茨、1849 年 8 月 25 日给约·魏德迈写信。后因马克思筹措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于 1849 年 12 月创办，恩格斯这一著作以连载的方式在该杂志的前三期上发表，序言和第一、二两章在 1850 年 1 月第 1 期，第三章在同年 2 月第 2 期，第四章在同年 3 月第 3 期。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三、四两章，经删节后曾以《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为题刊登在 1850 年 5 月 29 日—6 月 7 日、6 月 14—30 日《特里尔人民呼声报》第 23—27 和第 30—37 号。整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过。1902 年梅林将全文收入《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第 3 卷，梅林根据手头掌握的文件指出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发表本文时汉堡出版者为应付书报检查作的几处改动，这些改动均在本文脚注中作了说明——3。

- 2 这里套用了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在南德广为流传的《里克尔之歌》的

副歌。原来的歌词是：“里克尔，这个伟大人物来了，他又率领我们了。”

这首歌的曲调是贝尔曼于1844年创作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歌》的曲调。这是一首爱国歌曲，第一句歌词是“在大海怀抱中……”，1848—1849年从丹麦统治下争取解放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解放战士曾广泛传唱这首歌。——5。

- 3 帝国宪法是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帝国宪法没有提出通过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半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最自由的发展机会的任务，它规定了民主自由，同时又把行政权授予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有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要赎买。这部宪法是统一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它的主要缺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任何力量。几乎所有德意志大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它的唯一保护者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发动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的人民群众。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除本文外，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112页）中也评述了这一运动。——5、191、386、387、426。

- 4 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见注65）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的宴会和示威游行遭到禁止是二月革命的直接原因。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

- 里。——5、127、131、136、231、261、274、324、355、361、416、432、449、456、482、495、571、582。
- 5 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见注4)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75)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153页)——5、132、158、187、361、379、382、679。
- 6 三月协会是主要在德国南部和中部成立的各种民主协会的统称。中央三月协会是1848年11月底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为了集结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各派力量而建立的。其宗旨是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见注16)的成果。协会的领导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福祿培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不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是幻想走议会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和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抨击协会的领袖们对反革命斗争、畏首畏尾、犹豫不决。1849年春,革命力量脱离了中央三月协会。——6。
- 7 爱国协会是1848—1849年革命期间萨克森、符腾堡等德意志联邦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地方性组织。1849年春,该协会有200多个团体,约75000名会员,其中也有工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另外还有自己的工人协会)。1848年秋,共和派在萨克森爱国协会中取得优势。1849年4月,该组织改名为“民主人民协会”,持更为激进的观点;但是,反革命在1849年3月的胜利阻断了这种发展。——6。
- 8 格吕特利的誓言这一用语出自15世纪形成的关于建立瑞士联邦的一种传说。相传施维茨州、乌里州和翁特瓦尔登州这三个森林州最早于1291年签订协定,他们的代表于1307年在格吕特利(或吕特利)会合缔结联盟,并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6。
- 9 指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它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

开,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有恩格斯在本文中称为“坚定左派”的罗·勃鲁姆、卡·福格特等人,还有恩格斯称为“极左派”的阿·卢格、古·施勒费尔、弗·齐茨、威·特吕奇勒尔等人,这些人又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城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址迁到斯图加特,迁至斯图加特后的国民议会又称“残阙议会”。它曾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见注141)。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政府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的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帝国摄政政府(见注10)但是没有成功。1849年6月18日,议会被符腾堡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6、258。

- 10 帝国摄政政府是由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见注9)中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于1849年6月在斯图加特成立的,由选出的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五人组成,以代替1848年6月以来在德国存在的、以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为首并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的所谓中央政权(见注18)。帝国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但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但是没有成功。1849年6月18日,“残阙议会”被符腾堡的军队所驱散。帝国摄政政府随之解散。——6、120、419、552。
- 11 指1849年5—7月法国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一事。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9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朱·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此后,庇护九世逃到那不勒斯要塞加埃塔,路·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国避难。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庇护九世于1848年12月4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

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法国政府于 1849 年 4 月派出了由尼·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当年 4 月 27 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 月 30 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同年 6 月 3 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 1849 年 7 月 1 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 1849 年 7 月 3 日被推翻。——8,181、187、191、679。

- 12 在匈牙利人民 1848—1849 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期间,匈牙利革命军于 1849 年 4 月底在军事政治和战略上处于有利的地位。本来可以向维也纳推进,并因此推动整个欧洲的革命。但是总司令阿·戈尔盖拒绝越过匈牙利边境,这样奥地利军队得以于 1849 年 5 月进行反攻,并于 1849 年 5 月 2 日和俄国签订协议,要求俄国军队给予帮助,俄国人遂开进了匈牙利。

1849 年 5 月中,为防御俄国军队的进攻,匈牙利内阁通过一项军事行动计划,波兰革命将军亨·邓宾斯基被重新任命为革命军的司令。此前由于军事行动中受到戈尔盖的阻碍,邓宾斯基曾于 1849 年 2 月卡波尔架战役失败后放弃了指挥权。他重返军队后,打算不顾军事行动计划中给他安排的防守职责,越过匈牙利北部边境进入加利西亚,并促使他的波兰同胞发动起义。这个计划遭到匈牙利政府的反对,邓宾斯基因此认为有理由再次辞职。

关于匈牙利革命军 1848 年底至 1849 年 5 月初的斗争,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文章,尤其是《匈牙利》一文中作了详细描述。——8,191。

- 13 恩格斯预告的关于路·梅洛斯拉夫斯基向内卡河进军的文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未曾发表。——9。
- 14 1849 年 5 月 3—8 日德累斯顿武装起义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第一起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并和普鲁士结盟用军队镇压人民群众,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1849 年 5 月 3 日群众由于普鲁士即将入侵而需要武装起来,他们涌向军械库。当地卫戍部队对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全市发动起义。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资产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设立了 100 多个街垒。他们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并于国王 5 月 4 日逃亡之后成立了临时政府,为首的是赛·埃·奇尔讷。对

自发起义感到意外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人起初想和国王达成和平协议,将军队交给人民,他们同意了对起义者不利的停战。5月5日,在协议停战结束之前,军队开始宣战,此时装备很差的德累斯顿人和从临近地点赶来的缺乏必要的军事组织和领导的街垒战士们面对的是5000名装备良好的普鲁士—萨克森军队。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也参加了起义战斗,其中斯·波尔恩于5月7日,在起义处于绝境时走上了斗争的领导位置。参加起义的军事领导的还有米·亚·巴枯宁。直到5月8日晚,在继续斗争已失去任何意义时,街垒战士们才放弃军事上的顽强抵抗。在波尔恩、巴枯宁和齐赫林斯基的领导下,他们中的2000人撤回弗赖堡。——10。

- 15 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是拿破仑于1804年公布的民法典,有时指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有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拿破仑法典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典”(见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节)。——11。
- 16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13、191、258、386、491。
- 17 后备军是一支包括常备军和预备军中退伍的、年长的兵役义务者的武装部队。1515年普鲁士战时后备军规章规定,只有在战时和每年军事演习时才能征召后备军。

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受过特殊预备教育,有足够的钱承担自己费用的青年人在通过考试后,只需服役一年,期满后即可提出升为预备军或后备

军军官的要求。——14,661。

- 18 法兰克福帝国内阁是根据 1848 年 6 月 28 日作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为代替联邦议会于同年 7 月 12 日成立的,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和帝国内阁组成。这个实际上既不掌握预算也不掌握军队的政府,没有任何实际力量。不久,它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帮凶。——15。
- 19 特里尔和附近居民点的手工业者、工人和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市民为夺取武器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于 1849 年 5 月 17—18 日袭击了普吕姆军械库。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快就被政府军队镇压下去。——21。
- 20 三色旗指黑红黄三色的旗子,是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被宣布为德国的国旗,也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旗帜。——21,524。
- 21 巴登民主主义人民同盟于 1849 年 5 月 12 日在奥芬堡召开代表会议。他们对大公提出的要求,最初只限于建立一个新政府并召开制宪代表大会。在代表会议临时动议下,第二天又举行了近三万人的群众集会,这些人受拉德施塔特的革命士兵代表团的影响以及刚开始的士兵哗变的鼓舞,在群众集会上通过了一项反映左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进一步要求的纲领,其中要求:建立由政府承担费用的人民武装、立即征召所有 18—30 岁的单身男子作为第一批武装力量、选举军官并将现有军队并入人民军队。新选出的委员会前往拉德施塔特,并在那里得到 5 月 14 日卡尔斯鲁厄起义的消息,鉴于卫戍部队已于 13 日发动起义,并且大公已经逃走,委员会把卡尔斯鲁厄的行政权转交给洛·布伦坦诺领导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在 1849 年 5 月 14 日致卡尔斯鲁厄市民的呼吁书中声称它对于大公的逃跑没有任何责任并解释说,委员会来卡尔斯鲁厄只是为了维护“人的完全自由”和“财产”。布伦坦诺领导的巴登委员会的所有政策都背叛了全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29,31。
- 22 1849 年 5 月 19 日,即《新莱茵报》出版最后一号的当天,马克思、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和威·沃尔弗离开了科隆,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试图说服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公开担任武装起义的领导,他们没有达到目



的,便于5月21日前往巴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于5月23—24日在卡尔斯鲁厄逗留,在这里他们关于革命力量发起全面进攻的主张又遭到多数的反对。最后两人于6月1日前后分手,马克思带着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见注26)的委托书前往巴黎,恩格斯去了凯撒斯劳滕。《新莱茵报》的另外三位编辑格·维尔特、斐·沃尔弗和恩·德朗克也来到巴黎。在巴黎,这时山岳党(见注83)和革命俱乐部正准备发起反对执政的秩序党的群众运动,这三个人都参与了六月十三日事件(见本卷第158—190页)。——30、360。

- 23 坚决前进俱乐部是1849年6月5日在卡尔斯鲁厄成立的,它联合了对洛·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古·司徒卢威、赛·奇尔讷和卡·海因岑等人)。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并吸收激进分子参加政府的工作。俱乐部的成员们在建议被否决后,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迫使政府妥协。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支持,强行解散了“坚决前进俱乐部”。——35、79。
- 24 古·司徒卢威在一封告别信中,把君权、世袭贵族、官僚、常备军、僧侣、高利贷称作“人类六大祸害”。见1849年10月26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38号副刊。——37。
- 25 阿塔·特洛尔是海涅同名长诗中的人物。这本诗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行了讽刺。阿塔·特洛尔即普遍平等论的信徒的原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中所指出的,就是阿·卢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29页)——43。
- 26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

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见注83)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

日采取行动。——47。

- 27 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指《城乡信使》。实际上恩格斯在该报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1849年6月3日《城乡信使》第110号。——53。
- 28 轻骑兵(*chevaux-légers*)是对某些西欧国家以军刀、手枪和马枪武装起来的轻骑兵团的称呼。——54。
- 29 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汉泽曼政府把武器发给人民的行动遭到失败后，1848年6月14日袭击并占领了军械库。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队伍一齐很快驱散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在柏林工人袭击军械库期间，纳茨默上尉主要在古·阿·泰霍夫的劝说下向守军士兵发布撤退的命令。关于袭击柏林军械库和纳茨默上尉，见恩格斯《6月17日协商会议》一文。——58。
- 30 欧根·萨瓦亲王是奥地利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著名统帅，恩格斯在这里把路·布伦克尔称作欧根亲王，是有意讽刺他。——61。
- 31 弗·齐茨在1848年9月17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群众集会上，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见注244)所持的卖国政策提出抗议，他反对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并宣称“坚决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92。
- 32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93、289、430、568、622、700、704、731、739、748。

- 33 科隆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201)盟员于 1848 年 4 月 13 日在科隆创立的。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各行各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奉行抵制间接选举全德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政策,反对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煽动性地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 1848 年 8 月,联合会已有 7 000 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 月 6 日约·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到 1848 年 9 月因被捕的危险而侨居国外为止。1848 年 10 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 1849 年 2 月起卡·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 月 25 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 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93。
- 34 1848 年 9 月 25 日科隆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隆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卡·沙佩尔和海·贝克尔,恩格斯和莫尔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当局企图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隆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 月 26 日科隆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10 月 12 日恩格斯、约·莫尔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93。
- 35 当巴登—普法尔茨起义部队退却时,1849 年 6 月 23 日反革命军官在一支部队中策划了哗变。士兵们在师长托梅领导下,企图逮捕路·梅洛斯拉夫斯基和济格尔并把他们出卖给普鲁士军队。——94。
- 36 巴登制宪议会由 74 名当选议员组成,但是他们并未全部到会。议会于 1849 年 6 月 10 日在卡尔斯鲁厄开幕,6 月底制宪议会迁至弗赖堡,于 7 月 2 日在这里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103。
- 37 《德意志—伦敦报》1849 年 11 月 9 日和 16 日第 241 和 242 号发表了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海因岑的政论文章《革命的教训》。文章用蛊惑煽动性的词句攻击伦敦的德国革命流亡者。1849 年 11 月 23 日一个署名为“反社会主义者”的人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援引卡·海因岑的话,呼吁英国内务大臣“在 24 小时内把宣传这些恶毒学说的人赶出英国”。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于 11 月 23—28 日在伦敦讨论了某些

政治势力想把所有政治流亡者赶出英国的问题。1849年11月28日恩格斯在讨论的基础上撰写了这篇声明,声明发表在1849年12月1日《北极星报》第632号,署名为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10。

- 38 在筹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过程中,有必要对它的发行量及盈利情况作具体估算。1849年11月底,马克思通过泰·哈根在汉堡和出版商尤·舒伯特协商出版杂志事宜时,就应提供估算帐单。

恩格斯大约于1849年12月编成这一估价单。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和康·施拉姆与汉堡的尤·舒伯特和泰·哈根、科隆的斯·阿·璘特和斐·弗莱里格拉特以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约·魏德迈曾就杂志发行量、销售、价格等估算情况进行通信协商。施拉姆在1850年1月1日的招股启事(见本卷第708—709页)直接援引了这一估价单。——112。

- 39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停刊后,马克思一直积极筹措出版新的机关刊物。1849年8月1日,马克思把自己的意图写信告诉了恩格斯,邀他到伦敦来一同着手创刊工作。筹集资金、寻找出版商等问题获得解决后,1849年12月中旬,由康·施拉姆以出版者的身分同汉堡舒伯特出版社签订了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合同。杂志的《出版启事》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康·施拉姆共同起草,并由施拉姆以出版负责人的身分签字。恩格斯和施拉姆寄出的《启事》上注明日期为“1849年12月”,马克思寄出的《启事》上注明日期为“1849年12月15日”。

马克思在1849年12月19日把《启事》原文寄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约·魏德迈,请他登在《新德意志报》上,于是《启事》登在该报1850年1月16、26日及2月5日的第14、23、31号上。恩格斯把《启事》寄给了巴塞尔的雅·沙贝利茨和古·厄博姆,他们将它刊登在《瑞士国民报》1850年1月10日第8号和《伯尔尼报》1849年12月27日第361号。《启事》还登在《西德意志报》1850年1月8日第6号和《杜塞尔多夫日报》1850年1月10日第9号。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任务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总结1848—1849年的革命,说明新的历史形势的特点,进一步研究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杂志的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同时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拥护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为杂志写稿。此外,在第1期上刊载了卡·布林德的短评

《在巴登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各党派》。在第4期上刊载了法国民主主义者路易·曼拿尔的诗。

杂志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在地伦敦以及杂志印刷地汉堡以外,还有纽约,因为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有许多人流亡在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在那里找到发行杂志的基地。他们估计有可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打算在不久以后改为周刊,然后再改为日报(见本卷第709页)。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杂志总共出了六期,最后一期合刊(五、六期合刊)出版于1850年11月底。——115。

- 40 弗·恩格斯的《德国来信》和《法国来信》这两组文章都是为乔·朱·哈尼1849—1850年出版的宪章派杂志《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撰写的。早在1849年3月,哈尼就邀请恩格斯作该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但只是在1849年11月,当恩格斯来到伦敦后,他才能开始为之撰稿。

恩格斯根据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亲身经历写了《德国来信》。他使用的是德国和英国报刊上的材料,以及当时某些流亡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盟员提供的信息。按照当时杂志的实际需要,这组文章注明的写作地点是科隆。《德国来信》共四篇,分别写于1849年12月18日以及1850年1月20日、2月18日和7月21日,于1850年1、2、3和8月发表在《民主评论》上。

在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运动中的革命派建立了紧密联系,并利用《民主评论》向广大劳动人民宣传科学共产主义、介绍大陆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性质。《德国来信》和《法国来信》在宪章派报刊上得到了广泛的反应。《北极星报》在评介新的几期《民主评论》时,总要指出这些书信的特别重要意义。《北极星报》(1850年1月5日第637号)在评论中写道,《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将有助于推进国际间友爱的光辉事业。”《北极星报》(1850年2月2日第641号)在谈到《民主评论》最新的一期时写道:“《法国和德国的来信》无疑是《民主评论》这一期中最重要的材料。揭露欧洲暴君们的图谋和列举事实证明法德两国革命精神在发展,这就赋予这些信件以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提到《来信》中揭露反革命政权及其工具——波拿巴总统的图谋时,宪章派报纸在3月这一期这样写道:“这一期所刊登的《来信》证明,伟大的事件已为期不远。”(1850年3月2日《北极星报》)后来,在1850年4月6日和5月4日的《北极星报》上又刊登了关于《来信》的评论。其他报纸,如《人民报》也评论了最近一期《民主评论》上登载

的新的、极为重要的法国和德国来信(1850年《人民报》第2期第304页)——119、241、291、456。

- 41 秩序党(Ordernongers)这个名词是按照宪章派报刊上常见的两个词(profit-mongers, moneymongers)类推出来的,恩格斯在这里是第一次使用它;在《法国来信》中,他用这个词指秩序党(见注54)的拥护者。——119。
- 42 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奥地利,匈牙利,法国东部,捷克,荷兰和瑞士。它是由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119。
- 43 以前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即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见注249)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的德意志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全权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见注16)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联邦议会从1850年9月2日开始仍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从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由北德意志联邦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了。——119。
- 44 奥地利大公约翰1848年6月29日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推选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作为临时国家元首,他和内阁一起组成法兰克福帝国中央临时政府。法兰克福帝国内阁(见注18)于7月12日正式成立。联邦议会把权力移交给它,并停止了议会的活动。1849年12月过渡政府(见注45)迫使约翰放弃了帝国摄政王这一职位。——119。

- 45 过渡政府是根据普鲁士和奥地利在 1849 年 9 月 30 日签订的关于在德国宪法问题未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共同领导德国事务的临时协议成立的普鲁士奥地利联合委员会,实际上等于恢复了联邦议会(见注 43)。——119、269。
- 46 杂志编辑部在此处加了一个按语:“收到这封信以后,摄政王辞职并把他的权力(?)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代表的消息就传到了英国。这样就结束了这场法兰克福丑剧。《民主评论》编辑部”。这个按语大概是恩格斯本人写的。——120。
- 47 三王联盟是 1849 年 5 月 26 日在柏林缔结的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之间的协议,是普鲁士王朝力图夺取德国领导权的尝试。这个协议规定要按照普鲁士王朝的利益修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甚至选出了议会,并于 1850 年 3 月 20 日在爱尔福特举行了会议。1850 年 11 月,在俄国和奥地利的压力下普鲁士被迫取消了这个联盟。
- 这个联盟之所以被叫作有限的“联邦国家”,首先是因为中央权力的有限性。奥地利和其它许多德意志邦国(巴伐利亚等等)一开始就没有加入联盟,因此三王联盟在当时的著述中有时被称为普鲁士的宗得崩德(见注 61)。
- 所谓 5 月 28 日就感到分娩时的阵痛,暗指 1849 年 5 月 28 日普鲁士发表了邀请其他德意志各邦国加入三王联盟的号召书。只有一些小邦国慑于普鲁士的威势和再次爆发革命,响应号召加入了三王联盟。——120。
- 48 陪审法庭 1849 年 12 月在柏林和科尼斯堡宣布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翼领导人贝·瓦尔德克和约·雅科比无罪,这两个人曾由于拒绝按照普鲁士政府的要求离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去参加斯图加特的残阙议会(见注 9),因而被控以叛逆罪。——123。
- 49 奥伦治派是爱尔兰的秘密组织奥伦治会的成员。奥伦治会成立于 1795 年,以镇压过 1689—1691 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命名。奥伦治会以维护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为目标,采取大屠杀和政治谋杀及其他暴力手段迫害爱尔兰天主教居民,在新教教徒聚居的奥尔斯脱、北爱尔兰有很大影响。但是与大地主和新教、天主教的高级僧侣的愿望相反,在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在爱尔兰积极活动期间,新教奥伦治会和天主教的普通百姓一致拥护土地同盟的土地要求,并在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改善了相

互之间的关系。——123。

- 50 恩格斯的《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一样，都是为乔·朱·哈尼的《民主评论》撰写的（见注 40）。恩格斯于 1849 年 12 月 20 日—1850 年 7 月 23 日写的《法国来信》共八封，发表在 1850 年 1—8 月的《民主评论》上。按照当时杂志的实际需要，恩格斯在伦敦写的这组文章注明的写作地点是巴黎。

恩格斯写这组文章时不仅利用了法国、英国等报刊上的报道，还利用了其他人，包括流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201）盟员提供的材料。恩格斯在《法国来信》中所援引的事实及对事件的深刻分析，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观点。参看《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评。1850 年 5—10 月》（见本卷第 129—240 和 575—621 页）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125—242 页）。——124、246、295、382、410、444、460。

- 51 饮用酒税问题指废除酒税的法案。制宪议会曾于 1849 年 5 月 19 日通过决定，从 1850 年 1 月 1 日起废除酒税。关于废除酒税的法案于 1849 年 12 月 18 日提交国民议会进行讨论。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分析了饮用酒税的来龙去脉及其对政局的影响（见本卷第 209—212 页）——124、208、215、247。

- 52 入市税(Droit d'octroi)起源于封建时代，当时对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征收关税是城市的一种权利。它在 1791 年法国革命时期曾被废除，后来又恢复了对输入的粮食、盐、葡萄酒、鱼等征收关税。——125、345。

- 53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1848 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1848 年 2 月 24 日—5 月 4 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3 月 5 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127、137、151、159、166、171、378。

- 54 秩序党指法国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 年）正统派（见注 67）和奥尔良派（见注 80）联合组成的政党。正统派是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支持在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 年）统治法国的奥尔良王朝，代表



了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互竞争的这两个君主主义集团在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见注5)失败后联合组成秩序党,它的领导人是阿·梯也尔、皮·法卢、沙·福·蒙塔朗贝尔等人。——127、185、221、383、412、416、603。

- 55 在1848年12月10日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投票拥护候选人路易-拿破仑的有5 343 000人,占参加选举的总人数的四分之三。——127。
- 56 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二月革命(见注4)前是路易-菲力浦的宫殿。爱丽舍宫从1848年12月起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总统官邸。——128、331。
- 57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组连载文章,是1849年底至1850年11月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写的。文章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组署名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最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是以《从1848到1849年》这一总标题发表的,原计划包括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1、2、3三期上只发表了前三篇文章。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则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时评》中得到了阐述。

马克思这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1850年4月2日《自由射手》第40期发表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启示》和马克思这一著作的摘录。当年4月15日《大胡蜂周报》(加塞尔)第3期对该文发表了一篇评论。1850年4月5、12和19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62—264号转载了马克思的引言和第一篇文章。1852年1月在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创办的《体操报》上,刊登了约·魏德迈在马克思影响下写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不仅写了导言,还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见本卷第582—583和603—614页)。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写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断的性质”。当时前三章的标题也有改动: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用1895年版的标题。——129。

- 5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日至29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见注65)。——132、331、482。

- 59 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这次起义中第一次举起了红旗。当政府派出军队时,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最后还是被军队镇压下去了。

1834年4月9—13日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行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四季社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结果遭到了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起义失败后布朗基、巴尔贝斯及其他一些起义者遭到流放。——132、330、362。

- 60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有在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

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135、364。

- 61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其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于是宗得崩德在11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1848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

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见注62)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内政,维护宗得崩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这个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135、272、293、364、742。

- 62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见注249)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见注58)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35、164、271、292、384、387、435、438、456、648、655。

- 63 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1848年1月12日,当地人民举行起义,经过

两周激战,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退出这座城市。巴勒莫建立了临时政府和议会。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时,巴勒莫起义也被镇压。——135、364。

- 64 1847年春,法国安德尔省比藏赛的居民,由住在附近农村的饥饿的工人带头,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藏赛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847年3月底4月初对参加暴动的人进行审讯,结果三人被判处死刑,很多人被罚做苦役。——136、364。
- 65 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58)至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4)之间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统治时期。——137、184、261、363。
- 66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见注65)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就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137、171、365。
- 67 正统派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作家和政客。——139、151、179、296、366、378、446、672。
- 68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存在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所用的蓝白红三色的法国旗帜。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红色的旗缘。——141、381。
- 69 高教会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

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45、371。

- 70 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一法郎附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这种附加税的重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并在1848年12月16日的总统选举中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146、215、246、373。
- 71 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它是用来补偿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146。
- 72 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果树,人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因而禁止人们摘食。——146、214、374。
- 73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至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主义者将其解散,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后者一边。——147、163、178、375。
- 74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绰号。他们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147。
- 75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4)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见注5)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曾经利用了国家工场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

- 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148、176、375。
- 76 习艺所是依据1834年英国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案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148、299、321、376。
- 77 在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西班牙的喜剧中常常是主人假装成仆人,仆人假装成主人,结果闹出了又混乱又可笑的纠纷。——148。
- 78 指1848年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4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结在奥·布朗基和泰·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求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巴黎3月17日群众示威游行的结果,是正规军从首都撤离(4月16日事件后他们又被召回),以及国民自卫队的选举被推迟到4月5日,制宪议会的选举被推迟到4月23日。——149。
- 79 从本页到第427页,国民议会是指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的制宪国民议会(制宪议会)。——150。
- 80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58)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151、179、296、378、446。
- 81 执行委员会是法国制宪议会1848年5月10日为了代替辞职的临时政府而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路·卡芬雅克上台为止。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多半是温和的共和派。赖德津-洛兰是这个委员会中的左翼代表。——152、158。
- 82 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

- 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阿·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见注75)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153、160、338、379、382、447。
- 83 山岳党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1848—1851年,山岳党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属于山岳党。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又称新山岳党。——158、192、229、336、445、602、734。
- 84 指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见注249)上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164。
- 85 法兰西共和历是法国从1793年10月24日至1806年1月1日期间为取代格雷果里历采用的新历法。为消除基督教的影响,该历法日和月的名称都取自自然界和不同的时令,如雾月、收获月等。附在格雷果里历日期上的圣徒名字则代之以种子、树木、花卉和水果的名字。——164。
- 86 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继承了犹太的王位。——168。
- 87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徽号——169。
- 88 这句话引自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的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沃尔弗的通讯代号。不过,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审过。——169。

- 89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 18 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171、216、248。
- 90 公安委员会是 1793 年 4 月 6 日由国民公会(见注 91)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 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 1795 年 10 月被解散。——182、197、654。
- 91 国民公会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 1792 年 9 月存在到 1795 年 10 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28 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 年 7 月 27 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 1795 年 10 月 26 日被解散。——183、193、649。
- 92 指 1849 年 3 月 7 日—4 月 3 日在布尔日对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参加者进行的审判(见注 82)。——187、447。
- 93 十字军征讨指 11—13 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二百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1。
- 94 从本页到本文结束,国民议会是指 1849 年 5 月 28 日至 1851 年 12 月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192。
- 95 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 1849 年 6 月 12 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该报于 1843—1851 年在巴黎出版,由维·孔西得朗主编)编辑部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195。
- 96 1849 年 6 月 13 日“宪法之友社民主联合会”在《人民报》第 206 号上发表的宣言中,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195。



- 97 山岳党的宣言载于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195。
- 98 马克思指的是由三个红衣主教(德拉真加、瓦尼切利-卡索尼和路·阿尔蒂埃里)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的支持,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教穿的是红色衣服。——200。
- 99 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个疗养地。法国王位追求者(圣路易的孙子)、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德·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是指 1849 年 8 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201。
- 100 潘都尔兵是奥地利军队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规步兵。——201。
- 101 伦敦附近有一个城堡克莱尔蒙特。二月革命后(见注 4)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后曾住在该地。这里指的是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202。
- 102 “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是马克思套用的切扎雷·博贾的座右铭“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博贾(1475—1507)是意大利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以博贾为“新时代君主”的楷模,鼓吹“欲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论调。——202。
- 103 “出乎真意”(motu proprio)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谈教皇国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 1849 年 9 月 12 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202。
- 104 完全红色的候选人指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旺,在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死亡而举行的补选中,他在 36 000 票中得票 21 668 张,当选为红色议员。两个正统派候选人是:保守派的格雷尔得票 12 745 张,正统派的卢杜埃得票 9 249 张。——215、248、273。
- 105 1850 年 3 月 10 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领土分成了五大军区,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四个区的包围之中,而这四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的报纸强调指出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一模一样,所以称这几个区为帕沙辖区。——215。
- 106 指 1849 年 10 月 31 日路易·波拿巴总统给立法议会的咨文,他在咨文中通

知说,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216。

107 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号召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善良”。这个信件发表在1849年11月11日《通报》上。——216。

108 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18、282、347、574、596。

109 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4)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象征自由的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种植自由之树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当时国民公会还作了明文规定。

1850年1月,借口排除街道交通障碍,在警察局长的命令下砍倒了“自由之树”。——220、295、355。

110 七月纪念柱是为纪念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58),在巴黎巴士底狱广场上建造的建筑物。1833—1840年建成。它是一根镀有青铜的考林莘式圆柱,高50米。上面刻有1830年七月革命中牺牲的504位战士的姓名;圆柱底部的地下墓室安放七月革命殉难者的遗体。柱座的四只角上装饰着高卢雄鸡,柱顶立有青铜制作的自由守护神像。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4)后,柱上又装饰了不谢花花圈。——221。

111 巴托罗缪之夜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屠杀异教徒的事件。1572年8月23日到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杀害了大批胡格诺教徒。——223。

112 据希腊神话,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

——224。

- 113 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个城市,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225。
- 114 蒲鲁东关于所谓“人民银行”的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谈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声报》上,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228。
- 115 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银行券的强制比价,废除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办法。到1819年才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制度。——228、595。
- 116 亚·勒克莱尔是巴黎商人,他由于以国民自卫军身分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见注5)的暴行而获得了荣誉勋章。  
在《法国来信》中(见本卷第412页),恩格斯讽刺地称他为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230、412、603。
- 117 《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它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之为卫戍官。——230、603。
- 118 指两个文件:一个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第6号上的《山岳党告人民书》,另一个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该报第7号上的《告人民书》。——233。
- 119 拉摩勒特式的接吻(Baiser Lamourette),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在他这个提议的影响下,各敌对党派的代表热烈地彼此拥抱了,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记了。——234、607。

- 120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 32 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要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 25 个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 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 39 人组成:常务局 11 人,庶务 3 人和选举产生的委员 25 人。——235。
- 121 指所谓的《威斯巴登宣言》,这个宣言是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泰勒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 1850 年 8 月 30 日在威斯巴登草拟的。在宣言中规定了正统派执政后所要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由于以议员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这个声明在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论战。——236、609。
- 122 十二月十日会是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 1848 年 12 月 10 日经普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一组织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 1849 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 1850 年 11 月该组织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 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237、610。
- 123 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指的是图尔恩-塔克西斯的马克西米利安·卡尔。从 1615 年起,德意志帝国的邮政事业(除普鲁士和其他几个小邦以外)是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家族的世袭权利,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德意志帝国分解为一系列地区以后,图尔恩-塔克西斯家族失去了这种特权,并因此得到了政府的土地和金钱补偿。
- 1815 年图尔恩-塔克西斯首先和德国南部的一些邦国签订协议,将邮政运输的特权通过每年缴税或作为封地交还给图尔恩-塔克西斯。1815 年德意志联邦条例第 17 条确认了 1803 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和后来的协议给予图尔恩-塔克西斯的在各个联邦国家中的邮政经济特权。一直到 1851 年,邮政才转由国家管理。——242。
- 124 1849 年 3 月 4 日帝国议会起草了奥地利宪法,但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未生效。因为同年 3 月 7 日帝国议会已被解散。之后奥地利政府于 1849 年 12 月 29 日向皇帝提交一项建议,其中阐述了宪法的基本特征。皇帝作出一项决定:委托政府执行。建议和决定于 1850 年 1 月 4 日发表。
- 1850 年 1 月和 2 月,奥地利帝国内的一些德意志邦国也颁布了根据奥地利宪法制定的宪法,这些宪法也未实行。——242。

- 125 指科布顿 1850 年 1 月 18 日在主教门大街伦敦酒馆一次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这次集会是为讨论俄国建造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要求借债 550 万镑而举行的。科布顿宣称,迄今为止借款已造成 145 000 英镑的损失。他尤其反对向俄国提供外汇贷款。向沙皇提供钱财意味着赞成沙皇的暴行。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和科布顿的演说发表在 1850 年 1 月 19 日的《泰晤士报》上。——243。
- 126 1848 年 12 月 5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了普鲁士制宪议会,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宪法的基础是普鲁士制宪议会 1848 年讨论后并作了某些有利于封建政党的修改的方案。根据这个宪法,普鲁士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借助年龄和财产的限制成为一个有特权的贵族院;根据 1848 年 12 月 5 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被允许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宪法承认国王有权改变两院的任何决议,有权“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否决两院公布的法律,而且可以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款,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命大臣,宣布战争,决定和平。国王被授予完全的行政权,并与议会一起享有立法权。——243。
- 127 指 1849 年 5 月 30 日颁布的新选举法。它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9 年 4 月解散了第二议院之后颁布的,它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和各阶层代表权不平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选举人根据其全年税收额分为三个级别,每个级别不论其选民人数多寡,都推出同样数量的选举人。国王用这种办法,得以选出一个俯首听命的众议院多数,并于 1849 年 8 月 7 日开会时,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宪法。——243。
- 128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50 年 1 月 7 日的咨文,其中包括他对 1849 年 8 月 7 日宪法(见注 127)的修改意见。(见 1850 年 1 月 10 日《普鲁士国家通报》第 10 号和 1850 年 1 月 11 日《新普鲁士报》第 9 号)——244。
- 129 指类似英国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星法院(Court of Star Chamber)是 15—17 世纪英国的最高审判机关,设在韦斯明斯特的皇宫里的会议大厅,因天花板用繁星作为装饰而得名。它是亨利七世在 1487 年为惩罚叛乱的封建贵族而设立的一个特殊议院。它曾被查理一世用来推行不得人心的政治与宗教政策,成为压制议会和反对清教徒的象征。它施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如监禁、枷刑、鞭笞和火烙等。在伊丽莎白一世时,该院变为一个政治议院;17 世纪英国革命时期该院于 1641 年被长期国会废除。——244。

- 130 这里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新年诏书《致我的军队》，此诏书于1849年1月1日在波茨坦签署，并发表在1849年1月3日的《普鲁士国家通报》上。《新莱茵报》曾利用这份文件来揭露普鲁士军队的反革命行为（见马克思1849年1月8日写的《新年贺词》）。——244。
- 131 米尔海姆的工人们，其中包括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对这些工人的审讯是1850年1月17—19日在科隆进行的，他们被宣告无罪。——245。
- 132 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阶级指法国农民，谈到最近12—15个月法国农民情绪的变化时，恩格斯是与1848年10月至11月他在法国旅行时得到的关于法国农民敌视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印象作对比的，参看恩格斯的《从巴黎到伯尔尼》第1节后半部分。——246。
- 133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大地主交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自由农的选举财产资格规定为年纯收入40先令（2英镑）。  
这里也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恩格斯在描写法德两国实际生活中的现象时，尽量使用英国工人熟悉的概念。——246。
- 134 1849年12月13日，为了使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教师离职，早在通过新教育法（见注135）之前，教育部长帕略就曾向立法议会提出一项临时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教师受警察局长控制。这项法令于1850年1月11日通过。——247。
- 135 新的公共教育法法案是教育和宗教部长法卢于1849年6月18日提出的教育法草案。该法案确定了天主教会和宗教机构在公共教育中的统治地位，由立法议会于1850年3月15日通过。——248。
- 136 1850年1月20日《总汇通报》第20号上曾发表一则消息说，立法议会将于1850年1月21日审议关于把六月起义（见注5）参加者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去的法令。流放殖民地法于1850年1月24日通过，见1850年1月30日《总汇通报》第30号第333页。——248。
- 137 这三篇书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付排后，于1850年2月写成的。但是写作可能于1850年1月已经开始。因为道默和西蒙的书在1849年底已经出版，所以前两篇书评写于1850年1—2月，而基佐的书于1850年2月才出版，书评只可能写于1850年2月。

三篇书评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发表时均未署名。但是恩格斯1892年在他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说“此外,他还写过(和恩格斯一起)许多书评和政治评论。”马克思在1843—1844年第一次逗留法国期间已经开始研究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历史和基佐的著作。因此,可以相信,关于基佐的书评是他写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三篇书评都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著作收入本卷。——249。

- 138 《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星相学家、查理九世的医生诺斯特拉达穆斯用诗的形式写的、极为模糊而难解的预言。

苏格兰人的未卜先知是一种能洞察未来和普通人无法看到的现象的能力,根据迷信传说苏格兰山地居民具有这种能力。

动物的磁性是18世纪奥地利医生麦斯默尔的学说,他认为用催眠性的暗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254。

- 139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派与多数派通过妥协在皇权问题上取得一致。1849年3月28日在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的问题进行表决时,290票赞成,248票弃权,无人反对。议会决定派遣代表前往柏林邀请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后者认为皇冠只能由各邦君主授予,遂于1849年4月3日拒绝国民议会为他加冕,代表团失败而归。——257。

- 140 指哥达派,即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以弗·达尔曼、马·西姆桑、弗·巴塞耳曼、亨·加格恩、卡·布吕格曼等人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属于右翼自由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政府的决议之后,他们有148名代表宣布退出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25—27日在哥达城单独召开三天会议,故而得名。最后有130名与会代表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实现德国统一。于是哥达派一词被习惯地用来指背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258。

- 141 1849年6月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在斯图加特议会(见注9)中谴责了符腾堡政府反对国民议会的行为,并声明支持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武装斗争。但是,这一决议纯粹是宣言性质的。议会害怕广泛的人民运动,而没有给起义者任何具体的援助;另外议会不听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和法兰克福左派领袖谈判时提出的建议,拒绝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

起义部队来保卫国民议会。——258。

- 142 指英国 1688 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 1689 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261。
- 143 英格兰银行是 1694 年由私人创办的一家银行。当时,英国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向放债者作出特别让步,允许他们组建英格兰银行,授予它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创办者把银行的固定资本借贷给政府,英国的国债便由此产生,英格兰银行实际上由政府控制,起着国家银行的作用(见《资本论》第 24 章第 7 篇第 6 节《工业资本家的产生》)。19 世纪该行逐渐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1844 年银行法令确认它为发行货币的中央机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它在名义上仍是一家私人银行,1946 年才正式成为国家的中央银行。——262。
- 144 指 1640 年在里斯本、1647—1648 年在那不勒斯、1674—1676 年在墨西哥爆发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264。
- 145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 1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1679 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见注 146)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 年的议会改革(见注 147)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 年废除谷物法(见注 162)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265、301、357、597。
- 146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 17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形成,1679 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反对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见注 145)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



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见注 180)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 108)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265、302、357、596。

- 147 指1831年改革法案,它是辉格党(见注 146)内阁首相格雷和副首相罗素当年3月在议会中提出的一项法案。这个法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1832年6月7日这个法案被英国上院最后批准。但是为此项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未获得选举权。恩格斯在《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中对此作了评介(见本卷第299—310页)。——266、302。

- 14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第4期和第5—6期合刊上发表的三篇《时评》,当时没有署名。但是根据恩格斯1849年12月22日写给沙贝利茨的信、马克思1851年9月2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来看,这些时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此外马克思在1860年写的《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中也都说明他们两人是这些《时评》的作者。

第1篇《时评》原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写的,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后移至第2期,编辑部曾在说明中通告了这一情况。这篇《时评》的主要部分写成于1850年1月31日,在得知该文延期发表后又于2月底以前为这篇《时评》补写了结尾部分。

第3篇《时评》在发表时,作者在《时评》下面加了“5—10月”的字样,因此现在本版也为第1、2两篇加上了写作日期。——267、355。

- 149 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普鲁士王室为共同反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在1848年革命一开始时就达成协议。但是,随着反革命地位的巩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开始感到自己的同盟者是一种累赘,并且越来越加紧阻止大资产阶级的立宪的要求。后者一面继续维持跟王室的同盟关系,一面在普鲁士议会中假作“反对派”。1848年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了普鲁士制宪议会,在当天就“钦定了”宪法(见注 126),使双方勉强达成的协议和还不完全和解的局面陷于危机。但是这个宪法里还保留了某些民主果实,如普选权等。这一点保证了1849年1月的第二议院,即下院选举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能够当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曾经批评国王,常常惹得国王不愉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9年4月解

散了议会,1849年5月30日公布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和不平等的各阶层的代表人数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国王用这种手段使得下院当选的议员多数是顺从的人,因而在1849年8月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宪法。——267。

150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50年1月7日的御函,发表在1850年1月10日《普鲁士国家通报》第10号上。其内容是要修改和补充1848年12月5日的宪法草案(见注126)。——267。

151 1850年1月31日两院通过的普鲁士宪法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誓忠于的宪法,这部比1848年钦定宪法(见注126)更反动的宪法规定在普鲁士保留主要由封建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和按三级选举制选举出来的下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和危害国内安全的案件。为了保留国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宪法规定凡有作战能力的普鲁士居民都由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调配。根据宪法第40条,保留了地产长子继承权——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继承形式,按这种继承形式,所有权不得转让,归长子所有。1850年宪法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在普鲁士仍然有效。——267、291、574。

152 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的权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低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

1848年4月召开第二次联合议会,同意了一笔数额为2500万塔勒的借款。——268。

153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柏林的贝·瓦尔德克和特里尔的卡·格律恩的诉讼案件。他们在1849年因其政治活动被控。这两次诉讼案件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政府在与对手斗争时不惜伪造证据;另外,“民主主义”的代表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自己对普鲁士政府的忠心。

尽管如此,出席法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旁听者还为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喝采。——268。

- 154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统一的企图,即联合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君主以及与这些君主联合在一起的17个其他德意志邦的君主,共同建立德意志君主联邦,从而实现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小德意志”计划。这个计划受到右翼自由派,即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哥达派(见注140)的代表的支持。

爱尔福特指1850年3月20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议会。哥达派的代表积极参加了该议会的选举,并在议会中努力使修改后的全德宪法新草案得以通过。在奥地利君主和俄国沙皇的压力下,一些从前支持普鲁士的德意志邦转到了奥地利一边,而普鲁士政府由于不敢违抗尼古拉一世,于1850年4月29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议会。——268。

- 155 海外贸易公司(Seehandlung)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成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1820年1月起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269。

- 156 边屯居民是16—19世纪的奥地利帝国南部边屯地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巴纳特)的居民,他们须担任边防勤务,才能耕种土地。——269。

- 157 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按照奥地利和俄国皇帝的要求交出匈牙利和波兰政治流亡者,1849年8月奥地利、俄国中断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土耳其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270。

- 158 圣胡安-德乌卢阿是叙利亚的城堡,在1831—1833年埃及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于1832年曾被埃及军队占领。

圣让达克是委拉克路斯(墨西哥)的城堡,是墨西哥独立战争时期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堡,1825年光复。——271。

- 159 大陆封锁或大陆体系,是拿破仑第一在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于1806年11月21日宣布的命令。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封锁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俄国和奥地利等国。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封锁便瓦解了。——271。

160 15世纪以来瑞士是西欧各国雇佣兵的兵源。雇佣兵条约是指瑞士各州和欧洲各国从15世纪到19世纪中叶签订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在18—19世纪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瑞士的雇佣兵充当保皇派反革命势力的工具。

旧州指瑞士的山区各州,这些州在13—14世纪是瑞士联邦的基本核心。——272。

161 1707—1806年,纳沙泰尔和瓦朗然(德文称作诺因堡和瓦伦迪斯)公国为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纳沙泰尔归法国所有。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纳沙泰尔公国作为第二十一州加入瑞士联邦,同时保持它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1848年2月19日,纳沙泰尔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最终结束了普鲁士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关于1848年纳沙泰尔的事件,见恩格斯的《昔日的公国》一文。——272、293。

162 指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谷物法是从187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法令。它维护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影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谷物法。1838年反谷物法同盟成立,从而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最后帝国议会终于在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而实际上该同盟一直存在到1849年。——274、302、357、365。

163 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46年谷物法废除(见注162)后,英国工人利用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矛盾,迫使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了新的工厂法,即十小时工作日法,规定从1847年7月11日起童工(13—18岁)和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从1848年5月1日起再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工厂主没有遵守这项法案。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本卷第282—288和299—310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中作了详细考察。——274、283、299。

164 《十小时工作日问题》是恩格斯为宪章派左翼领袖乔·哈尼办的《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写的,文章写于1850年2月中旬,署名

弗·恩。

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已有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联系工厂主新近发动的反对十小时工作日的运动进行论述。文章在英国工人阶级报刊引起强烈反响。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为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有了新的认识。——282。

- 165 贵格会(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19世纪20年代产生的主张革新教友会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贵格会(区别于信奉正统教义的贵格会——“干的”贵格会)。——283。
- 16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较晚的一些著作中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十小时工作日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见马克思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284。
- 167 指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它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284。
- 168 轮班和替班制度(relay或shist system)是英国工厂主为了逃避法律对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的限制而采取的一种混乱的换班制度。当时年满18岁的男工每天从早上5点半开始工作到晚上8点半,共15小时。为了能在此时间内为成年工提供足够的辅助劳力,厂主便给那些受法律保护的未成年工和妇女规定了不同的上班时间。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时间被分成了两段,还避开了法定的吃饭时间。由于这些人的上班时间不一样,使工厂视察员很难进行监督,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285、306。

- 169 财务法院(Court of Exchequer)又称高等控诉院,是英国最老的法院之一,起初主要处理财政问题,19世纪执行英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职责。

财务法院于1850年2月8日宣判被控破坏十小时工作日法的厂主无罪。这一裁决事实上等于取消了十小时工作日法,因此引起工人的反对。1850年8月5日议会颁布了新法案,规定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为十个半小时,并规定了上班和下班的具体时间。——285、299。

- 170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打算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头两期合在一起出,但是出版商从营业角度提出合理的理由反对这样做,而在变更出版计划时恰值马克思生病,所以杂志第1期只能在2月的第2个星期出版(见1850年2月4日马克思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这篇《启事》。杂志第1期是1850年2月28日在汉堡付排的,由此推算,《启事》写于2月最迟可能于2月20日左右从伦敦寄出。

这则《启事》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第1期。编辑部在《启事》末尾作了如下说明:“《新莱茵报》每月出版1期,每期篇幅不少于5印张。预订每季为25银格罗申,零售每本为10银格罗申。责任出版者为康·施拉姆。”——289。

- 171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2期发表了《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二章(1849年6月13日);《启事》中所说的第三章《六月十三日对大陆的影响》以《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为标题载于《评论》第3期;马克思把第四章的和第三章的一部分构思写进杂志的其他文章,尤其是他和恩格斯合写的《时评》中了。——289。

- 172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章以《为共和国捐躯!》为标题,发表在1850年4月11日左右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3期上。——289。

- 173 1849年底就已计划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刊登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32)所作的经济学讲演。恩格斯于1849年12月22日写信给沙贝利茨说,第1期“如有可能,还包括马克思在这里工人协会所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讲演的第一讲”。2月初时肯定已计划在第1或第2期上刊登讲演的第一讲,因为本启事已预告第3期将刊登第二讲。但事实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未能发表马克思任何一篇经济学讲演。——289。

- 174 威·沃尔弗的文章按照 1849 年 12 月的计划是为第 1 期写的(见 1849 年 12 月 22 日恩格斯写给雅·沙贝利茨的信)。后来以《“帝国”后事》为标题发表在 1850 年 4 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第 73—79 页。——289。
- 175 按照马克思的要求,关于普鲁士的财政状况一文应由德国的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古·贝根罗特来写,他 1850 年 2 月 10 日在答复马克思 2 月 7 日的信时答应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后来贝根罗特被驱逐出柏林,使这项计划未能实现,贝根罗特在 1850 年 3 月 9 日的信中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恩格斯。——289。
- 176 1848 年柏林三月革命(见注 16)期间,柏林的街垒战士于 3 月 19 日下午把前一天牺牲的战友的尸体抬进宫中庭园。在那里举行集会,要求国王到阳台上向牺牲的起义者脱帽致敬。在一片“脱帽”的呼喊声中,国王被迫满足了起义群众的要求。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宣誓,指他在 1850 年 2 月 6 日就宣誓忠于普鲁士宪法(见注 151)所做的讲演。——291。
- 177 1849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5 日,最高法院在凡尔赛开庭审理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游行参加者的案件,这次游行是由岳党议员为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罗马的革命(见注 11)而组织的。在 76 名被告当中,有 29 人是缺席审判的;审讯结果,11 人被宣判无罪,36 人被判处驱逐出境。——296。
- 178 恩格斯这篇文章写于 1850 年 3 月中至 4 月中,发表在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和《十小时工作日问题》(见注 164)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考虑到德国读者的需要,更多地叙述了该法案的形成过程以及许多细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8 章《工作日》中引用过恩格斯的这篇文章。——299。
- 179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 19 世纪 30—50 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见注 167)。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

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运动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300、601。

- 180 皮尔派是19世纪40年代在罗·皮尔周围联合起来的一批温和托利党人(见注145),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见注162),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从而使皮尔分子集团独立出来。1850年皮尔去世以后,皮尔分子成了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19世纪50年代末,他们加入了当时形成的自由党。——302、598。
- 181 指英国19世纪30—40年代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所颁布的一系列的法令,其目的在于反对买卖官职和授予贵族家族的代表以挂名领高薪的职位。——304。
- 182 指1833年在英国议会中进行过讨论、1834年在议会中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的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76)。——304、322。
- 183 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是为了保护英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条例。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口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条例。航海条例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后,沿海贸易还只能用英国船只,1854年航海条例才被全部废除。——305。
- 184 这三篇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中(可能是在3月20日第3期稿件寄往汉堡之后)至4月18日之间写的。《当前的时代》发表于1850年2月,《模范监狱》发表于1850年3月初,谢努的小册子于1850年2月中出版,德拉奥德的小册子于3月1日出版。从对谢努和德拉奥德的评论



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出,评论是在3月10日选举结果公布以后,也就是说最早写于1850年3月中。

三篇书评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发表时均未署名。但是恩格斯1892年在他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说:“此外,他还写过(和恩格斯一起)许多书评和政治评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工可以推测,评卡莱尔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恩格斯于1844年就曾著文论述过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评日拉丹的文章是马克思写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三篇书评都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著作收入本卷。

对卡莱尔《当代评论》的评论于1871年以《历史学家》为标题在《人民国家报》上转载。编者加了脚注说明是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转载的。编者加的另一一些脚注解释了个别常见的外来词。除标点符号和单字拼写稍有不同外,转载时未作其他改动。马克思在1871年4月13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认为重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书评是不合适的。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通信中没有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重印表示同意。

对谢努的书的评论于1886年以《叛逆者和法国警探》为标题在《新时代》上转载,编者按语指出转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被称为作者。《新时代》的编辑卡·考茨基当时住在伦敦,和恩格斯紧密合作。所以可以断定,他是经过恩格斯同意进行转载的,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同作者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转载时对单词拼写和标点作了修改。考茨基把不常用的法语词译成德语,并加了几个解释性的脚注,还有几处编者按语中未提及的删减。——311。

- 185 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近似于共济会(见注186)的秘密团体,由对国王专制制度不满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伊留米纳特害怕一切民主运动,它的章程把普通会员变成了领导人的盲目工具。1784年被巴伐利亚当局取缔。——318。
- 186 共济会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一种秘密团体,旨在传播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后来,随着英帝国向外扩张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共济会谴责封建制度和英国国教,谋求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宗教。共济会秘密分会的活动是

- 模仿工匠行会的神秘典礼和秘密仪式。该会会员赋予自己净化道德、慈善为怀和革新世界的任务。他们相信永恒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有他们最智慧的领导人物才能认知,这些领导人物是至高无尚的权威,负责教育一般会员遵守这些规律,培养博爱、正义和启蒙的精神。——318。
- 187 《魔笛》是莫扎特利用艾·希卡内德的歌词谱成的歌剧。这部歌剧以天真的童话般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谁真正理解了自然界蕴藏的力量,并且始终不渝地遵循它的规律行事,谁就会得到好报,而恶人则会得到恶报。——318。
- 188 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见注108)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320。
- 189 新四季社是在1839年四季社被镇压后不久成立的秘密组织,似乎是四季社的继续。该社的骨干是工人;参加该社的还有大学生。其成员就观点来说倾向于革命的巴贝夫主义并受泰·德萨米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325。
- 190 密谋家小集团、秘密的革命组织的成员曾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恐怖活动。警察局的奸细也混入了这一冒险行动中,他们把密谋家的活动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把密谋的参加者一网打尽,并于1847年对密谋家进行了审判。——330。
- 191 指沙·傅立叶的下面几本著作:《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虚假的、分散的、令人厌恶的、欺骗的行业和符合本性的、协调的、诱人的、真实的行业》1835—1836年巴黎版;《宇宙统一论》(四卷集)1841—1843年巴黎第2版;这部著作第1版称作:《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在傅立叶的遗著当中,1845年发表在《法郎吉》杂志上的未完成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部分地谈到贸易问题。恩格斯把这个著作中的许多片断译成了德文并在1846年把它们刊登在《德国公民手册》上,见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337。
- 192 1850年3月10日,法国举行了立法议会议员的补选,以递补被开除的山岳党人。选举结果,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获得胜利。——341。

- 193 注册税(Droit d'enregistrement)是办理买卖合同、馈赠文约、法庭判决等文件的注册备案手续所纳的税。文件经过这样注册,一方面证明它是真实可靠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库收入的一个来源。——344。
- 194 恩格斯的《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是为卡·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见本卷第132—157页)写的简介。简介写于1850年春,分三次在1850年4—6月《民主评论》上连载,每次发表时最后都注有“待续”字样,但是第三次以后的后续部分一直没有出现。这篇文章开头讲述了《新莱茵报》出版的情况和该报编辑们的遭遇,对马克思这一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且还补充了新的事实以及恩格斯自己对法国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在这篇简介里,恩格斯大量摘引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尽量使这些摘引的段落为英国读者所易于理解。马克思原著和恩格斯的简介之间文字上主要的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360。
- 195 指恩格斯自己。他作为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经历了四个战役。起义失败后维利希的部队是最后离开德国国土的,恩格斯随同这支部队于1849年7月12日进入瑞士境内。《新莱茵报》的排字工人以及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盟员也都参加了革命军作战,其中包括在战斗中牺牲的约瑟夫·莫尔。——360。
- 196 恩格斯在写简介时根据的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最后定本而是初稿,因为这一段引文同《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最后定本不完全一致(见本卷第141—142页)。——369。
- 197 从“的确,这样的人选是意义重大的”开始至本段结束,在1850年4月6日《北极星报》评介《民主评论》4月这一期的文章中曾以《卡诺、维达尔和德弗洛特当选》为标题加以引用。——383。
- 198 “现在瑞士已经不在话下”这句话,是《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这两组文章出于一人之手的证据之一。关于神圣同盟(见注62)打算开始对革命进军,恩格斯1850年2月18日曾在《德国来信》第三篇文章中写到过。其中有这样的话:“无疑,如果法国不发生麻烦,下个月就要开始发动对瑞士,或许还对土耳其的‘神圣’战争”(见本卷第293页)。

共和派报纸在选举前经常刊登神圣同盟有即将入侵瑞士和随后入侵法国的报道,这与选举宣传有关。恩格斯在他的《德国来信》第二篇文章中

也报道过这个入侵计划(见本卷第 244 页)。——384。

- 199 恩格斯关于革命和战争迅速临近的这句话证实《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恩格斯曾在第三封法国来信(见本卷第 295—298 页)中谈到革命迅速临近的思想;而关于即将发生战争,关于神圣同盟(见注 62)打算在欧洲发动战争来窒息革命的看法,则在《德国来信》(见本卷第 291—294 页)中谈到。此外,就在这第三篇德国二月来信中,他还谈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专制政府企图为此目的在国外借债的问题。他写道:“俄国和普鲁士筹款是为了打仗。奥地利则是为了筹款而不得不打仗。”(见本卷第 293 页)。在 3 月份的《法国来信》中,恩格斯回到自己以前的想法,得出结论说,“每一个国家单靠国内已经不能把军队继续维持下去——要么把军队解散,要么叫他们靠敌人供养”。——384。

- 200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 3 月 24 日以前写的这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曾在流亡国外的以及德国境内的同盟(见注 201)盟员中秘密散发。1851 年这个文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隆日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上,后来,又被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收入他们编写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1885 年,这篇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71—545 页)一书。——385。

- 201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 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 1836 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 1847 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 年 6 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

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385。

- 202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把协商议会中的自由派称为协商派、妥协派等。1848年11月,在反革命势力进攻下,这一派曾通过拒绝纳税的决议,但是,由于他们仅限于消极抵抗,最后国民议会于1848年12月5日被解散。——387。

- 203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其系列文章《从1848到1849年》(后来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写的补遗,写于1850年3月底—约4月18日之间,和其他文章一起,于4月18日前后寄往汉堡,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在1850年3月17日第166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谈到巴黎财政界和政府就1850年3月10日竞选结果搞投机买卖的问题。马克思在本文中不仅提供了选举之后的投机活动的具体材料,而且直接指出了路易-拿破仑和阿·富尔德的名字。第二年,当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再次分析了富尔德和路易-拿破仑在股票投机方面的联系。——397。

- 204 选民同盟(Union électorale)是奥尔良派、正统派、波拿巴派、天主教派等保皇主义党派在1850年3月10日法兰西立法议会补选期间组成的联盟。——397。
- 205 指位于巴黎意大利林荫路上的托尔托尼咖啡店。在交易所收盘后,人们就在这个咖啡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交易活动。托尔托尼咖啡店及其附近地区被称作“小交易所”,以区别于正式交易所。——399。
- 206 路易·梅纳尔的诗歌《Jambes》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唯一一篇未用德文发表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首法文诗写的按语,大约写于1850年4月上半月,和其他文章一起,于4月18日前后寄往汉堡,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401。
- 207 本文写于1850年4月中旬,发表在1850年4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它是针对金克尔1849年8月4日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而写的。金克尔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代表,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被普鲁士当局关押。奥·吕宁在《新德意志报》(1850年6月26日第151号)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指责了本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中对吕宁等人的指责进行驳斥(见本卷第449—450页)。——402。
- 208 1848年春,在美因茨发生过几起市民自卫团和普鲁士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这些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并且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讨论的题目;议会只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也只是在美因茨市民自卫团已被普鲁士士兵缴械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而已。——404。

- 209 这一声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亨·狄德埃自称是《新莱茵报》的前撰稿人之后,于1850年4月中写的,刊登在当年4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阿·克路斯在1850年3月31日给威·沃尔弗的信中谈到了关于狄德埃这一消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大约在4月10日才获悉该信的内容。——406。

- 210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声明以及后面《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古·司徒卢威、鲁·施拉姆等人试图提高他们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中的地位以抵制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211)的影响而写的。《声明》写于1850年4月18日和20日之间;底稿是恩格斯的手迹。《声明》在伦敦传播,并刊登在许多德国民主主义报纸上。恩格斯的手稿注明的日期为4月20日。——407。

- 211 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属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32)的委员会成立于1849年9月18日,最初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被选入该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1850年9月1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委员会被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控制(见本卷第739页)。——407、700、702、703、704。

- 212 指1849年11月18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32)和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上共同通过的决议。1849年12月3日伦敦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援引了这一决议(见本卷第706—707页)。——407。

- 213 1850年4月4、5、18—22日立法议会开会讨论了把某些工人逐出巴黎的法案。按文中提到的旧有的警察条例,就可以把几千名穷苦失业的工人驱逐出巴黎。警察局在巴黎几个城区和郊区市镇禁止选举集会,国民议会中

- 的左翼共和党人曾提出反对选举集会法,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结果。——411。
- 214 古·司徒卢威和托·福瑟吉尔自称是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的代表,向临时代理伦敦市市长职务的吉布斯请求保证在伦敦不能维持生活的100个德国流亡者得到工作。吉布斯以许多英国工人也处于相同的境遇为理由,拒绝了这个请求。1850年5月24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关于这件事情的短评。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写这篇公开声明。《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由恩格斯于1850年5月24日起草,委员会其他委员签名后注明的日期为5月27日,于1850年5月28日《泰晤士报》第20500号正式发表。——414。
- 215 关于法国来信这组文章的写作情况见注50。这篇《法国来信》恩格斯未能按时寄到,《民主评论》第6期上也没有“法国来信”这一栏目。这是以《法国来信》为题发表的三段文字,引自《民主评论》6月这一期上的乔·哈尼《反革命分子的策略和纲领》一文,哈尼在引用这些文字时加了一个按语:“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巴黎通讯员被捕;他的信比平常迟到了好几天,只是在本刊付印时才收到。因此我们只能在这里援引几小段。”——416。
- 216 指1850年5月21—23日关于废除普选权这一法案的初步讨论结果(462票赞成,227票反对)。该法案于1850年5月31日通过。详见《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卷第229—233页)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78—182页)。——416。
- 217 暗指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共和国报》1850年5月17日号召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平静的告人民书(1850年5月18日《共和国报》)以及维·雨果在1850年5月21日立法会议上讨论修改选举法草案时的讲话(1850年5月22日《总汇通报》第142号附刊一、二,第1762—1763页)。——416。
- 218 这是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期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的片段。爱·梅因、尤·孚赫、路·布尔和麦·施蒂纳等几个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1842年曾参加柏林“自由人”小组,而从50年代初起则集结在《晚邮报·民主派报纸》和《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的周围。鼓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颂扬无政府状态,认为这是“高级民主”和“人民的自由联合”的实现。实际上他们拥护自由贸易,轻视和抵制普选权和人民代



议制。这个集团从 1850 年起把“民主派报纸”这几个字从他们机关报的报名中删掉了；同时《晚邮报》声明说，要达到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人似乎“不是别人的奴隶，也不是群众的奴隶”。《晚邮报》开始有步骤地反对“民主行列内维护法制的人们”，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也反对“革命的恐怖”。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一部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流传。

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章，写于 1850 年 5 月底至 8 月之间，开头援引了几段对埃·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他和马克思共同撰写并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见本卷第 342—354 页）作为前言，发表在 1850 年 10 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5、6 期合刊上。——418。

- 219 主要指卡·格律恩和阿·卢格，他们把蒲鲁东的个别著作译成德文并在报刊上进行宣传。——419。
- 220 斯图加特议会、帝国摄政中已被遗忘的“最高尚的民族精英”主要指帝国五摄政中卡·福格特和弗·拉沃，1850 年他们是《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的撰稿人，在文章中传播“无政府主义的”观点。——419。
- 221 麦·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于 1845—1846 年在莱比锡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这本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420。
- 22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写于 1850 年 6 月。他们在 3 月的《告同盟书》（见注 200）中阐明了同盟在革命时期所持的立场。在这次的《告同盟书》中所谈的同盟的情况，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央委员会特使（亨·鲍威尔在德国散发了 3 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并于 1850 年 5 月中返回伦敦）提交的报告和同盟盟员从欧洲各国寄来的信件。

这篇《告同盟书》由中央委员会特使卡·威·克莱因和其他密使带到德国、由恩·德朗克带到瑞士秘密散发。后来，1850 年 7 月 11 日《莱比锡报》第 192 号增刊、7 月 24 日《卡尔斯鲁厄日报》第 172 号和 7 月 31 日《北德意志通讯》第 177 号等报纸都曾节选或摘要发表了这篇《告同盟书》。——423。

- 223 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1849年5月德累斯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赛·奇尔讷;在这个组织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彼·弗里斯、泰·格赖纳、弗·济格尔、古·泰霍夫、卡·叔尔茨、约·菲·贝克尔、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卡·德斯特尔、卡·布伦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沃尔弗。1850年7、8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合并的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1850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424。
- 224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5月9日威·沃尔弗的长信中获悉“革命集中”组织的活动情况和这个组织的代表卡·布伦在德国的阴谋以后,便委派恩·德朗克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前往瑞士。德朗克在1850年7月3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和1850年7月3日和18日写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详尽地报告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活动。——425。
- 225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朱·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的国际性组织。马志尼的倡议曾得到古·司徒卢威和阿·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加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阿·达拉什和拉·科苏特。这个无论成分和思想都极其复杂的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马克思在《时评。1850年5—10月》(见本卷第575—621页)中批判了该委员会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425。
- 226 全德流亡者事务中央局,又称德国流亡者中央局,它是古·司徒卢威1849年10月迁居英国后与卡·海因岑、鲁·施拉姆、阿·卢格、路·鲍威尔(来自施托尔佩)和一些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起成立的,其目的是竭力阻挠成立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工作,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211)相抗衡。他们在1850年1—4月间,多次在伦敦召开德国流亡者会议,建立了单独的民主主义同盟。4月,他们在伦

敦的德国流亡者中间散发《告全体德国流亡者兄弟书》，其中宣布了在全德流亡者中央局领导下的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统一组织的成立。从1850年夏起提出和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见注225)联合。——426。

- 22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初侨居布鲁塞尔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团结了进步的德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正义者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之后，1847年8月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当中的最革命分子、如像菲·日果和维·特德斯科，都积极参加了该支部的活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见注4)以后，比利时政府对革命的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威·沃尔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大肆进行迫害，并把他们驱逐出比利时。

1848年8月，比利时国王莱奥波特的政府为了迫害民主主义者制造了所谓里斯康土的诉讼案，借口是由法国返回的比利时共和军团在1848年3月29日同里斯康土村庄附近的比利时部队发生冲突。特德斯科和支部的其他比利时成员遭到法庭的审判。包括特德斯科在内的17名被告被判处死刑，1848年11月改判为30年徒刑。——426。

- 228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见注227)。协会对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4)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426。

- 229 工人兄弟会全名是全德工人兄弟会，1848年8月底至9月初在柏林建立的德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人组织，是德国工人阶级发展独立的政治组织的一个重要开端。工人兄弟会的纲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其活动以经济斗争为主。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时曾试图以它为基础，但未能成功。工人兄弟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其创建者和领导人，像斯·波尔恩、恩·施韦宁格、安·罗伊斯和卡·冈格洛夫，都是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或拥护同盟的人。工人兄弟会的许多成员于1849年参加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工人兄弟会1850年中在萨克森被禁止,在其他邦也遭到镇压,但在其后几年仍在个别地方活动,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影响。——427。

- 230 1850年在汉堡出版了塞·载勒尔写的小册子《1849年6月13日的阴谋,或法国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作者注明该著作是献给马克思的。1850年4月20日的《纽约州报》摘登了载勒尔的这一著作。其中提到法国革命政府在1848年3月和4月为建立阿·伯恩施太德和卡·伯恩施太因领导的德国军团曾提供资金。1848年5月法国议会要求政府说明这些款项的使用情况,遭到了拒绝。载勒尔举出这些材料是要证明法国政府捐款并不抱革命的目的,同时还证明这些钱并没有落到巴黎德国工人的手里。

当时在美国出版的德文周刊《西方公报》担任编辑的亨·伯恩施太因以他已故弟弟卡·伯恩施太因的名义,对载勒尔的这些话提出了抗议,而把矛头主要针对马克思。《纽约州报》转载了伯恩施太因的攻击,但驳斥了他对载勒尔,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指责。为了澄清事实,马克思于1850年6月7日写了这封信。该信于1850年7月6日发表在《纽约州报》第27号。署名卡尔·马克思。

这封信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编辑的考证后,于1982年发表在该杂志的第5辑上。1977年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未能收入的这封信,现在按写作时间收入本卷。——431。

- 231 《普鲁士流亡者》、《伦敦的普鲁士密探》和《给〈地球〉报编辑的信》这三篇声明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6月14日写的。1850年5月22日,泽费洛盖在柏林刺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只受轻伤)之后,普鲁士政府利用官方报纸大肆煽动说这是各地阴谋活动的结果,这种阴谋活动的真正领导却在伦敦;企图借此让英国政府驱逐当地的政治流亡者。为揭露普鲁士政府的行径,引起英国公众对普鲁士密探的警惕,马克思和恩格斯使这三封同时在不同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每封信中都写有其他信中所没有的特定细节。最后,两家大的自由派报纸《太阳报》和《旁观者》分别刊登了前两个声明。

《普鲁士流亡者》于1850年6月14日发表在《太阳报》上,6月15日又发表在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第660号,稍后还刊登在德国民主派的下

列报纸上:1850年6月20日《西德意志报》(科隆)第145号(从《北极星报》上转载);1850年6月21日《每日纪事报》(不来梅)第298号;1850年6月22日《大胡蜂》(加塞尔)第144号。——434。

232 外侨管理法(Alien Bill)是英国议会1793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政府随时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有效期为一年。1802、1803、1816和1818年议会都曾通过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的决定。1848年,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宪章派4月10日游行示威,议会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1853年,当内阁提出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时,英国公众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434、439。

233 忠实者同盟是1848年成立的极端保皇主义的团体,曾试图影响社会舆论,以利于君主制度。——435、439、442。

234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伦敦的普鲁士密探》一文的原因见注231。1850年6月15日《旁观者》编辑部刊登了这个声明,并在同一期的“每周新闻”专栏中的一个说明中对此声明作了评论。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50年7月2日给《威悉报》编辑部的信中引用了这个说明(见本卷第451—452页)。

1850年6月18日《加利尼亚尼信使报》第11030号转载了《旁观者》上的这篇声明,转载的声明不是全文,但保留了编辑敌视革命流亡者的评论。这些评论还被1850年6月22日《威悉报》第2037号、1850年6月22日《总汇报》第173号和1850年6月26日《新普鲁士报》第144号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威悉报》发表的声明中的评论是《旁观者》所加。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威悉报》编辑部写信的原因。现存本篇声明的部分手稿出自恩格斯的手笔。——437。

235 这篇声明和《普鲁士流亡者》、《伦敦的普鲁士密探》的写作动机和时间相同(见注231)。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写作,而且手稿是恩格斯的手迹,虽然从文字上看似乎是马克思独立写成,但我们仍然标出作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篇声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俄文版第25卷第82—84页。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第348—349页——441。

- 236 英国的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见注 145)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 1815 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 80 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 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 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 年 6 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见注 162)。——444。
- 237 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带头人路·勃朗、约·蒲鲁东、亚·马·阿尔伯和阿·巴尔贝斯在法国工人中威信下降的情况,见恩·德朗克 1850 年 2 月 21 日和 5 月初写给恩格斯的信。——445。
- 238 法国国民议会在 1850 年 6 月 4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财政部长富尔德提交的关于增加总统年俸的提案。该提案是把总统的应酬费用提高到每月 25 万法郎,这样一来,与宪法规定的 60 万法郎的年俸加在一起,路易-拿破仑的年收入将达到 360 万法郎。在讨论过程中,多数派曾经成立了一个十五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 6 月 14 日的会议上否决了这个提案。但最后,1850 年 6 月 24 日国民议会还是通过了一项法律: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 300 万法郎,只同意拨给共和国总统 21.6 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446、460、607。
- 239 指一个叫作丹尼尔·博尔姆的人写的小册子《小博尔姆(帷幕拉开。5 月 15 日案件的前被告小博尔姆先生献给农民、勤劳的工人和正直的公民的一盏反映 1848 年 2 月 24 日、5 月 15 日和 6 月 24 日的政治阴谋的明亮的魔灯) [巴黎]的内容提要》拉孔布夫人刊印[1850],四开本,共 2 页。内容提要中谈到博尔姆在 1848 年 3—5 月参与组织保皇党人采取的行动,还在布尔日审判案中出庭作伪证。——447。
- 240 指《泰晤士报》企图利用博尔姆在控告该报的案件中充当证人。1848 年 2—6 月,前巴黎警察局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西迪耶尔控告这家报纸发表阿·谢努《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

1850年巴黎版的片断以诬蔑巴黎警察。而博尔姆正是从谢努这本书入手进行揭露的。1850年6月11日,《共和国报》发表了博尔姆的一封信,其中抗议《泰晤士报》企图利用他作为这个案件的辩护证人。1850年7月6日伦敦《红色共和党人》第3期(第1卷)也转载了博尔姆的信。——448。

- 241 本篇声明实际是1850年6月25日分别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的两个声明,本版作为一篇刊载。其写作动因是《新德意志报》(1850年6月22、23、25和26日第148—151号)刊登的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前4期的评论。评论的作者是《新德意志报》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奥·吕宁,其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马克思的《从1848到1849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自己的《评论》中答复吕宁(见马克思1850年6月27日给魏德迈的信),但是由于杂志继续出版遇到困难,于是直接把声明寄给了《新德意志报》。——449。

- 24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伦敦的普鲁士密探》(见本卷第437—440页)在《旁观者》上发表后,不来梅的《威悉报》于1850年6月22日第2037号第3版上发表了一段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声明中几乎全文摘引了这段说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加利尼亚尼信使报》转载了他们给《旁观者》的声明,所以他们认为《威悉报》上的说明是在普鲁士政府的影响下捏造出来的。

《威悉报》没有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声明,而是在1850年7月10日第2052号第3版上作简短的内容概括后宣布,他们6月22日刊登的说明不是取自《旁观者》,而是从《加利尼亚尼信使报》转载的;此外,他们对该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评论表示赞同。1850年7月10日,在《威悉报》发表说明的同一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威悉报》的声明的全文刊登在《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314号。——451。

- 243 这个名单的写作时间最早可能是1850年7月初,最晚不会超过1850年9月中,因为名单中已有卡·沙佩尔在伦敦的地址,他是7月1日到达伦敦的;而马克思这里所记录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只存在至9月15日,同盟中央分裂为止。

马克思作此记录显然是为了通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和他住在一起或附近的成员——鲍威尔、施拉姆、恩格斯、埃卡留斯、普芬德和维利希

——他只记下名字,未写地址。

这个名单包括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455。

- 244 指1848年3月—1850年6月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在法国二月革命(见注4)和德国三月革命(见注16)的影响下,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德意志居民奋起反抗丹麦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奥古斯滕堡公爵、威·贝泽勒和弗·雷文特洛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曾向德意志联邦议会和普鲁士求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了这一协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事再起,结果,1850年7月2日普鲁士和丹麦在柏林签订了和约,1849年7月6日腓特烈西亚发生会战,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被歼。恢复战前状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456,593。
- 245 指1848年8月9—30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审判案(见注227)。在此之前,恩格斯曾就此事在《新莱茵报》上写了一篇专题文章《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456。
- 246 海峡税是丹麦从1425年起对所有通过东部和北部海域的外国船只征收的关税。这种关税在17世纪导致瑞典、荷兰与丹麦之间的冲突。1857年取消了这种海峡税,但丹麦得到了利害相关的欧洲国家筹集的3120万丹麦塔勒的补偿金。——457。
- 247 俄国和丹麦在1767年秘密签订的并由1773年的条约确认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后来的俄国皇帝)把他从彼得三世那里继承来的对哥托尔普公国的权利转让给丹麦,以换取德国北部的奥登堡和德曼霍斯特这两个伯爵领地。由于哥托尔普公国的合并,整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都为丹麦所占有。丹麦在北方战争(1700—1720年)中也站在俄国一边,1778年就使用松德海峡问题提出的国际法五项原则,为1780年的“武装中立”奠定了基础。



叶卡捷琳娜二世 1780 年 3 月 11 日发表了武装中立宣言,其中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当时英国正在与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这一宣言显然是针对英国的。1780—1783 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在 1788—1790 年的俄国—瑞典战争中,丹麦也根据“武装中立”条约成为俄国的同盟国。——457。

248 从 1460 年起,丹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成为君合国。1815 年后荷尔斯泰因同时又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丹麦国王在这两个公国当选的条件是他必须宣誓,让这两个公国永远留在一个统一体内。在这两个公国内,王位只能由男系继承,而在丹麦,从 1665 年起也允许女系继承王位。——458。

249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从 1814 年 9 月至 1815 年 6 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因波旁王朝复辟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挪威;俄国获得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荷兰的好望角与锡兰殖民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 1792 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 年 9 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见注 62)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458。

250 执行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于 1848 年 4 月 8 日向丹麦政府递交一份照会,其中表示普鲁士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公国,而只是为了反对“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鲁士政府竭力回避正式承认这个损害它的名誉的文件。维登布鲁赫的照会刊登在 1848 年 6 月 18 日《总汇报》第 170 号的附刊。关于这

个照会见马克思的《新年贺词》一文。——458。

- 251 指1850年7月16日立法议会通过的关于报纸交纳保证金和对定期和不定期刊物征收印花税的决定。——460。

252 指发表在1850年7月15日《权力报》上的《国民议会的逐渐削弱》一文。根据1822年3月25日通过的法律第十五条,该报因诋毁上下两院而被处以罚金。——462。

253 《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于1850年夏天和秋天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发表在该杂志第5、6期合刊上,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总结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研究了16世纪上半叶的革命事件,把1848—1849年革命和宗教改革及1525年农民战争进行比较。

恩格斯很早就已对农民战争,尤其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革命者托马斯·闵采尔进行了研究。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叙述历史事件经过,主要依据的是德国民主主义历史学家威·威美尔曼的著作《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三卷集)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

《德国农民战争》在恩格斯生前多次出版。1852年1月1日至1853年2月1日纽约《体操报》第3—20号转载了这部著作。1870年,恩格斯和威·李卜克内西作出了先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然后出版单行本的决定。于是该报1870年4月2日至10月15日在第27—83号连载了这部著作,在第27和28号首先刊登了恩格斯1870年2月为该版写的导言。1870年10月《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问世。1874年10月底再版,再版时恩格斯对导言作了增补。

80年代,恩格斯打算全面修订他这一著作。1884年12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论》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但是,恩格斯还是写出了一些有关的手稿、札记草稿等等。——465。

254 汉撒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的贸易同盟。中世纪德语汉撒(Hansa)原意为“行会”或“协会”。从12世纪起,它是北德意志商人为与英国和佛兰德进行贸易的协作式联合。13世纪末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中心在吕贝克。

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东欧北欧同西欧的中介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 14 世纪后半期和 15 世纪前半期, 15 世纪末开始衰落, 1669 年解体。——468。

- 255 当时的奥地利世袭领地指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部分: 奥地利公国、克赖因、施泰尔马克、克恩滕、蒂罗尔和所谓的前奥地利。

前奥地利原文为 Vorderösterreich 或 Vorlande, 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 1491 年建立的奥地利边区,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德国西南部地区。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也指奥地利边区政府。——470、511、523。

- 256 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 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轻, 已经没有人身依附关系, 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通过世袭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地, 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 与农奴差不多。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 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农。——471。

- 257 死亡税(Sterbefall, Todfall)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 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472。

- 258 保护金(Schutzgelder)是封建主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所征收的税。——472。

- 259 在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的情况下, 产业常常通过后代继承而脱离教会掌握, 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下令禁止娶妻以后, 产业脱离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随之消失。——472。

- 260 什一税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捐税, 由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收成或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 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一。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 而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什一税逐渐被废除。——473、528。

- 261 公捐即帝国税, 是 15 至 16 世纪德意志封建国家的一种捐税, 其形式是人头税和财产税的混合, 直接向农民征收。——474、478。

- 262 上任年贡是 14 世纪以来教皇要求征收的一种贡赋。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次性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474。
- 263 城关市民指中世纪时居住在原城区界桩以外的居民。城市往往为提高防御能力而给他们以公民权。——474、485。
- 264 指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的代表所取代。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调和政策是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476。
- 265 即查理五世刑罚法规(*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1532 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严厉的刑罚法规》。这是德国第一部刑法典。直到 18 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刑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479。
- 266 神秘主义(*Mystik*)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主张人和神或超自然界之间直接交往,并能从这种交往关系中领悟到宇宙的“秘密”。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神秘主义是反对教阶制和社会等级制的形式。信仰宣传耶稣再生和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  
德国的神秘主义从 13 世纪以来在基督教中广泛传播,分为激进和保守两派。神秘主义曾被用来维护平民利益,是闵采尔教理的重要源泉。——483、492。
- 267 韦尔登派又称里昂穷人派,是 12 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中的一个教派。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认为贫穷是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反对天主教会聚敛财富和神职人员奢侈享乐。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否定许多教会礼仪和正统教义,认为教会对拯救信徒灵魂没有什么特殊作用。声称施舍、斋戒、弥撒、祷告,对已死的信徒都没有任何益处,并否认有

- 炼狱。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特别流行,后在西班牙、波希米亚和伦巴第等地也有发展。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信徒大部分参加了新教,成为新教中的一派。——483。
- 268 阿尔比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法国北部的封建主和教皇称它为南方法兰西的“异教徒”。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1229年朗基多克并入法国国王的领地。——483。
- 269 阿尔诺德在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弟子。1136年参加布雷西亚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要求僧侣放弃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给世俗统治者。1146年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后处死。——483。
- 270 约翰·保尔是英国肯特地方的牧师,是罗拉德派出色的宣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流传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出自保尔之口,他还在宣讲时对农民说:“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永远也好不起来。”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见注274)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狱中解救出来,保尔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483。
- 271 皮卡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是一个名叫雅科布的牧师,据说出生在匈牙利。他是1251年法国农民反封建起义的领袖之一。这次起义又称牧童起义,因起义参加者自称为“上帝的牧童”。——483。
- 272 约翰·威克利夫这位神父兼牛津大学教授是英国宗教改革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行者。曾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礼拜。驳斥没有教皇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观点,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征收贡赋及授予英国教士以神职;建立脱离教廷控制并隶属于英王的民族教会;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不是得自教皇”。主张没收教会财产,简化宗教仪式,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教徒应听从基督而不应听从教皇。他的号召得

- 到市民和骑士的拥护,成为15和16世纪所有天主教教会改革者的指导思想,后来的罗拉德派(见注277)也是他的信徒们建立的。1414年罗拉德起义失败后,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宣布威克利夫为异端,并下令将其遗骸从墓中掘出焚扬。——484。
- 273 加里克斯廷派(Calixtines)又译圣杯派,15世纪上半叶是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中的温和派,这个运动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会。加里克斯廷派主张在弥撒时,俗人可与主礼教士一样领食圣体(面饼)和圣血(酒),而不是只领食圣体;因以“圣杯”盛圣血,故而得名。该派主要代表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利益,要求自由传教,没收教会财产,限制教士的特权,建立不受德意志教士控制的教会。胡斯运动期间,曾与塔博尔派(见注275)结盟,共同打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转而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484。
- 274 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是中世纪英国最大一次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导人除泰勒外还有宣教人约翰·保尔(见注270)。起义席卷了全国大部分郡。6月,起义者在城市贫民的支持下进入伦敦。起义者同国王谈判要求废除农奴制(迈尔恩德纲领),归还村社土地,一切等级平等(斯密茨菲尔德纲领)。起义领袖瓦特·泰勒在与国王谈判时被谋杀。起义虽遭镇压,但对农奴制和徭役制的废除还是起了促进作用。——485。
- 275 塔博尔派是15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约·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曾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拥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见注273),多次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波希米亚进行的征讨,后来由于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485。
- 276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11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13世纪到15世纪。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最初曾被利用作反对皇

- 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15世纪鞭笞派揭露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开始遭到教会的迫害。——485。
- 277 罗拉德派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罗拉德（Lollard）一词源于中古荷兰文 Lollaert，意为“喃喃的祈祷者”。约1300年以慈善团体的名义出现于安特卫普。14世纪中叶，英国的罗拉德派大多是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信徒，又较之更为激进，主要代表是保尔（见注270），主张废除徭役，取消什一税及其他捐税，剥夺教会财产，实现社会平等以至财产平等。该派传教士穿粗制袈裟，活动于城乡下层人民中间，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见注274）。从14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1414年英国的罗拉德派又发动起义，失败后不少信徒迁往欧洲大陆和苏格兰。罗拉德派的活动对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有一定影响。——485。
- 278 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锡利亚斯（Chilioi，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于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耶稣再生和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它反映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心态。恩格斯把这种信仰称作“锡利亚式狂想”。在基督教早期，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486。
- 279 奥格斯堡告白是新教路德宗的信仰纲要。由路德授意其亲信菲·梅兰希顿起草。1530年提交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它是以市民的“廉价教会”的理想，规定宗教仪式（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确立教会从属于世俗统治的原则，宣布以领主王公来代替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所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489。
- 280 岩礁和大漩涡是希腊传说中某个海峡的海洋怪兽；谚语中用于形容两个同样大的灾难。——489。
- 281 “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是路德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后面的引文均出自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三卷集）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490。

- 282 托马斯·闵采尔的出生年月不详。威美尔曼在他的《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第1版中写的是1498年出生。但是根据1506年10月莱比锡大学学生名册的记录来看,他应当生于1490年左右。因为16世纪初大学生首次注册入学的普遍年龄是16岁。——492。
- 283 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不承认对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需再次重行受洗。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于于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地。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仇视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信仰宣传耶稣再生和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见注266)。其中一部分人主张财产公有,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积极参加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492。
- 284 尼·施托尔希是茨维考的裁缝,以宣传锡利亚教义(见注278)著名。是再洗礼派(见注283)的领袖。闵采尔曾受他的影响,认为他对圣经的理解高出所有的牧师。1522年施托尔希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起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492。
- 285 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大·弗·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们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宣传了将神与整个世界等同的一种宗教哲学。与中世纪异端的神秘主义一样均属泛神论。——494。
- 286 事实上闵采尔离开阿尔施泰特以后,首次来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1524年9月由于参加当地城市平民骚乱被驱逐,此后才由米尔豪森来到纽伦堡。——499。
- 287 天主教规定的圣礼有七种,即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和婚配。——499。
- 288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教徒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产生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以加尔文学说为旗帜的改革派,后来又从其中发展出一些脱离国教会的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清教徒要求“清洗”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度和仪式,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佚,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16世纪末开始形成温和派和激进派。温和派(长老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主张君主立宪。激进派(独立派)代表中层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的利益,主张共和政体。——503。



- 289 独立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激进派,16世纪末开始形成,反对专制主义和英国国教会,反对设立国教,更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这一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化的中小贵族的利益,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政党,主张推翻并处决君主,成立共和国。1648年在奥·克伦威尔领导下取得政权,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镇压平均派和掘地派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于1653年建立军事专政“护国政府”。——503。
- 290 士瓦本联盟于1488年由德国西南部的王公、中下等贵族和帝国直辖市建立。它很快成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和城市平民的主要工具。该联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由于内部纠纷而解散。——508、524、540。
- 291 塞克勒人是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马扎尔人部落,其成员大都参加边防部队。1848年以前享有很多特权,受到贵族样的待遇。——514。
- 292 西西里晚祷指1282年3月30日在巴勒莫发生的反对法国安茹王朝统治的人民起义。起义以晚祷的钟声作为信号,矛头指向从1267年起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4月,起义遍及全岛,消灭了数千名法国骑士和士兵,最后将整个西西里从安茹王朝统治下解放出来。——515。
- 293 指1517年10月31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钉在魏登贝格一个教堂门上的95信条。信条中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信条中,体现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学说也具有了初步轮廓。随着95信条的传播,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518。
- 294 布尔勒斯加(Burlesque)是诙谐讽刺文学的体裁之一,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中间;他们用这种文体来嘲笑宫廷诗歌华丽的风格和封建社会上层的拘泥习俗。——518。
- 295 蔷薇战争又称玫瑰战争,1455—1485年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之间即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战争。约克家族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兰开斯特家族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兰开斯特派的则

- 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520。
- 296 皇帝的诏书中说,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525。
- 297 南方高原地区指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时,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封疆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赖斯高或是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525。
- 298 指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方高原地区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威·威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526。
- 299 鸠迪加礼拜日,(原文是“Judica”,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耶稣复活节前第二个星期日。——528。
- 300 见1525年3月士瓦本联盟(见注290)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件记载有这个决议。引自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167页。——528。
- 301 维尔茨堡主教教堂议事会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530。
- 302 德意志骑士团又称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来治理。13世纪时,骑士团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占领了东普鲁士,并使之成为继续侵占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1237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开始衰败,于1466年臣服波兰。1525年,骑士团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地变为世俗的普鲁士公国。——532。
- 303 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赖斯高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

条例,而政府则应免除对普通的运动参加者的刑罚,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起义者刚放下武器,奥地利官方和地方封建主们马上背信弃义,屠杀了大批起义者。——548。

304 黑林山农民被迫于1525年11月13日与奥地利政府签订条约,条约规定农民必须再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农民在瓦尔茨胡特城又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548。

305 1525年3月17日在米尔豪森选出的“永久市政会”是当权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妥协的产物。平民阶层仍被排除在外。闵采尔并不属于“永久市政会”,也没有担任正式职务。但他参加市政会的会议,并起过指导作用。——551。

306 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4)后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见本卷第148—155页)。

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的活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而且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命斗争。——552。

307 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曾广为采用。——555。

308 阿尔萨斯农民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民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点上还超过了这个纲领。它们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贷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见注260),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人民不满的人们的职务,任用新人。——556。

309 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发生分裂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这份声明反映了他们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激烈斗争。1850年8月,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得出结论: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因而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在最近一个时期不可能发生新的革命。他们认为在新的条件下,首先要注意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反对这种分析和据此制定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对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策略和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早在8月和9月上半月召开的会议上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隆,委托科隆区域委员会组织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康·施拉姆,亨·鲍威尔,约·埃卡留斯和卡·普芬德等6名中央委员;其余4名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阿·列曼和弗伦克尔表示反对。处于少数地位的4名委员退出了会场,并诉诸伦敦区部的盟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32)的多数会员也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分裂派的一边,这就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这个协会。

这一声明曾收入1852年科隆印发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起诉书》和施梯伯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部分。——568。

- 310 1850年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作为继《德国农民战争》之后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一期即第5、6期合刊的第100—110页。这里是他们为这次部分转载《共产党宣言》加的附注,转载《宣言》首先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再次谈到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见本卷第733页)。其次也是为了满足德国的同盟盟员的要求,他们曾在信中指出再版《宣言》的必要性。

《红色共和党人》几乎同时发表了《宣言》的英译文。在这两份刊物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公开承认他们是《宣言》的作者,同时着重指出,《宣言》早在二月革命(见注4)前就已问世。

这次部分转载时,他们把1848年2月伦敦第1版作为正文基础,改正了其中的几个印刷错误。——571。

- 311 这篇编者按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10月为约·格·埃卡留斯的《伦敦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写的。埃卡留斯的这篇文章是在马克思直接指导下写成的,并经马克思校阅过,它刊载在1850年5—10月《新

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上，本篇按语紧接其后。

这篇按语后来还被埃卡留斯收入也是在马克思指导下完成的另一篇著作《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阐明和维护的若干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1869年柏林版)的前言以及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该书德文第2版。——572。

- 312 马克思1850年10月写的这篇草稿是为《时评。1850年5—10月》结尾部分准备的。《时评》的结尾部分即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0月写的、并注明日期为“1850年11月1日”的那段正文(本卷第613—617页)。《时评》在采用草稿的内容时作了很大的修改,有些地方,例如关于奥地利和普鲁士政策分歧的第4点,则根本没有采用。

这份草稿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574。

- 313 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和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黑森选帝侯国)1849年同意参加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见注47),1850年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曾转向奥地利。——574。

- 314 农民获得革命的果实是指1848年8月31日奥地利议会废除奥地利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8—39页)中也有这类论述。

对银行的保护政策是指一系列把奥地利国民银行置于国家保护下的政府措施:1848年5月22日的内阁命令允许银行限制银行券兑换硬币并规定银行券的法定行市;1849年初在银行协助下开始发行国家纸币;1849年12月6日国家和银行之间达成调整相互要求的协议,等等。——574。

- 315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篇《时评》很可能是1850年10月写的,当然也不排除9月底已动笔的可能性。作者在文章结尾注明的日期为“1850年11月1日”。

《时评》的主要段落是根据马克思写于1850年9—10月的三个笔记本写成的。这是主要从戴·莫·伊文思《1847—1848年商业危机》、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以及1850年10月12日《经济学家》第372号等著作中作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摘录笔记。

《时评》在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在马克思1857年10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中,把它称为“我们的时评”。另外,从恩格斯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我们也可以肯定他们两人都是《时评》的作者。

《时评》发表后不久,接着又被《德意志—伦敦报》分三次连载(有删节),考虑到马克思和该报主编班贝格爾的亲密关系,可以认为这是经马克思同意的。——575。

- 316 约翰·罗是1716—1720年在法国进行金融投机活动的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他从事证券发行,并建立合股贸易公司。他于1716年创立的、后来转让给法国政府的银行以及从事国外贸易的大批公司于1720年破产。——576。
- 317 南海公司即南海泡沫公司,是英国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开展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成立的,它的真正目的是从事国家证券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权利。该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于1720年破产。它的破产使英国国债大大增加。1853年格莱斯顿曾试图用收买该公司贬值股票的办法来偿还一部分国债。——576。
- 318 见托马斯·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第1—2卷。马克思从这本书中做了许多摘录,广泛地引用在这篇时评中。——581。
- 319 1844年银行法令是英国政府为防止发生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局面、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的一项关于改革英格兰银行的法律,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用黄金保证的金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得超过1400万英镑。然而,尽管1844年银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额实际上并不是依据抵补基金而是依据流通领域中对它的需求来决定的。在经济危机期间,对货币的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曾被迫使1844年法令暂停实行,并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581。
- 320 1850年10月10至14日,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君主在布雷根茨集会,签订了一项协定,旨在反对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称霸的野心。1850年10月28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

普鲁士政府元首勃兰登堡大公在华沙会晤,后者被迫让步。这两次会议表明了奥地利作用的加强和普鲁士地位的下降。——585。

- 321 1850年9月,在黑森选帝侯国发生了选帝侯及其大臣哈森普夫卢格与要求恢复1831年宪法的议会之间的立宪冲突,哈森普夫卢格解散了议会并宣布全国戒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选帝侯及其大臣无力镇压人民的反抗,曾向联邦议会和奥地利求援。但因黑森选帝侯国已经参加了以普鲁士为首的、不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联邦(见注47),为此,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发生冲突进而采取了军事行动。直到1862年6月底,在普鲁士最后通牒和两个军的兵力威胁下,黑森选帝侯国恢复实行1831年宪法之后,立宪冲突才告结束。——593、615。

- 322 皮由兹派是19世纪30—60年代英国国教中的一派,以其创始人之一皮由兹得名。皮由兹教派号召恢复天主教的礼仪,故又称崇礼派或重仪派。为宣传其教理,皮由兹教派的拥护者在《当代论著》的标题下发行小册子,故又称论著派。这一教派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599。

- 323 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分裂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32)之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发言人代表协会控告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以及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者盗用协会的钱款,并要求他们立刻归还全部钱款。1850年11月20日英国法庭驳回协会的上诉,但是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并未停止对鲍威尔和普芬德的攻击,并开始新闻界进行诽谤。其中一篇声明发表在1851年1月7日《瑞士国民报》上。

这篇驳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草稿写于1850年12月底。11月中移居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曾于12月底以前回伦敦住了几天。这篇草稿出自恩格斯的手笔,马克思作了修改,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上。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

1852年1月普芬德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就这一事件在《瑞士国民报》上发表了另一篇声明。该声明的手稿被保存了下来。——622。

- 324 阿·卢格在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74号上发表了一篇伦敦通讯,对《新莱茵报》的作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见注32)进行诽谤和攻击。马克思1851年1月22日将文章寄给恩格

斯,建议写一篇针对卢格的共同声明。恩格斯在1月25日回信中建议马克思起草一份声明,他将在声明上签名。由马克思草拟的声明于1851年1月27日寄给恩格斯,让他签名后转寄给不来梅的《威悉报》,但该报未予刊登。他们决定再将声明寄给《纽约州报》,委托康·施拉姆将其发表,该报也未予刊登。保存下来的手稿是燕妮·马克思的手迹。

这篇声明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年俄文版第8卷第595—596页;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德文版第8卷第464—465页。——624。

325 对卢格的类似的评价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24—335页)。——625。

326 马克思大约在1850年11月第一次设想出版文集的计划,当时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的出版商贝克尔恢复了联系。贝克尔自1850年7月《西德意志报》停刊后,一直在搜集马克思发表过的文章。当时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亨·毕尔格尔斯和罗·丹尼尔斯也在科隆参与《文集》的准备工作。马克思在1850年12月2日给贝克尔的信中,曾谈到出版文集的计划。这里是马克思1851年2月记下的第1册文集所收的文章以及他为文集修订的文章目录。

《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册于1851年4月底由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贝克尔被捕后,该书的出版即告停顿。——626。

327 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法国二月革命(见注4)三周年在伦敦举行了“平等者宴会”。宴会的组织者是路易·勃朗领导下的一些法国流亡者和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艾·巴泰勒米、亚当等人,以及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首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请他们的拥护者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去参加宴会,但是他们被逐出会场。并遭到维尔希—沙佩尔集团拥护者的毒打。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当时尚在监狱的奥·布朗基寄来的祝酒词,其中揭露路易·勃朗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其他成员的叛卖行径。尽管如此,这篇祝酒词仍然在2月27日《祖国报》第58号上及其他许多法国报纸上发表。3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祝酒词译成了德文并写了按语。德译文寄往科隆并印了3万份,在德国和英国广为流传,布朗基的祝酒词也刊登在几家德国报纸上。英译文的情况不详。

与布朗基祝酒词有关的情况,见1851年3月1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



信和《流亡中的大人物》、《高尚意识的骑士》。——630、633。

- 328 1851年3月5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路易·勃朗就2月24日周年纪念宴会上的事件和布朗基宴会祝酒词等事件写的一封信。勃朗在信中还攻击布朗基的人品。

恩格斯于同一天写了这封信予以反驳。但是《泰晤士报》未予刊登(见马克思1851年3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从恩格斯1851年3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来看,他曾经打算给奥·布朗基寄一份抄本。给《泰晤士报》这封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恩格斯没有用本名,而是用笔名“Veritas”。和这封信一同寄给《泰晤士报》的祝酒词的英译文没有流传下来。

这封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4年俄文版第25卷;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633。

- 329 马克思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为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摘录笔记共有24本。《反思》写在第Ⅶ笔记本的第48—52页,第Ⅶ笔记本主要是就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问题从不同作者的著作中做的摘录。这个笔记本是马克思大约在1851年3月写完的,《反思》反映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状况。《反思》在较高水平上继续了40年代开始的对小资产阶级的,特别是蒲鲁东主义的观念的批判,这些观念用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缺陷来解释经济危机,企图人为地构想货币,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是在1857—1858年手稿和以这一时期他所制定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中完成的。

《反思》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636。

- 330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六卷集)1835—1839年伦敦版第2卷第2章;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34—36页;《调查金条价格高昂原因的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1810年6月8日下院的决定刊印》1810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的摘录包含在第Ⅶ笔记本的第29—31页中。

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第3卷中对斯密和图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了评论。——636。

- 331 见让·沙·列·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马克思在1844—1847年间对这部著作作了摘录,但是有关的笔记本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和1861—1863年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问题的辩论,特别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作了详细评论。——636。

- 332 蒲鲁东在他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中曾多次激烈反对斯密的观点,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中所证实的,他事实上还是以简单化的形式采纳了斯密的基本发现。

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手稿中对蒲鲁东的简单化的观点作了批判,蒲鲁东把生产过剩的原因解释为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不能赎回自己的产品。——639。

- 333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这个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8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639。

- 334 伯明翰派亦称“小先令派”,是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只看作是计算名称。这一学派的代表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作“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的旨在减少流通中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使工业振兴,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实际上,他们提出的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利益。

马克思对伯明翰银行家托·阿特伍德建立的“小先令派”的评论见《政

- 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B;《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1节、第3卷第33、34章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92—393页。——643。
- 335 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第35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施蒂纳的观点作了批判的分析。——643。
- 336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643。
- 337 “这类税没有臭味!”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在他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时所说的一句话。——646。
- 338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是恩格斯于1851年4月写成的,他在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答应写一篇文章,“从军事观点来详细阐述”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前景,并且答应写好后寄给马克思。这篇文章是恩格斯1850年11月移居曼彻斯特后开始进行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的系统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恩格斯所依据的著作有:威·帕·纳皮尔《1807—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毕洛夫《最新军事制度的精神》1798年汉堡版;艾利生《欧洲史》的地图集以及阿·梯也尔《执政时代和帝国的历史》(20卷集)1845—1862年版。手稿首次发表在1914年12月4日和1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第9期和第10期上。——648。
- 339 指第一次反法同盟发动的第一次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战争中的主要战争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专制国家结成同盟,于1792年2月发动反法战争。由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奥联军于1792年8月23日占领了法国东部的隆维要塞,9月2日又占领了凡尔登要塞。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米(法国东北部)炮战中,由沙·弗·杜木里埃和弗·克·凯勒曼指挥的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接着1792年11月6日热马普(比利时)会战中,杜木里埃又大胜奥军,但他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在荷兰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1793年3月18日在内尔温登(比利时)战役中法军被科堡公爵击溃,结果法国失去

了比利时,北部国境又处于入侵者的威胁之下。在内尔温登失败后,杜木里埃公开背叛共和国,投靠了敌人。1794年5月18日在图尔宽(法国)战役中,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战胜了科堡公爵的反法联军。1794年6月弗勒吕斯战役中,法军战胜了反法同盟的联军,并在许多战线上把战争推进到敌国的领土。——648、652、653。

- 340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651。
- 341 8月10日的内阁是吉伦特派1792年8月10日起义胜利后组成的,1793年6月2日他们的内阁被雅各宾派建立的专政所取代。——652。
- 342 1793年5月底,里昂的大资产阶级吉伦特派发动反雅各宾的叛乱,与此同时法国南部许多省市也发生叛乱。吉伦特派发动叛乱,企图利用地方叛乱来对抗革命的首都。共和国的军队包围并占领了里昂,于1793年10月9日平息了里昂暴动。
- 1793年5月12日,土伦发生了反对雅各宾市政当局的暴动。当时,对法国作战的英国和西班牙趁土伦叛乱及法军许多海军高级军官参加叛乱的机会,把海军开进土伦港。1793年12月19日,拿破仑指挥下的共和国军强攻并占领了土伦的主要堡垒,收复了土伦。——652。
- 343 指法军在拿破仑第一的指挥下对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所进行的意大利战局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于1796年4月12日和22日之间进行的决定性会战迫使皮埃蒙特退出了战争。——654。
- 344 安特卫普保卫战发生在1814年,当时欧洲各国与拿破仑第一的军事行动已转移到法国及其邻国。当年1月,拉·尼·玛卡诺奉命负责组织安特卫普的防御,顺利完成了任务,该要塞经受住了反拿破仑联军的多次轰击和围攻。一直到拿破仑主力在法国投降以后,安特卫普才于1814年5月5日被放弃。——654。
- 345 热月9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拉·伊·卡诺积极参

加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朶月 18 日(1797 年 9 月 4 日)是指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波拿巴支持下进行的政变,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遭到怀疑,于是逃出法国。

雾月 18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是指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国家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怯懦地表现了反对拿破仑的立场,但因他赞成政变而被召回,1800 年 4 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54。

- 346 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是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与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所进行的战争。战争起因是英、法争夺殖民地和普奥争夺中欧霸权。在欧洲,普鲁士与奥地利、俄国、瑞典、法国之间的战争,以普鲁士取得对奥地利的胜利而告结束。1763 年签订了胡贝图斯堡和约,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夺得西里西亚,成为大陆上的新兴强国。在美洲、印度和海上,英、法间的战争以法国失败而告结束。1763 年签订巴黎和约,英国获得法属北美殖民地并确立在印度的优势,成为海上霸主。——655。
- 347 莱茵联邦是 1806 年 7 月在拿破仑第一的控制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 1805 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见注 42)就不复存在了。最初有十六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五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1813 年拿破仑的军队失败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655。
- 348 阿本斯贝格战役和埃格米尔战役是 1809 年奥法战争期间,拿破仑军队和奥地利军队 4 月在雷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为期五天的战役中的两个阶段。雷根斯堡战役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657。
- 349 “缓步前进”是 1813 年在法国形成的一首讽刺性民歌中的重唱句。——657。
- 350 指 1849 年 4 月,尼·乌迪诺率领法国军队进攻罗马共和国一事(见注 11),以及卡芬雅克在巴黎六月革命期间(见注 5)极残酷地镇压革命,屠杀起义

工人的行径。——659。

- 351 关于瑞士的民军制,恩格斯在《欧洲军队》一文中写道:“瑞士没有本国的常备军。每个瑞士人只要适合服兵役,都应在民兵部队中服务。民兵按年龄分为三种(适龄的、第一类应征的和第二类应征的)。青年在服役的头几年必须应召受训,有时也把他们集中在兵营内”。——661。
- 352 法国的全民征集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种普遍征集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几乎所有的男性公民都被征召入伍以抵御外敌入侵。——661。
- 353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载于1851年6月14日《寄语人民》第7期,是评论欧洲各国宪法的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杂志编辑厄·琼斯打算约请一些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来撰写这一系列论文。本文出自马克思之手,这一点从琼斯1851年5月23、25和30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本文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所作的对照中都可以得到证实。本文可能是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因为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用英文写作。
- 琼斯计划的系列论文中除本文外,另外发表的只有一篇《普鲁士宪法》。但不是马克思写的。——679。
- 354 根据法国1819年通过的新闻出版法,出版物登记时,保证金的多寡取决于它的出版期数和出版地点;保证金最高的是每周出版3期以上、在巴黎及其附近3个邻省出版的刊物。1850年7月23日的法律(它其实是1850年7月16日由国民议会通过的,但是在发表时错将第22条遗漏。国民议会因此于7月23日决定再出一个更正的文本。)把这种最高保证金又扩大到在里昂和附近的罗纳省出版的刊物。——683。
- 355 指英国宪章派(见注179)一直围绕着细节问题,即人民宪章(见注167)中提出的六点具体要求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692。
- 356 1849年9月1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32)与来到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在公开集会上成立了一个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注211)。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盟员,马克思被选进委员会。这份呼吁书及该委员会的收据和财务报告等文件,反映了马克思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聚集分散的革命力量方面所作的努力。

《呼吁书》写于9月20日,当时在很多报纸上发表。1849年9月25日《西德意志报》第106号上注明的日期为9月20日。《德累斯顿报》上发表时注明的日期为“9月19日”。《呼吁书》发表后,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在科隆成立了一个救济我们的政治流亡者的工人委员会,出版了《西德意志报和西卡耳梅克人》的小册子。9月28日,约·魏德迈领导的法兰克福工人协会作出定期为流亡者筹集“星期税”的决定等等。——699。

- 357 这份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注211)开出的《收据》证明了《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见本卷第699—701页)很快就得到了响应。给第一批响应者之一爱·蒂森所开收据的日期是1849年10月16日。——702。

- 358 本收据是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注211)继1849年10月16日后开出的又一张收据。这是从斯德丁寄来的第二笔款项。可以断定,G.Tichen和10月16日的文件中的E.Thiesen是同一个人。斯德丁寄来的两笔款项在1849年12月3日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中合并在一起(见本卷第705—706页)。

签名中没有卡·布林德和安·菲斯特尔,因为他们此时已离开伦敦。——703。

- 359 这个文件是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注211)的唯一一份财务报告。该委员会在1849年11月18日工人教育协会(见注32)的大会上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救济委员会。在新选出的委员会中,马克思担任书记,亨·鲍威尔担任出纳,恩格斯担任和伦敦的波兰及匈牙利流亡者委员会联系的秘书。

由于1849年11月18日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大会决定将这份财务报告在《德意志—伦敦报》等报纸上发表,所以这些报纸后来对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的财务报告的转载均可认为是经作者同意的。——704。

- 360 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能每两周或一周出版一次而集资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康·施拉姆在1849年12月下半月讨论集资问题,并在本手稿中作了说明。这份招股启事是1850年1月1日施拉姆撰写的。启事的第二部分和恩格斯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盈利和发行量的估价单》(见本卷第112—114页)有着明显的联系;“两周出版一次,印数3000份,每年可收入1900塔勒”这一说明直接和恩格斯的计算有关,根据他的

计算,每月出版一次,可收入 995 塔勒。

1930 年,这份招股启事的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8 卷。

1960 年,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7 卷。——708。

- 361 纪念法国二月革命(见注 4)两周年的宴会是由布朗基派流亡者组织的,于 1850 年 2 月 25 日在伦敦举行。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斐·沃尔弗在内的各国革命流亡者参加了纪念宴会。

1850 年 3 月 2 日《北极星报》第 645 号上刊登了一则关于宴会的报道。其中提到了恩格斯的祝酒词和其他人的演说,但没有指明演讲人。

1850 年 3 月 1 日《西德意志报》第 51 号刊登了关于宴会的更详细的报道,并标明“伦敦,2 月 26 日”。1850 年 3 月 5 日《德累斯顿报》第 55 号以及 1850 年 3 月 5 日《大胡蜂》第 54 号转载了《西德意志报》上的报道。《大胡蜂》指出参加宴会的有《新莱茵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并报道说恩格斯发表了纪念六月起义的祝酒词,沃尔弗发表了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祝酒词。——710。

- 362 这个收支清单是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211)提交给 1850 年 3 月 4 日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32)会议的。后面补充的第二部分可能是在清单得到会议确认后又过了几天才写的。

1850 年 3 月 20 日《大胡蜂》第 67 号第 302 页,在 1850 年 3 月 14 日署名“S”的伦敦通讯中只刊登了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711。

- 363 1850 年 4 月 17 日《大胡蜂》刊登了有关宪章派(见注 179)纪念罗伯斯比尔诞辰集会的报道,其中除恩格斯这段讲话外,还写道:“《新莱茵报》编辑卡·马克思也出现在客人当中”。1850 年 5 月《民主评论》也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报道,其中只提到了恩格斯的演说:“德国流亡者致了答辞,并以酒杯向‘英国无产者’祝贺而结束了非凡的演说”。——715。

- 364 平等派指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无地或少地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别,全称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715。



- 365 恩格斯亲笔写的这份流亡者委员会会议记录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211)为反对鲁·施拉姆、古·司徒卢威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试图组织自己的委员会、利用对流亡者的援助达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阴谋(见本卷第 722 页)而进行的斗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 4 月 20 日起草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见本卷第 407—409 页)中使用过这一记录。——716。
- 366 1850 年 4 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201)与旅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宪章派(见注 179)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定。这就是当时达成的六项条款的协定。协定由奥·维利希起草,马克思、恩格斯、乔·哈尼、奥·维利希、茹·维迪尔和亚当签署。这份协定共抄写七份,每一份上都有 7 个人的亲笔签名,它们都保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
-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未曾有过实际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后,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一边并企图接近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协会(见恩格斯和马克思 1850 年 5 月 6 日写给帕迪贡的信)。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哈尼在 1850 年 10 月初认为应当取消同布朗基派的协定。于是,当 1850 年 10 月 7 日巴泰勒米、亚当和维迪尔邀请维利希、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讨论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哈尼在 1850 年 10 月 9 日的回信中声明协定早已解除,并邀请他们于 10 月 13 日到恩格斯住处烧毁协定。事实上他们并未销毁这些文件。——718。
- 367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211)这份财务报告,除收支情况外,还谈到了古·司徒卢威等人企图通过成立另一个委员会来分裂政治流亡者的行径。与此有关的情况,见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 4 月 20 日起草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和 1850 年 6 月 14 日《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声明]》(本卷第 407—409、723—724 页),以及恩格斯 1850 年 4 月 22 日和 25 日写给约·魏德迈的信。——720。
- 368 这份声明是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211)在 1850 年 4 月 23 日的报告(见本卷第 720—722 页)以后又过了两个月、为帮助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不得不再次发出的呼吁。因为古·司徒卢威和弗·博布钦等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救济委员会只援助共产主义流亡者的谎言

和诬蔑,使来自德国的捐助暂时中止、而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723。

- 369 在1850年4月23日的报告(见本卷第720—722页)之后,流亡者委员会(见注211)于6月14日采取果断措施驳斥古·司徒卢威和弗·博布钦等人的谎言,让公众关注伦敦的流亡者的贫困(见本卷第723—724页)。于是1850年7月捐款再次增加。这份财务报告既反映了捐款增加的情况,也反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威斯巴登地区和汉堡的活动发展情况。

这份报告先刊登在1850年8月8日《北德意志自由报》第425号,后又节录刊登在1850年8月15日《自由射手》第98号。——725。

- 370 从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211)1850年9月18日的财务报告(见本卷第738—740页)可以看出,救济款在9月10日已经分发完毕,以至于1850年9月15日委员会事实上解散时已经没有资金。但是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把委员会的活动至少继续到1850年9月25日。根据保存下来的12张收据来看,这期间他大概是利用9月18日财务报告后从德国寄来的捐款。除了这里刊印的两张收据,以及1850年9月20日的收据(见本卷第741页)外还有6张收据,上面既没有马克思的也没有恩格斯的手迹。其中一张由威·李卜克内西于1850年9月1日开出,金额是12先令,另5张只有副本;克洛泽于9月9、16和25日分别签收10先令,康·施拉姆于9月20日签收1英镑,9月24日签收10先令。在李卜克内西的一张收据上有马克思的亲笔结算。——729、741。

- 371 1850年9月4日,曾残酷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将军海瑞在参观巴克莱彼尔金斯公司啤酒厂时,遭到工人殴打,在警察的保护下跑掉并立即离开了英国。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372)为了表示支持和同情工人的这一行动,于1850年9月10日举行集会。恩格斯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除1850年9月15日《雷诺新闻周报》第5号发表了恩格斯演说的完整记录之外,1850年9月14日《北极星报》第673号、9月11日《泰晤士报》第20591号也刊登了关于他的演说的简讯。两家德文报纸——1850年9月13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85号和9月18日《大胡蜂》第218号也刊登了这次集会的报道。——730。

- 372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派(见注179)左翼代表人物(乔·哈尼、厄·琼斯)和

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教育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01)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在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协会就完全解体了。——730、748。

- 373 这篇记录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它可能是当时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恩格斯写的。他在1853年11月23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在1850年8月底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曾和康·施拉姆轮流做记录。1850年9月15日这次会议的记录保留下来的只有两个副本,其中一个是由威·豪普特在1850年9月20日左右写的,另一个尚不知出自谁人之手。1956年,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1卷第2部分第248—252页根据这两个副本刊印了会议记录的全文。

1852年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曾引用这一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9—480页)。

本卷发表的记录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记录的两个不同副本之间的差别均在脚注中说明。——731。

- 374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于1847年6月在同盟(见注201)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拟定,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1847年12月8日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批准、通过。1848年下半年,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做了修改,从而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性。在新盟章的第一段,代替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含糊的要求。约·莫尔在他1848—1849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这个盟章。1849年3月,盟章全文在黑策尔领导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1850年8月审讯黑策尔小组时被用来作为一个证据。它就是这里所说的“现行的同盟章程”。

“真正的盟章”(见本卷第 744—747 页)是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科隆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起草的,12 月 10 日,这份盟章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文件一起送交同盟的伦敦区部,1850 年 12 月 18 日马克思收到了亨·毕尔格尔斯抄的章程副本(见燕妮·马克思 1850 年 12 月 19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1851 年 1 月 5 日,有马克思参加的伦敦区部会议予以批准。——732。

375 这个文件是马克思在 1850 年 8 月 1 日的信中要求奥·维利希提交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 211)9 月 2 日会议的;它是该委员会的最后一份财务报告,委员会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201)分裂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32)而停止了它的活动。——738。

376 这份建议书是 1850 年 11 月 11 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予下拟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者组成的伦敦区部提出的。科隆同盟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把它写入 12 月 1 日的公告。该公告曾于 1851 年落入警察局之手,1851 年 6 月 1 日刊登在《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 180 号。——742。

377 1851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注 374)在盟员彼·诺特荣克 1851 年 5 月被捕时,连同其他文件一起被普鲁士警察当局没收,并公布于 1851 年 6 月 22 日官方报纸《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 171 号,后来又收入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这里发表的马克思加了标记的章程,可能是马克思为 1 月 5 日伦敦区部会议作准备的。也可能是 1851 年 3 月初加的标记,因为马克思在 1852 年 3 月 5 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说:“附上章程。建议你把它整理得更条理些”。——744。

378 1850 年 12 月 30 日,“民主派兄弟协会”(见注 372)在伦敦举行新年聚餐会。出席的有德意志伦敦教育协会的代表、匈牙利、波兰和其他一些流亡者组织的代表。马克思和夫人、来自曼彻斯特的恩格斯以及康·施拉姆等都是由乔·尤·哈尼邀请来(见哈尼 1850 年 12 月 29 日给马克思的信)参加聚会的。

聚会的领导人是哈尼,他作了关于“民主派兄弟协会”1850 年度活动的总结报告。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北极星报》在报道中说“他同沙

---

佩尔一起作为德意志协会的代表”一事,可能是事先与沙佩尔达成的协议,因为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发表了退出协会的声明(见本卷第 568 页)。——748。

## 人名索引

## A

- 阿恩特, 恩斯特·莫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史学家和哲学家;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异族统治的解放战争,德国统一的先驱;1815年后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迫害,1820年被免去波恩大学史学教授职务,1840年恢复原职;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68、403。
- 阿尔伯(Albert 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 人称工人阿尔伯 der Arbeiter Albert 1815—189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领导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后为临时政府成员,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有期徒刑,巴黎公社的积极战士。——137、139、152、326—329、331、335、336、339、363、365、367、379、631。
-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勇士(Albrecht III., der Beherzte 1443—1500)——萨克森公爵(1464—1500);尼德兰总督,曾率军镇压1488—1493年尼德兰人民起义和1500年弗里斯兰农民起义。——505。
- 阿尔蒂埃里,路易吉(Altieri, Luigi 1805—1867)——罗马国务活动家,教皇国的主要代表;1845年为红衣主教;1849年是庇护九世的追随者,1860年是阿尔巴诺主教。——200。
- 阿尔肯,尼古劳斯(Alken, Nikolaus 死于1849年)——普鲁士战时后备军队员,袭击普吕姆军械库的参加者。——30。
- 阿尔诺德(布雷西亚的)(Arnoldo da Brescia 1100左右—1155)——意大利牧师和宗教改革家,1147—1155年是罗马共和国的领导人;被作为异教徒处死。——483、484。

阿尔瓦公爵, 费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皮门特尔(Alba, Fernando Alvarez de Toledo y Pimentel, duque de 1507 —1582)——西班牙统帅, 1567 —1573 年为尼德兰总督; 镇压尼德兰人民起义。——525。

阿拉戈, 多米尼克·弗朗索瓦(Arago, Dominnique-Français 1786 —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家; 七月王朝时期为共和主义者; 《改革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之一; 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曾参加镇压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631。

阿什利勋爵——见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阿斯顿, 路易莎(路易莎·迈耶尔)(Aston, Louise [Luise Meier] 1814 —1871)——德国女作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250。

埃代乌斯(Eddäus)——1849 年曾为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捐款。——704。

埃尔瓦, 夏尔德(Aylva, Sjurd 死于 1509 年)——1500 年弗里斯兰农民起义的领袖。——505。

埃格纳(Egener)——1849 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 —1889)——德国裁缝和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工人政论家; 侨居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1872), 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 —1871 年 5 月), 美国通讯书记(1870 —1872), 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 1872 年以前支持马克思,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 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455、568、572、731、734、736、737、742。

埃克尔曼, 约翰·彼得(Eckermann, Johann Peter 1792 —1854)——德国作家, 歌德的秘书; 《同歌德晚年时期的谈话》一书的作者和出版者。——250。

埃默曼, 卡尔(Emmermann, Karl)——莱茵省林务官; 1849 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步兵分队指挥官;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97。

埃塞伦, 克里斯蒂安(Essellen, Christian 1823 —185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 1848 年法兰克福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工人总汇报》的编辑, 后侨居美国。——102。

艾森胡特, 安东(Eisenhut, Anton 死于 1525 年)——德国神父;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和市民起义领袖之一。——540。

艾特尔·汉斯——见齐格尔米勒, 艾特尔汉斯。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在巴黎领导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429。
- 艾希费尔德,卡尔(Eichfeld, Karl)——普鲁士军官;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40。
-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189。
- 安·斯图亚特(Anna[Ann, Anne] 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262。
- 安东(Antoine[Anton] 1489—1544)——洛林公爵(1508—1544);镇压1525年阿尔萨斯农民起义的策划者。——557。
- 安内克,卡尔·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弗里茨)(Anneke, Carl Friedrich Theodor [Fritz]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1846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革除军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和书记,《新科隆日报》编辑,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7—12月被监禁,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指挥员,后为革命军炮兵总监和普法尔茨军事委员会成员;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56、58、87。
- 昂利,波尔多公爵——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 奥伯弥勒,威廉(Obermüller, Wilhelm 生于1809年)——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卡尔斯鲁厄志愿军的领导人;1848年以前流亡法国和瑞士;魏特林的反对者。——66、67、76、102。
-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Oborski, Ludwik 1787—1873)——波兰上校,革命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34年流亡伦敦,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家;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革命军师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1866年任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中央支部主席。——94、95、100。
- 奥蒂莉娅——见圣奥迪莉娅。



- 奥尔巴赫, 贝尔托尔德 (Auerbach, Berthold 原名莫泽斯·巴鲁赫 Moses Baruch 1812—1882)——德国作家, 自由主义者, 后为俾斯麦的信徒。——250、252。
-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 奥尔良公爵。
- 奥尔良公爵夫人, 埃莱娜·路易莎·伊丽莎白 (Orléans, Hélène-Louise-Elisabeth, duchesse d'父姓梅克伦堡-什梅林 Mecklenburg-Schwerin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长子斐迪南的遗孀, 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202、447。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69、178、184、203。
- 奥康瑞尔, 菲格斯·爱德华 (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 1848年后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430、601、602。
- 奥普尔侯爵, 阿尔丰斯·昂利 (Hautpaul, Alphonse-Henri, marquis d' 1789—1865)——法国将军, 正统主义者,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 陆军部长(1849—1850)。——204、215、221、231、238、239、247、272、297、412、604、611、612。
- 奥赛男爵, 沙尔·勒梅谢·德隆普雷 (Haussez, Charles Lemercher de Longpré, baron d' 1778—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 曾任海军大臣(1829)。——222。
- 奥斯特勒, 理查(Oastler, Richard 1789—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家; 托利党人;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斗争中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300、302、307。
- 奥斯瓦尔德 (Opwald)——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营长, 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军事委员。——86。
- 奥索巴 (Osoba)——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 奥维狄乌斯 (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 (Publius Ovidius [Ovid] Naso 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 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634。

## B

- 巴尔贝斯, 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 (Barbès, 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员(1848), 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1854年遇赦; 后流亡荷兰, 不久即

- 脱离政治活动。——177、223、331、445、447、634、690。
- 巴赫,瓦尔特(Bach, Walther)——德国雇佣兵,1525年是阿尔高农民军队的领袖。——547、549。
- 巴拉盖·狄利埃伯爵,阿希尔(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comt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1870年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99。
-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 - 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137、160、170—173、175—178、182、192、193、199、202、204。
- 巴罗什,皮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波拿巴主义者,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223、460。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133。
-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1836—1846);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164。
- 巴托里伯爵,伊什特万(Báthory[Batory], István, Graf 死于1530年)——匈牙利贵族;1514年率领军队镇压匈牙利的农民起义;匈牙利宫廷侍卫(1519—1530)。——515。
- 拜尔勒(Beyerle)——1850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16。
- 班贝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美因茨日报》编辑,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49—1850年移居伦敦,1851年在比利时经商,1852年起侨居巴黎,1858年成为巴黎的银行家;1866年回到德国,德意志

- 帝国国会议员(1871—1893);民族自由党人。——58、92。
- 班特尔,汉斯(班特尔汉斯)(Bantel, Hans[Bantelhans])——德廷根(维尔腾堡)人;1514年为“穷康拉德”的领导人。——512。
- 薄伽丘,乔万尼(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意大利诗人和人文主义者,《十日谈》的作者。——484。
- 保尔,约翰(Ball, John 死于1381年)——英国牧师,1381年是英国农民起义的左翼思想家和领导人。——483、485。
- 鲍威尔,安德烈亚斯·亨利希(Bauer, Andreas Heinrich 约生于1813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1838年在巴黎成为正义者同盟盟员,1842年被驱逐出法国;曾一度担任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7—1850),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司库;1850年春是同盟派往德国的特使;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386、408、409、414、423、425、428、455、568、622、623、700—703、706、707、713、722、724、728、731、737、740。
- 鲍威尔, J. (Bauer, J.)——德国政论家,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成员。——704。
- 鲍威尔,路德维希(Bauer, Ludwig)——德国医生,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移居英国,1850年是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协会救济委员会的主席。——408、722。
- 贝尔奈斯,卡尔·路德维希(Bernays, Karl Ludwig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加下出版;1848—1849年革命后侨居美国。——431、432。
- 贝尔坦,路易·玛丽·阿尔芒(Bertin, Louis-Marie-Armand 1801—1854)——法国新闻工作者,奥尔良党人,《辩论日报》的出版者(1841—1854)。——462。
- 贝尔托尔德,奥托(Berthold, Otto 生于1827年)——普鲁士军官,曾任商业助理;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从普鲁士军队逃跑;1850年在伦敦成为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约1851年初起回到汉堡,在那里与卡·沙佩尔有通信联系,1851或1852年在施特拉斯堡作为政治流亡者被捕,并被囚禁在南特。——729。
- 贝格(Berg)——1850年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筹措资金。——738。
- 贝格曼(Bergmann)——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 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5年徒刑;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626。

贝克尔,麦克斯·约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德国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迁居美国。——74。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年加入瑞士籍;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分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瑞士“革命中央”成员(1850),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1、90、91、99、101、102、104、106、424。

贝里耶,皮埃尔·安东(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203、204。

贝林,汉斯(Berlin, Hans)——德国官员,海尔布隆市议员和市长;1525年农民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试图在伯布林根集结一支士瓦本同盟的军队,占领海尔布隆。——533。

贝林,汉斯(Berlin, Hans 死于1560年)——海尔布隆公证人和司法代理人;1525年农民起义时是海尔布隆市议员,内卡河谷—奥登林山农业委员会委员,温和的“阿莫巴赫声明”的倡导者之一。——541。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

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27。

贝尼高, A. (Bernigau, A. 死于 1849 年) ——普鲁士军官, 1848 年 3 月初是科隆—多伊茨的少尉, 科隆革命事件的参加者; 柏林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在拉施塔特投降后被普鲁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03。

贝谢尔, 奥古斯特 (Becher, August)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6、120、419。

贝泽勒尔, 威廉·哈特维希 (Beseler, Wilhelm Hartwig 1806—1884) ——德国法学家, 律师; 曾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级代表大会主席 (1846),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临时政府首脑 (1848),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 属于中间派右翼,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总督。——615。

本茨 (Benz) ——1850 年是伯尔尼小店主。——259。

本生男爵, 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 (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Freiherr von 1791—1860) ——普鲁士外交官、政论家和神学家, 曾任驻梵蒂冈的代表 (1824—1839) 和驻伦敦公使 (1842—1854)。——434、438、452、598。

毕尔格尔斯, 约翰·亨利希 (Bürgers, Johann Heinrich 1820—1878) ——德国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6 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1851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 6 年徒刑;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60 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708。

毕若·德·拉·比贡利, 托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 Robert 1784—1849) ——法国元帅, 奥尔良党人, 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 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 (1808—1814) 指挥法军分队, 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 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 1841—1847 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 1848—1849 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 (1848—1849)。——172。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 ——罗马教皇 (1846—1878)。——181、202、203、313、599、600。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 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

- 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 Plon-Pron et prince rouge 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203。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威斯特伐里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弟弟。——203。
-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124、184、203。
- 波伊克尔,爱德华·冯(Peucker, Eduard von 1791—1876)——普鲁士将军,曾任法兰克福的所谓帝国政府陆军大臣(1848—1849),指挥反革命军队镇压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15、62、98。
- 伯蒂歇尔,威廉·卡尔(Boetticher[Bötticher], Wilhelm Karl 1789—1868)——普鲁士官员;普鲁士总督(1842—1848),1849年是第一议院议员,1850年是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奥—普联邦委员会的代表。——242。
-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ö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的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年3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曾与警察局有联系。——431、432。
- 伯恩施太因,阿尔诺德·伯恩哈德·卡尔(Börnstein, Arnold Bernhard Karl 1808—184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军事领导人。——431、432。
- 伯格,约翰(Berg, John)——英国人,1850年为社会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提供资金。——738、739。
- 伯海姆,汉斯(Böheim, Hans 人称吹鼓手小汉斯 Pauker, Pfeiferhänslein 死于1476年)——德国传教士、牧人和乡村音乐家;1476年在陶伯河谷传教,发动农民运动;后被维尔茨堡主教俘虏并作为异教徒被烧死。——502—505。
- 伯克尔(Boecker)——德国科隆市议员;1849年5月参加在科隆举行的莱茵省区乡委员会代表大会。——14。
- 伯里特,伊莱休(Burrill, Elihu 1810—1879)——美国语言学家,博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组织者。——597。

伯利欣根, 葛兹·冯(Berlichingen, Götz von 1480—1562)——德国骑士, 1525年参加农民起义, 任内卡河谷—奥登林山雇佣军支队的步兵上校, 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 歌德的同名剧本和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葛兹·伯利欣根的原型。——531、532、534、542、543。

勃兰登堡伯爵, 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1792—1850)——普鲁士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内阁首脑(1848年11月—1850年11月)。——15。

勃朗, 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向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年8月流亡英国, 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 1871年是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137、139、143、148、150、152、160、161、173、187、221、319、365、367、376、379、630、631、633、634、735。

勃鲁姆, 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为左派领袖之一, 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 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5、60、86、89。

柏拉图(Platon[Plato]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 自然经济的维护者。——166。

博布钦,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Bobzin,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生于1826年)——德国钟表匠帮工, 1847年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伦敦, 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 1850年4月底成为该协会司库; 1851年离开伦敦。——722、723。

博尔姆, 丹尼尔(Borme, Daniel 约1821—1872)——法国化学家, 因参与巴黎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而在布尔日受审, 在革命运动中是保皇派的代表人物。——447、448。

博凯, 让·巴蒂斯特(Bocquet, Jean-Baptiste)——法国教师, 共和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 曾参加法国1848年革命, 后流亡伦敦; 1864年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1872年由于支持巴黎公社被判流放5年。——328、329。

博林布罗克子爵, 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 Henry Saint John, Viscount 1678—

- 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263。
- 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德(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178。
-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Beust, Friedrich Karl Ludwig von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退伍;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委员会委员,《新科隆日报》的编辑(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8年10月代表科隆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相一致的纲领;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革命集中”的成员,1867年国际工人协会苏黎士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恩格斯的表妹安娜的丈夫。——84。
-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Braunschwei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Herzog von 1735—1806)——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2—179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司令,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1806)中战败。——648。
- 布阿吉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 Pierre Le Pesant, sieur d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210。
- 布赫尔,阿道夫·洛塔尔(Bucher, Adolph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推事和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50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外交观点。——407。
- 布莱(Blei)——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26, 207, 283。
- 布赖滕施泰因,塞巴斯蒂安·冯(Breitenstein, Sebastian von 1464—1535)——肯普滕修道院院长(1523—1535)。——526, 563。
- 布兰克,卡尔·埃米尔(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40—50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1845年起是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720。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 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 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 同年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无期徒刑;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 1870年巴黎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 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 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 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150、177、220—223、331、338、382、430、445、447、630、633、634、690。
- 布劳利许(Braulichy)——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 布勒姆(布勒姆第二), 安东(Bloem[Bloem II.], Anton 1814—1885)——德国律师, 民主主义者、市议员, 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14。
- 布雷亚, 让·巴蒂斯特·菲德尔(Bréa, Jean-Baptiste-Fidèle 1790—1848)——法国将军, 曾参与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 被起义者击毙。——187。
- 布里斯曼, 约翰奈斯(Briesmann, Johannes 1488—1549)——东普鲁士的宗教改革家, 柯尼斯堡大学的创建人之一。——500。
- 布林德, 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 与马克思同去伦敦, 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 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 50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60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 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35、43、361、700、701、702、706。
- 布鲁姆, 亨利·彼得, 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 Henry Peter, 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文学家; 辉格党人, 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曾任大法官(1830—1834), 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 议会议员。——598。
- 布吕格曼, 卡尔·亨利希(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自由主义者; 1830年起为德国大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1832年参加汉巴赫大典, 1832—1840年被监禁; 1842—1843年为《莱茵报》撰稿人, 1845—1855年为《科隆日报》主编;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持保守派立场。——614。

- 布伦, 卡尔·冯 (Bruhn, Karl von 生于 1803 年)——德国新闻工作者; 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 1848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起义和巴登起义的参加者; 1850 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 追随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后为拉萨尔的拥护者; 60 年代在汉堡出版拉萨尔派的机关报《北极星》。——424、425。
- 布伦克尔, 路德维希 (Blenker, Ludwig 1812—1863)——德国酒商, 退伍军人,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来流亡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59—62、69、74、94、99、101、103。
- 布伦坦诺, 洛伦茨·彼得·卡尔 (Brentano, Lorenz Peter Karl 1813—1891)——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 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0 年迁居美国; 1878 年起为美国国会议员。——34—36、38—41、43—46、50、51、79、80、86、103、108、109。
- 布绍特, 让·巴蒂斯特·诺埃尔 (Bouchotte, Jean-Baptiste-Noël 1754—1840)——法国将军;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雅各宾党人; 曾任陆军部长 (1793—1794)。——654、674。

## C

- 采尔, 弗里德里希·约瑟夫 (Zell, Friedrich Joseph 1814—1881)——德国律师, 特里尔市议员;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9 年是帝国内阁派驻巴登的专员。——14、15。
- 查基, 米克洛什 (Csáky [Csaky], Miklos 1465—1514)——匈牙利神学家, 乔纳德主教 (1500—1514), 在匈牙利农民战争时期被起义者所杀。——515。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 (1625—1649),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264。
- 查理五世 (Karl V 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19—1556) 和西班牙国王 (1516—1556), 称查理一世, 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查理五世的原型。——540。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 (1824—1830); 被 1830 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222。
- 查理—阿尔伯特 (Carlo, Alberto [Karl Albert] 1798—1849)——撒丁国王 (1831—1849)。——182、656。

查理·詹姆斯(Charles James)——英国神学家,1850年是伦敦大主教。——601。

吹鼓手小汉斯——见伯海姆,汉斯。

## D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 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领导成员,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616。

达莱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404。

戴斯特,让·巴蒂斯特(Teste, Jean-Baptiste 1780—1852)——法国律师和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时期贸易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1847)。——209、364。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22、312。

道光——中国清朝皇帝(1821—1850)。——277。

道默,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Dau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德国作家,写有宗教史方面的著作。——249—255。

德弗洛特——见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

德拉奥德,律西安(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警探。——325—331、335、338、339。

德拉马尔,泰奥多尔·卡齐米尔(Delamarre, Théodore-Casimir 1797—1870)——法国银行家和政论家,波拿巴主义者,1844年起为《祖国报》所有人。——397、461。

德拉真加(Della Genga)——罗马红衣主教,1849年是庇护九世的代表。——200。

德莱塞尔,加布里埃尔·阿伯拉罕·玛格丽特(Delessert, Gabriel-Abraham-Marguerite 1786—1858)——法国贵族,巴黎警察局长(1836—1848)。——325、

335。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2年4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424、425、427、429、431、708。

德雷埃尔,斐迪南(Dreher, Ferdinand)——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任巴登人民自卫团团长。——66、67、74、76、102。

德鲁安·德路易斯,爱德华(Drouyn de Lhuys, Edouard 1805—1881)——法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40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1851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外交部长和外交大臣(1848—1849、1852—1855和1862—1866)和驻伦敦公使(1855);1855年是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597。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ér[d' 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3—1859)——德国医生,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后来流亡瑞士。——47、51、54、64、86、92、103。

德韦斯(Devaisse)——法国革命家,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山岳党人。——337。

邓宾斯基,亨利克(Dembiński[Dembinski], Henryk 1791—1864)——波兰政治家和将军,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在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0年移居巴黎。——8、27。

狄茨,奥斯瓦尔德(Dietz[Die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建筑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赴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742。

狄德埃,亨利希(Didier, Heinrich)——普鲁士邮政官员;1849年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驻巴黎使馆秘书;被驱逐出法国后流亡瑞士,1849年移

- 居美国。——406。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 384 — 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 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 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 (公元前 338 年) 被驱逐出雅典。——203。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 — 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40 年代参加“青年英国”; 托利党领袖, 19 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8 — 1859 和 1866 — 1868), 内阁首相 (1868 和 1874 — 1880)。——580。
- 迪特里希施坦男爵, 西格蒙德 (Dietrichstein, Sigmund Freiherr von 1484 — 1540)——施蒂里亚总督, 帝国军事长官, 曾镇压 1515 — 1516 年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起义;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是施蒂里亚陆军指挥官, 7 月 3 日在施拉德明被击败, 农民战争行将结束时在韦尔芬被起义军捕获, 后被释放。——516、559、560。
- 蒂尔克, 卡尔·弗里德里希 (Türk, Carl Friedrich 1800 — 1887)——德国法学家, 罗斯托克大学法学系教授, 1847 年是《梅克伦堡丛刊》的编辑, 1848 —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被控犯有叛国罪, 被判监禁 (1853 — 1856)。——712。
- 蒂雷纳子爵, 昂利·德拉图尔·多韦尔尼 (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vicomte de 1611 — 1675)——法国将军, 三十年战争中任法军统帅。——666。
- 蒂森, 爱德华 (Tiehsen [Thiessen, Tichen], Eduard)——斯德丁人, 1849 年曾为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捐款。——702、703。
- 蒂森, G. 一见蒂森, 爱德华。
- 丁盖尔施泰特男爵, 弗兰茨 (Dingelstedt, Franz Freiherr von 1814 — 1881)——德国诗人和作家; 起初是自由党人, 40 年代为保皇党人, 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歌作品的代表人物; 斯图加特宫廷剧作家 (1846 — 1851)。——250。
- 杜班, 安德烈·玛丽·让·雅克 (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人称大杜班 Dupin aîné 1783 — 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众议院议长 (1832 — 1839),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议员 (1848 — 1849) 和立法会议长 (1849 — 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232、297、604。
- 杜邦-德勒尔, 雅克·沙尔 (Dupont de l'Eure, Jacques-Charles 1767 — 1855)——法国政治家, 自由主义者;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830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30 年以前是烧炭党领导成员; 40 年代是皇朝反对派的代表人物, 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 年为临时政府主席, 后为国民议会议员。——

137、365、631。

杜波蒂, 米歇尔·奥古斯特(Dupoty, Michel-Auguste 1797—1864)——法国政论家, 七月王朝时期是多家民主共和派报纸的出版者和编辑, 1841 年被判 5 年监禁。——326。

杜尔哥, 安娜·罗伯尔·雅克, 洛恩男爵(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魁奈的学生; 财政总稽查(1774—1776)。——313。

杜弗尔, 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 年 10—12 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1849 年 6—10 月); 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 内阁总理。——166、169、208、209。

杜克莱尔, 沙尔·泰奥多尔·欧仁(Duclerc, Charles-Théodore-Eugène 1812—1888)——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国民报》编辑(1840—1846), 财政部长(1848 年 5—6 月);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 动产信用公司董事会成员, 国民议会副议长(1875), 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2 年 8 月—1883 年 1 月)。——180。

杜木里埃, 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 [Dümouriez], 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法国革命时期是吉伦特党人; 曾任外交部长、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2—1793); 1793 年 3 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651。

杜普拉, 帕斯卡尔(Duprat, Pascal 1815—1885)——法国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297。

杜山-路维杜尔——见路维杜尔,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

杜亚里埃(Dujarrier)——法国银行家。——364。

多尔(Doll)——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莱茵普鲁士人, 推销员; 1848 年巴登共和派起义的参加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任师长。——101、102、105、106。

多尔图, 约翰·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Dortu, Johann Ludwig Maximilian 1826—1849)——普鲁士军官; 革命民主主义者, 柏林 1848 年三月十八日起

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遭枪杀。——403。

多扎, 盖尔盖伊(Dózsa[Dosa], Gergely 1470 左右—1514)——特兰西瓦尼亚的下层贵族, 马扎尔人；在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军官；1514 年是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遭受贵族的酷刑致死。——514、515。

多扎, 格雷戈尔(Dózsa, Gregor 死于 1514 年)——特兰西瓦尼亚的下层贵族, 1514 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与其兄盖·多扎一起被俘后处死。——515。

## E

恩格尔哈德, 玛格达琳娜·菲利浦娜(Engelhard, Magdalene Philippine 父姓加特雷尔 Gatterer 1756—1831)——德国女诗人。——250。

恩斯特第二(Ernst II. 1464—1513)——德国神学家, 马格德堡大主教(1476—1513)。——492。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 1771—1851)——汉诺威国王(1837—1851)。——120。

## F

法卢伯爵, 弗雷德里克·阿尔弗勒德·皮埃尔(Falloux, Frédéric-Alfred-Pierre, comte de 1811—1886)——法国政治家和作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1848 年解散国家工场的策划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171、181、193、204。

菲克勒尔, 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民主运动领导人；1849 年为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又流亡英国和美国。——35。

菲利浦一世(Philipp I. 1479—1533)——巴登封疆伯爵；1514 年镇压鞋会暴动的策划者之一, 1525 年参与镇压德国南部的农民起义；曾任帝国政府的总督(1524—1527)。——514。

菲利浦一世, 仁者(Philipp I., der Großmütige 1504—1567)——黑森邦伯, 曾参加消灭 1522 年的骑士起义, 镇压 1525 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522、554、555、563。

- 菲斯特尔, 安东 (Füster, Anton 1808—1881)——奥地利神学家, 维也纳大学物理学和神学教授; 1848—1849 年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8 年秋天以所谓的民间教士的身份在维也纳大学生武装组织中暂露头角, 后为国会议员, 属于左翼; 1849 年暂住莱比锡和汉堡, 1852 年流亡伦敦;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委员, 后移居美国。——700、701、706。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503—1564)——奥地利大公, 神圣德意志罗马帝国皇帝 (1556—1564)。——525、535、547、549、559—561。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419。
- 费尔巴哈尔, 马特恩 (Feuerbacher, Matern 1485—1567 左右)——德国店主, 波特瓦尔 (符腾堡) 市市政会成员, 市民反对派领袖; 1525 年领导符腾堡起义农民和市民的华美基督教军队; 起义失败后是唯一被宣告无罪 (1527) 的起义军首领。——535、536、539、540。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30 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 1848—1849 年是预备会议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 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268、597。
- 芬纳尔·冯·芬纳贝格, 斐迪南·丹尼尔 (Fenner von Fenneberg, Ferdinand Daniel 1820—1863)——奥地利军官; 1848 年任维也纳国民自卫军司令, 1849 年任普法尔茨革命军司令兼参谋长, 占领兰道要塞的行动失败后被撤职; 后流亡美国, 纽约《大西洋》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1851), 《德国共和党人报》(1851—1852) 和《西方先驱者报》(1853) 的编辑; 1858 年返回德国。——57。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50 年代脱离革命斗争, 50—60 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360。
- 弗兰茨·欧根, 萨瓦亲王 (欧根亲王) (Franz Eugen, Prinz von Savoyen [Prinz Eugen] 1663—1736)——奥地利统帅和国务活动家。——61。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 (1848—1916)。——243、616。
- 弗兰格尔伯爵,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Graf von 1784—1877)——普鲁士将军, 1848 年 11 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 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 1856 年任陆军元帅; 丹麦战争时期 (1864) 任普奥联



- 军总司令。——699。
- 弗朗索瓦一世(弗兰西斯一世)(François I [Francis I] 1494 —1547)——法国国王(1515 —1547)。——344、524。
- 弗勒利希(Fröhlich)——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10月底作为间谍从伦敦回到德国。——705。
- 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 1808 —1863)——丹麦国王(1848 —1863)。——458。
- 弗里茨,约斯(Fritz, Joß 死于 1525 年)——1513年上莱茵“鞋会运动”的组织者。——508 —511、517。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 —1786)——普鲁士国王(1740 —1786)。——262、655、660、661、666。
- 弗里德里希三世,贤人(Friedrich III., der Weise 1463 —1525)——萨克森选帝侯(1486 —1525);维滕贝格大学的创建人之一,路德在瓦尔特堡的保护人(1521 —1522)。——488。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 August II. 1797 —1854)——萨克森国王(1836 —1854)。——120。
- 弗里德里希-威廉-斐迪南——见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 1802 —1875)——黑森摄政王(1831 —1847),黑森-卡塞尔选帝侯(1847 —1866)。——616。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1744 —1797)——普鲁士国王(1786 —1797)。——648。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 —1861)——普鲁士国王(1840 —1861)。——30、71、73、120、123、243、267、268、291、292、435、438、441、458、614、616。
- 弗里德里希-约西亚斯,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亲王(Friedrich Josias Prinz von Sachsen-Coburg-Saalfeld 1737 —1815)——奥地利陆军元帅。——648。
- 弗里斯,彼得(Fries, A. 或 Peter 生于 1822 年)——普鲁士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成员;1850年流亡瑞士,后流亡法国。——50、424。
- 弗伦茨贝格,格奥尔格·冯(Frundsberg, Georg von 1473 —1528)——日耳曼军人,哈布斯王室的忠实臣仆,1525年帕维亚会战的指挥官;1525年曾受士瓦本同盟的委托镇压阿尔高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农民起义。——549、560。

- 弗伦克尔(Fränkell[Fraenkel])——德国工人,侨居伦敦,1847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49—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455、731、742。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37、339、365、631。
- 弗洛里,卡(Flory, C.)——1850年曾为伦敦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捐款。——738。
- 弗洛里安——见格赖泽尔,弗洛里安。
- 弗洛里斯,约阿希姆·冯——见约雅敬。
- 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Flotte[Deflotte], Paul-Louis-François-René de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50—1851),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221、223、382、399、400、412。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201。
-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Julius] 1820—187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撰稿人,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351、418。
- 福尔讷,安东(Fornier, Anton)——讷德林根(法兰克尼亚)帝国直辖市市长;1525年4月参加农民起义并领导城市平民。——530。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6、120、268、419。
- 福瑟吉尔,托马斯(Fothergill, Thomas)——英国军官,1850年任小资产阶级的德国流亡者同盟的名誉书记。——414。

福适, 莱昂(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和1851年)。——133、171、177、179。

富尔德, 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 任财政部长(1849—1851), 财政大臣(1861—1867), 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127、146、163、175、205、206、208、209、373、374、397。

富基埃-坦维尔, 安东·康坦(Fouquier-Tinville, Antoine-Quentin 1746—1795)——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183。

富瓦, 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蒂安·奥古斯特·阿尔图尔·路易·斐迪南(Foy, Maximilien-Sébastien-Auguste-Arthur-Louis-Ferdinand 1815—1871)——法国贵族, 1831年起为贵族院议员, 1850年3月10日在立法议会的补选中是秩序党的候选人。——399。

富歇, 约瑟夫(Fouché, Joseph 1759—1820)——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 拿破仑第一内阁的警务大臣; 以毫无原则著称。——216、404。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37。

## G

盖尔, 弗洛里安(Geyer, Florian 约1490—1525)——法兰克骑士, 站在起义的农民一面, 曾促使许多法兰克城市同起义军缔结盟约, 他的军事经验被记入陶伯河谷农民起义军的“奥克森弗特军事条例”, 农民起义失败后被处死。——531—534、542—545。

盖斯迈尔, 米夏埃尔(Gaismair [Geismaier], Michael 约1490—1532)——蒂罗尔行政长官的秘书, 布里克森主教的书记员; 1525—1526年阿尔卑斯山区农民起义的左翼领导人; “蒂罗尔邦法”的起草人, 设想建立一个农民和矿工的国家; 1532年被奥地利大公的亲信所谋杀。——559—562。

戈尔盖, 阿尔图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将军, 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 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 背叛匈

- 牙利革命,率领所属部队向沙皇军队投降。——46。
- 戈克,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43、86。
- 哥林格尔,卡尔(Göhringer[Göringer], Karl 生于1808年)——德国巴登小酒店老板;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那里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704。
-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Colubbus], Cristoforo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在四次航海(1492—1504)过程中,发现并考察了加勒比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东北地区。——349、351。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249、250、255。
- 格奥尔格,大胡子(Georg, der Bärtige 1471—1539)——萨克森公爵(1500—1539);宗教改革的反对者;镇压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弗兰肯豪森会战的参加者。——499。
- 格贝尔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Gebert, August Friedrich)——德国木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流亡瑞士,1850年迁往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742。
- 格茨,克里斯蒂安(Götz, Christian 1783—1849)——奥地利陆军少将;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656。
- 格尔伯,埃拉斯穆斯(Gerber, Erasmus 死于1525年)——德国手工业者;1525年阿尔萨斯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察伯恩会战失败后被俘并被处死。——557。
- 格尔伯,托伊斯(Gerber, Theus 原名马丁·安格勒 Martin Angerer 约死于1541年)——德国制革工人;斯图加特市民军(1525年同符腾堡费尔巴哈尔起义军合并)的领袖,起义失败后逃往埃斯林根。——536、540。
- 格赖纳,泰奥多尔·路德维希(Greiner, Theodor Ludwig 约生于1820年)——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成员;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移居法国和美国。——63、64、65、424。

- 格赖泽尔, 弗洛里安(Greisel, Florian 人称弗洛里安神父 Pfaffe Florian)——艾希施泰滕(符腾堡)的教士, 1525 年士瓦本农民起义的领袖。——538。
- 格朗丹, 维克多(Grandin, Victor 1797—1849)——法国厂主, 保守派政治家, 众议院议员(1839—1848);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32。
- 格朗梅尼尔(Grandménil)——法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成员; 《改革报》的创办人和发行人之一。——327。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 1848 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 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 50 年代为《国家报》主编。——232, 461, 605。
- 格雷, 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 1855—1858 和 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306。
- 格雷, 约翰(Gray, 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 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643。
- 格雷贝尔, 康拉德(Grebel, Konrad 1489—1526)——瑞士再洗礼派的创始人, 闵采尔的信徒, 曾在德国南部进行革命宣传。——500。
- 格雷戈尔(布尔格贝恩海姆的)(Gregor, Burgbernheim[Burg-Bernheim])——1525 年安斯巴赫农民起义军的首领。——544, 545。
- 格律恩, 卡尔(Grün, 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 40 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 属于左翼;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 1851 年起流亡比利时, 1861 年回到德国, 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 1870 年到维也纳; 1874 年出版了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402。
- 格纳姆(Gnam)——普鲁士啤酒商, 1849 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 1850 年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年秋天移居美国。——716, 717。
- 葛兹——见伯利欣根, 葛兹·冯。
- 古德肖, 米歇尔(Goudchaux, Michel 1797—1862)——法国银行家, 资产阶级共

- 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50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161。
- 古格尔,巴斯蒂安(Gugel, Bastian 死于1514年)——1514年巴登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514。
- 谷兹科,卡尔·斐迪南(Gutzkow, Karl Ferdinand 笔名莱昂哈德·法尔克 Leonhard Falk 1811—1878)——德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德意志电讯》的出版者,德累斯顿皇家剧院的戏剧顾问。——250。
- 郭士立,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Gü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 1803—1851)——德国传教士,曾在中国传教。——276、277。

## H

- 哈伯恩,威廉·冯(Habern, Wilhelm von)——普法尔茨选帝侯国的元帅;1525年镇压普法尔茨农民起义的贵族军队首领。——534、547。
- 哈德良(普卜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罗马皇帝(117—138)。——646。
- 哈菲兹(Hafis 原名沙姆斯乌丁·穆罕默得·哈菲兹 Schamsuddin Muhammad Hafis 约1325—1390)——波斯诗人,塔吉克人,波斯和塔吉克文学的经典作家。——252。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430、601、719。
- 哈森普夫卢格,汉斯·丹尼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Hassenpflug, Hans Daniel Ludwig Friedrich 1794—1862)——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曾任黑森选帝侯国的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1832—1837),首相(1850—1855)。——615。
- 海德克,恩斯特(Heidecker, Ernst 约生于1824年)——德国旋工;巴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1846年秋天被开除出同盟,1849年是德国工人联合会会员,1850年流亡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704。

- 海恩,奥古斯特(Hain August)——德国邮政干事;1848—1849年德国革命和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被判处20年监禁;1850年6月逃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568。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203、432。
-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k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总司令(1849),率领奥地利军队去镇压匈牙利革命。——201、597、730。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432。
- 海因茨曼,亚历克西斯(Heintzmann, Alexis 约生于1812年)——德国检察官;自由派政治家;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流亡伦敦,1861年为民族联盟伦敦分部的主席。——22。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44、110、111。
- 汉诺威王朝——英国的王朝(1714—1901),这个王朝的国王同时是德国汉诺威邦的选帝侯(1815年以前)和国王(1837年以前)。——262。
-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 David Justus Ludwig 1790—1864)——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财政大臣(1848年3—9月)。——13。
- 豪德(Haude)——19世纪40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0年底是该集团驻德国的特派员。——742。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

-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年10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贩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1852年迁居巴西。——568。
- 荷马(Homeros 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57、268。
- 赫德森,乔治(Hudson, George 1800—1871)——英国政治活动家,铁路公司所有者之一,有“铁路大王”之称。——363。
- 赫希斯特,恩斯特·海尔曼(Höchster, Ernst Hermann 约生于1811年)——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时期为安全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后脱离政治活动。——22、34。
- 黑尔芬施太因伯爵,路德维希(Helfenstein, Ludwig Graf von 1480左右—1525)——奥地利贵族,魏恩斯贝格(符腾堡)总督,以残酷无情地对待农民而著称;1525年起义农民攻陷堡垒后被处死;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女婿。——531、533、542。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57、277、313、421、495、619。
-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Hecker, Friedrich Franz Karl 1811—1881)——德国律师,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德国旁观者》的撰稿人和资助者(1847—1848),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1861—1865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60、101、109。
- 黑克尔,卡尔(Hecker, Karl)——德国商人,民主主义者,1849年埃尔伯费尔德起义军的领导人之一。——22。
- 亨利四世(Henri IV [Heinrich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263。
-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 亨利八世(Henry VIII [Heinrich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265。
- 亨讷贝格伯爵,约翰(Henneberg, Johann Graf von)——德国僧侣,富尔达皇家修道院院长(1521—1541)。——554、563。



- 亨泽(Henser)——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 洪施太因伯爵,威廉(Honstein, Wilhelm Graf von 1470左右—1541)——德国法学家,曾一度任弗赖堡(布赖斯高)大学校长;1506年起为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称威廉三世,1524年为美因茨总督;1525年镇压农民起义的参加者。——547。
- 胡布迈尔,巴尔塔扎尔(Hubmaier, Balthasar 约1480—1528)——德国神学家,教士,后为再洗礼派教徒;闵采尔的拥护者;曾在瓦尔茨胡特传教(1524—1525),在教区和起义农民之间建立联系;后作为浸礼派的领袖在维也纳被烧死。——500、523。
- 胡登,弗罗文·冯(Hutten, Frowin von)——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追随者,反对特里尔大主教战争的参加者,1525年是士瓦本同盟陆军上校;乌尔里希·冯·胡登的堂兄弟。——547。
-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诗人和政论家,人道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尔利希·冯·胡登的原型。——488、519—522、547。
- 胡斯,扬(Hus[Huß], Jan 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后被控告为异教徒,被烧死。——484。
- 华盛顿,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美国国务活动家,将军,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1775—1783)任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297。
- 华斯哥·达·伽马(Vasco da Gama[Vasco de Gama] 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1497—1498年发现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468。
- 怀斯曼,尼古拉斯·帕特里克·斯蒂芬(Wiseman, Nicholas Patrick Stephen 1802—1865)——英国天主教教士;1850年起为威斯敏斯特教堂大主教和红衣主教。——599、600。
- 霍亨洛埃伯爵,阿尔布雷希特(Hohenlohe, Albrecht Graf von)——法兰克尼亚贵族(1525年起)。——530。
- 霍亨洛埃伯爵,莱奥波德(Hohenlohe, Leopold Graf von)——法兰克尼亚贵族(1525年起)。——530。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

- 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30、73。
- 霍苏(霍索),安塔尔(Hosszu[Hosza], Antal)——1514年是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515、516。
- 霍伊斯纳,卡尔(Häusner, Karl)——德国工程师,1849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莱茵黑森分队指挥官。——58。

## J

-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126、133、135、137、155、164、171、178、199、204、261—266、311、446。
- 吉布斯(Gibbs)——1850年是伦敦市参议会会议员(高级市政官)。——414。
- 吉拉尼,弗里德里希·威廉(Ghillany, Friedrich Wilhelm 1807—1876)——德国神学家、史学家和作家。——250。
- 吉纳尔,约瑟夫·奥古斯坦(Guinard, Joseph-Augustin 1799—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由于参加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被判终生监禁,1854年获赦。——223。
-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作为将军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6年为纽约新闻工作者。——33、39、94、99—107、278、424、425。
-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1522—1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的原型。——488、519—522、565。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东(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曾任财政部长(1848年3—6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64—1870);

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339、365、631。

加格恩男爵,亨利希·威廉·奥古斯特(Gagem, Heinrich Wilhelm August Freiherr von 1799—1880)——德国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内阁首相(1848年12月—1849年3月),1849年5月后为哥达派的领袖之一。——597、613。

加莱尔,阿尔伯·弗雷德里克·让(Galeer, Albert-Frédéric-Jean 1816—1851)——瑞士教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7年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日内瓦民主派领袖;瑞士“革命集中”的成员,格吕特利同盟的创建人。——408、716。

加特雷尔——见恩格尔哈德,玛格达琳娜·菲力浦娜。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gkel, 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80、94、97、402—405。

居比耶尔,阿梅代·路易·德庞·德(Cubières, Amédée-Louis Despans de 1786—1853)——法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39—1840年任陆军大臣,1847年因营私舞弊被降职。——209。

居丹(Gudin)——法国元帅,国王路易-菲力浦一世的副官;1847年5月因营私舞弊被免职。——364。

居鲁士(Kyros [Cyrus] 死于公元前529年)——波斯国王(公元前559—529)。——494。

##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阐述的理论。——150、335。

卡尔-莱奥波德-弗里德里希——见莱奥波德(大公)。

卡尔利埃,皮埃尔·沙尔·约瑟夫(Carlier, Pierre-Charles-Joseph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216、355。

-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法国陆军部长(1848年5—6月), 曾参与镇压巴黎六月起义, 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 立法会议员(1849—1851);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154、155、159、163—170、175、180—182、188、195、433、445、659、694。
- 卡-赫-格-加-加赫-波赫(卡-吉-加-吉-瓦-瓦-贝-塔)(Kah-Ge-Ga-Gah-Bowth[Ka-gi-ga-gi-wa-wa-be-ta])约生于1818年)——北美印第安人奥季布瓦部落的首领(1850年左右), 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参加者——597。
- 卡莱尔, 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宣扬英雄崇拜, 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 托利党人; 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311—313、316—322。
- 卡利埃尔, 莫里茨(Carriere, Moritz 1817—1895)——德国哲学家、著作家和美学家。——250。
- 卡诺,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Carnot, Lazare-Nicolas-Marguerite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 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 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 1795年是五人内阁成员, 曾一度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陆军和内务大臣。——648、653、654、674。
- 卡诺, 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左派反对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848年2—7月),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秩序党的反对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为共和党反对派领袖, 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221、223、382、399、400。
- 卡普菲格, 让·巴蒂斯特·奥诺雷·雷蒙(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Raymond 1801—1872)——法国政论家、史学家和作家; 保皇派。——232、461、605。
- 卡齐米尔(Kasimir[Casimir] 1481—1527)——勃兰登堡—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封疆伯爵(1519—1527), 霍亨索伦王室法兰克尼亚系的代表人物; 镇压安斯巴赫和罗滕堡农民起义和市民起义的策划者。——542、544、546。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年),监察官(公元前184年);《论农业》的作者。——164。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202。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205。
- 康拉德三世(廷根的)(Konrad III. von Thüngen 约1466—1540)——维尔茨堡主教(1519—1540);1525年被起义军驱逐出境,在士瓦本同盟的帮助下才得以收复自己的领地。——533、546。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13、245。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312。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主义者,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126、207、243、275、308、597。
- 科尔文-维尔斯比茨基,奥托·冯(Corvin-Wiersbitzki, Otto von 1812—1886)——普鲁士军官和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共和派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拉施塔特的总参谋长;流亡美国,70年代回到德国。——91。
-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44、62、63、69、79、662。
-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

- 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于1848年8月流亡英国。——143、160、161、187、324、327—331、336—341。
- 克尔纳,海尔曼·约瑟夫·阿洛伊斯(Körner, Hermann Joseph Alois 1805—1882)——德国教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424。
- 克莱门斯七世(Clemens VII. 1475—1534)——罗马教皇(1523—1534)。——490。
- 克莱门特,阿尔伯特(Clement, Albert)——普鲁士军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任革命军营长。——81、84。
- 克莱纳, W. (Kleiner, W.)——1850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408、705、716。
- 克莱因,卡尔·威廉(Klein, Carl Wilhelm 约生于1825年)——德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埃尔伯费尔德和索林根起义的参加者,1849—1850年流亡伦敦;1850年七月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告同盟书从伦敦带到科隆;1851年流亡比利时,1852年迁居美国;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60—70年代是国际索林根支部领导成员,工人合作社的领导人。——705。
- 克莱因,雅科布(Klein, Jacob)——德国工人,1849年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716。
- 克雷米约,伊萨克·阿道夫(Crémieux [Cremieux], Isaac-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自由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37、180、365、631。
- 克雷普(Krepp)——英国人;1849年曾为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捐款。——704。
- 克雷通,尼古拉·约瑟夫(Creton, Nicolas-Joseph 1798—186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209。
- 克里斯托夫第一(Christoph I. 1453—1527)——巴登和霍赫贝格封疆伯爵(1473—1527)。——511。

- 克鲁格, 威廉·特劳戈特(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国哲学家; 康德的追随者; 1805年起为柯尼斯堡的哲学教授; 自由派政论家。——250。
- 克伦威尔, 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 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266、312。
- 克洛普施托克, 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诗人, 德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254。
- 克洛泽, 格(Klose, G.)——德国军官, 1850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568、741。
- 克尼格男爵, 阿道夫·弗兰茨·弗里德里希(Knigge, Adolph Franz Friedrich Freiherr von 1752—1796)——德国作家。——253。
- 克尼里姆(克尼里姆, 克尼里, 克尼里)(Knierim[Knieriem, Kniery, Knüry])——1849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营长。——87。
- 克诺普夫(洛伊巴斯河的)——见施米特, 约尔格。
- 孔策, 奥古斯特(Kunze, August)——德国政论家; 1848年是《文学杂谈》的撰稿人。——250。
- 库尔茨(Kurz)——瑞士军官。——106。
- 库诺夫斯基(Kunowski)——普鲁士军官, 后为少校, 1850年起在普鲁士陆军部供职。——435、439。
- 库珀(库柏), 詹姆斯·费尼莫尔(Cooper, James Fenimore 1789—1851)——美国现实主义作家。——325、326、329。

## L

- 拉波尔特施泰恩, 乌尔里希·冯(Rappoltstein, Ullrich von)——1525年是阿尔萨斯赖兴魏尔总督。——558。
- 拉德茨基伯爵, 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 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 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241、656、657。
- 拉多维茨, 约瑟夫·玛丽·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威廉·冯(Radowitz, Joseph Maria Ernst Christian Wilhelm von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匈

- 牙利人,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  
议员,属于极右派。——241。
- 拉菲特,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  
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政府首脑(1830—1831)。——132。
- 拉斐德侯爵,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贝尔·莫蒂埃(Lafayette, Marie-  
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任国民自卫  
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  
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该军团变成  
反革命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  
革命的领袖之一。——652。
- 拉基耶,费利克斯(Raquillet, Felix 1778—1863)——波兰革命家,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军总参谋长,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的参加者,曾任普法尔茨武装部队代理总司令。——57。
- 拉科(Rakow)——德国军官,曾参加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解放战争  
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巴登革命军凯撒斯劳滕营营长。——70。
- 拉克罗斯男爵,贝尔特朗·泰奥巴尔德·约瑟夫(Lacrosse, Bertrand-Théobald-  
Joseph, baron de 1796—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波拿巴主义  
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公共工程部长(1848—1849和1851年10—12  
月)。——194。
- 拉罗什雅克兰侯爵,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La Rochejaquelein [Larochejaque-  
lin], Henri-Auguste-Georges, marquis de 1805—1867)——法国政治家,贵族院  
议员,正统派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1851),1852年起为第二帝国参议员。——139。
- 拉马蒂尼埃尔,德(Lamartinière, de 约生于1808年)——法国政论家,巴黎《权力  
报》的发行人。——607。
-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史学家和政  
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  
(1848),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137、142、150、154、314、365、366、370、  
433、601、618、631。
- 拉摩勒特,安东·阿德里安(Lamourette, Antoine-Adrien 1742—1794)——法国主  
教,1792年是立法议会议员,1794年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死。——607。



拉莫里诺, 杰罗拉莫 (Ramorino, Gerolamo 1792 — 1849) ——意大利将军, 1834 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流亡革命者向萨瓦的进攻; 意大利 1848 — 1849 年革命时期指挥皮埃蒙特军队, 由于他的叛变, 使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657。

拉斯拜尔, 弗朗索瓦·万桑 (Raspail, François-Vincent 1794 — 1878) ——法国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 社会主义者, 《人民之友》的出版者, 靠近革命无产阶级;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 (1848); 因参加 1848 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 5 年徒刑, 后流亡比利时; 1870 — 1871 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夜属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反对派, 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138、150、163、169、177、366。

拉托, 让·皮埃尔·拉莫特 (Rateau, Jean-Pierre Lamotte 1800 — 1887) ——法国律师,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 — 1851)。——175、179。

拉沃, 弗兰茨 (Raveaux, Franz 1810 — 1851) ——德国烟草商, 政治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48 — 1849), 属于中间派左翼; 驻瑞士的帝国专员,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巴登临时政府成员,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6、120、419。

拉伊特子爵, 让·厄内斯特·杜科 (La Hitte [Lahitte], Jean-Ernest Ducos, vicomte de 1789 — 1878) ——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 (1850 — 1851)、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 (1849 — 1851)。——222。

莱奥, 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 — 1878) ——德国史学家和政论家, 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620。

莱奥波德 (大公) (Leupold [Grand Duke] 1790 — 1852) ——巴登大公 (1830 — 1852)。——34、41、45、80。

莱奥尼, 约瑟夫 (Leoni, Joseph) ——1850 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16、717。

赖德律 (赖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 [Ledru Rollin, Ledrù 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 — 1874)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改革报》编辑; 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848),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 — 1849),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 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 1869 年回到法国。——137、146、150、158、160、169、170、177、180 — 182、187 — 193、196、209、223、230、339、

- 365、373、603、616、630、631、634。
- 赖沙特,约瑟夫·马丁(Reichardt, Joseph Martin 1803—1872)——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1849年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成员,1849年五月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后流亡美国。——57。
- 朗格,马泰乌斯(Lang, Matthäus 1468—1540)——德国贵族,神学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宠臣;1519年起为萨尔茨堡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拥护迫害宗教改革,镇压1525年的农民和市民起义。——558、561。
- 朗帕尔特,格雷戈尔(Lamparter, Gregor 1463—1523)——符腾堡公爵乌尔利希的顾问。——513。
- 劳伦蒂乌斯——见梅萨罗什,劳伦蒂乌斯。
- 劳默,弗里德里希·冯(Raumer, Friedrich von 1781—1873)——德国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布雷斯劳大学史学教授,1848年任驻巴黎公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50。
-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Leclerc, Alexandre)——法国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230、412、603。
- 勒米尼耶,让·路易·欧仁(Lerminier, Jean-Louis-Eugène 1803—1857)——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末为保守主义者,“法兰西学院”比较法教授(1831—1839),由于学生抗议而离职。——178。
- 勒穆瓦讷,约翰·玛格丽特·埃米尔(Lemoigne, John-Marguerite-Émile 1815—1892)——法国政论家,《辩论日报》驻英国记者,后为主编。——233、605。
- 勒萨日,阿兰·勒奈(Lesage, Alain-René 1668—1747)——法国作家,著名小说《桑蒂利亚纳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的作者。——331。
- 勒文施坦,弗里德里希(Löwenstein, Friedrich)——法兰克尼亚的一个小诸侯家族的成员之一。——531。
- 勒文施坦,路德维希(Löwenstein, Ludwig)——法兰克尼亚的一个小诸侯家族的成员之一。——531。
- 雷布曼,约翰奈斯(汉斯)(Rebmann, Johannes [Hans])——德国传教士;1525年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格里森农民起义失败后被贵族收买,后为苏黎世地区的神父。——500。
- 雷文特洛伯爵,弗里德里希(Reventlow [Reventlou], Friedrich Graf von 1797—1874)——德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临时

- 政府成员,负责外交方面的事务。——615。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sub>活动家</sub>、语文学家<sub>和政论家</sub>;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工人协会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68、741。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352、619。
- 里奥特,卡尔·尼古劳斯(Riotte, Karl Nikolaus 约生于1816年)——德国律师,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普鲁士第二会议员;1849年埃尔伯费尔德五月起义期间为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流亡美国。——22。
-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Richard von Greiffenklau 1467—1531)——特里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1511—1531),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和1525年的农民起义;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特里尔的理查的原型。——522、547。
- 列曼,阿尔伯特(Lehmann, Albert)——德国工人,流亡伦敦;19世纪40年代是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成员;1841年起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46年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9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移居美国。——455、731、736、742。
- 隆格,约翰奈斯(库尔茨韦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Kurzweg,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神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49—1861)。——249、250、620。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19、432、616、620、621、624、625。
- 卢卡斯(Lucas)——德国工人,1847年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50年

- 流亡伦敦。——717。
- 鲁宾逊, W. R. (Robinson, W. R.)——1847年是英格兰银行行长。——578。
- 鲁道夫第二·冯·谢伦贝格(Rudolf II. von Scherenberg 约 1405—1495)——维尔茨堡主教(1466—1495); 1476年镇压汉斯·伯海姆所领导的陶伯河谷农民起义。——505。
-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 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 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 温和派的主要代表; 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481、487—493、496—501、518、519、523。
- 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 1478—1544)——普法尔茨选帝侯(1508—1544); 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 参加士瓦本同盟对法兰克尼亚起义农民的征讨(1525)。——513、522、532、540、542。
- 路特希尔德家族——金融世家, 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135、274、278。
- 路特希尔德男爵, 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134、278。
- 路维杜尔(杜山-路维杜尔),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Louverture [Toussaint L'Ouverture], François-Dominique 1743—1803)——海地黑人革命运动的领袖,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抗西班牙和英国的统治, 1791年参加海地第一次奴隶起义, 1795年被法国国民公会任命为黑人陆军师长和副总督, 1797年任海地部队武装力量总司令, 1800年脱离法国统治而独立, 并自任总统, 1803年被法国军队击败后, 被捕, 并带至法国。——172。
- 路易九世(圣路易)(Louis IX [Saint Louis] 1215—1270)——法国国王(1226—1270)。——201、244。
-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470、520。
- 路易十三(Louis XIII [Lugwig XIII.] 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263。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210、262。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125、247。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利浦-阿尔伯, 奥尔良公爵, 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 —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利浦七世,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235、447、608。

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 - 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 —1850)——法国国王(1830—1848)。——125、126、127、132—134、137、163、164、166、170、199、202、205—209、233、235、236、247、248、261、273、325、336、362、363、371、444、446、447、606、608、634、680。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吕宁,奥托(Lüning, Otto 1818 —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悉河汽船》(1844)、《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5—1848)和《新德意志报》(1848—1850)编辑;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449、450。

伦勃朗(Rembrandt 1606 —1669)——荷兰艺术家。——324。

罗,约翰(洛里斯顿的约翰·罗)(Law, John of Lauriston 1671 —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稽查(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576。

罗伯茨,威·L.(Roberts, U. L.)——伦敦市民。——623。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 —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22、164、247、633、715。

罗尔巴赫,耶克莱恩(Rohrbach, Jäcklein 1498左右—1525)——符腾堡的农奴;内卡河谷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攻克黑尔芬施太因的魏恩斯贝格城堡后主张处死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后被士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官特鲁赫泽斯下令处死。——531—536、540、541。

罗赫纳,格奥尔格·沃尔弗冈·卡尔(Lochner, Georg Wolfgang Karl 1798 —1882)——德国语言学家和史学家。——250。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 —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596。

洛克, 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启蒙思想家, 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263。

洛雷克(Loreck)——1849年是普法尔茨革命军连长。——67、76。

洛歇尔(Lorcher)——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513。

## M

马蒂厄(·德拉德罗姆), 菲利浦·安东(Mathieu[de la Drôme], Philippe-Antoine 1808—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倾向于山岳党;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比利时。——179。

马尔什(小马尔什)(Marche, de jeune)——法国工人, 1848年代表人民要求临时政府实行劳动法。——139。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德国皇帝(1493—1519)。——508、516。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1811—1864)——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120。

马拉, 让·保尔(Marat, Jean-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633。

马拉斯特, 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 Marie-Franç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 人权社的领导人, 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 《国民报》编辑;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 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150、159、163、165、166、180、188、189、248、273、330、335、365、601、631。

马利·德·圣乔治, 皮埃尔·托马斯·亚历山大·阿马布勒(Marie de Saint-Georges, Pierre-Thomas-Alexandre-Amable 人称马利 Mari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1848); 曾组织国家工场, 执行委员会委员, 制宪议会议长(1848), 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148、365、375、376、631。

马志尼, 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

- 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时企图置国际工人协会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600、616、620、634。
- 迈尔霍弗，鲁道夫(Mayerhofer, Rudolph)——德国工厂主，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35、40。
- 迈斯纳，阿尔弗勒德(Meißner, Alfred 1822—1885)——奥地利—波希米亚诗人，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为自由主义者。——250。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636。
- 曼施泰恩，约翰(Manstein, Johann 死于1849年)——普鲁士战时后备军队员；袭击普吕姆军械库的参加者。——30。
- 曼特尔，约翰(Mantel, Johann 约1468—1530)——德国神学家，斯图加特的传教士，在农民战争时期是起义军中的激进派，闵采尔的拥护者。——501。
- 曼托伊费尔(Manteuffel)——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上尉；体育组织的参加者；奥·泰·曼托伊费尔的堂弟。——77。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1850—1858)；1859—1860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4年入选第一议院。——15、43、77。
- 梅茨勒，格奥尔格(Metzler, Georg)——巴登的小店主；1525年奥登林山—内卡河谷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华美军司令，属于温和派，华美军被击溃后逃亡。——530、532、541、543。
- 梅尔西(Mercy[Mersy])——巴登军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任革命军第三师师长，1848—1849年失败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94、95、98、101。
- 梅兰希顿，菲利浦(Melanchthon, 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人道主义者；温和派的代表，马丁·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诸侯的利益。——498。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革命家，史学家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森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

- 导 1848 年波森起义, 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 1849 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 50 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1856 年出版了《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 1863 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首脑;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9、40、45、57、58、70、77、84、85、89、90、94、99、100。
- 梅纳尔, 路易·尼古拉 (Ménard, Louis-Nicolas 1832 — 1901) ——法国作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社会主义者; 1848 — 1849 年是《人民报》的撰稿人; 1849 年流亡伦敦, 1850 年 6 — 7 月是《红色共和党人》的撰稿人。——401。
- 梅萨罗什, 劳伦蒂乌斯 (Meszáros, Laurentius 死于 1514 年) ——塞格德的教士; 1514 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宣扬激进的思想; 后被匈牙利贵族俘虏, 并遭杀害。——514、515、516。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 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 (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 — 1859) ——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09 — 1821) 和首相 (1821 — 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241。
- 门钦根, 斯蒂凡·冯 (Menzingen, Stephan von 死于 1525 年) ——德国贵族; 1525 年 3 月罗滕堡手工业者和市民起义的领导人, 起义失败后被处死。——530、546。
- 蒙克, 乔治·阿尔比马尔公爵 (Monk, George, duke of Albemarle 1608 — 1669) ——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初为王党成员, 后来是奥·克伦威尔军队将军; 1660 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178。
- 蒙尼埃 (Monnier) ——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 1848 年二月革命后任警察局秘书长。——327。
- 蒙塔朗贝尔伯爵, 沙尔·福布斯 (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 — 1870) ——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 奥尔良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 — 1851), 天主教党的首脑;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拿破仑第三, 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210、231、604。
- 蒙特, 泰奥多尔 (Mundt, Theodor 1808 — 1861) ——德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史学家; “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 1835 年起与该团体疏远; 布雷斯劳大学 (1848) 和柏林大学 (1850) 的文学和史学教授。——250。
- 弥勒, 汉斯 (布尔根巴赫的) (Müller, Hans aus Bulgenbach 死于 1525 年) ——德国



- 士兵;1524—1525年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任黑林山的农民起义军上校;激进思想的散播者;后背叛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处死。——523、524、526、547、548。
- 弥勒,雅科布(Müller, Jakob 生于1823年)——德国法学家,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基希海姆博兰登民政委员,起义被镇压后流亡美国。——63。
- 闵采尔,托马斯(Müntzer[Münzer], Thomas 1490左右—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8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478、483、486、487、490、492—501、507、519、523、525、541、551—555、559。
- 摩莱伯爵,路易·马蒂厄(Molé, Louis-Mathieu comte 178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1836—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领导人。——199、200。
- 莫尔,约瑟夫(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穆尔格河战役中牺牲。——63、64、92、93、94、97、386。
- 莫里哀(Molière 笔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戏剧家。——233、606。
- 莫罗,让·维克多·玛丽(Moreau, Jean-Victor-Marie 1763—1813)——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106。
- 莫伊勒,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尔曼(Mäurer, Friedrich Wilhelm Germa[i]n 1811—1885)——德国政论家和作家,语文教员;巴黎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的创建人之一;1843年起加入法国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遭迫害时期被捕(1851),后移居法国。——250。
-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多斯(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318、619。
- 默尔德斯,弗洛里安(Mördes, Florian 死于1850年)——德国官员;1849年任巴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35。
- 姆尼夫斯基,泰奥菲尔(Mniewski Theophil 1809—1849)——波兰革命家,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任革命军团长；1849年在拉施塔特被普鲁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85。

穆罕默德，阿布尔·卡西姆·伊本-阿卜杜拉(Mohammed [Mohamed] Abul Kasim ibn Abdallah 570左右—632)——阿拉伯宗教界领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252。

##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11、60、62、124、125、134、168—172、187、203、210、212、215、216、237—239、247、297、404、610、612、648—659、661、663—666、670、671、674、676、677、680、683、690。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127、163、170—179、181—183、186—193、201—204、209—212、216、217、221—223、233—240、271—273、294、296—298、383、397、446、447、460、462、597、606—613、616、688、692—694。

纳茨默，海尔曼·冯(Natzmer, Hermann von 1806—1858)——普鲁士军官；1848年6月任柏林军械库的守备部队指挥官，拒绝向人民射击；被判处十年监禁，后被赦免；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英国，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58。

纳特，戴维·(Nutt, David 死于1863年)——英国书商和出版商。——249。

奈伯爵，拿破仑·昂利·埃德加(Ney, Napoléon-Henri-Edgar, comte de 1812—188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总统的侍卫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202。

奈林格尔(Nerling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8年奥芬堡民主运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任革命军参谋部参谋。——102。

瑙特，斯蒂凡·阿道夫(Naut, Stephan Adolph)——德国商人，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经理，1849年4月起为发行负责人；1850年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莱茵地区和南德的发行负责人。——116。

内克，雅克(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家、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原籍奥地利，1770—1789年多次被任命为财政总稽查，在法国革命前夕曾试

- 图进行某些改革。——275,313。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123、273,597,616,655,667。
-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年起)。——655。
- 诺阿克,路德维希(Noack, Ludwig 1819—1885)——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吉森大学教师。——250。
-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Neumayer, Maximilian-Georg-Joseph 1789—1866)——法国将军,秩序党的拥护者,巴黎卫戍司令(1848—1850)。——239,612。
- 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 原名米歇尔·德诺斯特勒达姆 Michel de Nostredame 1503—1566)——法国医生和星象学家,以其模糊而难解的预言而闻名。——254。
-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 Peter 1821左右—1866)——德国裁缝,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武装起义的参加者;科隆共产党人条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428。
- 诺伊豪斯(Neuhaus)——德国医生,1849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某分队指挥官。——98。

## O

欧根——见弗兰茨·欧根,萨瓦亲王。

## P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597,600。
- 帕芒蒂耶(Parmentier)——法国厂主和金融家,1847年因贿赂官吏受审。——209。
- 帕涅尔,洛朗·安东(Pagnerre, Laurent-Antoine 1805—1854)——法国出版商和

- 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制宪议会议员。——180。
- 帕斯凯维奇公爵，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нязь 1782 — 1856)——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655、667。
- 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 Hippolyte-Philibert 1793 — 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曾数度入阁，第二共和国时期是财政部长(1848—1849)。——202、208、209。
- 帕希，让·尼古拉(Pache, Jean-Nicolas 1746 — 1823)——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曾任陆军部长(1792年10月—1793年1月)，巴黎市长(1793年2月—1794年5月)。——654、674。
- 佩茨勒，约翰(Petzler, Johann)——德国音乐教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侨居伦敦；1854年工人议会议员。——725。
- 皮奥·农诺——见庇护九世。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 — 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26、581、598、599。
- 皮尔，维克多·阿波利内尔·斐迪南(Pilhes, Victor Apollinaire Ferdinand 1817 — 1879)——法国新闻工作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布朗基的共和派中央社的成员；《改革报》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71年支持巴黎公社。——326。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 — 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372。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 — 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228、419、420、449、595、634、639。

643。

普法伊弗,亨利希(Pfeiffer[Pfeifer], Heinrich 原名亨利希·施韦特费格 Heinrich Schwetfeger 死于 1525 年)——德国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米尔豪森市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被处死。——551、555。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Carl 1818—1876)——德国微型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 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 和 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09、414、455、568、622、623、700、701、702、703、706、707、713、722、724、728、731、737、739、740。

普拉迪埃,皮埃尔(Pradié, Pierre 1816—1892)——法国律师,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著有维护共和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小册子。——274。

普拉兰——见舒瓦泽尔-普拉兰公爵,沙尔·洛尔·于盖·泰奥巴尔德。

普拉斯勒,卡斯帕尔(Praßler, Kaspar)——德国矿工,1525 年 6 月萨尔茨堡起义农民和矿工的领袖。——558。

普雷吉策尔,卡斯帕尔(Pregizer, Kaspar)——德国铁匠,1514 年是“穷康拉德”的领导人之一。——512。

## Q

戚美尔曼,威廉(Zimmermann, Wilhelm 1807—1878)——德国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1—1843 年出版的《伟大农民战争通史》的作者。——487—501、502、505。

齐茨,弗兰茨·亨利希(Zitz, Franz Heinrich 1803—1877)——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预备议会议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5、58、60、64、92。

齐格尔米勒,艾特尔汉斯(艾特尔·汉斯) (Ziegel Müller, Eitelhans [Eitel Hans])——1525 年是北博登湖农军的领袖。——527。

齐赫林斯基(Zychlinski)——1849 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和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的参加者。——80、83、97。

奇尔讷, 赛米尔·埃尔德曼 (Tzschirner, Samuel Erdmann 1812 —1870)——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萨克森议会中极左派领袖, 1849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萨克森临时政府成员,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革命集中”的创建人和主席, 后迁居英国, 1853—1863年移居美国。——64、65。

乔治一世 (George I 1660 —1727)——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 (1714 —1727)。——262。

乔治二世 (George II 1683 —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 (1727 —1760)。——262。

钦斯基 (Zschinski)——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桑恩, 克里斯蒂安 (Zinn, Christian)——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普法尔茨革命军上尉。——69、98。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 —1869)——英国律师、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领袖, 《北极星报》编辑,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出版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同他断交。——430、601。

屈贝克, 卡尔·弗里德里希, 屈包男爵 (Kübeck [Kubeck], Karl Friedrich, Freiherr von Küban 1780 —1855)——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金融资本家, 曾任财政大臣, 议会议长 (1840—1848), 驻奥普同盟委员会代表, 后为帝国议会议长。——241。

## R

让·保尔 (Jean Paul 原名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 —1825)——德国讽刺作家。——312、313。

日拉丹, 埃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 —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 后为《自由报》编辑 (1866—1870); 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 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 (1850—1851);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232、342—354、419、420、604。

茹安维尔亲王, 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 奥尔良公爵 (Joinville, François 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

1900)——法国海军上将,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路易-菲力浦的儿子。——294、447。

## S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英国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托利党人,博爱主义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对者。——300、307。

萨菲尔,莫里茨·哥特利布(Saphir, Moritz Gottlieb 1795—1858)——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幽默诗人。——250。

萨克斯,汉斯(Sachs, Hans 1494—1576)——德国鞋匠,诗人,纽伦堡音乐学校的创办人和领导者。——255。

萨莱雷希(萨莱雷什),安布罗什(Szálerei[Szaleres], Ambros)——佩斯的公民;曾参加匈牙利1514年农民起义,曾任起义农军首领,后出卖起义者,投向贵族。——515。

塞巴斯蒂亚尼伯爵,奥拉斯·弗朗索瓦·巴斯蒂安(Sébastien, Horace-François-Bastien, comte de 1772—1851)——法国元帅,外交家;1801—1802年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外交使节;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06—1807)、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155。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33、255、598。

赛居尔·达居索伯爵,雷蒙·约瑟夫·保尔(Séguir d'Aguesseau, Raymond-Joseph-Paul, comte de 1803—1889)——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中的秩序党代表。——222。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莱茵报》的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93、455、622、630、731—736、742、748。

沙佩勒尔, 克里斯托夫 (Schappeler, Christoph 1472—1551)——德国神学家,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 乌·茨温利的追随者; 1523—1525年在梅明根传教, 《十二条款》总纲的作者; 农民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士瓦本联盟的迫害而逃往圣加伦。——500、549。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69。

尚博尔伯爵, 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 波尔多公爵 (亨利五世) (Chambord, Henri-Charles Ferdinand-Marie Dieudonne d'Artois, duc de Bordeaux, comte de, [Henri V] 1820—1883)——法国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之孙, 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 法国王位追求者, 称亨利五世。——201、235、236、245、294、447、608。

尚加尔涅, 尼克拉·安娜·泰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保皇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1848—1849), 曾参加镇压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 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 曾参加驱散巴黎 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 1859年回到法国, 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72、178、179、189、196、200、234、238、239、297、298、607、611、612。

绍普 (Schopp)——德国商人, 1849年流亡伦敦。——705。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671—1713)——英国著作家和道德论哲学家, 自然神论的著名代表人物, 辉格党人。——263。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 40年代是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的贵族慈善家运动的领导人,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 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 帕麦斯顿的女婿。——283、300、302、307。

圣奥迪莉亚 (圣奥蒂莉娅) (Odilia, die heilige [St. Otilia] 死于 720 年左右)——阿尔萨斯贵族, 多所修道院的创建人; 到中世纪, 被奉为阿尔萨斯的守护神。——509。

圣路易——见路易九世 (圣路易)。



圣茹斯特, 安东·路易·莱昂·德(Saint-Just [Saint Just], Antoine-Louis Léon de 1767—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653。

施蒂纳, 麦克斯(Stirner, Max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 青年黑格尔派,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351、418—421、643。

施拉姆, 康拉德(Schramm, Conrad 1822—1858)——德国新闻工作者,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8年11月起为《基尔民主周报》的出版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起流亡伦敦, 后侨居泽稷岛,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2—1857年侨居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16、455、568、709、731、737。

施拉姆, 鲁道夫(Schramm, Rudolph 1813—1882)——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反对马克思; 60年代拥护俾斯麦; 康·施拉姆的哥哥。——407、408、716。

施林凯, 路德维希(Schlinke, Ludwig)——普鲁士军官, 商店职员, 1848年布雷斯劳革命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总军需官。——105。

施米德, 乌尔里希(Schmid, Ulrich)——德国锻工; 巴尔特林根农军的领袖, 1525年是起义军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526。

施米特, 尼古劳斯(Schmitt, Nikolaus 约1806—1860)——德国新闻工作者和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城乡信使》的出版者(1832—1849);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 1849年任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的内务部长,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移居美国; 1852年是《坦率报》的出版者。——64。

施米特, 约尔格(洛伊巴斯河的克诺普夫)(Schmidt, Jörg [Knopf von Leubas] 约1480—1525)——德国染工, 阿尔高农民的领袖, 主张团结一致反对贵族; 农民战争失败后被处死。——550。

施奈德, 弗兰茨(Sznayde, Franz 1790—1850)——波兰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将军。——57、58、62、68、69、73、84、85、87。

施奈德, 格奥尔格(Schneider, Georg)——原法国雇佣兵上尉, 1513年参加上莱茵“鞋会”密谋和上莱茵农民起义的准备工作, 起义因泄密未成。——509。

- 施佩特, 迪特里希·冯 (Spät, Dietrich von 死于 1536 年)——德国贵族, 乌拉赫总督, 1525 年任士瓦本联盟常备军分队指挥官。——536、539、543。
- 施特恩堡——见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 彼得·亚历山大。
- 施特拉瑟, 弗里德里希 (Straßer, Friedrich)——奥地利艺术家, 奥地利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中校。——74。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 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313。
- 施特罗塔, 卡尔·阿道夫·冯 (Strotha, Karl Adolf von 1786—1870)——普鲁士将军, 曾任陆军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2 月), 1849 年是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278。
- 施托尔贝格伯爵, 博多 (Stolberg, Bodo Graf von 1467—1538)——阿尔布雷希特红衣主教的顾问, 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修道院总管。——492。
- 施托尔希, 尼克拉斯 (Storch, Niklas 约 1500—1536)——德国织工, 16 世纪再洗礼派的地方教派的领袖, 曾受闵采尔的影响成为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人民起义的鼓动者。——492。
- 施托费尔 (Stoffel)——弗赖堡人, 1513 年上莱茵和黑林山“鞋会”的农民密谋的组织者之一, 密谋失败后即隐匿。——509。
- 叔尔茨, 卡尔 (Schurz, Carl 1829—1906)——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加入秘密组织“革命集中”; 1852 年迁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 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 后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 (1877—1881)。——425。
- 舒伯特, 格奥尔格·斐迪南·尤利乌斯 (Schuberth, Georg Ferdinand Julius 1804—1875)——德国出版商, 1850 年在汉堡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115。
- 舒伯特公司 (Schuberth & Co.)——德国的一家出版发行公司, 总部在汉堡, 1832 年和 1850 年分别在莱比锡和纽约设有分公司。——116。
- 舒瓦泽尔-普拉兰公爵, 沙尔·洛尔·于盖·泰奥巴尔德 (Choiseul-Praslin, Charles-Laure-Hugues-Théobald, duc de 1805—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 贵族院议员 (1845 年起); 因谋杀其妻受到控告, 后自杀。——364。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冯(Struve, 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2年返回德国。——5、35、37、40、60、87—90、103—105、408、414、425、426、716、717、722、723。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620、636、639。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264。

苏,欧仁(Sue, Eugène 原名玛丽·约瑟夫 Marie-Joseph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217、230、232、412、460、602—604。

苏尔茨,鲁道夫·冯(Sulz, Rudolf von)——1525年是哈布斯堡王朝驻上奥地利的总督,克莱特高邦伯。——523、548。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1782左右—1867)——海地共和国总统(1847—1849),1849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171、216、220、297。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俄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七年战争(1756—1763)和俄土战争(1768—1774和1787—1791)的参加者;曾率兵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1799);保罗一世执政时被黜;著有《团谕》和《制胜的科学》等军事理论著作。——657。

索布里埃,玛丽·约瑟夫(Sobrier, Marie-Joseph 约1825—1854)——法国新闻工作者,民主共和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1848年3—5月是巴黎市政府机关报《巴黎公社》的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五月十五日示威游行的领导人之一,被判处7年监禁。——327。

## T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ph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攻占军械库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成为在瑞士的流亡组织“革命集

- 中”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58、87。
- 泰勒，瓦特(Tyler, Wat 死于1381年)——英国神父，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485。
- 泰列基，伊什特万(Teleki, István 死于1514年)——匈牙利枢密官，王室司库，后为匈牙利财政大臣，1514年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杀死。——515。
- 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 Ulysse 1795—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医生，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公共工程部部长(1848年5—6月)。——152、379。
- 特雷斯塔永(Trestailons〔Trestailon〕原名雅克·杜邦 Jacques Dupont)——法国工人，保皇派集团的首领，1815年白色恐怖时期曾洗劫并焚毁了许多村庄。——247。
- 特里尔的大主教——见理查(格赖芬克劳的)。
- 特鲁赫泽斯(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第二(Truchseß von Waldburg, Georg II. 1488—1531)——士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官，镇压1519年符腾堡乌尔里希起义和1525年农民起义的主要策划者。——525、527、531、536—550、554、555。
- 特罗钦斯基，费利克斯(Trocinski, Feliks)——波兰革命家，民主主义者，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曾任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波兰部队指挥官。——74。
- 特普弗，J.(Töpffer, J.)——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 特普弗，W.(Töpffer, W.)——1849年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705。
- 梯凡，让·罗朗(Tiphaine, Jean-Laurent 约生于1805年)——法国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1848年革命初期是巴黎警察局的秘书，《改革报》的拥护者。——327。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99、203、205、217、231、233、248、265、446、604、606。
- 图恩费尔德，孔茨·冯(Thunfeld, Kunz von)——德国骑士，1476年维尔茨堡主教的蕃臣，曾参加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斯·伯海姆策动的农民密谋活动。——504、505。
- 图恩费尔德，米夏埃尔·冯(Thunfeld, Michael von)——德国骑士，1476年是维尔

茨堡主教的蕃臣,曾参加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斯·伯海姆策动的农民密谋活动,孔·图恩费尔德的儿子。——504、505。

图尔恩-塔克西斯,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冯(Thurn und Taxis, Maximilian Karl von 1802—1871)——德意志一小邦的领主王公(邦君),1867年以前享有在德意志一些邦中组织邮政的世袭特权;是《法兰克福总邮报》的世袭所有人。——242。

图姆布(诺伊堡的),康拉德(Thumb, von Neuburg, Konrad 1465—1525)——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513。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581、636。

托梅(Thome)——巴登军官,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师长,起义末期采取投降立场。——94。

## W

瓦尔道,麦克斯(Waldau, Max 原名里沙德·格奥尔格·施皮勒·冯·豪恩希尔德 Richard Georg Spiller von Hauenschild 1822左右—1855)——德国诗人,上西里西亚庄园主。——250。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普鲁士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和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的领袖。——123、268、402。

瓦尔纳瓦(巴尔纳巴什)(Barnabas)——匈牙利教士,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导人。——514。

瓦尼切利-卡索尼(Vanicelli-Casoni)——梵蒂冈的红衣主教,1849年是庇护九世在加埃塔的代表。——200。

瓦萨尔(Vassal)——1848年是巴黎警察局长。——340。

瓦特·泰勒——见泰勒,瓦特。

威克利夫,约翰(Wycliffe, John 约 1324—1384)——英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市民和骑士利益的代表者,曾为建立独立的不受罗马控制的英国教会而斗争,被天主教会定为异教徒。——484、485。

威廉第三,斯特拉斯堡主教——见洪施太因伯爵,威廉。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81—1864)——符腾堡国王(1816—1864)。——120。
-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helm III, von Oranien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262,264。
- 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称威廉一世(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71,79,404,439。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599,655。
- 韦厄,汉斯·雅科布(Wehe, Hans Jacob 死于1525年)——德国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1525年是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一,农军失败后被杀。——500,527,531,537。
- 韦尔登男爵,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 Franz Ludwig Freiherr von 1782—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对革命的意大利的远征;曾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8年12月—1849年4月和1849年8月—1851年6月初),1849年4—5月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656。
- 韦尔纳,约翰·彼得(Werner, Johann Peter)——德国律师;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4。
- 韦尔泽家族——15和16世纪奥格斯堡的商人和银行世家;曾贷款给欧洲许多国家的君主。——525。
-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Weigand von Redwitz 1522—1556)——德国神学家,班贝格主教,镇压班贝格主教辖区起义的策划者。——530,546。
- 韦瑟利(Wessely)——1849年是在伦敦的流亡者。——705。
-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9—79)——罗马皇帝(69—79)。——646。
- 维达尔,弗朗索瓦(Vidal, 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勃朗的追随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221,223,229,382,399,400,411,602。
- 维登布鲁赫,路德维希·冯(Wildenbruch, Ludwig von 1803—1874)——普鲁士外交官,曾任驻贝鲁特总领事,1848年与丹麦作战时期与普鲁士国王秘密使

- 团一起被派往哥本哈根,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1852—1859)。——458。
- 维迪尔,茹尔(Vidil, Jules)——法国军官,社会主义者,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719。
- 维多克,弗朗索瓦·欧仁(Vidocq, François-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事犯,后为巴黎治安警察局长;一般认为《维多克回忆录》(1848)一书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的代名词。——334。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60、708。
- 维吉尔·马洛,普卜利乌斯(Vergilius Maro, Publinus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201。
- 维兰德,克里斯托夫·马丁(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莎士比亚和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420。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28、47、59、60、65、66、67、69、73—81、83—89、91—100、102—106、403、409、414、434、440、451、453、622、623、630、706、713、719、722—724、728、731、736、742。
- 维隆,路易·德西雷(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1848年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评论》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462。
- 维维安,亚历山大·弗朗索瓦·奥古斯特(Vivien, Alexandre-François-Auguste 1799—185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40年任司法大臣,1848年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166。
- 魏斯(Weiß)——德国医生,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茨韦布吕肯民政委员。——74。
-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

- 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572。
- 魏特莫泽尔,埃拉斯穆斯(Weitmoser, Erasmus)——德国手工业者,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萨尔茨堡起义矿工和农民的领袖。——558。
-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656。
- 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彼得·亚历山大(Ungern-Sternberg, Peter Alexander Freiherr von 1806—1868)——德国小说家,颂扬中世纪封建贵族。——250。
-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210。
- 沃尔波尔,罗伯特·奥福德伯爵(Walpole, Sir Robert, Earl of Orford 1676—1745)——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721—1742),在他执政时期完全形成了摆脱国王控制、依靠议会多数的内阁制。——263。
- 沃尔弗,斐迪南(Wolff, Ferdinand 绰号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 1812—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在牛津任语文教师。——160、161、169、175、360、568、708、729、741。
-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89、360、425、708。
-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Oudinot, Nicolas-Charles-Victor 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49年指挥军队侵犯罗马共和国;曾任巴



黎国民自卫军司令, 试图组织力量抵抗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后离开军界。——183、191、192、658。

乌尔里希(Ulrich 1487—1550)——符腾堡公爵(1498 年起); 1519 年被士瓦本联盟驱逐出符腾堡, 1525 年曾企图利用农民起义军进攻斯图加特, 以图恢复公爵地位, 1534 年重新取得符腾堡公爵爵位。——512—514、526、528。

乌滕霍芬, 冯(Uttenhoven, von 死于 1849 年)——普鲁士军官; 1849 年埃尔伯费尔德五月起义时被杀死。——17。

沃尔姆泽尔伯爵, 达哥贝尔特·西格蒙德·冯(Wurmser, Dagobert Siegmund Graf von 1724—1797)——奥地利元帅, 1796 年任意大利奥军指挥官, 几经波拿巴的重创后在曼图亚要塞投降。——648。

## X

西弗特(Siefert)——1849 年曾为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捐款。——704。

西蒙, 亨利希(Simon, Heinrich 1805—1860)——德国布雷斯劳市法院参事, 自由主义者; 40 年代由于持反对派立场而受惩戒, 后被革职;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 后流亡瑞士。——6、120、419。

西蒙, 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1872)——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极左派; 1849 年流亡瑞士; 曾被缺席判处死刑, 1866 年前往巴黎, 后返瑞士蒙特勒。——256—260。

西斯蒙第, 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史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浪漫派的代表人物。——636。

希尔曼, 胡果(Hillmann, Hugo 1823—1898)——德国农民和酒店店主;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流亡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1863 年是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9 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716。

希尔施费尔德, 卡尔·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莫里茨·冯(Hirschfeld, Karl 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Moritz von 1791—1859)——普鲁士将军; 1849 年是军团司令, 镇压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71。

希普勒, 文德尔(Hipler, Wendel 约 1465—1526)——德国贵族, 霍亨洛埃伯爵家族的总管; 1525 年参加法兰克尼亚农民起义; 《海尔布朗纲领》的主要起草人; 农民起义失败后逃脱, 1526 年被捕, 死在狱中。——530—533、541—543。

- 席尔,斐迪南·冯(Schill, Ferdinand von 1776—1809)——普鲁士军官,抗御拿破仑军队的游击队长,1809年策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阵亡。——33。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美学家和史学家。——249、250、257。
- 席梅尔普芬尼希(奥耶的),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 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登的斗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1858年迁居华盛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59、74—77、432。
- 谢努,雅克·埃蒂耶纳·阿道夫(Chenu, Jacques-Etienne Adolphe 生于1816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奸细和密探。——325—332、335—340。
-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斐迪南(Schärttner, August Ferdinand 1817—1859)——德国制桶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725、742。
- 辛格尔,汉斯(辛格尔汉斯)(Singer, Hans[Singerhans])——“穷康拉德”同盟和1514年士瓦本山区、符腾堡农民起义的领袖。——512。
- 匈牙利牧师——见雅科布(匈牙利牧师)。
- 许勒尔,弗里德里希(Schüler, Friedrich 1791—1873)——德国政治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6、120、419。
- 雪恩,乌尔里希(Schön, Ulrich 死于1525年)——1525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一,后被俘并被处死。——527、537。
- 雪恩哈尔斯男爵,卡尔(Schönhals, Karl Freiherr von 1788—1857)——奥地利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241、279。

## Y

- 雅科比,约翰(Jacoby, Johann 1806—1877)——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家,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普鲁士制宪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2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未来

- 报)创办人(1867),反对俾斯麦的政策;1872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123。
- 雅科布(匈牙利牧师)(Jacob[Meister aus Ungarn])——1251年法国牧民起义的领袖;据编年史记载,是匈牙利人。——483。
- 亚当(Adam)——法国制革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1850年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719。
-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os der Große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238,611。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655。
- 扬森,约翰·约瑟夫(Jansen, Johann Joseph 1825—1849)——德国测量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第一书记和副主席,安·哥特沙克的拥护者;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任营长,因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枪杀。——403。
- 尧普,亨利希·卡尔(Jaup, Heinrich Karl 1781—1860)——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黑森—达姆施塔特政府首脑(1848—1850),1850年3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597。
- 伊文思,戴维·莫里埃(Evans, David Morier 1819—1874)——英国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582。
-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 Victor-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为国民议会议员,1876年为参议员。——203,233,606。
- 约翰(Johann[Joh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241。
- 约翰(忠实的)(Johann, der Beständige 1468—1532)——萨克森公爵,同魏森的弗里德里希三世共同摄政;1525年起为萨克森选帝侯;闵采尔的迫害者之一,镇压1525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497。
- 约雅敬(约阿希姆·冯·弗洛里斯)(Gioacchino de Flore[Joachim von Floris] 约1132—1202)——意大利神父,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卡拉布里亚的费罗拉隐

修道院院长；曾把世界历史分作三个时期，并预言在第三时期开始阶段将有一场巨变，接着将达到和平幸福的“安息世纪”；他的学说被天主教判为异端；追随者后被称为“约雅敬派”。——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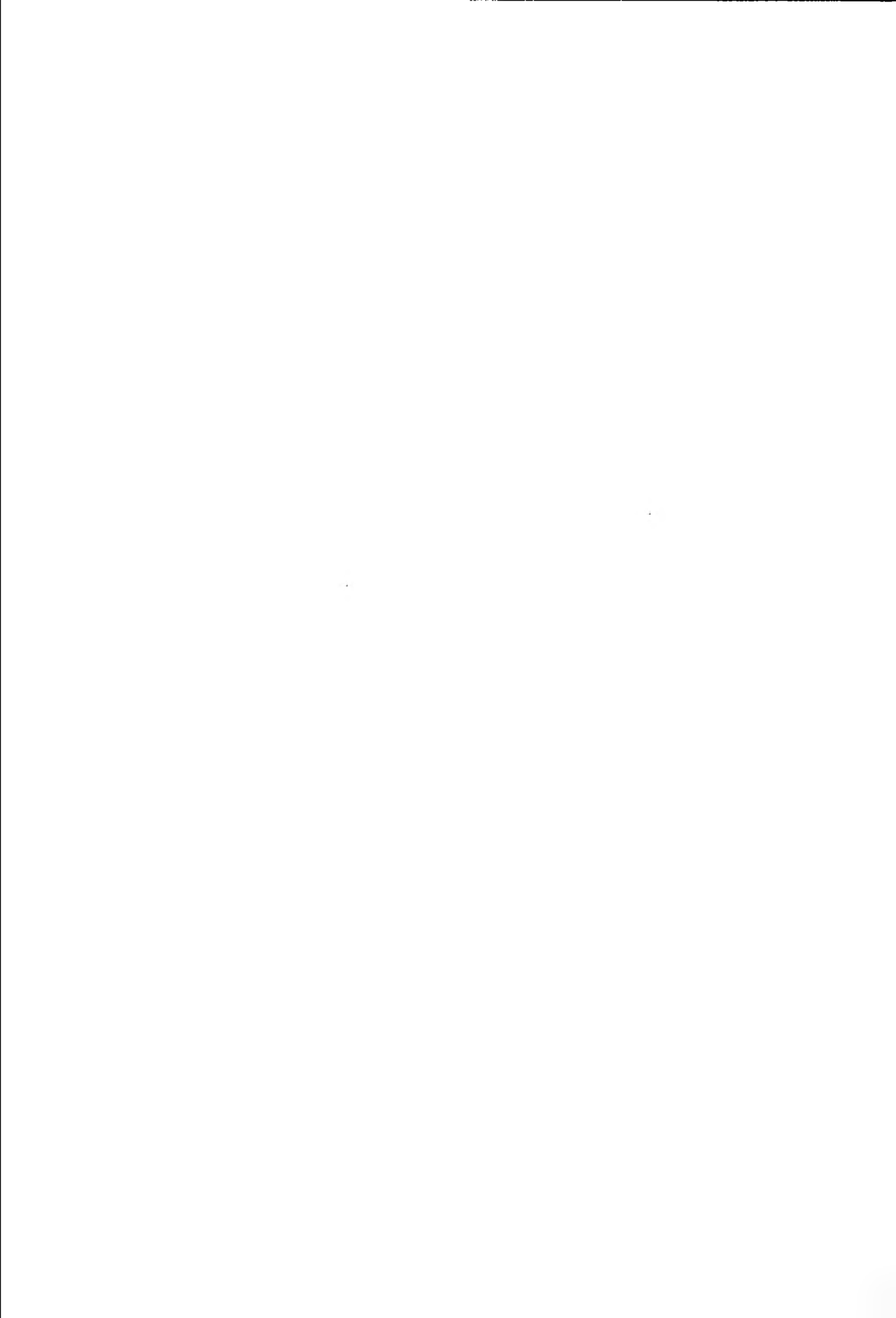
## Z

载勒尔，安东(Seiler, Anton 死于 1849 年)——普鲁士战时后备军队员，袭击普吕姆军械库的参加者。——30。

载勒尔，塞巴斯蒂安(Seiler, Sebastian 约 1815 — 约 1890)——德国政论家；40 年代初是魏特林主义者，1846 年在布鲁塞尔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 — 1849 年在巴黎任法国国民议会的速记员；《新莱茵报》的通讯员；50 年代初流亡伦敦，1856 年移居纽约，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支持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431、568、729。

泽费洛盖，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Sefeloge, Maximilian Joseph 1820 — 1859)——德国退伍军官，1850 年 5 月 22 日试图谋杀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后死于精神病院。——435、439、442。

扎波略，亚诺什(约翰)(Zápolya[Zapolya], Janos[Johann] 1487 — 1540)——特兰西瓦尼亚总督；曾率领贵族军队镇压 1514 年匈牙利农民起义，1526 年被封为匈牙利国王。——515。



##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 A

阿塔·特洛尔——海涅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43、44。

埃卡尔特(忠实的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山旁,警告一切要想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250。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力斯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195。

奥菲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他的歌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参加亚尔古船英雄们寻求金羊毛的远航。——189。

### B

巴托洛缪——圣经中的人物。——164、223。

笨伯雅克——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146。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胆小鬼和吹牛家。——69。

波提乏——据圣经传说,是埃及法老的侍卫长,以愚忠和轻信著称。——201。

柏克司尼弗——查·狄更斯的小说《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312。

###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世纪)的宠臣。

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215。

大卫——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少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168。

但以理——据圣经传说是先知,《但以理书》的作者。——494。

## F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70。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175。

## G

戈尔迪——古希腊传说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他用乱结把轭系在马车的辕上,牢固不可解,声言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断戈尔迪之结”一语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238、612。

##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吉尔·布拉斯——勒萨日的《山梯良那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主人公。——331。

## L

拉达曼——古希腊神话中的贤明公正的法官。——321。

莱波雷洛——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侍从。——620。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493、497、498。

## M

马凯尔,罗伯尔——法国演员弗·勒美尔特所塑造的和奥·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

- 狡诈奸商的典型。罗·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134、363。
-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502。
-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太阳神阿波罗把迈达斯的耳朵变成一对驴耳。——171。
- 麦尼劳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国王，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海伦的丈夫。——57。
-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251。
-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208、494、496。

## N

-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之一，又称伊理逆司或厄默尼德。——189。

## S

- 撒旦——圣经中为恶魔的称号。——498、500。
-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255。
- 参孙——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士师记》记载，参孙以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腮骨击杀一千非利士人。——195。
-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他吃掉。后谜底被奥狄甫斯道破，遂投崖自杀。今用以隐喻“谜”样的人物。——144、371。
- 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168。
-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253。

## T

-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33、599。



## W

威廉·迈斯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人物。——255。

温克尔里德,阿尔诺德——格圣经传说是瑞士武士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人民英雄;相传瑞士人同奥军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获胜,是史诗《森帕赫之歌》中的主人公。——620。

## X

希西家——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亚哈斯之子及继承者。——494。

## Y

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另一副朝向未来,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后人用雅努斯这一名字比喻口是心非的人。——191。

耶利米——圣经中的先知。——255。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488、492、493、495、499。

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494。

约瑟——圣经中的人物。据《创世纪》记载,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被自己的兄弟出卖给埃及,成了埃及法老的侍卫长波提乏的仆人,以仁慈、贤能和正派著称,后成为法老的宰相。——201。

约西亚——圣经中的人物,亚们的儿子。据载,约西亚登基时年方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494。

## 文 献 索 引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 卡·马克思

《六月革命》，载于 1848 年 6 月 29 日《新莱茵报》（科隆）第 29 号（Die Junirevolutio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9, 29. Juni 1848）。——153—156、379—380。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 1850 年 1—3 月和 5—10 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 1—3 期和 5—6 期（Die Klassenkampf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3, Januar bis März 1850, H. 5—6, Mai bis October 1850）。——289、360—381、344、397、449、594、606—607。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 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449。

#### 弗·恩格斯

《埃尔伯费尔德》，载于 1849 年 5 月 17 日《新莱茵报》（科隆）第 300 号（Elberfeld.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300, 17. Mai 1849）。——20。

- 《德国来信》，载于1850年1月《民主评论》（伦敦）（Letter from Germany.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In: The Democratic Review. London. Januar 1850）。——241—245。
-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3）。——289、361、450。
- 《法国来信》，载于1850年1月《民主评论》（伦敦）（Letter from France.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In: The Democratic Review. London. Januar 1850）。——124—128。
- 《法国来信》，载于1850年7月《民主评论》（伦敦）（Letter from France. In: The Democratic Review. London. Juli 1850）。——461。
- 〔《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载于1849年6月3日《城乡信使》（凯撒斯劳滕）第110号（〔Die Erhebung in der Pfalz und in Baden.〕In: Der Bote für Stadt und Land. Kaiserslautern. Nr. 110, 3. Juni 1849）。——53—54。
- 《普鲁士银行问题》，载于1846年7月4日《北极星报》（伦敦）第451号（The Prussian bank question. In: The Northern Star. London. Nr. 451, 4. Juli 1846）。——243。
- 《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Die englische Zehnstundenbil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4）。——281。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385、449、569、732—733。
-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在巴黎印成传单]（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 [Paris 1848. Flugblatt]）。——354、394—395。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März 1850〕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7, 28. Juni 1851）。——

- 423、732 — 736。
- 《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年版(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1852)。——626。
-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载于1850年6月15日《旁观者》第1146号(Prussian spies in London. In: The Spectator. London. Nr. 1146, 15. Juni 1850)。——451 — 452。
-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转载自《旁观者》]，载于1850年6月18日《加利尼亚尼信使报》第11030号下午版(Prussian spies in London. [Nachdr. aus "The Spectator".] In: Galignani's Messenger. Paris. Nr. 11030, 18. Juni 1850 Nachmittagsausg)。——451 — 452。
- 《评埃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1850年巴黎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Rezension zu:] Le socialisme et l'impôt, par É. de Girardin. Par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4)。——418 — 419。
- 《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2期([Rezension zu:] Guizot, Pourquoi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réussi? 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Par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2)。——311。
- 《时评。1850年1[—2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2期(Revue. (Januar [/Februar]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2)。——355、591。

### 其他作者的著作

#### A

埃卡留斯, 约·《伦敦的缝纫业, 或大小资本的斗争》,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Eccarius, J. G.: Die Schneiderei in London oder der Kampf des großen und des kleinen Capital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5/6)。——573。

埃克尔曼, 约·彼·《同晚年时期歌德的谈话(1823—1832年)》(三卷集)1836—1848年莱比锡—马格德堡版(Eckermann, J. P.: 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1823—1832. Th. 1—3. Leipzig, Magdeburg 1836—1848)。——255。

埃斯唐塞兰, 路·沙·亚·〔(1849年6月19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6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1号(Estancelin, [L.-Ch.-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9. Jun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1, 20. Juni 1849)。——199。

奥普尔, [阿·]〔(给宪兵队的通令(摘要))〕, 载于1849年12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46号(Hauptoul, [A.]: [Zirkular an die Gendarmerie. Ausz.])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46, 12. Dezember 1849)。——247、215、272。

奥普尔, [阿·]〔(1850年2月16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50年2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48号(Hauptoul,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6. Februar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48, 17. Februar 1850)。——221、297、412。

## B

巴拉盖·狄利埃, [阿·]〔(1849年6月2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6月28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9号(Baraguay d'Hilliers,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7. Jun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9, 28. Juni 1849)。——199。

巴拉盖·狄利埃, [阿·]〔(1849年7月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7月8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89号(Baraguay d'Hilliers,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7. Jul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89, 8. Juli 1849)。——199。

巴罗, 奥·〔(1849年1月12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1月1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3号(Barrot, O.: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2.

- Januar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3, 13. Januar 1849). —175。
- 巴泰勒米, 德·[《维斯巴登宣言。1850年8月30日。摘要》](Barthélemy, de: [Wiesbadener Manifest, 30. August 1850 Ausz.])——见《正统派代言人的阴谋》。
- 贝克尔, 约·菲·/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Becker, J. Ph./Ch. Esselen: Geschichte der süddeutschen Mai - 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9. Genf 1849)。——102。
- 贝里耶, [皮·安·][《1849年10月24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10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98号(Berryer, [P.-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4. Oktober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98, 25. Oktober 1849)。——204。
- 贝林, 汉·《十二条款陈情书》(Deklaration der zwölf Artikel)。——533、541。
- 庇护九世《致亲爱的臣民。[1849年9月12日于那不勒斯]》, 载于1849年9月28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71号(Pius IX.: A ses bien-aimés sujets. [Naples, le 12 sept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71, 28. September 1849)。——202。
- 波拿巴, 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给立法议会的咨文。[1849年11月1日于巴黎]》, 载于1849年11月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5号(Bonaparte, L. N.: 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Paris, le 1 novembre 1849.]) In: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05, 1. November 1849)。——204、216。
- 波拿巴, 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侍卫官埃德加·奈中校(罗马)的信。1849年8月18日于国民宫》, 载于1849年9月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50号(Bonaparte, L. N.: Lettre adressée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lieutenant-colonel Edgard Ney, son officier d'ordonnance, à Rome. Elysée-National, le 18 aoû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50, 7. September 1849)。——202。
- 波拿巴, 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乌迪诺将军的信。1849年5月8日于国民宫》, 载于1849年5月10日《人民报》(巴黎)第172号(Bonaparte, L. N.: Lettr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général Oudinot. Elysée-National, 8. mai 1849. In: 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 Paris Nr. 172,

10. Mai 1849)。——183。
- 波拿巴,路·拿·《[关于内阁的辞职和委任的指令。]1849年10月31日》,载于1849年10月3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4号特刊(Bonaparte, L. N.: [Décret sur la démission et nomination des ministres, ]le 31 octo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Suppl. extraordinaire. Paris. Nr. 304, 31. Oktober 1849)。——205。
- 波拿巴,路·拿·《在第戎的演说》,载于1851年6月4日《国民报》(巴黎)(Bonaparte, L. N.: Le discours de Dijon... In: Le National. Paris. 4. Juni 1851)。——694。
- 勃朗,路·《致〈泰晤士报〉编辑》,载于1851年3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748号(Blanc, L.: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748, 5. März 1851)。——633—634。
- 布阿吉尔贝尔, [皮·]《法国详情》,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Le détail de la France.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 de comm.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210。
- 布阿吉尔贝尔, [皮·]《法兰西辩护书》,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Factum de la France.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 de comm.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210。
- 布阿吉尔贝尔, [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 de comm.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ugène Daire. Paris 1843)。——210—211。
- 布朗基,路·奥·《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的路·奥·布朗基公民为2月24日周年纪念宴会寄来的祝酒词》,载于1851年2月27日《祖国报》(巴黎)第58号(Blanqui, L.-A.: Toste envoyé par le citoyen L. -A. Blanqui à la commission près les réfugiés de Londres, pour le banquet anniversaire du 24 février.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58, 27. Februar 1851)。——630,633。
- 布林德, [卡·]《在巴登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各党派》,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期(Blind, [K.]: Oesterreichische und

- preußische Parteien in Bade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361。
- 布伦坦诺, 洛·(1849年5月13日至6月25日革命期间内阁成员的处境和态度)(Brentano, L.: Die Lage und das Verhalten der Mitglieder der Ministerien während der Revolution vom 13. 5. bis 25. 6. 1849)。——51。
- 《布伦坦诺政府的声明。1849年6月7日于卡尔斯鲁厄》, 载于1849年6月8日《卡尔斯鲁厄日报》第23号([Erklärung der Regierung Brentano.] Karlsruhe, 7. Juni [1849]. In: Karlsruher Zeitung. Organ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Nr. 23, 8. Juni 1849)。——45。

## C

- 《财政公报》, 载于1850年3月8日《祖国报》(巴黎)第67号(Bulletin financier.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67, 8. März 1850)。——397—398。
- 《财政公报》, 载于1850年3月10日《祖国报》(巴黎)第69号(Bulletin financier.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69, 10. März 1850)。——398—399。

## D

- 道默, 格·弗·《古希伯莱人对火和火神摩洛赫的崇拜》1842年不伦瑞克版(Daumer, G. F.: Der Feuer- und Molochdienst der alten Hebräer als urväterlicher, legaler, orthodoxer Cultus der Nation, historisch-kritisch nachgewiesen. Braunschweig 1842)。——251。
- 道默, 格·弗·《基督教古代的圣礼》(两卷集)1847年汉堡版(Daumer, G. F.: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 Bd. 1. 2. Hamburg 1847)。——251。
- 道默, 格·弗·《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三卷集)1850年汉堡版(Daumer G. F.: Die Religion des neuen Weltalters. Versuch einer combinatorisch-aphoristischen Grundlegung. Bd. 1—3. Hamburg 1850)。——249—255。
- 德拉奥德, 律·《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De la Hodde, L.: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324—331、335、



338—340。

- [德斯特尔,卡·]《莱茵普法尔茨市镇施政条例。1849年5月26日于凯撒斯劳滕》,载于1849年5月27日《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官方通报和新闻小报》(凯撒斯劳滕)第6号([D'Ester, K. :]Gemeinde-Ordnung für die Rheinpfalz. Kaiserslautern, den 26. Mai 1849. In: Amts- und Intelligenzblatt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der Rheinpfalz. Kaiserslautern. Nr. 6, 27. Mai 1849)。——51。
- 迪斯累里,[本·][《1848年8月3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8年伦敦版第101卷(Disraeli, [B.]:[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30. August 1848.]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101. London 1848)。——581。
- 《调查金条价格高昂原因的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1810年6月8日下院的决定刊印》1810年伦敦版(Report, together 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ccounts,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 of the high price of gold bullion.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June 1810. London 1810)。——636。
- 杜普拉,帕·[《1850年2月16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50年2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48号(Duprat, P. :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6. Februar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48, 17. Februar 1850)。——297。

## F

- 《法兰西》,载于1850年2月9日《伦敦新闻画报》第412号(France. In: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r. 412, 9. Februar 1850)。——295—296。
- 《法兰西的自由之树》,载于1850年3月2日《笨拙,或伦敦喧声》(The tree of liberty in France. In: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2. März 1850)。——355。
- 《法兰西共和国》,载于1850年10月3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634号(The French Republic.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634, 31. Oktober 1850)。——601。
- 《法兰西银行。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没有贬值》,载于1850年10月5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71期(The Bank of France. Inconvertible notes not depreciated.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371, 5. Oktober 1850)。——495,496。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团的答复》],载于1849年4月4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80号([Friedrich-Wilhelm IV.]:[Antwort an eine Abordn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In: 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 Nr. 80, 4. April 1849)。——615。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关于建议修改和补充1848年12月5日的宪法的御函。附理由》,载于1850年1月10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10号(Friedrich-Wilhelm [IV.]: Allerhöchste Botschaft in Betreff der vorgeschlagenen Abänderungen und Ergänzungen der Verfassung vom 5. Dezember 1848 nebst Motiven. In: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10, 10. Januar 1850)。——243、267。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军队的命令。1849年1月1日》,载于1849年1月3日《新普鲁士报》(柏林)第1号(Friedrich-Wilhelm [IV.]: Armee-Befehl. 1. Januar 1849. In: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Berlin. Nr. 1, 3. Januar 1849)。——7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陛下的作战命令。[1849年7月28日]》,载于1849年8月8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215号(Friedrich-Wilhelm [IV.]: Armeebefehl Sr. Majestät des Königs von Preußen, [28. Juli 1849]. In: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215, 8. August 1849)。——7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50年2月6日告两院书》],载于1850年2月7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37号([Friedrich-Wilhelm IV.]:[Ansprache an die versammelten Kammern, 6. Februar 1850.] In: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37, 7. Februar 1850. Amtl. Th.)。——278、29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御前演说》,载于1847年4月12日《普鲁士总汇报》(柏林)第101号([Friedrich-Wilhelm IV.]: Thronrede. In: 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 Berlin. Nr. 101, 12. April 1847)。——73、292。
- 福适,莱·[《关于结社权的法律草案(摘要)》],载于1849年1月2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07号第2版(Faucher, L.: [Gesetzentwurf über das Assoziationsrecht. Ausz.]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07, 28. Januar 1849. 2. Ausg.)。——177、180。
- 傅立叶,沙·《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两卷集)1822年巴黎版(Fourier, Ch.: 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 T. 1 - 2. Paris 1822)。——337。

- 傅立叶,沙·《〈论三种外在统一〉的片断》,载于1845年《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第1卷(Fourier, Ch.: Section ébauchée 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 In: 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 14 année. t. 1. Paris 1845)。——337。
- 傅立叶,沙·《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Fourier, 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Prospectus et annonce de la découverte. 2. éd Paris 1841. (Œuvres complètes. T. 1. ))。——337。
- 傅立叶,沙·《虚假的、分散的、令人可恶的、欺骗的行业和符合本性的、协调的、诱人的、真实的行业》1835—1836年巴黎版(Fourier, Ch.: La fausse industrie morcelée, répugnante, mensongère, et l' antidote, l' industrie naturelle, combinée, attrayante, véridique, donnent quadruple Produit. Paris 1835—1836)。——337。
- 傅立叶,沙·《宇宙统一论》(四卷集)1841—1843年巴黎第2版(Fourier, Ch.: Théorie de l' unité universelle. Vol. 1—4. 2. éd. Paris 1841—1843. (Œuvres complètes. T. 2—5))。——337。

## G

- 《告法国人民书》,载于1849年6月13日《和平民主日报》(巴黎)第161号(Au peuple français. In: Démocratie pacifique. Paris. Nr. 161, 13. Juni 1849. Morgenausg. )。——195。
- 《革命的策略。致〈泰晤士报〉编辑》,载于1849年11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341号(Revolutionary tactic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341, 23. November 1849)。——110。
- 《公告。1849年6月2日于凯撒斯劳滕》,载于1849年5月27日《莱茵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官方通报和新闻小报》(凯撒斯劳滕)第6号(Bekanntmachung. Kaiserslautern, den 2. Juni 1849. In: Amts- und Intelligenzblatt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der Rheinpfalz. Kaiserslautern. Nr. 6, 27. Mai 1849)。——56。
-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的通告信。1847年6月9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1970年柏林版第1卷(Rundschreiben des ersten Kongresses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an den Bund, 9. Juni 1847. In: Der Bund der Kommuniste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Bd. 1. 1836—1849. Berlin 1970)。——385。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48年9月14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1970年柏林版第1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an den Bund, 14. September 1847. In: Der Bund der Kommuniste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Bd. 1. 1836—1849. Berlin 1970.*）——385。
- 古德肖，米·（〔关于支付半年息金的〕决定。1848年3月4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3月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64号（*Goudchaux, M.: Arrête [sur le payment du semestre des rentes]. Paris, le 4 mars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64, 4. März 1848.*）——144。
- 〔《关于国旗的公告。1848年2月26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2月2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8号（*Déclaration sur le drapeau national. Paris, le 26 février 1848.*）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8, 27. Februar 1848.*）——141。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自1月5日至9月5日为止的8个月》，载于1850年10月1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72期（*Trade and navigation returns. Eight month-January 5 to September 5.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372, 12. Oktober 1850.*）——584。
-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决议。1849年5月8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5月1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30号（*Résolution relative aux affaires d'Italie. Paris, le 8 ma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30, 10. Mai 1849.*）——192。
- 《国民议会的逐渐削弱》，载于1850年7月15日《权力报。十二月十日报》（巴黎）第195号（*Affaiblissement graduel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In: Le Pouvoir. Journal du dix décembre. Paris. Nr. 195, 15. Juli 1850.*）——463、608。
- 〔《国民议会关于尽力保证皮埃蒙特领土完整的宣言。〕1849年3月31日〕，载于1849年4月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91号（〔*Déclara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pour mieux garantir l'intégrité du territoire piémontais, ] le 31 mars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91, 1. April 1849.*）——182。
- 〔《国民院6月20日第46次会议关于废除服役合同的决议》〕，载于1849年6月22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151号（〔*Beschluß über die Militärkapitulationen des] Nationalrath vom 20. Juni. 46. Sitzung. [Ausz.]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151, 22. Juni 1849.*）——272。

## H

海因岑,卡·《革命的教训》,载于1849年11月9日和16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41和242号(Heinzen, K.: Lehren der Revolution.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Blätter für Politik, Literatur und Kunst. Nr. 241, 9. November 1849; Nr. 242, 16. November 1849)。——110。

海因岑,卡·《谋杀》,载于1849年1月26日《进化》(比尔)第4号(Heinzen, K.: Der Mord. In: Die-Evolution. Biel. Nr. 4, 26. Januar 1849)。——44。

《合众国的奴隶》,载于1850年9月21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69期(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369, 21. September 1850)。——588。

## J

《〔加利尼亚尼信使报为转载(旁观者)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伦敦的普鲁士密探)一文〔加的编者按〕》,载于1850年6月18日《加利尼亚尼信使报》(巴黎)第11030号下午版(〔Redaktionelle Bemerkung der Zeitung "Galignani's Messenger" zum Nachdruck aus "The Spectator" von:〕 Charles Marx, Frederic Engels: Prussian spies in London. In: Galignani's Messenger. Paris. Nr. 11030, 18. Juni 1850. Nachmittagsausg.)。——451。

基佐,〔弗·皮·吉〕《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Guizot, [F.-P.-G.]: Pourquoi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a-t-elle réussi? 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Paris 1850)。——261—266, 311。

济格尔,弗·《入侵计划》,载于1850年2月21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44号(〔Sigel, F.:〕 Ein Invasionsprojekt.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44, 21. Februar 1850)。——279, 280。

金克尔,哥·《1849年8月4日在拉施塔特普鲁士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载于1850年4月6和7日《晚邮报》(柏林)第78和79号(Kinkel, G.: Vertheidigungsrede... vor dem preußischen Kriegsgericht zu Rastatt am 4. August 1849. In: 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 Berlin. Nr. 78, 6. April 1850; Nr. 79, 7. April 1850)。——402—405。

《警察》,载于1850年5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497号(Police. In: The

- Times. London. Nr. 20497, 24. Mai 1850)。——411。  
《救济协会》，载于1850年4月14日《晚邮报》(柏林)第86号(Unterstützungs-Verein. In: 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 Berlin. Nr. 86, 14. April 1850)。——407—409。

## K

- 卡尔利埃,皮·《警察局长的声明。1849年11月10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1月1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5号(Carlier, P.: Proclamation du préfet de police. Paris, le 10 nov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15, 11. November 1849)。——216。  
卡莱尔,托·《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和演说集》(两卷集)1845年伦敦版(Carlyle, Th.: 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with elucidations. Vol. 1. 2. London 1845)。——312。  
卡莱尔,托·《当代评论》1850年伦敦版(Carlyle, Th.: Latter-day pamphlets. London 1850)。——311—323。  
卡莱尔,托·《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2月》1850年伦敦版(Carlyle, Th.: Latter-day pamphlets. Nr. 1: The present time. February. London 1850)。——311—323。  
卡莱尔,托·《当代评论。(二)模范监狱。3月》1850年伦敦版(Carlyle, Th.: Latter-day pamphlets. Nr. 2: Model prisons. March. London 1850)。——318—319,322。  
卡莱尔,托·《法国革命史》(三卷集)1837年伦敦版(Carlyle, 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Vol. 1—3. London 1837)。——312。  
卡莱尔,托·《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Carlyle, Th.: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43])。——312。  
卡莱尔,托·《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偶像崇拜和英雄事迹》1841年伦敦版(Carlyle, Th.: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6 lectures. Reported, with emendations and additions. London 1841)。——312。  
卡莱尔,托·《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Carlyle, Th.: Chartism. London 1840)。——312。  
康德,伊·《法学》第2册《公法》第1编《国家法》1838年莱比锡版(Kant, I.: Der Rechtslehre zweiter Theil. Das öffentliche Recht. Abschn. I: Das Staatsrecht.

Leipzig 1838. (Säm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Rosenkranz und Friedr. Wilh. Schubert. Th. 9)). —205。

《克罗茨纳赫兵营》，载于1849年5月31日《科隆日报》第129号(Das Lager bei Kreuznach.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29, 31. Mai 1849)。—55。

克洛普施托克，弗·哥·《到处是神灵》，载于《颂歌集》(Klopstock, F. G.; Dem Allgegenwärtigen. In: Oden)。—254。

克尼格，阿·冯·《论为人处世》1804年汉诺威版(Knigge, A. von; Ü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 Hannover 1804)。—253。

库珀，詹·费·《大失所望的警察》(Cooper, J. F.; Der enttäuschte Polizist)。—329。

库珀，詹·费·《间谍》(Cooper, J. F.; Der Spion)。—325。

## L

拉罗什雅克兰，[昂·奥·若·][《1848年2月24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48年2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6号(Larochejaquelein, [H.-A.-G. de]: [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24. Februar 1848. ]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6, 25. Februar 1848)。—139、142。

拉马丁，[阿·][《1848年2月24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48年2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6号(Lamartine, [A.]: [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24. Februar 1848. ]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6, 25. Februar 1848)。—137、142、365、370。

[《莱茵省市镇参议会代表大会决议》]，载于1849年5月9日《科隆日报》第110号([Beschluss des Kongresses der Deputierten der rheinischen Gemeinderäte. ]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10, 9. Mai 1849. 2. Ausg.)。—14—15。

赖德律-洛兰，[亚·奥·][《1849年6月1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6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3号(Ledru-Rollin, [A.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1. Juni 1849. ]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3, 12. Juni 1849)。—191—194。

[《理查·科布顿先生和俄国公债》]，载于1850年1月1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390号(Cobden, [Richard] Mr., and the Russian loan.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390, 19. Januar 1850)。—244。

《临时政府致法国人民的宣言。[1848年]2月24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2月

- 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6号(Proclamation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is, le 24 février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6, 25. Februar 1848)。——137、366。
- 卢[格],阿·《马克思和恩格斯》,载于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74号(R[uge], A.: Marx und Engels. In: 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 Norddeutsche Abendzeitung. Nr. 474, 17. Januar 1851)。——624—625。
- 路德,马·《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Luther, M.: Ermahnung zum friden auff die zwelff artickel der Bawrschafft ynn Schwaben. Auch widder die reubischen vnd mordisschen rotten der andern bawren.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3. Stuttgart 1843)。——490。
- 路德,马·《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1520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artin: 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Wittenberg 1520])。——488。
- 路德,马·《就反对农民的小册子发的通函》1525年版(Luther, M.: Ein Sendbrief von dem harten Büchlein wider die Bauern. 1525)。——491。
- 路德,马·《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1524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 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rührischen geyst. Wittenberg 1524)。——498。
- 路德,马·[《1525年2月4日给约·布里斯曼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Luther, M.: [Brief an Johann Brißmann, 4. Februar 1525.]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500。
- 路德,马·[《1525年5月30日给约·吕埃尔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Luther, M.: [Brief an Johann Rühel, 30. Mai 1525.]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3. Stuttgart 1843)。——490—491。
- 路德,马·《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1520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 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Wittenberg 1520)。——见路德,马·《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



[吕宁,奥·][评]卡·马克思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载于1850年6月22日《新德意志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148号([Lüning, O.]:[Rezension zu:]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von Karl Marx. In: Neue Deutsche Zeitung. Frankfurt/Main. Nr. 148, 22. Juni 1850)。——449—450。

《伦敦民主组织告人民书。1850年7月22日》,载于1850年8月6日《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巴黎—伦敦)第2期(Aux peuples! Organisation de la démocratie. Londres, 22 juillet 1850. In: 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 Paris, Londres. Nr. 2, 6. August 1850)。——426, 618—622。

## M

《马丁·路德论温克尔麦斯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 Luther's Schrift von der Winkelmesse.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492。

马志尼,朱·《意大利国民委员会[宣言]。[摘录]》,载于1850年10月23日《事件报》(巴黎)(Mazzini, G.: [Manifest des] Comité national Italien. [Ausz.] In: L'Événement. Paris. 23. Oktober 1850)。——601。

梅兰希顿,菲·《奥格斯堡告白》(Melanchthon, Ph.: Augsburger Konfession)。——489。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1849年伯尔尼版(Microslawski, L.: Rapports... sur la Campagne de Bade. Berne 1849)。——70, 84—85。

梅纳尔,路·《革命的序幕。1848年2—6月》1849年巴黎版(Ménard, L.: Prologue d'une Révolution. Février-juin. —1848. Paris 1849)。——401。

《每周新闻》,载于1850年6月15日《旁观者》(伦敦)第1146号(News of the week. In: The Spectator. London. Nr. 1146, 15. Juni 1850)。——451。

《每周政治和议会评论》,载于1850年3月18日《人民之声报》(巴黎)第167号增刊(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de la semaine. In: La Voix du peuple. Paris. Nr. 167, 18. März 1850. Suppl.)。——222—223。

蒙塔朗贝尔,[沙·][《1849年12月13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12月1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48号(Montalembert, [Ch.]: [Rede in der

- Assemblée nationale, 13. Dezember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48, 14. Dezember 1849)。——210。
- 闵采尔,托·[《布拉格宣言》](Müntzer, Th.: [Prager Proklamation])。——493。
- 闵采尔,托·《对诸侯讲道。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人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宫内对积极的、可敬的诸侯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见闵采尔,托·《1524年7月31日在阿尔施泰特宫内对诸侯讲道》。
- 闵采尔,托·《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 Th.: Außgetrückte emplö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vngetrewen welt durchs gezeügnus des Euangelions Luce 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ermlichen Christenheytt zur innerung jres irsals. Ezechie am 8. Cap. Lieben gesellen last vns auch das loch weytter machen auff das alle welt sehen vnnd greyffen müg wer vnser grosse Hansen sind die Got also lesterlich zum gemalten mendleyn gemacht haben. Jere am 23. Cap. Thomas Muntzer mit dem hammer.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497—498。
- 闵采尔,托·《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滕贝格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 Th.: 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vnd antwort wider das Gaistloße Sanfft lebende fleysch zu Wittenberg welches mit verkärter weyße durch den Diepsta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ermd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tz jämerlichen besudelt hat.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497、500。
- 闵采尔,托·[《1522年3月27日给菲·梅兰希顿的信》],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 Th.: [Brief an Philipp Melanchthon, 27. März 1522.]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498。
- 闵采尔,托·[《1524年7月13日在阿尔施泰特宫内对诸侯讲道》],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 Th.: [Fürstenpredigt am 13. Juli 1524 im Schloß zu Allstedt.]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494、496。

《谋杀国王》1850年5月24日柏林[通讯],载于1850年5月25日《新普鲁士报》(柏林)第117号(Der Königsmord.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den 24. Mai 1850. In: 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Berlin. Nr. 117, 25. Mai 1850)。——439、442。

## N

[拿破仑第一]《关于西班牙军队真实态势的札记。1808年7月21日于巴约讷》,引自威·弗·帕·纳皮尔《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53年经作者修订的伦敦新版第1卷([Napoleon I<sup>er</sup>]: Notes sur la position actuelle de l'armée en Espagne. Bayonne, ce 21 juillet, 1808. In: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New ed., rev. by the author. Vol. 1. London 1853)。——652—654。

## P

帕麦斯顿, [亨·约·坦·] [《1850年6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0年6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525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Juni 185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525, 26. Juni 1850)。——599。

《皮尔纪念碑》,载于1850年8月17日《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9号(The Peel monument. Exposure of a gang of "artful dodgers". In: The Red Republican. London. Nr. 9, 17. August 1850)。——600。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639。

《普鲁士密探》,载于1850年6月22日《威悉报》(不来梅)第2037号(Preußische Spione. In: Weser-Zeitung. Bremen. Nr. 2037, 22. Juni 1850)。——451。

## Q

威美尔曼,威·《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三卷集)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Zimmermann, W.: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1—3.

Stuttgart 1841—1843)。——487—505、524—526、528。

## R

日拉丹,埃·德·《社会主义和捐税》1850年巴黎版(Girardin, Émile de: *Le Socialisme et l'impôt*. Paris 1849)。——342—354、420。

日拉丹,埃·德·〔(1850年7月8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50年7月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90号(Girardin, É. de: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8. Juli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90, 9. Juli 1850)。——605。

## S

赛居尔·达居索,〔雷·约·保·〕〔(1850年3月16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50年3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6号(Ségur d'Aguesseau, [R.-J.-P. de]: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6. März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6, 17. März 1850)。——222。

《塞纳河畔的选举。选民同盟》,载于1850年3月6日《祖国报》(巴黎)第65号(Élections de la Seine. Union Électorale.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65, 6. März 1850)。——397—398。

《山岳党告法国人民的宣言。〔1849年〕6月12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13日《人民报》(巴黎)第206号(Déclaration de la Montagn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is, 12 juin [1849]. In: *Le Peuple*. Paris. Nr. 206, 13. Juni 1849)。——195。

《山岳党告人民书》,载于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6号(Compte-rendu de la Montagne au peuple. In: *Le Peuple de 1850*. Paris. Nr. 6, 11. August 1850)。——607。

尚加尔涅,〔尼·安·泰·〕〔1849年6月16日的报告书。巴黎〕,载于1849年6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1号(Changarnier, [N. A. Th.]: *Rapport*. Paris, le 16 juin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1, 20. Juni 1849)。——189。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420、643。

施奈德,〔弗·〕《第1—14号命令》,载于1849年5月31日、6月4日和9日《莱

- 茵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官方通报和新闻报》(凯撒斯劳滕)第8、10、11号(Sznayde, [F.]: Tagesbefehl. Nr. 1—14. In: Amts- und Intelligenzblatt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der Rheinpfalz. Kaiserslautern. Nr. 8, 31. Mai 1849; Nr. 10, 4. Juni 1849; Nr. 11, 9. Juni 1849)。——57。
- [《十二条款》], 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Zwölf Artikel.] Dye Grundtlichen Vnd rechten haupt Artickel aller Burschafft vnnnd Hyndersessen der Gaistlichen vnd Weltlichen oberkayten von wölchen sy sich beschwert vermainen.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525、528、531、533。
- 《书简》, 引自威·威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Artikelbrief. Nach: W. Zimmer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 2. Stuttgart 1842)。——525、528—529。
- 司徒卢威, 古·《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年伯尔尼版(Struve, G.: 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 Bern 1849)。——40、87—90、103。
- 司徒卢威, 古·《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1848年比尔斯费尔登版(Struve, G.: Die 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Birsfelden 1848)。——37、41。
-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六卷集[可能是四卷集])1835—1839年伦敦版第1—4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commentary, 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d. i. Edward Gibbon Wakefield]. In 6[vielm. 4]Vol. Vol. 1—4. London 1835—1839)。——636。
- 苏, 欧·《巴黎的秘密》(Sue, E.: Les mystères de Paris)。——217。

## T

- 《弹劾内阁的控诉书。——山岳党和蒲鲁东派的和解》, 载于1849年1月3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09号(Der Anklageakt gegen das Ministerium. — Die Aussöhnung der Montagnards und Proudhoniste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09, 31. Januar 1849)。——176—177。
- 梯也尔, [阿·][《1850年2月23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50年2月2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5号(Thiers,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3. Februar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5, 24. Februar 1850)。——205。
-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578、582。
- 图克,托·《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Tooke,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rrency with prices, and the expediency of a separation of issue from banking*. 2. ed. London 1844)。——636。

## W

- 维达尔,弗·《论财富的分配,或论社会经济的公正分配》1846年巴黎版(Vidal, F.: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ou de la justice distributive en économie sociale; ouvrage contenant l'examen critique des théories exposées soit par les économistes, soit par les socialistes*. Paris 1846)。——221。
- 沃邦,塞·《王室什一税》(Vauban, S.: *Projet de dime royale*)。——210。
- [沃尔弗,斐·]《拿破仑被提名为候选人》, [1848年]12月18日巴黎[通讯], 载于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74号([Wolff, F.:] *Als die Kandidatur Napoleons auftaucht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8. Dezember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74, 21. Dezember 1848)。——169。
- [沃尔弗,斐·]《法国人……》, [1849年]1月7日巴黎[通讯], 载于1849年1月10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91号([Wolff, F.:] *Die Franzosen werden immer gründlicher...*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7. Jan.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91, 10. Januar 1849)——175。
- [沃尔弗,斐·]《我们……》, [1848年]12月18日巴黎[通讯], 载于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74号([Wolff, F.:] *Wir haben uns nicht getäuscht: Die Wahl...*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den 18. Decb.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74, 21. Dezember 1848)。——169。
- 沃尔弗,威·《“帝国”后事》,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Wolff, W.: *Nachträgliches “aus dem Reich”*.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4)。——289。

## X

〈选举。六小时〉,载于1850年3月12日《祖国报》(巴黎)第71号(Élections. 6 heures. In: 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Paris. Nr. 71, 12. März 1850)。——397—398。

西蒙,路·〈请求德国陪审团保护全体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Simon, L.: Ein Wort des Rechts für alle Reichsverfassungskämpfer, an die deutschen Geschwornen. Frankfurt am Main 1849)。——256。

西蒙,[路·][〈1849年4月11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4月13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71号第2版(Simon, [L.]: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11. April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71, 13. April 1849. 2. Ausg.)。——257—260。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2. éd. T. 1. 2. Paris 1827)。——636。

〈宪法之友民主协会[宣言]。[1849年6月13日]〉,载于1849年6月13日《人民报》(巴黎)第206号([Manifest der]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 [13 juin 1849.] In: Le Peuple. Paris. Nr. 206, 13. Juni 1849)。——195。

谢努,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Chenu, A.: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324—341。

## Y

伊文思,戴·莫·〈1847—1848年商业危机〉1848年伦敦版(Evans, D. M.: The commercial crisis 1847—1848... To which is added; an app., containing an alphabetical list of the English and foreign mercantile failures, with the balance sheets and statemen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uses. London 1848)。——583。

雨果,维·[〈1849年10月20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10月2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94号(Hugo, V.: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0.

Oktober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94, 21. Oktober 1849) ——202。

## Z

詹[姆斯], 查·《伦敦大主教对威斯敏斯特请愿书的答复》, 载于 1850 年 10 月 29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0632 号(J[ames], Ch.: Reply of the bishop of London to the memorial from the Westminster clergy.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632, 29. Oktober 1850)。——601。

《正统派代言人的阴谋》, 载于 1850 年 9 月 22 日《1850 年人民报》(巴黎)第 24 号(La conspiration légitimiste avouée. In: Le Peuple de 1850. Paris. Nr. 24, 22. September 1850)。——610。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7 年 2 月》, 载于《1848 年民主手册》1847 年莱比锡版(Ansprache der Volkshalle des Bundes der Gerechten an den Bund, Februar 1847. In: Demokratisches Taschenbuch für 1848. Leipzig 1847)。——385—386。

## 法律、法令、条例

## B

《巴登委员会和莱茵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条约。1849 年 5 月 17 日》, 载于 1849 年 5 月 31 日《卡尔斯鲁厄日报》第 15 号(Vertrag zwischen dem Landesausschuß von Baden und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von Rheinpfalz. Karlsruhe, den 17. Mai 1849. In: Karlsruher Zeitung. Organ des Landesausschusses. Nr. 15, 31. Mai 1849)。——44。

## C

《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严厉的刑罚法规》(Hals oder Peinliche Gerichtsordnung Kaiser Carls V. und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s)。——479。

## F

〔《法国临时政府法院组织法草案》〕, 载于 1848 年 7 月 21 和 23 日《新莱茵报》



- (科隆)第 51 号和 53 号附刊([Gesetzentwurf über die Gerichtsverfassung der provisorischen französischen Regierung.]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51, 21. Juli 1848 u. Beil.; Nr. 53, 23. Juli 1848, Beil.)。——161。
-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848 年 11 月 4 日于巴黎》,载于 1848 年 11 月 7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312 号(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le 4 novembre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12, 7. November 1848)。——165—169, 173—174, 177—181, 191—200, 201, 224, 446, 610, 611, 679—680。

## G

- [《关于巴黎到阿维尼翁铁路的法案。(摘录)》],载于 1849 年 8 月 9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221 号增刊([Projet de loi relatif au chemin de fer de Paris à Avignon. Ausz.]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1, 9. August 1849. Suppl.)。——209。
- 《关于保留 1850 年度酒税的法令。]1849 年 12 月 20 日于巴黎》,载于 1849 年 12 月 21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355 号([Loi relative au maintien de l'impôt sur les boissons pour l'année 1850.] Paris, le 20 déc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55, 21. Dezember 1849)。——125, 247, 208, 211, 215, 272。
- 《关于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的法令。]1848 年 2 月 25 日于巴黎》,载于 1848 年 2 月 26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57 号([Décret pour garantir l'existence de l'ouvrier par le travail.] Paris, le 25 février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57, 26. Februar 1848)。——139。
- 《关于报刊杂志缴纳保证金的法令。1848 年 8 月 9 日于巴黎》,载于 1848 年 8 月 12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225 号(Décret relatif aux cautionnements des journaux et écrits périodiques. Paris, le 9 août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5, 12. August 1848)。——161。
- 《关于报纸保证金和定期及不定期刊物印花税的法令。1850 年 7 月 16 日于巴黎》,载于 1850 年 7 月 24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205 号(Loi sur le cautionnement des journaux et le timbre des écrits périodiques et non périodiques. Paris, le 16 juillet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05, 24. Juli 1850)。——606—608。

- 〔关于储蓄银行现有存款支付办法的法令。〕1848年3月9日于巴黎), 载于1848年3月1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0号([Décret sur les versements des dépôts faits aux caisses d'épargne.] Paris, le 9 mars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0, 10. März 1848)。——144—145。
- 《关于第二批征召人民自卫团的武器交给第一批征召人民自卫团的命令。1849年5月27日于凯撒斯劳滕》, 载于1849年5月27日《莱茵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官方通报和新闻小报》(凯撒斯劳滕)第6号(Décret. Die Abgabe der Waffen des Zweiten Aufgebots der Volkswehr an das erste betreffend. Kaiserslautern, den 27. Mai 1849. In: Amts- und Intelligenzblatt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der Rheinpfalz. Kaiserslautern. Nr. 6, 27. Mai 1849)——55。
- 〔关于调动诺马耶将军的命令。〕1850年10月29日于巴黎), 载于1850年10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3号([Décret sur la déplacement du général Neumayer. Paris, ]le 29 octobre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03, 30. Oktober 1850)。——613。
- 《关于废除全英国殖民地奴隶制的法令。1833年8月28日》, 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33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roughout the British colonies; for promoting the industry of the manumitted slaves; and for compensating the persons hitherto entitled to the services of such slaves. 28<sup>th</sup> August 1833.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33)。——588。
- 《关于将六月起义者流放阿尔及利亚的法令。1850年1月24日于巴黎》, 载于1850年1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号(Loi relative à la transportation des insurgés de juin en Algérie. Paris, le 24 janvier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0, 30. Januar 1850)。——272。
- 《关于将六月十三日阴谋和谋杀案主犯及从犯送交最高法院审判的法令。1849年8月10日于巴黎》, 载于1849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4号(Loi qui renvoie devant la haute cour de justice les auteurs et complices du complot et de l'attentat du 13 juin. Paris, le 10 aoû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4, 12. August 1849)。——197。
- 〔关于解除法兰西银行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的〕法令。1848年3月15日于巴黎》, 载于1848年3月16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6号(Décret [qui dispense la banque de France de l'obligation de rembourser ses billets avec des

- espèces]. Paris, le 15 mars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6, 16. März 1848). —145—146、217、595。
- 《关于救助国王陛下罗马天主教臣民的法案。1829年4月13日》，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29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relief of His Majesty's Roman Catholic subjects. 13<sup>th</sup> April 1829.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29)。——600。
- 《关于剧场治安的法令。1850年7月30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8月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14号(Loi sur la police des théâtres. Paris, le 30 juillet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14, 2. August 1850)。——684。
- 《关于俱乐部的法令。1848年7月28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8月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15号(Décret sur les clubs. Paris, le 28 juillet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15, 2. August 1848)。——161。
- 《(关于临时政府的独立行政权的)法律。1849年6月15日于卡尔斯鲁厄》，1849年6月21日《卡尔斯鲁厄日报》第34号((Die dictatorische Gewalt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betreffend.) Gesetz. Karlsruhe, den 15. Juni 1849. In: Karlsruher Zeitung. Organ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Nr. 34, 21. Juni 1849)。——35。
- 《[关于流放]已确认参加了6月23日事件的在押犯的法令。1848年6月27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82号([Décret sur la transportation] des individus actuellement détenus qui seront reconnus avoir pris part à l'insurrection du 23 juin et des jours suivants. Paris, le 27 juin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82, 30. Juni 1848)。——170。
- 《关于陪审团组成的法令。1848年8月7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8月1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4号(Décret relatif à la composition du jury. Paris, le 7 août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4, 11. August 1848)。——161、690。
- 《关于乡村学校教师的法令。1850年1月11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1月1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号(Loi relative aux instituteurs communaux. Paris, le 11 janvier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 15. Januar 1850)。——215、247、272。
- 《[关于任命市长及其助理的法案]》，载于1850年3月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61号([Projet de loi relatif à la nomination des maires et adjoints.] In: Le

-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61, 2. März 1850)。——215。
- 《关于实行新的市镇施政条例的法令。1849年5月26日于凯撒斯劳滕》，载于1849年5月27日《莱茵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官方通报和新闻小报》(凯撒斯劳滕)第6号(Decret, die Einführung der neuen Gemeinde-Ordnung betr. Kaiserslautern, den 26. Mai 1849. In: Amts-und Intelligenzblatt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der Rheinpfalz. Kaiserslautern. Nr. 6, 27. Mai 1849)。——51。
- 《[关于授权政府禁止俱乐部和其他公开集会的法令。]1849年6月19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2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4号([Loi qui autorise la Gouvernement à interdire les clubs et autres réunions publiques.] Paris, le 19 juin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4, 23. Juni 1849)。——198、684—685。
- 《[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1848年3月2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3月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63号([Décret sur la diminution de la journée de travail.] Paris, le 2 mars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63, 3. März 1848)。——161。
- 《[关于限期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法令。1848年3月16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3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7号(Décret [sur la perception temporaire de quarante-cinq centimes du total des rôles des quatre contributions directes. Paris], le 16 mars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7, 17. März 1848)。——146、215、631。
- 《关于修改《刑法典》第414、415和416条的法令。1849年10月11日、11月19日和27日》载于1849年12月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7号(Loi qui modifie les articles 414, 415 et 416 du Code pénal. Paris, les 11 octobre, 19 et 27 nov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37, 3. Dezember 1849)。——684。
- 《关于修改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的法令。1850年5月31日》，载于1850年6月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4号(Loi qui modifie la loi électorale du 15 mars 1849. Paris, le 31 mai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4, 3. Juni 1850)。——605、607、610、686—687。
- 《关于延长1849年6月22日通过的俱乐部法和其他公开集会法的有效期的法令。1850年6月6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6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5号(Loi portant prorogation de la loi du 22 juin 1849 sur les clubs et autres

- réunions publiques. Paris, le 6 juin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5, 12. Juni 1850)。——684—685。
- 《关于盐税的法令。1848年12月28日》，载于1848年12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65号（Loi relative à l'impôt du sel. Paris, le 28 décembre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65, 30. Dezember 1848）。——127、172—173、184。
- 《关于在首都及附近地区建立警察部队的法令。1829年6月19日》，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29年伦敦版（An Act for improving the police in and near the metropolis. 19<sup>th</sup> June 1829.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29）。——600。
- 《关于镇压通过报刊进行犯罪行为的法令。1848年8月11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5号（Décret relatif à la répression des crimes et délits commis par la voie de la presse. Paris, le 11 août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5, 12. August 1848）。——684。
- 《关于中止法兰西银行券强行流通的法令。1850年8月6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8月1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55号（Loi qui fait cesser le cours forcé des billet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Paris, le 6 août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55, 13. August 1850）。——595。
- 《国民议会议事规程草案》，载于1849年6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6号（Projet de règleme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6, 25. Juni 1849）。——197、686。
- 《国民议会通过的最初宪法草案。[1848年]6月19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2号（Projet de constitution présenté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le 19 juin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2, 20. Juni 1848）。——165、679。

## J

- 《集会法。1848年6月7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1号（Loi sur les attroupements. Paris, le 7 juin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1, 9. Juni 1848）。——153。
- 《教育法。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3月2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86号（Loi sur l'enseignement. Paris, les 19 janvier,

26 février et 15 mars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86, 27. März 1850)。——215—216, 221, 223, 272, 685。

《戒严法。1849年8月9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4号(Loi sur l'état de siège. Paris, le 9 aoû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4, 12. August 1849)。——198, 680, 683。

### K

《卡洛林纳刑法典》(Carolina)——见《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严厉的刑罚法规》。

###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 Ed. orig. et sule officielle. Paris 1808)。——11。

### P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12—13。

《[普鲁士政府新闻出版条例。]1850年6月5日》，载于1850年6月8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155号([Verordnung der preußischen Regierung über die Presse, ]5. Juni 1850. In: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155, 8. Juni 1850)。——292, 435。

### W

《外侨管理法》(Alien Bill)——见《准许将外侨驱逐出王国本土一年的法令。1843年6月9日》。

### X

《新闻出版法。1849年7月27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7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11号(Loi sur la presse. Paris, le 27 juille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11, 30. Juli 1849)。——198, 683—684。

《刑法典》(Code pénal)。——337。

《选举法。1849年2月8、28日和3月15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3月19日

《总汇通报》(巴黎)第 78 号(Loi électorale. Paris, les 8 et 28 février et 15 mars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8, 19. März 1849)。——686 — 687。

### Y

《英格兰银行改革法。1844 年 7 月 19 日》，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44 年伦敦版(An Act to regulate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and for giving to 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certain privileges for a limited period. 19<sup>th</sup> July 1844.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44)。——582, 599。

《友好协议法案》，载于 1848 年 8 月 12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225 号(Projet de décret sur les concordats amiable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25, 12. August 1848)。——162, 166, 216。

### Z

《准许将外侨驱逐出王国本土一年的法令。1848 年 6 月 9 日》，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48 年伦敦版(An Act to authorize for one year, and to the end of the then next session of Parliament, the removal of aliens from the realm. 9<sup>th</sup> June 1848. In: The Statut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48)。——434 — 436, 439, 452。

##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 D

《地球和旅行家》

—1850 年 10 月 26 日第 15318 号:(A book on Italy...). ——601。

### G

《国民议会报》

—1850年1月25日第23号:(Lettres de Londres... [Artikel:]Londres, 23 janvier 1850)。——273。

## J

### 《经济学家》

—1850年8月31日第366号:(Spirit of the trade circulars. In: The Economist.)。——594。

—1850年10月19日第373期:《商业缩影。星期五晚》(Commercial epitome. Friday night)。——584。

## Q

### 《权力报》

—1850年7月19日第199号:(L'Assemblée nationale, jugeant...)。——608—609。

## R

### 《人民之声报》

—1850年2月15日第137号(La France est l'alliée...)。——293—294。

—1850年3月17日第166号:(Avant-hier, le comité des commerçans...)。——222。

—1850年3月18日第167号:(Enfin le masque...)。——222。

## T

### 《泰晤士报》

—1850年3月11日第20433号:(In the National Assembly...)。——355。

—1850年3月13日第20435号:(We have received...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 March 12, [1850])。——355。

—1850年3月14日第20436号:(Telegraphic despatches received...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 March 13, [1850])。——355。

—1850年3月15日第20438号:(The modification of the Cabinet...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 March 15)。——355。



## X

## 《西德意志报》

—1850年1月17日第14期：(Die hies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Korrespondenz aus:] Breslau, 11. Januar [1850])。——390—391。

—1850年1月23日第19期：(In Nro. 14d. Z. befindet sich... [Korrespondenz aus:] Breslau, 17. Jan. [1850])。——390—391。

## 《新普鲁士报》

—1850年2月17日第39号(Der Entwurf des Gesetzes...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15. Februar [1850])。——278—279。

—1850年5月24日第116号：(Man glaubt hier... [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20. Mai [1850])。——441。

—1850年5月25日第117号：(Unsere große Times... [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den 21. Mai [1850])。——441—442。

## Z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1848年8月28日：(Nous laissons naturellement...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27 août [1848])。——160。

## 《总汇通报》

—1848年6月22日第174号：(La 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 a donné des ordres pour que les enrôlements commencent dès demain dans les ateliers nationaux... [le 21 juin 1848])。——153。

## 《祖国报》

—1850年3月15日第74号(Le citoyen Deflotte... )。——398—399。

## 文学著作

## A

阿恩特·恩·莫·《德国人的祖国》——268。

阿里欧斯托·洛·《疯狂的罗兰》。——148、175。

奥维狄乌斯·纳佐,普·〈哀歌〉。——634。

**B**

薄伽丘,乔·〈十日谈〉。——484。

柏拉图〈理想国〉。——166。

**D**

道默,格·弗·〈哈菲兹。波斯诗集〉。——252。

道默,格·弗·〈穆罕默德及其事业。东方诗集〉。——252。

**F**

伏尔泰〈亨利亚德〉。——201。

**G**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255。

**H**

海尔维格,格·〈来自山上〉,载于〈一个活人的诗〉。——203。

海涅〈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44。

荷马〈伊利亚特〉。——57、268。

**L**

勒萨日,阿·勒·〈桑蒂利亚纳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331。

**M**

莫里哀〈不得已的医生〉。——233、607。

莫扎特,沃·阿·〈魔笛〉。——318。

莫扎特,沃·阿·〈唐璜〉。——620。

**Q**

〈青蛙与老鼠之战〉。——268。

## S

-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599。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69。  
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69。

## W

-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201。  
维兰德, 克·马·《奥拜龙》。——420。

## X

- 席勒《钟之歌》。——250。

## Y

- 雨果《卫戍官·三部曲》。——230、604。

- 古兰经。——252。  
圣经。——169、482、491、493、494。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创世记)》。——201。  
—《旧约全书·摩西五经(申命记)》。——494、496。  
—《旧约全书·撒母耳记》。——168。  
—《旧约全书·士师记》。——195。  
—《旧约全书·雅歌》。——253。  
—《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255。  
—《旧约全书·箴言》。——253。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493。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280。

## 报 刊 索 引

### A

《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天主教反对派的机关报,1846年4月起用这个名称在布雷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编辑是莫·埃尔斯纳、尤·施泰因和约·泰梅;1849年4月起该报调整出版方针,并更名为《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855年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391。

### B

《巴伐利亚农村信使》(Bayerische Landbötin)——德国的一家杂志,1830—1847年用这个名称在慕尼黑出版,每周出三次,1848年改名为《伊萨尔报》(Isar-Zeitung),1864年停刊。——251。

《班贝格日报》(Bamberg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6—1865年在班贝格出版。——251。

《北德意志自由报》(Norddeutsche Freie Press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4月1日—1851年初在汉堡—阿尔托纳出版,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奥尔斯豪森;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706、725。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瑞尔在利兹创

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步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110、602、706。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简称《笨拙》,1841年在伦敦创刊,主编是威·梅·萨克雷。——355。

《辩论日报》(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北德意志晚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 Norddeutsche Abend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报纸,1849—1850年用《每日纪事报》(Tageschronik)的名称出版,主编是鲁·杜朗,1851年起改名,阿·卢格曾为报纸撰稿。——624—625。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宪章派左翼的月刊,1849年6月—1850年9月由乔·朱·哈尼在伦敦出版,曾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19—123、124—128、241—245、430、457。

## C

《城乡信使。普法尔茨人民报》(Der Bote für Stadt und Land. Pfälzisches Volksblatt)——德国的一家报纸,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机关报,1849年5—6月在凯撒斯劳滕出版。——56。

##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432。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德国的一家周报,1847年1月—1848年4月在曼海姆、1848年7月12日在巴塞尔出版,出版者是古·司徒卢威;报纸持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1848年7月—12月,弗·默尔德斯和雅·罗特

- 韦勒尔也用这个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小标题《续刊》(Neue Folge),并重新编号。——35。
- 《德国通讯员》(Correspondent von und für Deutschland)——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04年在纽伦堡创刊,最初报名为《法兰克通讯员》(Fränkischer Correspondent);1806年起用现在这个名称。——249、250。
- 《德意志—伦敦报。政治、文学和艺术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Blätter für Politik, Literatur und Kunst)——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周报,1845年4月—1851年2月报纸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资助下出版;1849年起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班贝格尔负责编辑;1849—1850年报纸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和古·司徒卢威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同时也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110、706、738。
- 《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报纸曾几度易名,1848年初卡·海因岑接管编辑部以前以《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ziales Leben Deutschlands)为名出版,1851年1月28日—4月23日又加了副标题《关于新旧故乡的状况和利益的报纸》;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406、706。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晚报,1803年起在伦敦每日出版;1866年以前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以后是保守党的机关报。——44、600。

## F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54。
- 《法兰克福通讯员》——见《德国通讯员》。
- 《法兰西日报》(La Gazette de France)——法国的第一家报纸,1631年由泰·勒诺多在巴黎创刊,最初名称为《新闻报》(La Gazette),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

两次,1792年起改为日报;七月王朝时期为正统派机关报。——139。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 Politique, industrie, sciences, arts et littérature)——法国的一家杂志,傅立叶派的刊物;《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农工法郎吉的报纸》(Le Phalanstère, journal p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ière, associée en travaux et en ménage)的续刊;1836年—1840年9月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每月出两次,1843年7月以前每周出三次;7月以后又先后改名为《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和《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1851年停刊;主编是维·孔西得朗。——195、337。

《飞行传单》(Fliegende Blätter)——德国的一家讽刺周刊,1845年在慕尼黑创刊;1848—1849年革命期间采取反对君主主义的立场。——48。

##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赖德律-洛兰;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158、177、325、326、327、330、332、335、338。

《改革报》(Die Reform)——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6月由阿·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副标题是《政治日报》,1848年中至50年代初在柏林出版,副标题改为《民主派机关报》;主编是爱·梅因。——43。

《共和国报》(La Républiqu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年2月26日—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出版,主编是埃·巴莱斯特。——447。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党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127、137、142、151、

159、163、172、177、179、180、184、185、188、189、195、198、200、219、221、235、248、338、339、378、382、609、694。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代表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合并。——221、233、273、441、462、606。

## H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6—11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朱·哈尼。——600。

## J

《加利尼亚尼信使报》(Galignani's Messenger)——法国的一家英文报纸,1814年在巴黎创刊,主要是转载英国报纸上的材料。——451。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494—496、584、588、594。

《进化。政治周报》(Die Evolution. Ein politisches Wochenblatt)——革命民主派的周报,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48年12月29日—1849年3月9日在比尔出版,共出了11期;主编是约·菲·贝克尔;报纸在1848年12月1日曾用《革命》(Die Revolution)的名称试行出版;报纸奉行革命民主主义方针。——44。

## K

《卡尔斯鲁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巴登政府的官方报纸;1757年在卡尔斯鲁厄创刊;1849年5月15日—6月2日巴登革命时期为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1849年6月3—24日为巴登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编辑是卡·布林德、亨·伯·奥本海姆和保·勒米施。——44—45、54。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



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报纸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15、55。

《快讯》(Dispatch)——见《每周快讯》。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 L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442。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233、462、606。

《临时政府官方新闻公报》(Amts- und Intelligenzblatt der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德国莱茵—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机关报，1849年5月22日—6月11日在卡尔斯鲁厄出版，共出12号。——51、56—58。

《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在巴黎和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月刊，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850年7—8月共出两期；参加编辑部的有赖德律-罗兰、朱·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和沃尔采尔；1850年10月底—1851年9月改为周刊《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在法国的圣阿芒出版。——457、618—622。

《伦敦—德意志新闻报》(London German Newspaper)——见《德意志—伦敦报。政治、文学和艺术报》。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第一家画报,1842年创刊,每周出一次,曾用其他文字出版。——295、296。

## M

《民主报。〈波罗的海守卫者〉的续刊》(Demokratische Zeitung. Neue Folge des Wächters an der Ostsee)——德国的一家日报,是1848年在斯德丁创办的《波罗的海守卫者》(Wächter an der Ostsee)的续刊,在柏林出版;1850年1月改名为《晚邮报。民主派报纸》(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同年3月取消了副标题),由爱·梅因、尤·孚赫和约·普林斯-斯密斯编辑出版,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有时具有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倾向,1850年7月因同年6月颁布的普鲁士新闻出版法而停刊。——402—404、407、409、706。

## N

《拿破仑》(Le Napoléon)——法国波拿巴派的周报,1850年1月6日—5月19日在巴黎出版。——217。

《纽伦堡信使》(Nürnberger Courier)——德国的一家日报,1673年创刊,最初名称为《和平和战争信使》(Friedens- und Kriegs-Courier);1842—1862年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250。

《纽约快邮报》(New-Yorker 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1834年创刊;最初为周报,1844年起改为日报;代表德国流亡者中的自由派的观点,1849—1850年支持伦敦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从50年代中期起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政策。——431、706。

## P

《旁观者》(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451—452。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1819年1月2日—1843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1843年7月1日—1848年4月30日用《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1848年5月1日—1850年12月31日改名为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1851年1月—1871年5月又改名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1871年5月4日起成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 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1917年停刊。——71、73、243、267、278、291、292、435。  
《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 Q

《权力报》(Le Pouvoir)——法国波拿巴派的机关报, 1849年4月—1850年6月用《十二月十日报。维护秩序的报纸》(Le Dix décembre. Journal de l'ordre)的名称出版, 此后改名为《权力报。十二月十日报》(Le Pouvoir. Journal du dix décembre), 1850年7月19日起取消副标题, 正式用《权力报》的名称出版; 1850年6月—1851年1月主编是阿道夫·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235、462、463、608。

## R

《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法国的一家日报, 蒲鲁东派的机关报; 主编是约·蒲鲁东; 1848年9月2日—1849年6月30日在巴黎出版, 是1848年4月—8月出版的《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的续刊; 1849年9月25日—1850年5月14日改名为《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出版; 1850年6月15日—10月13日又改名为《1850年人民报》(Le Peuple de 1850)出版, 并改为每周三次。——195—196、223、293—294、607、610。

《人民代表。劳动者日报》(Le Représent du Peuple. Journal quotidien des travailleurs)——见《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

《人民之声报》(La Voix du peuple)——见《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瑞士的一家日报, 1842—1858年由雅·克·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 1849年主编是小沙贝利茨; 报纸采取民主主义立场; 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272、279—280、706。

## S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200、219、235、248、273、609。

《事件报》(L'Événement)——法国的一家日报,由维·雨果创办,1848年8月—1851年在著作家奥·瓦克里、泰·戈蒂埃等人参与下在巴黎出版;报纸奉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方针。——601。

## T

《太阳报》(The Sun)——英国的一家报纸,1798—1876年在伦敦出版,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倾向。——434。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约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穆·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兰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年—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110、111、244、355、411、414、448、598、601、633、634。

## W

《晚报》(Le Moniteur du Soir)——法国的一家日报,在巴黎出版。——399。

《晚邮报。民主派报纸》(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见《民主报》。  
《波罗的海守卫者》的续刊)。

《威悉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44—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451。

《文艺杂谈》(Blä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1818年

在魏玛创刊,创办人奥·科策布,报名为《文艺周报》(Literarisches Wochenblatt),1820年由弗·阿·布罗克豪斯接办,改名为《文艺杂谈报》(Literarisches Conversationsblatt)在莱比锡出版;1826年7月1日起又改名为《文艺杂谈》,每日出版,1851年后改为周报,1898年停刊。——250。

## X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5月25日—1850年7月21日由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编辑是亨·毕尔格尔斯;报纸采取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报纸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开始出版的,企图以《新莱茵报》的继承者自居,并声明,对《新莱茵报》的订户今后将改送《西德意志报》。——391、706、712。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见《奥得总汇报》。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7月1日—1849年4月1日在达姆施塔特,4月1日以后至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编辑是奥·吕宁(1849年10月1日以前)、格·君特和约·魏德迈(10月1日以后);报纸持左派民主主义立场,1848—1849年在魏德迈的影响下接近《新莱茵报》,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后因其编辑被驱逐出境而被迫停刊。——449—450、706。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3、29、41 47、53、65、115、116、154、155、169、175、177、180、257—260、360、361、406、440、442、450、624、625、656、700、708—709。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5、8、10、112、115、

116、226、233、281、289、311、344、355、359、361、401、418、449—450、573、591、595、607、708、709。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8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夫，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年)；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71、278—279、440、441、442。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200、219、734。

《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297、325、326。

## Y

《伊萨尔报》(Isar-Zeitung)——见《巴伐利亚农村信使》。

《1850年人民报》——见《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

##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160、233、462、606。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德国的一家周报，1825—1878年在汉堡出版；主要刊登戏剧评论和文学评论；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726。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

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251。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127、137、139、141—142、144—146、153、155、158—166、172、175、179、180、183、189、192—194、199、202—205、208—210、215、216、221、222、247、248、297、365—370、379、398、593—595、613、680、683—692。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397—399、630。

## 地名索引

## A

- 阿本斯贝格 657。  
阿德莱德 639。  
阿登高原 676。  
阿恩施塔特 564。  
阿尔巴尼亚 557。  
阿尔卑斯山脉 325、536、558—560、  
657、675、676。  
阿尔伯斯韦勒 77。  
阿尔布河 105。  
阿尔高 627。  
阿尔河 279、280。  
阿尔及尔 217、239、384、583、613、  
658、670。  
阿尔及利亚 59、248、272、658、671、  
686。  
阿尔萨斯 500、506、508—510、524、  
525、536、543、556—558。  
阿尔施泰特 493、494、496、497、  
499、500。  
阿尔斯特 123。  
阿尔泰 270。  
阿尔托夫(阿尔特多夫) 556。  
阿弗尔(勒阿弗尔) 583、593。  
阿富汗 639。  
阿戈讷(地区) 648、676。  
阿基坦 293。  
阿卡普尔科 592。  
阿勒海利根 100。  
阿莫巴赫 532。  
阿姆斯特丹 578、583、622。  
阿斯佩格 535。  
阿特拉托河 592。  
阿维尼翁 209。  
埃比泽姆 557。  
埃伯恩堡 488。  
埃伯斯海姆 556。  
埃登科本 66。  
埃尔伯费尔德(伍珀河谷) 16、18—  
29、34、59、80、245、424、582。  
埃尔青根 106。  
埃尔旺根 534。  
埃格利绍 107。



- 埃格米尔 657。  
 埃京根(下埃京根) 105。  
 埃朗根 252。  
 埃姆斯 201、202。  
 埃纳河 677。  
 埃平根 89、90、540。  
 埃奇河(阿迪杰河) 559。  
 埃斯林根 540。  
 埃特林根 91。  
 埃瓦廷根 524。  
 艾奥瓦(衣阿华)州 590。  
 艾费尔高原 20、29、32、52。  
 艾施河 546。  
 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见诺伊施塔特(艾施河畔)。  
 艾希斯费尔德 554。  
 爱尔福特 268、269、469、554。  
 爱尔兰 321、325、343、578、600、602。  
 爱森纳赫 554—556。  
 安斯巴赫 530、534、544。  
 安特卫普 583、654。  
 安韦勒 74、75、77。  
 昂西塞姆——见恩西斯海姆。  
 敖德萨 271。  
 奥伯魏尔 97。  
 奥珀瑙 100。  
 奥登海姆 87、88。  
 奥登林山 467、504、529、532、544。  
 奥地利 120、123、135、136、156、163、181—183、206、241—243、258、269、279、292、293、314、381、525、536、547、549、558—560、567、575、594、598、601、602、614—617、655、662、668。  
 奥尔德姆 582。  
 奥尔良 672。  
 奥芬巴赫 66、73。  
 奥芬堡 31、548、558。  
 奥弗涅山脉 677。  
 奥格斯堡 251、468、469、525。  
 奥克森豪森 527。  
 奥拉明德 489。  
 奥林波斯山 171、175。  
 奥恰科夫 657。  
 奥斯 98、99。  
 奥斯坦德 651。  
 澳大利亚, 澳洲 275、588、589、591—593。
- B**
- 巴本豪森 549。  
 巴登 13、15、19、28、29、31—38、41、43—46、48—50、52、53、57、70、72、77—79、84、85、90、92、104、106、108、201、245、258、360、361、427、507、509、510、512、514、525、575、615、699。  
 巴登-巴登 31。  
 巴尔 556。  
 巴尔特林根 526。  
 巴尔特斯韦尔 106。  
 巴伐利亚(拜恩) 57、61、120、252、254、388、427、504、530。  
 巴克南 512。

- 巴勒莫 135、136、252、364。  
巴黎 11、30、35、43、45、47、51、108、  
124、135—139、142、143、147—  
155、158、159、161—163、168、172、  
179、187、191、193、194、197、198、  
200、209、220—223、226、228、229、  
231、239、244、246、247、251、252、  
261、270、279、294—297、324、330、  
331、342、355、361、364—368、370、  
374、376、377、382、384、410—413、  
416、425、429、432、444—446、461、  
463、578、583、594、596、603、605、  
613、623、631、648、651、655、672、  
674—677、700、704、708、712、725、  
731、738。  
巴林根 534。  
巴伦贝格 530。  
巴门(伍珀河谷) 19、25。  
巴拿马 275、276、592。  
巴拿马地峡 275、591。  
巴纳特 269。  
巴塞尔 92、103、279、325、669、675。  
巴约讷 583。  
班贝格 427、530。  
北海 675—677。  
北美半岛 276。  
北美洲 275。  
北圣胡安——见圣胡安-德尼加拉  
瓜。  
北意大利 182、183、602。  
贝尔海姆 67、76。  
贝尔特海峡 458。  
贝格察伯恩 71、74、77。  
贝格海姆 556。  
贝勒岛 632—634。  
贝林佐纳 279、280。  
贝马廷根 527、538。  
贝桑松 59、429。  
比伯河 527。  
比蒂希海姆 536。  
比尔 99、514。  
比尔德豪森 530、556。  
比尔斯费尔登 37。  
比勒费尔德 720。  
比利时 50、93、330、426、438、442、  
457、578、651、668、677、731。  
比萨拉比亚 279。  
比施韦尔 95、96。  
比希希 90。  
比藏赛 136、364。  
彼得堡(圣彼得堡) 271、582、668、  
669。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270。  
秘鲁 591。  
宾根 47。  
波恩 425。  
波尔多 133、293。  
波河 657。  
波兰 123、135、271、279、293、325、  
330、458、520、521、660、667、669。  
波罗的海 314、458、625。  
波美拉尼亚 625。  
波森(波兹南) 459。  
波士顿 276。

- 波希米亚 484、485、493、617。  
 伯布林根 539、540、544。  
 伯尔尼 99、120、259、271、280、281、511、632。  
 伯尔尼高原 280。  
 伯金根 530。  
 柏林 10、13、21、58、252、269、318、351、387、418、419、427、435、439、440、442、459、614、668、669、706。  
 勃艮第 294。  
 勃兰登堡 699。  
 博登湖 508、527、549。  
 博恩多夫 104。  
 博特瓦尔(大博特瓦尔) 535。  
 不来梅 452、582、625。  
 不列颠帝国——见大不列颠。  
 不伦瑞克 251。  
 布达佩斯(佩斯) 515。  
 布尔根巴赫 523、524、526、547、548。  
 布尔日 187。  
 布格贝恩海姆 544、545。  
 布赫霍恩(腓特烈港) 538。  
 布亨 532。  
 布拉格 493。  
 布拉肯海姆 534。  
 布莱巴赫 101。  
 布莱和鲁镇 198。  
 布赖斯高 508、509、514、525、548。  
 布兰肯洛赫 81、84、85。  
 布劳博伊伦 512、534。  
 布雷根茨 279、550、586。  
 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10、390、427、668、669。  
 布雷滕 89—91。  
 布雷西亚 483、484。  
 布鲁赫莱茵 535、540。  
 布鲁赫萨尔 81、85—87、91、507、540。  
 布鲁塞尔 425—427、582、583。
- C
- 蔡尔 527、538。  
 蔡森豪森 90。  
 查格雷斯 275、276、592。  
 察伯恩(萨韦尔讷) 509、557。  
 察伯高 535。  
 楚尔察赫 279。  
 茨维考 492。  
 茨韦布吕肯 52、68、71、74。
- D
- 达达尼尔海峡 458。  
 达尔马提亚 269。  
 达克斯兰登 79。  
 达连地峡 592。  
 达姆施塔特 32、41、47。  
 大不列颠(不列颠帝国, 联合王国) 111。  
 大西洋 276、317、677。  
 代宁根 546。  
 代廷根 512。  
 丹巴赫 506。  
 丹麦 458—460、616、668。

但泽(格但斯克) 293。  
得克萨斯州 588,591。  
德布勒森 252。  
德国 (日尔曼尼亚、德意志)5、6—8、10—13、16、29、30、32、36、37、39、43、44、47、93、107、108、111、120、123、149、187、199、241、242、245、250、252、269—271、288、291、294、311、319、330、351、357、360、361、377、386—388、389、393—395、402、404、418—421、424—428、442、457—460、467—470、474、480、481、484、486、490、495、499—501、505、507、511、519、520、522、523、529、536、540、551、565—567、573、575、576、583、594、614、615、617、619、621、625、630、639、661、663、664、668、669、675、699、709、713、722、728、731、734、735、742。  
德累斯顿 10、13、19、28、51、53、699。  
德绍 615。  
德维纳河 660。  
迪德尔斯海姆 91。  
的里雅斯特 583。  
地中海 276、314、677。  
帝国公路 70。  
第聂伯河 660。  
第戎 694。  
蒂宾根(杜宾根) 513。  
蒂芬巴赫 89。

蒂罗尔 559、560。  
东波美拉尼亚 13。  
东普鲁士省 242。  
东印度 262、275、356、358、577、579、581、588。  
都灵 656、657。  
杜布诺 669。  
杜拉赫(卡尔斯鲁厄-杜拉赫) 91。  
杜塞尔多夫 11、14、18—20、22。  
多瑙埃兴根 100—105、279。  
多瑙河 526、527、529、537。  
多瑙沃特 527。

## E

俄国(俄罗斯) 136、143、156、191、243、270、271、279、280、292、293、316、381、435、438、439、458—460、575、582、586、598、615、655、660—662、664、667、669。  
俄勒冈州 591。  
厄尔巴岛 670。  
厄林根 531、543。  
恩讷珀河谷 16。  
恩西斯海姆(昂西塞姆) 511、558。

## F

法国(法兰西) 6—8、11、12、36、50、78、93、124、125—127、135—137、140、141、145、146、148、151、152、157、164、166、168—170、172、175、181、182、198、199、201、204、206—208、210、212—215、218、225—

- 229、241、245—247、262—264、  
272、276、279—281、288、291—  
296、303、314、317、334、342—345、  
347、351—354、360、362—366、  
368、369、372、373、376、378、379—  
382、384、386、388、394、396、397、  
402—404、410、416、418、420、421、  
426、429、438、442、444—446、457、  
458、461、469、480、482、484、520、  
524、573、576、578、584、586、594—  
596、603、611、615、617、619、632、  
634、639、648、652、654、655、660—  
664、668、670、672—676、679、683、  
688、690、692、695、699、713、734、  
735。
-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6、14、15  
19、21、29、32、33、39、41、43、47、  
109、119、256—259、425、427、547、  
578、594、706、725、726。
- 法兰克尼亚 13、31—33、46、427、  
500、522、524、530、538、543、546、  
554、564。
- 凡尔赛 237、296、611。
- 梵蒂冈 313。
- 菲林根 101—104。
- 腓特烈港——见布赫霍恩。
- 腓特烈斯塔尔 81、84、85。
- 腓特烈西亚 459。
- 费尔德基希 279。
- 芬兰 271。
- 佛兰德 469。
- 弗莱恩 531。
- 弗莱英根 90。
- 弗赖堡(布赖斯高的) 46、72、101、  
103、508、510、514、539、548。
- 弗兰克韦勒 73、79。
- 弗兰肯豪森 554—556、560。
- 弗兰肯塔尔 61、62。
- 弗劳恩贝格 533、534、542、544、  
546、554。
- 弗勒吕斯 652、653。
- 弗里斯兰 505。
- 弗伦巴赫 102。
- 弗罗茨瓦夫——见布雷斯劳。
- 孚日山脉 71、557、676、677。
- 符腾堡 13、31—33、46、94、98—  
101、120、258、269、388、510—512、  
514、525、526、528、529、534—536、  
538—540、548。
- 福格特兰 554。
- 福拉尔贝格 279。
- 福伊尔塔伦 45。
- 富尔达 554—556。
- 富特旺根 101、102、104、524。

## G

- 盖布韦勒(盖布维莱尔) 557。
- 盖恩斯巴赫 94、95、97—100。
- 盖尔多夫 535。
- 盖默斯海姆 39、47、59、66、67、70—  
73、78、81、85。
- 盖斯博伊伦 529。
- 高加索 667。
- 戈伊 539。

- 哥本哈根 459、598。  
哥达 258、614。  
哥伊斯 559。  
格丁根 427。  
格拉本 81。  
格拉斯哥 358、581、582、593。  
格赖芬克劳 522、547。  
格勒诺布尔 675。  
格雷夫拉特 18。  
格里森 105、500、501。  
格洛高(格沃古夫) 427。  
格马尔 556。  
格明德 534。  
格平根 534。  
贡比涅 339。  
广州 276、592。
- H
- 哈茨山 492、551、554。  
哈德斯菲尔德 704、705。  
哈尔 534、545。  
哈尔特山 534、726、738。  
哈尔特山麓诺伊施塔特——见诺伊施塔特(哈尔特山麓)。  
哈格瑙(阿格诺) 675。  
哈根 19、25、27、28。  
哈雷 492。  
哈利法克斯 582。  
哈瑙 427、725。  
哈特马特山 510。  
海德堡 31、87、90、534。  
海地 297。  
海丁斯费尔德 543、545。  
海尔布隆 510、530、532、533、540、541。  
海姆斯凯尔克 505。  
汉堡 5、10、116、249、251、252、427、578、582、583、615、706、720、725、726、738。  
汉诺威 120、253、615。  
好望角 275、593。  
合恩角 275、316。  
荷尔斯泰因——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荷兰 264、276、330、505、578、586、593、622、651、668。  
赫伦河谷 101。  
黑高 501、526。  
黑勒纳尔布 98。  
黑林山 100、101、103、104、467、500、508、509、511、516—518、523—526、529、548。  
黑彭海姆 41。  
黑森——见黑森-达姆施塔特或黑森-卡塞尔。  
黑森-达姆施塔特(黑森) 29、31—33、39、46、47、50、427、536、551、554—556、563、575、615。  
黑森-卡塞尔(黑森,黑森选帝侯国) 29、32、575、594、615、616。  
黑森选帝侯国——见黑森-卡塞尔。  
洪茨山 100。  
洪格贝格山 506。  
后魏登塔尔(魏登塔尔) 74、77。

华沙 155、586。  
 华盛顿 406。  
 滑铁卢 199、599、670。  
 霍恩特维尔 526、528。  
 霍赫瓦尔德山 676。  
 霍亨施陶芬 534。  
 霍亨施陶芬山 511。  
 霍亨索伦 33。  
 霍姆堡 60、65、68、70、71。

## J

基辅 670。  
 基希海姆(基希海姆博兰登) 56、  
 63、71、72、92。  
 基希海姆博兰登——见基希海姆。  
 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528、536、539。  
 吉伦特省 215。  
 加尔各答 581。  
 加尔省 215、247、273。  
 加格瑙 97、98。  
 加利福尼亚州 275、276、589、591 —  
 593。  
 加利西亚 8。  
 加拿大 591。  
 迦太基 276。  
 旧金山——见圣弗朗西斯科。  
 居滕巴赫 101。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270。

## K

喀琅施塔得 271。  
 卡珀尔 100。

卡珀尔河谷 100。  
 卡珀尔山 513。  
 卡尔斯多夫 81、82。  
 卡尔斯鲁厄 15、31、34、39、42 —47、  
 50、53、59、72、79 —81、84 —86、91、  
 92、109、325。  
 卡缅涅茨 670。  
 凯尔 325。  
 凯撒施图尔 100。  
 凯撒斯劳滕 43、47、51、52、54 —56、  
 58 —60、62 —65、68、70、71、93。  
 坎德尔(朗根坎德尔) 74、77 —79、  
 86。  
 坎特伯雷 316。  
 康斯坦茨 107。  
 考夫博伊伦 526。  
 柯尼希斯霍芬 543、544、546。  
 科布伦茨 14、19、225。  
 科尔本 557。  
 科尔马 280。  
 科赫尔河 504。  
 科赫尔河谷 543。  
 科隆 11、14、15、19、20、29、30、119、  
 241、245、360、424、427、428、432、  
 436、440、442、457、469、626、706、  
 708、712、720、725、731、734、736、  
 742。  
 科伦贝格山 550。  
 科莫 272、279。  
 克恩滕(卡林西亚) 516、559、560。  
 克拉科夫 135、136、364、668。  
 克莱堡 557。

克莱特高 501、548。  
 克赖希高 540。  
 克赖因 516、559、560。  
 克劳特海姆 530、542、542。  
 克雷费尔德 20。  
 克罗地亚 269、662。  
 克罗嫩贝格 25、26。  
 克罗伊茨纳赫 49、55、70。  
 克尼比斯山 510、517。  
 克尼林根 70、85。  
 克尼林根桥 73、74、78、79、85、86。  
 克尼特尔斯海姆 67。  
 肯彭 21。  
 肯普滕 279、505、526、550、563。  
 库尔 279。  
 库彭海姆 92、94。  
 库特赖(科特赖克) 582。  
 奎希河 59。  
 奎希河谷 74。

## L

拉波茨韦勒(里博维尔) 556。  
 拉德施塔特 560。  
 拉多尔夫采尔 548。  
 拉夫茨 106。  
 拉科什 515。  
 拉芒什海峡 228。  
 拉绍德封 726。  
 拉施塔特 31、34、46、58、72、91—  
 93、99、107、109、402、432、560。  
 莱昂 276。  
 莱昂贝格 513、539。

莱比锡 10、427、556、594。  
 莱恩 508、510。  
 莱格尼察——见利格尼茨。  
 莱科 279。  
 莱瑙 106。  
 莱尼亚哥 657。  
 莱普海姆 500、527、531、535、537。  
 莱塔河 8、19。  
 莱希河 526、529。  
 莱茵阿尔卑斯山脉 325。  
 莱茵巴伐利亚——见普法尔茨。  
 莱茵地区——见莱茵省。  
 莱茵费尔登 325。  
 莱茵高 547。  
 莱茵河 11、19、20、21、29、31、42、58、  
 60、62、70、81、85、105、280、298、  
 403、504、507—509、511、516、522、  
 524、526、534、556、667、669、670、  
 675、676、708。  
 莱茵河谷 71、101。  
 莱茵黑森 11。  
 莱茵普法尔茨——见普法尔茨。  
 莱茵普鲁士——见莱茵省  
 莱茵省(莱茵普鲁士,莱茵地区) 6、  
 10—15、19—21、28—33、38、  
 52—54、96、97、360、403、427、428、  
 522、594、708。  
 赖恩 516。  
 赖兴魏尔(里克维尔) 556、558。  
 兰道 39、47、51、59—61、66、69—  
 74、77、78、522。  
 兰开夏郡 580。



- 兰施图尔 522。  
朗根坎德尔——见坎德尔。  
朗根萨尔察 554、556。  
劳芬 536。  
劳芬堡 548。  
劳赫林根 105。  
劳特堡(洛泰堡) 50。  
劳特河谷 74。  
勒拉赫 101、279。  
勒文施泰因 531、543。  
雷德维茨 546。  
雷姆沙伊德 19。  
雷姆斯河谷 511—514。  
黎凡特 356、469。  
里昂 197—199、214、247、280、294、  
331、368、652、672、674。  
里德 526、537。  
里德伯林根 104。  
里德恩 106。  
里尔 368、672。  
里加 669。  
里斯本 264、582。  
里窝那 582。  
利格尼茨(莱格尼察) 427。  
利马 592。  
利马特河 279、280。  
利摩日 631。  
利物浦 276、304、357、579、581、582、  
593。  
联合王国——见大不列颠。  
林恩塔尔 74、75、77。  
林普格 534。  
龙斯多夫 19。  
卢普施泰因 557。  
卢塞恩 279、280、511。  
卢森堡 11、20。  
卢瓦尔河 678。  
鲁昂 132、226、247、368、594、631。  
鲁尔 19、27。  
鹿特丹 583、593、675、676。  
路德维希港 42、45。  
路易斯安那州 588。  
吕特灵豪森 25。  
伦巴第 182、557、601。  
伦敦 44、93、111、116、136、202、249、  
270、276、278、289、304、311、312、  
359、365、386、396、407—409、414、  
425、428、429、434、435、438—440、  
442、451、469、568、573、579、581、  
583、593、598、601、622、625、630、  
633、700—709、711、713、720、  
722—725、728、729、731—733、  
735、736、738、740—742。  
伦内普 25。  
罗马 8、160、181、183、184、187、189、  
191—193、200—202、280、324、  
474、488、521、587、601、658、679。  
罗讷河 676、677。  
罗森 509。  
罗森费尔德 534。  
罗斯托克 712。  
罗特河 527。  
罗特韦尔 101、279、506、510。  
罗滕堡 530、531、534、544、546。

罗滕费尔斯 94、95、97、98。

洛林 557。

洛泰堡——见劳特堡。

洛特施泰滕 106、107。

洛伊巴斯河 549、550。

## M

马德拉斯 581。

马德里 583。

马恩河 677。

马尔施 540。

马格德堡 58、492。

马希塔尔 523。

马克格勒宁根 512。

马克特贝格尔 546。

马赛 583。

马斯河(默兹河) 651、676、677。

迈卡默 68、73。

迈宁根 556。

曼彻斯特 300、358、581、582、588、  
624。

曼海姆 15、39、41、42、45、70。

曼图亚 652。

毛尔布龙 535。

毛尔斯明斯特(马尔穆捷) 557。

毛里求斯 581。

梅克伦堡 100、269、427、615。

梅克斯海姆 94。

梅勒巴赫 496。

梅明根 279、500、523、526、548。

梅斯 672。

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北美) 26、

262、275—277、300、317、351、358、  
418、441、582、585、588、590—594、  
739。

美因茨 20、32、70、71、404、427、532、  
547、669。

美因河 33、279、504、507、510、549。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见法兰克福  
(美因河畔)。

美洲 275、276。

美洲地峡 593。

蒙斯 583。

孟买 358、581。

米尔海姆 28、245。

米尔豪森——见米卢斯。

米尔豪森(托马斯·闵采尔城-米尔豪  
森) 497、551—556、564。

米兰 656。

米卢斯(米尔豪森) 226、368、594。

米歇尔巴赫 94、95、98。

密西西比河 591。

明德尔河谷 537。

明登 20。

明戈尔斯海姆 87、88。

明斯克 669。

明辛 534。

摩泽尔河 20、29、32、52、524、676、  
677。

莫尔塔拉 656。

莫斯科 669。

墨西哥 226、594。

墨西哥湾 275。

墨西拿 264。

慕尼黑 251、427。  
 穆尔格河 28、38、45、95、97、99、  
 386。  
 穆尔格河谷 96、98。

## N

拿骚 29、31—33、39、427。  
 那不勒斯(那波利) 181、182、264、  
 272、313。  
 纳戈尔德河谷 539。  
 纳沙泰尔 270、272、293。  
 纳塔尔 588。  
 南安普敦 592。  
 南德意志(南德)5、6、13、36—38、60、  
 245、708。  
 南美洲 275。  
 南特 239、613。  
 讷德林根 530。  
 内尔温登 651。  
 内卡河 9、529、532、542。  
 内卡河谷 530、539、543、544。  
 内卡加塔赫(海尔布隆-内卡加塔赫)  
 540。  
 内卡苏尔姆 531、543。  
 尼德兰 469、506、522。  
 尼德魏尔 96。  
 尼尔廷根 539。  
 尼加拉瓜 592、593。  
 尼克拉斯豪森 502、504、505。  
 纽伦堡 33、249、251、255、427、469、  
 471、499、500。  
 纽约 275、276、583、590、592、593、

706、712、720。  
 诺丁汉 602。  
 诺瓦拉 656、657。  
 诺伊堡 557。  
 诺伊施塔特(艾施河畔) 546。  
 诺伊施塔特(哈尔特山麓) 52、59、  
 66、68、70—73、534、726、738。  
 诺伊施塔特(武塔赫河畔) 101、  
 104。  
 诺伊斯 21。  
 诺伊特哈德 82、83。

## O

欧洲 8、107、110、136、142、143、148、  
 149、156、182、191、262、270、275—  
 277、279、281、294、314、320、358、  
 364、367、376、377、380、438、439、  
 457、458、468、566、567、578、586、  
 590—594、598、617、631、674。

## P

佩斯——见布达佩斯。  
 佩斯基耶拉 656。  
 蓬德博瓦桑 675。  
 皮埃蒙特 182、557、661、669。  
 皮尔马森斯 68、71、73、74。  
 皮卡第 483。  
 皮亚琴察 656。  
 葡萄牙 276。  
 普法尔茨(莱茵巴伐利亚,莱茵普法  
 尔茨) 5、10、11、13、19、28—31、  
 33、35、39、41、42、44—60、62、63、

68—73、79、84、85、258、289、424、  
534、547。

普费德斯海姆 547。

普富林根 535。

普鲁士 10、12—15、20、27、29、50、  
68、93、120、123、136、156、241、243、  
244、258、267、269、279、280、289、  
291—294、314、381、404、435、438、  
442、460、567、575、594、599、614—  
617、625、655、661、662、667、699、  
705、708。

普吕姆 21、28、30、59。

### Q

奇维塔韦基亚 181、183。

乔纳德 515。

切尔西 116。

### R

热马普 651、653。

热那亚 276、582。

日耳曼尼亚, 德意志——见德国。

日内瓦 271、280、408、425、675、716。

汝拉山, 汝拉山区 280、429、675—  
677。

瑞典 668。

瑞士 5、37、44、45、51、82、100、101、  
103—107、120、135、136、271、272、  
279—281、291、293、360、384、387、  
407、424、425、427、429、438、457、  
458、500、506、507、510、511、514、  
517、522、540、548、549、560、661、

699、713、731。

### S

撒丁 182、601。

萨尔布吕肯 49、55、70、71。

萨尔茨堡 558—560。

萨尔格明德 50、70、557。

萨尔河 557。

萨尔路易 20。

萨克森 6、10、12、54、120、123、427、  
499、500、505、551、556、615。

萨勒姆 538。

萨托里 237、239、611—613。

萨瓦 458。

萨瓦山 676。

塞格丁(塞格德) 515。

塞京根 105。

塞京根桥 105。

塞纳河 677、678。

塞纳省 172。

塞尼山 676。

塞斯托 656。

塞斯托卡伦代 279。

桑布尔河 676。

桑格豪森 556。

桑威奇群岛(夏威夷群岛) 591、  
592。

森海姆(塞尔奈) 557。

沙夫豪森 101、280、501。

沙夫豪森州 105、106。

上阿尔高 526。

上阿赫恩 99。

- 上奥地利 559、560。  
上巴登 40、44、100、103、524。  
上法兰克尼亚 554、556。  
上格龙巴赫 86。  
上金茨堡 549。  
上莱茵 524。  
上士瓦本 505、523、524、527、554。  
尚贝里 675、676。  
绍恩多夫 512、536。  
舍尔韦勒 506、558。  
申塔尔 530、531。  
申瓦尔德 102。  
圣彼得堡——见彼得堡。  
圣布拉辛 523。  
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 275、276、592。  
圣哥达山口 280。  
圣格奥尔根 101。  
圣赫勒拿岛 124、210、648。  
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北圣胡安, 格雷敦) 276。  
圣胡安-德乌卢阿 271。  
圣胡安河 592。  
圣加仑 279、549。  
圣伦纳兹 235—237、446、609、611。  
圣梅尔根 101、102。  
圣默努尔德 651。  
圣让达克 271。  
圣伊波利特 556。  
施珀克 82、84。  
施蒂林根 104、105、523、524。  
施拉德明 560。  
施兰贝格 101。  
施勒特施塔特(塞莱斯塔) 506。  
施吕瑟尔堡(彼得要塞城) 271。  
施马尔卡尔登 564。  
施派尔 47、52、70、72、73、85、507、534。  
施普吕根 279。  
施泰尔马克(施蒂里亚) 516、559、560。  
施泰特费尔德 88。  
施泰因海姆 523。  
施特里高(斯切戈姆) 407、408。  
施托茨海姆 506。  
施托尔贝格 492。  
施托尔珀(施托尔普, 斯武普斯克) 408、722。  
施托卡赫 524、525、548。  
施瓦本山 512、537。  
什切青——见斯德丁  
什未林 427、712。  
石勒苏益格——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因) 269、424、427、429、457—460、594、598、615、739。  
士瓦本 500、504、508、516、522、525、538、551、554。  
舒森河 526。  
斯德丁(什切青) 407、702、703、705。  
斯德哥尔摩 583。  
斯蒂泽尔布罗恩 557。

斯海尔德河 677。  
斯洛文尼亚 508、516。  
斯切戈姆——见施特里高。  
斯特拉斯堡 556、557、672、675、  
677。  
斯图加特 33、35、39、120、258、427、  
487、488、490—493、497、498、500、  
502、505、513、526、528、535、536。  
斯武普斯克——见施托尔珀。  
松德高 548、558。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 458。  
松特海姆 531。  
苏必利尔地区 598。  
苏必利尔湖 591。  
苏尔茨(上莱茵苏尔茨) 506、557。  
苏尔茨巴赫 94。  
苏尔茨多夫 544、545。  
苏格兰 321。  
苏黎世 77、279、425、500、626。  
苏黎世湖 522。  
苏黎世州 45、106。  
索恩河 677。  
索林根 16—19、25—28。  
索洛涅 153。  
索洛图恩 279、511。

## T

太平洋 275、276、586、591—593。  
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 515。  
陶伯河 530、543。  
陶伯河谷 502。  
特兰西瓦尼亚 515。

特里安 509。  
特里贝格 101、102、104。  
特里尔 14、20、29、256、268、402、  
522、725。  
特罗内肯 97。  
特万特佩克地峡 592。  
廷格达 556。  
廷根 105。  
图尔高(州) 523。  
图尔宽 653。  
图林根 98、478、490、493、500、501、  
518、525、530、536、551、554、556。  
图林根林山 556。  
图特林根 279。  
土耳其 270、279、281、293、514。  
土伦 652、662、674。  
推罗(提尔) 276。  
托特瑙 101。

## W

瓦尔茨胡特 105、500、523、548。  
瓦尔德昂格洛赫 87—89。  
瓦尔德堡 525、527、538。  
瓦尔德基希 100。  
瓦尔河 676。  
瓦尔米 651。  
瓦尔帕莱索 592。  
瓦格河 8。  
瓦格霍伊瑟尔 39、45、85—87、90。  
瓦拉几亚 621。  
瓦朗谢讷 672。  
瓦雷泽 279、280。

- 瓦特州(沃州) 271。  
 瓦兹河 677。  
 万塞讷 163。  
 旺代(省) 651、652、662。  
 威尼斯 276、560、562、582。  
 威斯巴登 236、237、427、609、611、725。  
 威斯康星州 590。  
 威斯特伐利亚 14、27、203、427、428、522。  
 维尔茨堡 427、502、505、530、532—534、542—547、549、564。  
 维尔纳(维尔纽斯) 669。  
 维尔廷根 512。  
 维勒河谷 556。  
 维罗纳 656。  
 维滕贝格 488、490、496、500、518。  
 维也纳 8、46、51、668、669、699、700。  
 韦瑟尔 20、27。  
 魏登塔尔——见后魏登塔尔。  
 魏恩海姆 41。  
 魏恩加滕 85、507、538。  
 魏恩斯贝格 512、531、542。  
 魏玛 497、499。  
 魏森堡(维桑堡) 547、557。  
 温茨海姆 545。  
 温迪施边区 516。  
 温克尔 94。  
 温嫩登 512。  
 温嫩施泰因山 535。  
 温特图尔 626。  
 沃尔法赫 100、103。  
 沃尔夫埃格 538。  
 沃尔马廷根 538。  
 沃尔姆斯 60—62、70。  
 沃尔特 78、79。  
 沃伦 279。  
 乌布施塔特 45、58、86—89、92。  
 乌茨纳赫 279。  
 乌尔比斯河谷 556。  
 乌尔姆 526、527、536、537。  
 乌弗瑞岛 522。  
 乌拉尔 270。  
 乌拉赫 524、534、539。  
 乌拉赫山 534。  
 伍珀河 19。  
 伍珀河谷(巴门, 埃尔伯费尔德)  
 16、18—29、34、59、80、245、424、582。  
 武尔察赫 527。  
 武塔赫河 105。  
 武塔赫河畔诺伊施塔特——见诺伊施塔特(武塔赫河畔)。  
 武特兴根 105。

## X

- 西班牙 226、276、468、557、594、655、660、676。  
 西里西亚 12、19、427、467。  
 西蒙斯瓦尔德河谷 101。  
 墨西哥 591。  
 西区(约克郡) 358。  
 西西里 314、515。  
 西印度 301、581。

- 希尔青根 548。  
希尔斯巴赫 89、90。  
希腊 60、324、557、598。  
悉尼 276、592。  
下阿尔高 527。  
下阿尔萨斯 556。  
下奥地利 560。  
下巴登 103。  
下蒂克海姆 512。  
下厄维斯海姆 86。  
下法兰克尼亚 529、544。  
下格龙巴赫 507、508、511。  
下莱茵省[法] 229、411、603。  
香槟 677。  
谢伦贝格 527。  
辛茨海姆 99。  
辛斯海姆 89、90。  
辛辛那提 712。  
新奥尔良 276。  
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 592。  
新加坡 276、592、594。  
新墨西哥 591。  
新苏格兰 591。  
新西兰 592、593。  
匈牙利 8、43、58、123、191、199、201、  
458、459、514、516、617。  
许芬根 104。
- Y
- 亚布伦卡河 19。  
亚琛 11、19。  
亚格斯特河 504、530、542。  
亚格斯特河谷 543。  
亚拉巴马州 588。  
亚历山大里亚 276。  
亚洲(亚细亚洲) 276、277、591、  
592。  
耶路撒冷 255。  
耶施泰滕 106。  
伊奥尼亚群岛 639。  
伊达尔林山 676。  
伊勒蒂森 537。  
伊勒河 527、549。  
伊利昂城 224。  
伊瑟隆 16、18、19、25、27、28。  
伊泽尔河 676。  
伊兹梅尔 657。  
以色列 183。  
意大利 8、149、181—183、199、276、  
279、314、458、459、468、469、484、  
524、602、619、621、655、656、668、  
675、676。  
因戈尔施塔特 545。  
因普夫林根 74、78。  
因斯布鲁克 279。  
印度 468、693。  
英格兰 321、600。  
英国 6、7、93、126、136、140、143、  
163、164、206—208、226、228、229、  
261—266、270、271、274—277、  
281、284、285、287、289、299、303—  
305、307—309、317、319、320、322、  
352、353、355、357、358、360、362、  
365、402、421、429、434、435、437—



- 
- 441、444、458、469、482、484、485、  
520、573、575、577—586、588、589、  
592—594、596—603、615、639、  
660、661、663、699。
- 于利希 20。  
约翰尼斯克罗伊茨 74。  
约讷河 677。
- 智利 591。  
中法兰克尼亚 529。  
中国 276、277、287、304、356、468、  
577、579、586、594  
中美洲 592。  
中欧 458。

**Z**

战斗山 555。